

國立中央大學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碩士論文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衝擊「香港七〇年代」神話：

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

Bursting the Myth of

The 'Hong Kong 70s Golden Era':

Thoughts, Affect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Fiery

Seventies Social Movement

研究生：劉璧嘉

指導教授：林淑芬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國立中央大學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碩士論文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衝擊「香港七〇年代」神話：

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

Bursting the Myth of

The 'Hong Kong 70s Golden Era':

Thoughts, Affect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Fiery

Seventies Social Movement

研究生：劉璧嘉

指導教授：林淑芬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學位論文授權書

填單日期：2021/7/25

2019.9 版

授權人姓名	劉璧嘉	學 號	104129003
系所名稱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學位類別	☒ 碩士 ☐ 博士
論文名稱	衝擊「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	指導教授	林淑芬

學位論文網路公開授權

授權本人撰寫之學位論文全文電子檔：

·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

(☒) 同意立即網路公開

(☐) 同意 於西元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網路公開

(☐) 不同意網路公開，原因是：_____

·在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同意立即網路公開

(☐) 同意 於西元_____年_____月_____日網路公開

(☐) 不同意網路公開，原因是：_____

依著作權法規定，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與國家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微縮、數位化或其他方式將上列授權標的基於非營利目的進行重製。

學位論文紙本延後公開申請 (紙本學位論文立即公開者此欄免填)

本人撰寫之學位論文紙本因以下原因將延後公開

·延後原因

() 已申請專利並檢附證明，專利申請案號：

() 準備以上列論文投稿期刊

() 涉國家機密

() 依法不得提供，請說明：_____

·公開日期：西元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繳交教務處註冊組之紙本論文(送繳國家圖書館)若不立即公開，請加填「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研究生簽名： 劉璧嘉 指導教授簽名： 林淑芬

*本授權書請完整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論文封面之次頁。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學系/研究所 劉璧嘉 研究生所提之論文 衝擊
「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
情感與組織 係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簽章)

2021 年 7 月 25 日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劉璧嘉 研究生所提之論文 衝擊「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定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委

員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30 日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劉璧嘉 研究生所提之論文 衝擊「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定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委

員

林淑芬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30 日

國立中央大學碩士班研究生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

學系統）劉璧嘉 研究生所提之論文 衝擊「香港七〇

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

織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定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_____

委 員

 _____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30 日

衝擊「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思想、情感與組織

摘要

本論文循著「火紅年代」與「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之間的矛盾和張力，以火紅年代這段「失敗者」的歷史作突破點，試圖複雜化從「七〇年代神話」而來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尤其是貫穿於火紅年代討論的「中國問題」，除了是關乎青年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興趣，更多時候甚至是折射出超越國族身份認同政治的範圍，而應該被理解為來自香港作為第三世界殖民地青年左翼對「國族政治」與「左翼政治」該持什麼關係的問題意識。本論文以歷史化的方法書寫了火紅年代從 1967 到 1976 年的史前史及發展史，並從情感、思想與組織為切入點，研究了六七暴動的左派和極左派、火紅年代中自發毛派、無政府主義者、托派、國粹派、社會派在第一波中文運動、《盤古》、《70 年代雙週刊》、珠海事件、保釣運動、反貪污運動、反加價運動、四報聯刊事件、「認識中國」活動中的實踐。同時，論文也拉入了文革造反派、西方新左翼、美國保釣運動等進行參照，以說明火紅年代與其他地方的社會運動及左翼運動之關係。

關鍵字：火紅年代、左翼歷史、國族政治、社會運動、香港七〇年代

Bursting the Myth of The ‘Hong Kong 70s Golden Era’: Thoughts, Affect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Fiery Seventies Social Movement

ABSTRACT

The myth of the ‘Hong Kong 70s Golden Era,’ which glorifies colonial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Hongkonger identity that is built upon it, has always appeared problematic when juxtapose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Fiery Seventies.’ The ‘Fiery Seventies’ was a brief period of time during which the Hong Kong post-war baby boomer generation was deeply engaged in leftist social movements and engaged in enthusiastic discussions about China’s politics. By revis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Fiery Seventies’, this thesis questions the very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Hongkonger identity,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difficulties of reinventing Hongkonger identities through Third-World left-wing politics. This thesis deline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ry Seventies’ social movements from 1967-1976, and focuses on the guiding effects of affects, thought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pro-CCP left-wing-camp, ultra-leftists, autonomous Maoists, anarchists, Trotskyists, student Maoists, and ‘the social faction’. The important events and publications discussed include: the 1967 Riot, Chinese Language Movement, publications of *Pan Ku* and *70s Biweekly*, Chu Hai College Incident, Baodiao Movement, Anti-Corruption Movement, Anti-Inflation Movement, Joint-Publication Incident, and Know China activities. Through referencing the rebel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western New Left, and the US Baodiao Movement,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movements of the Fiery Seventies were deeply entangled with global left-wing politics.

Keywords: Fiery Seventies, Left-wing history, Nationalist politics, Social movements, Hong Kong 70s

誌謝辭

我是在 2008 年讀的大學開始，並因緣際會地接觸了自治八樓（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和趕上了所謂的「社運小陽春」或「八十後社運」風潮，而從此進入社運圈。雖然說當時為香港社運圈重新發現七〇年代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源的一段時間，但說來慚愧的是，當我身邊的社運小夥伴們都在樂此不疲地重聽「黑鳥」、重看《70 年代雙週刊》的時候，18 歲的我卻是和這些社會運動思想資源統統擦肩而過的。儘管，在表面上我都跟著小夥伴們趕上了每一場示威和集會，並學著衝上前線和警察 mosh-pit，但其實內心裏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局外人、一個「不正宗」的社運人——雖然是一個女同志並生長於一個「半新移民」中，並不是真的和歧視及社會問題絕緣；但原生家庭在經濟上的準中產地位、在教會學校讀書、而且會考和高考成绩不俗的情況下，我算是「不憂柴米」便可向上流動的一群——於是，我在想的是，到底社會運動和我的關係是什麼？而其他看起來比我更為「正宗」的「社運人」，他們的成長背景及歷史背景如何、他們經歷的世界是怎樣的，導致了他們成為了與功利主義社會格格不入的「社會運動者」？反過頭來，這也質問著我為什麼我的原生家庭會如此去政治化，為何我會有「局外人」的感覺？為何我會感覺我的家庭、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都在試圖把我養育成和社會運動絕緣的模樣，甚至希望我當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為何我的家庭會如此恐懼文革和左派？甚至又因為恐懼一切社會運動而投票了給建制派？這到頭來和大陸的歷史及香港的歷史又有什麼關係？而又因為我在社會運動的行動及自治八樓的培育下越發傾向於無政府主義，讓我更好奇的是：到底我的自治八樓們是怎麼被他們的前輩所影響，成為了今日的模樣？而他們又是如何接過了前人給他們的思想資源，引導了我撇開了我原生家庭給我的去政治化壓力，並讓我也成為了無政府主義者？這一切年輕時的經歷，似乎都在一步一步引領了著我要對大陸及香港的運動歷史作進一步的探究。

2019 年，我在自治八樓收拾物資時，意外發現了資料房的書架上收藏了一本由黑鳥的郭達年及「黑夜編輯小組」所編的《在黑夜的死寂中唱歌》。塵封的小書紙張雖已殘舊發黃，但其內容依然新潮炸裂。這本書就像大海中漂浮著的一盞訊號燈那樣，讓我把此

前生命中的一些片段被聯繫了起來——無論是以前在某二手書店工作時見到的「紅黑書店」小書、長毛來寄賣的理論讀本、曾擦肩而過的黑鳥唱片和《70年代雙週刊》……

這些舊有片段的彼此連結遂編成了一個巨大的網，都著我要回到「黑鳥」、回到《70年代雙週刊》、甚至是回到文革及六〇年代新左翼思潮。我渴望著從此去理解這些歷史對於自己及八樓的社運及無政府主義成長的影響——包括了這些歷史的延續和斷裂。而這又進一步牽引了我飢渴地閱讀了香港無政府主義及左翼的歷史——原來，「社運小陽春」並非從石頭中爆出來，我的社運前輩不是、自治八樓不是、我的無政府主義也不是，但我們的確都曾經是某個當下「新生的」、「打破某些歷史延續性」的一群。於是，關於「七〇年代」黃金年代及火紅年代左翼歷史的問題意識就出現了。



2019年夏，筆者於即將被學聯強行關閉的自治八樓

然而，剛好2019年也是自治八樓被學聯強行關閉及反修例運動爆發的一年，我在香港的許多本來應該拿來做訪問和查資料的精力，結果都用來了收拾八樓和上街抗爭。許多資料還沒來得及被好好翻查及整理，我就帶著一鍋粥的腦袋和混亂的精神狀態回到台

灣：生活、思想和身心狀態都嚴重脫軌。2020 年，我又加入了境外生返台抗爭，論文都被我丟到腦後，再一次，本來該用來寫論文的時間，結果都用來了搞組織和陳情。直到抗爭成功，我才猛然發現自己只是剩下半年可以寫論文……

這篇論文得以在半年內被趕起，是在是需要多方的鼎力相助才能成功。首先，我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林淑芬在最後半年「臨危受命」願意當我的導師，不是她幫我釐清了問題意識，我是沒可能踩盡油門地一寫到底的。然後，我還要感謝白瑞梅老師在此之前鞭策我及給予我指引去找林淑芬，以及提案口委員陳光興老師孜孜不倦地提醒我亞際視野及參照的重要性——亞際的知識計畫是我認同的，也是我在寫作過程中一直在審視自己的部分。最後，我要感謝我的論文口試委員。這包括一直對我不離不棄的葉蔭聰老師給予了我精準的修改意見，特別是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的處理不該只是被放置在身份認同的框架中去；還有王智明老師在最後一個月答應當我的口委，提醒了我要如何修改論文讓它可以更好地跟知識社群對話。

我要感謝我的被訪者們，包括郭達年、周奕、梁寶龍、莫昭如、陳寶瑩、甘浩望神父、林志毅、船長、高 YP、石中英、楊寶熙、房遠華、林致良、梁國雄（長毛）、陳順馨、陳鼓應、周魯逸、劉健威、雷競璇、H、黃默、阮志雄，他們對自身經歷、觀察及人脈的無私分享，不但提供了寶貴的一手資料，更是幫助我進入七〇年代社會運動場景的關鍵。也感謝曾經幫過我在訪談中牽線的朋友，包括江瓊珠、林麗雲及自治八樓的 Terry。我也要特別感謝包世一的幫忙，是她的仗義協助，我才能看到包奕明的全部文章。希望我的研究能一部分地報答你們給我的恩惠。

我要感謝在我寫作過程中的幫忙過的朋友們。感謝 Tommy Chung 和 Kevin Yang 給我介紹文獻、Chris 在美國給我捎來古早的香港無政府主義刊物、Akiko 幫我翻譯日文文獻、和 Phil 給予翻譯建議。感謝 June 和郭達年在共同居住期間幫我做家務。感謝亞際辦公室的 Jessica 幫忙處理提案和口試背後的行政工作。感謝「境外生權益小組」及由一些運動小夥伴們所組成的「彼此監督論文小組」，每天鞭策我寫論文、吃飯、做運動，還要一直鼓勵我、給我自信。我還要特別感謝葉寶儀、鄒文君和 Matthew，他們不只是我運動

上共同進退的同志、學習上齊頭並進的同學，也是我論文的「白老鼠」——曾耗費巨大的精力花上一整個晚上聽我嘮嘮叨叨地朗讀整本論文，還挨著睏給予了寶貴的建議和閱讀材料上的推薦——在知識路上有你們相伴同行，是我的榮幸。

最後，我還要感謝我的女友郭佳，她不但陪我跑田野、跑訪談、做校對，還在我寫論文期間承擔了家裡幾乎所有的再生產工作。在情感上，她是我的靈魂伴侶；在日常生活上，她是我的萬能室友；在論文寫作上，她是我半個導師和半個編輯；在運動和革命路上，她是與我齊上齊落的戰友；在知識路上，她是與我一同思考、探索和執行各種知識計畫的好同事。沒有她的話，我是絕對沒可能在半年內寫得完這篇論文然後準時畢業。

我把這論文獻給為左翼革命的可能付出過心力的思想者和行動者，和曾被政治所傷的人們。也把它獻給我的女友郭佳。



2018 年冬，攝於香港西環碼頭（左：劉璧嘉，右：郭佳）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目錄		iii
圖表目錄		viii
前言、	火紅年代作為扭轉敘事的起點.....	1
0-1	背景及問題意識.....	1
0-1-1	支撐著「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的兩大敘事.....	1
0-1-2	「香港七〇年代」神話與「火紅年代」的拉扯：被遮蔽的國族政治和左翼政治思考.....	4
0-1-3	為何要提「消失」的火紅年代？研究火紅年代左翼政治的重要性.....	9
0-1-4	如何進入火紅年代的社會運動場景？.....	12
0-2	文獻回顧.....	14
0-2-1	關於情感政治的討論.....	14
0-2-2	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	22
0-3	研究問題.....	36
0-4	研究方法.....	37
0-5	章節安排.....	39
一、	香港社運場景：左派、右派與第三勢力（1949-1967）.....	42
1-1	當冷戰遇上殖民主義：左派與右派在香港.....	44
1-1-1	香港戰後左右兩派的微妙共存：殖民地下的冷戰.....	44
1-1-2	香港戰後社會問題.....	45
1-2	香港左派場景.....	47
1-2-1	中共的對港方針、組織和活動.....	47
1-2-2	左派場景的經驗、文化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	52
1-3	香港右派場景.....	55
1-3-1	國民黨的對港方針、組織、活動.....	56
1-3-2	「第三勢力」和美國的組織、方針和活動.....	59
1-3-3	友聯的位置：新生代第三勢力？美國於香港文化冷戰中的代理人？...	62
1-3-4	新儒家南來文人的位置：文化民族主義與國民黨的不反殖的契合.....	65
1-4	小結.....	70
二、	從六七暴動再出發：大陸文革「造反派」與香港左派.....	72
2-1	六七暴動與中國文化大革命.....	73
2-1-1	為何討論文革和六七暴動在今天如此的敏感和困難？.....	73
2-1-2	為何要把六七暴動放置在文革的框架下討論？如何放置？如何討論？..	76
2-2	六七之前：大陸文革爆發，香港左派造反暗流湧動.....	78
2-2-1	《五一六通知》：大陸校園風起雲湧，保守派、造反派各據一方.....	78
2-2-2	《炮打司令部》：毛澤東亮出底牌對造反派及香港左派內部的影響.....	80

2-3	六七之起：文革造反派奪權與「一二·三事件」帶來的改變氣息.....	83
2-4	六七之承：人造花廠工潮、鬥委會成立、遊行、罷工.....	87
2-4-1	人造花廠工潮：左派群眾及工聯會在工潮中的小試牛刀.....	87
2-4-2	《人民日報》與外交部罕見地對香港抗爭開綠燈：鬥委會正式成立....	91
2-4-3	港督府的遊行與大字報：一次群眾自發的行動.....	92
2-4-4	六三社論：《人民日報》跳過外交部對香港直接喊話.....	94
2-4-5	被激進化的群眾在政治訴求上的挪移.....	95
2-4-6	聯合罷工開始.....	98
2-5	六七之轉：武裝化與大陸文革造反派的武裝化.....	99
2-5-1	大陸造反派的武裝傾向.....	99
2-5-2	香港極左派的暴動傾向.....	101
2-6	六七之合：造反派的落幕、被孤立的武裝極左派.....	104
2-6-1	火燒英國代辦處後毛澤東收拾造反派.....	104
2-6-2	1967年8月後·香港：極左派孤掌難鳴，暴動漸漸結束.....	107
2-7	小結.....	108
三、	以第一波中運為例：後六七暴動非左派的難局.....	111
3-1	非左派何以厭惡六七暴動——「繁榮穩定論」的誕生.....	112
3-1-1	非左派的社會大眾對六七暴動的回應.....	112
3-1-2	「繁榮穩定論」的幕後推手：簡述港英政府的宣傳策略.....	115
3-2	六七暴動與第一波中運：為了「繁榮穩定」該做些什麼？.....	117
3-2-1	非左派的大專院校界對六七暴動的回應.....	117
3-2-2	第一波中運序幕.....	121
3-2-3	右派對中運的反應：從搖擺到支持.....	122
3-3	六七暴動後的政治恐懼與扣帽子風氣——第一波中運的難產.....	124
3-3-1	崇基「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問題研討會」風波.....	124
3-3-2	第一波中運後：運動創傷與青年困頓.....	126
3-4	小結.....	127
四、	超越左／右派的先聲：從自由主義到自發毛派的《盤古》.....	128
4-1	《盤古》與創建實驗學院的誕生.....	128
4-1-1	從《盤古》創刊初衷說起：對反共與台灣自由主義的承傳.....	128
4-1-2	以「創建」為線索：《盤古》與友聯及西方激進主義的親密性.....	132
4-2	以包奕明為線索：《盤古》左轉背後的理論家.....	133
4-2-1	〈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包奕明的蛻變之路.....	136
4-2-2	〈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右派情感、毛派理論.....	140
4-2-3	〈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回歸論」作為知識計劃.....	146
4-3	以包奕明為線索：《盤古》左轉背後的西方新左及反國民黨脈絡.....	150
4-3-1	新左翼？舊左派？.....	150
4-3-2	從包奕明到《盤古》——香港新左翼毛派「新」在何處？.....	153
4-4	「回歸論」之後：包奕明的潛伏與香港新左翼毛派的醞釀.....	155

五、	超越左／右派的先聲：從「沒有主義」到「紅黑」的《70年代雙週刊》	159
5-1	以吳仲賢為線索：自由主義、本地社運與《70》的誕生.....	159
5-1-1	文社運動：獨立於政治？.....	160
5-1-2	珠海大學：國民黨右派在香港的象徵.....	163
5-1-3	珠海事件導火線：〈從夢想到絕望〉以揭露校政問題批判國民黨.....	164
5-1-4	珠海書院的光環脈絡後——青年中的困頓與迷惘.....	168
5-2	以莫昭如為線索：新左翼、西方社運與《70》的誕生.....	170
5-3	突破難局！「平地一聲雷」的《70》.....	172
5-3-1	《70》是無政府主義刊物嗎？.....	174
5-3-2	那《70》是新左翼嗎？關於《70》編輯邏輯.....	175
5-3-3	《70》的運作：「去組織化」的組織形式如何動起來？.....	181
5-3-4	「去組織化」背後的隱形門檻：《70》的組織文化，兼談《70》的組織情感.....	183
5-3-5	《70》與《盤古》：一對異卵雙胞胎？.....	185
5-4	莫斯科—中國—法國—香港：托派與《70》的相遇.....	187
5-4-1	從莫斯科到中國，從中國到香港：香港托派的脈絡.....	187
5-4-2	《70》份子於法國變成托派：在尋找法國革命中發現中國革命.....	190
5-4-3	從紅黑並舉到分道揚鑣.....	193
5-4-4	從《70》的分裂看組織的內憂外患.....	195
5-4-5	從紅黑分裂看《70》的組織情感.....	198
5-5	小結.....	199
六、	香港第一次保釣運動：打破後六七的恐政治難局.....	200
6-1	香港保釣運動的起源：本地、台灣及美國的影響.....	201
6-1-1	香港保釣運動的社會運動脈絡：山雨欲來的1970年.....	201
6-1-2	從台灣到美國，從美國到香港：香港保釣運動如何共襄盛舉？.....	203
6-2	二月保釣：保釣會與《70》長期累積的矛盾和各立山頭.....	207
6-2-1	保釣遊行前的最後100小時：兩派保釣、一種緊張.....	210
6-2-2	腹背受敵：運動內部兩派撕裂、運動外部遭國民黨右派抨擊.....	217
6-3	四一〇保釣示威：警方打壓如何成為保釣運動的轉捩點？.....	218
6-3-1	美國的四一〇保釣示威.....	219
6-3-2	香港的四一〇保釣示威.....	220
6-3-3	四一〇保釣示威對香港保釣運動的影響.....	221
6-3-4	五四保釣.....	227
6-4	七七保釣示威：香港保釣運動最高潮.....	228
6-4-1	七七保釣示威：示威者以肉身改寫歷史.....	229
6-5	小結.....	232
七、	香港第一次保釣運動：統運路線和反殖路線的融合與決裂.....	233
7-1	基辛格秘密訪中與聯合國代表權更替：保釣運動路線的轉向.....	233
7-1-1	美國保釣運動的轉向.....	233

7-1-2	香港保釣運動的統運路線.....	236
7-1-3	香港保釣運動的反殖路線.....	241
7-2	保釣落幕.....	244
7-2-1	五一三保釣示威.....	245
7-3	火紅年代青年的後保釣行動反思.....	247
7-3-1	「反殖」與「統運」如何融合？.....	247
7-4	後保釣中的反貪污運動：「反殖」和「統運」的矛盾所引發的鬥爭.....	249
7-4-1	社會派 vs. 國粹派.....	250
7-4-2	〈「反貪污、捉葛柏」我的一些不明白〉vs. 〈明白你的「不明白」反貪污運動的茶杯裡風波〉.....	251
7-4-3	〈「同志」讓我告訴你〉vs. 〈與屠龍君討論「香港問題」〉.....	252
7-4-4	從保釣到反貪污運動：「反殖」與「統運」的決裂、「社會派」與「國粹派」的敵對.....	255
7-5	「流」的討論：國粹派何以成為多數派？.....	257
7-6	小結.....	262
八、	「無關痛癢」的 1974：「毛托相爭」與港英的「漁人得利」	264
8-1	回應通脹的兩條路線.....	266
8-1-1	無政府主義與托派的激進：鼓勵抗爭.....	267
8-1-2	大專院校界的溫和：反物價通脹論壇及「探訪資展」.....	271
8-2	展覽宣傳 vs. 抗議行動：國粹派與社會派的交惡.....	274
8-2-1	國粹派展覽展外的「傳單風波」.....	275
8-2-2	《十月評論》如何成為石中英的批托材料.....	278
8-2-3	反加價運動高潮：絕食、集會，兼論無政府主義派與托派的差異與關係...	281
8-2-4	石中英為何批托：批托第一人的經歷與時代性.....	284
8-3	反加價運動落幕：港英政府的「漁人得利」.....	290
8-3-1	總體經濟上揚—社運內鬥—社會大眾的犬儒文化—社會運動.....	291
8-3-2	殖民政府懷柔政策—社會運動者.....	296
8-4	小結.....	299
九、	「中國向何處去」：「四報聯刊」與逃港紅衛兵	301
9-1	〈中國向何處去〉：「四報聯刊」中的托派代表.....	302
9-1-1	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與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	302
9-1-2	吳仲賢的分析：中國官僚主義及官僚制度的前世今生.....	304
9-2	〈我們的立場〉與〈理性的黃昏〉：「四報聯刊」中的「極左派」代表.....	307
9-2-1	〈理性的黃昏〉所象徵的造反派逃港紅衛兵立場.....	307
9-2-2	逃港紅衛兵對《70》的影響及兩派的合作.....	310
9-3	〈香港向何處去〉：「四報聯刊」事件餘波中的「社會派」代表.....	315
9-4	「四報聯刊」事件餘波.....	317
9-5	「中國向何處去」的其他延續：《黃河》與《北斗》.....	320
9-5-1	《黃河》與中華人權協會.....	322

9-5-2	《黃河》的人權論述與極左派之間的張力.....	325
9-5-3	《北斗》與新亞及救總.....	327
9-5-4	《北斗》的趨勢和傾向：從李一哲到認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329
9-6	小結.....	331
十、	國粹派的潛伏與潰散：風格、組織、情感與思想	334
10-1	從國粹派的風格到國粹派的活動.....	337
10-1-1	國粹派的「土」風格.....	337
10-1-2	國粹派的鄉土與故土.....	338
10-2	國粹派的組織形式與思想資源.....	344
10-2-1	潛伏的組織生活：關於開「黑會」和秘密「大會」.....	345
10-2-2	內部的政治思想學習.....	347
10-2-3	神秘的國粹派領導：中共與國粹派之間的線人？.....	348
10-3	抗爭？不抗爭？國粹派的情感矛盾、組織文化與世界觀.....	352
10-3-1	說服方法一：「覺得自己是小資」.....	352
10-3-2	說服方法二：「中國還是很弱」.....	355
10-4	國粹派何以潰散？.....	359
10-4-1	「神秘」潰散背後：組織形式的侷限、「想不通」的感覺.....	360
10-4-2	左派憂鬱？左派罷工？左派反思？.....	365
10-5	小結.....	368
十一、	結論	372
11-1	火紅年代的思想、組織與情感.....	373
11-1-1	關於火紅年代的爆發與演變.....	373
11-1-2	火紅年代與此前政治局面的傳承和斷裂.....	380
11-2	作為香港左翼政治史的火紅年代.....	381
11-2-1	火紅年代各派對國族主義及相關國族身份認同的討論，關乎的是其左翼政治.....	381
11-2-2	香港火紅年代是新左翼嗎？新在哪裡？兼談國家建構的引誘和隱憂.....	386
11-3	研究侷限.....	391
11-4	火紅年代事後記：昨日之火在今日留下了什麼？變成了什麼？.....	392
參考文獻		393
附錄一、	訪談與田野紀錄清單.....	407
附錄二、	2019 年粉嶺和合石墳場六七公祭田野筆記.....	409
附錄三、	周魯逸「悼包錯石並論世局」講座節錄.....	415
附錄四、	2021 年 5 月 13 日雷競璇訪談.....	421
附錄五、	2019 年 6 月 8 日梁國雄（長毛）訪談.....	430
附錄六、	2019 年 2 月 8 日陳寶瑩訪談節錄.....	455
附錄七、	2019 年 5 月 21 日房遠華訪談節錄.....	457
附錄八、	2019 年 5 月 15 日楊寶熙訪談.....	459
附錄九、	2021 年 6 月 26 日阮志雄訪談.....	478

圖表目錄

圖目錄

圖 1：港督麥理浩與市民接觸.....	3
圖 2：火紅年代青年參與保釣示威.....	5
圖 3：1956 年亞洲自由國家聯合反共聯盟中國總會理事長谷正綱在出席世盟籌備 會後於返台途中訪問調景嶺.....	58
圖 4：1967 年被大字報包圍的港督府.....	93
圖 5：1967 年《華僑日報》對六七暴動的報導.....	112
圖 6：1967 年萬人傑在《星島日報》上對六七暴動的評論.....	114
圖 7：1967 年《盤古》創刊號封面.....	131
圖 8：包奕明照片.....	135
圖 9：包奕明照片.....	135
圖 10：1971 年 4 月正在《70》報社籌備保釣運動的莫昭如.....	173
圖 11：1971 年 4 月正在《70》報社籌備保釣運動的吳仲賢.....	173
圖 12：1970 年《七〇年代雙週刊》創刊號封面.....	176
圖 13：1970 年《七〇年代雙週刊》「中國特刊」封面.....	179
圖 14：1971 年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之對釣魚台列嶼事致日本政府抗議書..	214
圖 15：1971 年 2 月 18 日香港保釣示威者於身上掛上「反日軍國侵掠釣魚台」的 標語.....	215
圖 16：1971 年 2 月 20 日香港保釣示威.....	217
圖 17：1971 年 7 月 7 日警方於維園追打保釣示威者.....	230
圖 18：1971 年 7 月 7 日香港保釣示威圖解.....	231
圖 19：1971 年《70 年代雙週刊》第 24 期封面.....	311
圖 20：1976 年《黃河》創刊號封面.....	323
圖 21：1978 年《七〇年代雙週刊》復刊創刊號封面.....	370

表目錄

表 1：1971-1972 年香港保釣運動大事彙整.....	246
表 2：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及其按年變動率.....	265
表 3：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292

前言、火紅年代作為扭轉敘事的起點

藉由系譜學引領的歷史學之目的，並非挖掘出我們的身份根源，而是為了讓身份自身進行分解。這樣的歷史目的並非為了定義我們發源的獨特開端——那個形上學允諾將會回返的故土。它所追尋的乃是讓所有橫跨在我們眼前的支離破碎得以形現。

——傅柯〈尼采·系譜學·歷史〉¹

0-1 背景及問題意識

0-1-1 支撐著「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的兩大敘事

對歷史的理解決定了我們對當下的理解。如果要講一個近代的「香港故事」，即香港是如何發展成一個全面功利化的國際經濟大都會，及「香港人」是如何發展成高度擁抱資本主義及消費文化，崇尚自由、民主、法治、廉潔等價值——一般都會從後六七暴動的「香港七〇年代」開始說起。儘管香港人身份認同是在八〇年代才「確立」的，這個確立卻是建立在對於七〇年代香港的認知之上。也就是說，「香港」及「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的建立一般都會伴隨著特定的關於「香港七〇年代」的敘事。就如同呂大樂所說：

時下坊間有不少有關香港社會的論述，均以論者對「七十年代香港」所持的看法與態度為基礎，然後各自建構他們意圖推廣的香港故事。這個各自表訴的過程之中，「七十年代香港」局部的某一個方面，會被不成比例的放大，選擇性地呈現在大眾面前。但說來奇怪，就算是「七十年代香港」片面的理解，一般都不會引來強力的反應或惹人的批評，反而經常可以拼湊出動人的大故事、圖案。假如大家談論的是另一個年代，而不是「七十年代香港」的話，效果肯定完全不一樣……

在一定程度上，「七十年代香港」的確有著一種神話的色彩……

「七十年代香港」有一種特殊意義。在他們〔香港的市民大眾〕眼中，那是香港社會的，也就是他們個人或家庭的黃金歲月。²（黑體為筆者所加）

¹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ed. James D. Faub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386-87.

² 呂大樂，〈重新認識七十年代〉，《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 6-7。

由此可見，「香港七〇年代」並非只是一個物理時段，而是一個「神話」，並且由不同「敘事」所拼湊出的「大故事」和「圖案」去支撐，這些敘事可以被看作是對七〇年代香港所持的看法與態度——儘管它們是局部的，但它的神話性又會影響著我們對「香港」及「香港人」的基本認知。

支撐著「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的敘事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敘事認為，香港自七〇年代開始經濟起飛並成為「亞洲四小龍」，而香港的經濟成就也逐漸使得本地居民安居樂業、引以為傲，「香港人」身份認同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而經濟發展的興盛又會被認為是七〇年代港督麥理浩及殖民主義的功勞。麥理浩是管治香港最久的港督，從 1971 年上任，連任三次，一直到 1981 年才退下港督之位——七〇年代也因此被香港市民譽為「麥理浩黃金十年」，以顯示這段時期的治績如何使得香港告別 1966 和 1967 年的騷動氣氛，為香港日後發展成一繁榮安定的先進經濟體奠下基礎。不能否認的是，麥理浩的施政的確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³以至於到了今天，麥理浩的許多懷柔政策依然被一些歌頌殖民統治人士娓娓道來——包括「廉政公署」的成立解決了警察貪污問題、「立法禁止童工」及「九年免費教育」解決了兒童就學問題、「十年建屋計劃」和「新市鎮發展」解決了住屋問題、「清潔香港」解決了環境衛生的問題等。⁴麥理浩的功勞也經常被引申來佐證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香港市民的個人努力搭配英國殖民治理營造出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空間下的協力成果。⁵而這種關於七〇年代經濟騰飛的經濟神話敘事的話外音，此時也就更清晰可見了：「香港人」之所以有今天的政治啟蒙——即渴望民主自由法治——是因為我們是資本主義體系，資本主義帶來的是開放，而英國的殖民統治則是香港有資本主義的原因……也就是香港版的「殖民有功論」。

³ 呂大樂，〈「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20），頁 141-86。

⁴ 陶傑，〈他沒有銅像〉，<https://hk.appledaily.com/columnist/20191004/J7RIB4AY5V3IV3MEFQI7BFJO7I/>（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22 日）。

⁵ 參見 Chris Patten, *East and West: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on Power, Freedom and the Future* (London: Macmillan,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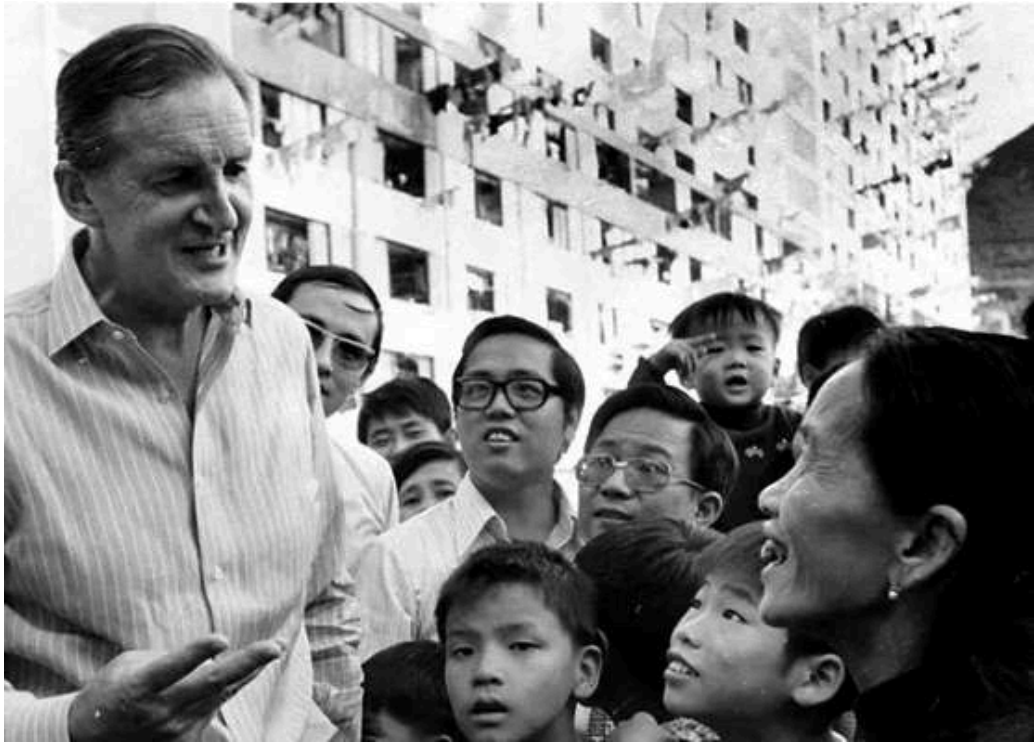


圖 1：港督麥理浩與市民接觸（圖片來源：Matters 網站，<https://bit.ly/3DQuFXy>）。

然而，難道初生於七〇年代的「香港人」只是對殖民政府的一切照單全收嗎？難道「香港人」只是滿足於成為經濟動物嗎？這第一種七〇年代敘事的保守性，因此促生了第二種七〇年代敘事的誕生——它從「香港人」七〇年代以來的本土社會文化與生活中挖掘「香港人」的能動性，並試圖回應、超越及批判第一種敘事。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曾在〈導言：文化中的生活，生活中的文化〉中提過，這些對香港社會文化及生活的分析對香港研究的重要性在於，它一方面透過文化及生活的論述去捕捉日常細節所掩蓋的利益、權力關係與矛盾，另一方面也不否認文化、日常生活有其自主性及獨特的運作邏輯。⁶也就是說，社會文化自身的邏輯可以透露出民間社會和「殖民有功論」複雜多樣的關係。

然而，在今天本土情緒高漲的當下，關於「香港人」社會文化與生活的本土論述，就經常被認為要擔負起和中共劃清界線和拒絕威權體制的政治任務。因此，一種庸俗化的香港本土七〇年代文化敘事就誕生了。這些關於「香港人」的社會文化及生活的論述，只是流於描述、分類和歌頌香港七〇年代以降的流行文化和「港式生活」，譬如自七〇年

⁶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導言：文化中的生活，生活中的文化〉，收入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2011），頁 325-30。

代開始蓬勃的電視文化、消費文化、粵語流行曲等如何「獨立」於中共及港英自成一文化體系。⁷在當下的政治語境下，強調港式生活和文化獨特性的論述更可以作為一項理據，拿來證成香港政治上的獨立。⁸而這種庸俗化的七〇年代本土文化敘事，一方面雖然肯定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經驗，把「香港人」身份認同確立成一種民間的、自發的、由下而上的、獨立的認同；然而，這種「庸俗的本土文化敘事」卻因為停留於文本或現象的描述和分類，而未能把那些未為人所察覺的權力關係及過程呈現出來：殖民主義對本土文化及生活的滲透，因此也可能會被默認（default）成是香港的既定模樣。庸俗化的本土文化論述——特別是對香港七〇年代社會文化及生活的簡單描述及分類——因此可以很容易反過頭來維穩了「殖民有功論」的敘事。

0-1-2「香港七〇年代」神話與「火紅年代」的拉扯：被遮蔽的國族政治和左翼政治思考

對歷史的理解不但決定了對當下的理解，也決定了對未來的想像。特別是當「香港七〇年代」作為一個神話其實關乎「香港人身份認同」及「香港價值」的概念，而不只是一個單純被敘說的歷史時期，神話的欺騙性也就滲透在了被默認的身份認同及價值內部，以此方法侷限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譬如，八〇年代《中英聯合聲明》之所以廣泛被香港人所默認、「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之所以曾讓香港人覺得安心、一國兩制（包括永續了殖民主義的政治架構和「馬照跑、舞照跳」的「港式生活」及「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之所以在回歸的關節點曾經起到心理上的定海神針作用，大抵就是因為這些聲明、承諾、制度，都曾答應過「香港七〇年代」的神話將可被永續下去。

而當大家曾經都認為只要緊緊乘著「香港七〇年代」的神話走下去，香港就會美好、就會安定、就會一帆風順時，一切對「一國兩制」和「五十年不變」等大前提的批判——不論是來自保守的、激進的、右的、左的、理性的、不理性的聲音——都會讓香港市民普遍感到在心理層面上難以容忍。畢竟這些批判都傷害了「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的大前提。而當主流七〇年代敘事中的「殖民有功論」及庸俗化的本土社會及文化論述完全霸佔了「香港七〇年代」這個概念時，回歸後政府曾經嘗試去維持永續的「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也會弔詭地引發反效果——社會一旦出現什麼問題，就會很容易召喚出對七〇年

⁷ 這類庸俗化的對香港社會文化的研究論述的例子，參見陳美燕，楊聰榮，〈從香港本土文化看香港人意識之形成〉（香港：香港問題研討會，1994）。

⁸ 林艾德，〈留住語言跟文化，香港總會是香港人的香港〉，<https://vocus.cc/article/5f0a1ec7fd89780001f4350d>（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代甚至殖民主義的懷舊之情。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也可以被理解成是「香港人」眼見「五十年不變」不保下的一次憤怒的大爆發吧。

但「香港七〇年代」神話所帶來的侷限性，剛好也可以被它所想要遮蔽（eclipse）的真實的七〇年代所解套：「香港七〇年代」這個概念與史實如果不是相去甚遠，至少是充滿張力的（雖然我承認，要呈現完全的史實就如同要畫一個一比一的地圖那樣是不可能的）——被前述兩種七〇年代敘事所塑造出來的「香港七〇年代」概念，實際上是和它所遮蔽的「火紅年代」相衝突的。

「火紅年代」指的是 1970 年左右開始的青年們轟轟烈烈地參與社會運動的一個時期。火紅年代涵蓋的社會運動除了狹義的社會運動外，也涵蓋了學生運動、居民運動、工人運動等。火紅年代青年中的不同派別透過形形色色的活動（包括大型展覽、旅行團、講座、文藝活動）、出版、示威、遊行等行動，回應各種本地及國際事件，共構了火紅年代的社運場景。這個場景中比較奪目的運動包括：1969 年珠海事件、1970 年 4 月中文大學抗議削減財務經費的學生罷課、1970 年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1971 年保衛釣魚台運動、1973 年「反貪污、捉葛柏」運動、1973-1977 年「中國周」展覽、1974 年反加價運動（又名四反四不交運動）、1974 年「四報聯刊」的「中國向何處去」討論、1975 年港大「香港周」展覽引發的「香港往何處去」討論、1976 年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討論以及炸彈恐嚇事件、1978 年金禧事件、1979 年艇戶事件、「CU 仔往何處去」討論及安樂村事件等。



圖 2：火紅年代青年參與保釣示威（圖片來源：「端傳媒」網站，
<https://bit.ly/3G638DB>）。

不過，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特色和重要性並不在於其規模和頻率——事實上，當年規模最大的保釣運動也不過只有幾千人參加（而李小龍出殯就有上萬人去送行），就連曾經參與火紅年代的梁國雄也稱：「其實火紅年代，也不過是很小的火。香港人自己也不知道。大家搞搞震搞搞震，但都是青年而已，是青年激進化的餘波。」⁹

火紅年代的特色和重要性是在於它在當時打開了新的政治局面，以及它在今天對於「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以至於「香港價值」、「港式生活」甚至「香港人」等概念的挑戰。羅永生對火紅年代的社會運動的特色和重要性有著權威性的總結，他在〈「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思潮〉中說：

所謂「火紅年代」，其實並非實指香港出現激進政治的年代，因為戰後影響最大的激進政治運動，是發生在 1967 年的那場由親中左派陣營發動的六七暴動。但「火紅年代」一詞所涵蓋的事件，一般不包括六七暴動，而是經過暴動後兩年左右的沈寂期，由 1969 年直至 1982 年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開始談判的一個較長時段的七〇年代。這段日子裏並沒有發生大型的社會動盪，但卻是**香港土生土長一代罪熱心投身於學生和青年運動、也是種種左傾激進思潮佔據大學生和青年活躍份子思想的年代**，所以被當時參加這些學生和青年運動的活躍份子稱之為「火紅年代」。¹⁰（黑體為筆者所加）

此外，在〈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中，羅永生也提到了火紅年代的特色：

這個時期所出現的社會運動，是**獨立於傳統左右派**的第一次本土政治社會運動，所以也萌生出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意識」。¹¹

總結以上定義，我們可以歸納出由青年主導的火紅年代有以下的特色。第一，火紅年代社會運動有著獨立於此前的左右派的意識，並打開了一個新的政治局面。事實上，六〇年代的民間政治局面主要還是被左派（由港共統籌的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統的親中共派別）和右派（由國民黨等影響的視中華民國為正統的傾向國民黨的派別）所主導，但火紅年代卻生成了有別於傳統左派和右派的新派別，也就打破了此前的政治局面。火

⁹ 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¹⁰ 羅永生，〈「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二十一世紀》161 期（2017），頁 72。

¹¹ 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思想》26 期（2014），頁 123。

紅年代的新生派別可以被大致分類如下：在校內，有國粹派（學生毛派）與社會派；在校外，有托派、無政府主義派、自發毛派等；比較少為人知（或者說，存在但不成派系）的還有逃港紅衛兵和民主自由派等。而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國粹派、自發毛派和此前的本地傳統左派，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都是毛派，但不一樣的是，前兩者更大程度上是自發而起的毛澤東思想的「志願兵」，不但在組織和發展上並不由傳統左派團體——譬如左派工會或左派報紙——所全面控制，其思想脈絡、情感結構、組織生態、以至於對政治的感受、對現實政治的判斷都與傳統左派有著微妙的差異。可見他們對舊有的政治並非直接的複製，而是有「破」的部份。總括來說，火紅年代的重要性在於各新生派別都把六〇年代的左派、右派主導香港民間政治的局面給洗了牌，並掀開了新的一頁。

第二，火紅年代的社會運動均有著左傾激進（radical）的色彩，而這體現於不同派別多多少少都有的革命意識。譬如梁國雄就說，火紅年代托派組織「革馬盟裡面〔本來〕都是文青」，「改變社會有很多方法，但革命是先用破壞的方法去改變社會，是一個很特定的方法。文青也是改變社會的方法」，不過在火紅年代時，青年人都傾向要「扔掉自己的文青性」，因為「文青看個電影都好幾個小時，只能扔掉」、「沒有時間搞革命啊」。¹²也就是說，在改變社會上，火紅年代的社會運動青年和六〇年代的文藝青年比起來，明顯展現出不一樣的改變社會的路徑。在火紅年代百花齊放的場景中，雖然自發毛派、無政府主義派、托派、國粹派和社會派都各有不同的社會主義主張——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到達社會主義的彼岸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行動程度上有非常大的差異——但其左翼色彩卻是共享的。

而第三，是我認為羅永生沒有提到但其實是火紅年代中最重要的特色：火紅年代實際上也是香港青年在主動探索國族與民族意識的年代。曾走過火紅年代的學者陳順馨曾說，火紅年代是（中國）民族意識及本土意識都有進一步發展的年代，但很多人只看到後者，而不大講到前者，那是因為前者隨後就銷毀沒落，並於社會運動中絕跡。¹³一些可以體現出陳順馨所說的火紅年代的民族／國族意識的經典例子，包括但不限於國粹派對鄉土和故土的興趣，以及社會運動中對「中國問題」的探索。值得一提的是，羅永生所提到的火紅年代「本土意識」之萌生，事實上不與此「（中國）國族意識」相衝突。畢竟，

¹² 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年6月8日。

¹³ 陳順馨，〈遭遇「中國」與民族身份的追問〉，《正值銀杏生輝：記北大》，（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0），頁27。

把「本土意識」完全對立於「(中國)國族意識」的看法，恰恰是站在了壓抑著火紅年代歷史的「勝利者的史觀」之位，這並不是火紅年代青年的普遍看法。如果我們可以歷史化地、脈絡化地看待火紅年代，就可以看出當時「本土意識」如何並不與「中國意識」相切割。

火紅年代對「中國」的興趣及對「中國問題」的討論當然一部分是和當時青年的「中國」民族／國族意識相關。特別是，當他們採用了「中國問題」而不是(類似於今天的)「中國因素」的框架去討論中國時，就顯示出火紅年代青年是把「中國問題」當成內部問題來討論。這裡指的「中國問題」，包含了對中國政府政權性質、社會問題、政治及革命路線等國事的探討。雖然這些討論也可以在「中國因素」的框架範圍內討論，但「中國因素」和「中國問題」的差別在於：「中國因素」把「中國」當作是思考問題時一個不可變的前提和條件(**condition**)，認為此「中國」是外在於自身歷史和未來的一個專門來「攪局」的「因素」；但「中國問題」則認為「中國」的種種國事以至於「中國因素」的形成是我們需要動手解決的內部問題。也就是說，「中國因素」中的「中國」經常被認為是一個客觀的、不可變的「現況」(**status quo**)，在回應「中國」時也就採取了被動的、防禦的姿態；「中國問題」中的中國則被認為是一個需要被解釋和介入的、可改變的「現實」(**reality**)，在回應「中國」時也就採取了主動介入、渴望與「中國」串聯的姿態，並更著重從中國內部脈絡化地理解「中國問題」。於是，火紅年代使用「中國問題」框架去討論中國時，顯現出一定程度的國族意識——這就關乎了身份認同的問題。

但是，國族意識也不應該成為解釋火紅年代對中國問題的關注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事實上，國族意識及國族身份認同也有多種模樣。在火紅年代前，佔據著戰後一代土生土長青年的國族主義更多是塑造了「無根的一代」的身份認同。這些無根的一代儘管在面對自己所不了解的中國時或會泛起一抹鄉愁——但這抹鄉愁更多指向一個古老的文化中國，但並不直接指向現實中的「中國」社會及政治，更不要說想要介入了……所以說，火紅年代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對其政治與社會的介入性，正正指出了火紅年代的民族／國族意識其實是和舊有的民族／國族意識有著不一樣的內涵——這也體現了火紅年代「獨立於左右派」的特色。

那為何火紅年代青年的民族／國族意識會帶有對「中國」社會及政治的積極性和介入性？甚至指引了不一樣的國族身份認同政治？這就必須要離開唯身份認同政治的範疇才可以被解釋。事實上，火紅年代青年的民族／國族意識背後隱含著激進而深刻的左翼

政治思考。當龐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近在咫尺，火紅年代青年左翼都在想這意味著什麼——特別是他們當時正處於香港作為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局面之中——社會主義中國的左翼政治藍圖能否帶來救贖？作為左翼是該支持還是反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左翼藍圖？支持的話，是要融合進去還是齊頭並進？如何融合？如何並進？若要準確理解火紅年代的身份認同政治的話，就不可以忽略背後關於「左翼政治」與「國族政治」該持有什麼關係的問題意識。

而只要以前述火紅年代的特色去對照「香港七〇年代」這個概念，火紅年代就會像「照妖鏡」那樣，折射出超越了「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以及建立在這神話上面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及「香港價值」的視野。「火紅年代」和「香港七〇年代」雖然都指向七〇年代這個時間段，兩者卻互相衝突、互相出賣——但這正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若要打破「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以及此神話所帶來的對現實及未來想像之侷限，重新認識火紅年代就變得尤其關鍵。

0-1-3 為何要提「消失」的火紅年代？研究火紅年代左翼政治的重要性

雖然火紅年代在實踐還是思想上對香港來說都是開天闢地的一頁，然而，這段歷史在現在注定被有所掩蓋，因為它是一個香港發展歷史中的「例外」。這一方面因為火紅年代的國粹派、社會派、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大多都沒有再維持本來的組織，這些派別獨有的政治視野和分析在沒有組織的承載下，也只能溶解於今天的泛民、建制和本土派之中，或索性被排擠到邊緣的位置，在今日的政治版圖上不著痕跡。另一方面因為「香港七〇年代」神話正正是泛民、建制和本土派等今天的「勝利者」所共構的，火紅年代作為一個格格不入的存在也因此被忽略或曲解了。如果只以今天的「勝利者」目光去觀看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話，什麼托派、社會派、無政府主義、國粹派，頂多只會被拿來作為泛民和建制的史前史去理解，火紅年代就只會被當作是「過渡期」。這連當時的激進部份、左派及左翼部份，也被輕輕帶過甚至是忽略了——彷彿七〇年代只是為八〇年代由壓力團體為主角的政治運動做鋪墊而已，甚至是為泛民派和建制派做嫁衣。

雖然，無可否認地，七〇年代的社會派和民主自由派在延伸到八〇年代後，的確與今天的泛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年的國粹派／毛派和今日的建制派也有著傳承關係；當年的托派有的也為今日的泛民派要員；而當年的無政府主義派中的許多個體則在今日的文化場景中有著莫大影響力……但終究，泛民和建制的政治意識都不能取代昔日托派、

無政府主義、自發毛派／國粹派和社會派等派的政治意識。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只是把火紅年代說成是泛民和建制的史前史，然後嘗試用「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方法把火紅年代整齊地填塞到「泛民」和「建制」的版圖之中，我們不但注定無法完全進入七〇年代的情感、思想及組織脈絡；而且，火紅年代中許多至今沒有被泛民、建制及本土派繼承的左翼或左派的激進政治——譬如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反殖民主義、堅持國際主義等——也會注定被繼續忽略。

當然，可能也會有人問，既然七〇年代社會運動已經被拋掉了、「消失」了，其存在對今日的政治看起來不癢不痛而且無法「直接感應」，那為何還要研究這段歷史呢？簡單來說，為什麼我們需要去理解一個對我們現在看起來已經是過眼雲煙的歷史？這除了為歷史而歷史、為學術而學術以外，對我們今日有什麼幫助？這是一個「so what」的問題。

我認為，只要我們首先鬆開一點今天的「勝利者」的角度去閱讀七〇年代，很容易就可以看到火紅年代社會運動在今日所遺留的蛛絲馬跡、甚至看到火紅年代並不真的是「過眼雲煙」，而是始終以「幽靈」的方式縈繞（haunt）。譬如，今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 2007 年作為發展局局長時，就對著向她抗議的皇后碼頭示威者說「我也曾經激情過」¹⁴——而她所說的「激情」，就是她曾經參與過火紅年代末期的金禧運動。又譬如，香港大資本家——四大地產代理商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也不止一次對媒體細數自己作為托派組織「革馬盟」成員的「理想主義」階段，但卻以革命「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好處」去為自己今日爬往地產霸權的高位開脫。¹⁵也就是說，今日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上的掌權者，都要透過把火紅年代重新詮釋成一個不足以停留的過渡期，才可以證成自己的轉變——而這正正顯示了火紅年代所隱藏著的那些足以威脅、刺傷、攪和這些政治經濟上的「勝利者」的激進力量。

如果我們得以看到具備著以上三個特色的火紅年代，就可以看到這些激進力量的輪廓，也看到了打開不一樣的對未來想像的可能。譬如，當兩種「七〇年代神話」敘事皆營造了「香港人」及「香港」相對於中國的「獨立性」——畢竟，無論是講經濟繁榮、香港流行文化還是「港式生活」，大部份時間指向的都是香港與經濟落後的、沒有流行文化的、沒有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中國大陸」是截然分割的。而當目前的「香港人」身份認

¹⁴ Ahchoii，〈七月二十九日下午皇后碼頭速記〉，<https://www.inmediahk.net/node/249434>（檢索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¹⁵ 衛毅，〈施永青的 60 年：從革命青年到地產巨商〉，<http://news.sina.com.cn/c/2010-05-21/134820319992.s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同多是建立在未經反思的「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甚至被進一步地「政治化」並匯入到「自決」或「獨立」等關於香港未來的政治議程當中時，就造成「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兩極敵對。

那重回火紅年代，我們則會看到不一樣的可能。若以火紅年代青年的激進左翼之眼去看今日的政治局面，「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撕裂之所以是一個問題，其實並不只因為這當中有種族主義的傾向，也是因為「香港人」和「中國」之間的「井水不犯河水」態度會阻斷與大陸民間社會運動相互參照、連結及齊頭並進的可能，對推進香港及中國未來的社會改革及社會主義發展可以說是自斷雙臂。又譬如，當「香港七〇年代」被神話化成「黃金年代」，使得本地社會至今對「香港七〇年代」有許多正向的情感連結，甚至會認為未來也最好是持續著「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的模樣——好好地繼續跟隨殖民政府的方法管理社會、好好地低頭醞釀本土流行文化、好好維持資本主義——一切都會變得順利時，¹⁶火紅年代的激進左翼卻是在當年就用了具體的社會運動行動及出版駁斥了「殖民有功論」的神話。畢竟，如果麥理浩的懷柔政策是萬能的話，火紅年代青年又為何要走上街頭呢？今日政經當權者對火紅年代的刻意遺忘，是因為恐懼去面對火紅年代中的激進左翼力量。而今日畫地自牢的、只是訴諸防禦性的、甚至帶有右翼潛能的本土主義及「香港人」身份認同（雖然這並不代表我否定它背後帶有可敬的道德力量、可諒解的邏輯及修正的可能）對火紅年代的刻意忽略，則是因為恐懼去面對當中左翼政治與國族主義極其複雜糾結的問題意識。

透過重新書寫被「香港七〇年代」神話所塑造的功利主義的本土身份認同，及被今日政經「勝利者」聯手掩埋及斷裂的火紅年代香港左翼歷史，此論文首先是要回饋香港的本地政治——特別是當中的左翼政治。我希望可以透過書寫火紅年代挖掘出一種非「殖民有功論」的、非功利主義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可能性。甚至，透過重看左翼政治與國族政治之間的配置（*configuration*）的可能，去摸索出左翼的國族政治的歷史輪廓。火紅年代對掩耳盜鈴、自我閹割、附庸帝國主義強權、自掃門前雪地「政治獨立」的抗拒，是因為他們看到香港抗爭與大陸社會主義發展可以連結的部分，並希望探索一條可以共同解放兩地人民甚至是更廣泛第三世界被殖民者的政治出路。以上這些，都可以讓我們突破今日死板的「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以至於這神話下過份乾淨及保守的「香港人」及

¹⁶ 這種懷舊的論述，可參見陶傑，〈中國人的小農基因〉，<https://www.rfa.org/mandarin/duomeiti/guandian/gd-05132020170005.html>（檢索日期：2021年1月28日）。

「中國人」身份認同。特別是今天，當建制派以「統一」的政治議程去對抗「自決」和「獨立」中過份乾淨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時，當中所生產出來的香港「中國人」身份認同往往也同樣有「過份乾淨」的問題——彷彿「香港人」理所當然地不存在，而只有「中國人」的部份才是正當的。這不但忽略了本地的社會特性、對殖民主義歷史存而不論，甚至以默認的方式永續了殖民主義的剝削性；現實上更會出現對本地需求的忽略、對主體性的抹煞、將香港左翼政治歸為「異端」或「外部勢力」而壓抑之等問題。這種保守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反過來也偏擺了「中國人」身份認同中的激進性和開放性，妨礙了中國自身的社會主義發展。火紅年代關於國族政治與左翼政治之間關係的探索，或者可以為對香港目前只存在「非此即彼」的身份認同狀況而感到苦悶的左翼提示解套的方向。

此外，此論文也希望可以和更廣泛的世界左翼歷史形成對話關係。特別是，火紅年代實際上可以被理解成「世界的六〇年代」(global sixties)的一部份，更可以被理解是文化大革命影響下的結果。那香港的左翼歷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左翼歷史的關係是什麼？火紅年代是西方新左翼在香港的翻版嗎？自發毛派是什麼意義上的新左翼？火紅年代對國族政治與左翼政治的思考又如何可以回饋到更廣泛的左翼知識生產計劃——特別是第三世界左翼的知識生產計劃之中，為超克二戰遺留、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冷戰及分斷體制做出貢獻？事實上，在火紅年代對左翼政治和國族政治的關係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解殖與民族主義的綑綁是解方也是毒藥，民族主義所指引的國家主義是引誘也是隱憂。這當中的毒性是現實政治的問題？是國家主義的問題？還是內在於國族主義的問題？對此，火紅年代青年都有或多或少想要解套或超越的意識，甚至想要尋求另類的解殖方案。雖然，這些嘗試有很多是失敗的：許多的「解套」嘗試難敵國家主義的引誘而陷入保守，最後陷入政治死局自行消亡；對國家主義的慾望之強大也使得許多的「超越」嘗試被三番四次地拉回到死局之中，最後呈現徒勞無功的狀態。但檢討當中的失敗，或許也可以提示出修正左翼政治或國族政治的方向。這也是我認為此研究的重要性。

0-1-4 如何進入火紅年代的社會運動場景？

下一個問題是，我該怎麼探索火紅年代呢？這個時候我就會想到我在逃避寫論文時經常會去的那些地下電音活動。我把自己這次進入七〇年代的研究當作是去地下電音趴「蹦迪」那樣：如果我把每一次去電音趴「蹦迪」都看作是參與場景 (scene)，那我在研

究時也就總會想像著自己穿過時空隧道，到火紅年代當中與青年們一起去開會、思考、辦活動及上街頭與警察跳一個衝撞的舞蹈——社會運動，不就也是一個場景嗎？

場景一詞本來是一個和流行音樂與次文化研究相關的用語，經常是指社群和創作所依靠的社會結構和脈絡。這包括了譬如樂手和樂手、樂手和觀眾、樂手和場地提供者等之間共構的生活型態、互助網絡、美學感知、事件、歷史等。場景的概念也有效地把音樂研究從只是討論台上表演的亮眼時刻，轉移到台下的生態的探討——是怎樣的場景才可以提供條件讓某種創作以至於表演得以可能？那麼，社會運動其實也和場景一樣：社會運動不只是出來抗爭時的那個高光時刻、不只是人們在集會和遊行中的聚合和行動，這些聚合和行動背後往往是需要經過了思考、組織（包括爭論、串聯、生活），而且帶著各種各樣的情感才得以生成。一個一個行動又像螢光幕上獨立的光點那樣，共構了一個大的畫面——也就是場景。借用場景一概念，可以有效地點出社會運動行動背後的諸多物質與非物質條件，我將分類為思想、組織和情感三個部份。

「行動—思想」和「行動—組織」這兩組關係是比較直觀和容易理解的。社會運動作為一個集體行動，必定涉及到組織（哪怕是鬆散的組織），以及組織帶來的動員。而社會運動因為經常與訴求有關，而這些訴求往往也是思想／意識型態的引導下的結果，有關的知識很容易就可以理解成是每一個社會運動行動背後的理性依據。所以思想儘管不像組織那樣是物質的，但因為它被認為是行動背後的理性，所以也經常被探討到。

然後，一個社會運動背後，也是有著其他被認為是「非物質」的條件——也就是情感。事實上，情感早已充斥在公眾空間，並且在想像及形成集體中擔當重要的位置，以至於情感曾為社會運動中不可跳過的一環。而我對於情感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是把它放置在情感政治的脈絡中討論。在情感政治中，情感首先是被當作是一個公共化的範疇，而不是私人的、不可言傳的、毫無邏輯的「情緒化」。情感座落在社會當中被不同的事件所形塑和衝擊，而也會反過來指引著當事人的行動。總結一下，思想、組織和情感為三個我在分析火紅年代社會運動場景時會用到的範疇。

0-2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將分為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關於研究框架的文獻回顧、第二部份是關於研究問題的文獻回顧。

我在上一個部份，我曾說過閱讀社會運動要具備關於「場景」的視野，以理解社會運動的行動背後的物質及非物質條件。此外，我也提到七〇年代敘事所伴隨的情感之於政治未來及身份認同的影響。所以，對於情感政治的討論對本論文尤其重要。第一部份的文獻回顧會是著重梳理情感研究中關於情感—認同—社會運動行動之間的關係的討論。

第二部份的文獻回顧則是梳理關於身份認同的理論及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討論。我會首先從理論和概念開始，梳理文化研究中身份認同的概念及它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接著的下半部份，則是在理論的基礎上接上在地經驗，梳理目前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討論——特別是與七〇年代歷史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已經被討論的。

0-2-1 關於情感政治的討論

(1) 知識生產中的情感轉向與威廉斯「情感結構」的假設

在九〇年代中期開始，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特別在文化研究、文學研究及性別研究中）出現了「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在這個轉向下，大量研究開始對情感投入關注：精神分析導向的情感研究關心著情感之於主體的關係，酷兒研究傾向於關注負面情感、女性主義則對於情感所顯示出的社會力在個別主體身上的運作尤其敏感、政治理論也大量地探討情感如何在政治中被利用。在情感轉向下，情感研究涉及的範疇百花齊放，學界對於情感、情緒、感覺等如何出現、流通、散播、展演都尤其感到興趣。

此轉向在理論上可以回溯到 1677 年斯賓諾莎的《倫理學》。當斯賓諾莎當時使用情感 (affect) 一字的時候，此字也有觸動、感動、影響的意思——這也是為什麼 affect 也經常被翻譯成「情動」。要理解斯賓諾莎對情感的定義，則要首先理解他的哲學的特色：由於斯賓諾莎不談本體、主體、本質，而只看狀態的變化；所以，身體的界定只是取決於它所能受到的影響與所能改變的幅度——也就是斯賓諾莎所說的行動力。於是，斯賓諾莎在定義情感時說：「情感 (affect)，我將之理解為身體的觸動 (affection)，而透過此，

身體行動力會增強或減弱，得到輔助或受到限制。」¹⁷也就是說，情感對斯賓諾莎而言比較是關乎身體得以存活的潛力。然而，在上世紀九〇年代中期開始的情感轉向，其實更直接地受到第二波女性主義「個人既政治的」的口號、馬克思主義傳統對經驗的重視、族群研究對於社會宰制與對抗之肉體面向的批判性描述、以及反殖民運動對要基進地重新思考主體等的影響。¹⁸也就是說，情感研究作為一種知識實踐，其發展背景是和女性主義、酷兒、左翼、解殖等知識生產計劃有著更緊密的系譜的關係。

比較直接地影響了這一輪的情感轉向的一些著作也因此可以追溯到法農（Frantz Fanon）於 1961 年出版的《大地上的受苦者》。作為一本研究殖民主義的經典，法農借用了自身的精神醫學知識，充分勾勒了被殖民者如何內化了殖民者，而把自己當作是「他者」的看法終導致了身份認同和情感的困境。¹⁹這本著作除了提供了政治分析以外，也開啟了情感研究中精神醫學的、心理學的、精神分析的取徑。另一本同樣對這一輪的情感轉向有比較直接的影響的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中所提出「情感結構」（Structures of Feeling）的假設，這開啟了情感研究中文學研究及文化研究的取徑。威廉斯最廣為人知的對情感結構的定義是這樣的：

我們在講的是關於衝動、壓抑、調性的特徵；特別是意識和關係的情感元素：它們並非是對立於思想的感覺，而是思想是感覺到的，感覺就是思想：這是一種實際的當下的意識，是處在一個活生生的且相互關聯的連續性當中。我們因此定義這些元素為「結構」：作為一個組態（set），它們有著特定的內在關係，互相牽引同時充滿張力。然而，我們也正在定義著還在進行中的社會經驗，這種社會經驗經常尚未被辨識為是社會性的，因此是私密的、有個人特殊性的、甚至被認為是孤立的。但是，在經過分析後（而幾乎無一例外地），這些經驗其實都是有新興的、與外在連結的，及有主導性的特徵，並有著特定的位階序列（hierarchies）。²⁰

¹⁷ 斯賓諾莎的原文如下：「By affect I understand affections of the body by which the body's power of acting is increased or diminished, aided or restrained.....」參見 Steven Nadler, "The Passions," in *Spinoza's "Ethic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6), 200.

¹⁸ 海澀·愛，〈論情感政治：感覺倒退、感覺「背」〉（張瑜珩譯），收入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新北：蜃樓，2012），頁 178。

¹⁹ 弗朗茲·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楊碧川譯）（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9〔1961〕）。

²⁰ 威廉斯的原文如下：「We are talking about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of impulse, restraint, and tone; specifically affective elements of consciousness and relationships: not feeling against thought, but thought as felt and feeling as thought: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of a present kind, in a living and interrelating continuity. We are then defining these elements as a 'structure': as a set, with specific internal relations, at once interlocking and in tension. Yet we are also

威廉斯對情感範疇的關注，一方面是為了跟譬如世界觀或意識形態這類比較正式的概念做區分以凸顯活生生的經驗；²¹另一方面，在「情感」一詞後加上「結構」一詞，是為了指出了被認為是特殊的、變動的、突發的、個人的情感範疇其實是與社會經驗、意識形態、思想等範疇具連續性的——甚至會主導了情感主體何以會接受某些意識形態，以及去判斷怎樣的未來是可行或不可行的。因此，威廉斯也認為，每一個階級的崛起，或內部出現了矛盾、破裂、變種時，都是和一個新的情感結構相關。這些情感結構也可以在文學及藝術的風格轉變中被捕捉。²²威廉斯對情感可以具備「理性」與「結構」的假設，在他當時身處的知識脈絡是具創新性和批判性的。那是因為，他所要回應的是傳統馬克思主義中的機械式唯物主義對情感並不存在內部邏輯的假定。機械式唯物主義認為，情感是被政治、經濟等「唯物」的條件驅動，而這也導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者輕視情感研究——畢竟推動歷史「往前進」的引擎是政治經濟關係的改變。威廉斯的情感結構的假設最終是挑戰了「歷史會如科學法則一般向前邁進」的設想、並指出了情感並不被「經濟決定」或「心理決定」任何一方武斷其走向，此假設也因此給情感研究自機械化的唯物主義中鬆綁，為情感研究的發展鋪平了跑道。²³

若把威廉斯的假設納入到本論文的討論中的話，那就是，如果七〇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不同派別都涉及到鼓勵及活出一種新的階級意識和／或身份認同，那這些不同派別的情感結構是怎樣的呢？威廉斯指引的方法是要留意其「關於衝動、壓抑、調性的特徵」，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譬如他們的書寫中所表達的初衷、動力、欲言又止或風格等地方，捕捉到他們的情感結構，並從此推演它與社會脈絡的關係。然而，由於威廉斯從來沒有指出情感結構的內在邏輯與外在社會脈絡的關係為何、可以為何，而只是鼓勵我們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每個具體的情感結構和社會脈絡中尋求其關係——所以，情感結構的假設中對情感結構內在運作的留白也使得它得以和不同的理論結合。

defining a social experience which is still in process, often indeed not yet recognized as social but taken to be private, idiosyncratic, and even isolating, but which in analysis(though rarely otherwise) has its emergent, connecting, and dominant characteristics, indeed its specific hierarchies.」參見 Raymond Williams,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32.

²¹ Williams, "Structures of Feeling," 132.

²² Williams, "Structures of Feeling," 132-33.

²³ 威廉斯作為文化研究創始人之一，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是非常存疑，也就是說，工人階級是否就會天然地有階級意識？為了去理解人的經驗與文化對（革命）主體塑造的影響，威廉斯因此主張需要對活生生的經驗以至於文化多加分析。而他對情感的重視，是在思考階級意識如何出現時建立起來的。而威廉斯對文化實踐的重視也使得他後來被霍爾（Stuart Hall）歸類為「文化主義」的典範之中。

（2）使用情感結構的方法及態度

其中一篇響應了威廉斯的情感結構的假設的文章是溫蒂·布朗（Wendy Brown）的〈抗拒左派憂鬱〉。布朗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將情感結構的假設結合了精神分析，去描繪七〇年代末以來二十餘年一些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情感結構的內在邏輯。布朗認為，這些左翼因為對過往的社會主義陣營有入骨的政治認同，於是，在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以後、在「左派、社會主義、馬克思、或是社會運動這幾組詞語都意味著這樣的〔理想的〕失落、破滅」的當下，這些左翼無法接受他們那實在的認同已成為逝去之物，在進退失據下因此產生了自戀以至於自恨——也就是精神分析中的憂鬱（melancholia）的反應。自恨是體現在這些左翼越來越沒有行動力、越發癱瘓、也越發無法介入公共輿論。自戀則是體現在左派對文化政治這種新的思考模式感到恐懼及焦慮，甚至是拒絕理解，甚至把文化研究當成代罪羔羊、對其他種族、性別、族裔等文化認同的政治運動保持輕蔑。²⁴

布朗這篇分析力極強的文章為威廉斯的情感結構的假設作出了貢獻——這不只是體現在她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者喊話，為情感研究這種屬於文化政治的研究範疇做了辯護而已——而是在於她透過把情感結構的假設與精神分析相結合，顯示了情感研究之於理解政治的力度和深度。布朗的文章中有效地展現了情感—認同—不行動之間可能的關係。

布朗對負面情感如何中介了認同與行動是甚有啟發性，循著布朗對左派的看法，火紅年代末期不同社會運動派別的消亡和轉化，除了可以理解成是殖民政府介入、「香港人」對殖民地的成功感到滿意、身份認同自驕傲等正面情感成形以外，會否也有「左派憂鬱」的部份？六七暴動失敗後，傳統左派從激烈行動轉而變成保守行動，甚至對其他政治派別採取敵意的態度，這是否也是「左派憂鬱」的反應？布朗的文章對我的論文最大的啟發在於她提醒了我要對負面情感——諸如憂鬱、失落、不忿等——要有更大的關注，因為這或許是去解釋火紅年代中某些派別癱瘓、不行動、轉向保守的關鍵。

雖然我認同布朗大部份的分析，並認為如果結合她其他文章來看的話，這篇文章會更說服力的；但是，就她在這篇文章使用情感結構的態度卻讓我有些卻步。第一，布朗對憂鬱等負面情感是採取了全面否認的態度的。在她的論述當中，負面情感只會構成癱瘓、自戀、自恨、拒絕理解現實、找替罪羔羊等問題。在〈拒絕的政治〉中，海澀·愛（Heather

²⁴ 溫蒂·布朗，〈抗拒左派憂鬱〉（張永靖譯），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憂鬱的文化政治》（新北：蜃樓，2010〔2001〕），頁139-53。

Love) 就指出了布朗「把壞情感本身當成是問題」。²⁵而這種好壞的區分的問題在於它強化了一種僵硬的二元論假設，認為只有積極的、欣欣向榮的、可動的主體可以進入的未來，於是癱瘓的主體、有憂鬱(症)的主體，會被認為是不具備進入未來的入場券。也就是說，布朗對憂鬱等負面情感的排斥，也打造了一個健全中心主義的革命想像及未來想像。第二(延續著第一點)，布朗「要求」左派要重新檢視憂鬱的態度也因此指向了「診斷—治療—復原」模式，但這是否一種具備介入性的研究態度？當然不是說憂鬱的左派也只能被哄著，但「要求」的語氣對那些經歷著憂鬱的人(也就是她的分析對象)會有什麼樣的幫助？事實上，情感這東西不是你要求它不存在它就可以不存在的，就算這些情感到最後是負面的、癱瘓的，也不是你給它貼一個負面的標籤就可以解決問題的——特別是我們通往未來的進程中，就已經是在這些負面的情感當中了。在〈毀壞的身份認同〉中，海澀·愛以酷兒運動為例，陳述了在歷史中基進的酷兒運動如何在處理異性戀主義所帶來的羞恥問題上過於急進粗暴，使得「陽光正向」成為了一種「要求」，進而排擠了把恐同內化了的倒退酷兒，使得他們陷入了雙重羞恥之中。²⁶賀照田也在《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中提到，在中國歷史中，後毛澤東主義的「新時期」由於急迫地想要糾正文革，也就是「撥亂反正」，結果卻因為對毛澤東時代的經驗和教訓沒有做出多角度的檢討與總結，結果造成了「病藥相發」——即「由於對病本身的把握不夠精準，治病的藥不能充分妥貼對症，藥本身又有副作用，故醫生自以為高明的『藥』在對所治「病」有其治療效用時，又會導致新問題，新的『病』」。²⁷布朗對憂鬱的要求，會否也會對研究對象造成雙重羞恥的問題？對未來的想像會否也造成「病藥相發」的效果？

循著海澀·愛及賀照田對處理負面情感的提醒，在本論文當我想要把使用情感結構的分析框架時，也必須對當中的負面情感給予更為多元、彈性和細緻的出路。這一方面是讓本研究的最後可以向「打造一種連最倒退的人都可以找到安身之所的未來」²⁸邁進，為本地政治有著不同的情感結構的派別尋找可以與自身及外部和解共存的可能，不至於一定要被「要求」復原。另一方面也是要正視負面的情感結構所帶來的諸多可能性：或許，憂鬱是認同中無法繞過的一部份——就像酷兒的身份認同總是連帶著羞恥一樣，左派的

²⁵ 海澀·愛，〈拒絕的政治〉(鄭聖勳、翁健鐘譯)，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憂鬱的文化政治》(新北：蜃樓，2010〔2007〕)，頁345-46。

²⁶ 海澀·愛，〈毀壞的身份認同〉(洪凌譯)，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憂鬱的文化政治》(新北：蜃樓，2010〔2001〕)，頁213-66。

²⁷ 賀照田，〈後記〉，《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台北：人間，2016)，頁269-70。

²⁸ 海澀·愛，〈毀壞的身份認同〉，頁266。

歷史也是由「失敗」所鋪成的——但憂鬱在有的時候卻反而成為群體的內部凝聚，產生認同，甚至可以成為行動爆發的助力。譬如，在七〇火紅年代中各派別都要面對不同的社運創傷、歷史創傷等，但為何譬如托派、無政府主義派會比國粹派比較不癱瘓？創傷和憂鬱注定只會帶來癱瘓嗎？甚至，癱瘓是否一個問題？國粹派的消極癱瘓會否也是一種積極的選擇？

（3）邁向歷史化的情感結構

最後，我認為賀照田的研究方法也值得被參考。賀照田最廣為人知的文章是〈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他認為，自九〇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精神史進入了一個特殊並讓人困惑的階段。首先，中國大陸黨和國家更多把人們精神健康會好轉的願望寄託在現代化發展，然而人的精神並沒有因為物質的充裕而好轉，很多人陷入了虛無主義；然後，一些新的徵狀也出現了，包括日常語言和日常生活氣氛對錢的關注及新興宗教的大規模快速傳播——毛時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狀態此時變得似乎毫無蹤影。那是為什麼呢？中國左派知識份子認為是資本主義的禍、自由主義者認為是權力腐敗的影響、保守主義者認為是儒家傳統被毀壞的緣故、民族主義者認為是民族自信心不足的原因。賀照田認為這些解釋都是去歷史化的，他們無法解釋事情是如何從以前演變到今天這個狀態的，於是，人在當中也是被設定成是全然地被動地受煽動的。因此，他透過文本細讀八〇年代的「潘曉討論」去分析後毛時期的「潘曉們」是如何討論人生意義的，並探討「什麼身心意義感狀態對當時中國人是理想且可能的？在當時的時代條件下，什麼樣的工作實踐、生活形式有助於而不是妨礙這更為理想的自我狀態實現」。²⁹在他自己的研究看來，中國大陸的人的「精神—主體」困頓和其身處的「歷史—觀念—社會—制度」有關，那從七〇年代過渡到八〇年代最大的改變則是毛澤東時代的結束。毛時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對「精神—主體」被高度膨脹的理想主義所填充；然而，由於個人主義是被集體主義所壓抑的，於是許多活生生的經驗就也被當作是個人主義而被忽略。不過，儘管這種理想主義是有問題的大部份人都是繼續選擇了理想主義、集體主義——因為人們在組織中還是得到了許多實際的幫助。可是，在後毛時代，文革被宣佈是結束了、失敗了，這也連

²⁹ 賀照田，〈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台北：人間，2016），頁 167。

帶理想主義及信仰的核心也失落了。而在後毛時代翻天覆地的改革中，由於大家並沒有照顧到怎樣安置「精神—主體」的困頓，這使得不少人遁入虛無。對安頓虛無感的需要在八〇年代造就了文學的蓬勃發展，到了九〇年代則變成了市場。因此，當今中國大陸精神倫理及健康的問題，在賀照田的解釋下，就是被單單一力度（譬如經濟決定還是心理決定）所構成，而必須要在歷史的過程中去理解這如何是不同政治、經濟、社會、時代、觀念、制度的力度共構的特殊的邏輯關係和作用所共同導致的結果。³⁰

雖然賀照田嚴格來說不是座落在西方的情感政治的知識生產系譜中，而是被歸類成是精神史。但他研究中跨學科的視野……譬如和思想史、政治史和社會史（包括人類學）的特色——以及他經常採用的文本細讀的方法，也使得 he 可以和情感研究作對話。符鵬就曾經以威廉斯的情感結構和賀照田對「精神感受與思想之間的關係」對讀起來，並指出兩者是高度相似。³¹此外，鈴木將久也曾對賀照田的精神史的幾個特點做出總結，他說：

首先，雖然賀照田學兄致力於進入歷史世界的精神狀態，但也不太講究個別人物的心理。他最追求把握的，既不是一個社會的結構，又不是個別人物的內心世界，而是瀰漫於這個世界的精神狀態。其次，他認為在一個世界精神狀態的核心處總有與精神有關的概念，但精神不單獨構成問題，而還應特別追索這種精神狀態所由之產生的歷史、觀念、社會等多種機制，才能深刻認識這一精神狀態。第三，他認為一個世界的精神狀態如此複雜，內部存在多方面的顯在和潛在的關係網絡，但他不願意逃避複雜的討論，也不願意分別討論精神問題的一面。因此他同時追求直截性和全面性。第四，他還堅持用歷史的眼光對待精神狀態，即使討論當下中國大陸的精神問題，也要參考歷史上的精神狀態。甚至他似乎認為，沒有充分考慮歷史，就不能認識當下。第五，因此，他所謂的歷史與精神，其實是分不開的。歷史絕不是過去的往事，精神也絕不是個人的內心，他所謂的當代精神史，直接就是構成當下中國精神狀態的重要因素。正是在這些意義上，「精神

³⁰ 賀照田，〈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頁 79-194。

³¹ 符鵬，〈回向「經驗」的可能方式與人文知識思想的社會想像力：從嘗試理解賀照田當代人文學的探索出發（初論）〉，收入賀照田、陳明、符鵬等，《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9），頁 22。

史」即是他極為關注的研究主體，也構成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³²（黑體為筆者所加）

由此可見，賀照田和威廉斯極為相似在於，首先，兩者都指出了情感（或精神）不是個別的、私人的，情感的社會性不只是在於它是受社會經驗影響，也是在於它中介了情感主體對社會經驗的理解，了解歷史與精神／情感因此也可以了解當代。第二，兩者都會認為需要深入世界精神狀態的核心或情感結構的核心去理解它是怎麼被多個力道模塑，但同時承認情感具備自己的邏輯。

但是，比照其威廉斯、布朗及海澀·愛，賀照田最大的特色是在於對歷史的強調。威廉斯提出了情感結構的假設，但對於情感的內部邏輯的走向卻只提出了要有深入的維度而沒有指引出歷史的維度。布朗雖然以精神分析深入到情感結構的內部，但卻有海澀·愛所指出的「要求」復原問題。海澀·愛給予了修正的目標和方向，卻沒有給予修正的路徑或方法。而到了現在，若用賀照田的視野去看，布朗的問題就更直接了當：布朗在分析左派憂鬱的問題上之所以會有「病藥相發」的問題，是因為她所使用的精神分析話語是去歷史化的，她把研究對象的情感結構的內部運作放了在一個抽象的「憂鬱」邏輯中理解，這就把具體的、動態的歷史語境和脈絡對於情感結構的內部運作邏輯的影響給抹走了一一憂鬱的情感結構就會被敘述成是一個自動化的心理機制，缺乏翻轉的動力。賀照田則以自身的研究倡導了歷史化的重要性，這可以被看作是對威廉斯的情感結構的假設的補充。³³

循著賀照田對歷史化對於情感結構的影響，我希望也對火紅年代所出現的情感、思想、組織給予足夠的歷史化的關注。譬如，火紅年代此前的歷史——特別是之前左右派的歷史和六七暴動的歷史——所帶來的影響因此要被納入到分析火紅年代的視野之中。火紅年代各種派別的情感結構也要歷史化地分析，因為他們之間差異的行動力，或許也是出於各派的情感結構被不一樣的歷史感所中介。最後，我也需要把歷史感更具體地處

³² 鈴木將久，〈序一：當我們直面在危機重重崛起的中國大陸〉，收入賀照田，《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台北：人間，2016），頁13-14。

³³ 然而，當然可以商榷的是，賀照田是否有成功理性自己的倡導？當他對歷史中的人喊話，認為大家錯過了許多內部的翻轉的動力和機會擦身而過、錯過了走出虛無的機會的時候——因為大家「本來可以……」時——這個「本來」的機會是否真的存在過？這種對過去的檢討是否建立在歷史化的理解之上？當然，就算賀照田自己並沒有真的成功做到他所倡導的歷史化的要求，但在對未來的政治議程的塑造，對過往的分析及對當下的介入中，建立賀照田所說的歷史化的方法本身，依然是具體的。

理，以理解火紅年代前的歷史是怎樣被承傳，並納入到火紅年代各派的思想與組織當中成為「活的歷史」，最後中介了行動。

0-2-2 關於身份認同的討論

(1) 文化研究關於身份認同的知識脈絡

關於文化研究是如何討論身份認同的概念，就必須先回溯其知識生產歷史脈絡。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赫魯雪夫否定斯大林、蘇聯入侵匈牙利等，都讓當時的左翼於是為了在正統馬克思主義及蘇聯斯大林主義等舊左翼以外尋找新路線；這些新左翼著重批判經濟決定論，並且認為可以從工人的生活經驗——特別是文化經驗中——中激發一種由下而上的階級革命性，這些都對文化研究影響深遠。³⁴到了六〇年代至七〇年代，反殖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及女性主義運動此起彼落，這些運動皆自發性地發展出圍繞著身份認同這個概念的實踐；與此同時，流行文化透過城市的消費文化擴散，當中也越来越注重推廣「個人品味」等概念，鼓勵人們通過消費去顯示自己的身份認同／身份，身份認同／身份這個概念因此在社會運動及流行文化中被廣泛引申，不過前者是指向集體的身份、後者是指向個體的身份。而在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這段時間，文化研究是沒有完全跟上社會的步伐去討論關於身份認同的種種。因此，身份認同／身份的概念被討論，首先是在消費文化及新社會運動的脈絡中被生產的，而要到了八〇年代，此概念才被人文學科所討論和推廣，有了學院知識生產的脈絡。³⁵

文化研究也是從八、九〇年代才開始討論身份認同的概念的，而這是源自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所帶來的急迫感——對新左翼而言，1979年戴卓爾夫人當選及新右翼的興起是一記當頭棒喝，迫使他們必須去回應一些近在眼前的問題：工黨為何會落敗？為何得不到工人的選票？身份認同政治是否取代了工人的階級意識？這就是霍爾（Stuart Hall）言下的「左派的危機」。而由於新左翼早在五〇年代開始就已在思考關於工人的能動性問題，並早已意識到階級認同並非被經濟位置所決定，但也要看到工人的文化生活等其他面向。這些思考資源及脈絡使得他們很快就理解到，以往只是思考工人的文化經驗是不

³⁴ 關於新左翼與身份認同政治的興起，參見 Grant Farred, "Endgame Identity? Mapping the New Left Roots of Identity Poli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31, no. 4 (2000): 627-48.

³⁵ Marie Moran, "(Un)Troubling Identity Politics: A Cultural Materialist Interven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3, no. 2 (2020): 258-277. <https://doi.org/10.1177/1368431018819722>.

足夠的，文化研究學者必須也要理解新社會運動和消費文化中的身份認同政治的部份，才能理解工黨的失敗——就如霍爾所說：

它（工黨）沒有積極追尋及介入我們社會中龐大多元的社會力量，他並沒有看到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基本本質就是權力中心的衍生。把更多社會領域拉進社會對抗之中，它沒有承認人們腦中眾多的身份認同——**他們的主體性、文化生活、性生活、家庭生活及族群經常是不完全相同的，卻廣泛而大量地政治化。**³⁶（黑體為筆者所加）

在文化研究的討論脈絡下，身份認同並不被認為是要被責怪的對象——對霍爾來說，不去積極尋求介入這股新的社會力量才是「左派的危機」的主因。這使得在文化研究討論身份政治時有三個特點；第一，有別於許多新社會運動和消費文化的參與者，身份認同也不是被認為是自有永有的、可以自動地拿來解釋譬如工黨落敗這樣的現象的，相反，身份認同政治和概念作為一個新興的現象，是需要被解釋的；第二文化研究並不滿足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方法，即一種經濟決定論的解釋方法去解釋身份認同的崛起，而認為要從文化中尋求解釋；第三，文化研究在解釋身份認同的產生後，並不是要取消關於所有身份認同政治的正當性，使之「返回」到傳統左翼政治之中，相反，霍爾是認為工黨或左翼應該主動地「積極追尋及介入我們社會中龐大多元的社會力量」。在九〇年代，霍爾給予了身份認同一個定義，我們不妨把它當作是下面關於身份認同討論的起點：

世界上有至少兩種思考「文化身份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方法。第一種是把文化身份認同看成是整全的、共享的，就好像集體都分享著同一個「真正的自我」那樣，這個「真正的自我」隱藏於在很多人的內在，而這些人有著共享的歷史和血緣，卻被其他強加於的或虛假的「我」所掩蓋……

然而，世界上還有第二種與第一種相關但不一樣的方法，去看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第二種位置除了看到人與人彼此的共同以外，也看到彼此明顯和深沈的差異，這些尖銳差異卻是「我們真正的樣子」。而因為歷史總是被持續的發明，「我們真正的樣子」也是「我們變成了的模樣」。我們因此無法對我們那「共同的經驗、共同的身份」篤定地侃侃而談，因為我們不得不對這個「共同的經驗、

³⁶ Stuart Hall, "Gramsci and Us," in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171.

共同的身份」的反面視而不見——也就正正是那些分斷和不連續性，造就了好像加勒比海人那樣的「特殊性」。從第二個方法來看，文化身份認同是關乎「成為」，也是關乎「存在」；它既屬於未來、也屬於現在。它並不是什麼自有永有的、已經存在的東西，可以因此逃脫地方、時間、歷史和文化的印記，而是自由它的來歷和歷史。然而，就像一切歷史化之物，它是永遠處於變動之中。因此，身份認同不是永恆地附著在一個本質化的過去之上，而是隨時地被歷史、文化和權力的「操弄」所影響；**身份認同不是永恆地植根於一個等待被發現和「復興」的過去並以為一旦成功就可以永恆地穩固對自身的認知，身份認同事實上是一個個自我命名，是如何把自身放置在歷史敘述中、或被放置在歷史敘述中的不同的方法。**³⁷（黑體為筆者所加）

也就是說，第一種身份認同是本質主義的身份認同，其衍生出來的政治議程也因此是本著「相同的人群、相同的訴求」的公式——也就是身份認同政治。霍爾在文章中有強調過譬如女性主義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等身份認同政治的貢獻。然而，由於這種身份認同政治並沒有拆解身份認同的歷史建構過程、沒有反省身份認同中既存的權力遺留，所以，當身份認同被固化及政治化時就會造成新的問題。相比起來，第二種關於身份認同的概念則是首先和身份認同政治拉開距離，要求要首先要對身份認同有所解釋——身份認同因此是一個沒有本源的、混雜的、矛盾的、持續的、高度歷史化的過程，而且這個過程還會一直被歷史敘述所干擾，這也使得身份認同是一個未完成但也永遠不會完全完成的概念，這也因此打開了政治空間。

³⁷ 原文寫道：「There are at least two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The first position defines "cultural identity" in terms of one, shared culture, a sort of collective "one true self," hiding inside the many other, more superficial or artificially imposed 'selves', which people with a shared history and ancestry hold in common... There is, however, a second, related but different view of cultural identity. This second position recognises that, as well as the many points of similarity, there are also critical points of deep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ich constitute "what we really are"; or rather - since history has intervened - "what we have become." We cannot speak for very long, with any exactness, about "one experience, one identity," without acknowledging its other side - the ruptures and discontinuities which constitute, precisely, the Caribbean's "unique-ness." Cultural identity, in this second sense, is a matter of "becoming" as well as of "being." It belongs to the future as much as to the past. It is not something which already exists, transcending place, time, history and culture. Cultural identities come from somewhere, have histories. But, like everything which is historical, they undergo constant transformation. Far from being eternally fixed in some essentialised past, they are subject to the continuous "play" of history, culture and power. Far from being grounded in a mere "recovery" of the past, which is waiting to be found, and which, when found, will secure our sense of ourselves into eternity, identities are the names we give to the different ways we are positioned by, and position ourselves within, the narratives of the past. 參見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 Kathryn Woodward (London: Sage, 1997), 223-25.

而隨著跨性別平權運動、「變裝皇后」的文化運動等運動，加上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性／別操演理論³⁸的影響力，運動和學術都在攜手演進，使得富有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意味的第二種身份認同概念在學院和運動圈中被越發重視。從新社會運動萌芽的諸多身份認同政治運動也因此有所轉向：「黑跨命關天」（Black Trans Lives Matter）、跨性別、非二元等運動和詞語這都敲問著「女性」身份認同的本質。第二種身份認同概念不再只是一種抽象的、學術的定義，而是越來越具備現實政治的「肉身」，變成是有行動力的及有具體政治議程的實踐性。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其他身份認同一樣，也是經常被手到拿來地解釋許多現象——特別是近年的反修例運動，似乎參與者和反對者也只是需要說「因為我是香港人」或「因為我是中國人」就已經可以解釋其支持或不支持的原因。但是，「香港人」——特別是相對於「中國人」身份的「香港人」——的概念的出現和演變是需要被歷史化地解釋的。就如同霍爾所說，這個自我命名是如何把自身放置在歷史敘述中、或被放置在歷史敘述中？這必須要理解譬如英國殖民政府、中共和特別是社會運動之間等多個力度如何爭奪和商榷這個命名，才能理解其複雜、矛盾、多重、混雜的內涵。

（2）兩種從「香港七〇年代」神話敘事中構建的「香港人」身份認同

那麼，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認同，目前是被怎麼理解的呢？在全文初，我提到它總是與「香港七〇年代」神話有關。那在這裡，我將會回顧彭定康、周永新及呂大樂是如何討論「香港七〇年代」和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

彭定康是英國保守黨的政治人物，也是香港的末代港督，見證著香港 1997 年的主權移交。在離開香港後，他出版了 *East and West: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on Power, Freedom and The Future* 一書，總結了管治香港上的挑戰及經驗，和他對這些挑戰和經驗與東西價值衝突之間的關係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這段時期關於香港歷史的知識生產，和其政治環境也是息息相關的。1997 的主權移交意味著權力及利益中心的轉換，而因此，在這段時期，不同的權力及利益集團，都特別著急地要透過建立一種香港的歷史敘述，以確立一套符合他們利益的意識形態。關於如何總結香港的成功，彭定康提到：

³⁸ 參見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這些〔從中國〕來到香港的難民想在香港尋找什麼呢？以及，他們是如何和為什麼成功的呢？他們來到了中國唯一一個自由的城市，以中國新聞工作者 Tsang Ki-fan 的話來說，這是「唯一一個百餘年間依然保持著自由的理想的中國社會——住在這裡的人，不用恐懼夜半的敲門聲」。香港有一個能幹的政府，並且在法治的保障下行使市場經濟。而這個政府完全符合了儒家的目標：「近者說，遠者來。」³⁹

簡單闡釋一下，那就是彭定康認為，來到香港的大陸難民在來香港之前、在成為「香港人」之前，就已經有一個共同性，那就是追求自由（特別是追求市場及政治的自由）。而殖民政府則是一個認同自由價值的政府：透過法治和市場經濟的建立，香港終變成一個可以安居樂業和安心營商的環境，這就和大陸難民對「自由」追求不謀而合。最後，住在這裡的難民終於願意不再漂泊，並且在此地努力拼搏賺錢，而他們也對這個由殖民政府促成的成功香港感到滿意，因此自稱「香港人」。簡單來說，香港的經濟神話和「香港人」身份認同因此是天生一對、互相成就，而殖民政府就是牽紅線的人。這套歷史敘述其實也就為殖民政府以及其相關的利益集團服務，而「香港人=經濟人」的身份認同被召喚是因為這種「香港人」並不反殖、甚至認為殖民有功，也就符合了殖民者的利益。這種對於香港歷史的敘述，也就是文初所說的第一種七〇年代敘事中「殖民有功論」的代表。

然而，就算這種說法有部份的正確——即「香港人」的確有很深的經濟認同，而這個和殖民政府所塑造的條件有關，它的敘述還是有三個大問題。第一，他並沒有解釋香港人是如何在歷史中逐步接受及認可「殖民有功論」，反而是認為中國難民在來到香港時，已經天然地因為渴望自由而和殖民政府的想法一拍即合。但是，彭定康對來到這片土地上的「難民／香港人」都「自然而然」地具備「自由」意識的認知是片面、粗糙和去歷史化的，也毫無反思的。要知道，在歷史中，來香港的大陸難民成分非常複雜，有的是為了逃避戰亂、有的是逃避政治形勢、有的是為了討生活、有的是為了走資、有的只是當刻無何奈何為勢所逼下的就近或地理選擇，這些不一定和「自由」或認同「市場經濟」有關，而就算對這些有認同，也不一定因此就會取「香港人」的身份。事實上，香港自上兩個世紀末被殖民後到七〇年代以前，根本沒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大部份難民對

³⁹ Patten, *East and West: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on Power, Freedom and the Future*, 21.

自己的「鄉土」或「中國」更有認同（要知道，「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不一定意味著對國家的認同，也可以是一種對文化中國的認同）。甚至，火紅年代青年的本土意識，其實也是把香港的未來扣連於中國的未來，這也顯示了火紅年代青年的「中國人」與「香港人」兩個身份認同的互相糾纏。第二，更甚者，彭定康的敘述是自相矛盾的：在殖民政府的管理下的很長一段時間，貪污問題嚴重、治安、清潔、住屋、就業等都曾非常糟糕，在這裡生活的人並不一定發現自己比在中國更安居樂業——連彭定康都自己說了，香港的犯罪率要到了九〇年代才真的明顯下降。這不就代表了殖民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滿足「香港人」對（經濟）「自由」的追求嗎？第三，彭定康的敘述忽略了「香港人」能動性的部份，彷彿「香港人」是被動地接受殖民政府對「香港人=經濟人」的打造，無視了香港從六七暴動到火紅年代中此起彼落的反殖、反資、反帝聲音，更無視了貫穿於火紅年代運動中的「中國問題」的問題意識。彭定康對「香港人」身份認同，到頭來其實只是一種自圓其說，而不是真的從歷史中出發去做具體的解釋和分析。⁴⁰

對比起來，周永新及呂大樂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內涵和形成的分析，是比較歷史化的。在《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一書中，周永新就結合了個人觀察和歷史敘述去推論「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是如何建立出來的，並且從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論延伸，提出了殖民政府的行政吸納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影響。⁴¹而呂大樂在 2007 年出版的《四代香港人》則是使用一種靜態的社會學模型，去首先刻畫當時香港人的意識現況（status quo），並從此現況回看每一代人成長的歷史。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把香港的人口結構分成四代：第一代「戰後嬰兒」的父母在 1946 前出生或來到香港，他們與中國保持連繫；第二代戰後嬰兒潮在 1946 至 1965 出生，親生見證身邊的環境漸變富裕，認同進步繁榮樂觀的社會發展觀，同時，他們也經歷了香港本土意識的發

⁴⁰ 我理解，彭定康也意識到，這種認為「香港人」就是渴望穩定大於一切的「自由經濟人」的看法，是有瑕疵而經不起歷史的敲問的，譬如，如果這種「香港人」身份認同果真如此自然而然，又為何會出現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的反殖風潮？而他的對此的「解釋」則是認為：香港大部份的廣東人對政治辯論有天然的熱誠，自己也無意把中國人塑造成都是政治冷感的人，但他們對政治的熱誠，特別是對民主的追求，卻是不合時宜的——不但殖民政府恐懼民主會使得香港被國共鬥爭所「利用」，導致社會撕裂，七〇年代的香港大家都忙著建設香港、努力賺錢、讓大家安居樂業，所以民主之聲沒有發展下去。簡單翻譯一下，也就是說，反殖風潮在這套論述下不過是過眼雲煙，殖民政府忽略「香港人」這些外在於「自由經濟人」的框架的訴求，都是合理的，而「香港人」也是認同殖民政府對這些的忽略，因為香港人終究就是經濟人。說到底，其實彭定康就是試圖用雲淡風起的語氣跳過這段歷史，清洗歷史，也清洗「香港人」身份認同中非「自由經濟人」的追求。

⁴¹ 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香港：中華書局，2019）。

芽，與中國有一定距離，而在成長後，他們從理想主義變成務實主義。第二代香港人後來壓著第三代香港人的發展，也規訓著第四代，讓後面的人無法向上流動。⁴²

他們和彭定康有交集的地方在於，呂大樂和周永新都認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港英的治理技術息息相關：譬如，周永新提到了港英「清潔香港運動」對「香港人」歸屬感的重要性、呂大樂則刻劃了第二代香港人「上位」的空間如何變大。但是，他們與彭定康的差別在於他們認為「香港人」的出現是一個歷史過程而不是自然定律，而兩者都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出現訂立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年期——也就是七〇年代——這就和彭定康那種「香港人自有永有」的去歷史的身份認同觀不一樣。周永新和呂大樂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歷史過程理解大概如下：首先，七〇年代的殖民政府的治理技術使得香港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狀況都有所改善；然後，戰後嬰兒潮——也就是在七〇年代長大的新一代——並沒有上一代的難民包袱，就有了介入政治的意圖；接著，殖民政府的一些塑造身份認同的政策就成功吸納到他們，譬如殖民政府發起的社會動員及行政吸納，讓市民覺得他們自己有幫忙出力，或上位有望，因此有了作為香港市民的參與感；及後，參與感使得這些七〇年代人對殖民政府所推動的社會發展的成就有了歸屬感，覺得在港英讓香港社會變好的過程中，自己也有出過一份力，因此對作為港英管治下的「香港市民」的身份感到自豪；最後「香港市民」的身份成為連結港人最大動力，塑造出「香港人」的身份。⁴³也就是指出，「香港人」身份認同是「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的產物。然而，在當時，周永新及呂大樂都並沒有戳穿「神話」被建構背後的權力結構，這樣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陳述到頭來是複製了「神話」的話語。

周思中因此對種建立在「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的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說法感到不滿。他認為，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是「從這三十年發展中蒸餾過濾出的規範性價值觀」中裁剪了歷史，自圓其說地宣佈了不同代人的存在的關注只是在於「上位」（向上流動）與否，讓「香港人=經濟人」的身份認同借屍還魂，自我證成。⁴⁴也就是說，《四代香港人》其實不是真的是在說「四代香港人」或「四種香港人」的故事，而是第二代香港人（也就是在殖民主義下上位成功的一代）怎麼武斷四代香港人的故事。不過，世代論的問題的硬傷不是只是在於它的立場問題（因為這種世代論賦予了殖民地時代以來的

⁴² 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2007）。

⁴³ 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呂大樂，《四代香港人》。

⁴⁴ 周思中，〈從來存在、且命定回歸的幽靈——「本土」的本體論〉，收入馬家輝、梁文道、王慧麟編，《本土論述 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台北：漫遊者文化，2009），頁 166。

社會政治文化制度一些合理性)，它的硬傷是在於它的方法問題——周思中認為，這種描述的方法的問題是將香港的現況模型化，而不是歷史化，因此既不能捕捉歷史的複雜，也無法捕捉從複雜的歷史傳承至今的現實的複雜。⁴⁵我基本上同意周思中對世代論的批判，即無論是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還是周永新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是站了歷史的勝利者的角度去斷定何謂「香港人」，並在此固化的、「螢幕截屏」般的身份認同基礎上回溯性地填塞歷史——這其實就是霍爾所說的第一種身份認同概念。呂大樂和周永新把「香港人」當作是一個整全的、有著相同的集體回憶、相同的本質，相同的價值（結果都是認同了殖民政府遺留的「上位」價值）的一群「相同」的人。這種概念儘管不全然是一無所處的，也必然有它的短板和問題。第一，以此硬實、直線、平整的框架來面對必然是混雜的後殖民身份認同現實，因此就會出現簡化、曲解、誤讀或無視。第二，如果我們用霍爾第二種身份認同的框架去看這第一種身份認同的框架，則會看到這種身份認同的固化也包裹了殖民時代一直遺留在身份認同中的問題，散播這種身份認同在長遠來說也就關閉了政治的可能。因此，面對這樣的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論述，周思中的主張是要穿越「緬懷殖民時代」和「資本主義全球競爭年代」的「雙重幻象」。⁴⁶

然而，到底要如何穿越雙重幻象去構建「香港人」身份認同呢？譬如，把「香港人」身份認同論述成「香港文化」、「港式生活」能否就跳過殖民政府的框限，並發展出一條「由下而上」的香港敘事及香港身份認同敘事，開啟了「香港人」身份認同政治的可能性？周思中對此也是非常警惕的，他認為，「香港文化」並不就等於必然蘊含著與殖民政府分庭抗禮的公民社會力量，因為「香港文化」、「港式生活」可能也是被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等價值所穿透。在〈編話：拒絕認命，重複《70》〉中，周思中就認為呂大樂在《號

⁴⁵ 我以周思中對呂大樂的批判為例子去說明好了。在 2006 到 2009 年間，世代論在學院及知識份子社群曾經被廣泛地挪用，用來打擊「八十後」社運青年（也剛好是屬於第四代香港人）的保育運動。就如同我先前所說，《四代香港人》其實是「第二代香港人怎麼武斷四代香港人」——此書首先已經是以第二代香港人（也就是得益於七〇年代殖民時代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的一代）的唯經濟、唯「發展」、「唯上位」角度去套到第三代和第四代香港人身上去。因此，世代論對「香港人=經濟人」的默認，就完全跳過了這群「八十後」非唯經濟、非唯「發展」、非「唯上位」的關注，更曲解了這些的年輕人的抗爭不過是無法「向上流動」、「上位」的結果而已、擺偏了「八十後」社運青年了運動意圖及想要重新打造的本土議程——他們想要的可不是要求老的殖民地發展主義遊戲規則增加上位名額，而是要求改變這種遊戲規則，讓社區發展既不用為了「上位」而犧牲或扭曲自身，或活在「上位」競爭遊戲的恐懼和疏離之中。而如果我們理解「八十後」社運青年的脈絡，更會發現他們並非從石頭中爆出來的一群人，他們事實上也是承繼七〇年代《70 年代雙週刊》無政府主義與托派思想，也就是說，「世代論」不但在把第二代香港人的價值套用到第三代及第四代時是武斷的，它甚至對第二代香港人的認識也是偏頗的、也因此被周思中認為是一種為殖民地背書的行為。參見周思中，〈編話：拒絕認命，重複《70》〉，收入侯萬雲，《《1970s》不為懷舊的文化政治重訪》（香港：進一步，2009），頁 25。

⁴⁶ 周思中，〈編話：拒絕認命，重複《70》〉，頁 25。

外三十》大讚《號外》是如何印刻及見證從七〇年代開始土生土長的年輕香港人所打造的香港，就只是為城市消費文化及資本主義「成就」背書，企圖重複「幻象」；他認為，這不過是繼續試圖掩蓋殖民時代一直遺留到現在的問題，彷彿七〇年代以後的本土新香港（區別於七〇年代前國共二元劃分的香港）是建立在城市消費生活而已，這結果是避而不談譬如七〇年代社會運動對文化場景的輸出並所遺留下來「本土」——也即「香港」及「香港人」——遺產可以蘊含的激進性，其實到頭來還是反吸於「香港七〇年代」的神話之中。⁴⁷雖然，持平地說，從文化探討身份認同的取徑並非一無是處，畢竟，這種取徑彌補了傳統的階級政治及其背後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解釋力不足的問題，然而，它也同時繞開了傳統馬克思主義階級批判的力度。或許我們可以因此了解到為什麼這種敘事以至於以此為佼佼者的《號外》雜誌無論對香港知識份子還是「香港人」來說都那麼吃香——正是因為文化論述看起來又貼身、又無害、又讓我們免於各種走資的羞恥和罵名——事實上，連《號外》的創始人陳冠中也曾在《事後——香港文化誌》提到，《號外》的創立是受到無政府主義及托派刊物《70年代雙週刊》裡面的文化評論啟發，但又不想做得像他們那麼危險，好像會隨時被人逮捕那樣。這種敘事的優勢是在於它使得「香港人」的主體建構免於免於來自傳統馬克思主義批判帶來的羞恥、但也免於了唯利是圖的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引誘帶來的無恥。在欠缺對資本主義及殖民主義的敏感度與批判性下，以文化論述構建「香港人」主體性到頭來又栽進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手中——就好像周思中會認為，為《號外》讚好的呂大樂當年也只是看到了消費文化的《號外》，錯過了批判文化的《70年代雙週刊》，也錯過了理解「香港人」身份認同之混雜行和複雜性的契機。也因此，周思中認為啟動一個關於重新認識七〇年代的知識計劃尤其必要。

48

⁴⁷ 這種敘述——也就是文初所說的「第二種七〇年代敘事」——因為限縮在流行文化中的消費文化，因此天然地錯過香港文化中的社會運動種子。這些社會運動對身份認同政治的議程的反省、對階級分析中解放政治及唯物主義的強調，結果是在這種以消費文化為主軸的七〇年代敘事中被架空的。這種七〇年代敘事塑造出來的身份認同政治，結果只是重複著對日常常識的肯定，卻看不見這些日常往往又是被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所穿透。在後冷戰時期，這種敘事下的「香港人」主體，更容易滑落成為文明衝突論背書，從較為樸素的民粹主義變成右翼民粹主義的主體。在欠缺對香港社會運動的重視及影響下，香港文化並不再代表草根在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中自強不息的另類路徑——香港文化變成香港的消費文化，只是代表草根的向上流動，代表的是乾淨、文明、啟蒙，相對的是無產階級「髒亂差」。到頭來，第二種敘事被收編到第一種敘事當中，這樣的敘述下的「香港人」如果不是經濟至上，那也是只是在經濟以外也顧及生活品味而已。參見周思中，〈編話：拒絕認命，重複《70》〉，頁 14-25。

⁴⁸ 周思中，〈編話：拒絕認命，重複《70》〉，頁 25。

（3）七〇年代社會運動敘事之必要

或許也是經歷了這一波的批判，呂大樂在 2012 年出版的《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中明顯要比以前對殖民主義遺留的問題及「香港人」身份中的殖民性有更高的敏感度，在研究方法上也變得更為歷史化。⁴⁹在此時，呂大樂已經和之前的《四代香港人》相去甚遠。在此書的〈「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一文中，呂大樂就翻看了麥理浩的報告，指出「香港人」身份中對自己作為「香港市民」的認同感覺是如何符合了殖民政府的藍圖。呂大樂表示，麥理浩上任以後就意識到英國在八〇年代就香港前途問題和中國談判，而為了增談判的本錢，就必須在七〇年代開始累積民眾的支持——因為如果不去努力經營香港民眾的支持，使得香港以類似強迫收回的方式回歸中國，足以令英國政府有所損失、蒙羞，及與中國進入緊張的關係，這會不利於英國在香港的利益團體的存在和發展。因此，港英政府從七〇年代開始就致力於培育市民的自豪感（civic pride），這一方面是為了改善政府與市民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是要避免「香港人」對英國的效忠而可能出現的公民認同及其附帶的對公民權利的要求，也就是說，市民的自豪感是公民身份「有效的替代品」。⁵⁰呂大樂的研究的重要性是在於指出了由「香港市民」的認同而來的「香港人」認同可能本身就存在殖民性。

然而，呂大樂這系列研究的重要性不只是對「香港市民」所隱含的殖民性有所警惕，因為這畢竟只是加入了道德上的批判立場。⁵¹我認為，呂大樂的研究的兩大貢獻在於，第一，他對「香港市民」以至於「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建立和殖民政府政策之間的關係是看得沒那麼緊密的。譬如，呂大樂對殖民政府的政策的成效比較存疑。在〈矮化的公民概念〉一文中，呂大樂就在透過仔細的分析了像「清潔香港」和「撲滅暴力罪行」這種由殖民政府帶領的、由上而下和有組織的參與後，認為這些動員的真正成效，是尚有待深入研究。⁵²他總結說：

⁴⁹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⁵⁰ 呂大樂，〈「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

⁵¹ 而這也可見於呂大樂對彭定康的批判：他指出彭定康的香港成功故事只是講殖民政府的好，是忽略了譬如香港的成功的許多其他天時地利——譬如香港有幸成為轉口港、又緊貼二戰後的國際經濟形勢才得以轉型成為財經及商業服務為主的「世界都市」，而且英國管治下所造成的傾斜性社會制度並非只有成功，而也有其他黑暗面，包括工人的經濟困境和封閉的政治制度。參見呂大樂，〈香港故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收入潘毅、余麗文編，《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2003），頁 206-18。

⁵²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 121-36。

我們初步的觀察是，香港市民絕非照單全收。事實上，差不多跟那兩次社會動員同步發生的，是本地的城市社會運動……自七十年代開始與香港社會所形成的公共文化與生活秩序，有多少是官方動員的結果，有多少是民間自發的回應，值得好好了解的討論。⁵³

也就是說，呂大樂在拼湊「香港市民／香港人」是怎麼建立起來時，和殖民政府的功勞之間打開了一個縫隙，並認為七〇年代社會運動的研究或「一種從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發展經驗的視野」⁵⁴是那一塊有待填補上去的拼圖。這無疑也同時打開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歷史可能性，使之在概念上不一定會走入「殖民有功論」的桎梏之中，也更能捕捉「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複雜性和混雜性。

第二，呂大樂在〈無關痛癢的 1974〉一文中則強調了七〇年代作為一概念在一些去歷史化的敘事下是如何以偏概全，使得我們忽略了七〇年代初期的社會狀況與民情民意，並因此而產生很多與時候對那個時代的片面理解。此外，他也提到了很多人會把七〇年代所出現的社會轉變——包括歸屬感所帶來的身份認同改變——直接或間接歸咎到 1966 和 1967 兩年的暴動；但他觀察到的卻是 1967 到七〇年代中出現的「時間差」中更流行的其實是「認中」的政治方向。⁵⁵也就是說，火紅年代社會運動並不是一開始就走向本土，而是走向尋根——大量火紅年代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也是從此時開始的——而理解這股熱潮流，或許才能把香港人身份認同問題給複雜化。

循著呂大樂的研究，我在自己的論文中的相關提問是：1967 到 1974 年的認中熱潮是如何出現的？社會運動對此認中熱潮的貢獻是什麼？認中潮流與麥理浩的管治可能的張力及關係？而如果港英政府所打造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是一個被逐步組裝的過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那反殖的社會運動在當中的作用是什麼？他們是怎麼看待「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特別是「香港人」的責任以及與中國的關係？

⁵³ 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頁 136。

⁵⁴ 呂大樂，〈香港故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頁 218。

⁵⁵ 呂大樂，〈無關痛癢的 1974〉，《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 13-20。

（4）七〇年代社會運動與「香港人」身份認同

火紅年代社會運動對香港政治局面的影響，絕對不只是在於一派或一種意識形態怎樣直接「一個蘿蔔一個坑」地直接注入於其中；不同派別互動的過程中其實就有辯證地發展出新的價值與路線，而甚至生出新的派別——而火紅年代對現在的影響往往就是要經歷這個辯證的過程，火紅年代的遺產因此也是以一種混雜但總體的方式延續到後來。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必須要扯進羅永生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研究進來。羅永生是在研究香港七〇年代社會運動及此時間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最有權威性的學者之一：法定中文運動、保釣、毛托之爭、國粹派國粹派「認中」活動對後續的影響等——他都有研究過。然而，我認為他對本論文最大的啟發在於，他對不同各派別之間，和與殖民地政府之間的許多的衝突和矛盾尤其敏感，並也總是捕捉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複雜性——譬如中國還是英國、反殖還是戀殖、民族還是國際、行動還是等待、激進還是維穩等——在羅永生的書寫下，都是以特定機制（當然這個機制需要環境條件配合，而不是說可以跨歷史、跨脈絡地恆動）被暫時安放或並置（雖然並不是毫無張力地）。譬如，在八〇年代的，也就是「粹尾」（國粹派末期）的影響下，羅永生自己就曾是民主回歸論的支持者，民主回歸論其實也是國粹派和社會派辯證下的一個新的路線，而不是直接隸屬於一家或一派的直接產物，其民族主義色彩及對本土主體性的關注，就可以說是合兩家之大成。

那羅永生在學術上是怎麼論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建構過程呢？在〈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中，羅永生稱戰後嬰兒潮——也就是七〇年代的一代——為第一波「本土意識」（也就是「香港人」身份建立的第一波）的推動者。⁵⁶然而，這一波本土意識在結果來看是沒有被充分展開的，而是敗在了殖民主義底下。在〈邁向具體主體性的本土性〉中，羅永生就詳細描述了當下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何以是一種殘缺的政治主體性——體現在「香港人」的慕強、功利主義與參與公共事務的無力感——而此殘缺的主體性是港英政府透過推行本土化計劃去刻意打造的。在九〇年代，這這殘缺的主體性也因為「被動回歸」而變得更加確鑿。⁵⁷羅永生除了歸咎殖民政府為造成了「香港人」政治主體性薄弱的主謀，他也認為高等華人與殖民政府勾結的管理傳統及七〇年代的國粹派盲

⁵⁶ 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頁 123。

⁵⁷ 羅永生，〈邁向具體主體性的本土性〉，《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2014），頁 14-30。

目的民族主義皆為偏擺了「香港人」政治主體性的幫凶。而羅永生對國粹派的鞭撻也是非常用力的，他認為，國粹派從來都是國家主義凌駕於民族主義，而且他們都是因此對本土的事情被動、並隔絕於介入本土政治當中，造成了之後的被動回歸。特別是在回歸後成為建制派，以國家主義的名義延續了殖民性、遮蓋了從殖民時代遺留到現在的一連串問題。⁵⁸羅永生也在多處以狠辣的語氣對這些幫凶批評、喊話，似乎認為他們該為此薄弱的主體性帶來的政治困境負責。⁵⁹而由於他對「主體性薄弱」的分析主要是認為是殖民政府為罪魁禍首，國粹派和高等華人為幫凶，所以他對香港回歸後的政治困境的斷診是在於香港「未解殖」，而不是香港「被極權中國再次殖民」。⁶⁰我理解，羅永生這樣的診斷，是為了預防香港社會運動在批評大陸威權統治時重新倒會殖民主義的懷抱，並且回到冷戰的「極權 vs. 自由」框架底下。同時，搭配上他對「香港人」身份認同必須建立出「主

⁵⁸ 羅永生，〈邁向具體主體性的本土性〉。

⁵⁹ 不過，持平地說，羅永生對國粹派的批評也總是同時透露出一些「曖昧」。我舉一些簡單的例子好了：在〈曾蔭權的悲情與香港的悲情〉中，羅永生就認為曾蔭權為殖民地打工的委屈經驗，與六七暴動的愛國左派在回歸後需要為這樣的前殖民地精英奔走，其實一樣「只有辱沒有榮」，兩者都只有徹頭徹尾的反願景、也就是「認命」。以至於他說他對曾蔭權——也就是他經常批評的對象——掉了眼淚。他認為這是一個悲劇，兩者在沒有疏理歷史前就訴諸「大和解」的模樣，自己和稀泥之餘還阻擋新一代道破真相。類似的富有溫度與曖昧的書寫，也可以在〈左派的躁狂與憂鬱〉中看到，文中他就曾延續布朗的左派憂鬱討論，嘗試體貼香港的老左派的心情，指出香港的老左派（也就是六七暴動的愛國左派到國粹派）當年自詡在眼光、分析、遠見，都比沈淪在殖民地當奴才的本地主流社會高明，他們曾經有理論、有分析、有判斷，然而卻一直受制於殖民政府及中共對香港的策略擺放下而沒有辦法一展所長，因此與他們的左翼理想處在一個痛苦的關係之中，這使得他們只能繼續沈溺在空中樓閣的對中國大陸的追認上，無法看到回歸後的殖民連續性，錯失對當下問題的批判。而在文中，他一方面批評流行文化中對這種老左派以「阿甘」的方法開脫，只是體貼他們的善良，卻錯過了他們思想的一面，似乎是在為老左派擋刀；另一方面也似乎不甘老左派倒退為「阿甘」，放棄了左派眼光、分析、判斷，也就是同時在對老左派動刀。羅永生對香港老左派的左派憂鬱的態度、以至對如曾蔭權這種殖民地菁英的態度，因此比布朗更加的複雜。布朗對這些老左翼在分析的過程中是決絕而冰冷的，但羅永生在毫不留情地批評老左派需要為香港缺乏主體性負責的同時，其實也有相愛相殺、「恨鐵不成鋼」的部份，他痛恨這些老左派就輕易放過理想，隨著政治上位的空間被打開就隨波逐流，至少在表面背棄或放棄對「主體性」的追求。羅永生對著這些老左派以及他們遺留下來的問題的劇烈的批判，我覺得也不妨理解成是一種左派憂鬱的延續，或被老左派的老憂鬱造成了另一種新左派的新憂鬱的結果。我在這部份提到的憂鬱，並不是一種貶義，而是沿用一種精神分析的關注，認為這種憂鬱可以被當作是一種驅力（drive）的機制來看。如果說，在殖民時代，香港的老左派是受制於殖民政府與中共的雙重桎梏，而他們的憂鬱作為一種驅力，使得他們有了一種「忍辱」的能力，放棄了爭取身份認同中那個具備自決動能的「主體性」，成為了「建制派」這種「既口頭反殖但又不行動地反殖、還要配合國家主義的對殖民遺留的延續」的陰陽怪氣的妥協（而這是戲假真做還是放棄自我，則也無從知曉，因為所謂真相也總是回溯式的操演）；那在後殖民時代，羅永生作為新左派，則是受制於「老左派——建制派」與戀殖的華人精英這些「老一輩」所製造的桎梏。羅永生其實和那些老左派一樣，也是身陷在一個桎梏帶來的憂鬱，而也是一樣的是，羅永生也讀懂他們桎梏的結構，並且對它表示無限同情（也就是譬如〈曾蔭權的悲情與香港的悲情〉和〈左派的躁狂與憂鬱〉中顯示的柔軟），以上，就是羅永生曖昧背後的底色。

⁶⁰ 然而，有些本土派會認為他用「未解殖」來為香港斷診，是不夠批判中共管治，到最後其實是要窒礙近年本土派打造的「香港人」身份認同計劃——這顯然是把「反殖」和「香港人」身份認同對立了起來，或把「反殖」看成是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我認為這只是一種限縮與冷戰框架下的誤讀，太僵硬地理解批判威權的中共必須要擁抱西方現代性價值（甚至是之中的殖民性）。

體性」的堅定意志，他整套敘述和診斷因此可以被理解成是一個左翼民粹主義的路線的知識生產的嘗試。⁶¹

儘管我同意羅永生對「香港人」身份認同困境的分析，然而，我認為當中對傳統左派及國粹派的大力鞭撻是稍微去歷史化的。六七暴動的本地傳統左派並不是一開始就「丟棄」反殖和關注本土的行動——六七暴動其實就是香港最大規模的反殖運動——而他們國家主義的轉向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這和港英政府對左派的打壓、社會大眾對左派的污名化也是息息相關的。本地傳統左派或之後的國粹派以建制派的方式回魂，並站在了勝利者的位置對一切反對聲音進行打壓，也可以被了解是一種失控的自我防禦機制，其國家主義的走向，也需要被放置在這些左派的創傷中理解。當然，我也可以理解，批評國粹派對批評建制派以至於今天以民族主義之名行國家主義之實的政府在當下的意義。但是，一來，這種狠批的方法是否足以介入他們的曖昧性？二來，這會否也放過了本地左派以及國粹派的某些激進性？回到文獻回顧中對方法的討論，羅永生這種對國粹派布朗式的狠鞭，是否恰當？本論文希望可以延續羅永生對七〇年代社會運動及當下解殖進程的關注，但希望可以在狠鞭之前，嘗試再歷史化一點。⁶²

⁶¹ 必須要留意的是，當羅永身在香港的歷史當下，嘗試把「反殖」和「香港人」兩者融合起來，去嘗試發展一個左翼的民粹主義路線時，他並不是只是在操作一個單純的、抽象的概念，他在執行時，也必然要回應到具體的人與歷史情感——無論是對自持「反殖」還是自持「香港人」的人或情感，他都會仔細分析。而羅永生的書寫，必須放置在這樣的脈絡下去閱讀，才能看到他是如何嘗試著穿越這重重情感和人事，以操作「香港人」與「反殖」、「身份認同政治」與「左翼政治」的合體。畢竟，在香港，這兩組詞語在很多時候是不相容的，具體來說，就是在現實中，我們怎麼看待當日的自明激進且口頭反殖的老左派（即六七暴動的毛派和國粹派）在變成建制派以後，成為了這個左翼民粹路線的最大的擋路人；而反而那些有戀殖成分的意識形態，成為了訴諸「香港人」身份認同主體性中最大的養分之一？現實之難，是在於誰是「朋友」、誰是「敵人」——在如果說後殖民的身份認同都必然是混雜、矛盾、自帶毀壞（羅永生則是認為是導致了「主體性」薄弱）的問題？左翼民粹主義路線如何才可以保持基進性？才是對得起現在的一些運動議程，也對得起歷史？這是我認為羅永生在寫作時總是在拿捏和琢磨的一些點。我理解這也是羅永生的書寫在筆鋒狠辣以後，總是有一種曖昧（ambivalence）的弦外之音。

⁶² 我認為，羅永生其實總是有曖昧的部份，但在曖昧過後卻總是訴諸狠批。但我卻認為，這種曖昧是必須的，因為只有這種曖昧是與最底的一層的情感——也就是歷史的憂鬱——直接呼應的。特別是，因為目前還沒有一條現實的解殖的政治議程得以讓這種曖昧流暢地被疏理及解決——或者說，「八十後」曾經想要做這條路線，但剛做起一點，就被右翼本土派當作「左膠」敵人鬥垮，而2019年，新進本土派趁反修例運動的關注蓋過一切時，把學聯的「自治八樓」收回單位，就是標識著這條基進路線的潰散——在這樣的情況下，憑什麼為了擺脫憂鬱而放棄曖昧呢？我認為我們就該保留曖昧，因為這是保留批判的尖銳，也是保留元氣之所在，在沒有建立好自身的運動議程和勢力當下，以討好的姿態投入到既存的運動當中，斬獲的也是虛假的支持幻像。羅永生的問題正正是還不夠曖昧，這特別體現在羅永生對當下的追求「香港人」主體性為首要目的的新進的本土派倡議總是「留一手」——即不多談也不具體地批判——而放過了當中的右翼民粹傾向的書寫風格。羅永生新近的「攪炒解殖輪」，可謂是拒絕自身曖昧的代表。2019年9月20日，羅永生於明報撰文〈「攪炒」是一種解殖運動〉，認為「攪炒」之所以讓人感動，是因為他認為「攪炒」是讓「一切歸零，讓新的價值重新出發」，也就是法農所說的解殖的必經之路。羅永生引述的儘管是攪炒團隊的原話，然而，這是完全忽略了「攪炒」團隊在運動中行動和語言之間的矛盾，譬如，一方面他們認為要主動突破五十年不變的限期，不要為了五十年的苟且延緩自身的行動；但另一方面，自身的行動原來是向西方世界登報紙指責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

0-3 研究問題

總結以上，本論文的問題意識是要循著「火紅年代」與「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之間的矛盾和張力，以火紅年代這段「失敗者」的歷史作為突破點，試圖複雜化從「七〇年代神話」而來的「香港人」身份認同並提示出另類身份認同、國族政治及左翼政治的可能性。特別是貫穿於火紅年代的「中國問題」討論，除了關乎身份認同，有些時候甚至折射出超越身分認同政治範圍的問題意識，而應該被理解為左翼政治的一部份。而我們也要意識到，左翼政治與國族政治在火紅年代中相互糾纏拉扯的模樣，並不只是「香港特色」，也不只是當時脈絡中的現實政治問題（譬如，社會主義中國近在咫尺，國族主義的慾望也就更大了，探究國族政治與左翼政治之間的關係動力也更強）。更普遍的問題是，香港作為第三世界殖民地，和其他第三世界都需要面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冷戰、分斷等問題，而很多時候，這些問題都會被予以國族政治的解方——譬如訴諸獨立建國、民族國家建構、或回歸等政治議程。香港火紅年代的左翼特徵，及他們對國族政治的思考，也需要被放置在此一第三世界左翼政治的範疇下理解。

在研究框架上，我將大量採用情感結構的假設，並且用歷史化的方法去剖析情感結構之於思想、組織等作用，以及這些情感、思想及組織如何影響其行動及論述——特別是對中港未來的構想及附帶的身份認同的部份。由於本論文更想要歷史化地討論火紅年代的爆發，討論的是多個派別之間的互動所留下的總的影響，因此在漫長的火紅年代之中，本論文只會觸碰相關的歷史事件，並以不同派別互動最為頻繁的事件作為研究重心。

明》。到頭來，他們一開始對五十年不變的期限的不滿，只是在於它沒有被落實，而不是質問這個遊戲規則的制定的問題。他們是以冷戰二元的結構去理解香港的處境，也就是認為二元必須平衡，才能讓《中英聯合聲明》被落實。因此，他們的方法並不是譬如聲援其他同樣批判殖民遺留的運動，也不是反省後冷戰時代殖民主義一資本主義造就的新的困境，而是支持 G20、並且進行面向西方政府（而不是民間）的遊說工作。「香港人」的「主體性」因此不是體現在大衛面對巨人的勇氣，也不是體現在質問中英強權共構的《中英聯合聲明》，而是體現在和西方政權連線——這不是繼續慕強，放棄「主體性」，是什麼？

在後殖民時代，羅永生在對抗來自老左派和殖民地菁英所遺留的桎梏時，是做了很多的理論工作，他沒有像老左派那樣認命和自我否定，而是選擇了拼命掙扎。但是在抗拒自我否定和自我傷害中，羅永生或許過快嘗試找救命稻草，因此過快肯定攪炒團隊以至於新進本土派的一些操作。然而，這真的是一種好的做法嗎？這種沒有曖昧到底、自傷到底的急忙的趨向目前的右翼民粹主義，並以為可以左翼民粹與右翼民粹的能齊頭並進，我認為講到底是聰明過頭了。羅永生對老左派總是比對這些右翼傾向的本土派要嚴苛很多，這種嚴苛是不對等的。憑什麼國粹派的慕強就可以被以「擺偏」「主體性」被嚴苛的否定？這不是站在歷史的結果——也就是「國粹派」的潰散——的回溯是什麼？而憑什麼對新進右翼本土派的慕強就可以認為是一種解殖的嘗試而不是再一次的擺偏？當然，想必羅永生也會認同的是，在面對具體現實時，一味批判新進的右翼本土派，可能會錯過他們的某些內涵的激進性，所以不妨以鼓勵的方法匯入並導正之——也就是嚴苛並非聰明。但如果是以此個觀點，那當年社會派、托派、無政府主義，對國粹派的苛刻是否也是不夠聰明？因為他們沒有以貼近及導正的方法提煉香港毛派中的激進性。那羅永生又何以延續著這種嚴苛，對甚至是已經逝去的國粹派依然繼續鞭屍，又是不是繼續延緩了從中提煉它剋制殖民主義的激進資源呢？

這也是為什麼我決定選取 1967-1976 年這個時間跨度，1967 年是六七暴動的年份，1970-1976 年則是火紅年代各派誕生、相對活躍並多一點互動的時間，而 1976 年則是國粹派退場、火紅年代緩慢開始步入結束的年份。

延續著此問題意識，本論文的研究問題如下。第一，火紅年代是如何爆發的？第二，火紅年代青年的思想、組織與情感是如何在運動的發展中演變的？這和此前的歷史及運動中的經驗有什麼關係？有怎樣的承傳和斷裂？這傳承和斷裂在社會運動的發展中起到什麼作用和副作用？最後，在火紅年代的運動發展中，青年是為何及如何構想「香港」的未來及與「中國」的關係——也就是「中國問題」的討論？這如何挑戰了從「香港七〇年代」神話所構建的「香港人」身份認同，開啟不一樣的「香港人」及「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可能？甚至，當時對「中國問題」的興趣，並不只是應該被包納在民族情感和身份認同政治的框架底下去理解——不只關於要認同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而已——這些認同以外，更多的是關於他們對左翼政治計畫的設想。這些認同與這些左翼政治會怎樣在不同的派別及時段中發生、衝突或融合的關係？這些香港左翼政治在世界左翼歷史（特別是西方新左翼和第三世界左翼歷史）中，又有什麼位置？譬如香港左翼政治是否是西方新左翼發展可以涵蓋的？如果不是的話，這是因為它有怎樣的香港脈絡和第三世界脈絡？

最後，此論文並不在於要完全推倒麥理浩懷柔政策的功效，也不在於要完全抹掉香港流行文化的遺產，畢竟無論是「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中的「殖民有功論」敘事還是香港流行文化敘事中的內容都並非生安白造。本研究只是著重於重組火紅年代與其他支撐著「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的敘事之間的關係，但也是去瓦解「香港七〇年代」神話的籠罩性。

0-4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文本分析及訪談當事人來進行。

分析的文本主要是和火紅年代相關的出版物。第一類是和文社相關的同人雜誌。在六〇年代，文社運動在青年中曾有過一番影響力（而在 1966 年人口中有一半人年齡為 21

歲以下)⁶³，譬如、《開放》、《中國學生周報》及早期的《盤古》等，都曾對火紅年代被點燃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第二類是與運動組織及派別相關的刊物，譬如托派及無政府主義相關的《70年代雙週刊》，和托派相關的《十月評論》、《戰訊》、《新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相關的 *Minus 7*、*Minus 8*、*Minus 9*，和國粹派及左派相關的《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特別是風華版）、《七十年代》及1971年後的《盤古》，和逃港紅衛兵相關的《北斗》、《黃河》等。

第三類則是大學生刊物，因為大學生在火紅年代的青年激進化過程中起了先鋒的角色。譬如《學聯報》、《中大學生報》、《學苑》、《新亞學生報》、《曙暉》等。

第四類則是運動中出版的機動刊物，譬如釣魚台運動及反加價運動中的各種通訊、聲明、傳單等。

第五類文本則是七〇年代運動領袖的個人書寫，包括回憶錄、文集、訪談及口述歷史。譬如學聯出版的《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和《香港學生運動回顧》、托派吳仲賢的《大志未竟》、國粹派陳毓祥的《昨日今日陳毓祥》、社會派的曾澍基的《曾澍基全集》等。《香港文化眾聲道》及《思想香港》中的許多對七〇年代當事人的訪談也對本論文幫助甚大。

在訪談上，我則是找到了當時有參與或觀察運動的七〇年代當事人。採訪是採用了滾雪球的方式，從無政府主義派的郭達年（曾參與《70年代雙週刊》編輯工作）及「六七動力」（由六七暴動的YP〔Young Prisoner〕組成）開始，並在他們的介紹下，逐步訪問了莫昭如（《70年代雙週刊》主要編輯）、阮志雄（《70年代雙週刊》編輯）、陳寶瑩（前「革馬盟」成員）、梁國雄（又名長毛，前「革馬盟」成員）、林致良（前「先驅社」成員）、房遠華（崇基學生會幹事）、楊寶熙（中大學生會會長）、石中英（六七暴動YP、批托寫手）、船長（六七暴動YP）、周奕（資深左派報紙記者）、雷競璇（保釣運動領袖）、周魯逸（保釣運動領袖）、劉健威（1971年「保釣會」成員、《70年代雙週刊》相關保釣組織「聯陣」成員）、陳順馨（艇戶事件參與者）、梁寶龍（香港工運研究者）、梁寶琳（獨立工運運動者、CIC幹事）、甘浩望神父（艇戶事件參與者）、林志毅（逃港紅衛兵）、H（《思與言》編輯）、陳鼓應（台灣保釣運動重要人物）、黃默（中華人權協會發起人）。

⁶³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66）。

大部份訪談於 2018-2019 年期間在香港進行，有的是有錄音的正式訪問，每次大約兩個小時；也有的是沒有錄音只有簡單筆記的非正式訪問。不過在 2019 年，由於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使得大家的身心狀態都被大幅度地攪動（包括我自己）——因此訪問也在當時暫時結束。在 2021 年，我有透過網路再次聯絡某些當事人確認一些小細節，也進行了新一輪的視訊採訪，但卻感受到在這種時刻要再去深聊關於七〇年代的種種，對某些當事人來說，是不恰當的時機。

0-5 章節安排

本論文將會分成十一章。每一章將會討論到一個到兩個火紅年代的事件，而章節的順序則是以時序來安排。

第一章是關於火紅年代前的左派、右派及第三勢力在香港的歷史、對港方針及活動狀況，特別是他們如何發揮其影響力，造成了左派和右派割據了香港政治派別版圖的局面。

在第二章，我將會把 1967 年六七暴動（又名反英抗暴）與文革中的造反派進行對照，去理解六七暴動的參與者是如何感覺到和認知到造反派的文革思潮，並探討個人的能動性是如何和文革的大環境在互動。把六七暴動參與者與文革造反派一併討論，除了可以細緻化及複雜化所謂「六七暴動是文革的延續」此觀點的內容，也可以以一個去中心化的六七暴動去映照出一個沒有獨一核心的文革。

在第三章，我會描述 1967 年後非左派的社會大眾及大學生對六七暴動的看法。在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殖民政府是如何帶領反六七暴動的輿論風向，製造「繁榮穩定論」，也會看到對暴動的反對何以催生了第一波中文運動，但此運動又如何被反對暴動的恐左和恐政治化氣氛所反噬。

第四章是關於來自台灣的反蔣的自由主義思潮和來自西方的新左翼思潮，如何為了回應本地、中國大陸及國外社會運動的發展，最後催生了兩本刊物的誕生——1967 年創刊的《盤古》與 1970 年創刊的《70 年代雙週刊》。這兩本刊物的代表性在於，它象徵了青年一代如何在恐左、恐政治的後六七氛圍中衝破了冷戰的低氣壓，並提出有別於本地傳統左右兩派的政治理念或方向。這一章會主要關注《盤古》，並特別討論到當中由包奕明帶起的「回歸論」風潮的時代性，如何催生了後續的「自發毛派」。

第五章是延續著第四章，介紹《70年代雙週刊》自1970到1973年在思想、情感與組織上的發展，並娓娓道來其成立與分裂背後的時代性。此外，《70年代雙週刊》也是「無政府主義派」和繼承了「中國托派」的新一代「香港托派」的搖籃。理解《70年代雙週刊》的統一和分裂，也可以讓我們理解此兩個派別的思想、情感與組織差異。

第六章，我會以1971年保釣運動為主軸，寫作重點除了指出此運動何以是香港中文運動的延續，以及香港保釣運動的問題意識如何是《盤古》及《70年代雙週刊》的問題意識的延續，也把香港保釣與台灣及美國保釣運動進行對照，以理解本地運動與其他地方的運動之間的交流和關係。

延續著第六章，在第七章，我將會討論在基辛格訪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的背景下，本地保釣運動和美國保釣運動在1971年末到1972年的轉向。此外，我也會勾勒本地保釣運動何以在此背景下發展出反殖路線及統一兩條路線，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和融合。而在此章的下半部份，我會接連著保釣運動去討論1973年的「反貪污、捉葛伯」運動中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分庭抗禮以及國粹派與社會派及托派之間的鬥爭如何標誌了保釣運動的反殖路線和統一路線的分裂。「反貪污、捉葛伯」運動中行動的挫敗，也輾轉使得不鼓勵行動主義的國粹派成為了多數派。

第八章，我會介紹1974年由《70年代雙週刊》分裂而來、成立了獨立團體的新生托派，與無政府主義派主導的反加價運動。上半部份主要是分析此運動何以會激起國粹派／自發毛派的大力鞭打，變成「毛托之爭」；下半部份，我則會從運動失敗所反映的社會運動低潮去理解新生的犬儒文化及殖民政府懷柔政策對社會及運動的影響。最後，我則會去探討「毛托之爭」如何結合犬儒文化及殖民政府懷柔政策使得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被蒙上了陰影。從此，托派被嚴重污名，港英政府的懷柔政策也在收割社會運動的成果，火紅年代陷入了困境。

第九章，我將會講述自1974年開始越發誇張的國粹派／自發毛派和托派之間的敵對，如何在運動陷入低潮之時轉移到了學生刊物的陣地，從而引發了「四報聯刊」事件。而四報聯刊事件中引發的「中國向何處去」討論，也工整地顯示了托派、無政府主義派、社會派、逃港紅衛兵造反派之間的關係與就「中國問題」上的思想差異。而在文章下半部份，我也會特別著重透過介紹極左派紅衛兵的出版與組織、以及《黃河》、《北斗》兩本逃港紅衛兵雜誌，一方面是展示文革對香港社會運動討論的持續影響、另一方面也探討逃港紅衛兵造反派思想上的轉向。

第十章，我將會深入講述文革結束何以使得國粹派幾乎一夜潰散——這不只是一次來自外部的信仰的重創，也和他們組織內部的生態及文化有關。然而，國粹派的崩潰並沒有使得他們轉向托派、無政府主義派或社會派，托派的持續污名也沒有因此被解開，國粹派的解散伴隨的是火紅年代場景中理想主義的消逝。配合香港經濟上揚的氣氛和港英的懷柔政策，運動的氣氛已經逐漸走入下坡。

最後一章是結論，我會總結火紅年代興起及消亡的原因，並重申文革及世界激進主義潮流對香港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無論在思想、情感還是組織上的影響，並總結火紅年代青年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以此挖掘火紅年代青年對非切割的、基進的、左翼的「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構想。

在附錄，我將會呈上我的訪談及田野清單、以及收錄一些訪談逐字稿及節錄。雖然火紅年代雖然已成過去，但從六七暴動到火紅年代未解的政治辯論與紛爭，依然持續且隱晦地影響著當事人對今日政治的分析、判斷和主張。希望這樣的附錄，可以給予後續的研究者一些材料，以幫助開啟關於火紅年代的後續影響的討論。

儘管火紅年代對今日的影響或許並不直接，但其實我們作為新一代，也不該只是被動地寄望老一輩把運動的遺產都完好無缺的交托到我們手上一—火紅年代的火種何以繼續傳承，是我們也該主動去挖掘及把握的。這本論文也是我作為新一代與上一代的遺產相遇的嘗試。不過，遺產的承傳不但只是希望與資源的承傳，它同時是侷限、紛爭、矛盾、創傷、不和的傳遞。上一代當事人在當年無法解開的種種，作為接下棒來的下一代或許也會深陷其中，或許我也不能完全繞過。我只盼望自己能出盡全力繼續疏理，為日後的和和解出力。同志已死，活著的人要帶著他們的遺產繼續赴前。

一、香港社運場景：左派、右派與第三勢力（1949-1967）

在戰後時期到七〇「火紅年代」以前的香港，在政治勢力的分佈上分為「左派」與「右派」。而我在這論文中使用左派與右派二詞時，必須再次強調這兩個詞語並不對應我們今天對左翼／右翼之分野的認知。在今天，我們一般會把左翼和右翼首先看作理念的差別。左翼是重視社會平等、分配正義、主張公有制、反對資本主義、反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支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右翼則是重視自由競爭、主張私有制、支持資本主義及保守主義的；而中間派則是社會民主主義。然而，在香港，特別是在七〇「火紅年代」以前，人們在定義左派和右派時雖然也跟左翼和右翼的理念有關，但更多是一個政治派系上的區分：左派代表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被稱為毛派；而右派則代表主張反共及支持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中華民國，或至少是視中華民國為正統。而以上這種在冷戰及內戰下衍生出來的派別和理念分類，有時候也不能完全拿來解釋一些群體及其理念，譬如視中華民國為正統的「第三勢力」和「南來文人」等就未必完全支持國民黨，但在其反共並視中華民國為正統的前提下，在本論文中姑且歸類為右派。

這種對左派和右派的指稱雖然因為和今天的左翼／右翼並不一一對應，而看起有諸多彆扭，但因為本論文就是一篇關於七〇「火紅年代」的社會運動研究，因此，我在此使用左派和右派二字時，僅僅是以一種歷史化的方法使用了忠於當時討論脈絡的用字，並不代表我認為左派就是符合今天的左翼定義，右派就是符合今天的右翼定義。

在這一章，我將會簡述 1949 到 1967 年香港的左派、右派的場景，還有本來想要獨立於左派和右派的「第三勢力」如何被收編入右派場景的過程。而了解這段七〇年代前的歷史，對後續我們開啟關於七〇年代的討論至關重要。那是因為，第一，這是火紅年代得以生成的脈絡，也正正是從此脈絡下觀看，我們才能理解火紅年代的劃時代重要性。羅永生對火紅年代就曾經做出以下形容：「這個年代所湧現的政治及社會運動，是以青年一代為主體的。比起戰後初期的『冷戰式』對抗，1970 年代的社會運動風潮，更有獨立性和本土一代的自主性……」¹。這裡「獨立性」和「自主性」的意思就是說火紅年代的社會運動派別衝擊了七〇年代前「左派」和「右派」的分野，是「獨立」和「自主」於左派和右派的一一也就是說，火紅年代是一次政治派系上的「重新洗牌」。

¹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思想》26 期（2014），頁 123。

我們要先理解左派、右派及第三勢力一開始是怎樣佔據香港的政治分佈，才能理解火紅年代是把「怎樣的」「舊牌」洗成了「新牌」。

第二，我們不能忽略火紅年代各個派別的「獨立」與「自主」，其實也建立在持續地和之前的左右派分野對話之上。而又由於左派和右派都是建立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獨立於左派和右派的火紅年代在與之對話時，其實也沒有放棄「中國問題」這個問題意識。所以，要理解火紅年代對「中國問題」的討論，同樣先要理解左派和右派本來是怎麼討論中國和香港的關係。

第三，火紅年代各個派別的「獨立」與「自主」的生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實上，火紅年代的各個派別新生時，也曾經在當年造成認識上的定的困擾：在校內的左派／毛派與社會派出現矛盾時、在校外的左派／毛派與托派和無政府主義分庭抗禮時，左派對社會派、托派和無政府的左右屬性都曾非常起疑；坊間對這些新生的派別到底屬左屬右、還是不左不右、還是另一種左和另一種右，也有過一番激烈的討論。在今天的左翼、右翼標準來看，當然會事後孔明地覺得這種討論非常奇怪：因為七〇年代的托派、無政府主義、社會派等毫無疑問是左翼的，甚至在理論上來看，好像就應該「左翼一家親」地與左派一同對抗譬如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然而在當時，左派卻對這些新出現的左翼派系甚為忌諱，坊間也常會對這些派別會否都是左派有所顧慮。這種敵對和顧慮在今天看起來會覺得難以理解，但當我們歷史化地理解六七暴動所勾起的左派恐懼，以及七〇年代的托派、無政府主義、社會派、右派及第三勢力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後，或許就可以明白當時不同派系的紛爭背後的原因——這些歷史的紛爭絕不是可以用今天抽象的對左翼和右翼的界定去化解的，而是需要首先從梳理歷史入手。也就是說，雖然火紅年代一般會被認為是受到西方六〇年代激進思潮甚至新左翼思潮的影響所產生的，但這些思潮得以進入香港並且形成火紅年代的各個派系的前提條件，其實首先是需要跟 1967 年前在香港異常穩固的左派和右派的分野對話和互動，才得以被社會的認知版圖所定位，並且在香港政治座標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我們要先理解左派和右派及第三勢力一開始「如何」——出於什麼動力？有什麼組織？用什麼方法？經過什麼過程？面對什麼問題？——佔據香港的政治分佈，才能知道火紅年代是「如何」把「舊牌」洗成「新牌」。

1-1 當冷戰遇上殖民主義：左派與右派在香港

1-1-1 香港戰後左右兩派的微妙共存：殖民地下的冷戰

從 1841 年開始，香港因鴉片戰爭被割讓成英國殖民地；1941 至 1945 年間，香港曾被日日軍佔領；1945 年，二戰結束，香港的主權則根據《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依然歸屬英國，使得香港在戰後並沒有立刻回歸中國或宣佈獨立，而繼續為英國殖民地。

左派和右派作為政治派系之間的鬥爭，隨著二戰以後國共內戰的展開而變得白熱化。此外，在冷戰的籠罩底下，國共內戰也被視為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的對壘。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政府避走台灣，成為「流亡政府」，但聯合國依然承認中華民國地位。國民黨與共產黨都希望自己在國際上更有地位，以早日統一中國。因此，香港對左派和右派兩大陣營的定義，也是國共鬥爭及冷戰在香港的延續及反映。

對港英政府來說，他們非常明確地意識到香港的脆弱性，也明白共產黨和國民黨隨時可以大軍壓境的潛在危機。²所以，儘管左右兩派都希望使用香港的殖民地特性，為自己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戰略鋪路，使得香港成為了兩派的「兵家必爭之地」，但港英政府在穩固自身管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因為香港還是有巨大的經濟利用價值，且可以作為英國在全球依然擁有權力的象徵）的大前提下，並沒有因為與中華民國政府同屬「自由世界」而對右派縱容，而是對左右兩派都採取了中立及非挑釁（non-confrontational）的態度——也就是說，對兩派既默認又壓制，並允許兩派在不危及自身法律與統治秩序的前提下進行活動。³譬如，港英政府不允許兩派以共產黨或國民黨的名義在香港活動，國共兩黨在香港只能以不同的名義、以公開或半公開機構活動，這也製造了左派和右派在香港分庭抗禮、互相牽制的局面。

由此可見，當冷戰遇上殖民主義，就在香港出現了微妙的化學作用：在大部份時候，左派並沒有與屬於自由世界的港英政府起直接衝突，以避免自身被鎮壓；另一方面，右派也沒有因為與港英政府同屬自由世界陣營就在香港得到更多好處，而也是處處受到港英政府壓制。在香港，左派和右派的衝突是一種冷戰及內戰的產物，但此衝突卻被殖民主義硬生生地壓制著（但沒有被調停）。

² Chi-kwan Mark, "Int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1.

³ Mark, "Hong Kong in British,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d War Thinking," 12-39.

1-1-2 香港戰後社會問題

要理解香港戰後左派、右派和第三勢力的場景是怎麼建立起來，先要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和社會問題，才能明白各派可以透過介入什麼社會問題去發展自身的組織，並且擴大派系的力量。

香港自開埠到戰後，最重要的產業是轉口貿易，唯一比較重要的工業是造船修船業。經歷 1945 年二戰結束、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人口從 1941 年被日軍佔領前的 164 萬爆增到 1951 年的 214 萬。⁴事實上，香港一直都是一個「移民城市」，本地人口變化深受來自中國大陸的遷移所影響，並反映著中國的政治及社會變動。

在此快速的人口增長中，有不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雖然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人口不應該被簡化為都是逃避共產黨政權的難民，特別是有學者也曾指出過，一些過分強調來自中國大陸的逃港難民人數的統計研究——譬如具濃厚國民黨官方性質的半民間團體「中華救助總會」（簡稱救總）及親國民黨的美國組織「援助中國知識份子人士協會」所做的統計——很多時候都是為了服膺冷戰下自由世界對共產世界的戰略，有透過扭曲移民人口屬性和誇大難民人數來詆毀共產世界的嫌疑。⁵然而，不論這些移民人口是否為了逃避共產黨政權來到香港，移民的確帶來了資金和勞動力，使得香港跳過原始積累階段，在五〇年代開始有條件轉向工業出口。⁶香港的工業化以製造業為主，紡織業、製衣業、玩具業和塑膠業發展得最快；進入六〇年代，美國快捷集團（Fairchild）到香港設立半導體工廠，帶領了香港電子業的發展。又因為香港工資低廉、政治相對穩定（因為港英政府努力壓制左右派的政治活動）、有所謂「不干預政策」（其實就是殖民政府沒有在做什麼政策），香港成為了東南亞區域中外資的優秀選擇。⁷然而，這樣高速的工業化、城市化，也為香港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

⁴ 1953 年，福特基金會批了 5 萬美金的資金予聯合國難民署（UNHCR）以支持一項關於對香港難民狀況的調查項目。1954 年，UNHCR 成立了「香港調查代表團」（Hong Kong Survey Mission），並由 Edvard Hambro 領導。根據 Hambro 所發表的"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一文，香港於 1949 年時人口有 213,800 人，參見 Edvard Hambro,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The Phylon Quarterly* 18, no. 1 (1957): 70。關於香港調查代表團檔案的簡介，參見 UNHC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Fonds Unhcr 23 - Hong Kong Refugees Survey Mission," <https://www.unhcr.org/en-au/research/archives/43fdd8553/%E2%80%9D/www.googletagmanager.com/ns.html?id=GTM-R6MF%E2%80%9D>（檢索日期：2021 年 4 月 14 日）。

⁵ Laura Madokoro, "Surveying Hong Kong in the 1950s: Western Humanitarians an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9, no. 2 (2014): 493-524.

⁶ 吳仲賢，〈香港經濟發展的批判理論〉，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頁 29-32。

⁷ 吳仲賢，〈香港經濟發展的批判理論〉，頁 34-36。

所以，在六〇年代，香港最大的問題首先是工人權益。在沒有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及集體談判權等勞動保障底下，港英政府縱容資本家對工人進行剝削。此外，由於港英政府要提防左右派的政治運動，工人運動也連帶地在發展上舉步維艱。1949年，港英政府首讀《遞解不法份子出境條例》以遞解反抗人士出境、制定《違法罷工與罷僱條例》以制止罷工，及制定《1949年社團條例》以規定社團須重新註冊、不允許搞政治活動、不允許境外分支團體註冊。⁸雖然這些條例總體來說是用來防治政治運動的發生，但也特別壓抑了工會的組織與發展，使得工人在港的生存處境更加任人魚肉。此外，快速工業化業帶來了其他社會問題，市區人口密度太高，衛生、醫療、住屋等需要都亟需被解決。

另一個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是貪污。貪污問題有多嚴重呢？一般小市民儘管可以在日常生活迴避與官府有過多接觸，但一旦因治安問題、生病、意外等而需要使用公共服務並接觸官僚體制，當中的經驗一般都是不好的，而貪污也成為一般市民生活中的「常識」——劉銳紹的說法更是「貪污腐敗像呼吸那樣自然」⁹。譬如，1973年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方蘇曾提到：「當時申請公屋，以往稱徙置區，申請居住地方，都要給錢。還有小販擺賣，即使持牌也要送錢給警察。」¹⁰1973年港大學生會常務秘書馮可立也說過：「當時香港社會貪污情況很惡劣，記得電話公司職員來安裝電話，爸爸給我一些錢叫我轉交電話公司職員，電話線才安裝得比較妥當。」¹¹坊間經常流傳諷刺貪污的順口溜，「多水多水，少水少水；過水開水，等水制水；有水放水，無水散水」¹²。此順口溜中的「水」除了指「救火用的水」外，在廣東話也有「錢」的意思，而「散水」的意思就是解散——可見不給錢給消防員，他們就不會放水救火，甚至會就地解散。而在此貪污風氣中，警察的貪污尤其嚴重，警察向黑社會收取保護費（俗稱的「收片」）以掩蓋他們的犯罪是人所共知的事，香港電台1974製作的「獅子山下」系列短劇中的《警察》一劇公開講述了警察收保護費如何使人憎恨。¹³莫昭如也曾提到：「以前幾乎所有警察都收規，我弟弟曾經在筲箕灣警署工作，逢星期六都看見抽屜裡有二、三百元。他

⁸ 周奕，〈羅素街血案〉，《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頁111。

⁹ 劉銳紹，〈我在67暴動前後的經歷〉，《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上）》（香港：次文化堂，2017），頁13。

¹⁰ 黃婉兒，〈鏗鏘集——流金歲月系列之四〉（香港：香港電台，1997）。

¹¹ 黃婉兒，〈鏗鏘集——流金歲月系列之四〉。

¹² 劉銳紹，〈我在67暴動前後的經歷〉，頁14。

¹³ 黃華麒，〈警察〉（香港：香港電台，197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PRJ_YyM0c（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到處查詢這些錢的來歷，同僚叫他只管收下，不用問。」¹⁴而因為警察中又有不少洋人警司，貪污問題、官民矛盾，也因此有時被認知為民族矛盾。譬如當時左派內部就流傳貶抑洋人的順口溜：「死鬼佬、住洋樓、養番狗、一聽到、就想嘔」。¹⁵

香港社會中形形色色的問題，是「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聯手種下的結果。既然港英政府沒有要著手回應問題，左右派就因此著手回應問題了。接下來，左右兩派將因為不同的打算、以不同的方針、不同的組織和手法，在香港介入社會、吸收群眾，並且建立了自己的場景。

1-2 香港左派場景

香港左派的權力核心當然就是中共。但左派在香港，大部份時間並不張揚（1967年的六七暴動，又名反英抗暴，其實是一個特例）。接下來的部份，我將會講述中共在香港是基於怎樣的對港方針，在香港做怎樣的組織工作，並且探討其組織架構、組織文化、情感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及這種文化如何使得中共的對港方針可以被全面落實。

1-2-1 中共的對港方針、組織和活動

（1）組織

由於港英並不允許香港的共產黨（或國民黨）有公開的活動，因此中共在香港以地下黨的方式運作（下稱港共）。港共分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下稱工委）及中共港澳城市工作委員會（下稱城工委）兩個部份負責組織香港的工作，兩個委員會又分別透過廣東省委組織部四處和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做協調，聯絡到中央外交領導小組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¹⁶

當中，工委又以新聞機構「新華社」的身份在香港半公開地活動，負責統戰、文化、宣傳、財經、外事、僑運、情報，及中共與在地組織之間的聯絡工作。也就是說，所有可見的、公開的左派場景內的活動，都由工委指導，新華社也因此成為了香港可見

¹⁴ 黃婉兒，《鏗鏘集——流金歲月系列之四》。

¹⁵ 劉銳紹，〈我在 67 暴動前後的經歷〉，頁 11。

¹⁶ 程翔，〈六七暴動的指揮和組織機制〉，《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頁 66-67。

的左派場景中的最高權力機構。城工委則是完全地下，我們因此所知不多。不過，按照程翔的猜測，根據中共解放其他城市的方法，城工委的存在是為了準備中共接管大城市而鋪路，其角色包括動員工人、學生、控制大城市的公共設施、物色人材等，而工聯會即為城工委開展工作的主要機構。¹⁷

港共作為核心，也在外圍建立了各種組織，去凝聚左派群眾。這些組織包括學校、工會、診所、國貨公司、同鄉宗親會、街坊會、電影公司等。而這些組織的領導，多是中共的積極支持者、或正式的港共黨員，他們對核心採取單線聯繫，對彼此則是互不干涉。

（2）對港方針

中共對香港的方針，一直以來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齊鵬飛對「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有過很好的詮釋——這個對港方針實際上在表現形式上就是「暫時維持現狀不變」——要香港為了配合中共在國際的戰略決策，而保留其傳統的「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世界聯繫的橋樑（也就是商品、資金、人才、戰略物資，甚至是思想的「對外窗口」）。這個方針也解釋了為何中共在 1949 年並沒讓解放軍跨過深圳河解放香港。¹⁸

然而，中共一直以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和六〇年代以後中共對外採取的「革命外交」路線是有張力的。由於 1962 年美蘇緩和，毛澤東意識到中國處於美蘇的夾縫之中過於被動，於是開始積極推崇「革命外交」。毛澤東革命外交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支持亞、非、拉國家和人民的民族革命鬥爭，要把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責任和民族民主運動結合起來。」¹⁹也就是說，毛澤東對亞非拉作為抵抗帝國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設想，繞過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分類局限，而把第三世界作為新的革命動力來源。而在革命外交精神最為高漲時——也就是 1966 年中蘇交惡、文革初期左傾思想與情緒跟革命外交交織起來時——香港也因此受到影響，使得「長期打算，充分利用」被暫時懸置了，而 1967 年香港左派發起的主張反英、反

¹⁷ 林怡，〈港媒體人：中共欲經香港滲透各國〉，<https://bit.ly/3eCLDxM>（檢索日期：2021 年 4 月 24 日）。

¹⁸ 齊鵬飛，〈新中國成立後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戰略出台始末〉，《黨史博采（紀實）》7 期（2007），頁 4-8。

¹⁹ 賀艷青，〈毛澤東的國際戰略與第三世界〉，《中共黨史研究》3 期（2005），頁 84。

殖、反帝的六七暴動因此可以被理解成是「革命外交」蓋過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結果。然而，我必須要說明，除了六七暴動（特別是在七〇年代毛澤東調整了「革命外交」的戰略以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一直是中共從 1949 以來最主要的對港方針，而「革命外交」在大部份時間是比較少影響到香港的。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的確在某些重要時刻使得香港發揮關鍵作用。譬如 1950 年爆發韓戰時，美國雖然對中國實施禁運，並且包括了香港和澳門，但香港作為傳統的對外窗口所具有的條件，使得香港商人霍英東依然得以幫中共在海外購買戰略物資；加上港英當局對美國採取兩面策略，默許香港與大陸進行貿易，不少戰略物資就是這樣從香港走私到大陸。²⁰也就是說，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和中共「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對港方針，的確使得香港可以成為戰略物資通路，幫助中共發展其他外交項目。因此，中共並無打算推動香港左派推翻港英政府。

那麼「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具體落實到左派的工作上又該怎麼做呢？我認為 1966 年吳荻舟對在澳門參觀完「一二·三」事件的香港工聯會幹部的講話甚有總結性。吳荻舟是香港《文匯報》首任社長，1962 年任職中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他在 1966 年說：

現在我們不解放香港就是因為有美國問題。對美矛盾不解決，香港的問題就不能解決。

現在美帝國主義包圍我們，北方蘇修對我們關門，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我們拿回香港，等於得到一個黃埔或青島，意義不大。希望大家身在香港，放眼世界。從香港得外匯不是我們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香港是個放射性的地方，是我們跳出去的橋頭堡，如果收回來，便關了門，沒用。我們從香港可以掌握到帝國主義的弱點，可以利用。長期堅持，對我們有利。這樣子比收回來好……

要像白蟻一樣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

要學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通知說的。

²⁰ 關於霍英東如何利用香港的殖民地特殊性在韓戰下幫助中共走私，見王永華，〈博奕與制衡：香港禁運歷史的解讀〉，《二十一世紀（網絡版）》51 期（2006），<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601066.pdf>（檢索日期：2021 年 4 月 14 日）。

你們這次回來，學了不少東西，有用，但也不能照搬。否則你們在香港站不住腳。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各民，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²¹

可見，中共的對港方針，是要左派努力寄生在既有的政治及經濟結構中，然後默默低頭攢取在各界的影響力，好等待一日在世界大局的變動中被有效利用。也就是說，左派在香港是被要求不可明目張膽反殖、不可複製大陸的社會主義鬥爭模式、也不可在乎於一時三刻與港英或右派鬥個你死我活——這就是「白蟻」的精髓。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左派在香港的工作，大都是著重搞民生，而不是與政府搞明目張膽的鬥爭。

（3）活動

左派深刻地知道香港的社會問題，也看中了殖民地福利系統的薄弱和民生保障的不足，因此對這些社會問題針對性地提供了一系列的解困服務，吸引了許多香港市民加入了左派的組織以至於陣營。譬如，在教育上，左派中學包括了旺角勞工子弟學校、香島中學、中業中學、漢華中學、福建中學、培僑中學等，高等教育則有短壽的達德學院；這些學校學費低廉，校風純樸，學生畢業後可以在左派公司工作。²²譬如，在電影選擇上，左派有「長、鳳、新」（即長城電影製片又想公司、新聯影業有限公司、鳳凰影業公司）、華南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南方影業公司等。²³譬如，在購物的選擇上，左派設有價廉物美的國貨公司，如華潤、華遠、五豐行等。譬如，在報紙出版上，左派有《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香港商報》、《晶報》協助宣傳中國大陸在中共領導下的美好一面。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工會在左派場景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左派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下稱工聯會）自成立後，會員人數總體穩步上升，而且也是左派場景中比較活躍的組織，發起過不少行動去爭取工人的經濟權益（而不是政治權益）。因此，

²¹ 吳荻舟，〈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紀錄〉，收入程翔編，《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頁 482-85。

²² 關於左派在香港的辦學狀況，參見劉翠珊，〈國家權力與教育〉，收入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編，《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2014），頁 33-47。

²³ 趙永佳、冼基樺，〈兩岸三地的政治差異與文化經濟的融合——銀都在華語電影產業鏈的角色〉，收入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編，《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2014），頁 170。

在香港社會的常識中，一個人會被界定為「左派」，除了用「有沒有看左報」為常用的指標（indicator）外、另一個指標就是看那個人「有沒有加入工聯會」（青少年則是看「是否在左校讀書」）。

總而言之，左派發展出方方面面的組織，涵蓋了生活中的每一個範疇，為左派場景的群眾提供「一條龍服務」。所以，對於生活在左派場景的群眾來說，他們可以完全只在左派場景中活動，不需要「出圈」就得到生活所需。譬如，劉紹銳曾提到自己的童年是如何方方面面都被「左派大家庭」所照顧：父母加入了工會，消費用工會的小賣部團購便宜的生活用品，自己則在左派「勞工子弟」學校讀書，看左派電影公司關於大陸鬥爭的電影，和其他工會會員的家屬參與打乒乓球、歌詠班、舞蹈班、太極班、閱讀版、學習班等文娛康樂活動等。²⁴陳文鴻也認為：「左派系統在香港與主流社會隔絕，自成一國。」²⁵因此，左派群眾活在這個場景以內，基本上是一種幾乎隔絕於港英官府、隔絕於右派勢力的、「圈地自萌」的經驗。左派群眾普遍團結，是出於日常生活或精神文化上習慣性的互相依靠。當然，生活在這個圈中並不代表生活在一個平行時空，可以完全免於經驗貧窮及各樣普遍的社會問題，但在左派場景中生活，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4）活動與方針的關係

雖然中共在港的工作是有一個嚴密的結構，可以有效地下達指導，有效地執行其「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然而，我們不可因此以為香港的左派場景中各組織領導人就沒有任何發揮的空間。事實上，只要不是明顯地違反此方針，左派還是可以發揮其創意和想法。只是，有時候這些想法也可能會觸礁，使得左派組織需要調整。譬如，1958 年大躍進時，左派工聯會的屬會就大力宣傳，包括提高公開活動，以及自作主張地動員技工會員返大陸工作回穗（廣州），回穗的除了普通會員，也包括工會的理事和積極份子，總數接近一萬人。他們以為，回國工作、建設大陸，並不與中共對港方針有衝突，加上大陸工作的工資折算下來要比香港略高、物價又較便宜，工會領導看準了會員想要更好的生活，因此發動回穗。但是，後來大躍進失敗，技工吃不飽，許多回穗的技工都申請要回香港。再之後，許多左派工人甚至以退出工會的方式表示對大躍進

²⁴ 劉紹銳，〈我在 67 暴動前後的經歷〉，頁 18-43。

²⁵ 陳文鴻，〈前言：我們走過的路〉，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頁 4。

的不滿：五金工會的會員人數從 4,204 人降到 2,335 人、車床打磨職工會的會員人數從 4,000 多人降到 600 多人。²⁶這無法預料的大躍進失敗和會員人數暴跌，明顯非中共所樂見。所以，在 1959 年的「五十天整風會議」，中共歸咎這此錯誤在於左派提高公開活動是「左傾冒險」——也就是違反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穩健的、低調的、韜光養晦的方針。²⁷雖然大躍進的失敗並非可預見，但中共為了避免香港工作再次出錯，影響總體方針，一般並不鼓勵香港跟隨大陸的改革或革命的步伐。

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之所以以「白蟻」的方法展開，除了讓香港隔絕於大陸的動盪，擴大群眾基礎，以保持香港特殊地位的戰略優勢外，當然也是要提防港英鎮壓及使出「遞解出境」的絕招。譬如，因為 1949 年 10 月工聯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過於招搖，加上 1949 年 12 月的工潮，港英於 1950 年 1 月即把相關左派人士遞解出境，包括電車工會的四個負責人。此事使得工聯會左派網絡被暴露，需要主動撤退工會幹部 70 多人，元氣大傷。²⁸因此，到 1957 年的海塢關廠抗爭時，左派工會很明顯已經自行收斂並學會了對港英的忌諱，並不需要等到 1959 年「五十天整風會議」對香港左派擺明車馬地提醒中共對港方針。左派（特別是領導）之所以在大部份時間順應當「白蟻」，並且以此方法執行「長期利用、充分打算」方針，其實除了由上而下的命令，也是從自身經驗中學會的。但這裡之所以多番強調群眾和港英對左派組織的影響力，是要指出左派領導並非只是「由上而下」地工作，更不是以「踢一腳、動一下」的方法響應中共的「長期利用、充分打算」。

1-2-2 左派場景的經驗、文化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

左派所發展的組織和服務不但包山包海，使得左派群眾可以很大程度上活在厚厚的同溫層之中；而且左派組織——特別是工會——普遍也有著純樸、友愛、互助、團結的文化，使得左派組織內聚力很強。譬如，以前在左報工作，同為左派工會會員的周奕就曾在訪問中提到這種團結的力量：

²⁶ 周奕，〈海塢閉廠與大躍進〉，《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頁 164。

²⁷ 程翔，〈六七暴動發動的原因和目的〉，《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頁 26。

²⁸ 周奕，〈兩次反共高潮〉，《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頁 123-24。

群眾會覺得左派這批人關心他們，所以就算物質條件不豐富，但是大家〔左派群眾和領導〕都會一方有難各方支持，所以不會覺得個人獨立無助。就好像生養死葬，我們這些做工會工作的，都有個別援助的事件。譬如，病死有帛金，就算不是會員的，如果很可憐的話，我們都會根據情況力所能及地發動小部份捐助。當時搞一個棺木都要百多元，大廠籌款比較容易，但我們一毛、兩毛捐出來，加起來都有三幾十塊。不是幫助很大，但是都是資助……當時我們那一代很服從組織。這個是長期所造成的，是這個左派圈子的生活。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服從狀態……當時左派機構都是高度理想的，薪金偏低，大家都是為了理想而奮鬥。²⁹（黑體為筆者所加）

左派組織中團結至上的文化，首先是一種心理和生活的需求。而這種團結至上的文化，主要由左派工會打造。由於六〇年代的香港工人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社會的地位都處於弱勢，生活在比較無助和卑微的狀態中，因此，左派組織對工人方方面面的照顧——無論是生養死葬、還是人生面臨危機等，組織都會惦記，甚至會發動組織中的各位互相捐助和幫忙——使得左派組織內部普遍有一個情感與物資的互惠的良性循環，讓左派中的群眾被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邏輯所穿透的冷酷社會中，找到相對安全、可靠的空間。譬如劉紹銳儘管在今天非常反共、反左派，但回憶起自己童年在左派場景中生活的經驗，他也會說：「〔左派〕工會把工友和家屬聯繫在一起，互助友愛，那種大家庭的氣氛是今天無法複製的。」³⁰

而這總純樸、友愛、互助、團結的文化，也會被轉化成一種「理想」——甚至一種民族主義理想。左派群眾會認為，在左派組織中所經驗到的純樸、友愛、互助、團結，是一種社會主義中國的特質，這也構成了他們對共產黨治理的認同，以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與人民的愛。而這種認同與愛，同時又反過來成為他們繼續去經營純樸、友愛、互助、團結的左派場景文化的動力，這也是周奕所說的「為了理想而奮鬥」的意思。

我想要強調的是，在香港左派場景中，群眾與組織關係緊密、向心力強、高度愛黨愛國（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從性高的特性，並不完全只是因為中共在香港的組

²⁹ 周奕，私人訪問，2019年1月16日。

³⁰ 劉銳紹，〈我在 67 暴動前後的經歷〉，頁 30。

組織結構嚴密，更不是因為群眾對中共威權唯唯諾諾因此對中共方針唯命是從，而更多是因為左派群眾在集體的、緊密的左派場景中的經驗大多是正面的，從而自發地營造出以上特性。左派在組織中感受到的純樸、友愛、互助、團結，成為他們對社會主義之所以成功的理解，也成為民族主義和愛國背後的範本或基礎。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即便知道大陸並不富有，但依然有一種「光明中國」的認知。

然而，純樸、友愛、互助、團結的文化也是一個雙面刃——它不利於個人意識的發展，也不利於批判性思考。背後的物質基礎有二。第一，當組織把生養死葬都給你安排好的時候，個人意識和批判思考就沒有特別用途；第二，因為中共在香港是以地下黨的方式活動，左派場景中的群眾也多少感覺到，過多的發問、過多的想要搞清楚事情、過多的批評，可能會使得組織的弱點暴露出來，甚至招來殖民政府的打壓。這其實是一種左派對自己屬於一個地下場景的自我認知和定位。這個時候，儘管左派可能對中共方針有疑問、有反對、有不滿，但在想到保護組織和那純樸、友愛、互助、團結文化的前提下，左派群眾普遍會先以「個人意識」的方法去定義自己的那些疑問和不順從，並認為這「個人意識」是與「集體」對立的，從而閹割和犧牲這些想法。周奕因此也接著說：

大家〔左派群眾和領導〕都不說個人意識的，一提個人意識會不容於群體。儘管組織沒有公開的原則的宣佈，但是我們只是知道地下鬥爭這個方法我們就跟隨了。我們也知道這種是比較安全的，這是不言而喻的。³¹

這時那純樸、友愛、互助、團結的文化，就不只是生活和心理所需了，它甚至是一種集體主義。一旦出現與組織方向不相容的想法，左派群眾首先會「自然而然」地自我審查那是「個人意識」，是對集體不好的，是不信任組織甚至違背組織的；而這違背之所以不好，是因為那代表自己有負於那一直與自己同甘共苦、關懷備至的組織。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香港的左派群眾在大部份時間都是配合中共低調和韜光養晦的方針，很少從自身生活經驗出發去搞社會運動，也不反殖——這不是因為他們對港英的管治滿意，不是因為左派生活圈完全讓他們生活在真空，也不是因為他們清楚來自外部的被鎮壓的危險是什麼，更不是因為他們都熟知「白蟻」、熟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熟知國際格局中的中國戰略——而是因為他們在左派組織中的經驗讓他們認同左派場景內生活的樸

³¹ 周奕，私人訪問，2019年1月16日。

素氣息、了解到團結向心的重要性、顧念著與組織之間情感關係（而這種情感關係也會被轉化為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和民族主義），也就是說，他們的集體主義是來自於一種很樸素的團結感知。以上，除了想要講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高高在上的方針，是怎樣落實到群眾的身心，也是想要去解釋為什麼香港左派群眾中一個弔詭的現象：思想和情感上認同社會主義中國、認同革命、認同第三世界、不認同港英政府，組織上高度團結、服從性高——也就是有著一切發動反殖運動條件——但在香港面對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時，在大部份時間都沒有發動具體行動去反殖、反帝，而是最終選擇了韜光養晦、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及殖民主義原狀的模樣。因此，1967年左派「反英抗暴」的高調張揚，其實並不符合左派大部份韜光養晦的性格，也並非中共的對港方針，左派於六七的突變是需要被特別地解釋的。

1-3 香港右派場景

在以上小節中，我們看到六七暴動前的左派場景是在一個緊密的結構及濃厚的集體主義文化底下，使得中共可以從核心下達各種指令到核心外圍的機構及群眾身上，把在香港各個領域的工作方向統一起來，使得左派在香港的工作既可以符合中央的利益，又可以不「出界」地去反殖。但在六七暴動以前的香港社會，除了左派以外，還有右派。那麼，右派的場景又是怎樣的呢？場景的組織結構為何？右派的對港方針是什麼？所推崇的民族主義又與左派的有什麼差別？

跟左派場景中的組織結構比起來，香港右派的就鬆散得多，而且場景當中還有多個權力核心和行動者：最大的權力核心固然是國民黨和美國，行動者則包括國民黨右派、南來文人、第三勢力、友聯、美國的亞洲基金會等。這些權力核心及行動者雖然皆為反共、反左派。但大部份時間都是各自發力，時而協調、時而矛盾。這也塑造了右派場景中存在著微妙差別的多種右派。國民黨右派諸如救總，受到國民黨影響，所以致力於反共自然可以理解。南來文人則是尊中華民國為正統，但他們一方面接受國民黨資助、推崇文化反共，另一方面也不怕接受美國資助，甚至會對國共大政治上的鬥爭採取去政治化態度，只顧埋頭做學術。第三勢力則是尊中華民國為正統，卻也對國民黨有批判，但其意識形態會因為美國的介入而擺盪，導致反共的部份遠遠大於批評國民黨的部份而成為「右派」。而美國遠在千里之外，只能透過拉攏第三勢力及南來文人去發展自身的反共大計，國民黨右派也對第三勢力甚為堤防。

接下來，我將簡單介紹香港右派場景中的組織、活動，和背後權力核心的對港方針。這也可以讓我們理解右派的民族主義內涵是在怎樣的組織條件和歷史條件下發展出來的，進而有助於我們理解在反對左派 1967 年反英抗暴／六七暴動的聲音背後的權力佈局。

1-3-1 國民黨的對港方針、組織、活動

(1) 組織

國民黨右派在香港的工作，在 1950 年時由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直接主抓，到了 1952 年改為由南方執行部指揮及統領。³²可見國民黨把港澳看作中國長江以南的部署範圍。1952 年，國民黨成立了「海外工作指導小組」，負責指導香港在內的海外工作；1955 年，中常會通過成立「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下稱海統會）取代了海外工作指導小組，海統會下又設「港澳特派員辦公處」。³³由此可見國民黨對港澳地區部署的改變：香港的工作被列入海外工作的一部份。

國民黨作為右派場景的權力核心之一，也和左派一樣在外圍建立了各種組織，去凝聚右派群眾——這些組織經常是和左派「對著幹」的，當左派提供各種就業、教育、醫療等服務去組織群眾時，國民黨右派也同樣在這些方面努力，成立了同鄉會、街坊會、工會、工商團體、報紙、學校等與之抗衡。其中比較重要的團體包括國民黨在香港的半官方民間團體「救總」。救總於 1950 年成立，當時的名稱為「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根據官方網頁介紹，救總「成立伊始即揭櫫『以胞愛發揚民族精神，以救濟團結反共力量』的工作目標，秉持『救災即是救國』的理念，藉由政府的支援，以及海內外各界的捐助，在大陸、海外、臺澎金馬地區，全力投入大陸災胞與海外難僑的救助工作，同時接運難胞來台安置、照顧，並參與海內外重大災害救助。」³⁴

³² 樊俊朗，〈國民黨在香港的組織、活動與困境（1949-1970）〉（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頁 23。

³³ 樊俊朗，〈國民黨在香港的組織、活動與困境（1949-1970）〉，頁 23。

³⁴ 中華救助總會，〈本會簡介〉，<http://www.cares.org.tw/CaresPortal/intro/introduction.do#>（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6 日）。

（2）對港方針

那麼，國民黨右派成立這些組織背後，是為了配合怎樣的對港方針呢？事實上，1945 年港英政府重新統治香港後，國民黨政府已放棄收回香港的實際舉動；而隨著 1949 年國民黨避走台灣，香港就有了「反共復國」的戰略價值。在冷戰底下，國民黨右派對港英政府的期盼更是可以與英國合作抗共，把香港發展成「反共橋頭堡」。³⁵

然而很難過的是，現在回頭來看，這是一個大大的誤判：港英政府無意得罪中共，也並不打算長佔香港，只希望可以儘量留在香港維繫住帝國體面並多撈點錢而已；當中國大陸已經被中共所控制，可以輕易出兵過河收回香港，港英在不希望社會出現過於挺共的風氣之餘，也並不希望社會上有過於反共的聲音，招致香港被提早收回。³⁶因此，港英對右派的定位，從來只是希望他們可以存在著去制衡左派，而不是完全支持或打擊右派。國民黨與英國合作抗共的如意算盤從來未能打響，國民黨右派在香港的工作也和左派一樣處處受到港英監視和壓抑。總的來說，1949 年後國共兩黨互視對方——而非港英政府——為最大敵人；港英政府也並沒有因為和國民黨右派同屬冷戰「自由世界」陣營而任由其在香港發展其影響力。³⁷

（3）活動

既然國民黨作為右派場景的權力核心之一，希望把香港發展成「反共橋頭堡」，其在香港的工作也是和左派針鋒相對。譬如，當左派有工聯會，右派就成立了總工會「工團總會」。不過，和左派的工聯會相比起來，工團總會的發展並不樂觀，自成立後影響力一直下滑，到最後甚至被左派工聯會爬頭：工團總會的會員人數從 1949 年創會的 10.5 萬，到了 1967 年則只有 3.3 萬，另一邊廂工聯會人數持續上升，從五〇年代的 3 萬多到 1967 年已有 9.5 萬。³⁸

³⁵ 樊俊朗，〈國民黨在香港的組織、活動與困境（1949-1970）〉（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頁 18-19。

³⁶ Mark, "Hong Kong in British,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d War Thinking," 12-39.

³⁷ 樊俊朗，〈國民黨在香港的組織、活動與困境（1949-1970）〉，頁 17-18。

³⁸ 工聯會及工團總會的創會初期的會員人數，參見周奕，〈兩大陣營的組成〉，《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頁 94。工聯會及工團總會 1979 年的會員人數，參見周奕，〈重整會務的艱辛〉，《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頁 221。

此外，國民黨右派也成立了在香港的「黨報」——《香港時報》——並與《大公報》、《文匯報》等左派報紙抗衡。有趣的是，雖然並無跡象顯示《華僑日報》和《工商日報》受到國民黨的直接指揮和統領，但此兩份明顯親國民黨的報紙，在六〇年代為右派場景的興盛發揮了不少作用。

在教育上，國民黨右派發揮了超然的影響力：除了創立中學並且直接連結台灣升學系統，也創立了多家大專院校——其中以珠海書院及新亞書院最為出名。前者雖然在香港僅以書院註冊，被稱為「野雞大學」，但在台灣是受中華民國教育部承認的大學。³⁹ 後者則後來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為六〇年代香港唯二兩所大學。這些與國民黨右派有組織聯繫的大專院校也成為 1949 年以後南來文人的聚集地。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民黨右派在調景嶺難民議題上的影響力。調景嶺難民營於 1950 年成立，本來只是港英政府暫時收留戰後逃港的中國難民（特別是國民黨軍人）的權宜之計，但在國民黨和美國的大肆宣傳下，迅即被封為「反共精神堡壘」，而救總就是代表國民黨的利益介入調景嶺難民營，成功把調景嶺難民問題向世界展示成是中共迫害的鐵證。⁴⁰



圖 3：1956 年亞洲自由國家聯合反共聯盟中國總會理事長谷正綱在出席世盟籌備會後於返台途中訪問調景嶺（圖片來源：「調景嶺圖片集」網站，<https://bit.ly/3lXPg6o>）。

³⁹ 樊俊朗，〈國民黨在香港的組織、活動與困境（1949-1970）〉，頁 42。

⁴⁰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 1-2。

1-3-2 「第三勢力」和美國的組織、方針和活動

不過，右派場景中不只有國民黨發揮影響力。在冷戰中的香港，右派場景的另一個重要行動者是「第三勢力」。

（1）組織

第三勢力可以被理解成是由國共以外的中間在野黨組成的政治聯盟，當中又以中國民主同盟為首，抗戰期間發展尤其迅速。1949 年後，中國民主同盟選擇留在大陸，民社黨和中國青年黨總部則去了台灣，一些民社黨員和青年黨員則來到香港繼續延續第三勢力運動。⁴¹

1951 年 3 月，國民黨香港工作組針對「留港華人政治活動現狀」向蔣介石做報告，此時的第三勢力已經發展出四個主要派系：民主反共同盟、桂系、自由陣線、中國自由聯盟；主要領導人物是許崇智、張發奎、顧孟餘、黃旭初、謝澄平、任援道。而且，他們接受的外援和捐款來源包括李宗仁、華僑、東京盟總、香港美國新聞處以及日本軍人等。⁴²我們可以由此捐款名單看到，第三勢力在香港很快就接受了美國及日本的援助，並捲入冷戰之中。

1951 年 9 月 24 日，國民黨右派報《香港時報》的社長許孝炎曾致函王世杰，表示「香港第三勢力蓬勃而不可抑止」。⁴³可見進入五〇年代，第三勢力正努力在香港發揮影響力。根據黃克武的研究，1952 年 3 月，民社黨主席張君勱為了整合第三勢力來到香港，終把四分五裂的大部份第三勢力統一成「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下稱戰盟）。戰盟的中央委員是張君勱、顧孟餘、張發奎、張國燾、許崇智、謝澄平、黃旭初、李微塵等 15 人，其中李微塵為秘書長，接受主要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經費。⁴⁴

事實上，在冷戰下美國也理解到介入東亞以圍堵中蘇的需要，但自己遠在天邊，必須要透過聯合在地人士去發展自身的冷戰需要。也就是說，第三勢力可以在美援下組織起來，是與冷戰息息相關。1949 年後，美國為支持第三勢力，在東亞建立了一個複雜

⁴¹ 容啟聰，〈民主社會主義在冷戰香港：從理論闡述到參與恩地政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7 期（2018），頁 234。

⁴²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二十一世紀》162 期（2017），頁 52。

⁴³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頁 52。

⁴⁴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頁 55-56。

的網絡，涉及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東京的盟軍總部（盟總）、自由亞洲委員會（Committee For Free Asia）等。⁴⁵1954 年，自由亞洲委員會改名為亞洲基金會，繼續支持第三勢力的發展——此機構也可以理解成是香港右派場景中代表著美國立場的最重要反共機構。以上，是第三勢力早期在香港的組織面貌。

（2）方針

第三勢力之所以被稱為第三勢力，顧名思義，本來是要在國共兩黨之間尋找第三條出路，也就是既反共也批蔣，並以建立出一個以自由民主改革路線為號召的政治勢力為己任。譬如，戰盟的政治觀點為：反對由斯大林統治、並在共產國家建立「新奴役制度」的蘇聯；批評一面倒向蘇聯的中共；主張自由、民主、文化與思想的多元，主張私有財產制，避免貧富差距。⁴⁶此外，1951 年，顧孟餘、張國燾、李微塵也曾公開批蔣，稱蔣介石視國家為其個人私產，「成為今日中華民族的毒瘤」。⁴⁷而他們對香港的方針，主要也是利用香港的便利，組織反共反蔣的第三勢力運動，希望「發展成一股獨立的反共力量，取代國民黨政府，擔負起反共復國，乃至重建自由民主新中國的任務」⁴⁸。

至於美國支援第三勢力的背後想法，則源自 1949 年《中美關係白皮書》（下稱《白皮書》）。《白皮書》認為，國民黨政府腐敗，因此不能完全依賴國民黨右派反共和對抗蘇聯。因此，《白皮書》提出要鼓動中國的內部力量反共——也就是資助譬如第三勢力這樣的派系——以暗中消除蘇聯的影響。《白皮書》還精準地說出在中國反共的重點在於挑撥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之間的衝突，因為共產黨恰恰「背離了中國傳統」。⁴⁹以上，為美國積極動用亞洲基金會介入香港右派場景背後的政治方針——也就是運用香港有著「中國的內部力量」集合於此的便利，使香港成為亞洲的反共橋頭堡。

⁴⁵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頁 55-56。

⁴⁶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頁 57。

⁴⁷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頁 58。

⁴⁸ 萬麗鵬，〈1950 年代中國第三勢力運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頁 169-71。

⁴⁹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173 期（2019），頁 50。

（3）活動

第三勢力在香港的政治活動主要分軍事、政治與組織、宣傳三方面。在軍事方面，譬如戰盟曾接受美國的軍事支援，招募在港的離散青年到沖繩美軍基地與塞班島軍政幹部學校接受軍事訓練、籌組游擊隊。1952年中至1953年初，戰盟也曾以此為基礎發動幾次對大陸沿海地區的突擊與空投。⁵⁰在政治與組織方面，國民黨南方執行部指出，第三勢力有在調景嶺民營組織「國際反共抗俄志願軍」；然而，我們也要理解到，國民黨對調景嶺被第三勢力介入的判斷，或許有誇大及扣帽子的成份。⁵¹最後，在宣傳方面，第三勢力的代表刊物包括《自由陣線》、《獨立論壇》、《華僑通訊》、《中國之聲》、《自由中國》等。而《自由陣線》及《獨立評論》的創辦人左舜生雖然並不是戰盟的一份子，但對香港的第三勢力場景影響深遠。⁵²

然而，這股第三勢力政治運動在香港非常短壽，這裡有美國停止資助、港英打壓與國民黨打壓等因素。而這就聯繫到國民黨與美國在第三勢力問題上的矛盾：畢竟，國民黨無法統一起同屬冷戰中「自由世界」的隊友，美國一直資助批評蔣介石的第三勢力，國民黨因此向美國抗議，指美國一方面支持台灣，另一方面在香港搞「第三勢力」破壞台灣。美國不得不撤回對第三勢力人士張發奎和顧孟餘的資助。⁵³而且，國民黨的對港方針始終是拉攏港英和群眾共同反共，而當國民黨發現第三勢力不但無法被拉攏還持續反蔣時，國民黨就發放關於第三勢力的消息予港英政府，使得第三勢力不少領導人物於1952年被港英政治部約談，並且被威脅會驅逐出境。⁵⁴1954年，戰盟瓦解，標誌第三勢力大部份政治運動告一段落。

其後，第三勢力中的各人有繼續一些政治工作，譬如孫寶剛在1963年與馬文輝等人創立了香港民主自治黨，並在1964年8月設立香港社會民主黨，持續推崇民主社會主義。但在移居香港十數年後，這些第三勢力逐漸認為反攻大陸無望，開始把關注放在本地社會和經濟發展改革上。然而，這些政黨在香港只會被視為是高高在上的高等華人，在缺乏群眾組織的情況下，與一般大眾關係遙遠，難以獲得支持。社會民主黨的黨

⁵⁰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頁56。

⁵¹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頁81-85。

⁵² 關於左舜生的《自由陣線》及《獨立評論》的重要性，參見陳正茂，〈另一條道路：左舜生與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學報》5期（2016），頁219-49。

⁵³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頁58。

⁵⁴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頁59。

報《新社會》最後於 1967 年 4 月停刊。⁵⁵事實上，第三勢力在香港一直都是非常尷尬的：在文化領域上，第三勢力的地位遠遠不能與有辦學的新亞書院新儒家南來文人相比；在群眾組織上，第三勢力也不能與有眾多工會、同鄉會等機構的國民黨右派和中共左派相比；以至於，第三勢在本地的影響力十分有限的。

1-3-3 友聯的位置：新生代第三勢力？美國於香港文化冷戰中的代理人？

雖然戰盟於 1954 年就瓦解了，但這只代表第三勢力不再以政治運動的模式發揮影響力，不代表美國和第三勢力的影響從此煙消雲散。事實上，代表著美國利益的亞洲基金會並沒有停止活動——只是從資助第三勢力的政治活動轉移到資助文化活動。⁵⁶

1951 年 10 月，先前被謝澄平的《自由陣線》組織起來的年輕人成立了新生代的第三勢力青年組織「民主中國青年大同盟」（下稱同盟），而同盟在當時和還是叫作自由亞洲委員會的美國亞洲基金會的艾偉（James Taylor Ivy）取得聯絡，學者傅葆石這樣總結同盟給艾偉的信：

1952 年 5 月 4 日燕歸來致信艾偉，提議他優先考慮動員和支援中國青年流亡知識份子，因為他們擁有「強烈的鬥爭意願」，渴望逃離「鐵幕」，加入「我們共同的事業」，「建造一個民主中國」，然而他們貧窮無助，勢單力薄。為了同盟的未來發展，燕歸來提出兩項建議，繼續向亞洲基金會尋求財政支持：第一項提議是建立一座類似於移動圖書館的機構，便於流亡青年閱讀反共材料；第二項提議是刊發一份「學生周報」，藉此喚起流亡學生「對祖國的責任感」和國際民主鬥爭的意識。她後來又進一步建議，吸納學生志願者，特別是新亞書院的難民學生，讓他們幫助編輯和分銷《周報》。⁵⁷

由信件可見，這群第三勢力新生代有巨大的魄力，提出了許多工作建議，而這些建議背後的想法也與美國對香港的冷戰戰略思維非常契合——利用香港的便利（特別是香

⁵⁵ 關於第三勢力對香港本地政治的參與，參見容啟聰，〈民主社會主義在冷戰香港：從理論闡述到參與本地政治〉，頁 229-49。

⁵⁶ 其中一個例子是，林悅恆就曾經說過，亞洲基金會後來並不願意支持政論性的刊物，才會支持友聯的文化活動。參見林悅恆、盧瑋鸞、郭詩詠，〈林悅恆〉，收入盧瑋鸞、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一）》（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188。

⁵⁷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頁 50。

港有許多來自中國的難民)，把香港塑造成反共橋頭堡。1952年6月2日，艾偉向舊金山總部轉發燕歸來的信，提議支持同盟，幫助他們建造移動圖書館並出版《中國學生周報》。不僅如此，他還建議由新亞書院總務長張丕介給予同盟「總體指導」。⁵⁸由此可見，亞洲基金會幫助促進了新亞書院的反共南來文人與第三勢力新生代的跨界合作。同時，五〇年代開始，由於資金預算的壓力，新亞書院開始接受來自台灣和多個美國基金會的財政支持（如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雅禮協會），其中艾偉再次發揮了影響力。1953年，艾偉短暫地在美國福特基金會工作（後於1954年回到亞洲基金會，除了成為香港代表，還成為了行政總監）⁵⁹，把手促成了對新亞書院的資助：因福特基金會不可捐錢予外國機構，故因時制宜，透過雅禮協會「轉贈」建校基金，新亞書院得以在農圃道興建新校舍。本來只與國民黨有聯絡的新亞書院此時也被納入到美國支援香港反共勢力的網絡之中。

1952年7月25日，《中國學生周報》正式由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友聯）出版。從同盟演變而來的友聯雖然已經不屬於任何第三勢力團體或政黨，但也可以被理解成是第三勢力在香港的遺產，也是本地青年反共勢力的新一頁。

進入「友聯時代」，這群反共青年的論述有何特色呢？他們為何反共呢？我們可以從《中國學生周報》發起人之一余寬德後來對創刊初衷的解釋，開始著手理解：

本報創刊的時候，正是歷史逆流淹沒了我們的祖國，**中國的文化遭受着徹底的破壞，人類文明面臨着空前的危機。**國內的同學們在受着統治者的**毒害、奴役、蒙蔽和控制**，海外的同學們大部都悲觀、苦悶、頹喪和消沉。……當初，我們為惡劣情勢的逼迫，為責任感的驅使，才鼓起勇氣，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創辦了這份刊物。⁶⁰（黑體為筆者所加）

此外，胡菊人這樣評論《中國學生周報》：

⁵⁸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頁58。

⁵⁹ The Online Collection and Catalog of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re, "Ford Foundation Records,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Logistical Services, Office Files of James T. Ivy, Summary," <https://dimes.rockarch.org/collections/YbWbM5edZUpwALjsrCVqLu>.

⁶⁰ 德寬，〈漫長的行程——致敬讀者、作者和關心本報的朋友們〉，《中國學生周報》，1953年第53期，第1版。

喜愛《中國學生周報》的人，都喜歡把她比擬作一棵樹。……〔因為樹〕堅忍不拔、永遠向上、生機蓬勃……她永遠固定在一點上，永遠不脫離其鄉土。……她永不忘本！……在這中華民族處於風雨飄搖、中國文化臨於絕續存亡關頭的今天，《中國學生周報》不遺餘力地宣揚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喚起海外華僑青年的愛國心，呼籲青年對中國的優秀文化要抱有熱愛，對中華民族要抱持深厚的感情。⁶¹

從引文可見，這些以友聯為基地籌辦文化活動的反共青年背後的意識形態，相比早期的第三勢力有兩大差別。第一，友聯的反共語言（譬如稱中共為「毒害」、「奴役」、「蒙蔽」和「控制」）被新儒家南來文人的「苦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論述包裹了起來，比較少用第三勢力慣常使用的社民主義的政治論述。他們認為，大陸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最大問題，是中共使得中華文化岌岌可危，因此共產黨是與人類文明為敵。此文化民族主義論述也可見於胡菊人關於「樹」的比喻——這可說是和新儒家南來文人唐君毅的「花果凋零論」契合。第二，我們也看到，在美國的援助下，第三勢力著重反共多於反蔣，先前第三勢力中比較左傾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部份，此時也消逝了，剩下的只是美國所樂見的對「自由世界」價值的宣傳。也就是說，本來想要在左右之外另覓路線、並浮動於左右光譜之間的、對左右皆有批判的第三勢力，在五〇年代經歷了主要力量被鎮壓後，其獨立出來的反共新生代出現了明顯的「右轉」——其「右」是在於它在宣傳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和反共的大前提下，完全偏離了第三勢力曾經的反對國民黨或支持社民主義的政治色彩。

我們絕對不應該小瞧友聯後來在香港右派場景中的影響力。畢竟，友聯在出版上超越了此前的第三勢力政治運動，甚至，友聯建立起的跨國出版分銷網絡遍及東亞與東南亞，還擁有自己的印刷廠。友聯甚至出版一系列不同刊物，針對不同群體，發展出一條龍的、全方位的出版計劃：《兒童樂園》是針對兒少讀者的、《中國學生周報》是針對青少年讀者的、《大學生活》是針對大專院校學生讀者的、《祖國》是針對成年人讀者的。

友聯的成功，部份也有賴美國的支持。曾任友聯負責人的林悅恆曾指出：「工作一直都在做，不是有錢才做的，只是他們〔亞洲基金會〕覺得我們做得不錯，於是撥款給我們繼續做下去。『友聯』的工作都是這樣子，《周報》早期也不是他們撥款才搞的……

⁶¹ 胡菊人，〈像樹木一樣的生長〉，《中國學生周報》，1961年第470期，第1版。

他們〔坊間的流傳〕都不知道內裡的情況，以為美國給我們錢，然後要求我們做各種事情。不是的，其實『友聯』的工作一直都是這樣做，後來他們覺得某些地方可以合作，就支持我們。」⁶²雖然林悅恆一直強調友聯的編輯自主，我必須要強調，友聯就算不是被美國的亞洲基金會所操控，也並不阻礙友聯成為美國在香港文化冷戰下的志願軍或代理人，成為香港右派場景中重要的一員。亞洲基金會對友聯的資助，包括了《中國學生周報》和《大學生活》的出版，後來甚至支持友聯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具，幫助他們設立了印刷廠；友聯也幫助美國新聞處發行其出版的書籍，以賺取經費。⁶³到了七〇年代，由於友聯企業化不順利、刊物無法自負盈虧、活動無法和教育司署及宗教團體的活動競爭等原因，隨著亞洲基金會的資助退場，《中國學生周報》在苦撐了一下後也停刊了。⁶⁴但友聯以軟性的方式推銷民主自由、民族主義和反共意識，所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我們將會在未來的章節中討論到。

1-3-4 新儒家南來文人的位置：文化民族主義與國民黨的不反殖的契合

（1）新亞南來文人與國民黨

在中國百年的歷史動盪中，因戰亂和政治原因而避走他方的離散華人，總是一波接一波的。在 1949 年以後的離散華人中，除了有國民黨的擁戴者，被中共清算的地主、資本家、買辦，及為了生計而離開大陸的一般民眾等，還有一批文人。這些避走到港澳和台灣的文人，一般會被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學者（特別是文學史研究者）歸入「南來文人」⁶⁵的研究範疇中。這些南來文人當然不應該全部被簡單歸類為國民黨右派——特別是當中還有跟既反共也反蔣的第三勢力親近的例子。然而，以新亞學院為據點的新儒家南來文人如唐君毅、錢穆等「去政治化」的只反共不反殖的文化民族主義，卻和國民黨及友聯的意識形態高度契合，使得新亞書院成為香港右派場景中最重要的行動者之一。

⁶² 林悅恆、盧瑋鸞、郭詩詠，〈林悅恆〉，頁 181-86。

⁶³ 亞洲基金會資助了友聯旗下的什麼項目，參見林悅恆、盧瑋鸞、郭詩詠，〈林悅恆〉，頁 188-91。

⁶⁴ 林悅恆、盧瑋鸞、郭詩詠，〈林悅恆〉，頁 188-91。

⁶⁵ 「南來文人」是論及中港近代史中的關係時一個經常會被觸及的範疇，有關「南來文人」的定義，以至怎樣描述他們的活動性質，都有很多爭論；「南來」一詞的香港本位問題所帶來的斷脈絡問題，也引發不少爭論。然而，我在這裡並不打算深入這些討論。在此使用「南來文人」一詞，僅僅基於這是戰後來港的右派文人被研究時的一個常用範疇。而我採用的定義，跟隨趙雨樂的說法：「南來文人」是「從香港地緣出發、追溯知識人自身民族文化淵源的複合名詞」。見趙雨樂，〈序言〉，《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三卷合訂本）》（香港：三聯書店，2016），頁 1-8。更多關於「南來文人」的討論，見盧瑋鸞，〈「南來作家」淺說〉，《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牛津大學，1996），頁 118-28。

新亞書院於 1949 年由張其昀、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人創立，其教育宗旨在於「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⁶⁶，深具新儒家特色。⁶⁷此外，新亞書院也視中華民國為正統，譬如創校時，新亞書院就把校慶定在雙十節。新亞書院和國民黨政府的親密性也可見諸其經費來源：1950 年，錢穆曾赴台會見蔣介石，請求資助，結果，國民黨政府決定於總統府辦公費項下每月撥款港幣 3,000 元支持新亞書院辦學。⁶⁸1954 年後，新亞書院獲雅禮協會撥款資助，才停止向國民黨政府請款。此外，錢穆對國民黨的忠誠也值得一提，在蔣介石 80 大壽時，錢穆於祝壽文中稱蔣介石為「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⁶⁹，錢穆的奉承後來也被李敖拿來嘲笑。

（2）新儒家的文化民族主義：並不針對殖民政府

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南來文人是怎麼配合國民黨的對港方針呢？這要從他們的文化民族主義開始說起。唐君毅在 1961 年首先發表於《祖國週刊》的〈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是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代表作。他寫道：

如一園中的大樹之崩倒，而花果凋零，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託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糞得滋生，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⁷⁰

⁶⁶ 錢穆，〈招生簡章節錄〉，《新亞遺鐸》（台北：聯經，1998〔1950〕），頁 3。

⁶⁷ 我們也不妨從由錢穆填詞的新亞書院的校歌，去感受他們是怎樣描述中國的狀況、辦學的目標、以及海外華人的任務：「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裡，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歌詞分成三段，三段旋律和韻律相若，三段在吟唱時因此會有高度呼應和重疊的感覺。第一段是寫中國的歷史的縱深，第二段是寫在這個縱深中，配合著中國地大物博的條件，如何孕育出傑出的文化和人，但到了第三段，則是寫的卻是之前提到的傑出的一切都面臨了一個「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的困境與危機，歌曲因此勉勵學子在花果飄零下必須自重、該視此困境為磨練，繼續扛起宣揚中華文化的任務。而這些內容被放在一個校歌的框架底下，也因此可以被視作這些右派南來文人在辦學時的目標：復興中華文化與抗共。

⁶⁸ 陳珪明，〈港中大掛青天白日紅旗 校方擅拆除〉，<https://anntw.com/articles/20171012-cO43>（檢索日期：2019 年 10 月 12 日）。

⁶⁹ 錢穆，〈總統蔣公八秩華誕祝壽文〉，《錢賓四先生全集 23》（台北：聯經，1998〔1966〕）。

⁷⁰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凋零〉，《說中華民族之花果凋零》（香港：三民書局，1974〔1961〕），頁 2。

南來文人一直致力於塑造出一種有別於左派的「光明中國」的民族主義，以「苦難中國」號召出對中華民國的認同及對中共的反對：當左派民族主義時常把中國塑造成友愛的、熱情的、勇敢的、進取的、貧窮但團結的，也因此是有生機和希望的，⁷¹右派則把整片中國——包括香港——都描述為苦難的，就如同花果凋零的意象那樣。大樹崩倒、花果凋零的意思是：中華民國就是大樹，而他們這些離散華人就是花果；花果凋零意味著中華文化與理念正隨著中華民國失勢而面臨危機。面對這一切苦難，他們把矛頭指向了中共。他們認為，大片的中國土地和人民正淪陷於左派手中，而左派是中國文化的摧毀者、是不正統的，而居住在香港這片土地的離散華人，是自大陸的土地上被剝離了的人群，因此也是苦難中國的一部份。這種判斷部份地來自新儒家唯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之間的矛盾。以唐君毅為重要代表的新儒家認為，「馬列主義之專政思想」是違反「心性」的。因此，他們以辦學去推崇新儒家，認為復興中華文化的任務是透過自省培養心性，做到「靈根自植」，成為道德主體。⁷²新儒家把對心性之重視看作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抗。⁷³

由於他們認為當下離散華人最大的命題是訴求「靈根自植」，維護及復興中華文化，而不是對外尋求。⁷⁴因此，他們對介入本地社會議題並不積極，也不認為需要反殖。加上這些南來文人自命正統（是出自大樹的花果），認為香港這個殖民地是不正統的、不正當的（事實上，這些右派南來文人很多只把香港當作暫居地），如此一來，他們在情感上也是隔絕於對香港社會的。對殖民地的一切文化採取否定或隔絕的態度，也反過來是為了維繫對大陸的正統性的嚮往。於是，唐君毅接著寫道：

香港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胄，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自憐不暇，何敢責人？⁷⁵

⁷¹ 關於六〇年代左派是怎樣在文學及電影中以光明中國對比傷殘的香港，參見駱穎佳，〈怨恨的生命政治：毛派國族論述對香港人身體想像〉，《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香港：基道，2016），頁 65-99。

⁷² 關於靈根自植的闡釋，見唐君毅，〈花果凋零及靈根自植〉，《說中華民族之花果凋零》（香港：三民書局，1974〔1964〕），頁 30-61。

⁷³ 關於心性培養與反對馬列主義之關係，見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中國文化與世界〉，《說中華民族之花果凋零》（香港：三民書局，1974〔1964〕），頁 125-92。

⁷⁴ 關於靈根自植的闡釋，見唐君毅，〈花果凋零及靈根自植〉，頁 30-61。

⁷⁵ 唐君毅，〈花果凋零及靈根自植〉，頁 29。

可見，這些新儒家南來文人大多只把香港當成過渡之地，真正在意的中國是「神州」，所以對殖民政府沒有立場去苛責，對本地社會也是很隔絕的。他們鼓吹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保守主義的⁷⁶、非反殖的、抗拒行動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謹記，雖然錢穆和唐君毅很具代表性，但他們兩人不可以完全代表所有新儒家南來文人的觀點，實則新亞書院中的南來文人之間也是有差異的。在這裡舉唐君毅和錢穆的例子，是因為我欲指出兩人在新亞書院位高權重所帶來的文化影響不容小覷。我們可以在《新亞學生報》及他們對新亞書院學生的發言中，處處看到新亞書院是如何不鼓勵學生介入政治的事例。譬如，1966年9月25日接受《新亞學生報》訪問時，錢穆對新亞同學說道：「讀書是你們的三餐，談政治便是你們的咖啡與蛋糕，不應限制你們。」⁷⁷可見南來文人的民族主義議程，主要是訴諸文化民族主義的理想，以文化活動的方式進行，並不鼓勵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政治只能是用「談」的，而不是用來「做／行動」的，就更不要說反殖了。

這種只談反共並隔絕於殖民政府，甚至不去反殖的政治判斷，到頭來完全符合國民黨右派的對港方針：也就是不反殖，以爭取聯合殖民政府合作抗共。新亞書院的南來文人以如此精緻的論述去支持不反殖的結論，雖然可以被簡單解釋為是因為他們親國民黨，但我們也不可忽略南來文人自身的經歷、情感和思想脈絡，不可把他們的這些倡議看成是被國民黨操控下的傑作。畢竟，新儒家保守主義的確不容於中共，而這些南來文人在「大勢已去」下，選擇了在香港不搞事、依靠國民黨、依靠亞洲基金會、只是推崇針對反共的民族主義、以及持反共不反殖的立場，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受到這些和國民黨右派有緊密聯繫的新儒家南來文人影響的青年學子——特別是戰後在香港土生入長的一代——他們未必有辦法輕易聽從南來文人的建議。畢竟，土生土長的一代無法把香港當作是暫居地，面對殖民地的諸多問題，也無法像這些新儒家南來文人那樣冷眼旁觀。此外，知識份子或學生身份，在新亞書院新儒家的影響下，也會讓青年學子認為自己需要負上更多責任——這主要是保守主義中國文化的士大夫傳統，認為學位越高、知識越多、責任越大。但是，當新儒家南來文人只要求背負著這些責任的青年學子有更多內省，這就使得透過「苦難中國」形象帶出來的文化民族主義所

⁷⁶ 唐君毅曾經為保守主義辯護過，見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凋零〉，頁1-29。

⁷⁷ 〈前校長錢賓四先生接受本報記者訪問：身體無恙著作有成 山居生活閒而少暇——詳談學生對「娛樂」「談政治」當有態度〉，《新亞學生報》，1966年9月25日，版1。

催生出來的情感像疊疊樂那樣，越堆越高，越堆越沉重，越堆越困頓，但沒有行動的出路。當所有的痛到最後都指向自己和那個苦無出路的中國，這些受到新儒家南來文人影響的青年學子，也開始出現自傷的狀態，也就解釋了為何步入六〇年代後開始出現「無根的一代」和「失落的一代」這些概念。也就是說，這些南來文人所推舉的知識份子責任是一個雙面刃，一方面告訴本地青年知識份子應當關注政治（因為政治是關係國家民族的大事，特別是知識份子應該正視這種現實）；另一方面，又不鼓勵你參與政治，只要你讀書——這使得讀書對於青年知識份子來說越發沉重、矛盾、衝突、苦悶、壓抑、感覺與現實脫軌、因人生無處寄託而感到失落。1966年澳門「一二·三」事件爆發後，《新亞學生報》有人投稿談過這種失落感：

由於月初澳門發生的一連串流血動亂事件……令到身處與之相隔一九州洋的香港居民，收到相當的震動……倘若澳門一旦被收回，那末，香港距離英政府在港降旗的日子，亦自不遠……記得一有一次，與友人談到香港的前途問題，他帶點牢騷氣地說：「我們現在辛辛苦苦，你離死讀書幹，三十多年後，誰能知道這回事一個怎樣的世界呢？朋友，還是及時行樂吧！」這當然是一個充滿悲觀、消極性而且似是而非的論調……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可真不幸，不獨生在動盪不安的時局之中，且每人都要在這黑暗的人生，作漫無止境的摸索，究竟我們活下去的目的是什麼呢？人生中，究竟有沒有主宰的存在呢？這些問題，使我們者「失落的一群」，感到迷惑、懷疑，而始終找不到答案。⁷⁸（黑體為作者所加）

香港青年學子在文章中引用的「失落的一群」一詞，特意加上引號，大抵也是呼應了王尚義所說的「失落的一代」。王尚義努力在文學與哲學中尋找世界動盪下該如何自處的答案，就像引文作者跟隨新亞書院右派南來文人的步伐努力想在書本中尋找道理；然而，兩者到最後都只是感受到更多的失落。因此，作者認為讀書不過是一種「充滿悲觀、消極性而且似是而非」的答案。可見，南來文人在香港沒有明確政治議程的虛弱態度，一手惡化了香港右派場景青年（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失落。於是在1967年後，越來越多本來屬於右派場景下的青年學子開始反省右派及新儒家南來文人的局限性。這我們將會在後續的章節提到。

⁷⁸ 奕翰，〈由澳門事件說到我們的人生〉，《新亞學生報》1966年12月25日，版4。

1-4 小結

在這一章，我概述了 1949 年到 1967 年間（也就是火紅年代前）香港本地的政治版圖。雖然我是以比較工整的方法去呈現中共左派、國民黨右派、第三勢力、友聯、新亞南來文人等在香港的位置及影響力，並指出他們總體上是如何分庭抗禮卻也無法壓到對方；然而，我必須要補充，左派、右派和第三勢力並不是在所有領域都勢均力敵，更不是靜態地、對稱地、在方方面面都平分秋色。事實上，左派在香港沒有持續辦下去的高等院校，在知識論述方面會比右派和第三勢力等要弱。而右派及第三勢力無法在組織上有左派的深度，因此也缺乏了對群眾的生活上的把控力。此外，我也跳過了五〇年代左派曾經在電影界的影響力。

我之所以要花如此多的篇幅去描繪火紅年代前的政治版圖，是意欲指出：在 1949 年到 1967 年間，無論是受中共影響的左派、受國民黨影響的國民黨右派、還是受美國影響的第三勢力右派，都因為其各自核心的對港方針而無意反殖，以至於和港英政府共同塑造出一個超穩定的、與社會運動絕緣的社會風氣。所以在香港社會問題異常嚴重的情況下，一直沒有出現反殖的抗爭。

這也呼應了呂大樂所說的「殖民冷經驗」概念：呂大樂認為，香港市民在殖民地制度下總是與建制有種疏離感，也就是說，抗拒殖民地的情緒主要表現為跟殖民體制核心保持距離。然而，這並不代表呂大樂否認市民對殖民地感到不滿、甚至有反殖的情緒，他是要指出：「反殖民地作為一項捲入廣大民眾的政治工程——包括有組織地進行政治顛覆，宣揚針對殖民主義的國族主義思想，嘗試推翻殖民政府，並有打算通過解放殖民地而另立新的政權——基本上從來不是政治現實的一個部份。」⁷⁹

由本章所見，反殖的政治工程之所以一直沒有出現，實在是左右兩派共構的結果，背後也是由於左右兩派複雜的政治計算及精心的組織——他們都直接及間接地為社會大眾提供了可以與殖民體制保持距離的知識論述、社會空間和物質基礎。但是，這也造成左右兩派的群眾都活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社會的框架中，「各自解讀社會生活的現實」⁸⁰——這在後來的六七暴動中就更為明顯了。

⁷⁹ 呂大樂，〈殖民冷經驗〉，《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 50-52。

⁸⁰ 呂大樂，〈殖民冷經驗〉，頁 53。

但是，1966 年的天星小輪暴動，以及 1967 年因為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擦槍走火的反英抗暴／六七暴動，將鬆動這個超穩定的結構與風氣，也啟動了火紅年代青年政治化的契機。我們也必須時刻記住——儘管火紅年代的反殖聲音是如何開天闢地，但它從發起到發展再到遺緒，依然要一直與這種歷史遺留下來的超穩定結構對抗。但這已經是後面章節的故事了。

二、從六七暴動再出發：大陸文革「造反派」與香港左派

屬下集團 (subaltern groups) 的歷史必然是支離破碎和有週期性的。無疑在這些集團的活動中確實存在著一種統一的趨勢 (至少是暫時的階段)，但這種趨勢不斷被統治集團的活動所干擾；因此，只有當歷史它的歷史週期以成功告終的時候，該趨勢才能得到證明。屬下集團往往受統治集團的活動的支配，甚至當它們起義反抗的時候亦如此：只有「永久性的」勝利才能打破這種從屬關係，而且不能立即實現。

——葛蘭西《獄中札記》¹

為什麼要寫六七暴動呢？火紅年代的定義不是一般都不包括六七暴動嗎？在我看來，如果要理解香港七〇火紅年代社會運動風潮何以誕生，甚至要理解整個火紅年代的思想資源，都必須從 1966、1967 年的兩場暴動開始說起。兩次暴動因揭露了殖民政府管理下的深層次矛盾，使得此後居住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的人，再也不能以鴛鴦心態面對殖民地的社會問題。²其中，1967 年的暴動更是標誌了文革對香港的影響。而因為 1967 年的暴動無論是時間跨度、影響範圍還是挑起的社會討論，都要比 1966 年的暴動要深、要廣，本論文因此決定從六七暴動開始理解火紅年代的起源。

1967 年的暴動被稱作「六七暴動」或「反英抗暴」，它事實上並不是一場暴動，而是 1967 年 5 月到 11 月的一連串由左派群眾發起的反殖抗爭。行動則包括了派單張及刊物、貼大字報、遊行、示威、罷課、罷工、罷市、在街頭與警察「打游擊戰」、暗殺及炸彈襲擊等。而這些反殖行動到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一般來說，「六七暴動」這一名稱延續了殖民政府對抗爭的暴動定性，延續了社會對暴動的污名，變成是在支持殖民政府對「暴動」的鎮壓；相對來說，「反英抗

¹ Antonio Gramsci, "Notes on Italian History,"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2 [1971]), 44-118, see 54-55.

² 羅永生在論及兩場暴動對七〇年代反殖意識的關係時寫道：「土生土長的新一代精英雖然大部份都不贊同暴動的方法和目標，但暴動也激發了他們的社會意識，令他們決意要從父母一輩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難民心態逃脫出來。暴動發生後的幾年內，大學校園充滿了焦慮不安和失落的情緒，因為暴動暴露了社會的不公平和其他弊病。青年人對殖民地體制的不滿急劇增加，但他們卻沒有方法去改變現狀，更不知道香港的未來和前路應如何走下去。於是，大學校園關於香港前途的討論日漸增多，也有愈來愈多的青年人和大學生希望將爭論轉化為行動。」參見羅永生，〈「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二十一世紀》161 期（2017），頁 71-83。

暴」這一名稱則是凸顯了行動背後的正當性，認為所謂激烈行為是行之有理——為了反對英國的暴力。雖然我將在本論文中繼續沿用「六七暴動」這一名稱，但並非代表我同意「暴動」一詞的污名，我反而是希望為「暴動」這種行動模式解咒，讓人理解到「暴動」背後的邏輯。畢竟，何謂暴力、甚至何謂「暴動」、暴力或暴動是好是壞，從來都並非只是在於行動本身的程度或效果，而是在於權力之於話語的支配。六七暴動的定義的困難，正是因為它具備屬下歷史（subaltern history）的特性，而且是以被壓抑和失敗的姿態告終。

2-1 六七暴動與中國文化大革命

2-1-1 為何討論文革和六七暴動在今天如此的敏感和困難？

實際上，在今日要討論當年的六七暴動，就如同要討論它的命名一樣，皆是高度敏感且高度政治化的話題，而且被多重冷戰、殖民、後冷戰的力量所穿透。要理解討論六七暴動為何如此困難，則要先理解討論文革為何如此困難——因為由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事實上可被看作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伸。譬如，在研究六七暴動上頗具權威性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一書的作者張家偉在接受《明報》記者訪問時說：「六七年社會問題並非主因，我會說，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延伸。」³

文革從 1966 年 5 月 16 日開始，於 1976 年 10 月 6 日結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場由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一開始由陳伯達擔任組長）發動，由群眾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響應的政治運動。根據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中的觀點，毛澤東把文革看成「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以防止中國走向蘇聯修正主義的道路。透過動員在系統中被壓抑的「下層」（也就是「年輕人」、「聘任、兼任、被人們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去造反「老年人、有錢有權有勢的人、地位高的人」，毛澤東希望整頓大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僚）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知識份子），奪回政治領導權，以達到他希望建立一個領袖獨裁和群眾專政直接結合的新的一黨專政模式、一個可以堅持他空想社會

³陳嘉文，〈掘史達人：不認識歷史，定性暴亂太危險〉，<http://goo.gl/vfOjYx>（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主義的烏托邦實驗、及創建一個能體現人民民主主權的公社式的新國家體制的目的。

4

然而，由於文革中出現過的殘酷的文鬥、武鬥、冤獄、炒家、告密、人身迫害等行為，再加上高考停擺、古蹟文物被破壞、社會關係與文化秩序翻天覆地的改變等因素，文革又被中國社會廣泛定性為「十年浩劫」。此外，中共與中央政府在 1981 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把文革定調為「失去的十年」。⁵而當文革被認為是瘋狂的、非理性的歷史錯誤，要討論文革中的理性內容就變得非常困難。吳一慶在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一書的開頭對這種定性有以下總結：「當文革被簡化成一次革命的瘋狂——只關乎混沌與暴力的摧毀……從八〇年代初開始，文革超乎尋常的複雜性就被努力地簡化成只有野蠻、暴力和痛苦。」⁶而當六七暴動被認為是文革的延伸時，也意味著對文革的簡化公式也適用到六七暴動身上，使得六七暴動的複雜性被掩蓋了。

這種對文革的簡化所塑造出來的論述場域，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服務於多方勢力的政治需要。簡化文革並且批評這個簡化了的文革，經常可以用來把中共二十世紀以來的革命歷史去正當化，以達到批評中共及反共等目的——譬如，自由派否定文革中的造反派，是為了證明整個政權是為極權制度的反動。⁷此外，中共官方同樣極力否定文革、否定造反派，為的是說明現行極權體制的進步性；⁸同時也是為了去正當化後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大陸過渡到市場經濟並被納入資本主義體制內，也被認為是可欲且不可避免的。⁹在香港社會的常識中，對六七暴動簡單化的負面評述也起到了類似作用。譬如，唐子明認為，香港人身份認同是源自於六七暴動下出現的抵禦心態——由於香港市民普遍對激進左派的鬥爭和暴力行為感到不滿，因此對文革下的大陸社會產生抗拒，並加強了自我認同和歸屬感。¹⁰雖然我認為唐子明的說法過於平整，無法解釋火紅年代中的中國熱。但這的確如實地反映了在對六七暴動的理解

⁴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台北：聯經，2012），頁 7-114。

⁵ 白承旭，〈文化大革命與陳伯達〉，《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2014），頁 1。

⁶ Yiching Wu,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3.

⁷ 白承旭，〈文化大革命與陳伯達〉，頁 9。

⁸ 白承旭，〈文化大革命與陳伯達〉，頁 9。

⁹ Wu,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3-4.

¹⁰ Clement Tsz Ming Tong, "The Hong Kong Week of 1967 and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Identity through Contradistinctio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56 (2016): 44.

過於簡陋的前提下，社會意識的基本走向：當六七暴動被簡化為一則單純的暴力事件，「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也取得了正當性，因為七〇年代的美好在於它平息了六七暴動的混亂與瘋狂，這甚至為此後的「香港人」身份認同開了路。

有趣的是，當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在八〇年代末隨著國企改制問題出現，社會浮現出一波對毛澤東的興趣，連帶文革也被熱絡地討論起來時，¹¹香港社會卻因為受益於改革開放的紅利，在飛揚上升的經濟氣氛中並不感覺到資本主義的壞處——於是自身的左派和左翼思潮都難以發展，更不要說重提六七暴動或文革了。而當西方左翼學者以及中國「新左派」「用中國前三十年批判中國後三十年」的方法，從肯定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實踐的立場出發，批評中國的市場改革如何顛覆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時，¹²這一波討論同樣沒有撼動本地社會之於六七暴動的評價。也就是說，學術上關於文革的討論，奇怪地並未影響到被認為是「文革延伸」的六七暴動的頭上。結果，關於六七暴動與文革的討論，在香港就被「石化」在六七暴動結束後的那幾年，沒有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種種變革而被重新認識——於是，在香港社會，支持六七暴動依然被認為是支持中共，反對六七暴動依然被認為是反中共。

儘管自 2012 年起，張家偉出版了《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這一研究專書，奠定了相關研究的基礎，「火石文化出版社」也連續出版了《傷城記》、《五月無家》、《火樹飛花》、《印象六七》等關於六七暴動的書籍，加上諸多以「解密」角度去敘述六七暴動的書和電影相繼面世（譬如 2017 年《消失的檔案》和 2018 年《香港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即為其中的佼佼者），六七暴動的歷史似乎再次進入社會大眾的討論之中。不過，這些專書及電影在「還原歷史、尋找真相」的同時，在進入社會大眾的討論的過程中，結果還是跌入了「反中共與否」的泥漿摔角當中。一方面，是站在「揭露者」的立場，以當時的社會混亂去批判當事人的暴力、混亂、隱瞞，並以此批判當年操盤者，再連結到批判今日中共威權統治的「反六七」論述——拍攝了《消失的檔案》的羅恩惠¹³，和寫了《香港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的程翔

¹¹ Wu,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7.

¹² 宋國慶、董國強，〈社會主義中國的危機與轉型——評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二十一世紀》156 期（2016），頁 119-20。

¹³ 羅恩惠把自己要揭露六七暴動的「極左」仇恨與盲動看作是對抗高牆的行動，參見《明報》對羅恩惠的系列訪問：蘇美智，〈【人物專訪—羅恩惠】四年追蹤六七暴動歷史真相〉，<https://bit.ly/3n0r2JS>（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蘇美智，〈【人物專訪—羅恩惠】「我極度憤怒 那是作為公民的憤怒」〉，<https://bit.ly/3DILaWO>（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蘇美智，〈【人物專訪】羅恩惠：無論高牆有多高 要尋找真相的話也會做得到〉，<https://bit.ly/3gXpYIW>（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他本人曾為左派，在 1989 年後開始批判左派）¹⁴，被認為是此系列論述的代表。另一方面，是站在「弱者」的立場，以當時暴動左派的視角敘述其遭遇到的來自殖民政府的暴力，並把當年反殖的理念與支持中共的民族主義接軌，卻也默認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支持六七」論述——受到不少六七暴動 YP（young prisoner，因六七暴動入獄的青年囚徒的簡稱）信任的「六七動力」與屈穎妍就被認為是此系列論述的代表。¹⁵

也就是說，香港關於六七暴動的討論的弔詭之處是：以負面方式去評論六七暴動者，沒有走出自 1967 年起殖民政府為了鎮壓暴動而打造的「繁榮穩定論」；而以正面方式去評估六七暴動者，也沒有走向研究文革的西方左翼學者以及中國「新左派」「用中國前三十年批判中國後三十年」的論述道路，而是反過來維穩了中共的威權統治及默認了改革開放的正當性——而在中共對文革定位得比較負面的當下，「支持六七」的論述甚至刻意模糊化自身與文革之間的親密性，聚焦在把六七暴動定位成愛國。以至於，今天討論六七暴動時，香港的兩派輿論都並無觸及六七暴動中暴動左派的「左」的思想邏輯，各種關於歷史細節的釐清——譬如炸彈是誰放的、人是誰殺的、左派在獄中是否有遭遇暴力對待等——只是為了追究責任，而不是去理解暴力、暴動背後複雜的思想與情感邏輯。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討論六七暴動和討論其命名一樣，是被多重冷戰、殖民、後冷戰的力量所穿透，而變得敏感且困難。

2-1-2 為何要把六七暴動放置在文革的框架下討論？如何放置？如何討論？

有鑑於文革以至於六七暴動都被冷戰、殖民、後冷戰因素，及今日對中國性質的判斷，緊緊鎖死。那我們還可以如何再討論文革以至於六七暴動呢？而當所有關於六

¹⁴ 程翔認為，六七暴動若被平反，意味著中共要美化文革，是「淡化了文革的災難本質」。參見程翔，〈觀點：港片《中英街 1 號》為何引發「漂白暴動」爭論〉，<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4316504>（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¹⁵ 「六七見證」創辦人石中英曾指羅恩惠的《消失的檔案》最大的問題是「讓一班因愛國承受冤獄揹負案底五十年的『六七』老人，未曾結疤的傷口再被灑鹽」，更有 YP 稱羅恩惠利用自身和屈穎妍的關係，騙取 YP 信任，再用剪接技巧將 YP 的訪問片段「斷章取義」，變成「反共反華、政治煽動、製造分裂的影片」。參見立場新聞，〈《大公》兩版轟「消失的檔案」斷章取義 受訪者「熱愛祖國」內容被刪走〉，<https://bit.ly/3zHprw4>（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七暴動的研究都明言要歷史化、要「還原歷史、尋找真相」時¹⁶，連帶的問題就是：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的六七暴動的歷史真相被還原時，會還原出一種怎樣的文革？

這個時候，關於如何歷史化地討論文革的相關思考，就可以進場，並在該如何歷史化地討論六七暴動這一問題上給我們啟發。吳一慶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就因此對「還原歷史」的說法提出追問：要還原誰的歷史？如何還原？他說：「歷史學家批判思考的任務並非在於簡單地、誠懇地再現歷史，更重要的是以批判的視角重新審視歷史中的核心概念——也就是那些定性了該段歷史的概念。」¹⁷因此，吳一慶書寫的歷史主體，就是在文革的「邊緣」之中尋找各種駁雜、散亂、游移的異議聲音，他致力於書寫出一個並沒有穩定核心的文革，以擾亂目前輿論對於文革的過於武斷和簡陋的認定。此外，白承旭也認為，文革時難以還原出一個單一的主軸，去加以詮釋和判定，其中有許多層次。因此，他認為：

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我們需要跨越兩種解釋：（一）把它詮釋為毛澤東為了權力鬥爭，而井井有條地操縱、動員群眾的「極權主義」立場；（二）把它詮釋為為了建立新的烏托邦所進行的黨內鬥爭的「毛澤東主義」立場。我們需要對於複雜的社會張力和矛盾進行分析，更需要在它表面的對立結構下，對於那些有所意圖或沒有意圖的結果、預料之中或出乎預料之間的歷史複雜性，進行多面性的分析。

18

那麼，響應著吳一慶賀白承旭的建議，我的這一章關於六七暴動的書寫，是希望呈現一個內部呈複數的、紛雜的、持續變動著的、有張力的六七暴動。事實上，香港左派被激化，甚至出現極左派的六七暴動，是與大陸造反派從底層的興起、奪權和消亡息息相關的；也就是說，六七暴動的興起與滅亡，並不只涉及港澳工委與中共之間的決定，而也是關乎中共中央的權力於文革初期被短暫打散及重整所牽扯到的權力變動。透過把六七暴動放置在左派的中港互動中，我期望以更精準的語言把六七暴動放

¹⁶ 羅恩惠認為，自己之所以要拍《消失的檔案》，是為了還原真相，更觀照當下——即「極左可悲、盲從可恨、鼓吹鬥爭可怕、刷洗事實的人背後動機都惹人疑慮」；而六七動力每年搞公祭，也是「要求還原六七暴動真相」——即「參與者並不是暴徒，而是愛國者」。兩者其實都是認為自己要「還原歷史、尋找真相」。關於羅恩惠的說法，參見蘇美智，〈【人物專訪】羅恩惠：無論高牆有多高 要尋找真相的話也會做得到〉，<https://bit.ly/3gXpYIW>（檢索日期：2021年9月1日）。關於六七動力的說法，參見幫港出聲，〈六七暴動50周年 團體要求還原真相〉，<https://www.silentmajority.hk/articles/31227>（檢索日期：2021年9月1日）。

¹⁷ Wu,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8.

¹⁸ 白承旭，〈文化大革命與陳伯達〉，頁2。

置到文革之中，並將之定位在吳一慶所說的文革的「邊緣」部份之中——使得六七暴動之於文革的存在意義不是在於穩定所謂文革有一穩定核心的這種歷史觀，而是在這個書寫過程中，六七暴動自身也會因此而有所散射。

因此這一章我對六七暴動的處理，不是要巨細無遺地敘述六七暴動的經過——這無論是張家偉、周奕還是程翔，都已經寫得很仔細了；也不是要挖掘六七暴動中是否有可在今天被動用的遺產——這僅管是對今天關於暴力及革命的思考非常有意義的工作；而是在於讓今日被壓抑的聲音和意識得以現形，使得它們重新被納入今天關於歷史化六七暴動的思考當中，也就開拓了一個複數的六七暴動的可能。

2-2 六七之前：大陸文革爆發，香港左派造反暗流湧動

2-2-1 《五一六通知》：大陸校園風起雲湧，保守派、造反派各據一方

毛澤東是如何發動文革的呢？這需要從《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說起。1966年2月，中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撰寫了《二月提綱》，認為對《海瑞罷官》一劇的批判應該限於學術討論的範圍而不是上升到政治層次。於是，1966年5月16日，毛澤東就藉著由陳伯達及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即後來「四人幫」中的三人）等人起草的，由自己修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去批評《二月提綱》，同時提出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以「文化革命小組」取而代之的建議。《五一六通知》這份綱領性文件的主旨雖然是總結在此之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錯誤，實際上是在批判過去的同時也指向文革未來的走向。這份文件是這樣說的：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

我國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沖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障地和文化障地。這個〔二月〕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沖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

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二月〕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新生力量……

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¹⁹（黑體為筆者所加）

雖然這篇《五一六通知》在發佈首年只有 17 級以上的幹部才能閱讀，要到了 1967 年 5 月 17 日才被《人民日報》公佈，並被喻為「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角」；然而在當時，普通黨員和共青團幹部已經在此後一個星期的政治學習中透過

¹⁹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五一六通知》，<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4%BA%94%C2%B7%E4%B8%80%E5%85%AD%E9%80%9A%E7%9F%A5>（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口頭傳達學習到這份文件的精髓。²⁰《五一六通知》也因此在大學和中學中首先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些地方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的「重地」。譬如，北大的聶元梓等人於5月25日寫下〈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大字報，攻擊中共北京市委大學工作部和北京大學黨委主要領導人。²¹清華大學在6月份就湧現出65,000張大字報；北京大學附屬中學也有數千張。²²

同時，中央也派領了總數達7,239名幹部的「工作組」進駐學校管理。²³一開始，一些師生是歡迎工作組的，然而他們很快就發現這個由劉少奇統領的工作組是來壓抑師生寫大字報的狀況，於是開始有反對工作組的狀況出現。譬如，北京39所大學的工作組被激進學生逐出校園。²⁴

雖然，《五一六通知》在大陸校園內一石激起千重浪，但對於香港卻沒有即時起到很大影響。那是因為，周恩來在當時就跟政治局說，文革的方向是「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²⁵。同時，周恩來也明確表示香港不搞文革。²⁶也就是說，一河之隔的香港，在當時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2-2-2 《炮打司令部》：毛澤東亮出底牌對造反派及香港左派內部的影響

不過，到了1966年8月5日，也就是毛澤東於第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期間寫下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被刊登，香港港澳工委內部開始感覺到一些壓力。毛澤東這張大字報是這樣說的：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²⁰ 麥克法夸爾，〈圍攻北京市委〉，《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2009），頁42。

²¹ 關於這張大字報的詳細出台過程，參見印紅標，〈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十一世紀》36期（1996），頁37-45。

²² 麥克法夸爾，〈五十天〉，《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2009），頁69。

²³ 麥克法夸爾，〈五十天〉，頁68。

²⁴ 麥克法夸爾，〈五十天〉，頁73。

²⁵ 麥克法夸爾，〈圍攻北京市委〉，頁42。

²⁶ 程翔根據《周恩來年譜（1949-1976）》，認為周恩來在1966年5月的講話是著香港不要搞文革：「香港的鬥爭是長期的，我們不能急，搞急了，對我們不利。」見程翔，〈六七暴動的發動及進程〉，《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頁40。

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²⁷（黑體為筆者所加）

毛澤東在這大字報中提到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指的是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而毛澤東在標題中要炮打的「司令部」指的則是負責工作組的劉少奇——他此時已被說成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因此意味著毛澤東開始大動手腳發動群眾，去清理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亮出了發動文革的底牌。

而隨著劉少奇被認為是反革命，之前支持工作組的也被稱為保守派，反對工作組的則被稱為造反派。²⁸保守派同時也被稱為「老紅衛兵」或「保皇派」，是與造反派對立的。²⁹根據錢理群的說法，老紅衛兵的父母多是老幹部，自身及家庭是官僚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但因為平常不受老師重視，因此藉機透過文革的發動批鬥老師，並稱他們為「反動學術權威」——老紅衛兵因此也被稱為「保爹保媽派」。³⁰而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出台後，這些身為幹部子弟的老紅衛兵頓時感到被打臉——因為他們此時才知道毛澤東這場在「文化上」的革命，目的是清算體制中以劉少奇為首的官僚，而他們的父母很大機會被包括在內。同時，曾被老紅衛兵壓抑的、沒有幹部父母背景、又對現存官僚體制感到不滿的造反派就感到吐氣揚眉了——他們認為自身才是文革的主體，是毛澤東思想的體現者，並把現存的權力與勢力視為攻擊對象。從 1966 年 10 月到 1967 年 1 月，這些造反派將迎來他們的黃金時期。³¹

²⁷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5-202.htm>（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²⁸ 麥克法夸爾，〈五十天〉，頁 87。

²⁹ 白承旭，〈文化大革命與陳伯達〉，頁 6。

³⁰ 在此使用「老紅衛兵」一詞，是借用了錢理群的分類。錢理群認為，老紅衛兵多屬於高幹子弟，一方面他們的背景雖然使得他們在政治上有優勢，但另一方面、出身工農革家庭使得他們在文化知識上不佔優勢，在學校不被老師重視，因此有了文化自卑感。這因此造成了他們既高傲又自卑的心理不平衡狀態。當文革給予了他們足夠的藉口，去以反「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的名義，他們首先在學校內造反、進而是其他異己。參見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頁 17-37。

³¹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頁 38。

與此同時，遠在香港的港澳工委上下開始感受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所帶來的震動，左派上下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聽到了毛澤東的號召，要在香港搞文革。當時擔任《文匯報》總編輯，負責中共在香港宣傳和統戰工作的金堯如對港澳工委內的狀況有以下紀錄：

對於當時港澳工委全體黨員幹部來說，〔毛澤東於十一中全會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也是一個極為震驚的消息，三日後，梁威林就在新華分社舉行港澳工作會議。梁在會上號召要好好學習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要堅決擁護、堅決執行。大家更要好好檢查自己身在香港，有沒有自覺活不自覺地走資本主義道路。否則就會變成牛鬼蛇神，身敗名裂。

梁又說：我自己就在嚴肅而痛苦地思考，我究竟是什麼樣任務？是走資派還是仍有可能是左派？這席話使舉座黯然。散會之後，大家搖搖頭，都有「大劫難逃」之感。³²

儘管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廖承志在8月下旬再度傳達了周恩來的話，再次重申文革是中國領土的事；但港澳工委中的中下層幹部，在看到大陸文革造反派正風風火火質問領導人的風潮後，在9月、10月開始三三兩兩地用「小字報」問責領導。內容大概是「黨在香港組織機構裏有沒有走資派？社會主義的國有，資本主義的香港反而沒有，這符合邏輯嗎？在香港我們要不要反對走資派、帝修反？香港是不是中國的領土？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事領導的革命土地？為什麼不容許我們『造』帝修反的『反』？香港的黨是不是毛主席的，組織機構裡有沒有帝修反的代理人？」³³

不過，我也必須提醒，此時大陸文革的造反之於香港的影響，主要還是一種風氣的影響，而不是來自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港澳工委的領導層以至於幹部對領導層的懷疑，又被中共外交部直接地壓制，然後繼續在暗流周旋。此外，此時的文革對香港的影響，也只限於左派的領導層圈，未擴展到廣泛的左派群眾。大陸文革掀起的波瀾，也只指向左派組織的內部問題，和六七暴動中的反帝、反殖、反英精神，可以說一點都沾不上邊。

³² 程翔，〈六七暴動的發動及進程〉，頁45-46。

³³ 程翔，〈六七暴動的發動及進程〉，頁47。

2-3 六七之起：文革造反派奪權與「一二·三事件」帶來的改變氣息

從 1966 年 10 月到 1967 年 1 月，由於中央內部造反派得勢，導致大陸民間各種造反派無論政治行動還是思想都高度活躍。而且，在造反派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造反過程中，也因為一步步發現黨組織內的腐敗問題而不安於只是響應毛澤東而已，所以有了要做「自覺的毛澤東式的戰士」的意識——這不但展現了文革中群眾的首創精神和自覺精神，也催生了後來關於「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意識。³⁴

「自覺的毛澤東式的戰士」的意識，首先催生了上海造反派的奪權，導致了上海政府原有的官僚架構面臨癱瘓。而上海造反派奪權事件背後實際是由工人的造反支持的：在此之前，中國大陸的工人實際上被官僚體制的分類系統嚴重分化，工人因著不同的企業所有制、產業、組織、地方等而出現了分等，造成了同工不同酬等不公平現象；而當文革的浪潮席捲上海後，這些工人趁勢而起——他們不只要求合理的工資、福利、工作環境等，更批判這些不平等背後的政治及意識形態基礎。³⁵1967 年 1 月 6 日，在毛澤東的心腹張春橋的支持下，上海「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召開了十幾萬人的「打倒上海市委大會」，要求中央徹底改組上海市委；1 月 10 日，毛澤東又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造反派組織發賀電。³⁶上海的奪權成為革命樣板，激化了全國各地的造反相繼奪權——也就是「一月風暴」奪權潮的起因。

甚至，上海的奪權後還曾出現過「上海公社」的成立——這也象徵了外在於黨的新的權力結構出現。³⁷雖然在臨門一腳時，毛澤東沒有支持上海公社的成立，甚至在 1967 年 2 月對張春橋說：「如果都搞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哪裡呢？」³⁸可見毛澤

³⁴ 錢理群認為，當時的民間有三大思潮。第一，是對血統論的批判，即認為不該以一個人的出身條件當作是先決條件，並認為血統論猶如種姓制度；第二，是「懷疑一切」思潮，衝破「馴服工具論」束縛的作用；第三，則是在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造反派開始在思考推倒各級黨追後，下一步該怎麼辦。第三種思潮的重要性的在於，要他們不僅安於只是響應毛澤東而已，而是有想要做「自覺的毛澤東式的戰士」，而因此有了思考造反以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見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頁 44-53。

³⁵ 關於工人所面臨的結構性不平等問題，參見 Wu, "Revolution Alchemy: Economism and the Making of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95-158.

³⁶ 李遜，〈巴黎公社原則在文革中的蛻變〉，《二十一世紀》155 期（2016）。

³⁷ 參見 Wu, "Revolution Alchemy: Economism and the Making of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128.

³⁸ 參見張春橋，〈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政研究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刊行，1988〔1967〕），頁 323。

東對造反派的公社理念有所質疑，認為這會架空黨，衝擊一黨專政。但是，奪權在各地已經成為定局。

而和後來香港六七暴動發展息息相關的兩起奪權事件，要數中宣部和外交部的奪權。1967年1月8日，曾執筆《九評蘇共》的造反派健筆王力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也就取代了以前的中宣部等部門。從此之後，《人民日報》為王力等造反派所領導。白承旭曾經說過：

中央文革小組主導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三大刊物：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黨的理論刊物《紅旗》和人民解放軍的《解放軍報》，在關鍵時刻，都會刊登「社論」，並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文章，這些文章皆提示了運動的方向。³⁹

馬繼森認為，造反派取得宣傳組的領導權意味著歷來作為中共中央喉舌的《人民日報》等報章已經不再是跟隨在黨和國家的機關之後，而是站在運動的最前線領導著運動，甚至可以跳過其他機關的決定，領導著國家機關的改變方向。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姬鵬飛因此曾說：「領導運動就是報紙，就是靠我們自己，靠我們的自覺性。《人民日報》就是指導的方針。」⁴⁰《人民日報》的定位被改變並落在造反派手上，對之後六七暴動何以升級尤其關鍵。

此外，外交部也是在1月被奪權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在向上海取經後，在原部長陳毅的同意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即革命領導幹部、革命群眾代表和人民解放軍三者的聯合執政——宣佈全面奪權。所以，外交部內的奪權並非由外人發起及執行，而是內部的和平過渡，為的正是防範被譬如北外紅旗戰鬥大隊等外來的造反派全面奪權。⁴¹所以，此奪權很大程度上又和中宣部的奪權不一樣——它並非全面奪權——原本的領導人沒有被大量換下來，造反派的權力也被限縮在「領導運動，監

³⁹ 白承旭，〈文化大革命與陳伯達〉，頁18。

⁴⁰ 馬繼森，〈姬鵬飛：「現在領導運動就是報紙。」〉，《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19。

⁴¹ 馬繼森，〈一月奪權〉，《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70-74。

督業務」的層次。⁴²而由於外交部是中共對港的窗口，這次奪權也意味著陳毅及周恩來等上層領導的對港工作被造反派介入了，但事實上並沒有被完全取代。

金堯如回憶，當時的港澳工委在中國大陸外交部被奪權後，就收到過來自「國務院外辦革命領導小組」的通知：

這個通知又指示港澳工委：應立即傳達和學習中央文革支持奪權的精神，揭發原國務院外辦主任陳毅和副主任廖承志在知道港澳工作上的右傾錯誤，並肅清自己頭腦裡的右傾遺毒，立刻糾正工作中的錯誤，重新走上革命道路。當前的重要任務是特別要重新研究今後香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務是什麼，把港澳工作推上新的歷史階段……⁴³

這段指令值得細讀的地方是，它其實傳達了三個意思：第一是，知會港澳工委上層領導將出現路線上的變化；第二是，表示香港應該跟隨大陸文革的步伐；但第三，又表示了怎麼跟隨文革要交由港澳工委自行研究。所以，什麼是「推上新的歷史階段」？如果以大陸的脈絡來講，這意味的可能性有太多——它可以意味著本地的派要更改文化政策，可以意味著左派學校需要進行教育改革，可以意味著左派學校學生應該反對思想的束縛，可以意味著左派機構內部應該檢討是否有走資派的問題，可以意味著港澳工委內部要允許幹部貼大字報，可以意味著工人要發動抗爭等。因此，要求港澳工委把香港工作「推上新的歷史階段」，本來是給予了港澳工委許多活動的空間去發展和思考屬於香港的道路。然而有趣的是，金堯如在事後寫到，他從「推上了新的歷史階段」讀到的是，旨意香港左派「把英國殖民主義者掃進歷史垃圾堆」，而他認為當時的港澳工委也是如此理解。⁴⁴

這個如此具體的結論到底是否為他當時的猜測，我對此是很懷疑的。我認為，這極有可能是他在六七暴動後的回推：因為，首先，從 1966 年 8 月、9 月看來，香港工委中幹部對文革的理解，主要指向對內部的批評，並無涉及反殖。所以，工委對文

⁴² 根據馬繼森的說法，聯絡站在部、司兩級成立了業務監督小組。各司業務監督由各該戰鬥隊指定，部業務監督小組成員由幾個地區業務司和其他職能部門的戰鬥隊選派組成。所謂監督，是參加研究處理具體業務案件，並參與簽署上報的文件。外交部的業務工作基本上仍按原來的程序進行。見馬繼森，〈聯絡站奪權初期〉，《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81。

⁴³ 程翔，〈六七暴動的發動及進程〉，頁 49。

⁴⁴ 程翔，〈六七暴動的發動及進程〉，頁 49。

革的理解為何採取了反帝、反殖、反英式的閱讀，是很跳躍的。而且，外交部的奪權並不是徹底奪權——主要領導人基本不變。這樣看來，這次通知的內容模糊且空間大，或許是故意為之，用意並非給出具體方向的指令，而是一種例行公事的知會，給香港工委一個「大陸正在改變的」的提醒。

但其實，推測彼時外交部及港澳工委的真正心意或許作用不大，因為儘管他們接到指示，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也沒有主動作為。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從這個旨意中理解到，當時的港澳工委明確知道（也可能是誤解）了一點：先前的一套方針或許要被刷新了，至於要刷新成什麼樣子，當時來看其實很模糊。

同時，我們也不該忽略 1966 年 12 月 3 日，澳門「一二·三事件」的影響。事件的起因是因為澳葡政府阻擾左校施建而演變成大規模騷動。然而，在澳門工聯會和眾多左派圈子的大動員底下，成功滾動成一個全民事件，在騷動過後，更得到了大陸以大軍壓境的姿態，間接迫使澳葡政府低頭。1967 年 1 月 29 日，一二·三事件滾動而成的反殖抗爭以勝利之姿結束，左派的反葡鬥爭在《澳門日報》頭版的標題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反迫害鬥爭獲全面勝利，澳葡當局今日低頭認罪」。⁴⁵從此以後，雖然澳門依然是殖民地，但左派在澳門的勢力強盛，特別是澳門右派撤退後，澳門儼如「半個解放區」。一海之隔的香港左派，似乎終於從上到下都感覺到了毛澤東思想的風潮已越出中國大陸的範圍，向香港逼近。根據當時在左派報紙工作的周奕回憶，當時左派圈子意識到這個事件的重要性，各機構都有組織去澳門的慰問活動，但他也強調，港澳工委並沒有積極策動各個機構去澳門，而是左派各機構自發地派人前往——港澳工委也只是「做幕後之協調」；他也說：「前去的批次不會很多、每批的人數亦不多，因為六〇年代，去一次澳門已屬『遠遊』的高消費。」⁴⁶儘管去的左派未必很多，但去的人當中卻不乏左派圈的領導層，譬如，《大公報》社長、《文匯報》李子誦及工聯會副理事長等皆曾前往澳門慰問。⁴⁷至於去完澳門後這些人有什麼得著？新華社何銘思在接受張家偉訪問時說：「我們經過澳門學習的亢奮後，回到香港卻飽受留難，我們有種在香港受英國人壓迫、歧視的感覺，老是覺得被人欺負。」⁴⁸工聯

⁴⁵ 李孝智，〈一二·三事件期間報紙建構的事件〉，《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7），頁 152。

⁴⁶ 周奕，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16 日。

⁴⁷ 張家偉，〈六七暴動的前奏〉，《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頁 30。

⁴⁸ 張家偉，〈六七暴動的前奏〉，頁 30。

會的觀光團也反映：「香港群眾迫切要求解放，觀光團成員也有這種感受。」⁴⁹可見，這次旅程留下了一些火紅的苗頭在去的人心中，而這些人皆是左派同心圓的圓心及圓心外圍網絡的關鍵人物。這些人物的改變，是之後整個六七暴動時左派場景得以改變的動力之一。

從外交部的奪權及「一二·三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自 1967 年 1 月開始，不僅處於同心圓核心的港澳工委，連處於貼近核心外圍的左派組織領導，都感覺到一種事情需要改變的氣氛。但具體什麼事情需要改變？要往什麼方向改變？在當時還沒有一致的方向——更不要說往「反殖」的方向改變了。1967 年 1 月到 4 月的香港，表面還是大致平靜的模樣，但也暗藏著改變的暗湧。

2-4 六七之承：人造花廠工潮、鬥委會成立、遊行、罷工

2-4-1 人造花廠工潮：左派群眾及工聯會在工潮中的小試牛刀

1 月到 4 月本地的平靜，與大陸造反派被打壓，在時間上是高度的吻合的。1 月到 4 月這三個月間，造反派在奪權後遭遇了「二月鎮壓」：這次鎮壓是源於文革中的黨內鬥爭，不滿意文革的黨內、軍內老革命，和毛澤東與他支持的中央文革小組於懷仁堂發起了較量，全國各地也因此發生了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事件，甚至出現軍隊開槍打死人的狀況。⁵⁰直到造反派於 4 月得到平反，「二月鎮壓」被改稱成「二月逆流」，造反派又活躍起來。由於陳毅曾參與懷仁堂會議，並站在了老幹部的一邊，之前一直想奪取外交部權力的北外造反派和外交部內的造反派聯合站於 4 月 5 日籌組了「批陳聯絡站」，聯絡站也與屬於「造反派」的北外紅旗造反團結成一派，排擠了先前屬於「保守派」的北外紅旗戰鬥大隊，開始了批鬥部長陳毅的工作——陳毅的地位岌岌可危。⁵¹1967 年 4 月 10 日，一些外交部內的造反派認為聯絡站「組織紀律性強」、「怕革命」，又認為聯絡站在劉少奇、鄧小平及陳毅的問題上批鬥得不堅決，於是宣告成立「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成為另一個平行於聯絡站的文革造反派群眾組織。5 月

⁴⁹ 程翔，〈六七暴動發動的原因和目的〉，《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頁 33。

⁵⁰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下）：1966-1976〉，《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台北：聯經，2012），頁 58。

⁵¹ 馬繼森，〈「砲轟陳毅」〉，《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139-62。

19日，這個新成立的群眾組織發表了《致周總理和全部革命同志的一封公開信》，表示要「要打破外交部的『一言堂』局面」——明顯指向了陳毅。⁵²

平行於造反派的抗爭，1967年4月13日的香港，一個左派抗爭正要爆發。位於新蒲崗工業區人造花工廠的左派工人爆發工潮。5月6日，警察暴力鎮壓，膠花廠工人被拘捕。但工人並沒有因此停止抗爭，而是繼續留在工廠所在的新蒲崗駐守，也引來了普通群眾圍觀及左派群眾前來慰問。5月9日，工友再次出動佈置糾察線。

這個重新佈置糾察線的做法，其實是非常不尋常的。作為當時長期跑工運場合的新聞工作者的周奕，在訪問中跟我說：「一般我們被鎮壓都不會繼續對抗。這是一貫的作風：另開新的戰場。但這一次我們沒有，而是繼續出。而我大吃一驚。」⁵³這次重新佈置糾察線，相信除了是工友自發，也是在工聯會高層允許下的行為，根據周奕的回憶，當時工聯會秘書李慶寧是在場坐鎮的。而這種小小的進取行為，一開始或許只是比較先鋒的工友及高層的工會領導，因為大陸文革或澳門一二·三事件帶來的啟發而出現的一次小改變。但參與其中的普通左派群眾，卻被此改變的勇氣所感染，周奕說：「那天出了兩個小時，信心都回來了……這一切，都和過去不一樣。」也就是說，一小部份的群眾開始充權了：群眾感覺到在面對敵對的權威時可以自強不息地進取的可能。而這種充權的感覺，並不只是腦中一些勇氣的靈感冒現——就像他們隔著報紙看到一二·三事件或文革的時會有的小小的震動——群眾在重新佈置糾察線這種實作中，在身體上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解放感，以至於內內外外都體驗及攢取了充權的美妙和造反的激動。他們發現，在面對港英鎮壓時，原來是可以正面還擊。這是左派群眾第一次在升級上的小試牛刀。

5月11日，警察再次清場，民眾四散和警察打游擊。一時之間，1966年香港天星小輪加價暴動彷彿重播，警方也因此頒佈了宵禁。這種民眾在四散後還繼續打游擊而不是被鎮壓後馬上收爐的做法，同樣也是左派多年來沒有再做的事。游擊的行動樣態也體現了群眾的自發性：因為除非經歷過系統化的訓練，要不然街頭游擊實際上是無法被組織的，各自在街上的人其實都在臨場發揮和應變。這次街頭游擊得以發生，也有賴群眾的自覺與巨大的動力。這是左派群眾第二次在升級上的小試牛刀。

⁵² 馬繼森，〈「總部」和「攀險峰」的誕生〉，《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163-69。

⁵³ 周奕，私人訪問，2019年1月16日。

這一夜，催淚彈和防暴木彈亂發，警察更打死了一名 13 歲的男子。雖然這男子並非左派，只是路人，但有人被打死一事，是一個尖銳的事例，顯示出鎮壓的力道。左派民眾因此更為憤怒，5 月 12 日，有無組織的左派群眾（或更準確來說，目前沒有任何證據指明這次事件有經過左派組織）對黃大仙公務員縱火。儘管沒有人員傷亡，但足以顯示一般左派群眾對警察鎮壓的憤怒。這是左派群眾第三次在升級上的小試牛刀。

一般來說，在此之前，如果左派群眾有這種升級行為，港澳工委及聽令於港澳工委的工聯會都會連忙制止，並且迅速把工潮導向勞資糾紛的方向。然而，這一次港澳工委並沒有立刻叫停事件，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祁烽甚至讓金堯如幫忙著力報導，支持抗爭。⁵⁴國務院外辦的吳荻舟則表示：「聽了關於 11/5 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份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我同意 X 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⁵⁵這段話說明了兩點：第一，六七暴動的發起並非由上而下地安排，而是群眾自發後得到了港澳工委及外交部的首肯；第二，外交部之所以同意香港左派群眾自發的鬥爭，是認為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份，而受到造反派監督及制約的外交部，也不好叫停這些「香港的造反派」。

工聯會幹部眼見無論上級領導還是下層群眾都在往升級的方向走——左報一致升溫、自身在前線與小部份激進的左派群眾同行時也感覺到越戰越勇的充權威——工聯會於是於 5 月 12 日成立了「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要知道，工聯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這種左派內部就著抗爭事件相互連線的做法，雖然以前曾經出現過⁵⁶，但也有不尋常之處。儘管左派在五〇年代初期比較活躍，但經歷了 1949 年港英政府因左派成立「港九各界慰勞人

⁵⁴ 程翔，〈六七暴動的發動及進程〉，頁 49。

⁵⁵ 程翔，〈1967 年聯辦工作情況〉，《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頁 487。

⁵⁶ 慣常之處是在於工聯會在搞工運的時候，經常都會組織慰問團和連結各屬會的支持。譬如，在 1950 年的電車工潮，工聯會也是有組織其他三十八個青年團體對電車工人舉辦慰問大會⁵⁶，而 1957 年的海軍船塢閉廠鬥爭中及後也是有動員除了海塢工會以外的其他的工會屬會前來聲援，可見 1967 年工聯會發動跨團體的支援連線，本身是很符合工聯會做工人運動時的戲碼（repertoire）。見周奕，〈羅素街血案〉，《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頁 115；周奕，〈海塢閉廠與大躍進〉，《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頁 158。

民解放軍籌委會」而遞解左派人士出境⁵⁷、1950 年港英政府因「廣州市總工會籌備處」發表支持香港電車工潮中的公開信而遞解本地工運人士出境⁵⁸、1952 年港英遞解「東頭村災民代表團」相關左派人士出境等⁵⁹，此後本地左派比較少大動作的抗議和組織。遞解出境的意思是港英政府可以根據 1854 年公佈的《遞解出境條例》，將「港英政府認為不能容留在香港」的「不是本港土生土長者」遞解出境；而 1949 年後的《驅逐不良分子出境條例》，甚至把驅逐出境的範圍擴大和細緻化，「在隧道洞穴或在公地搭蓋木屋居住的人；或在任何不合法的建築物居住，或在衛生幫辦宣佈為不合衛生的地方居住的人，上述各種人物，苟其不能證明他可能取得正當的房子居住，即為不良份子」，甚至「可能變為流氓、乞丐或將加重公私慈善團體負擔的人」等都可以被遞解出境。⁶⁰這個「莫須有」的罪名可以有效針對各種政治組織中的關鍵人物，打散各種政治性組織，以起到鎮壓政治性活動的效果。從 1952 年後左派傾向採用比較溫和的行動可見，港英政府的遞解出境手段是非常奏效的。譬如，在 1957 年的海塢閉廠抗爭中，左派的工聯會雖然也發動有連線的抗爭，其名稱也是非常沒有政治性的，只是叫作「支援海軍船塢工友爭取合理解決閉廠出任事件委員會」，並沒有把矛頭指向港英政府。⁶¹也就是說，1967 年 5 月 12 日工聯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其實是打破了左派自 1952 年後保守溫和的行動風格：把矛頭不只指向資方，也指向港英政府。以措辭之激進性而言，這是在 1952 年以後都未曾出現過的一次「小試牛刀」。

不過，我認為，這次「小試牛刀」其實還沒正式走向反殖、反帝的意識。四大訴求儘管措辭嚴厲，反對港英也只是在於反對他的處理手法而已，還沒上升到定性港英為「法西斯」或帝國主義的地步，也因此還沒有要反對他存在的正當性，到達反帝、反殖、反英的地步；這次連線的升級，主要是態度上的升級而已。

⁵⁷ 周奕，〈兩次反共高潮〉，《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頁 123。

⁵⁸ 周奕，〈兩次反共高潮〉，頁 115。

⁵⁹ 周奕，〈兩次反共高潮〉，頁 125。

⁶⁰ 張連興，〈堅尼地〉，《香港二十八總督》（香港：三聯書店，2012），頁 115；張連興，〈葛量洪〉，《香港二十八總督》（香港：三聯書店，2012），頁 295。

⁶¹ 周奕，〈海塢閉廠與大躍進〉，頁 158。

2-4-2 《人民日報》與外交部罕見地對香港抗爭開綠燈：鬥委會正式成立

5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同日，中國外交部罕見地對香港的工人運動發表聲明，把矛頭指向港英，要求港英（一）接受工人和居民全部訴求，（二）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三）釋放被捕人員，（四）嚴懲兇手、道歉、賠償，（五）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共五大訴求；這和「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四大訴求，也就是：（一）立即停止血腥鎮壓，保證今後不再發生同樣鎮壓事件，（二）立即釋放被捕的中國工人、學生和同胞，（三）嚴懲兇手，賠償一切損失，（四）港英當局必須賠禮道歉，是非常相似的。⁶²不一樣的是，中共外交部把港英對左派的鎮壓定性為「法西斯行為」，並且沒有重申「賠禮道歉」。而「法西斯行為」的定性，更是直接的針對港英政府的帝國主義性質。在中國和香港的脈絡中，很自然地會讓人聯想到抗日戰爭中對抗日本法西斯的修辭，也挑動起了一種反帝愛國的情懷。這篇無疑是一次積極且正式的回應。

工聯會在5月12日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時候，或許也沒想過這一次試水溫會得到中共中央（其實是更多是造反派推波助瀾）的積極回應。因為自1952年以後，香港左派在做抗爭的時候已經許多年沒有得到過來自大陸如此直接、激動和官方的鼓勵。因此，對時勢之改變具有敏銳度的本地左派報紙都在頭版轉載了外交部的聲明。甚至，在此後，香港左派還把一系列《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編成書。⁶³也就是從此時開始，造反派對外交部，以至於造反派對香港的影響，終於散播到了本地左派的上上下下，而不再只是被一小群工委和左派組織的領導人物所意識到。

此時，左派圈子的每個角落，都感覺到了同心圓核心對港政策的鬆綁，彷彿一切抗爭都被開了綠燈那樣。周奕因此表示，這對於左派民眾來說，是很新鮮、很驚人的一件事，他說：「文匯報〔以前〕的指示其實是以反美為主……當《人民日報》表示要反英的時候，我們是很吃驚的。但石頭是不會孵化成雞。」⁶⁴也就是說，當時的左派民眾是感覺到了很大程度的不尋常；但同時，他也感覺到，在之前的工潮中，群眾

⁶² 兩個版本的訴求，見張家偉，〈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頁39-68。

⁶³ 許崇德，〈攻心為上：香港政府應對「六七暴動」的文宣策略〉，《二十一世紀》147期（2015），頁68-69。

⁶⁴ 周奕，私人訪問，2019年1月16日。

早已有了反英的意識，只是這一刻這些意識終於有了正式萌芽的出路，就像雞蛋終於孵化成了雞一樣。另一個贊成「石頭是不會腐化成雞」的證詞，是來自工聯會副理事長潘江偉在 2013 年的發言：

1967 年導致反英抗暴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們時常遭港英鎮壓，港英警察貪污腐敗，與小販、基層發生矛盾，相當尖銳；二、是受極左思潮影響，人人期望因此而有所改變；三、是受澳門 12.3 事件影響，加上一批又一批人到澳門學習，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四、原本工會上上下下也想鬥一鬥。⁶⁵

我認為，這一段的重要性是在指出，有許多對港英的反感的情感條件，早在 1967 年以前已經存在；但受到了造反派在《人民日報》上「開綠燈」、外交部「鼓勵」和一二三事件的啟發，使得工聯會從上到下都希望真正發動更大規模的抗爭。

因此，左派於 5 月 16 日——也就是《人民日報》發表支持及外交部發聲明的第二天——就沿用了之前在慶祝國慶時會用到的聯絡作為藍本，動員了各左派機構成立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並且開始一輪又一輪的示威抗議。鬥委會此時又稍微更新了自己的四大訴求，分別為（一）立即停止一切非法的逮捕、審訊、判罪、毒打刑法等「法西斯的血腥鎮壓行動」，（二）立即宣佈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同胞，（三）嚴懲這一血腥暴行的兇手，向受害者道歉，並賠償一切損失，（四）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⁶⁶對比起之前的四大訴求，此四大訴求的特色是在於沿用了外交部「法西斯」等詞語，並且把被捕人士說成是「愛國同胞」。鬥委會的成立，左派上下正式把從先前對港英比較曖昧的路線，透過對港英「法西斯」的定性，推向了明刀明槍地反殖、反帝、反英的路線。

2-4-3 港督府的遊行與大字報：一次群眾自發的行動

之後就是連日、連串地到港督府的遊行示威。曾參與其中的蘇婆婆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去港督府示威，一群人一隊接著一隊去示威，沒有停的。每個單位都派人去。就在港督府面前，銀行街，政府組織前面示威。共產黨的手法很厲害，可以鼓動

⁶⁵ 香港工會聯合會，〈第二部份專題訪問〉，《工聯會與您同行：65 周年歷史文集》（2013），頁 170-71。

⁶⁶ 張家偉，〈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頁 59。

到你團結一起，一條心去做。」⁶⁷此外，這些遊行示威和之前的游擊、佈置糾察線等抗爭模式不一樣，對一般左派民眾來說，是門檻比較低的行動：遊行示威並不一定需要肢體的衝突，又沒有太實際的危險，因此是左派上下不論老幼都可以去體驗的抗爭滋味。這種在官府前喊出自己的訴求、用大字報把官府的牆壁重重包圍的做法對許多左派群眾來說既有輕微的腎上腺素的飆升，但又沒有實際的危險，成為了左派群眾一次獨特的、充權的政治體驗，是一趟種反叛意識的覺醒之旅：這對於從前被安排在韜光養晦位置的一般左派民眾而言，是會體驗到一種以前沒經驗過的積極的快感。參與其中的周奕，也提到了看到港督府被大字報包圍的震撼。⁶⁸



圖 4：1967 年被大字報包圍的港督府（圖片來源：「頭條日報」網站，<https://bit.ly/38NNv4u>）。

5 月 22 日，港英在港督府附近的花園道鎮壓左派的示威群眾，也就是左派口中的「花園道血案」。而到了 5 月 23 日，梁威林召開會議，帶來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消息並正式宣佈：（一）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批准發動「反英抗暴」鬥爭，並批准成立

⁶⁷ Elsie Chen、Mike Ives，〈香港六七暴動的親歷者看「反送中」〉，<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920/hongkong-north-point-1967-riot/zh-hant/>（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⁶⁸ 周奕，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16 日。

「香港各界通報反英抗暴委員會」；(二)外交部西歐司與國務院外辦成立了「香港反英抗暴鬥爭聯合指揮部」，直接受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領導；並且定性這是一場「反帝反殖的革命鬥爭、是一場香港前途和命運攸關的革命鬥爭」。而會議上有出席的包括「一月風暴」奪權的造反派鄭偉榮，金堯如認為，是他帶來了中央文革的指示。⁶⁹由事情發生的順序來看，六七暴動的發展其實是群眾先領頭，然後才有工委及大陸的官方回應，卻也是奠定了反殖、反帝、反英的路線。

2-4-4 六三社論：《人民日報》跳過外交部對香港直接喊話

1967年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社論，又叫「六三社論」，文章表示：

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想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戰鬥吧！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港九愛國同胞們，英勇地戰鬥吧！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偉大勝利的祖國千百萬紅衛兵支持著你們，億萬革命群眾支持著你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七億中國人民，誓作香港愛國同胞的強大後盾。⁷⁰

根據馬繼森的回憶，這篇社論是根據王力講話起草的，不是來自於外交部的決定。⁷¹王力是屬於造反派，而這篇文章也繼承了造反派激進的風格。至於為何造反派得以繞過外交部直接對香港的左派群眾喊出直接支持抗爭的話？首先，王力實際上是有把稿子先透過外辦的港辦人員給周恩來過目，但周恩來並沒有叫停。⁷²我理解，這是因為之前在外交部替代陳毅主抓香港事務的周恩來，此時正被造反派的「批陳」行動牽連。在周恩來被認為是在包庇陳毅，外交部革命造反派總部正貼出了大字報，指責周恩來反革命的情況下，⁷³外交部上下沒有人敢輕舉妄動做出和造反派對抗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當時的《人民日報》的位置已經是在領導著國家機關改變的

⁶⁹ 程翔，〈六七暴動的發動及進程〉，頁 50。

⁷⁰ 《人民日報》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收入張家偉編，《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1967〕），頁 255-58。

⁷¹ 馬繼森，〈六三社論〉，《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224。

⁷² 馬繼森，〈六三社論〉，頁 224。

⁷³ 馬繼森，〈「總部」和「攀險峰」的誕生〉，頁 172。

方向，而不是受制於其他部門，所以要叫停《人民日報》實在是很敏感的做法。所以造反派之所以可以發表的對港言論，甚至跳開了外交部一向的對港的「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框框，正是因為外交部內外都受到了造反派牽制。這篇評論也象徵了造反派正對香港左派群眾直接喊話和發號指示。受到《人民日報》「六三社論」的鼓舞，普遍的香港左派群眾又再一次被打了一劑強心針。5月尾的花園道鎮壓留下的陰影此時也被一掃而空。

2-4-5 被激進化的群眾在政治訴求上的挪移

一些研究六七暴動的人都認為，在此以後，這場運動的目的已難以被了解：到底反抗是為了什麼目標？有什麼訴求？譬如，程翔曾說：「筆者細心閱讀了《人民日報》、《大公報》、《文匯報》所有社論、評論；和鬥委會主任楊光的多次發言，都沒找到有任何文宣明確指出這場運動目的何在，最高目標和最低目標是什麼等等。文宣的主要內容是譴責港英，雖然想『港英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這類口號比比皆是，但是不是只要收回香港亦沒有進一步說明。」⁷⁴面對這種質疑，其實曾經歷過的當事人都會有不同的說法。譬如，鬥委會的周奕對程翔的說法就予以反駁，他說：「鬥委會就是有具體要求的」，但也同時對我篤定地說：「沒有人想過會解放。也沒有人和我說過。新界的群眾組織的領導人都沒有和我說過。」⁷⁵另一邊廂，曾於六七暴動期間在國貨公司工作的蘇婆婆則說：「我們上班，每天都在公司值班保護公司，在公司睡。一開始我們很威風的，我們以為解放軍要解放香港了，中共的解放軍到關口了，隨時可以解放香港了。我們把廣告貼在門口，目標特別突出這是左派。我們以為很威風，就快解放了，是我們的世界了。」⁷⁶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被捕人士——也就是 YP（young prisoner）在與我吃飯閒聊時，就說曾想過「五星紅旗飄揚在香港」、「港英政府像澳門低頭認錯」等運動訴求和目標。

由此可見，其實參與其中的當事人對於六七暴動的最終訴求為何，都有不一樣的感受。有的左派並沒有認為會就地解放，只把運動目的務實地定在鬥委會的書面訴求，但也有的左派則有一個錯誤的印象：中國大陸會無條件支持香港的抗爭——雖然

⁷⁴ Elsie Chen、Mike Ives，〈香港六七暴動的親歷者看「反送中」〉，<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920/hongkong-north-point-1967-riot/zh-hant/>（檢索日期：2021年9月1日）。

⁷⁵ 周奕，私人訪問，2019年1月16日。

⁷⁶ Elsie Chen、Mike Ives，〈香港六七暴動的親歷者看「反送中」〉。

怎麼支持並不知道——但總之就是會支持到底，所以就意味只要一鼓作氣即可終結殖民主義及彌補先前在生活中或在多輪抗爭中受到的委屈，解放了的話鎮壓後也會被平反。不過，其實就算準確訴求在當時為何，已經不是重點了。譬如，周奕也補充了當時抗爭背後的心情：

在反英抗暴時，屠刀都殺到來了，只是想著要反抗，只是看到警察一直拉人，很兇狠。已經不想什麼長期利用或收回香港的問題。當時根本沒有想後來怎麼樣的，只是想著反抗。⁷⁷

也就是說，在左派群眾眼中，訴求已經不是重點了，重點是在於要繼續行動——而這是由於先前被鎮壓的憤怒。也就是說，雖然準確來講，作為領導運動的鬥委會，當然是在先前已經羅列過訴求——這是白字黑字，無須「感受」的事實。然而，到了「六三社論」以後，其實要求那些白字黑字的訴求被達成已經不是運動的主軸了。這時的六七暴動其實也和文革更為貼近了——也就是沒有了形式主義的訴求。所以，到底左派心中是怎麼設想著六七暴動的終結和六七暴動的目的？我認為，不同的左派都是心裡在猜測，並不清楚，但也覺得先前的訴求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

不過，雖說此時的六七暴動並沒有以達成具體訴求作為運動主軸，但也不代表各人心中沒有片刻想過抗爭成功的路徑是怎樣，只是我認為怎樣達成這個目標、達成這個目標的路徑為何，儘管是一些左派在「六三社論」後會想過的問題，但這個思考很快就會被擱置。因為，他們認為這一點輪不到自己想，因為這是中共去想的問題，他們更認為，當時連《人民日報》都明言會支持到底了，那還會是假的嗎？還有什麼需要擔心的嗎？香港左派當時普遍都以為強大的中共已經想好了香港的後續路徑，他們以為自己只要做好自己的那個部份，一切都會水到渠成，這也使得他們陷入在一往無前的狀態之中。當明確的訴求變得不清晰，同時又覺得達成訴求的路徑並非自己的位置所可以決定，一切關於訴求和路徑之間的關係的思考也會變得無關痛癢。這也使得左派群眾更沒有指標去衡量自己的手法是否和目標一致，讓左派群眾此後在升級時並沒有「度」。就如同曾參與六七暴動的陸德成所說：「這件事搞到咁〔那麼〕大，既有內因亦有外因，外因乃北京政府的態度，中國政府發表過聲明說政府對香港同胞要付

⁷⁷ 周奕，私人訪問，2019年1月16日。

出責任、做出支援……當時為何我們又會搞到咁〔那麼〕激呢？有一個心態，『話知佢』〔不管那麼多了喇〕。⁷⁸而且，在經歷了新蒲崗鎮壓、港英警察槍殺示威者、花園道血案等事件後，身陷其中那又憤怒、又委屈的香港左派群眾的人心，已經不是說港英回過頭來說答應鬥委會的訴求就可以解決、收買、或安撫。此時，一種「訴求」的語言也已經無法捕捉他們的心情，受傷的情感已經超越了可以被任何訴求承載的地步。⁷⁹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運動貌似沒有目的——那是因為運動在此後已經不再依賴訴求的語言為主軸了。此時，不切實際但言之鑿鑿的、高昂激烈但理想虛浮的語言，才有足夠大的韌性去包裹超越了理性範圍的憤怒和委屈。以至於，儘管香港的左派未必真的知道大陸會否以什麼具體的措施——譬如派軍支援或宣佈提早收回香港——去支持香港的抗爭，「六三社論」那又篤定、又激動、又其實沒有實質內容的預言，足以讓最憤怒和最委屈的左派從之前的受傷感中解脫出來。此時，左派群眾被一種膨脹的自信感所填充：以為自己是有千軍萬馬在背後支持，而因此將無所不能。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之後的左派的反抗手法會一致持續升溫。但在此補充幾句：也是從這時開始，群眾被充權的感也逐漸從自己實作和實能的基礎上脫離。他們對抗爭成功的圖像的幻想是有大陸出手，所以並不是靠自己來，而是靠大陸來。這也是香港左派和大陸造反派的不同，香港左派並不真的相信自己的力量，但大陸造反派是真的相信自己一代的力量足以改變中國和世界。

⁷⁸ 李詩聰、梁可欣、田曉彤、溫秀倚、湯澤恆，〈陸德成訪問〉，收入李詩聰編，《六七暴動：工會運動的分水嶺》，（香港：迦密柏雨中學，2010）。

⁷⁹ 請允許我借用我在 2019 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的一個感受與之平行地對讀一下：為什麼儘管林鄭月娥已經宣告了《逃犯條例》的修例已經「壽終正寢」，示威及暴動的浪潮依然繼續升溫？那是因為後續的抗爭的動力引擎，再也不是條例本身，而是在於反抗因為這次修法而暴露出來的具壓迫性的結構，以及抒發對警察及結構的憤怒。因此，儘管修例已經暫停，那種憤怒是無法因此被安撫的——因為警察還在打人、政府的結構還是沒有改變。我認為，在「壽終正寢論」發表以後，五大訴求在街頭的作用，不過是一個讓自己出師有名的說法——真正激起讓人街頭怒飆的高濃度的勇氣，是來自一種憤怒和一種渺茫的希望感。每次聞到催淚彈和聽到橡膠子彈的發射聲音的時候，閃過在我腦海的是：這個政府一直以來怎麼擱置人民各種民生和民主的訴求、是怎麼不近人情地表示不會撤回條例，同時，我也會有一種受傷感和被騙感，會想到一些人自殺了、被捕了、受傷了、入獄了。但平衡在這些負面情感，我也會想到抗爭成功的一天，大家怎麼摘下防毒面具在「煲底」（政府總部樓下）相認和道賀。這一切情感和畫面都是很濃烈的，濃烈得我會覺得沒有什麼具體訴求可以承載得住、或說有什麼目標達成了我就可以當什麼讓人悲憤的事情就沒有發生過。我甚至沒有辦法明言，要具體怎麼做、採取什麼路徑、什麼手段，才能讓大家有在煲底下相認的一天。我雖然並不是本土派（更準確來說，在本土派越發右傾的當下，我說我是本土派也沒有人會同意），但我卻認為，我是理解在那種濃烈的情感驅動是如何總是溢於一切具體的訴求；而正是因為情感過未濃烈，以至於那看上去沒可能在現實中透過暴動而達成的「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登天式訴求，或一點都不具體的「光復香港、世代革命」的口號，或「煲底見」這種抽象的烏托邦畫面，反而才能捕捉得住這種情感。抗爭者都需要更為有彈性的、抽象的、激昂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口號和類訴求，才能承載得住那個情感不至於總是溢出。

2-4-6 聯合罷工開始

6月10日，左派政軍醫工會、海事處工會、郵政工會及水務工會，和牛奶公司、天星小輪等英資企業鬥委會發動聯合大罷工，並在《告政府職工書》表示：「我們有千百萬紅衛兵的支持，有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解放軍做後盾，有七億偉大中國人民做靠山，有偉大領袖毛澤東撐腰。我們反迫害抗暴鬥爭一定勝利。」⁸⁰從此行動聲明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六三社論」的措辭——特別是對紅衛兵、中國人口及毛澤東的威力的強調——不一樣的是加入了解「解放軍的」部份，可見香港左派的激進化和誤認解放軍會介入有關。但無論是「支持」、「做後盾」、「做靠山」、「撐腰」等詞語，其實都是模糊和比喻性的用字，這也是表示了當時的左派並不真的可以明言到底中共或造反派將以什麼形式介入六七暴動。此外，我們也可以從這一次罷工的失利（譬如，九成郵政署職員準時報到⁸¹）看到，此時的六七暴動主要是由一小群被《人民日報》激進化了的左派所領導，但其影響力並未擴展到一般民眾。此時的香港社會，已經看到撕裂的痕跡：左派在在目睹同伴被捕、被殺，而陷入悲痛，同時被《人民日報》鼓勵而陷入認為該拼死反抗的情緒；但其他非左派民眾，既不看左報、又不需要面對港英鎮壓，他們猶如在平衡時空那樣，看著激動的左派，他們普遍冷感。可是，此時的左派都處於身心狀態極度高昂的地步，都覺得中共或造反派會讓一切會水到渠成，也沒有覺得自己需要用心疏理和處理與一般民眾的差距。

不過，當罷工和行動一直升級，一般民眾還是會因為有被影響，而有了一些轉念的契機。譬如，在6月23日，港英警察在九龍旺角清理大字報時，就與左派示威者發生衝突；雙方雖然都有動武，但左派完全不是防暴隊的對手。許多剛好在旺角換班的九巴司機（雖然並不都是左派），剛好就目睹了這場鎮壓。而剛好，6月24日就是左派本來預定的、發動全港的聯合大罷工（罷市、罷工、罷課）的日子。因此，根據鬥委會的周奕回憶：「在26路罷工工人之中，參加最多的是九巴工人，參與率有90%。巴士工人收入雖然不算特別好，但其實是職業穩定，在打工仔之中算是好的。而他們的工會參與不到一半，那為什麼他們會參與呢？那是因為罷工前一天的下午武裝進攻塑膠業工會，在新填地街，他們上下班交班時間目睹了英國的催淚彈，所以巴士工人自覺不接班。工人問：『為什麼不是今天罷工？』他們甚至是提前半日參加罷

⁸⁰ 張家偉，〈《人民日報》「六三社論」及左派大罷工〉，《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頁91。

⁸¹ 張家偉，〈《人民日報》「六三社論」及左派大罷工〉，頁92。

工。工會書記當時都傻眼了。」⁸²可見，除了六三社評對左派人士是很有號召力外；對一般人來說，則是要看到港英警察鎮壓的模樣才有機會響應左派的號召——也就是一種機緣巧合。在左派沒有渠道或心思去細細說服一般市民的當下，這次三罷其實並沒有很成功：三罷並沒有讓香港陷入癱瘓，使得港英因此低頭；這使得三罷帶來的不便，首先是激化了一般民眾對左派的厭惡：一般民眾開始認為左派的所作所為霸道、自私。加上左派在宣傳上一向渠道不廣、都是圈地自萌，而在宣傳三罷的正當性時也並不夠細緻，而是多以激進高亢的語調，以非此彼、非友則敵的二元論指責所有反對三罷的人為「黃皮狗」，這也讓一般民眾出於不甘（覺得被冤枉）、壓力和恐懼（怕被左派說成是港英的附庸）而有所反彈，更加討厭三罷——三罷也因此被一般民眾說成是左派一次「自食砒霜」的行為。⁸³而這種對左派反感的情緒，更因為後續市面出現的炸彈陣而被點燃。

此外，不但左派與一般民眾分化越烈，左派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我們不妨從他們在罷工的表現中看出這端倪：首先，工會是有給工人發放罷工津貼的（但比工資略少）；而罷工期間，工會因此會組織無所事事的工人學習；但是，工人學習中就分成了兩派：第一派激進的左派依然是處於高度憤怒和悲傷之中，覺得學習不夠激進；第二派沒那麼激進的左派因為集體主義的慣性而參與罷工，同時對先前幾個月的長期抗爭感覺疲憊，他們都趁著罷工的時間休息，對拿津貼喝茶的慾望遠遠大於組織學習。積極的左派和消極左派雖然並沒有真的衝突，但兩派此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前者因為覺得學習死板保守，並不符合繼續升級的慾望，同時覺得自己什麼都沒做就領取了津貼，有愧於黨，所以衍生出自行升級、自發激進化的慾望。7月2日，左派宣佈罷市結束。

2-5 六七之轉：武裝化與大陸文革造反派的武裝化

2-5-1 大陸造反派的武裝傾向

儘管造反派於4月得到了「二月鎮壓」的平反，但造反派與軍隊之間的關係依然持續緊張。而造反派中的一些激進份子由於有被鎮壓的經驗，於是試圖建立自己的群眾武裝。7月20日，甚至有造反派在武漢搶軍隊的槍，並且認為自己是奉王力之

⁸² 周奕，私人訪問，2019年1月16日。

⁸³ 張家偉，〈《人民日報》「六三社論」及左派大罷工〉，頁99。

命；剛好毛澤東在武漢視察，軍隊不爽自己被造反派搶槍，更是包圍毛澤東的住所「軍諫」——這也就是著名的「七二〇事件」。⁸⁴然而，在 1967 年 7 月到 8 月，毛澤東依然推崇「文攻武衛」，並提出了「武裝左派」和「群眾專政」兩大口號去利用造反派推動文革，全國武鬥頻頻升級，錢理群更形容這「形成全國範圍的全面內戰」。

85

武裝激進化的狀態不但影響了內政，也影響到外交。一方面，這是因為激動的造反派群眾用了武裝的方式於國內回應外交問題，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外交路線上也更傾向於輸出革命。譬如，毛澤東和林彪在 7 月 7 日接見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會議的代表時，就發表了〈中國應該成為世界的兵工廠〉的講話。毛澤東說：

目前許多地方反華，形式上好像是我們孤立，實際上他反華是害怕中國的影響，怕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反華是為了鎮壓國內的人民，轉移人民對他統治的不滿。這個反華是美帝蘇修共同策劃的，這不表示我們孤立，是我們在全世界影響大大提高。他愈反華愈促進人民的革命。這些國家的人民認識到中國的道路是解放的唯一道路。我們中國不僅是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軍事上、技術上也要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給他們武器，就是刻了字的武器（除一些特殊地區）也可以。就是要公開支持，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⁸⁶（黑體為筆者所加）

也就是說，在 7 月開始，毛澤東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國外都是趨向於武裝革命。而這種在國內外都鼓勵武鬥的做法，也導致了各種外交衝突。譬如，6 月 18 日北京有紅衛兵和各界群眾湧入印度駐華大使館，砸毀大使館部份設施以抗議印度在中國邊境的武裝。7 月 3 日，北京各大群眾組織也在故宮午門召開了十萬人的抗緬大會，聲討緬甸政府；會後大批群眾湧向緬甸駐華大使館，砸了大使館的一些設施，呼應韓念龍副外長抗議緬甸政府唆使暴徒「連續襲擊我國使館，殺害我專家，迫害我僑胞」。8 月 5 日，北京以大中學校紅衛兵為主的群眾組織和各界群眾在抗議和示威遊行後砸了

⁸⁴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頁 58。

⁸⁵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頁 99。

⁸⁶ 卜偉華，〈文革中的外交極左問題〉，《二十一世紀》95 期（2006），頁 38。

印尼駐華大使館，以回應「抗議印尼軍警包圍、封鎖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武裝劫持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徐仁的嚴重事件」。⁸⁷可見大陸的造反派的行動是越發激進。

2-5-2 香港極左派的暴動傾向

大陸造反派的行動上的激進和他們的論述也是一致的。7月5日，《人民日報》第二次發表了對港的社論，題為〈放手發動群眾，進一步壯大反英抗暴隊伍〉，對比起「六三社論」，除了鼓勵群眾下而上的自發行動，更隱晦地提到了武裝和殺警的正當性，社論說：

對於那一小撮英國殖民主義者和那些罪大惡極、怙惡不悛，甘心充當敵人的劊子手的鷹犬，香港同胞完全懂得怎麼去處理他們，那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要嚴厲制裁這些壞傢伙，殺人要償命，血債要血來還。⁸⁸

此社論此外還提到「英帝國主義是困獸猶鬥，它們的壽命已經不長了」、「擺在香港愛國同胞面前的任務，就是再接再厲，把這場反英抗暴鬥爭堅持下去，奪取偉大的勝利」。⁸⁹這無疑給予了本地左派群眾更多的激勵，並生出了以暴制暴的念頭——極左派就開始行動了。7月8日，數百名示威者與港英警察爆發衝突，土製炸彈首次出現。而《人民日報》在7月9日以「英帝屠殺我七名同胞，血債必須血償」為題，報導了這次事件。這兩次連續的激勵，使得想著自發升級的極左派群眾更加樂意武力升級。而最簡單的武器，就是製作土製炸彈及暗殺。

當然，這些社論和報導之所以會在《人民日報》出現，是要結合整個當時大陸的造反派武裝化的趨勢來看待的。但《人民日報》對香港左派群眾再一次的直接喊話，也是反映了造反派如何跳過了外交部對香港的把控——這也是為什麼先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被偏擺了。

然而，香港的極左派看到這標題時，其實並不了解《人民日報》與外交部之間的差異，就得到了錯誤的訊息。香港極左派並無法理解大陸正處於權力分散的狀態，也

⁸⁷ 卜偉華，〈文革中的外交極左問題〉，頁 39-41。

⁸⁸ 周奕，〈反英抗暴之真假炸彈〉，《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訊，2017），頁 303。

⁸⁹ 人民日報，〈放手發動群眾，進一步壯大反英抗暴鬥爭隊伍〉，
https://hk1967.org/beijingviews.asp?this=670705_1（檢索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無法理解造反派與外交部的矛盾，而這就讓他們再一次以為中央在著香港往暴力方向升級後，就會出手讓港英低頭。所以，當極左派群眾的土製炸彈和暗殺，並不是出於對行動和目的之間的關係有全盤的理解和方向（因為目的之達成，並不完全取決於自身的行動，而是在於中共會怎麼接著部署），而是因為以為暴力升級是有中共的部署在背後支持的（雖然《人民日報》的造反派正當權，但他們不知道造反派與外交部、宣傳組、軍隊之間並不完全一致，造反派所得到的權力是有限的）。從 7 月 9 日晚上開始，香港街頭出現了許多真真假假的土製炸彈（又叫「菠蘿」），有一些是少數極左派聚合起來「有組織」下製作的，是通過組織批准的，有一些則是特立獨行地製作，組織根本不知道。⁹⁰當時的「菠蘿陣」有多猖獗？譬如，在 10 月 13 日英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抵港訪問一天，真假「菠蘿」就達 200 多個，港英軍警一死七傷。⁹¹另外一起比較突出的事件則是 8 月 24 日的火燒林彬事件，一名著名的反共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於開車上班途中遭暗殺。⁹²一般市民則是對「菠蘿陣」及暗殺感到非常恐懼，認為「左派=恐怖份子」——而「菠蘿陣」也成為了一般人對六七暴動最鮮明的記憶。

許多人以「菠蘿陣」去為六七暴動定性，並結合對傳統本地左派長期集體主義的認知，穿鑿附會地認定左派是有組織、有預謀、由上而下地發動暗殺及炸彈攻擊這種恐怖主義動行為。然而，其實暗殺和做土製炸彈剛好是一種去組織、去中心化的行動模式；如此危險和高風險的行為如果依賴過於龐大和笨重的組織形式，在鎮壓勢力太強的環境下反而會容易被揪出一個人後全團覆沒。我們不妨將暴動和罷工兩種行動模式當做是一個連續的光譜，街頭暴動和暗殺是更個人主義的、有賴自發，組織規模需求小，講求靈活變通；罷工是更集體主義的，有賴組織，組織規模需求大，講求合作互助。這也是為什麼對個人自發更為推崇的無政府主義會有暴動和暗殺的傳統；而對組織更為推崇的社會主義在歷史上更傾向於罷工這種行動模式。那在六七暴動的案例中，諸如炸彈襲擊這種暴動行動，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其實是在回應和補充罷工這種集體主義行動的失敗：當罷工不能為群眾帶來反抗的滿足感（無論是達到充權，還是達到訴求或目的），群眾如果有被鼓勵自發（譬如《人民日報》的社論和報導），就會選擇脫離罷工的組織的肌理，以更彈性、輕盈、快速、低成本但高姿態的方法行動，那有什麼比炸彈、暗殺更高姿態呢？這就形成了極左派的暴動。

⁹⁰ 周奕，〈反英抗暴之真假炸彈〉，頁 307。

⁹¹ 周奕，〈反英抗暴之真假炸彈〉，頁 308。

⁹² 周奕，〈反英抗暴之真假炸彈〉，頁 309。

激烈的行為除了是源自於自發性高的群眾，另一方面也和群眾無法與左派領導取得聯繫有關。事實上，當時的左派組織幾乎陷入癱瘓，根本無法完全拉得住群從去停止或發動炸彈襲擊——而這是因為港英政府此時正大量搜查左派組織，左派群眾根本無從用以前的方法組織起來聽從領導的指示。譬如，7月12日，防暴隊突襲左派港九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和香港巴士分會；7月14日，圍攻九龍船塢勞工聯合會及紅磡勞校；7月16日，突襲九龍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搜查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福利部、太古車糖工會福利部及五金業總工會香港支部……類似的事情，一直發生。⁹³此後，就算工委、鬥委會或工聯會想要拉住炸彈襲擊，這些訊息也是不可能下達到極左派群眾那裡。鬥委會副主任黃建立在接受張家偉訪問時就表示：

本來鬥委會在準備（在鬥爭中）知會，但港英頒佈緊急法令後，對集會做出嚴格限制，三個人聚頭開會也屬違法，鬥委會無法有效運作。我們連會都開不了，還談什麼指揮？結果大家各自為政，事態發展端視各界負責人如何行事，這樣對港英也沒有好處。⁹⁴

而同時，我在自己進行的私人訪問中也從周奕處聽到了和黃建立一致的看法，周奕說：

當時沒有什麼紅頭文件，也沒有什麼聯絡，當時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所以那期間各個小組都獨立作戰。在九龍，我們分成三個小組採訪，各自找地方住宿和辦公，白天利用商業電話聯絡。主任會知道我們在哪裡，但是我們每三兩天就換一次，避免警察追捕。那是高度敵我鬥爭、高度地下鬥爭的狀態，很莫名其妙。⁹⁵

左派趨向地下化、邊緣化和零散化的組織樣態，其實是港英打壓左派組織的結果，卻也無心插柳地形成了有益於極左派自發行動被催生的土壤。也就是說，群眾自發地激進化一方面和《人民日報》的鼓勵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和原本的組織秩序在港英政府的鎮壓下潰散了有關。周奕在自己的書中也曾表示過，當時一系列激進行動的

⁹³ 更多關於港英搜查及突襲的詳情，見張家偉，〈沙頭角事件與「真假菠蘿陣」〉，《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頁122-38。

⁹⁴ 張家偉，〈沙頭角事件與「真假菠蘿陣」〉，頁124。

⁹⁵ 周奕，私人訪問，2019年1月16日。

時機和背後的綱領，其實都是「從左派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或消息自行理解」。⁹⁶《人民日報》激進的論調和當時自發的土壤，就使得秘密及危險的行動更容易發生。這也是為什麼而黃建立認為，如果鬥委會能繼續運作，最少可以對局面「稍加控制」。⁹⁷

總結一下：其實就算工委受到外交部牽制，而外交部負責香港方針的周恩來從來堅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但就當時的許多條件——包括大陸造反派把持《人民日報》、《人民日報》跳過外交部對香港喊話、國內造反派武裝化氣氛激烈、毛澤東外交路線激進、香港左派組織被港英政府打散、香港極左派群眾反抗情緒高漲但缺乏組織性而呈現自流狀態、香港極左派無法與上級取得聯絡而只能看《人民日報》去猜測抗爭走向等條件看來，工委對極左派群眾無論是心意還是行動上的把控力都很低，暗殺和土製「菠蘿」等行動也就因此在沒有人下達命令的情況下自發地出現了。而極左派一直看著《人民日報》，以為自己是在得到港共以至於中共的允許下暴力升級，甚至以為最後關頭必定等來中共出手撐腰把港英拉下台：這一等，卻幾乎是等了一輩子。

2-6 六七之合：造反派的落幕、被孤立的武裝極左派

2-6-1 火燒英國代辦處後毛澤東收拾造反派

8月9日凌晨，港英政府根據緊急法查封了《田豐日報》、《香港夜報》和《新午報》共三份左派小報，並拘捕了大量左派領導人及記者。⁹⁸這無疑是打斷了造反派向香港喊話的一些渠道（因為《人民日報》的內容多是要透過本地左報的轉載）。8月20日，外交部發出48小時限時照會——也就是最後通牒——要求港英政府釋放被捕的香港左派。外交部當時的底牌是：如英國拒絕中國外交部要求，就將驅逐英國代辦處負責新聞工作的一個二等秘書。同時，此最後通牒也有被刊登在報紙上，於是，北京第二天就有數萬人參加了聲援中國記者聲討港英當局的大會，這次聲討大會的主要負責單位為首都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聯絡站。最後，這些不知道外交部底牌

⁹⁶ 周奕，〈反英抗暴之真假炸彈〉，頁307。

⁹⁷ 張家偉，〈沙頭角事件與「真假菠蘿陣」〉，頁124。

⁹⁸ 張家偉，〈改寫香港歷史的六七暴動〉，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頁143。

的一般造反派群眾，就在最後通牒結束、港英政府沒有放人後，於 22 日晚火燒英國代辦處。⁹⁹

發生如此激烈的行動，背後實際上是有兩個背景原因的。第一，8 月 7 日，王力發表了著名的八七講話，表示批鬥陳毅的方向是對的。第二，8 月 15 日，《紅旗》和《人民日報》又發表理論性文章〈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明確肯定了文攻武衛的路線，並擬定了右翼和修正主義都是反對暴力革命的「指標」，指出犯了這毛病的都是資本主義當權派：

無產階級的叛徒右翼社會黨人、老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都是以鼓吹議會道路，反對暴力革命，出賣無產階級的利益，來充當資產階級反動政權的裝飾品和幫兇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他們是一路貨色！如果說還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在當時中國的無產階級已經有了一百二十多萬軍隊，並且已經在一億三千多萬人口的地區內建立起人民政權的時候，還要把人民的政權、人民的軍隊雙手交出去。這種大投降，大出賣，就更加卑鄙，更加惡毒！¹⁰⁰

兩起事件加起來，就是代表了造反派正認為自己聽到了號角：一是要擺脫陳毅以前的外交路線，第二則是要有更多的暴力升級。兩起事件加起來，就為火燒英國代辦處開了路。而在這裡必須要提醒的是，雖然在 8 月 7 日，王力曾對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說：「人事也要監督，幹部路線是政治路線的保證。挑幹部就是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沒有這一條，什麼都不行。」¹⁰¹也就是說說放手讓聯絡站批鬥陳毅，但聯絡站的造反派並沒有參與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¹⁰²這次外交上的擦槍走火，是延續了自 6 月開始的群眾參與外交的傾向——和砸印度、緬甸及印尼大使館的做法是有連續性的，但行動上從「砸」變成「燒」，則是受到暴力革命的風氣所影響。而這次暴力事件，也應該被解釋為是造反派「文攻武衛」的群眾運動的實踐，和香港極左派遙遙呼應。

⁹⁹ 馬繼森，〈文革初期的對外關係〉，《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228。

¹⁰⁰ 《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355>（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30 日）。

¹⁰¹ 馬繼森，〈砸政治部〉，《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247。

¹⁰² 馬繼森，〈八月大亂〉，《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253。

在火燒英國代辦處後，周恩來直斥了造反派學生，我們不妨從 8 月 23 日的以下對話，琢磨出造反派對香港六七暴動的一連串心情，同時看到造反派除了一直以來透過《人民日報》對香港隔空喊話之餘，其實也想要透過外交部給香港以實際的支持：

周恩來：你們奪外交部權，要所有副部長向你們報告，出入要你們批准，有外事活動找他們還要我向你們請求。

造反派：王力同志講話說……

周恩來：你不要從王力同志講話裡撈稻草，一根稻草也撈不到。

造反派：我們封了以後聽總理的。

周恩來：你們也沒有打電話給我，也沒有通知我。你們發生了問題要我替你們辦事，那好，請你來做外交部長。

造反派：我當不了。

周恩來：你的做法就是這樣。四天外交大事沒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組織可以管嘛！

周恩來：左派組織中央沒有承認嘛！它只是監督。我今天首先問你們，我們國家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和毛主席授權的國務院來管，還是你們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外交權力，那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

造反派：當然中央來管。王力同志講話以後，我們覺得……

周恩來（氣憤地打斷）：都拿王力同志講話，你們不能拿這個撈稻草。……

周恩來：這是無政府主義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的社論、廣播都說了不少，連續廣播了幾天反對無政府主義。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請你回答。採取一個什麼行動中央決定了還得請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們隨便一個什麼戰鬥隊就定了？

外語學院造反派：你這個感情就不對。

周恩來：什麼感情？

外語學院造反派：我們負擔責任嘛！

周恩來：同志啊，你們負得了這個責嗎？你們把事情做錯了可以回家睡覺，還是要我們來處理，最後還是要中央負責。¹⁰³（黑體為筆者所加）

103 〈周恩來就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與外事口各組織負責人的談話〉，
<http://marxistphilosophy.org/ChenBoda/120601/173.htm>（檢索日期：2021 年 1 月 30 日）。

從以上的對話，看出來大陸的造反派（不論是否有直接參與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其實都是傾向支持這一次的行動，並意外這可以使得外交部內的造反派得以坐正，對香港的外交事務更實際地負責。不過，到底是怎麼實際地負責，由於造反派始終沒有完全在外交部坐穩過，我們也無法知道。但從前前後後造反派의思想和方針（譬如〈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及《人民日報》的文章等所顯示）、行為（火燒英國代辦處）、及造反派與周恩來的對話。我們可以估算，造反派是認為代表舊路線「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周恩來「感情不對」，也就是指責周恩來對香港極左派並沒有感同身受和真實支持；而他們認為自己才是「願意負責」的人，也就是最為體會香港六七暴動的極左群眾的一方；他們想要做的，是貫徹「武裝左派」和「群眾專政」的方針：利用外交部與香港的極左派取得實際的連線，然後鼓勵用更激進或暴力的手法（他們自己就用了火燒），去支持香港左派推翻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

無論是從大陸造反派的角度，還是香港極左派的響應，香港六七暴動不但是文革的延伸，更準確來說，它是文革造反派的延伸。而其終結與被壓制，也和造反派被毛鎮壓有關。真心跟隨毛澤東思想、戳破紅衛兵「保爹保媽」的保守性的造反派，到最後因為批判性太強而被毛顧慮、壓制甚至剷除：外交部造反事件和火燒英國代辦處使得毛澤東有了契機，以造反派的先前言論為藉口，大量清查造反派，8月尾，王力、關鋒及戚本禹等造反派被隔離或停職。1968年1月26日，王力入獄並被開除黨籍。

2-6-2 1967年8月後·香港：極左派孤掌難鳴，暴動漸漸結束

在六七暴動時期受到造反派鼓勵而參與在激烈行動當中的香港極左派，在造反派被打壓後，其實已經難以再聽到來自中國大陸的造反的號角。六七暴動中的極左派此時其實已經失去了精神上與他們相通的大陸同志。隨著港英的鎮壓持續，大陸又沒有發來使群眾可以穿鑿赴會的鼓勵和支持言論，暴動持續了兩個月後就開始走向下坡。大陸原本的外交部系統也恢復對工委的控制，讓工委繼續落實「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治理方針，極左派群眾更是孤掌難鳴。到了1967年底，「菠蘿陣」也消失了。

1967年底，各工會開始恢復常態，其中一個活動就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但內容是說除了敢於鬥爭以外，還要善於鬥爭，特別是發揮互相幫助的精

神；周奕認為，工會領導與港英達成秘密協議，以停放炸彈換取工會不被搜查。¹⁰⁴這個秘密協議的真切性我無法找到另外的文本交互確認，但周奕同時重申，此秘密協議的內容沒有傳達到下層的群眾¹⁰⁵，群眾是在這類「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上領會到工會想要停止放炸彈等激烈的對抗。

1968年4月，工會推行「復轉改」，也就是復工、轉廠、改行以結束罷工。工聯會說：「1967年『反英抗暴』主張罷工，對工人影響很大，尤其令一些將近退休的工友，失去退休福利。不少會員及工作人員犧牲了職業和退休金，工會用『復、轉、改』的政策改變局面。」¹⁰⁶也就是說，雖然聯合三罷一早已經結束，但依然有些工人是還在無業或無工的狀態，領取罷工津貼。這次復轉改，也讓不少身為極左派的工人理解到抗爭確實已經結束，也把他們丟回到艱難的殖民地現實當中。

2-7 小結

吳一慶曾經提到，在還原歷史的時候，需要討論「誰的」及「如何」歷史的問題。我認為，在目前的其他研究當中，儘管已經有譬如著重描述左派群眾經歷的《火樹飛花》，或著重於描述左派組織高層決定的《香港暴動始末：解讀吳荻周》；然而，這些研究無論是採取由下而上還是由上而下的視角、或是採取對六七暴動持褒還是貶的態度——他們依然把整個左派內部當作鐵板一塊來看待，也把中央與地方、地方與群眾之間的關係看作是合作無間、無斷裂的、從內而外的統一的。而這也導致了他們還原出來的六七以至於文革，實際上維持了這些事件皆擁有一個穩定的內核的判斷，到頭來持續了對文革的過於簡化的總結。

而唯有理解毛澤東、周恩來與造反派、港澳工委、本地左派群眾的複雜互動，以及文革時期權力核心的分散與變動，我們才不會過份吹噓在六七暴動中，毛澤東、造反派或港澳工委會由上而下的單方面挑動、縱容、激勵和設限，也不會忽視或誇大香港及大陸左派和極左派群眾由下而上的突破或創意，但同時也不會偏擺本地左派在面對殖民地政府時的心情與思考的脈絡。而藉由這樣的理路去還原六七暴動所還原的文

¹⁰⁴ 周奕，〈反英抗暴之「復轉改」〉，《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訊，2017），頁331。

¹⁰⁵ 周奕，〈反英抗暴之「復轉改」〉，頁331。

¹⁰⁶ 香港工會聯合會，〈第二部份專題訪問〉，頁101。

化大革命，也因此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統一、不斷變化且充滿張力的文革。錢理群也是這樣理解文革群眾和毛澤東的關係：

毛澤東自己喜歡大亂，文革一開始，他就在給江青的信裡明確表達了他的信念和設想：「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他自信有能力，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局面，文革沒有出現全國崩潰，這也是一個奇蹟。但這樣一個「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的局面，又是毛澤東所不願意看到的，是出乎他意料的。他後來也承認，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兩大缺陷」，其實就是承認他雖然總體上控制了形勢，但也有部份的失控。這種失控，就是因為群眾在利益驅動下的行動，反過來對毛澤東所預設的藍圖，形成不同程度的衝擊，這種衝突和衝擊，有利用、有抵制、也有曲解、修正和異化。可以說，是毛澤東發動了革命、發動了群眾；革命和群眾又反過來裹挾了毛澤東，影響了毛澤東。在以後的分析中，我們將可以看到，毛澤東最初預定的目標，有的實際上被擱置，毛澤東自己也在逐漸後退，而且到最後，幾乎所有的努力都走到預設的反面。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過程。¹⁰⁷

由這一章可見，在對港事務方面，造反派群眾、外交部奪權的造反派和周恩來的不協調，其實象徵著毛澤來自身搖擺和矛盾的不同切面，而這些矛盾最後貌似統一了——六七暴動後的香港左派又在「復轉改」中回歸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甚至在後續以反對街頭抗爭的模樣、對七〇年代的其他派別的反殖行動帶來了阻力，造反派和香港六七暴動極左派的反殖計劃被中斷了。但這樣的周折，也跟文革的歷史一樣是要經歷「複雜的歷史過程」，並不是一步到位的。這或許也是六七暴動作為文革的邊緣、作為「屬下歷史」的特性：六七暴動左派的反殖趨勢不斷被統治集團的活動所干擾、支配，甚至無法以成功的面貌結束它的週期。然而，六七暴動所帶出的議題和情感，並沒有完全隨著暴動的失敗而結束，它們或變體、或壓抑、或匯入到七〇火紅年代各個派別之中。也就是說，屬下歷史並沒有因為本地左派的沉寂而就此終結。本章以此方式去講六七作為七〇火紅年代的開首，可以讓我們看到六七這個

¹⁰⁷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頁 16-17。

「分水嶺」¹⁰⁸並非把香港劃分成兩個對立的香港——而是看到七〇火紅年代與六七暴動的辯證關係，也看到七〇火紅年代各種新生派別的歷程，都同屬於這屬下歷史的一部份。

¹⁰⁸ 這裡使用「分水嶺」一詞，是受到專門研究六七暴動的歷史學者張家偉的啟發。參見張家偉，〈引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頁 1-18。

三、以第一波中運為例：後六七暴動非左派的難局

六七暴動後，左派被香港的社會大眾徹底污名化，社會出現了一股恐左風潮——直到今天，「左仔」一詞在香港依然帶有污名化的稱呼。這一方面和六七暴動的動員主要侷限於「自成一國」¹的左派場景之內有關——這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討論過了——左派場景因為自身的條件和慣性，於六七暴動其實並沒有太多渠道和意識去很好地滾動一般社會大眾，而造成了隔閡。然而，這些社會大眾對左派的恐懼、憎恨和厭惡，也並非如此「自然而然」——畢竟隔閡並不意味著憎恨和污名——六七暴動在當時就開始被污名化是一個需要被好好解釋的過程。這就和港英政府有效地在六七暴動期間於非左派報紙輿論上帶風向有關。

在接下來的部份，我會從當時的報章入手，去理解這些非左派社會大眾是怎麼回應六七暴動的，以及「繁榮穩定論」的誕生和港英政府帶風向之間的關係。在第一章，我們可以看到本地左派的報紙主要是《大公報》、《文匯報》及《新晚報》等。而在六〇年代，非左派的社會大眾，則又分成比較中間派的和右派的（包括國民黨右派和第三勢力右派），各自派別都有著代表他們聲音的報紙。六七暴動時，中間派的報紙以《明報》為首。右派的代表報紙則是《香港時報》、《華僑日報》及《工商日報》，當中又以後兩者銷量較佳；當時的《星島晚報》也是偏右的（後來則變為稍微靠中間一點）。為了理解非左派社會大眾的反應，我將會從這些報紙入手。

在這一章的第二部份，我會指出大專院校界如何在擁抱「繁榮穩定論」的同時，尤其敏感地看到了六七暴動所暴露的社會問題，並且思考著自身的責任，因此有了第一波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下稱中運）。最後，在第三部份，我則會描述六七暴動何以一方面驅動了第一波中運，六七暴動所帶來的恐懼政治氣氛何以在另一方面也窒息了第一波中運的發展。

¹ 陳文鴻，〈前言：我們走過的路〉，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頁4。

3-1 非左派何以厭惡六七暴動——「繁榮穩定論」的誕生

3-1-1 非左派的社會大眾對六七暴動的回應

作為左派長期的敵人，可想而知右派對左派的六七暴動採取了猛烈抨擊。以《華僑日報》及《工商日報》為例，在報導六七暴動時的措辭和語調上，都會用到「左派暴徒」等比較負面和激烈的字眼。譬如，1967年7月14日一則名為〈暴徒使用恐怖手段炸黃大仙警署〉的特訊中，第一句就是這樣敘述的：「左派暴徒，變本加厲，繼續進行恐怖的暗殺手段……」²



圖 5：1967 年《華僑日報》對六七暴動的報導（圖片來源：「眾新聞」網站，<https://bit.ly/3bn1tM1>）。

² 羅恩惠，〈當政治凌駕法律 重看「六七暴動」案例〉，<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7681>（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不過，除了措辭比較激烈以外，在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上，右派報紙其實與中間派的報紙一樣，著重在批評左派的抗爭手段如何影響香港居民的治安和生活，以及社會安定和繁榮。譬如《華僑日報》在 1967 年 8 月 28 日的社論，標題就是〈解決困難穩定局勢〉³，明顯把對六七暴動的批判落在「左派的搗亂」干擾了香港的繁榮穩定，而不是針對左派行動背後的意識形態。作為中間派報紙，《明報》在 1967 年 8 月 23 日的社論〈兒童無罪！抗暴有理！〉⁴，及在 1967 年 8 月 25 日的社論〈燒不滅正義的聲音〉⁵，也主要是譴責左派暴力的行徑，在以維護社會治安為前提去反對六七暴動。就算後者稱商業電台名嘴林彬為「正義的聲音」，其正義的點也主要是肯定林彬揭發「港共各種活動真相」和「根據事實，迅速而有力地向廣大市民提供報導」，使得「人心安定」，而不是以林彬去反駁左派提出的一些理念。在當時的主流媒體當中，反對六七暴動者其實甚少直接討論左派的反英、反殖、反帝等理念，而多是直接跳過這些理念和意識形態，著眼於描繪左派「搗亂」的部份。

值得一提的是，商業電台名嘴林彬及政論作家萬人傑（原名陳子雋）是當時的反共名人，他們在反對六七暴動時就會採取比較多線的抨擊。當林彬在六七暴動時遭左派暗殺活活被燒死時，萬人傑也曾收到死亡恐嚇。不過，這並沒有使萬人傑停止他的反共立場。六七暴動期間，萬人傑依然在《星島日報》頻繁而高調地批評左派，譬如他在〈愛國〉一文這樣寫到：

我在香港過著安定、自由的生活，只要努力爬格子，有足夠收入，什麼都有得享受。我過的生活，比七億同胞（除了坐「平治」的紅朝貴介）好得多。

在被共產黨搞到幾乎沒一寸安樂土的今日，能夠過這種生活，已是十分幸運，如果左仔不是惡毒到想把我們這兩頓安樂茶飯也要鬥掉的話，我也懶得去「憎」他，只用「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的態度，一如歷朝興替一樣，終於，我不愛的「國」倒下來，另一個我愛的「國」將建立起來。看看中國歷史，那一朝代

³ 華僑日報，〈解決困難穩定局勢〉，<https://1967riot.wordpress.com/2012/08/28/wkyp-19670828/>（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⁴ 明報，〈兒童無罪！抗暴有理！〉，<https://www.facebook.com/vanishedarchives/photos/pcb.1905605716196246/1905601972863287>（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⁵ 明報，〈燒不滅正義的聲音〉，<https://www.facebook.com/vanishedarchives/photos/pcb.1905605716196246/1905602099529941>（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前幾天，接到一個「左仔」的一封信，封帶有恐嚇性的來信，自己署名是「愛國者」，罵萬人傑不「愛國」。

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我比若干左仔更愛國，至少，萬人傑在香港撈了三十幾年，直到現在，還是「中國人」身份，並沒有加入英籍，更不會像一些左紙門委，以及「前進」彭星，懷著英國護照，走上港督府唱歌請願那麼雙重人格。

我曾經熱愛過祖國，在祖國對日抗戰的艱苦而悠長的日子裡，沒一天離開過報人的崗位，到處奔波，在最新線出版報紙，我愛過那時自己做的報事，和執著捍衛祖國的鬥士沒兩樣，這該盡了國民愛國的職責了。

賴我們「愛國」，凡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乃不致於淪亡，我該分佔一分光榮。

現在左仔在香港搞搞罷工，煽動罷市，就自命「愛國」；造謠的報紙，稱為「愛國報紙」；專賣左報，又稱「愛國報販」。似乎「愛國」是他們的專利品，我們愛也無從愛。

其實，他們愛的何嘗是「愛國」？他們愛的是毛澤東（或者一部份愛劉少奇）而已。毛澤東不能代表中國，即如光緒皇帝或蔣介石也不能代表中國。他們不過是中國某一朝代的元首，朝代雖有變革興替，中國是永恒存在。我愛

愛國

家人條

的不是毛澤東的中國，是我曾經安居樂業過，也會為它的危亡出過力的中國。

有些幼稚的左仔說：現在中國強大了，在世界上有地位了，我們做現在的中國人是有光榮的，值得驕傲。如果這理由存在，任由我選擇的話，我寧願做成吉思汗時代的中國人，那時中國的武功，盛於今日多矣！

反對毛澤東就是不愛國，如果左仔這條道理成立，將來毛澤東不幸被人推倒，或者百年歸老，壽終正寢，那時，我們豈不是要愛國也無國可愛了？

那位寫恐嚇信的左仔，誤正名為「愛毛者」；而我萬人傑則可稱為「憎毛者」。

「憎毛者」與大陸的「反毛派」不同，反毛派要鬥爭，「憎毛者」不必參加鬥爭行列，因為我只「憎」他，并不打算「反」他。我在香港過着安定、自由的生活，只要努力爬格子，有足够的收入，什麼都有得享受。我過的生活，比七億同胞（除了坐「平治」的紅朝貴介）好得多。

在被共產黨搞到幾乎沒一寸安樂土的今日，能夠過這種生活，已是十分幸運，如果左仔不是惡毒到想把我們這兩頓安樂茶飯也要門掉的話，我也懶得去「憎」他，只用「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的態度，一如歷朝興替一樣，終於，我不愛的「愛國」倒下來，另一個我愛的「愛國」將建立起來。看看中國歷史，那一朝代到「民不聊生」的時候，都要倒下來。那時，我是「愛國者」，你是「賣國賊」了！

我們可以同時看到，萬人傑的論述，雖然主幹也是「繁榮穩定論」，但他比一般報章雜誌往前走了一步。他不僅反對左派的手段，也直接回應左派的論述，特別是發動暴動的背後原因。譬如，在〈愛國〉一文中，萬人傑提到自己在抗日時「沒一天離開過報人的崗位，到處流徙，在最前線出版報紙。我覺得那時候自己做的事，和執槍捍衛國土的鬥士沒兩樣，這該盡了國民愛國的職責了」。因此，他是肯定民族主義、肯定「愛國」的，然而，他指出左派的愛國並不是真正的愛國，「他們愛的是毛澤東（或者一部份愛劉少奇）

114

而已」。因此，左派不但手段上有問題，他們連理念也有問題，因為他們的愛國只是偶像崇拜，而不是真的愛國。這種更加徹底地打擊左派理念的論述，也使得萬人傑成為不少左派心中的一根刺。

至於中間派，同樣以抨擊左派危害繁榮穩定為主。僅管《明報》社論〈沒有槍炮的內戰〉⁷在 1967 年 8 月 8 日（也就是六七暴動的高峰期）評論過文革的武鬥，似乎含沙射影地認為兩者有關，想要攻擊六七暴動中理念的部份；但文章對武鬥的評論，最終也只認為文革是權力鬥爭的形式而已，是與人民幸福相悖的：「整個來說，不論是毛林派或反毛派，著眼點都是在爭權，都號稱為國家人民謀幸福。但國家人民是否真從這種亂成一段的打鬥中得到幸福，那當真是天曉得了。」也就是說，社論到最後還是跳過了討論理念的部份，著眼於批判手段過激，並質疑這種手段會危害社會總體的未來治安和幸福。這些報紙從未深入地在左派的意識形態上做批評。

3-1-2 「繁榮穩定論」的幕後推手：簡述港英政府的宣傳策略

為何右派此時甚少用平常慣用的「自由論述」去回應左派，而是和中間派報紙一樣強調「繁榮穩定論」？這跟港英政府有意識地介入並統領媒體——特別是報紙——輿論有關。6 月 14 日，港英政府就設立了沒有對外公佈的「特別宣傳小組」，強化對抗左派的文宣工作。⁸我們從《1966 年騷動報告書》可以看到，港英政府的這一次部署是來自 1966 年暴動的經驗總結。當時的報告書認為，為了防止社會上負面情緒的散播會助燃暴動，政府必須要和傳媒合作：

要達此目的，祇有廣播和報紙這兩大傳播媒介可用，就中尤以報紙更為普及及有持久的影響力……但是在香港，政府本身並無報紙，可用以宣傳某一特別政策，對於這類事情，必須依靠報界不吝合作。要獲得這種合作，必須雙方有誠意及共同的意向——儘量使市民得到有關本港目下重要經濟問題的消息的意向。

⁷ 明報，〈沒有槍炮的內戰〉，

<https://www.facebook.com/vanishedarchives/photos/pcb.1905605716196246/1905602196196598>（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1 日）。

⁸ 許崇德，〈攻心為上：香港政府應對「六七暴動」的文宣策略〉，《二十一世紀》147 期（2015），頁 66-68。

……政府可以並且應該提供大量事實，但是是否使用，發表或以何種方式發表這些事實，完全由自由報業的編輯部加以決定。⁹

也就是說，有了 1966 年面對暴動的經驗後，港英政府得出了要透過柔性手段影響民意來平息暴動的結論。於是，在六七暴動中，我們就看到港英政府透過發放「專題文章」與媒體合作並帶領報章的輿論風向。「專題文章」為港英政府所寫的範文，內容多是反駁左派的言論及指責六七暴動的左派在侵擾香港的繁榮，並重申香港應該恢復秩序——所謂「繁榮穩定論」也由此而生。許崇德指出，當時《工商日報》、《工商晚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及《明報》的港聞版都有刊登港英政府發放的專題文章，不僅全文刊登，還加上了一些醒目的小標題以表明立場。¹⁰

右派和中間派報紙在論述上的相近，很大程度是因為都受到了港英政府的帶領。譬如，許崇德舉例，6 月 20 日，《華僑日報》為原本沒有標題的專題文章加上了〈港府新聞處指出 暴徒行徑惡劣〉的標題；《工商日報》的標題則是〈港府發言人指出 搗亂份子慘敗 設法挽回面子〉。又如，針對《大公報》報導中華全國總工會捐款一千萬元支持罷工，港英政府在 6 月 17 日發放了標題為〈最不受歡迎的一千萬元〉的專題文章；但《華僑日報》收錄這篇文章時，將標題改成〈所謂一千萬元捐款，提防糖衣毒藥〉；《工商日報》的標題則是〈糖衣毒素的一千萬〉；《明報》的標題則是〈家有千七盤，日耗三百萬，請君一計算，能堪幾日玩〉。¹¹

這樣對比起來，如果右派報紙和中間派報紙有什麼差異，那就是以《明報》為代表的中間派報紙，標題的措辭還是比較溫和。不過，總括而言，當時非左派（左派和中間派）在大眾輿論的表現上，都是以支持香港繁榮穩定為理由反對六七暴動，並認為六七暴動是左派對香港的搗亂——即所謂「繁榮穩定論」。

儘管左派也有出版《誰破壞香港的「和平安定」》等小冊子，去回應港英政府提出的「和平安定」是「建立在殖民主義的反動統治上面的，是靠殘酷壓榨三百多萬勞苦大眾的血汗來維持」，並提出真正的和平安定要「在英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被徹底砸爛以後」

⁹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1967），頁 86。

¹⁰ 許崇德，〈「六七暴動」與「香港人」身份意識的萌生〉，《二十一世紀》169 期（2018），頁 77-94。

¹¹ 許崇德，〈「六七暴動」與「香港人」身份意識的萌生〉，頁 77-94。

才會出現。¹²然而，這些書的流通始終不敵「菠蘿陣」所帶來的震撼，事實上左派的暴力行為的確影響了一般大眾的生活，也威脅到社會大眾的生命與財產；加上除了左派報紙以外，所有報紙都在猛烈抨擊「菠蘿陣」的做法。左派因此開始被全盤性地厭惡。

3-2 六七暴動與第一波中運：為了「繁榮穩定」該做些什麼？

3-2-1 非左派的大專院校界對六七暴動的回應

除了少部份左派大學生，當時大部份大學生是普遍非常反對六七暴動的。譬如當時是官立中學學生並曾參與六七暴動的石中英說：「六七〔暴動〕的時候，是沒有任何大學生被人抓的，是 0，只有抓到官津補校和左派學校的中學生……1967 的時候，其實大學生——譬如港大那些——是完全沒有支持過左派工人的，是站在英國佬那邊的。」¹³1967 年 5 月 15 日，學聯的大專院校，包括崇基書院學生會、香港工業學院學生會、香港大學學生會、新亞學院學生會、羅富國師範學院學生會及聯合書院學生會發表了聯合聲明，並且在《學聯報》¹⁴刊登；他們表示對工潮所引起的騷動「深表遺憾」，「擾亂了地方安寧，也間接危害到廣大市民的利益」，對騷動和暴力「堅決反對」。一般來說，學聯是由多家大專院校的民選學生會代表組織而成，是學生運動界別最有認受性的代表。¹⁵此時，學生的論述與坊間報章雜誌很相近，旨在以維護香港安定繁榮的前提批評左派的暴力，主要還是跟隨著「繁榮穩定論」。

此外，雖然非左派的大學生依然以「繁榮穩定論」為其論述主軸，不過，他們也有稍微不一樣的問題意識。譬如，6 月 17 日，也就是工聯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五日後、「港九各界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成立一日後，香港大學學生會發表了特刊，還於首頁發表了聲明〈我們要求安定〉，說到：

¹² 許崇德，〈攻心為上：香港政府應對「六七暴動」的文宣策略〉，頁 70。

¹³ 石中英，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31 日。

¹⁴ 《學聯報》雖然理論上是要反映學生聲音，因此是中立的，《學聯報》在 1966 年 12 月創刊時的創刊辭是這樣寫的：「《學聯報》（*The Federation*）創刊的目的，不在於補充目前香港各專上院校學生刊物的不足，而在乎重建大學生思想及言論自由的整體性，思想與言論自由一旦創立，方可摧毀奴性的沈默，方可矯正僵化成冬烘的風氣。基此才得以表明本刊所不容辭的態度。」然而，《學聯報》接著表示其宗旨之一「即大學的活動和行政必須自治自決，而不受任何政治、經濟、和勢力逮捕之恐嚇，與各大專院校建立一條團結學生陣線，彼此合作進行民主學生運動，促進『自由大學』，『自由社會』，及『世界和平』的目標。」把此段放在當時的語境來讀，還是甚有冷戰色彩，其對「自由」的重視，顯示出《學聯報》作為一份中立的報紙，還是稍微傾向於當時社會中右派的論述。參見學聯報，〈創刊辭：寄言論自由於自由大學〉，《學聯報》1966 年 12 月 20 日，版 1。

¹⁵ 崇基書院學生會、香港工業學院學生會等，〈聯合聲明〉，《學聯報》，1967 年 6 月 30 日，版 1。

我們非常同情勞工運動，是要是合理的，正當的。但任何勞工運動若染上了政治色彩，便不會再是為工人請命的運動，而變成動亂的藉口。¹⁶

從以上可見，儘管聲明依然以「繁榮穩定論」為主軸，並把標題命名為〈我們要求安定〉，但其中提到了對工人的同情，也承認了工人所面對的問題，算是嘗試回應左派的理念和主張。然而，聲明終究還是懷疑工人運動是被「染」上了政治色彩——也就是認為工人不過是被中共利用，而不是真的純粹地在以工人的位置抗爭。不過，透過這樣的反對暴動的文章，還是使得香港勞工問題在大專界中被擺到了檯面。甚至，社論還直接回應了左派的民族主義論述，他們寫到：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愛自己的國家與同胞。但愛國並不等於愛一個政權，也不等於愛一個領袖或一個黨。國家是全部人民的國家，並不是一人一黨的資產。一個執政的人或黨派若得不到全人民的承認，我們絕不認為它能代表整個國家。¹⁷

從社論可見，他們是肯定民族主義的，也指出「我們是中國人」。然而，他們懷疑六七暴動中的民族主義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和對共產黨的崇拜——是「愛一個領袖或愛一個黨」——而不是愛一個民族，因此是一種不當的民族主義。總括而言，聲明雖然與坊間的「繁榮穩定論」同一陣線，但卻少有地把勞工問題和民族主義問題放到檯面上，甚至予以部份肯定。然而，就像勞工問題該如何解決那樣，民族情感如果不該指向以暴動方式反英（因為它被認為只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產物），那又指向什麼議程？這是當時包括《學苑》在內的大專院校界開始在思考的問題。

到了 1967 年 7 月 13 日，也就是三罷以及炸彈開始出現後，《學苑》關於六七暴動的反對更加強烈。此時反對的論述也更多元化，有了更細緻的說法，開始加入關於反對者的責任的討論。譬如，在被放到頭版的一篇名叫〈向正義的工友們致敬〉的文章中，作者就向「正義的工友」致敬，而「正義的工友」指的是在大罷工下依然繼續工作的工友，他們被作者寫成是身體力行地反對左派的誘惑和恐嚇，作者以此來對照大學生，認為大學生作為知識份子，更應該明確地反對左派：

¹⁶ 學苑，〈我們要求安定〉，《學苑》，1967 年 5 月 17 日，版 1。

¹⁷ 學苑，〈我們要求安定〉。

「我們要為社會服務」，「我們要謀求大眾的福利」，「我們要抵抗一切破壞我們理想的侵襲」，這似乎是每一個人都懂的真理，但危急之際，能夠不受誘惑，不受恐嚇，能夠站得起放得開的英雄又有幾人？……同學們！你們不是常常誇示自己是智識份子嗎？你們不是常常說自己能夠明辨是非嗎？但在這幾星期一連串是非分明的事件中，你們曾否為這「是」盡過力而抵抗那「非」呢？你們常道「我們不能迷信，我們反對盲目崇拜」，但你們曾否為這「不能」「反對」下過功夫？在這些盡力為「是」的工友面前，你們是否覺得慚愧？有人說「智識是逃避現實的最好媒介！」你們是否願意為一逃避現實的假智識份子？¹⁸

這篇文章的症狀性在於，六七暴動促使了年輕人及大學生開始思考知識份子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和義務去反對暴動。這個問題意識很明顯承繼著士大夫傳統，即認為知識份子因為有更多的知識，也因此應該有額外的責任和貢獻，不可以「輸」給「不願意罷工的工友」的付出，而且應該更明確地反對左派的「盲目崇拜」。

從以上幾篇和其他同時期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當非左派大學生在反對六七暴動時，其實也承認了六七暴動的部份元素，包括民族情感和工人問題。而他們反對六七暴動時，也站在了肯定知識份子責任及「繁榮穩定論」的立場上。也就是說，六七暴動為這些非左派大學生帶來了四個問題：（一）如果承認民族情感是有正當性的，但六七暴動不是一個出路，那民族情感該如何安放？（二）反對暴動者（主要限於年輕人、大專院校學生和知識份子圈）該負上什麼責任？（三）既然承認工人面臨問題，而六七暴動又不是出路的話，工人問題該如何解決？（四）香港如何得以繁榮安定地發展？這些都是當時的社會大眾——特別是自命該有理想感的、作為未來社會棟樑的年輕人和大學生——在對於六七暴動提出任何說法和議程時都需要面對的一系列問題。這時候「繁榮穩定論」就從一個只指向維持六七暴動前的現狀的維穩論述，變成一個思考的起點，並指向對未來的改革。

¹⁸ 西窗，〈向正義的工友們致敬〉，《學苑》，1967年7月13日，版1。

（1）民族情感該如何安放？反對暴動者該負上什麼責任？

面對民族認同的問題，港大《學苑》的〈我們還有話說〉提出的解套方法很有代表性。作者龍戰是這樣寫的：

此次最重要的考驗並不是一些人口說的民族尊嚴，而是個人生死存亡的決擇，是**自由與奴役白刃戰**的一剎那，也是中華兒女智慧發揮的時候。中國人在亂世之中能不能獨立不倚，能不能作出一個最理智的決定？中國人在動盪和**山河破碎**之際，能不能為中國未來的遠景留下一片曙光？還有，**中國人在顛沛流離的慘痛時刻裡**，能不能為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劃下**不可抹煞的一筆**？這些才是我們民族面臨最艱鉅的考驗。¹⁹（黑體為筆者所加）

這篇文章承認在香港的「中國人」應該有民族感，但認為這民族感應該是導向耕耘「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而不是去抗爭——因為這不是一個「最理智」的決定。文中提到的要在「在顛沛流離」中復興「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也可以看到右派南來文人的「花果凋零論」的影子。此外，文中提到的「自由與奴役」是一種冷戰語言，「自由」指的是屬於「自由世界」的資本主義陣營，「奴役」指的是社會主義陣營。這時候去解套左派民族情感的方法，主要還是跟隨右派的民族主義議程。然而，這畢竟是一劑老的藥方，只是重複著右派的老調。但在六七暴動暴露了諸多社會問題後，年輕人開始探求新的、更具針對性的解決方法。

（2）工人問題該如何解決？香港如何得以繁榮安定地發展？

1967年6月30日，《新亞學生報》發表了〈最近騷動對香港的影響——並論香港的勞資關係〉。《新亞學生報》作為右派南來文人重鎮，當然也認為要肯定香港青少年的「愛國及愛民族的思想」。然而，文章認為在肯定民族主義之餘，卻為民族主義提供了不一樣的出路。文章認為，六七暴動雖然是不可取的，但瀰漫其中的民族情感應該被激發和利用到其他議程上去，在文章結尾，作者更加入了「政府應加速制定周密而完善的勞工法，使有政治背景的罷工不至蔓延」的建議。²⁰同樣地，1967年6月30日的《學聯報》社評

¹⁹ 龍戰，〈我們還有話說〉，《學苑》，1967年7月13日，版1。

²⁰ 逸飛，〈最近騷動對香港的影響——並論香港的勞資關係〉，《新亞學生報》，1967年6月30日，版2。

〈亡羊補牢〉也提出政府應該在社會福利和市民基本所需上多下功夫，包括勞工要有法定最低資額和最高時額、公務員和警察的服務態度要改良、立法局要有民選議員等。²¹這些都顯示了六七暴動以後，大專院校界青年在認為要肯定民族主義的同時，並沒有都走入先前左派或右派的對民族主義該如何實踐的議程設定，而是看到要找到新的、入世的、能直接回應殖民地社會中種種問題的方法去落實自己的家國情懷。

隨著因為社會的反對聲浪、港英政府的暴力鎮壓和左派內部的回歸保守，六七暴動慢慢落幕了，左派也漸漸回歸其本來的韜光養晦性格。然而，六七暴動凸顯了一系列社會問題，正逼迫著年輕人去回應。1967 年底，第一波中運乘著六七暴動的餘溫發酵。然而，我必須強調，第一波中運在論述上並不是要為左派六七暴動的政治議程添磚添瓦，反而是想轉化六七暴動所引發的民族焦慮和官民衝突焦慮，以一種非左派、但更貼近右派和本地華人菁英的人權論述，去批評而非徹底反對殖民統治的手段，也並不觸碰到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和帝國主義問題。因此，第一波中運是和六七暴動反英、反帝、反殖的理念有衝突的。某程度上，第一波中運是為大專院校中反對暴動但承認社會問題存在的青年，找到的一種左派暴動以外的替代物。雖然它既作為一個另類路徑來與六七暴動一爭長短，但在回應香港前途、官民矛盾、民族情感、知識份子責任等問題時，也辯證地繼承了六七暴動的一些問題意識。

3-2-2 第一波中運序幕

1967 年 10 月 17 日，《崇基學生雙週報、新亞學生報和「聯合學生」聯刊》（下稱「聯刊」）發表社論〈中文必須儘早被列為官方語言〉，提出了中文應該被列為官方語文的理據：

香港的中國人，佔全港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們許多只懂得中文，而不諳熟作為目前唯一官方語文的英文。政府與民眾彼此間的溝通和了解，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要香港的政府和民眾間的隔閡消除，互相了解，則必須要有一種最適切的語文作為媒介……把中文列為官方語文，一方面可以加強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對政府的親切感；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國人，在心理上，也會因此而感到其地位提高了。兩者可使在香港的中國人有歸屬於香港社會的感覺。而這種市民歸屬感是香港社會

²¹學聯報，〈社評：亡羊補牢〉，《學聯報》，1967 年 6 月 30 日，版 1。

進步所必須的……選賢與能，是四整治本。香港的中國人，其中不乏才學出眾之士；可是，他們卻不能為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或最少，不能在政府機關服務，乃因為不能用流利的英語說話和寫作。²²

由此可見，第一波中運提出了使用中文作為官方語文訴求，其背後論述是希望讓市民更方便地表達自己、和政府溝通更順暢、更有歸屬感，甚至使更多人可以加入港英殖民政府機關協助其進行治理。也就是說，中運一開始發起時，並沒有要否定港英殖民之正當性，反而是在幫助殖民政府使社會繁榮穩定的前提下進諫。此外，在行動上，第一波中運多流於表態，態度也是有商有量的以勸說為主，沒有採取激烈的手法。也就是說，第一波中運無論是主張、論述、行動還是態度，都緊遵著「繁榮穩定論」的框限，和六七暴動可說是差天地別，甚至是在「打對台」。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中運和六七暴動雖然同樣是對殖民地提出意見，中運並沒有跟六七暴動的遺緒力量串聯在一起，甚至當時的左派多是反對中運的。

3-2-3 右派對中運的反應：從搖擺到支持

面對這樣的第一波中運，左派當然無法將之匯入六七暴動的浪潮之中。但右派對中運的態度，一開始是不完全一致的。譬如，右派的新儒家南來文人是支持中運的，但右派報紙《華僑日報》1967年10月2日的社論〈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的問題〉就對中運格外謹慎。社論指出，雖然他們贊同中文被列為官方語言的建議，但認為執行上有許多問題，結論是認為需要特別的機構去研究及推進這一種改變。²³這也導致「聯刊」發表〈對華僑日報社評「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問題」的商榷〉一文，認為《華僑日報》以翻譯人才不足等理由希望有更詳盡的研究和計劃，事實上只會讓訴求達成之日遙遙無期，「是一種悲觀的論調」；又反駁其「人才不足論」，認為基本人才是具備的，只要政府求才若渴，必可一年半載便先讓與市民最有關的文件中英並重；而且也認為，要讓人才充足就要先把中

²² 崇基學生雙週報、新亞學生報和「聯合學生」聯刊，〈中文必須儘早被列為官方語言〉，《崇基學生雙週報、新亞學生報和「聯合學生」聯刊》，1967年10月17日，版2。

²³ 華僑日報，〈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的問題〉，<https://1967riot.wordpress.com/2012/10/02/wkyp-19671002/>（檢索日期：2021年4月1日）。

文列為官方語言，才能讓英文中學的教學中英並重，更有利人才之培育。²⁴可見在反對六七暴動的非左派之內，對中運的意見其實並不協調。

雖然此時的中運，只是一個小小的聲音，甚至還沒長出任何的行動以致於可以被稱為「運動」；但經歷了六七暴動的港英政府卻神經過敏，採取了非常粗魯的方式回應中運。華民政務司徐家祥在接受《學苑》12月初的訪問時表示了對中運的否定，認為那是知識份子的一次「智能練習」，他們只會製造「小小麻煩」(minor nuisance)，這無疑為中運的發展火上加油。²⁵

過了兩個月，右派顯然對中運採取更為明朗的態度。1967年12月22日的《新亞學生報》，不但顯示了有99.25%的新亞同學支持中文列為官方語言，²⁶還訪問了右派南來文人唐君毅。而唐君毅明確表示支持中運，認為儘管中運當時只被認為是小部份人的訴求，但「社會上的改革，往往只有少數先知先覺的發起，但這少數人卻能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心聲」。唐君毅甚至直接攻擊所謂「智能練習」和「小小麻煩」的說法。最後她更以右派常用的「民主」為論調，認為殖民政府：「本於民主精神，開明態度，香港政府是不會絕對沒有改革的意向的。」²⁷此時的中運對待港英殖民政府的統治，依然主要採取肯定和鼓勵改革的態度。

1967年12月20日，崇基學院舉辦了「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問題研討會」，有多間院校近百代表參與，標誌著第一波中運終於從輿論走向了組織和行動。這場研討會不但通宵達旦持續到第二天凌晨，還在會後發表了「聯合公報」。這些活動也獲得了政府的關注：1968年2月28日，港督戴麟趾在施政報告中，提及將會盡量使中英文獲得平等地位。²⁸從運動外部看來，這場研討會雖然形勢不錯——至少是在暴動以外，研討會成功把中運的議題帶到社會大眾及政府的視野。然而，在運動內部，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²⁴ 崇基學生雙週報、新亞學生報和「聯合學生」聯刊，〈對華僑日報社評「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問題」的商榷〉，《崇基學生雙週報、新亞學生報和「聯合學生」聯刊》，1967年10月17日，版3。

²⁵ 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思想香港》6期（2015），頁4。

²⁶ 新亞學生報，〈本校師生贊成列中文為官方語文〉，《新亞學生報》，1967年12月22日，版1。

²⁷ 新亞學生報，〈忍心見中文衰萎下去？研究所所長兼哲學系主任唐君毅先生訪問記〉，《新亞學生報》，1967年12月22日，版2。

²⁸ 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頁5-7。

3-3 六七暴動後的政治恐懼與扣帽子風氣——第一波中運的難產

3-3-1 崇基「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問題研討會」風波

1968年2月1日,《學苑》編輯委員會發表了一篇名為“The Nationalists in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Students”的文章,當中不但質疑此議題為何是由崇基學生會獨辦而不是學聯來主抓,還認為這只會讓非學生的民族主義者在研討會中煽風點火,利用研討會滲入骯髒的政治——也就是所謂「滲透論」。²⁹這種滲透論背後指的是,中運不過是一個右派把持的運動。

因此,研討會執行委員會於1968年1月14日在《學聯報》發表〈就學苑編輯委員會 The Nationalists in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Students 一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問題研討會」執行委員會公開聲明〉,表示雖然會議有兩名關心中運的台灣畢業生到場,但他們只能在旁聽席,社會人士的意見也只作為參考;而且研討會的兩次小組討論,每次的五個小組均沒有非學生擔任組長。³⁰但無論如何,《學苑》的攻擊還是很有殺傷力的,這個殺傷力也不只是文章本身,而是在於它成功挑動了自六七暴動以後瀰漫在社會的一種恐懼政治的情緒。這種恐懼政治的情緒的底色,在於社會普遍認為「工人是被左派煽動」,因此任何單純的議題一旦被認為已經被某派插手——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會使得危害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再次發生。於是,社會中不少人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遠離政治,而一旦《學苑》把中運說成與政治有染,便會被社會所忌諱。

也就是說,當中運最初的開展,是乘著坊間反對六七暴動的浪潮,主要訴求「繁榮穩定」,還是被廣泛接受的。然而,後六七暴動的「繁榮穩定論」也是一個枷鎖,教人遠離政治與組織。這也是為什麼一旦學生組織起來、對政府表現出更為強硬的態度時,它就開始為人懷疑。也就是說,坊間對六七暴動的恐懼讓後六七的那些即便是批評六七暴動的活動——譬如中運——也陷入難局之中:組織化地解決問題就會被懷疑是被某個政治派別利用、是在重複六七暴動、是在危害繁榮穩定;但不去組織化地解決問題,繁榮穩定背後其實存在一大堆社會問題;不去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話,暴動又可能從社會問題中死灰復燃。這種難局在中運被呈現時,情況又更為複雜:學生一直被認為是「純潔」的,應該透過讀書去追求理想,而不是去碰「骯髒的政治」;因此,這種把中運學生組織

²⁹ 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頁8。

³⁰ 學聯報,〈就學苑編輯委員會 the Nationalists in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Students 一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問題研討會」執行委員會公開聲明〉,《學聯報》,1978年1月14日,版4。

說成是有「來自台灣的」「民族主義份子」（也就是說是右派）在把持的說法，其實更取消了參與運動的學生的純潔性以至於正當性。

雖然學生自稱並非被右派把持，並始終宣稱其政治獨立性（非被左右政治控制），但一方面，這種辯護被認為只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在群眾畏懼政治的社會氣氛下，難以被大眾信服；另一方面，右派的確在 1968 年更加積極地支持中運，甚至以一種高度政治化的冷戰戰略對港英政府進行遊說，也就無形中符合了坊間對「骯髒的政治」的理解。《人生》第 90 期中，梁宜生就表示：

安定香港的最大力量，是四百萬居民絕大多數與政府的密切合作……只要四百萬中國人擁護政府，**世界輿論**就會同情英國在香港的地位，**世界民主的力量**就有理由和信心來協助香港的**繁榮與安定**……我們除非認為香港應該永遠施行殖民地政治，中英兩民族永遠要劃清一條鴻溝。如果要講民主，如果要將香港居民不分膚色，不分種族，一律融成為「香港人」，就不能不**重視民族的情感問題**。不承認中文為官方語言。就表示這政府不是中國居民的政府，在香港的中國人須永遠接受另一種語言的人的統治。這就永遠引不起香港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對香港的愛護心與責任感。³¹（黑體為筆者所加）

梁宜生說的「世界民主的力量」是一種冷戰話語，指的是資本主義陣營。在第一章我曾經提到，國民黨右派一直希望可以透過重申台灣中華民國政權與英國同為「自由世界」的資本主義陣營，從而爭取與港英政府聯手抗共；而第三勢力右派則認為鼓勵文化民族主義，可以有效從內部削弱中共以至於蘇聯的世界影響（因為共產主義是和傳統中國文化有矛盾的）。很顯然，右派的論述此時找到了和第一波中運扣連的方法：把重視民族情感與「爭取世界輿論」、「加強世界民主的力量」扣連起來，認為將中文列為官方語文除了可以製造出「香港人」的歸屬與身份，也可以顯示出港英政府作為「自由世界」的一員正有效地回應香港人的民族情感，因此可以在跟高舉民族主義的左派的競逐中勝出，為自由世界加分。

正因為坊間恐懼左右政治的氣氛，1968 年中以後，第一波中運也停頓了。參與過中運的青年，也陷入了一段時間的沉寂與困頓。儘管第一波中運明顯地是在反對六七暴動

³¹ 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頁 3。

的前提下萌芽的，甚至擁抱了「繁榮穩定論」，然而在後六七的恐懼政治氣氛下，「扣帽子」風潮不斷，任何沾有政治色彩的運動都被人懷疑。這打擊了第一波中運的發展，使得這些非左派的運動者也意興闌珊。

3-3-2 第一波中運後：運動創傷與青年困頓

此後一年，大學也好、年輕人也好、社會也好，大家的政治討論又回到了六七暴動前的平靜。不同的是，這次只是表面的平靜，實則被挑動起來的社會意識無從安放，青年人——特別是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大小學運或中運的參與者——尤其感到壓抑、失落、困頓。

1968年6月7日，署名異鄉人的作者在《學聯報》發表〈當代大學生的困境〉，討論到他所感到的困頓和失落。文章開首就提到各地政治環境對青年人帶來的困境，譬如殷海光被解僱使得台灣自由主義沒落並造成台灣青年的困境、大陸青年人對毛澤東思想起了懷疑等。接續，他提到香港大學生的困惑是「缺乏一個共同努力的遠大目標」，困在「知識的死胡同裡」。³²作者精準地描寫了如他這樣的香港年輕人在後六七恐懼政治的環境下所感到的失落和困頓——書本是「知識的死胡同」，代表的是年輕人已經無法滿足於用讀書去改變社會，但恐懼政治的大環境使得大家無法討論或推進任何政治議程。

1968年12月16日，《學聯報》中忒倫詩的〈說香港學生運動〉更明確提到學生所面對的難局的模樣——學生搞運動時經常被坊間認為「學生與政治不符」，學生發表評論只是「書生論政」，學生強硬地抗議就被說成是「人云亦云」，以至於學生都患有「恐政治病」。³³1969年1月12日，《學聯報》的〈也算是獨白日〉更以深度剖白的方式對學運前途表示迷惘，也提到當時學生會附設的時事委員會無法真的動員學生，學運只能是「紙上談兵」。³⁴從這些文章可見，第一波中運的失敗，正是因為當時任何運動都被鑲嵌在後六七恐懼政治的社會氣氛之中。

而我認為，郭勳亮在1969年3月31日的〈對學生會諸公進一言〉中，最為明確地指出了當時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無法發展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組織不足的問題：學生在中學「先天」地沒有學生會組織，對「民主和自治認識不足」；第二是恐懼政治的風氣問

³² 異鄉人，〈當代大學生的困境〉，《學聯報》，1968年6月7日，版3。

³³ 忒倫詩，〈說香港學生運動〉，《學聯報》，1968年12月16日，版3。

³⁴ 張雪夫，〈也算是獨白日〉，《學聯報》，1969年1月12日，版7。

題，就算學生「後天」進入大學後有了「初嚐自由」甚至是「進入學生團體的機會」，但在後六七的去政治化的大環境底下，扣帽子的做法給參與學生運動的人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說：

一提起「左派」「左仔」這些字便談虎色變，很不幸地，有些齷齪的學生政客，便往往利用同學這種恐懼心理來排斥異己……但是，不少同學對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來大施帽子壓力，不少熱心的同學因此而被破放棄其學生政治生涯，是屬非常可惜的事。³⁵

當時由恐懼政治而來的扣帽子氣氛，是瀰漫在社會中的。這種扣帽子的風氣不僅窒息了第一波中運，也嚴重影響了其他學生運動的推進，港大校政改革就是其中一例。1969年2月的港大非常會員大會，討論的本來是香港大學的改革議題，同學的發言都是很開放的；但經過報章報導和渲染後，同學們都開始害怕左派滲入搞事，又害怕若自己反駁就會被認為是右派，因此認為「既然自己不是有任何政治或派別愛好，也就無謂令人產生這些與事實不符的意念，因而在大會上多沉默不語，或附和大多數……」³⁶。可見從第一波中運以來的一連串學生運動，無論是要求政府改革還是校園改革，都被扣帽子的風氣緊緊箝制。

3-4 小結

六七暴動期間，殖民政府成功帶領風向，統一了右派及中間派輿論，生產出「繁榮穩定論」。儘管大專院校界的年輕人在緊跟「繁榮穩定論」之時，看到了六七暴動所揭露的種種社會問題，甚至發起第一波中運去回應這些問題。然而，「繁榮穩定論」成了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的緊箍咒，恐懼政治的氛圍以扣帽子的風氣現身，窒息了許多運動發展，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1970年保釣運動後才略微鬆綁。但在1967到1970年之間，這種扣帽子風氣足以讓不少社會意識覺醒的青年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更不要說提出議程和進行實踐了。許多年輕人此時只能暫時轉回到書本中去，但一直在等待一個可以突圍的機會。

³⁵ 郭勳亮，〈對學生會諸公進一言〉，《學聯報》1969年3月31日，版7。

³⁶ 未名，〈港大二月七日的兩次非常會員大會感言〉，《學聯報》，1969年3月31日，版7。

四、超越左／右派的先聲：從自由主義到自發毛派的《盤古》

六七暴動激發了年輕人改造社會的想法和熱誠。而雖然第一波中文運動（中運）在恐懼懼政治的氛圍籠罩下被迫中斷，參與其中的學生因為被扣帽子是「左派」或「右派」，而感到壓抑、困頓、失落的狀態。但這種困頓和失落是一個不舒服的狀態，是需要尋找出口的。改造社會的想法就像星星之火那樣，在等待一個時機和一個可以燃燒的草原。

《盤古》與《70年代雙週刊》（下稱《70》）就是這個社會狀態下的產物——它們給當時困頓和失落的年輕人，指引了一片等待被燃燒的開闊之地。雖然兩本刊物後續的政治傾向非常不一樣——特別是保釣中，《盤古》側重統一運動路線，《70》側重反殖運動路線，兩者的理念不但分道揚鑣，更有劍拔弩張的情況，以致很多時候我們總沒有辦法在情感上允許自己把兩者放在同一個脈絡去思考，也鮮見有把兩者並置來討論的文章。然而，這兩本刊物在創刊時是為了回應同樣的時代困境，可以說是同一脈絡下的產物——譬如，兩者皆與台灣的自由主義脈絡有關，又在西方新左翼思潮中選取養分去回應當下。

在這一章的上半部份，我會講述 1967 年《盤古》創刊的脈絡如何與香港、台灣及大陸的政治狀況息息相關。在下半部份，我則會以從海外來港的台灣外省人包奕明（筆名包錯石）為線索，探討西方新左翼中的毛派思想對《盤古》的影響。在關於保釣的第六章，我們也會看到《盤古》在保釣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著重的統一運動路線是如何受到毛澤東思想所啟發。雖然《盤古》對國粹派的影響力在保釣後並不如受到中共資助的《七十年代》那麼廣泛，但理解《盤古》如何「從自由主義變成『文革』小將」¹，可以讓我們窺見毛澤東思想對當時諸多渴望改變世界的年輕人的吸引力，也對我們在後續理解火紅年代中的國粹派有一定參照性。

4-1 《盤古》與創建實驗學院的誕生

4-1-1 從《盤古》創刊初衷說起：對反共與台灣自由主義的繼承

《盤古》於 1967 年創刊，《盤古》人馬的聚合是從聚在一起討論國是開始，一開始的活躍成員有戴天、胡菊人、林悅恆、古兆申、黃維波、岑逸飛等，都是當時有名的青年知識份子。這群青年知識份子的共通性是什麼呢？曾經是《盤古》編輯的古兆申（筆名

¹ 戴天、盧瑋鸞、熊志琴，〈戴天〉，收入盧瑋鸞、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一）》（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250。

古蒼梧)在《雙程路》提到：「《盤古》同人實際上都比較右傾，絕大部分同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反革命的。」²但我必須指出，《盤古》的這種右派與新亞書院的右派南來文人是不一樣的：新亞書院右派南來文人的意識形態是新儒家，而古兆申認為《盤古》「是英美自由主義那種意識形態」³。在政治表現上，新儒家會比較乖巧、少介入政治、與社會的距離比較遠；《盤古》則比較具批判性。古兆申對《盤古》的「右傾」是這樣闡釋的：「所謂右傾，並不是國民黨那種，它還是對國民黨保持批判態度。」⁴

為什麼這些自由主義者，要在 1967 年創立《盤古》？那就不得不提及那個時代的特殊性，這和台灣及大陸政治形勢的翻天覆地息息相關。古兆申說：

《盤古》出現，是因為時代的衝擊。一方面是國民黨極右，查封《文星》雜誌，然後是共產黨極左，文革爆發。⁵

古兆申所提到的《文星》是一本於 1957 年在台灣創刊的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思想性刊物。「查封」是指《文星》在 1965 年被國民黨停刊，而且到了 1966 年復刊不果。加上同期國民黨政府也在打壓著名自由主義領袖殷海光，《文星》的停刊因此象徵著國民黨對自由主義派系的全面清算。這對後來成立了《盤古》的那群青年知識分子來說都是很衝擊的一件事。因為他們發現，自己一直以來比較傾向的（對比起中共）國民黨政府並非只是反共，而也會打壓自由主義者。隨後，文革也在 1966 年爆發。這兩件事加起來，讓這些自由主義者認為必須要有一個平台表達自己的聲音，要革北京的命、改台北的良。戴天為刊物命名為「盤古」，是「開天闢地」的意思——在北京和台北之間發出忠於自己政治的聲音，以及對社會的看法。因此，他們的創刊辭是這樣寫的：

據說同人性質的刊物大多夭亡，而不巧「盤古」正是一份同人雜誌。我們並非不知道前路的艱難，甚至也早就先有失敗的打算。但艱難和失敗雖然可怕，卻沒有抽手旁觀，隔岸觀火令人沮喪（願意捲起袖子的，我們都歡迎）……組成我們這個刊物的成員，全都是二十歲到三十五歲之間的人，因此衰落、頹廢的蒼老心情，膽怯、怕事的聽天主義，還未曾在我們心中生根。我們願意接受一切攷驗，同時也可

²古兆申，〈現實的回歸〉，收入盧瑋鑾、熊志琴編，《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2010），頁 148。

³古兆申，〈現實的回歸〉，頁 148。

⁴古兆申，〈現實的回歸〉，頁 148。

⁵古兆申，〈現實的回歸〉，頁 146。

以證明：這一代的知識份子，是「頭頂蒼天，腳踏大地」，還是「口的巨人，做的懦夫」？至於我們自己，既然視「袖手旁觀，隔岸觀火」為洪水，為猛獸，那麼入世的心情就免不了。譬如：我們以後會用大量篇幅談社會問題。⁶

「隔岸觀火令人沮喪」的意思，是目睹大陸文革和台灣自由主義者被鎮壓的沮喪。「捲起袖子」的意思是拒絕任由國民黨或共產黨代言，要自己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拒絕「衰落、頹廢的蒼老心情，膽怯、怕事的聽天主義」，意思是要拒絕新儒家右派文人一貫以來不直接介入社會議題的風格。《盤古》和新儒家右派文人的不一樣，除了可以歸咎是《盤古》更年輕的、更有衝勁，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承繼的思想傳統不一樣，所感受到的情感衝擊也不一樣：新亞所傳承的儒家傳統依然是國民黨所沿用的；但《盤古》所承繼的自由主義思想傳統卻在台灣被國民黨打壓，這也難怪發刊詞會有一種急流勇進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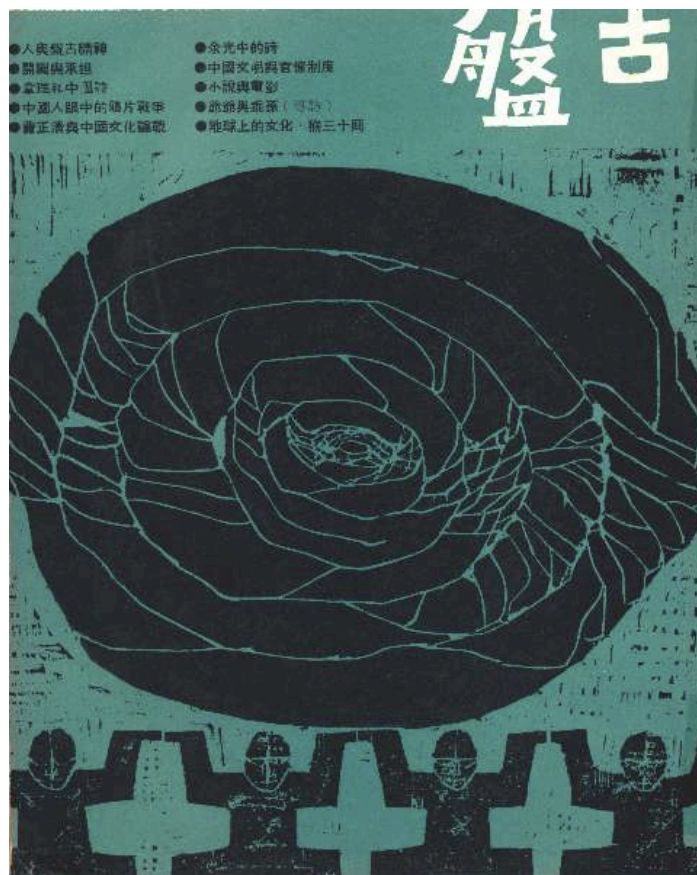


圖 7：1967 年《盤古》創刊號封面

⁶ 盤古，〈給讀者的報告〉，《盤古》1 期（1967），封面內頁。

我們也可以在《盤古》創刊號目錄頁旁的「我們的宗旨」中，理解到這些自由主義者在辦報時的取態：「1. 以理智的態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2. 以獨立觀點評論當前香港；3. 中國及世界問題；4. 以客觀立場介紹西方學術真知，以誠真精神從事文學、藝術及學術之創新。」⁷吳仲賢對這三句話的解讀是這樣的：

這幾句話就是很好的說明：就是一項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不是在殖民地文化同化政策迷失了本位文化，唯西方是尊，或是一廂情願地死抱傳統不放的非理性態度，才使《盤古》要追求「理智態度」；就是因為年輕人從來對香港、中國和世界問題都混淆糾纏不清，都是糊糊塗塗翻版人家的話，自己恍恍惚惚，不知其所以然，故此要提出「獨立觀點」的思想；就是因為從來接觸西方學術時，不是斷章取義唯心地接受，便是以偏概全，乾脆不聞不問，所以才要做到「客觀」；就是因為文藝學書普遍成為現實逃避者的王國，或是謀生上自欺欺人的手段，所以才要提出「誠真」。《盤古》和相依的「創建實驗學院」，便是在這種充滿濃厚自由主義的啟蒙精神下，團結了香港大部份最精幹的青年。⁸

我對吳仲賢的解讀大致同意，但我也必須提出額外幾點做補充。第一，吳仲賢這段文字是一個香港本位的解讀，但事實上《盤古》的目標讀者群包括海外華人，所以「理智態度」並不只是對應香港知識份子在殖民地政策下唯西方是尊或死抱傳統不放，也是對應海外華人崇西方的心態；而「獨立觀點」說得更白的話，根據他們提到的創刊初心，其實是要超越國民黨和共產黨所導致的兩派獨大的壟斷，而在此用到的思想資源主要繼承了台灣的自由主義。

《盤古》眾人決定創立《盤古》以回應當時的環境，是一個非常精準的決定。不得不說，它創刊後很快就獲得了右派場景中的年輕人的注意。1967年4月7日的《新亞學生報》中，就開始有進步青年討論這份刊物，在〈我認識「盤古」之後〉一文中，作者杜萊形容《盤古》為他和一些知己朋友帶來了「深刻的喜悅」，並且為《盤古》的嚴肅性辯護（因為《盤古》沒有輕鬆的言情小說），說那些因為《盤古》嚴肅而不願意閱讀的人是「專以時尚做幌子的人，簡直連市儈不如」。⁹可見《盤古》一創刊就吸引到一小批忠實讀

⁷ 盤古，〈目錄〉，《盤古》1期（1967），頁1。

⁸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70年代雙週刊》29期（1973），頁7。

⁹ 杜萊，〈我認識「盤古」之後〉，《新亞學生報》，1967年4月7日，版4。

者，並且佔據了文化和知識界刊物的高位。雖然這個高位一開始是叫好不叫座的——《盤古》一開始並不是廣為文青接納的大刊物——但卻是進步知識份子的象徵。

4-1-2 以「創建」為線索：《盤古》與友聯及西方激進主義的親密性

「創建實驗學院」（下稱「創建」）的辦學宗旨是「推廣一般和專業教育，使失學、就業或在學青年和成年都有機會追求實用智識技能，發展個人人格心智」，科別包括建築科、藝術科、文學科和實驗教育科。¹⁰《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對「創建」的簡介如下：

「創建書院」於1968年10月成立。由包錯石、胡菊人、文樓、戴天等創辦，是一全人性質的文化團體。「創建書院」受當時世界學生運動及歐美流行的「自由大學」觀點所影響，希望提供開放、不問學籍和沒有學制的學術活動，使各種不同思想衝擊和交流機會，藉以推廣和實踐實驗教育理念，使參與者透過自由討論培養自發自主學習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創建書院」開設科目包括：藝術（導師有：戴天、胡菊人、林悅恆等）、建築（導師有：鍾華楠、陳淳翰等）各方面。除開設藝文專科外，並舉辦文化茶座，曾與《盤古》全人舉行聯歡聚會，《大學生活》主辦電影會亦常在「創建書院」舉行。¹¹

由這短短的簡介，我們可以知道兩件事。第一，「創建」的師資陣容非常優良，甚至可以說「星光熠熠」。譬如負責主講中國文學概論、現代文學欣賞與批評及詩作坊的戴天，曾在1967年前往過美國愛荷華的作家工作坊，可以說是「創建」的名人招牌；以包少昕為筆名主講文化理論的包奕明，則是台灣著名的才子。第二，「創建」在1968年創立時與《盤古》在人手上高度重疊，而且也有友聯系統的人參與。譬如，「創建」的林悅恆是《盤古》編輯，曾任《大學生活》總編輯及《中國學生週報》社長，也幫忙借用了友聯在九龍塘多實街的會址給「創建」當校址；¹²胡菊人和戴天是友聯《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

¹⁰ 林悅恆、盧瑋鸞、郭詩詠，〈林悅恆〉，收入盧瑋鸞、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一）》（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199。

¹¹ 黃繼持、盧瑋鸞、鄭樹森，《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素葉，1996），頁137。

¹² 林悅恆、盧瑋鸞、郭詩詠，〈林悅恆〉，頁200。

和寫手；在「創建」教導藝術科素描和初級雕塑的文樓則是《盤古》的封面設計師。「創建」因此可以看成是和《盤古》在初期相依的計劃，兩者也與友聯系統息息相關。

在第一章，我曾提到友聯系統是如何發源於第三勢力，及後來自發地成為「第三勢力右派」，在冷戰下積極地成為宣揚「自由世界」的志願軍。然而，我們不可以因為《盤古》及「創建」和友聯有人事上的關聯，就把《盤古》及「創建」當作友聯系統下的計劃。事實上，正因為《盤古》不在資金或資源上依賴友聯或國民黨右派，《盤古》在編輯上一開始就表現出驚人的獨立意志。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它在第8、9期刊登了包奕明具新左翼毛派色彩的文章，而這些文章正因為林悅恆認為友聯旗下的刊物都無法刊登，《盤古》才把文章發表。¹³此外，「創建」的主辦人之一就是包奕明，他是一個新左翼毛派，並不是第三勢力。而「創建」成立初期也被左右派共同批評¹⁴（儘管周魯逸認為，包奕明已經知會過左派「創建」之成立，左報對「創建」的批評只不過是「放煙幕彈」，以掩飾包奕明想說服「創建」「左傾化」的工作¹⁵）。

「創建」曾經在文社圈引領過一陣風潮，甚至被認為是西方激進主義思潮的聚集地之一。譬如，當年從澳洲回來的莫昭如當年也曾受到「創建」激進主義色彩吸引，成為「創建」的學生，還上了一門存在主義的課。莫昭如這樣敘述西方六〇年代激進主義思潮和「創建」的關係：「胡菊人和戴天在看到六〇年代的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就做 anti university、counter university，自己做課程，做自己想認識的東西……」¹⁶如果說，《盤古》比較有民族主義家國情懷，在宗旨上依然包括重視以理智態度探討中國傳統文化、以獨立觀點評論當前「中國」問題；那「創建」則比較洋氣，對西方激進主義思潮有更多引薦。

4-2 以包奕明為線索：《盤古》左轉背後的理論家

一開始，《盤古》是自由主義刊物，立場是反共批蔣；「創建」則帶有西方激進主義思想色彩，但兩者均與毛派思想相距甚遠。然而今天，我們對《盤古》的印象多是認為它是一本「挺中共」的刊物（而「創建」很快就沒有經營下去了）——其編輯部甚至在

¹³ 古兆申，〈現實的回歸〉，頁 147-48。

¹⁴ 戴天、盧瑋鸞、熊志琴，〈戴天〉，頁 260。

¹⁵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未出版，2018）。

¹⁶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1972年發表了支持文革的宣言〈向本港牛鬼蛇神輿論宣戰——揭漢奸特務及「中國專家」的嘴臉 革洋奴買辦及封建餘孽的狗命〉¹⁷，光是那文革語言色彩濃厚的標題就嚇了大家一跳。

要理解《盤古》的轉向，就要先理解包奕明這個人。古兆申曾經回憶道：「這位作家對我們的影響相當大。在所有人都針對文革和左翼思潮的時候，他將左翼思潮帶回香港，因為他從美國回來，美國那時正是心左派運動最激烈的時候。」¹⁸可以說，《盤古》的左翼思想，是由包奕明首先帶來的。

包奕明是台灣外省人，父親包華國是國民黨高官，包奕明小時候隨家人赴台灣。五〇年代初，包奕明在台大讀政治系期間，與李敖、王尚義合稱台大三大才子。¹⁹陳鼓應說，包奕明很有「家國情懷」，這個情懷加上他的才氣，使得他在台灣時在知識份子圈內就有頗具影響力。²⁰在1961年，他和陳鼓應、張紹文等人結拜成兄弟，並且和王尚義、劉玉英、林澄波等人組織演講會；包奕明講的就是存在主義哲學，而屬於他們老一輩的殷海光，也是偶然會出現在演講會中。²¹此外，包奕明對《文星》的編輯走向也有很大影響。²²後來，包錯石因為涉嫌組黨串連被國民黨逮捕入獄。²³然而，我必須說明，這時候的包奕明——至少在外表上——只是自由主義者。²⁴

¹⁷ 盤古，〈向本港牛鬼蛇神輿論宣戰——揭漢奸特務及「中國專家」的嘴臉 革洋奴買辦及封建餘孽的狗命〉，《盤古》44期（1973），頁1-5。

¹⁸ 古兆申，〈現實的回歸〉，頁147。

¹⁹ 鄭蕾，〈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思潮：以「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為視點〉（嶺南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2），頁94。

²⁰ 陳鼓應，私人訪問，2021年4月2日。

²¹ 在我與陳鼓應在2021年4月2日進行的私人訪問中，陳鼓應表示，包奕明並非殷海光的學生，而殷海光雖然輩份上是老師，但與包奕明之間是平等的關係，陳鼓應認為殷海光對包奕明總體來說是欣賞的。關於陳鼓應與包奕明的結拜，參見陳光興、林麗雲，〈在六、七〇年代急流中勇退的漂浪哲學家：陳鼓應訪談〉，《人間思想》14期（2016），頁9-10。

²² 關於包錯石在《文星》中的影響，陳鼓應是這樣說的：「我記得包奕明在《文星》編輯部講科學整合和存在主義，他辯才如虹，我們都聽得入迷了。《文星》也開始從文藝性刊物轉向與歐新思潮含量的刊物，代表了年輕世代的想法和欲求。」參見陳光興、林麗雲，〈在六、七〇年代急流中勇退的漂浪哲學家：陳鼓應訪談〉。

²³ 關於包錯石在台灣的组织活動，陳鼓應曾經有以下的說法：「〔我們〕曾經一同勾畫過一些自由民主理想的模型，甚至想像要買槍、搞革命、推翻蔣介石政權。」而後來包奕明因為組黨串連被抓，陳鼓應估計，是和他「跟孫立人那條線有關，或許也是因此被捲進去，也可能是因為包奕明人士台大同學吳定遠，後來五因政治因素被抓起來關了二十年左右。」參見陳光興、林麗雲，〈在六、七〇年代急流中勇退的漂浪哲學家：陳鼓應訪談〉。

²⁴ 由於包奕明已經往生，他在台灣時在思想上是否早已左轉，或參與台灣的地下左翼組織，我們都不得而知。雖然陳鼓應與包奕明的「大弟子」周魯逸（筆名魯凡之）認為，包奕明在台灣已經左轉。而周魯逸認為這主要和兩個原因有關。第一是家庭的影響：包奕明的母親思想左傾曾被中共地下黨成功統戰，奔赴延安，但卻於途中病逝陝西寶雞；包奕明13歲時，其仍然是中學生的長兄於國共內戰期間，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南京學生運動，進而參加中共解放軍而失去聯絡，而周魯逸曾提到包奕明曾和他表示過他「受其母親和兄長的思想及事蹟影響很大」。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包奕明父親是國民黨高層的特殊關係，包奕明因此可以到國民黨中央

後來，包奕明因為被捕，父親透過關係把包奕明從牢獄中救了出來，不過被拘禁期間，包奕明還是沒逃過殘酷的私刑折磨。²⁵1963 年，包奕明父親擔憂自己死後不能再保包奕明平安，送包奕明往美國讀書，包奕明因此去了哥倫比亞大學讀書。²⁶而在美國這段時間，包奕明悄悄地從一名自由主義者變成了新左翼毛派。

接下來，我將會選擇三篇最能代表包奕明的新左翼毛派思想的文章，去講述包奕明的思想何以從「自由主義者」的起點出走成「新左翼毛派」、並且「何以毛派」、「何以新左翼」並在後六七恐共的恐政治氛圍下談毛澤東思想。了解包奕明的經歷和思想，可以讓我們理解《盤古》左轉的軌跡，也可以間接理解在後六七暴動時代，以包奕明為代表的新左翼毛派思想何以可以重新登上香港的政治舞台。



圖 8、圖 9：包奕明照片（圖片來源：包世一提供）

黨部圖書館讀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禁書（在台灣當時的白色恐怖下，坊間是很難獲得這些思想資源的）。因此，周魯逸認為，包奕明在台灣已經左轉，並且是「社會主義左派／反蔣反美帝反台獨地下鬥爭領袖人物」。雖然有種種跡象顯示包奕明在台灣或許已經左轉，但我在台灣追查的過程中，並無找到其他來源的證據證明包奕明曾經有和其他台灣左派串連過，更不要說有任何與之相關的行動。其中一個明顯的指標是，包奕明等自由主義者雖然是和陳映真認識的，而陳映真是當時他們小圈子內都知道的在看左翼書的人，但在台灣期間沒有證據表明包奕明曾和陳映真那邊的左翼搭上線。所以，包奕明很有可能是一個「孤獨的左翼個體」，而沒有與任何左派有組織上的關係。而且，包奕明到了美國才開始公開表露自身的左翼傾向。關於包奕明在台灣接觸到左翼思想的部份及家庭對他左轉的影響，參見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關於包奕明在台灣《文星》圈子與陳映真的關係，參見陳光興、林麗雲，〈在六、七〇年代急流中勇退的漂浪哲學家：陳鼓應訪談〉，頁 11-13。關於筆者對包奕明左轉的分析和證據，將會在後續寫到。

²⁵ 劉健威在接受筆者訪問時表示，包奕明手腳都有被煙蒂烙傷的疤痕，是他被國民黨私刑折磨的證據。參見劉健威，私人訪問，2021 年 4 月 25 日。

²⁶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4-2-1 〈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包奕明的蛻變之路

1963-1967 年，包奕明到美國讀書和工作。雖然受過一番牢獄之災，到了美國的包奕明依然不減風采及活力，根據當時《思與言》的編輯、與包奕明在美國相識的 H 的說法，包奕明在美國時依然喜好結社交友，經常跟大夥兒在一起，非常熱鬧：「他在台灣時就有好幾個結拜兄弟，他在美國的時候經常都有好多人來找他。包奕明很能談，他們就經常高談闊論，高朋滿座。他也很有魅力，又喜歡唱歌。」及後，他和結拜兄弟就在 96 街自己租了公寓，並在那裡組織了非政治化的聚落「填空社」。²⁷

1963-1967 年也正值美國反越戰和黑人民權運動最為熱火朝天之時，這種火熱是時人很難置之度外的。1968 年，曾與包奕明來往的黃守拙就在《人物》上提到他與包奕明所身處的美國社會背景：

近三年來，越戰的擴大以及黑人城市暴動日趨惡化，使美國社會輿論趨於極端……在很多民權社團及反戰社團中，一部份白人自由主義份子紛紛推出，控制權利漸漸操於激進的黑人青年手中……最近，少數最激進的黑人青年領袖人物更倡「革命」只說，希望把美國黑人的「革命」行動與亞非拉拉丁美洲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連成一氣，以擴大聲勢，互為推動。²⁸

文中的「黑人城市暴動」指的是 1964 年的哈林區黑人暴動；「白人自由主義份子紛紛退出」指的則是在 1966 年「學生非暴力統籌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以「黑人權力」(black power) 為理由，勸退組織內的白人離開，去另立以遊說白人為主的民權運動機構；「少數最激進的黑人青年領袖人物更倡『革命』之說」指的是 1967 年聲勢逐漸浩大的黑豹黨的毛派言論。同時，H 也提到了當時火熱朝天的運動影響了「填空社」：「填空社雖然沒有參加政治活動……但他們對那些問題是有興趣的。」而在畢業後，由於包奕明在各個地方工作——從酒吧俱樂部演唱，到賭場打工，最後再開小雜貨店——包奕明接觸的社會層面很廣，因此對正在改變的社會的氛圍特別敏感，H 說：「他就在這個時候開始關注民權運動組織 SDS 的動態。」²⁹

²⁷ H，私人訪問，2021 年 5 月 17 日。

²⁸ 黃守拙，〈「新左派」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挑釁〉，《人物》16 期（1968），頁 13。

²⁹ H，私人訪問，2021 年 5 月 17 日。

這裡提到的 SDS 即 1960 年創立的「學生民主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是當時與「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同樣重要的兩大參與黑人民權運動的學生組織。SDS 在反越戰中也同樣高調，後來屬下的分支如「weatherman」更以鼓吹武裝革命而聞名。回港後的包奕明，經常大力推崇 SDS 的政治——特別是當中毛派的部份——可見包奕明的左轉時期與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息息相關。

包奕明左轉的起心動念，也可以在他 1968 年以包少昕為筆名所寫的〈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³⁰一文中看到。這篇文章的起源在於他寫信給《人物》(後改名為《人物與思想》)的編輯許冠三，提到了他對自由主義思想刊物《思與言》的一些批判，而由於許冠三自行把信的部份內容給節錄出版了，包奕明就順勢於《人物》公開了自己對《思與言》的看法——這就是為什麼文章的副標題指出自己是要回應《思與言》的「編輯諸君子」和「守拙齋主人」。許冠三為著名歷史學家，《人物與思想》為他自己出資在香港印刷的刊物，影響了麥海華、何俊仁等一代年輕火紅年代運動領袖後來成為了「反國粹派」的「民主自由派」，刊物也有明顯的自由主義反共立場。³¹但在這篇文章中，包奕明可謂是深入了自由主義重鎮，以不名言「左」的方法去解釋自己轉變(其實就是左轉)的經過，同時也婉轉地道出了他對《思與言》的自由主義的批判是出於什麼立場(其實就是新左翼毛派的立場)。

文章一開始就提到，自身是在參與黑人民權運動時與一般民眾接觸後開始轉變的。包奕明提到，在「與街頭巷尾的各色人等閒談時」，他驚訝地發現，那些「不以知識、研究、著文、讀書、教書位專業的『人群』卻對知識有著極高的興趣和尊敬」，他們其實對社會各種事件都有著自己的想法，而那些想法都是建立在他們「彼此共有的生活經驗和道德是非取捨」之上。³²他認為這些意見之「切實」，使得他們是「民間知識家」——「他們雖是業餘的知識家卻又是職業的社會生活實踐者」。他這樣形容這些民間知識家的力量：

往往讀書人要窮一生之力用符號去分析解釋的知識，在他們卻能以一瞬間的決意用行動去綜合而且表現出來。事實上，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變動中的社會的活生生的反映，同時也正是社會這個大銀幕的一粒粒光點。正是這個千千萬萬交動互射

³⁰ 包少昕，〈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人物》16 期(1968)，頁 3、10-12、43。

³¹ 關於《人物與思想》及民主自由派的關係，參見麥海華、劉麗凝，〈民主自由派・反國粹大聯盟・香港前途問題〉，《思想香港》8 期(2015)，<https://commons.ln.edu.hk/thinkinghk/vol8/iss1/3>。

³² 包少昕，〈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

出的光點，才織造出一幅幅日新月異的社會現象的畫面。所以，再討論任何問題時，他們幾乎都有意見，這些意見也很切實。工會方上場時正當正午的一次有關城市暴動的辯難，如果吧參與其中的黑人、玻人、猶太人、白人、學生、教授、工人、小職員的高論錄音下來，那一句句話絕對比當天紐約時報的社論的一個個字更能射入讀者的心房，更能擊中那個病態社會的要害。³³

一方面，包奕明深深地受到民眾的「一瞬間的決意」及「用行動」所震動，感受到來自平民的知識威力是如何能「更能擊中那個病態社會的要害」。另一方面，包奕明則對「知識份子」（特別是「港台的知識份子」）感到失望，認為他們「困守在符號世界中，不僅使它們的知識更貧血更無據，而且也使他們的人生態度以至於思想動向更陷於偏執僵化的絕境」。那到底包奕明如此憎恨的這些「知識份子」具體指什麼人呢？他接著舉例了當時的文化論戰，對論戰中的兩派知識份子加以批判。包奕明說：

所謂文化論戰正是這一個例子：本國文字符號「退回」到傳統，或者透過外國文字符號「超越」到西化……知識份子的文字符號之爭正足說明他們存在的架空無根……脫離社會大多數活生生的經驗生活和共同參與，他們就只有被迫而越為社會中的特權少數去幫閒。³⁴

他筆下的文化論戰指的是自 1962 年開始，因著李敖在《文星》上發表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所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大量著名的台灣知識份子都加入筆戰，包括了胡秋原、劉述先、居浩然、許登源、鄭學稼、任卓宣等人，也包括了包奕明的好朋友陳鼓應及徐復觀。主張全盤西化的李敖被認為只是胡適之的全盤西化論的翻版，論戰因此以討論胡適到底有多大學問及討論全盤西化論這兩個軸心展開，主張全盤西化、支持胡適的被稱為「西化派」，與之對立的則是「傳統派」；兩派之爭也因此可以理解成是自由主義與新儒家兩種思想的矛盾。

然而，此時的包奕明卻認為要走出第三條道路——他似乎對無論自由主義的「西化派」還是新儒家的「傳統派」都失望了。包奕明除了懷疑西化派並不契合中國需要，認

³³ 包少昕，〈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

³⁴ 包少昕，〈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

為西化派可以讀「殖民地運動史」、「工人運動史」、「中國的被殖民史」、「扶貧狀況和人口土地問題」以外，同時懷疑傳統派不了解俗的文化，認為傳統派應該要讀「地方誌」以挖掘中國的信仰不只是限於儒教和佛教，而也包括了民間信仰。當包奕明將兩派均看成是「離地」的之時，其實已經折射出他自身的取態、立場與思想——那就是要「貼地」。而當包奕明認為「民間知識家」最貼地之時，他因此提出了唯有「從人群中來」、「向人群中去」的知識計劃，才是知識份子應該走的第三條道路。這個知識計劃必須注重「人群的價值、知識、制度」，而不是硬搬西方的民主到中國去。包奕明是這樣去演繹「從人群中來」、「向人群中去」的：

也唯有抓住「群中來去」這條線索，庶幾乎還能觸及人物的脈搏。人物是什麼？在社會文化演變中，既能從人群的行動和經驗把價值、思想、知識雛胚找出「來」而加以豐富化系統化，又能把者系統化精煉化了的價值、思想、知識倒轉來向人群傳送進「去」，使之劃為人群有一定導向的社會行動和有一定重心的的個人人格，凡能完成這些任務的人便是歷史社會中的人物。因為人物這種居間於「從群中來」「向群中去」的媒介作用，才使社會的價值、思想、知識、制度在一來一去的社會行動中不斷地得到檢驗、保存、豐富和改進。人物在本質上是一種媒介者，真正的創造者和實踐者只是人群在長期中的社會行動和那行動業績的積累。能脫離於人群的行動經驗而無中生有的創造及創造者是沒有的。³⁵

這一段現在讀來甚為抽象。其實他的意思是，他認為知識份子作為「人物」是一種「媒介」。其責任是放低之前在象牙塔中要搞「純知識」的想法、貼近「人群」，並透過「從人群中來」、「向人群中去」的方法——透過搜集人群的經驗——去打造一種適合人群的社會的價值、思想、知識、制度，然後再讓人群去驗證這套價值、思想、知識、制度，再反覆往來。而因為人群是社會行動的「真正的創造者」和「實踐者」，因此他們也是驗證這些價值、思想、知識、制度的標準。而作為「人物」，也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地從這些「人群」的檢驗中去修改那套價值、思想、知識、制度。

³⁵ 包少昕，〈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

此時，他的毛派思想傾向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了：「從人群中來」、「向人群中去」不就是毛澤東思想中的「群眾路線」嗎？對知識份子作為「媒介」的要求，不就是毛澤東對共產黨員的要求嗎？

第一，他以上這一段對「人物」與「人群」的定位，其實和毛澤東對於「共產黨員」和「群眾」的定位高度相似。毛澤東說過：「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³⁶第二，包奕明認為「人物」應該「從人群中來」、「向人群中去」的路線，也和中共對「群眾路線」——也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理解高度一致。1943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若干問題〉一文中是這樣闡述「群眾路線」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意思：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³⁷「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其實就是中共對領導群眾的方法和工作方法系統化、條理化的總結。包奕明所主張的「從人群中來」、「向人群中去」，其實就是毛澤東思想中「群眾路線」的意思。

4-2-2 〈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右派情感、毛派理論

1968年，包奕明離開美國，前往香港。³⁸而在離開美國之前，包奕明把〈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全文寄到了香港的《盤古》，在《盤古》第8期及第9期刊登。³⁹然後，在《盤古》第10期，由包奕明主筆，同時聯同多位《盤古》編輯發表〈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⁴⁰及後，包奕明參與了「創建」的成立。曾與包奕明在1971年保釣期間共事過的劉健威也是這樣形容包奕明的影響力：「他的人自己是有自己的魅力，

³⁶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5〕），頁1096。

³⁷ 王歡、王曉東，〈重溫毛澤東關於密切聯繫群眾的經典論述〉，<https://bit.ly/3tsvcJR>（檢索日期：2021年5月4日）。

³⁸ 周魯逸認為，包奕明離開美國是一個臨時決定，對美國的朋友來說是「突然消失」了，那是因為包奕明受到美國CIA威脅；到港後，包奕明首先投靠了徐復觀一段時間。參見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51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³⁹ 關於《盤古》收到包奕明的越洋投稿，見古兆申，〈現實的回歸〉，頁147。此外，《盤古》第8期出版於1967年10月，包奕明還在美國；但到了第10期的時候，包奕明已經和其他《盤古》編輯合寫文章。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包奕明是在1967年10月到1968年1月之間到港。

⁴⁰ 包錯石、張懷人、陳齊等，〈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盤古》10期（1968），頁2-16。

因為他很有才華，很有才情。我覺得他的政論寫得太好。他在之前那些文章，文彩實在是太好了，胡菊人、戴天、古兆申等人，當年都佩服到五體投地。」⁴¹

〈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和〈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這兩篇文章是包奕明在香港發揮其影響力的第一步，用一鳴驚人來形容不會過分。其對知識青年的震撼除了來自包奕明的雄辯滔滔，也來自文章呼之欲出的左派傾向——這在後六七的香港可謂挑動了大家恐共的神經。於是，無論是同意文章的還是反對文章的人，都急著出來抨擊、相挺或發表意見。⁴²這兩篇文章引起的迴響和筆戰，也讓包奕明聲名大噪。

此外，由於〈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一文首次提到「回歸」二字，包奕明等人也因此是香港第一批提出「回歸論」的人。然而，當時包奕明等人討論「回歸」時主要是圍繞「人心和認同的回歸」，而不是「政權的回歸」——這個「回歸論」在當時之所以出現，並不是要回應一個明確看得見的香港政權的回歸，而是要回應海外華人的分裂和台獨論。以下，我將討論包奕明「回歸論」的結構，及其論述和理論特色。

（1）回歸的第一步：民族主義作為一切的「真實」

那包奕明是如何論述「回歸」的正當性呢？文章的第一步是首先討論民族主義情感，並以此作為基礎為自己後續的回歸論述鋪路。也就是說，在包奕明的文章中，「民族主義」是不大需要被解釋的，而是被當作一切的前提，是「真實」的根源。包奕明這樣形容這種民族主義：

那麼——如果你要知道「誰是中國人」——要「獨立」、要「失落」、要「苟全」、要互輕互疑、要斬斷回憶、要寄人籬下、要老死異域、要堅忍迫害、要冷了血、要死了心的人，就是「中國人」。雖然他們頂了中國人的名字、用著中國人的語文、過著中國式的生活、也被外國人責以中國人的重任、更分享全人類加諸全體中國人的榮辱是非。⁴³

⁴¹ 劉健威，私人訪問，2021年4月25日。

⁴² 相關的回應文章，至少包括董堅白，〈讀包錯石先生「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有感〉，《盤古》11期（1968），頁0；李金曄，〈為發「回歸」熱的人醫病——從包錯石的文章看包錯石〉，《盤古》17期（1968），頁2-5；陳婉瑩、莫壽平等，〈第一塊石頭：我們對回歸運動的一些建議〉，《盤古》13期（1968），頁48-52；鍾馥，〈淺談李金曄〉，《盤古》18期（1968），頁9、20-21；張喜民、砥柱、方清、雲濤、王五，〈讀者對「未發回歸熱的人醫病」一文的意見〉，《盤古》18期（1968），頁43-45。

⁴³ 包錯石、張懷人、陳齊等，〈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頁3。

從以上看來，包奕明對當時的「現況」(status quo)的理解是，「中國人」的內涵多是充斥著負面情感的——也就是說，包奕明所理解的「中國人」的民族身份認同是一種類似於海澀·愛(Heather Love)所說「毀壞的身份認同」。這種身份認同並不指向陽光的、整全的、積極的經驗，而是遍佈了各種「毀壞」：「失落」、「苟全」、「迫害」，甚至是羞恥（「寄人籬下」）、孤獨（「老死異域」）、割裂（「要死了心」）等經驗，並且是以負面情感與支離破碎為集體身份的黏著劑。我們也可以說，包奕明首先肯定了「花果凋零」論的影響力的客觀存在性；然而接下來，包奕明並不認為「花果凋零論」等「負面情感」應該被拿來作為何謂「中國人」的唯一定義。因此，他引用到了聞一多在《死水》中的詩〈發現〉：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
「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我來了，因為我聽見你叫我；
鞭著時間的罡風，擎一把火，
我來了，不知道是一場空喜。
我會見的是噩夢，哪裡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夢掛著懸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
我追問青天，逼迫八面的風，
我問，拳頭擂著大地的赤胸，
總問不出消息；我哭著叫你，
嘔出一顆心來，——在我心裡！

包奕明解釋道，在追尋何謂「中國人」的道路上，結果往往是跌入「失落」（「噩夢掛著懸崖」）；然而，他確信作為「中國人」不應該只有「失落」一種內涵（「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包奕明代入到詩歌中，去「追問晴天」，呼喊著作為「中國人」的意義——而答案卻是訴諸「心」（「嘔出一顆心來，——在我心裡！」）。對包奕明來說，「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一個「被隱藏」的集體身份，而這個被隱藏的身份卻又是「真正的自我」——就像被皮肉所包裹的心臟，卻又是血、脈的泉源。也就是說，包奕明對民族主義的看法，類似於新儒家所說的唯心主義，認為「中國人」是源發於「心性」，而也是

如霍爾（Stuart Hall）所說的「第一種身份認同」——認為有相同身份認同的這些人背後「有著共享的歷史和血緣，卻被其他強加於的或虛假的『我』所掩蓋」⁴⁴。在包奕明看來，身份認同因此是一個等待被發現和「復興」的過去，並且一旦成功就可以永恆地穩固對自身的認知。而推論至此，包奕明的論述中還沒看到左派的部份，反而比較像右派新儒家。⁴⁵

有趣的是，包奕明雖然肯定了在「現況下」作為「中國人」多是一個「毀壞的身份認同」的經驗——這並不像左派的說法，反而比較像新儒家右派的論述方式——但他接續的論述走向卻和新儒家右派分道揚鑣。

（2）回歸的第二步：入世是「真誠」的選擇

接續著，包奕明的第二步是對這種「毀壞的身份認同」開出了診斷和藥方，認為「毀壞」（也就是海外「中國人」在面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時「失去自信」、「失去歸屬」、「失去勇氣」、「失去了過去現在未來間生活的貫續性」、「失去了人的價值和道德力量」等）不是內在於「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的一種內涵——「毀壞」是源自於外在因素，也就是不夠「入世」。⁴⁶包奕明說：

如果我們真對自己誠實，我們會知道自己沒有一絲一毫的條件能夠「遺世而獨立」，也沒有一絲一毫的條件可以「入世而不為世所有」。我們應該入世，因為出了純粹而病態的主觀主義以外，沒有人真有出世的條件或能跳出存在的限制。問題只在於我們活進去的是什麼一個「世」。如果這裡有一個世——一個實實在在的群體——它的人間條件是最適合我們各個人的條件的，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們只有主動地向它參與。你可以一時興會或興拜而不去參與它，那你也必須寄生在另

⁴⁴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 Kathryn Woodward (London: Sage, 1997), 225.

⁴⁵ 在香港，當傳統左派要論述民族主義時，經常都會把以大陸為主體的中國塑造成一片光明的模樣，在處理非中國大陸華人的狀況時，則鮮少去肯定離散下的負面情感。因為這些負面情感——譬如「花果凋零」——會被認為是不需要的，因為在中共的認知底下，中共自國民黨手中解放了中國大陸人民，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蒸蒸日上，何來「花果凋零」和負面情感呢？甚至，左派在香港的工作——除了六七暴動外——也很少去承認香港是分裂出去的殖民地，因為香港只是被暫時割讓。這是一種非常詭異，甚至是掩耳盜鈴的說法，顯然與在港居民的現實經驗格格不入。然而，這種分類方法卻和左派圈內的組織邏輯相通：即努力把左派圈架於香港空中，隔離於跟殖民地政府的直接接觸，並且在這個層次上打造面向大陸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由此可見，香港傳統左派和包奕明雖然在意識形態上都傾向毛澤東思想，但兩者有非常不一樣的「起手式」。至少，包奕明首先肯定了「花果凋零」的民族情感的存在。

⁴⁶ 包錯石、張懷人、陳齊等，〈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頁4。

一個社群裡，以一個代替品去填補你的空虛，什麼社群的「人間條件」是最能適合個人的「人的條件呢」？很顯然，這只有用我們的「現在」來做一個尺度。凡是最能連貫我們的「過去」（傳統、歷史、習慣和回憶）與「未來」（理想、方向、需要和發展潛能）而有為我們的現在（目前的問題、處境和能力）找到一個位置，提供一個角色，安排一個發展的社群才是我們應該主動參與的社群……

即令如此，**那也只能以一個社群的力量去奮鬥，不是一個個原子人的群丑亂舞。**……

此所以當我們歸屬到中國而竟發現「不對，不對」時，我們仍然只有「哭著叫她」，要「嘔出一顆心來」，讓她住在心裡。即令是惡夢，你也只有回歸，也因為這回歸的勇氣和努力，你才能一掃惡夢的毒障，看清你的歸路。有了歸路，就是有了出發點，有了出發點，才能進而要求向著終點的企及。否則，一切都是一個空。⁴⁷

（黑體為筆者所加）

可見，包奕明和新儒家右派分道揚鑣的點在於：第一，新儒家所理解的「花果凋零」是一個無可避免的「中國人」的傷痛——因為中華民國如大樹般倒下，海外華人因此是類近「亡國」的狀態，因此無法不感覺自身的身份認同是「毀壞」的；然而，包奕明卻認為「毀壞」的感受是可以透過重新「入世」——也就是以社群的力量去奮鬥——而被扭轉的。第二，新儒家在面對「毀壞的身份認同」時，多訴諸「出世」的「靈根自植」，但包奕明卻鼓勵「入世」，甚至認為與之相對的「出世」才是導致「毀壞」的病根。第三，對包奕明來說，在「入世」還是「出世」之間，他之所以選擇前者，並不是因為外在的道德律令而已，也是因為「我們真對自己誠實」的前提下出於「真」的選擇——因為只有先「入世」，才有機會討論如何「回歸」，而對包奕明來說，「回歸」是尋找出路的第一步，是抗拒原子化、失落的必要步驟，甚至是人生必要的歸屬，這因此和內省的「靈根自植」是走向完全相反的路線。

⁴⁷ 包錯石、張懷人、陳齊等，〈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頁 4-5。

(3) 回歸第三步：「回歸」是要入一個最「真實」的「世」

既然包奕明已經從民族主義論證到「入世」以及「回歸」之必須，下一個問題就是要解答如何入世，以及要回歸到哪一個「世」。實際上，包奕明等人在此文章並沒有仔細規範要回歸到哪一個「世」，甚至明確表示「我們可以直接地大量地回歸到海外中國尤其是海外中國的國土——台灣」。然而，對包奕明等人來說，即使是回歸台灣，也只是回歸運動的其中一部份而已，回歸的步驟是這樣的：

我們的先發回歸運動是要在群體行動的層次上直接重建海外中國社會。我們的後發回歸運動是要在個人心裡和符號的層次上，回歸到包括大陸人民在內的全中華民族；並同時研究了解和批評大陸中國的社會現實。在重建了海外中國社會的基礎上，海外中國人民將和大陸中國社會的民主力量結合起來，這樣，全中國便必有統一的一天。⁴⁸

也就是說，入世、回歸社群、然後回歸以台灣為中心的海外中國社會，但這只是因為海外中國是分裂的中國的一部份，而回歸運動到最後必須回歸到中國大陸中去，與全中華民族統一。這也是為什麼他會認為回歸運動雖然是雙重的（人心首先要回歸海外中國，進而是大陸中國）；但卻是單向的（海外中國到最後要回歸大陸中國）。

為了支持這種單向的、以大陸為回歸重點的論述，包奕明因此提出兩個論點作為支持。第一，「我們回歸的主體是當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巨大民眾和土地，不是一個個特定的政權或聖人」——也就是說，因為大陸擁有更多的民眾和更大的土地，而且正在走向現代化，涉及到更多人的利益，因此是更值得大家去理解及投入。⁴⁹第二，包奕明等人認為：

凡政府能契合民眾透入民眾，了解他們之中多數人的真正需要和發揮他們之中多數人潛能的政治，就是政治權力和社會力量中有前途有功能一面相配合的、名副其實的政權。否則，就是政治權力結合社會惡勢力或少數特權，共同應用統治工具來分贓的、但「治」而無「政」的治權。⁵⁰（黑體為筆者所加）

⁴⁸ 包錯石、張懷人、陳齊等，〈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頁 11。

⁴⁹ 包錯石、張懷人、陳齊等，〈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頁 9。

⁵⁰ 包錯石、張懷人、陳齊等，〈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頁 9。

再一次，我們看到了包奕明對「真」的重視：入什麼世，就意味著要判斷哪一個政權才是「真」的。結合之前包奕明的〈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我們早就知道包奕明是肯定「群眾路線」的。然而，為什麼包奕明對「群眾路線」如此肯定、認為「群眾路線」可以行得通呢？那是因為包奕明認為「群眾路線」才符合人群「真正」的需要——因此「群眾路線」也使得中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政權。特別是，大陸文革恰恰是成功動員了全國大部份人，這在當時看來，更可以認證中共何以才是「得以契合民眾透入民眾、發揮了大多數人的政治潛能」的一方。

結合兩點來看，其實包奕明是想要把民族主義情感，首先轉化成對現代化及廣大群眾的關注，進而再轉化成對大陸——一個正走向現代化並擁有更多群眾的政體——的關注。然後，把對現代化及群眾路線的認可，轉化成對進行現代化及實行「群眾路線」的中共的認可，以達到完整的「回歸」。

總結以上，在〈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中，包奕明雖然沒有明言過支持社會主義中國，更沒有用到任何明顯的「左翼」或「左派」語言，在推論上卻是導向支持中共的。而從「肯定民族主義——要入世——要回歸真實——現代化和充滿群眾的中國大陸」這一系列推論中，包奕明認為回歸中共的中國才是解決「毀壞的身份認同」的出路。也就是說，包奕明的回歸論是從右派的民族主義情感為起點，同時契合了《盤古》的苦難中國民族主義氣息，然後把這些情感引向更積極的出路——也就是以積極「回歸」去轉介苦難中國民族主義的自傷、失落、憂鬱等「毀壞的部份」。

4-2-3 〈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回歸論」作為知識計劃

雖然〈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⁵¹出版於〈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之前，但將兩篇文章結合來看，〈研究全中國〉可以看成是包奕明回歸論的實踐方法，更像是一個「下篇」。如果結合〈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一起看來，〈研究全中國〉也更像是一個延伸——因為

⁵¹ 全文參見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盤古》8期（1967），頁24-28、33；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續）〉，《盤古》9期（1967），頁31-37。

它仔細地敘述了一個認同「群眾路線」的知識份子該如何做學問。我們不妨把此文章當作一篇對知識份子的倡議，在討論該如何把「回歸論」應用到知識計劃之中。

這篇文章的上半部份主要是「破」，是要批判在西方的華人留學生的保守屬性，拆解保守屬性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並且批評從此保守屬性產出的「匪情」研究的問題。包奕明認為，生產「匪情」研究的華人留學生不但成為了西方文化代理人甚至政治代理人，而這種「匪情」研究本身的方法也是錯誤的。他認為，這種方法以西方民主自由作為唯一的政治標準，高高在上地蔑視了土生的政治力量——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以至於「大陸的發展固然是『匪情』，就在科舉的留學不二看來，大陸的百態也不過是『土況』」。而為何這種保守的匪情研究會被進行下去？包奕明指出，除了因為它是舊科舉制度的求才入仕但不涉足民間去研究活的文化變體以外，也跟國民黨政府的「剿匪」清共路線有關：

大陸有人造了反，「農民暴動」的土運剋了「外國存款」的金運，於是政府和新科舉被爆到了台灣。一方面政府繼續它數十年如一日的剿匪，另一方面高級知識份子繼續他們數十國如一家的留學。剿匪預算逐步升級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七十，而匪情如故。⁵²

事實上，「匪情」一詞本來是國民黨政府的用語，而包奕明在此多次提到了「匪情研究」，是因為他認為「匪情研究」的問題是結構性的——是國民黨對知識生產的影響，使得知識份子對中國大陸國情有太多的先入為主，譬如認為「匪不愛國」、「匪不科學」、「匪不人道」、「匪不自由」、「匪不和平」、「匪太浪費外匯」、「匪太侵畧」、「匪太醜陋」、「匪太無知」、「匪不現代化」、「匪太貧窮」等。也就是說，當包奕明在面對許多海外華人的研究中對中共的批評時，他的反駁方法並不是就愛國、科學、人道等問題逐一反駁，而是把這些知識背後所生產出來的脈絡，歸類為受到國民黨匪情研究的知識生產子題所影響，導致這些反共論述內部有著共有的弱點——沒有站在「土」的角度進行研究。⁵³這可說是深入右派論述內部，來一個精準的四兩撥千斤埋身攻擊；而這就和當時香港傳統左派那種飄在自己的理想圖像中、無法拉近自身和被說服對象的距離去進行遊說、只會從敵我分明立場出發的遠程掃射，是剛好相反的——他可能甚至比他的「敵人」（國民黨）

⁵² 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頁 25。

⁵³ 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頁 26。

更熟悉整套反共論述。這也讓他在隱晦地支持社會主義中國時，沒有流於香港傳統左派那般的八股文。

那包奕明認為該如何反對匪情研究呢？他認為化解的方法是以「國情研究」替代之。而國情研究的特色，是首先要站在「土」的角度來研究——就是對實事求是及自力更生有所認可：

「窮幫窮成王，土幫土成牆」。這句諺語提煉出今天中國國情的精華：首先承認一窮二白，同時卻肯定自力更生。這種面對現實、就地取材（不僅是物質素材，也是建設人才）的態度是一種樸素堅實的態度、是一種草根性的土態度。沒有這種態度，就會對中國國情視而不見見而不聞，知而不解。⁵⁴

如果說包奕明的上篇，主要就是「破」匪情研究的話，那麼續篇則主要是「立」「國情研究」。他甚至在續篇最後羅列出了十個應該進行國情研究的理由，並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且把國情研究說得既可以符合現實功利、又可以符合理想。⁵⁵這篇文章在 1967 到 1968 年刊登，剛好是六七暴動尾聲，也是香港極度恐懼左派的日子。然而，這篇文章隱約地支持社會主義的文章，又和香港左派在六七暴動中慣用的高度激昂及理想化的語言風格非常不一樣。威廉斯在“Structures of Feeling”中曾提到，每一個階級的崛起都伴隨著新的風格，我們因此可以在風格的轉變中看到新生階級興起的端倪。⁵⁶那麼，包奕明此文章在風格上的創新，或許可以讓我們理解為何毛派的包奕明何以是香港的「新左翼」。

首先，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長大的包奕明，充分地把握了外界批評中共的論述套路，辯駁起來從容不迫；他的文章中並沒有任何明確歌頌社會主義或毛澤東的詞句，也沒有口號和毛語錄，他也不會因為支持社會主義而對讀者宣揚「共情人道」或「共情自由」

⁵⁴ 這十點歸納如下：一，民主的概念必須被脈絡化地理解，而不是被視為絕對（意思是不能以西方民主理念去說中共沒有「民主」，而是要理解中共的脈絡）；二，留學生在研究科學與現代化時不能只是崇拜結果，也要看到中西取徑的差異、潛能，和各自優劣，甚至從中重新分享中國對世界的貢獻的光榮（意思是不能把中西兩方只做表面的比較）；三，國情研究是知識份子的責任；四，留學生的人格形成會受到社會的「存在侷限」，國情研究可以超克這個人格的一些問題；五，喜歡反傳統的留學生更應該進國情研究；六，先做惠而不費的國情研究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西化；七，留學獎學金難以競爭，不如做國情研究；八，研究完國情再看匪情，會發現匪情的古怪和無聊，這個過程非常淋漓爽快；九，研究國情不難，可以成為一種新的娛樂或消磨時間的方法；第十點則只有很詩性的一行：「孤獨的影子和鄉愁的夢」。參見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頁 26。

⁵⁵ 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續）〉，頁 36。

⁵⁶ Raymond Williams,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128-35.

等，反而是處處要讀者理性研究，要「不懷偏見，不存私利，要為大多數中國人的長遠利益去觀察研究，心與身與」。而且這種鼓勵大家要仔細思考、深入研究的態度，也讓人沒法扣他是被左派洗腦的帽子，如果不仔細看內容，只看風格的話，包奕明這點甚至與《盤古》右派自由主義那種宣揚個體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氣質更為相近。這使得包奕明在本地傳統左派以外，開創了另一種毛派的寫作風格。

第二，包奕明非常擅長召喚知識份子的責任感（譬如，他提醒知識份子要「飲水思源」，要提防良心的「乾枯」），再把這種責任感轉化成民族主義。這雖然是之前新亞書院的知識份子非常擅長使用的一種遊說方法，但不一樣的是，他並不為研究的範圍設限，甚至鼓勵大家要研究社會問題，甚至是各地的社會問題：「英國毒情、蔣情獨情、匪情公情，都一律要把它當著『藉由中國人、乃有中國事』的國情來看待。」也就是說，他把那扇被儒家知識份子鎖死的門打開了，讓知識份子不再只能在「自我反思」和社會苦無出路中來回兜圈，而是鼓勵一種思想和研究的自由。這種思想進路可以說既超越了右派的刻意去政治化，也超越了左派的內聚和封閉。而又由於他在反對非理性、反對情緒化和反對匪情研究的陰謀的立場上站穩了陣腳，並且對扣「左派」帽子的反對論述進行了預防性措施，所以這也讓扣他「左派」帽子這件事的殺傷力大大降低。他在文章中說：「〔這樣的全盤論者〕所作出來的知識，我們不要也罷。這種知識其實是一套『帽子術』，即令我們抬頭迎上那排飛來的帽子，也不過只能知道某也左派某也右派某也中間偏左或右而已，至於七萬萬中國人究竟做了些什麼事，自己又能做些什麼事，卻全被低簷帽把視線壓得一無所見。」⁵⁷而這種反對扣帽子的言論，也同時拉攏了曾被右派攻擊的左派，以及曾被國民黨右派扣成是左派自由主義者，這種懂得拉近自己與被說服者的距離的遊說方式，也使得這篇文章很有情感渲染力，這讓他在超越左右派的同時，也可以左右逢源。

最後，包奕明在以「土情」去批判「匪情」的時候，其實運用的就是毛澤東思想中的「群眾路線」——若把「土」置換成「群眾」，整篇文章也是完全通順及成立的。也就是說，包奕明想透過說服讀者接受土情研究去接受「群眾路線」，從而接受社會主義中國——他的挺共立場是包覆在他的方法論裡，讓人難以輕易用之前那種醜化、妖魔化或陰謀化左派的粗糙反共論述應付之、打發之。這種隱晦的風格或者是為了迴避恐左的大氣氛，但也有效地讓人可以先拋開對中共在政治上的批判，在更思想性、理論性、抽象的層面去審視毛澤東思想。這種寫作策略也是之前本地傳統左派所少用的——因為毛澤東思想

⁵⁷ 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續）〉，頁 37。

對他們來說和現實政治過於貼近，反而讓他們缺乏這種理論化討論的能力——包奕明的毛派論述也因此別樹一格。這篇文章因此預示了新左翼毛派在香港的興起。

4-3 以包奕明為線索：《盤古》左轉背後的西方新左及反國民黨脈絡

在上一節，我曾經提到《盤古》以及與此相依的「創建」的反蔣反共傾向，也提到了《盤古》對民族主義關注及「創建」對新左翼思潮的關注。那我們該怎麼理解包奕明的思想在這些思潮光譜中的位置？如果說包奕明是本地左派，那為何他的稿子會被反共的《盤古》所接納？如果說他是「新左翼」而不完全和本地左派一樣，那他到底是何來的「新」？如果說他是新左翼，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他在《新晚報》寫了至少十篇文章批評「新左翼」？⁵⁸我們該如何定位包奕明？而難以定位包奕明的時候，我們能否反過來鬆動「新左翼」與「舊左翼」的二元定義、劃分與斷裂？

4-3-1 新左翼？舊左派？

六〇至七〇年代，一些非關經濟決定論的運動——包括反殖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環境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及女性主義運動等，都被認為是一系列與新左翼思潮有關的運動。我曾在前言提到，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赫魯雪夫否定斯大林、蘇聯入侵匈牙利等，都讓當時的西方左翼想在正統馬克思主義及蘇聯斯大林主義等傳統左翼以外尋找新路線；這些西方新左翼著重批判經濟決定論，並且認為可以從工人的生活經驗——特

⁵⁸ 根據包奕明女兒包世一提供的資訊，包奕明的筆名除了一般人已知的包少昕和包錯石以外，還包括了崔華、席辛佐、歐陽敏惠。以這些筆名去翻查，我們可以找到包奕明在《新晚報》「風華版」一系列批判「新左派」的文章。參見崔華，〈嬉皮與新左的文化反叛一樣嗎〉，《新晚報》，1970年5月17日，版5；崔華，〈新左嬉皮合二為一（上）〉，《新晚報》，1970年5月31日，版5；崔華，〈新左嬉皮合二為一（下）〉，《新晚報》，1970年6月7日，版5；崔華，〈論「新左」嬉皮的異同——兼論兩者與自由主義的淵源（上）〉，《新晚報》，1970年6月14日，版5；崔華，〈論「新左」嬉皮的異同——兼論兩者與自由主義的淵源（下）〉，《新晚報》，1970年6月21日，版5；席辛佐，〈試談「新左派」——由垮而誇、由迷藥到火藥〉，《新晚報》，1970年1月18日，版8；席辛佐，〈挖美國新左派歷史的根——經濟大恐慌與三類反叛的知識青年〉，《新晚報》，1970年2月22日，版5；朱剛，〈新左派的失離〉，《新晚報》，1970年2月8日，版8；朱剛，〈新左派與新階級——看美國反叛的知識青年〉，《新晚報》，1970年1月25日，版8；歐陽敏惠，〈列寧誕辰日評新左派（上）〉，《新晚報》，1970年4月26日，版5；歐陽敏惠，〈列寧誕辰日評新左派（下）〉，《新晚報》，1970年5月3日，版5。

別是文化經驗——中激發一種由下而上的階級革命性，這就解釋了為何會有反殖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等「非經濟決定論」的認同政治運動。⁵⁹

科西彥（Razmig Keucheyan）認為，新左翼的一些有別於舊左翼的共同點，在於對「異化」概念的重視、對權力的再思考、及對結構主義的回應。⁶⁰而當時和包奕明一同目睹黑人民權運動中新左翼風潮的 H 則用自身經驗去闡述他們當時對新左翼的感受：「當時新左翼和舊左翼最大的差別是什麼？新左翼最常說的一個詞是什麼？不是 liberation，而是 authenticity。」⁶¹1972 年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誠與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的出版就極具時代象徵意義。事實上，「真」（authenticity）與「異化」之間，也是相聯的，而這和當時總體的社會環境脈絡有關：戰後西方社會高等教育的普遍化，使得大學生畢業後不見得可以直接取得更多的社會機會，反而是加入「新」工人階級的大軍。1965 年佩雷克（George Perec）的《物》（*Les Choses*）就探討了個人對「真」的願景與社會的異化之間的撕裂與拉扯。⁶²

如果只是以新左翼的表面特徵，以一種靜態的、「對著清單點算」的形式去衡量包奕明是否新左翼的話，我們很可能只會得出一個矛盾的結論。因為，包奕明雖然一方面展現了一些新左翼的特色：其自身的毛派啟蒙很明顯受到黑人民權運動的啟發，而且他非經濟決定論的論述方法、對民族解放抗爭的關注、對黑人民權運動的深入探討等，⁶³都是新左翼的拿手議題。特別是其著名的「回歸論」多次展現了對「真」的關注、對「原子化」的抗拒，而強調「中國人」要本著內心深處的真誠而選擇入世和回歸等——這些都帶有新左翼關於「真」和「異化」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包奕明卻處處撰文抨擊西方新左翼，包奕明認為，所謂的新左翼在美國結合了嬉皮士以後，不過是一種形而上的反叛，他說：

中間階級子女從一粒粒性藥、一套套性瑜伽（sexual Yoga）……一句句髒話、一樁樁「怪、力、亂、神」到一本本「新左」理論，確實是在唯「性」、唯「符」

⁵⁹ 關於新左翼與身份認同政治的興起，參見 Grant Farred, "Endgame Identity? Mapping the New Left Roots of Identity Poli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31, no. 4 (2000): 627-48.

⁶⁰ Razmig Keucheya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New Left'," in *The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London: Verso, 2014), 34-46.

⁶¹ H，私人訪問，2021 年 5 月 17 日。

⁶² Keucheya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New Left'," 35.

⁶³ 包奕明的許多文章都有黑人民權運動作參照，見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續）〉，頁 31-37；包錯石，〈試從就業與教育看美國黑人的命運（上）〉，《盤古》13 期（1968），頁 37-41；包錯石，〈試從就業與教育看美國黑人的命運（下）〉，《盤古》14 期（1968），頁 11-15。

上，痛快淋漓地一父母那一套「反叛」了父母那一代。父母幫閒著寄生性的資產階級，子女就以寄生來「反叛」中間接機家庭和資本主義「建制」；父母偷偷濫藥或換妻，子女就公開「群交」來「反叛」父母的性勾當（game）；父母挾右派或改良主義派的理論、「專有名詞」、「學術用語」以自重，子女就用新左貨新右的理論、「專有名詞」、「學術用語」來罵父母，父母愛好「新」文藝，子女就以更「新」超「新」的文藝來反叛。作為中間階級父母一代由奉承模擬資產階級而來的那一套資產階級文化本身所發展出來的對立物，中間接機青少年就善能以父母及建制之矛，攻父母及建制之盾。⁶⁴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跟「典型」的「新左翼」思潮看起來既衝突又融合的包奕明呢？

事實上，如果我們對新左翼的歷史有足夠了解，就該明瞭新左翼並不是鐵板一塊的一股思潮，所以用「對著清單點算」的方式去定義新左翼，首先在概念上是不妥的。譬如，新左翼之間的毛派、托派、義大利工人主義、情境主義、無政府主義、女性主義及無數「主義」之間，本來就是百花齊放。而這個百花齊放中，也不見得全部都和舊有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模式完全劃清界線，新與舊事實上處於互相爭辯但你中有我的的狀態：在戰後歐洲，儘管「歐洲共產主義」（Eurocommunism）越發流行，而不少西方新左翼也逐漸拋棄蘇聯模式，認為可以漸進地、民主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然而，我們卻可以同時看到列寧主義論述在譬如法國托派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 LCR）的走勢依然強勁。⁶⁵

也就是說，新左翼也非從此與舊左翼一刀兩斷——用「對著清單點算」的方式去定義新左翼無法捕捉新舊左翼之間的辯證關係。所以，我們不妨先把「新左翼」中的「新」以更「顧名思義」（literal）的方法去理解——「新」終究要對應著「舊」——要理解「新」在變動的歷史中對「舊」的創新、突破、傳承，「新」才可以成立。也就是說，新左翼的「新」只是特定歷史點上的新，並不存在去脈絡或超越脈絡的「新」。我們應當明瞭，就算西方新左翼在創新、在試圖超越舊左翼時，也不是和「舊左翼」截然二分的。在新左翼的創新中，當然會受到「外來」的啟發，譬如被精神分析理論所影響的馬庫色（Herbert

⁶⁴ 崔華，〈嬉皮與新左的文化反叛一樣嗎〉。

⁶⁵ Keucheya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New Left'," 39.

Marcuse) 和弗羅姆 (Erich Fromm) 就是一例——但這些創新有時候也受到「內在」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影響，譬如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就是受到俄國社會主義者普列漢諾夫 (Georgi Plekhanov) 和阿克雪里羅得 (Pavel Axelrod) 的啟發。⁶⁶也就是說，「新」與「舊」本來就是相對的概念。

4-3-2 從包奕明到《盤古》——香港新左翼毛派「新」在何處？

既然西方新左翼與舊左翼之間本來就曖昧不清，那麼在香港，包奕明的毛派思想儘管可能和「舊」左派思想（港共系統下的傳統左派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不妨礙包奕明可能是香港的第一個「新左翼」毛派。在掌握了新左翼定義背後動態的歷史邏輯及複雜性後，包奕明是否新左翼一事，就該放置在歷史中去理解其「新」才有意義。那麼，到底我認為包奕明的思想在對應香港的脈絡時，有何「新」呢？

第一，包奕明在參與《盤古》及「創建」時所展現的反建制色彩。《盤古》成員古兆申闡釋包奕明所帶來的「新左翼」影響的這段話非常有代表性，他這樣理解包奕明的新左翼毛派思想：

當時林悅恆的台灣同學包錯石剛從美國回來，這位作家對我們的影響相當大。在所有人都針對文革和左翼思潮的時候，他將左翼思潮帶回香港，因為他從美國回來，美國那時正是新左派運動最激烈的時候。新左派運動實際上也受文革影響，譬如說再教育的觀念就是。當然，具體來說，政治立場、背景都是對立的，但思想有某些共同點，例如：反建制。文革當時也從文化界的角度開始爆發，反對官僚主義、建制上所謂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教育文化方針，再激進點的講平等化。在西方，美國的新左派運動、歐洲的毛派、托派運動都首先在大學發起，大學的師生和文藝界都有參與。⁶⁷

古兆申這一段提到的包奕明對《盤古》和「創建」等人的影響，是在於其「反建制」的部份，特別是毛派理念中對教育觀念的創新，並且以教育改革作為一個反建制計劃。具體來說，就是包奕明是有份建立「創建」的。此外，他的〈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

⁶⁶ Keucheya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New Left'," 34.

⁶⁷ 古兆申，〈現實的回歸〉，頁 146-47。

情〉雖然以沒有明言的毛派立場來批評國民黨「匪情研究」的「知識生產」問題，但其結論卻不是要讀者加入香港的左派建制、支持六七暴動，或為香港左派學校搖旗吶喊，而是鼓動知識份子自發地做「國情研究」的知識生產。而包奕明自身在左派系統外辦學的身體力行，也說明了包奕明早期的毛派思想與行動，都並不是完全陷入左派和右派的建制之中。或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自由主義反共刊物《盤古》的編輯同人儘管並不全都同意包奕明的說法，依然刊登包奕明文章的使命感，古兆申說：

他的文章在當時——尤其以香港的環境來說，是反潮流的，絕對是反潮流的，所以那文章沒有其他雜誌可以刊登。我們開編輯會議時說，如果我們不刊登這篇文章，也就沒有人會刊登了，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它，它都是針對的思考。⁶⁸

也就是說，包奕明「反建制」的、鼓動自主的「國情研究」部份，其實是原本國共二元對立的「潮流」下都無法容納的——文章只能在《盤古》刊登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對反共的《盤古》來說，他們之所以會在反共的同時接納包奕明，是因為包奕明的新左翼毛派思想中的反建制價值超越了他親共的立場，因此不會被歸類為「中共建制」的一方，而是「反建制」的一方——《盤古》與包奕明的契合點，精準地標記了包奕明不為「舊」所容納的「新」的部份。

第二，包奕明調動知識份子主體性去參與革命的做法是本地傳統左派中少見的，甚至是對香港「舊左派」的一種創新。一直以來，本地傳統左派的主要工作就是重視工人組織，而不太重視知識份子組織——左派在香港沒有長期維持任何高等教育機構就是一個症狀。這也是為什麼在六七暴動中，大專院校學生幾乎一面倒地反對六七暴動——中共在大專院校界的工作相比工人運動來說要薄弱（這或許可以歸咎成中共對知識份子有所忌諱的歷史傳統：革命的主體性多落在工農身上，知識份子則時而被認為需要改造的對象）。雖然包奕明對知識份子的看法也並不是認為知識份子可以取代長期在社會行動中有積累的「真正的創造者和實踐者」——也就是「群眾」。⁶⁹然而，包奕明〈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和〈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這些文章的重點不是因此以階級決定論去放棄知識份子、輕視知識份子，而是把知識份子提升到成為潛在「共產黨員」的位置去調動知識份子成

⁶⁸ 古兆申，〈現實的回歸〉，頁 148。

⁶⁹ 包少昕，〈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

為「群眾路線」的一員——這種對知識份子的積極調動雖然也內在於毛澤東思想，並不是從零到有的創新——但相對於不重視調動知識份子在知識生產上積極性的本地「舊左派」來說，的確是一次大的突破。

4-4 「回歸論」之後：包奕明的潛伏與香港新左翼毛派的醞釀

包奕明的文章是在 1967 到 1968 年發佈的，而內容多是號召大家重建中國人身份，並認同中國是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六七暴動及其後的恐左及恐懼政治的氣氛下，包奕明的文章因此成為被激烈辯論的對象，掀起文化圈的一輪討論。譬如，1968 年，港大《學苑》刊登了陳婉瑩、馮可強、莫壽平、劉迺強合寫的〈第一塊石頭：我們對回歸運動的一些建議〉⁷⁰，算是以比較證明的態度對待包奕明的回歸論；李金曄則寫了〈為發「回歸」熱的人醫病·從包錯石的文看包錯石〉⁷¹，明顯地反對包錯石的回歸論。兩篇文章均被《盤古》收錄。

我們也不可以忘記，在恐左和恐懼政治的大氣氛下，「扣帽子」經常出現。古兆申回憶當時就兩篇文章的激烈討論所帶來的「扣帽子」風潮：

結果《盤古》發了此文，引起很大的衝擊，香港有很多人攻擊，包括李金曄、黃震遐等都有撰文批評，什麼帽子都扣了，但我們也照樣刊登，那討論也包括很多海外支持包錯石的人參與，譬如劉大任也寫文章支持包錯石。奇怪的事，在外國的華人知識份子通常支持，香港的通常反對，一些右翼文人不惜給別人扣帽子。當時胡菊人、戴天也受到包錯石某些觀點的影響，在《星島日報》或其他報刊撰文，表現了某程度的認同，但馬上受到本地右翼作家猛烈攻擊、扣帽子，例如萬人傑就給戴天、胡菊人扣上左翼的紅帽子。⁷²

而從 1967 年開始成為反共名人的萬人傑此後更是孜孜不倦地對包奕明等人發動筆戰攻擊，他對包奕明尤其批判，除了暴露出包奕明曾經被捕坐牢等事，甚至公然叫港英政府逮捕包奕明。

⁷⁰ 參見陳婉瑩、莫壽平等，〈第一塊石頭——我們對回歸運動的一些建議〉，《盤古》13 期（1968），頁 48-52。

⁷¹ 參見李金曄，〈為發「回歸」熱的人醫病·從包錯石的文看包錯石〉，《盤古》17 期（1968），頁 2-5。

⁷² 古兆申，〈現實的回歸〉，頁 148。

根據周魯逸的回憶，由於包奕明及周魯逸認為萬人傑是國民黨間諜，而這些攻擊把包奕明的親毛派立場挑明出來，包奕明因此很可能會招來港英政府的遞解出境（在當時，遞解出境是港英政府對付非土生土長的異議份子的常用手法）。包奕明若被遞解，就是遞解回台，那他必定會被以共匪的名義槍斃。包奕明認為萬人傑的攻擊事關重大，會帶來生命危險。因此，包奕明在 1968 年後，就「失蹤」避難了一段時間，甚至退去了在「創建」的參與，直到保釣才重新回到水面。⁷³之後幾年，這樣一個健筆消失於大眾的視線之中。從包奕明的避走以至於「失蹤」，可見包奕明文章所引起的辯論，在後六七的政治氣氛及脈絡下，是多麼激烈。

然而，「失蹤」的包奕明並非完全停止了他的新左翼毛派活動。根據周魯逸的文章，此時的包奕明已經和香港傳統左派連線。一方面，包奕明在加入「創建」前，也就是 1968 年 10 月前，已經和羅孚（香港地下黨員，著名左派報人）聯絡過；另一方面，包奕明的摯友周魯逸也是本地左派圈的活躍參與者。因此，包奕明「失蹤」期間，就是由周魯逸接應到某左派工會居住及工作，及後搬到沙田下徑口的村屋。⁷⁴包奕明此時是一種潛行蓄力、韜光養晦的狀態。

根據周魯逸的說法，下徑口村時常「會聚各路英雄」，不少學生和文人經常前來聚會或聽課（聽包奕明介紹西方及台灣的鬥爭及思想），或來拜訪、論政。⁷⁵這群人當中，不少在後來都成為火紅年代的重要人物，並且散播在不同派別中（雖然主要還是國粹派／毛派）。曾參與下徑口村聚落的馬紹良說：

包錯石呼籲共產理念上回歸祖國，這與黨的認同不同。他的思想很能風靡年輕一代的心，激發他們對根的追尋。那時候，我們常常在大圍一間村屋裡通宵達旦討論國事，那種思想衝擊很大，雖然包氏對我的影響不深，但漸漸我發覺我的思維層

⁷³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⁷⁴ 周魯逸在六七暴動期間，曾與朋友製作地下刊物《鑄劍》支持反英抗暴。事實上，他與包奕明的結緣，也是因為周魯逸在《盤古》的文章中嗅出了他是毛派，所以把《鑄劍》寄去《盤古》給他，兩人才成為朋友，進而建立起深厚的信任關係。除此以外，周魯逸也和左派工會有聯絡，曾經在一個小的左派工會中主持過「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協助工會積極份子讀《毛選》和講解中國近代史和革命史，也曾幫忙打理「國貨站」。參見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⁷⁵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面擴闊了。可以說，七十年代中的火紅年代也是由這裡衍生出來的。創建學園的一群年青人，後來成了國粹派的中堅人物。⁷⁶

曾來過下徑口村的，包括周魯逸、高耀、關永圻、黃子程、劉達政、鍾玲玲、陸文強、陳婉瑩、馮可強、周尚慈、李傑雄、莫昭如、吳仲賢等。⁷⁷當中，陸文強是著名的社會派。關永圻、黃子程參與了 1970 年的中運，後來在《盤古》左轉時也是編輯，間接影響了國粹派。周尚慈後來去了美國，在美國的保釣運動中，曾與郭松棻、許信孚、劉大任等人在 1970 年後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組成教學小組，在校內講授中國近代史，甚至在 1971 年四·〇九舊金山留學生遊行中，作為學生代表朗讀致美國政府抗議書。⁷⁸高耀、周魯逸、李傑雄則是香港保釣運動的活躍份子和保釣後期統一路線的骨幹。鍾鈴鈴則在參與香港四·一〇保釣示威中與吳仲賢等人共同被捕。陳婉瑩和馮可強是港大《學苑》編委，後來也是知名的國粹派，和成為托派的吳仲賢有不少過節。至於吳仲賢和莫昭如，也有分別去過下徑口村，但顯然沒有被包奕明說服，也沒有長期參與下徑口村的結社。

莫昭如當時剛從澳洲回來，是一個新左翼，為了尋找可以合作的伙伴，莫昭如在接受筆者訪問時說：「我跑去認識周魯逸、包錯石，那裡有一批人，他們後來是保釣會的。但他們是毛派，北京政權派的。他們都很有趣，但他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是左翼傾向。」⁷⁹而莫昭如感受到與包奕明的距離，也被周魯逸所認證，周魯逸在文章中說：「莫昭如搞《70 年代雙週刊》之前，也來過『下徑口村』與阿包、與我們討論各種問題（他年齡介乎阿包和我們多數之間），但彼此的思想可謂『南轅北轍』，他反對阿包和我的『毛派思想／中國社會主義取向』，雖不反對說說毛澤東『造反有理』，而我們則明確反對他的『無政府主義／美式反共自由主義』。」⁸⁰至於吳仲賢，也很明顯沒有被包奕明說服。吳仲賢在當時還是右派自由派，在右派「難民大學」珠海書院讀書，後來才成為托派，並且與國粹派交惡。不過，即使是吳仲賢與毛派或國粹派交惡期間，他對包奕明依然是

⁷⁶ 中大校友編輯委員會，〈It 教育家——馬紹良〉，《中大校友》33 期（2003），頁 17。

⁷⁷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⁷⁸ 姜宇晨，〈春雷怒吼釣魚台——1970 年代中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述評〉，<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t/2009/09/44715.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5 日）。

⁷⁹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⁸⁰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尊敬的。⁸¹不過，他從下徑口村時期開始，就和周魯逸勢成水火——周魯逸認為珠海期間的吳仲賢是親國民黨右派，以至於後來吳仲賢雖然左轉，周魯逸始終不予信任，甚至懷疑他是間諜。而吳仲賢則因為保釣的組織問題和周魯逸有明顯摩擦，甚至後來在《70》中說他是無賴。⁸²

總括而言，下徑口村的結社還是在思想上滋養了不少火紅年代的運動領袖——雖然這些人以國粹派／毛派為主。而且，後來保釣運動中三大勢力之一的「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也是由下徑口村的結社直接催生。不過這是第六章的故事了。

⁸¹ 在吳仲賢參與的《70》與包奕明參與的保釣會發生衝突時，吳仲賢雖然一邊罵包奕明的大弟子周魯逸是無賴，但一邊還是驚訝於包奕明對保釣會的包庇，可見他對包奕明有格外的期待。吳仲賢是這樣說的：「保釣會中包錯石是毛派，周魯逸是毛派，高耀是毛派，這是三個我認識的毛派……保釣會攻擊《70》及聯線，我不感到意外，周魯逸這個無賴（未離港前我已罵他是無賴）攻擊異己，我也不感到意外。感到意外的只是包錯石雖是毛派，但不失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為什麼可以容忍保釣會這種手段？難道他看不出這是道德上的墮落？」參見吳仲賢，〈八月的札記〉，《70年代雙週刊》23期（1971），頁13。

此後，毛派刊物《青年通訊》曾發文攻擊《70年代雙週刊》，吳仲賢因此在〈堅持世界革命總路線〉一文中還擊（文章雖曾公開發表，並收錄在吳仲賢文集之中，但由於具體發表年份及平台不詳，未能找到原刊版本查看，只能從上文下理推斷，文章發於1974年3月），他在此文最後一段寫道：「早兩日自發毛派前輩包奕明（包錯石）先生剛到訪，閒談中指出《青年通訊》的朋友都是十多歲的青年，認識都很淺薄片面，我絕不會因此指責《青年通訊》，況且也知道你們自己也強調學習。」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吳仲賢在被毛派攻擊之時，依然維持和包奕明的私交，甚至還引用包奕明的話並尊他為「自發毛派」，可見吳仲賢在與毛派總體交惡的同時並無與包奕明交惡。參見吳仲賢，〈堅持世界革命總路線〉，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業麗容，1997），頁227-40。

⁸²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頁13。

五、超越左／右派的先聲：從「沒有主義」到「紅黑」的《70年代雙週刊》

在《盤古》以外，另一本打破了後六七政治難局的刊物，要數1970年開始出版的《70年代雙週刊》（下稱《70》）。《盤古》與《70》兩本雜誌之所以如此重要，抽象來說，是因為在後六七社會上對政治恐懼、互扣帽子的氣氛中，這兩本勇於評論政治又勇於對左右皆持批判態度的刊物就如清流一樣，激勵了許多在左右難局下感到困頓、壓抑和失落的年輕人。具體來說，是因為這兩本刊物在1971年保釣運動中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保釣則是開啟火紅年代的關鍵事件，可謂一舉突破後六七恐政治的難局，發出了超越本地左右派的政治先聲，奠定了火紅年代的基調。如果說，《盤古》後來成為自發毛派的重鎮，重新介紹了毛澤東思想，也對校內國粹派有間接影響；那《70》則是「無政府主義派」與「托派」的搖籃。

在這一章的第一部份，我將會以當時24歲的吳仲賢及23歲的莫昭如這兩位在1970年《70》創刊時的核心人物為線索，以他們個人的生命經驗映照出他們各自代表的社會脈絡，並從此社會脈絡看《70》所繼承的本地、台灣與西方思想資源、及想要回應的社會問題。也希望從而解釋《70》的編輯邏輯，以及《70》作為一個團體的組織文化和組織形式。兩人在創刊前雖然都曾經去過下徑口村，但都沒有被包奕明說服，直到1969年「珠海事件」兩人才相識相知，創立《70》。在第二部份，我會深入介紹《70》的特質，除了探討早期的「無政府主義」色彩，也會把它和《盤古》進行對比，看看這兩本刊物如何是「異卵雙胞胎」。在第三部份，我則會介紹《70》短暫的無政府主義和托派共存的「紅黑並舉」時期，並且解釋托派的出走。這個介紹會橫跨1969-1973年——也就是《70》比較活躍的時期。至於《70》在1971年保釣運動的參與，我會在下一章專門處理。

5-1 以吳仲賢為線索：自由主義、本地社運與《70》的誕生

吳仲賢的大名，對熟悉香港社會運動歷史的人來說應該不陌生。現在，我們對他的印象多是關於他作為支聯會發起人及托派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聯盟（下稱革馬盟）的重要成員。然而，吳仲賢在進入社會運動前——也就是接續會討論的「珠海事件」前——是一名視國民黨為正統的自由主義文青。也就是說，吳仲賢是經歷了一番「左轉」和「政治化」的過程才成為後續大家所熟悉的托派社運人。事實上，吳仲賢的經歷也代表

了許多火紅年代青年的經歷。要了解這些火紅年代青年是如何破繭而出，就要先了解吳仲賢六〇年代所處的文社運動場景。

5-1-1 文社運動：獨立於政治？

文社運動是一個以青年為主體、以創辦各種文社為核心的文藝風潮。文社運動從五〇年代開始，在六〇年代風行。愛好文學的年輕人會在報章雜誌投稿，並且藉文字互相認識、結社。文社運動雖然以文藝活動為主，但也時不時會擦邊地觸及關於民族、理想、政治的討論。

在六〇年代，土生土長在香港的新一代青年，其實已經漸漸意識到香港並不是他們祖父輩口中的暫居地，而他們對眼中所看到、自身所經驗的社會問題，也開始覺得難以忍耐。然而，在第一章中我曾提到，在無論左派、右派和擺盪到右派的第三勢力都並不鼓勵反殖抗爭的前提下，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只能被抽象地感知成一些焦躁、憂鬱、失落、難受、疑惑、好奇的感覺。這些感覺像被困在一個壓力鍋中，如果沒有出口，往往會爆炸——1966 年的天星小輪加價及 1967 年的六七暴動，就可以看作是對社會問題的不滿下的兩次大爆發。但在兩輪暴動前，社會運動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可以解決對社會問題不滿和自身失落感的選項。當時的年輕人大多會訴諸文藝，這就是六〇年代的文社運動得以風行的條件。

青年結成文社，而不是走上政治化和社會運動的原因，除了可歸咎為六七暴動前香港沒有政治化的土壤，也跟文社運動的性質和性格有關。文社運動，其實就是「進可攻、退可守」。所謂的「進可攻」，是文社的「輕反叛」氣質：當教育制度是以灌輸為主，不是屬於教會系統（灌輸信仰）、殖民地官校系統（灌輸秩序），就是屬於左右系統（灌輸政治意識形態），在課外參與文社運動，嘗試吸收被灌輸以外的一套知識，更會被賦予是學生脫離教育控制的一種理想實踐和自我訓練的意義。專門研究文社運動的吳萱人，甚至稱文社運動的實踐在當時社會是一種「自我拯救」。¹此外，用中文而不是英文書寫，更可以宣示自己並不順從於殖民政府的某種獨立性、理想性。然而，曾參與文社運動的吳仲賢在 1988 年回看文社運動「退可守」的問題時說：

¹ 吳萱人，〈一條血脈一種姿勢〉，《70 年代雙週刊》9 期（1970），頁 9。

開始進入六十年代中期，這個歷史年代第一批主角登場了，他們便是「文藝青年」……他們喜歡文藝，甚至生活在文藝創作的天地中。他們喜歡創作，甚至以為創作中的世界才是現實；他們喜歡思索，甚至以為單憑沉思便可以改變世界；他們喜歡感性經驗，甚至以為這才是生命中最珍貴的……文藝青年時年輕一輩的社會現象，廣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年輕人的運動，表現的方式就是「文社運動」……他們是戰後成長的一輩，但周圍的環境使他們幾乎窒息了：原始的殖民地制度，警察是野蠻的替身，難民心態的長輩，社會冷漠和政治恐懼便是正常……於是，在沒有傳統，沒有啟示，沒有先驅的情況下，青年中敏感的，便在文藝中、創作中、沉思中、感覺中進行抽象的反省，反省個人生存的目的，肯定愛、肯定美、肯定真理。自覺與不自覺，儘管這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反叛。²（黑體為筆者所加）

也就是說，文社運動之所以「退可守」，是因為文社無論如何反叛，讀書、寫作、討論，其實都是「形而上」的，因為在實際環境中，他們的這種結社是安全的：這些活動既不危害社會安定，又被認為是健康的，是無論政府、學校還是家長都會樂於看青年人進行的興趣活動（因此，當年就有一句名言，叫作「多個社員，少個阿飛」）。³

然而，我們不能因為文社運動所標榜的獨立性（因為文社運動是六〇年代年輕人和他們父母——那些有著左派、右派或恐懼政治的包袱的「難民」一輩——獨立出來的運動），就以為它可以免於被左派、右派及由美國所影響的第三勢力右派的政治邏輯所穿透。事實上，就像新儒家南來文人來到香港後要依賴國民黨右派和美國的援助，或像曾標榜獨立的第三勢力從頭到尾都受到亞洲基金會的協助一樣，在六〇年代的冷戰香港想要獨立於政治是非常困難的。就算是資金上獨立的、意識上自發的文社運動，在人力資源和思想資源上同樣被第三勢力及右派所影響。這主要因為被譽為「難民大學」的珠海、大同、新亞等大專院校學生，經常積極地幫忙和中學生一起搞文社運動，⁴而這些文社運動青年有不少都接受著完整的反共教育。而且，文社那種內省的性格其實非常符

² 毛蘭友，〈回憶六十年代〉，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88〕），頁 820-28。

³ 毛蘭友，〈回憶六十年代〉。

⁴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衝破沈默——學運的醞釀期〉，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8〕），頁 9-28。

合右派南來文人的口味；其文以載道的性格，更讓文社運動容易契合右派南來文人的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

在右派和左派都不主張直接反對殖民主義的情況下，加上文社著重以文載道的士大夫性格，六七暴動前的文社雖然多標榜獨立，但也沾染了和社會抗爭絕緣的體質，更不要說反殖了。⁵畢竟，文社本身就有停留在思考和寫作的傾向，並不一定會推前一步指向抗爭行動。關於文社運動和火紅年代社會運動到底是繼承還是斷裂關係，前者是窒礙還是助長了後者的發展，吳仲賢曾經和吳萱人有過一番激烈的辯論。吳萱人極力主張兩者的連續性，吳仲賢則極力反對；但多年以後，吳仲賢認為「兩者都對，大家都錯」，因為「文藝青年是形而上的反叛，是象徵性的反叛。到了激進運動，卻是實踐上的、社會意義上的反叛」。⁶我也同意吳仲賢晚年的這個看法，我認為文社運動與《70》所開啟的激進主義社會運動，兩者是辯證的關係，雖然文社運動與社會運動在形式和目的上的確很不一樣；然而，兩者都共享著相近的情感。文社運動也承載、保護甚至肯定了許多青年的情感（包括反叛的情感和負面的情感），而這些情感都是後來社會運動蓬勃的情感動力。

事實上，吳仲賢自己就是從文社運動走到社會運動的；⁷後來和他一起創立《70年代雙週刊》的莫昭如，也曾是文社青年。⁸吳仲賢在做文社青年時，曾在屬於國民黨右派系統的珠海書院讀書，同時也是友聯刊物《大學生活》的寫手。吳仲賢自身從文社青年變成火紅年代社運青年的過程雖然是一次飛越式的改變，但並非完全斷裂。

六〇年代末，經歷了兩場暴動的催化後，文社運動場景其實也在迅速政治化——《盤古》的誕生可謂其中一個重要指標。《盤古》早期的自由主義傾向，也反映了青年在後六七政治化的過程中，多首先接觸自由主義。吳仲賢也不例外——根據羅永生及劉麗凝的研究，吳仲賢在珠海事件前，曾在珠海學校刊物《社教之聲》的〈珠海學生會的展望〉中顯示出其自由主義傾向，他在批評珠海學生會時，大量引用自由主義哲學家加

⁵ 當然，當時也有左派的文社，但只是數量的三十分之一；大部份文社都標榜獨立。參見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衝破沈默——學運的醞釀期〉。

⁶ 關於吳仲賢和吳萱人的辯論，參見吳仲賢的回憶，見毛蘭友，〈回憶六十年代〉。

⁷ 根據吳萱人的說法，吳仲賢曾協助籌辦珠海書院的文社「文學研究社」，見吳萱人，〈同一序幕，不同演出——一九七〇時期探六七十年代文社青年〉，《讀書人》25期（1997），頁16-21。

⁸ 根據吳萱人的說法，莫昭如中學時期辦了「灝心文社」，筆名「如秀」，見吳萱人，〈同一序幕，不同演出——一九七〇時期探六七十年代文社青年〉。

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殷海光、盧梭（Rousseau）及洛克（John Locke）的思想和理論，可見自由主義思潮是早期吳仲賢參與學生運動的重要思想資源和推動力。⁹

5-1-2 珠海書院：國民黨右派在香港的象徵

1969年，吳仲賢因為揭露珠海諸多校政問題而被學校開除，從而發動了自六七暴動後第一次靜坐抗議，他也因此在新生進步青年圈中嶄露頭角。這場小小的運動也被稱為「珠海事件」，對突破後六七的恐政治氛圍甚有代表性。然而，要理解這場運動的更多意義，必須先理解珠海書院在當時社會的地位。

珠海書院源自於廣州珠海大學，儘管後來搬到香港，但被國民黨政府視為正統大學。也就是說，珠海書院的創立脈絡與新亞書院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是右派南來文人在學院的基地，甚至被稱為「難民大學」。不過，在殖民地的高等教育政策下，珠海書院並非如港大、中大那樣具備正統地位，新亞書院加入中大以後，位階也比珠海書院高。因此，它也被坊間歸類為「野雞大學」。吳仲賢就曾以筆名毛蘭友，介紹過珠海書院的特色：

如果要在香港找屬國民政府最貼切的象徵，珠海書院無疑是第一人選。珠海書院不僅高掛青天白日旗、高懸孫中山的照片、定三民主義為尊，而且珠海的歷史年代進程，也與台灣政府差不多。一九四九年，隨著國民政府的潰敗，由「正統」的政權以至偏安苟息台灣這個大海島，珠海也由「正統」大學降格到私立的「野雞」大學，更妙的是，大家都得不到英國人的承認，以至珠海要以商業公司的名義在香港註冊。¹⁰

也就是說，珠海書院是國民黨在香港高教領域中最有標誌性的象徵。而這也使得珠海書院的學生會一方面自豪於自己的學校，覺得自己是正統的，甚至是繼承某種家國情懷；但另一方面，珠海書院在香港殖民政府的管治下又處處寄人籬下。珠海書院在香港這種曖昧的狀態，也折射出國民黨右派在香港的困難。

⁹ 羅永生、劉麗凝，〈「珠海事件」：由一篇悼念殷海光文章而起的香港學生運動〉，《思想香港》8期（2015）。

¹⁰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70年代雙週刊》29期（1973），頁8。

珠海書院不但在文化和歷史上具備國民黨右派的政治色彩，學校的體制結構也有政治上的把關。譬如，珠海事件前，珠海書院有幾份學生刊物，包括由新聞系出版的《珠海新聞》、由學生會出版但立場親校方的《珠海學生報》、由社會教育系出版但開放給全體學生的《社教之聲》。根據校方規定，所有刊物發行前都需要經過訓導處的審查。1969年5月號《社教之聲》送審時，訓導處突然加了一條之前沒有的要求：所有文章都必須呈交所有作者的真實姓名，不能只提供筆名，否則就要撤銷文章。¹¹

在《社教之聲》編輯部分別與作者及訓導處交涉失敗後，刊物決定以開天窗抗議，而被抽出的文章只剩下標題和筆名，包括〈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殷海光〉、〈我們多醜〉、〈雨霧濛濛〉及〈稚子〉。¹²有鑑於珠海書院有濃厚的國民黨右派政治色彩，而之前台大解僱了殷海光一事也反映了國民黨政府鎮壓認自由主義，所以這幾件事連在一起，不免讓人在刊物開天窗時有了許多聯想。學校以行政關卡妨礙學生的言論自由，一篇關於殷海光的文章不被校方批准刊登——這使珠海書院校方蒙上了跟隨著國民黨政府打壓自由主義的嫌疑。

5-1-3 珠海事件導火線：〈從夢想到絕望〉以揭露校政問題批判國民黨

1969年6月，吳仲賢及李雲峯以化名「依雲」在校外一本屬於友聯系統的刊物《大學生活》投稿〈從夢想到絕望〉一文，揭露珠海諸多校政問題——此文章也為吳仲賢「成名」之作。

〈從夢想到絕望〉表面上主要是控訴校方解散校內文社（活躍於下徑口村的李傑雄為珠海書院文社民選社長）、罷免民選建築系會會長、學生會與校方勾結導致檢討課程、教授法及學校行政的「課程研究委員會會議」流產、學生會淪為訓導處工具等。¹³然而，只要細看文章的結論，我們不難發現，吳仲賢及李雲峯不只是以學生權益的立場對珠海書院各院校課程、教授法及設備做批評，更是搬出珠海書院自己的辦學宗旨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珠海書院說成講一套做一套的學校。文章結論提到：

¹¹ 羅永生、劉麗凝，〈「珠海事件」：由一篇悼念殷海光文章而起的香港學生運動〉。

¹² 羅永生、劉麗凝，〈「珠海事件」：由一篇悼念殷海光文章而起的香港學生運動〉。

¹³ 參見伊雲，〈從夢想到絕望〉，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69〕），頁99-113。

珠海書院標榜的宗旨，何謂任重道遠，足為國人激賞。且看前校長黃麟書說（見民國五十六年元旦《珠海校刊》）：「現在的大陸時最可悲的大陸。歷史文化遭毀滅，知識份子遭清算，大學教授遭侮辱，大學學宮，變成紅衛兵兵營，大學教育掃地而亡……『亡天下』是如何悲哀的事，不只是政治問題，或是黨派問題，乃是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絕續存亡的問題。無大學教育幾無民族聲明，我們遷校（指珠海書院，前身乃廣州珠海大學）來香港時，亦是以維護我中華之傳統文化為己任」……然而，說漂亮話的人多的事。當我們稍微留心發生在珠海的事實，必然會發現崇高的宗旨不過是幌子。從上文的幾項事實，我們固然肯定所謂「走向獨立民主」、「致力天下為公」是空言，更不幸的事透過下文，我們證實所謂「發揚中國文化」也是紙上文章。¹⁴

也就是說，文章所隱藏的殺傷力不只在於它鉅細靡遺地暴露了珠海書院的種種校政問題，而是在於它把校政問題上升成了政治問題和民族問題，也就把珠海書院從神壇上拉了下來：本來被文社圈膜拜的「難民大學」、被認為是「抗共」、「自由」的珠海書院，被說得原來不過如是。再加上之前的開天窗事件，這篇文章對讀者是非常震撼的，也讓珠海書院——甚至是國民黨——顏面掃地。

1969年8月22日，12名學生被校方無理由通知轉學。根據吳仲賢的說法，這是校方想要把有嫌疑與〈從夢想到絕望〉相關的學生根除，由於作者「依雲」的身份不明，校方只能寧枉勿縱地一次退學12人。¹⁵珠海校方對外界表示：開除該12名學生是為了維持社會繁榮安定；至於開除的理由，是為了內在與外在環境的因素，不便公佈。¹⁶雖然校方沒有明言，甚至表示跟政治無關，但這種「維持社會繁榮安定」讓人不禁想到反對六七暴動的論述，暗指學生是「左派」。1969年9月5日的《新生晚報》更以頭條報導此事，暗示被開除的12名學生有政治背景，更讓外界認為學生不值得同情。¹⁷學生在申訴無效後，於9月15日清晨舉行靜坐示威，爆發了「珠海事件」，學生提出要校方

¹⁴ 伊雲，〈從夢想到絕望〉，頁104-105。

¹⁵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頁7-8。

¹⁶ 馮可強，〈原則與政治恐懼狂——珠海靜坐示威的前後〉，《學聯報》，1969年10月5日，版8。

¹⁷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衝破沉默——學運的醞釀期〉，頁18-19。

立即收回被無理開除的學生、尊重學生的批評及尊重學生應有權利三大訴求。¹⁸此為六七暴動後首次靜坐示威。

珠海學生行動升級，學界譬如港大、中大、浸會等也有相當大的迴響，學聯發表聲明支持，聲明第一條就宣示了「專上學生有言論、出版自由」；學聯、天主教大專同學會及大專同學會也組成了調查委員會。¹⁹大專院校界別之所以以積極、快速的方法回應珠海事件，也跟那幾年間「創建」（創建實驗學院）和《盤古》的催生有關。吳萱人是這樣形容〈從夢想到絕望〉和其後續行動得到關注的時代背景：

吳仲賢面世的首篇驚人之作：〈從夢想到絕望〉，並非無環境氣候因素。外在的環境分別有國際的和本地的，那時西方青年反建制度運動如火如荼，香港強調「開放心靈」與「知識誠真」的文化青年匯合某些「青年導師」正躍躍欲試，在為催生《盤古》與「創建實驗學院」之前，他們已經聚合在《大學生活》（友聯出版系統以大學生為對眾的刊物）旗下，撥出篇幅名為「十字街頭」，風雨欲來……其後《盤古》一雷震天。以上是署名「伊雲」的吳文登場的環境氣候。²⁰

也就是說，珠海事件得以在大專院校界被正面地回應及傳播，和這些當事人事前早在《盤古》、「創建」、《大學生活》等平台串聯有關。其他非公開的串聯平台可能也包括了包奕明在下徑口村的聚落——李傑雄、吳仲賢與聲援珠海事件的學生編輯馮可強等，都曾都是下徑口村的訪客。

靜坐行動遇到各大專院校的熱心報導和仗義相挺，或許是校方始料不及的。這也讓校方覺得學生是組織、有預謀、有計畫的。接下來，校方出動一連串的扣帽子和抹黑攻勢。在這個過程中，更逐步暴露了自身開除及鎮壓 12 名學生背後的邏輯。

根據劉麗凝的整理，《珠海報生報》第 6 期「雙十國慶」中就有一篇名為〈殷海光死了！〉的文章，諷刺〈從夢想到絕望〉的作者使用筆名，躲在幕後，顯然希望幫助校方抓到伊雲這個「真兇」；同期還有一篇名為〈小爬蟲珠海碰壁攪學運一事無成，學校當局招數好連消帶打獲全勝〉的文章，說 12 名學生是「第三勢力」、「小爬蟲」，「存心

¹⁸ 李心木，〈「抗議珠海無理開除學生」事件〉，《學聯報》，1969 年 9 月 19 日，版 1。

¹⁹ 蘭芷，〈報界請拿出良知來〉，《學聯報》，1969 年 10 月 15 日，版 8。

²⁰ 吳萱人，〈青石的歲月〉，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96〕），頁 97。

和國府過不去，所以先攪珠海，宣揚『殷海光思想』，還認為這會將學運攪大。²¹以下，我們可以看到支持校方的《珠海學生報》如何把自由主義、第三勢力與左派扯在一起：

所謂國際第三勢力，實在是共產黨的支流，也就是新左派。共黨明知擺正左派的招牌會嚇怕人，於是利用一班無知的小爬蟲，假民主自由的美名，幹其反民主反自由的事實……舊金山華埠的中國少年有紅衛兵組織；中華少棒隊在美奪標，有「台獨」份子在球場內打人；珠海書院有人大攪學運，鼓吹「殷海光思想」。這一切，全是一個老板的傑作——美國姑息份子，要更澈底地出賣中國，非「嚴厲對付」不可！²²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馮可強也提到，珠海事件的抗爭者除了被稱為「小爬蟲」、「第三勢力」以外，也被稱為「滋事份子」、「某方面學生」。²³挺校方的輿論把第三勢力和自由主義說成是左派雖然是和現實偏離的——就如同我在之前的章節提到過的，香港第三勢力與左派在六〇年代實際上並不重疊，自由主義者與左派也是有明顯矛盾的，但由於三者共享著批判國民黨右派的立場，所以在國民黨右派眼中都構成了威脅。我們也可以想像，在國民黨總體的困境下、在台灣自由主義者同樣被清算的大環境中，校方以大動作清算學生雖然不公不義、不合事實，但是有其內在邏輯。在親國民黨右派的校方眼中，學生到底是自由主義者、第三勢力還是左派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都對國民黨的正統性有所威脅。長期以來備受左派及殖民地政府限制的右派校方，就用了最有效率地、有策略地打壓這群學生，而沒有搞清楚第三勢力、自由主義和左派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支持校方的輿論，都試圖扭曲事實地把第三勢力、自由主義與左派扣上關係，好借用香港六七暴動後恐共的氣氛，讓人覺得這背後有強大的派系要利用學生煽風點火——就像六七暴動經常被認為是左派在利用工人煽風點火那樣，務求「多快好省」地剷除造反的學生。

由此可見，珠海事件雖然是一個很小的事件，卻揭露了後六七的右派如何繼承了殖民政府打壓左派的語言，把「左派—暴動—示威—抗爭—危害社會穩定繁榮」等概念串

²¹ 羅永生、劉麗凝，〈「珠海事件」：由一篇悼念殷海光文章而起的香港學生運動〉。

²² 羅永生、劉麗凝，〈「珠海事件」：由一篇悼念殷海光文章而起的香港學生運動〉。

²³ 馮可強，〈原則與政治恐懼狂——珠海靜坐示威的前後〉，版 8。

聯起來，並用在打壓其他異議者上。這也加強了香港總體的去政治化氛圍。其實，討論到「去政治化」概念時，我們不應該認為這真的意味著所有人都不討論政治、不關心政治，而是意味著社會各個位置都設置了多重機制去防治大家討論政治、實踐政治，這其實也是一種高度政治化地對待一切的狀態。

5-1-4 珠海書院的光環脈絡後——青年中的困頓與迷惘

我曾在第三章提到，第一波中運的學生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而兩年後，國民黨右派也用同樣的扣帽子技法把對社會或政治不公發表意見的自由主義學生扣上「搗亂份子」、「左派」、「第三勢力」的帽子。右派在繼承殖民地打壓左派的話語時，也讓青年意識到右派與港英政府狼狽為奸的面貌，右派多年來所累積的光環，開始逐步褪色（到了保釣，就被學生全面摒棄了）。

珠海事件所引發的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對右派的失望，是不容忽視的。曾在第一時間跑去報導珠海靜坐的《學聯報》記者李心木在 1969 年 10 月於《學聯報》刊登的〈十月感言〉中提到：

又是十月了，但又怎樣呢？

幼時，看見滿街的旗幟，總懷有一點異樣的興奮……那平正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在我是代表著「忠誠」，代表一個赤熱的心，代表一個不朽的精神，一個遠大的理想。然而如今，也不過是一番惆悵而已……太多太多的承諾，太多太多的口號，太多太多的頌辭，也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前天，當新疆的核子輻射塵渡過香港時，我坐在一輛北行的巴士上，巴士在一間國貨公司前停下來，偶然望見外邊慶祝十一牌樓上的燦爛花球，禁不住叫我記起清華街那兩個血肉模糊的小孩……十月，我們都在慶祝國慶，然而我們是慶祝那個國慶呢？我們的國家其實又有什麼值得慶祝呢？想著想著，我的淚水滴下來了。²⁴

「清華街那兩個血肉模糊的小孩」象徵的是六七暴動左派的「濫殺無辜」（雖然從來沒有人可以肯定清華街炸死兩個小孩的炸彈是左派所放，但當時滿街的菠蘿都被認為

²⁴ 李心木，〈十月感言〉，《學聯報》1969 年 10 月 5 日，版 9。

是左派所為)，也象徵著對中共的厭惡。但同時，作者對於國民黨政府似乎也沒有好感，認為它太多的承諾和口號根本沒有兌現，而這讓他感到惆悵。

事實上，珠海事件所揭露的不只是珠海校方的內部問題，也將年輕人的目光牽引到台灣政府身上，看到白色恐怖下自由主義者被鎮壓的問題，這使得非左派的年輕人，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可以輕鬆地在反對左派時就跳到國民黨右派門下。就像小時候同情國民黨右派的李心木，在寫到文章結尾時，也居然覺得兩個「國家」都不可倚靠、不值得慶祝，那種頓失國家的感覺讓他哭了起來。六〇年代的左右政治分佈，此時越來越顯得是一個死局；在兩者都那麼糟糕的情況下，這些惆悵、困頓、失落的進步青年，正等著一個可以破除原本左右派政治分佈的聲音。

這種認為「國民黨右派破產」的言論，也可以在當時還是反共自由主義的《盤古》中看到。1969年雙十國慶，《盤古》編輯室發表〈給讀者〉一文，除了悼念殷海光先生外，還明確對珠海校方查禁文章、扼殺言論自由、甚至「開除」學生等提出反對，甚至將這些事件都聯繫到對國民黨的批評上，認為國民黨當年就是因為「沒有雅量」，以「恐嚇、勒索、傳詢、封鎖輿論來對付無黨無派、無背景、無組織的群眾」，以至於失去人心：

時代雖然不同，真理還是一樣。任何腐敗的勢力，總有一天會遭受到挑戰。問題只是遲早而已。今天，香港新一代的年輕人經已成長，他們絕不會畏懼於權勢，不會妥協於不合理的制度。那種軍閥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的手法，是如水之向下，理所固然的。無論腐化派如何製造謠言，如何亂扣帽子，如何製造輿論，事實總是擺在那裡，掩蓋不來的。²⁵

珠海事件，是一個尖銳、鮮明的、國民黨右派的「壓迫大全餐」。本來是反共也批蔣的《盤古》，此時對國民黨的批判就更加高昂了。《盤古》不齒於以珠海事件為象徵的國民黨的腐敗和權勢，以及他們為了清除自由主義不惜亂扣帽子的行為，這也反映了當時不少進步青年的想法。到了1969年末，在經歷了六七暴動、珠海事件、目睹文革浮屍及台灣殷海光事件後，無論是親中共左派還是國民黨右派其實都已經蒙上了污點。親中共的左派被認為是偶像崇拜、危害社會穩定發展，而且滿手鮮血；國民黨右派則是腐

²⁵ 編輯室，〈給讀者〉，《盤古》27期（1969），封面內頁。

敗威權、背叛自由主義理想，而且滿口謊言，還要扣帽子。本來稍微傾向國民黨右派的親第三勢力青年，也開始與國民黨右派拉遠距離。七〇年代的年輕人正期待著一個可以說出他們心聲的派別和聲音——一種敢於突破左右地批判社會上的種種不合理現象的聲音。而吳仲賢就是其中一個選擇了捲起袖子來幹的人——他與莫昭如及後創立了《70》。吳仲賢以創立《70》的行動，繼承了本地社會運動和台灣自由主義的火苗。

5-2 以莫昭如為線索：新左翼、西方社運與《70》的誕生

1965-1968 年，莫昭如正留學澳洲，剛好錯過了六七暴動，所以他其實並沒有陷入香港六七暴動後的恐左氛圍。相反，他在澳洲留學期間，正好是澳洲新左翼浪潮高漲的時刻，莫昭如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提到：「1965-1968 年我都在澳洲，我是在大學時期慢慢形成新左的認同，覺得要反建制、覺得資本主義有問題。」²⁶莫昭如提到的「新左」，指的是六〇年代西方出現的一群新左翼——他們不是以機械的辯證唯物主義與工會為運動理論與關注，而是廣泛地探索新的理論與行動，包括黑人民權運動、原住民抗爭、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反越戰、反文化運動等。這幾年莫昭如在澳洲，正是遇上了學生反越戰的浪潮。他參與到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當中，搞過學生會、投入過反越戰、支持過澳洲原住民土地權運動。在搞運動中累積的經驗，也使得他的思想慢慢改變，接洽上西方的激進主義浪潮。他說道：「澳洲當時有參與越戰，所以同學有反對越戰，所以我會開始會問越戰是什麼事。我當時讀經濟，有一個老師從美國 Berkele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回來，他跟我們說了 Berkeley 發生的 Free Speech Movement：同學開始發聲，對學校的制度、運作、最後到學校本身 offer 的學習都有產生懷疑。那是一個循序漸進慢慢去認識社會、世界的過程。」²⁷

雖然莫昭如身體力行地學習及感知到西方激進左翼思想，然而，這並不代表他一下子就知道這些思想可以怎麼帶到中國和香港的現實上運用。事實上，當時的他對中國是沒有認識的，他自己說道：「我去澳洲前，對中國是沒有認識的……到了那邊也只能看到爸爸寄給我的報紙和《明報月刊》，知道文革浮屍來了香港，但其實也沒有什麼認識。我記得老師 Joan Robinson 給了我一本小書要我評論文革，我不知所措。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怎麼評論。」

²⁶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²⁷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不過，由於香港是殖民地，在澳洲又有走勢強勁的原住民反殖民運動，當中的思想資源還是可以用來回應香港狀況。莫昭如說：「在澳洲，我認識到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社會，所以政治上面有一個 *urge* 去面對這些事情。所以我就要找同志……找那些一樣有 *urge* 去改變、思想又比較相近的人。」²⁸

1968 年，莫昭如回到香港。而在當時，留學後還會回港的學生是少數。莫昭如回港時，同學和朋友問他回香港後幹什麼？他說：「要搞革命推翻英國人統治。我這樣跟他們說，半認真半說笑，回想起來其實頗為認真。」²⁹因此，初回香港的莫昭如首要任務就是要找尋志同道合之人。雖然莫昭如沒有經歷六七和六七後的恐左氣氛，更沒有經歷過運動中互扣帽子的運動創傷和跌宕起伏，但他卻和同時代的年輕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渴望改變，渴望尋求關於香港的、中國的、世界的改革以至於革命的答案和出路，他說：「想要改變，是我覺得在所有年輕人身上都有的」；而下一步，莫昭如想要做的，就是在這些年輕人中找到伙伴，去「引入革命的思潮和行動、實踐」。³⁰

回港後的莫昭如，因此首先透過《中國學生周報》接洽到了「創建」去尋找同路人。但參與了一個關於存在主義³¹課程後，他認為「創建」對他來說在「思想上沒有特別的影響」。莫昭如也去找過包奕明和周魯逸，但大家並沒有很談得來。³²雖然包奕明和莫昭如都繼承了西方新左翼思想，但包奕明是新左翼中的毛派，是比較親中的；而莫昭如傾向無政府主義，是比較反中共及國家主義的。

這樣說來，其實莫昭如和吳仲賢會相知相遇，是冥冥中注定的：兩者不但同屬一個場景，而且在意識形態和行動取態上都高度契合——都是反中共、批國民黨、反港英、傾向行動主義，並且都希望以更激進的思想及行動去介入社會。1969 年，珠海學生控訴珠海書院的高壓，消息透過友聯系統的《大學生活》等出版物在文社圈和大專院校圈

²⁸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²⁹ 世代懺悔錄，〈民族論爭史前史：戰後嬰兒潮崛起〉，<https://medium.com/recall-hk/f-d41262fffdbf>（檢索日期：2021 年 4 月 12 日）。

³⁰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³¹ 在六〇、七〇年代，存在主義在台灣和香港，都被認為是激進思想，而且和左翼思想甚至共產主義思想有著連結性。

³²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迅速傳開。1969年9月，珠海學生靜坐抗議，莫昭如前往聲援，從此認識了吳仲賢。³³在《70》的合作上，莫昭如象徵著《70》對六〇年代西方新左翼及激進運動的承傳。

5-3 突破難局！「平地一聲雷」的《70》

珠海事件雖然很快就敗下陣來，被人嘲諷是「三分鐘熱度的香港學生運動」。但當中的參與者並沒有從此消失，反而正摩拳擦掌地想要做更多行動。吳仲賢說到：

在這「三分鐘熱度」底下，一股頗為持久的鬥志已從失敗中、從旁觀者的冷言冷語中、在參與者心中鍛鍊出來，在不久的將來發揮更大的影響；在這裡，只列舉莫昭如、施淳頓、陳婉瑩、馮可強、宋恩榮這幾個名字，指出他們日後中文運動、釣魚台運動所佔的重要位置，更可以推翻這「三分鐘熱度」的評語。³⁴

透過珠海事件相互認識的吳仲賢和莫昭如，更是捲起了袖子，打算幹一番事業。吳仲賢從珠海事件中吸取的教訓是，要使運動不至於淪為小圈子「三分鐘熱度」的小事件，就要更好地把人聚合起來、連結起來。而就像包奕明那樣，他們也受到黑人民權運動啟發，本來是希望辦類似美國「學生非暴力統籌委員會」(Students Non-violence Coordinate Committee, SNCC)³⁵，但由於香港當時沒什麼運動可以統籌，所以轉而出版刊物——《70年代雙週刊》就誕生了。

³³ 莫昭如和筆者回憶時提過，其實當時除了吳仲賢以外，還認識了政治上比較親中共的劉迺強和馮國強等人。不過，他也補充道：「馮國強試過有一段時間大家是很親密的戰友，但是最後大家分開了，因為政治不同。」而吳仲賢始終是之後一段時間比較親密的戰友。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年1月24日。

³⁴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頁8。

³⁵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頁9。



圖 10：1971 年 4 月正在《70》報社籌備保釣運動的莫昭如（圖片來源：Youtube 網站，<https://bit.ly/3b3xFDW>）



圖 11：1971 年 4 月正在《70》報社籌備保釣運動的吳仲賢（圖片來源：Youtube 網站，<https://bit.ly/3b3xFDW>）

於 1970 年 1 月 1 日創刊的《70》，除了莫昭如和吳仲賢外，也陸續增加了不少參與者，至今依然為人津津樂道的，包括在珠海事件被校方解除學籍的陳清偉，還有侯萬雲、莫妙英、傅魯炳、岑建勳、楊寶熙、馮可強、張景熊、關懷遠（淮遠）、馬覺、黃仁達、阮志雄、郭達年、張景熊、劉健威等——他們現在多在自己的領域有一番名氣，

是香港重要的電影工作者、劇場工作者、政治人物、作家、樂手等。馮可強和楊寶熙後來與《70》漸行漸遠，變成了國粹派旗手。阮志雄與郭達年則依然是無政府主義者。

5-3-1 《70》是無政府主義刊物嗎？

從內容來看，《70》既是一本文藝刊物，也是高度政治性的。它不但精於介紹西方的藝術思潮，也非常著重介紹國際抗爭和本地抗爭，使得青年在理解社會運動時，可以有主流媒體以外的渠道選項。如果只是表面地看刊物內容，《70》可以被理解成一本新左翼的文藝雜誌，或是有文藝色彩的新左翼雜誌。

然而，為何今日《70》經常被認為「就是」一本無政府主義刊物呢？³⁶主要原因包括：第一，由於《70》是一個極度自由和水平的組織，採取的是參與式民主，而且眾人皆可擔任編輯，這種組織模式不免讓人覺得《70》就是無政府主義的。這也和《70》一開始想要仿效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團體 SNCC 有著有趣的平行關係。SNCC 在創始期間，因為深受「南部基督教領袖會議」（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SCLC）的 Ella Baker 的影響和訓練，因此使用水平的組織方式，但 SNCC 的政治不是無政府主義的，也不是無政府主義組織。同樣地，《70》和 SNCC 在組織手法上有相似之處，但並不代表《70》就是無政府主義團體。這種以為無政府主義只是一種組織模式的定義方法也忽略了無政府主義在思想上的深度，就好像把社會主義等同為極權主義，是一種過於粗暴的理解。此外，《70》水平的組織形式未必只是效法 SNCC，也是跟隨了一直以來文社圈中同人刊物的傳統。

第二，《70》經常被認為是無政府主義刊物的一個原因是，《70》的一些參與者至今都是公認的無政府主義者（譬如莫昭如、阮志雄、郭達年等），而《70》對他們的確有無政府主義思想上的啟蒙作用。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就說《70》的編輯們都是無政府主義者。其實在 1972 年，《70》就曾討論過是否成立「安那其出版社」，但基於「除非所有同志一致了解及贊成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否則宜用『前衛出版社』」的理

³⁶ 楊慧儀曾寫到：「《70 年代》是一份安那其同仁雜誌，刊登中、英文文章，內容涉獵領域多元化，但文章價值觀都符合安那其精神。」這種說法不但完全忽略吳仲賢的托洛茨基主義傾向、只以莫昭如為視點，也嚴重忽略《70》作為平台的性質，所帶來的多元性格。甚至，楊慧儀對《70》中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淺表分析，只是把安那其抽象化地當成是一個離地的概念理解，而忽略《70》的許多在地脈絡。更嚴重的是，這種對安那其的理解，也是把安那其僵化地套用，忽略了安那其理論所注重的高度脈絡化和彈性化。參見楊慧儀，〈革命〉，《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劇場》（香港：手民，2019），頁 53-112。

由，「安那其出版社」的命名沒有被採用。³⁷由此推斷，在 1972 年，《70》的集體並不全部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只是《70》的其中一個關注而已。

第三，《70》有好些介紹無政府主義的文章，《70》的各種公開論述中的確也有無政府主義的影子。然而《70》也介紹嬉皮士、托洛茨基，甚至還有對新左翼毛派包奕明的訪問，我們也並不能因此說《70》是嬉皮的、托派的或毛派的。

回應以上對「《70》為無政府主義刊物」的說法，我會認為，《70》一開始創刊時，對新左翼和社會運動的關注的確包含了無政府主義——也就是說，無政府主義是《70》一開始的關注之一，但並不是他們辦刊的目的或編輯取向。

5-3-2 那《70》是新左翼嗎？關於《70》編輯邏輯

其實，要以單一的意識形態來總括《70》——譬如把它定義成是無政府主義的或托洛茨基主義的——不但不能準確地理解《70》的編輯邏輯，也很容易搞錯了《70》從創刊到發展的重點。如果我們回到吳仲賢和莫昭如（作為《70》的代表人物）的自身經歷脈絡來看的話，或許可以更歷史化地總結《70》的思想資源和思想傾向，以理解《70》到底是一份什麼刊物，以及在編輯和組織上有什麼思想傾向、立場傾向、行動傾向、調性風格。

莫昭如一開始的資源是六〇年代西方新左翼思潮和社會運動經驗（但撇除了新左翼中的毛派思潮），而吳仲賢一開始的資源是反中共的自由主義思想及本地青年在大學及社會中的抗爭經驗（而成立《70》前後，吳仲賢也從自由主義左轉為無政府主義，再後來轉為托派——變化之快，也使得周魯逸對他非常難以信任，連帶地對《70》也不信任）。也就是說，《70》初期的思想傾向，也就是莫昭如和吳仲賢所代表的兩條思想及經驗資源細流的匯合——當中有許多西方新左翼和激進主義思潮因素。

³⁷ 岑建勳、吳仲賢、吳家麟、田偉貞、李金鳳、陳翹英、杜準，〈留法成員致香港成員信函〉，<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ids/MCY-001614/starts/1/dates/1972-09-29/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6 日）



圖 10：1970 年《七〇年代雙週刊》創刊號封面（圖片來源：70 年代雙週刊及民衆戲劇莫昭如及友人私人收藏檔案，<https://bit.ly/3CdxD8i>）

在《70》上，嬉皮士、馬克思列寧主義、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女性主義、造反派紅衛兵思想等均可見到介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70》是少數介紹了女性主義的刊物。《70》曾出版過一本名為《女權》的探討女性主義的小誌——雖然當中對墮胎的討論是穩固地踩在「生理女性」的身份認同政治之上；³⁸或是用女工的議題及黑人女性議題去締造工人運動、黑人解放與婦女運動之間的連結時，並沒有問題化「種族」、「女性」等概念。³⁹但其對黑人女性主義的介紹，是當時《70》的新左翼思想特徵。此外，不只在出版物上，《70》在組織上也嘗試融入這些新的思潮。譬如，《70》在保釣會中的組織「聯陣」的內部檢討就有檢討「聯陣大男人主義造成男同志不敢與女同志接近。希望男同志以後避免之，而女同志不應恐懼接觸男同志」，可以算是有女性主義意識。雖然其成員關錦標被批評為「對同志態度男女有別」、「大男人主義」及有騷擾言

³⁸ 安奇，〈從幾種論調看墮胎問題〉，《女權》6期（1974），頁2；小娥，〈墮胎是否人道〉，《女權》6期（1974），頁2；林翠華，〈墮胎問題之我見〉，《女權》6期（1974），頁1。

³⁹ 二馬，〈美國黑人姊妹的鬥爭——婦女解放與黑人解放運動〉，《女權》6期（1974），頁1-2；四洲，〈爭取同工同酬的意義〉，《女權》3期（1974），頁3。

論；⁴⁰莫昭如也被說其性笑話「令女同志難堪」⁴¹，說明了《70》組織內部的性別意識堪憂，但這至少代表了他們願意自我檢討及暴露存在之性別問題，而這也受益於新左翼風潮所帶動的關於身份認同政治的討論。

不過，《70》在引薦新左翼思想時，其實並不是已想通了有著不一樣的知識生產脈絡的西方新左翼思想可以如何適用於香港。準確來說，《70》對新左翼思潮的偏好並不是源自於思想上的認同，而是源自於《70》「行動指向」（action-oriented）的宗旨——吳仲賢就說過，《70》的最大特色是它是一個為了行動而生的刊物。⁴²《70》所象徵的新生代青年，都在努力地尋找可以突破左右派割據的政治局面的另類（alternative）思想及行動選擇，而來自於外國的新左翼理論由於不是本地左派或右派的產物，也就指引了不一樣的政治行動的出路，突破了左派和右派의思想和行動上的結界。這也剛好化解了當時進步青年覺得左派和右派皆不可取的困頓，為當時的進步青年帶來許多思想的解放及養分。《70》在進步青年場景中所象徵的激進性和進步性實在不容小覷，譬如陳冠中就是這樣評價這本刊物的——「看得我這種溫馴的大學生目瞪口呆但如吃禁果地每期追看……」⁴³

這也是為什麼早期的《70》不但不是「無政府主義」，更是「沒有主義」。在早期的《70》中，嬉皮士、馬克思列寧主義、無政府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女性主義、造反派紅衛兵思想等均可被收納——因為這些或「新潮」或「洋氣」的思潮都是香港早已放棄搞社會運動或抗爭的「左派」或「右派」所不會觸碰到的。也就是說，其實只要是對社會有批判力度的、鼓勵社會運動的、促進自發性的、反建制、行動主義、自發主義、有「戰鬥格」（廣東話俚語，意思是喜歡挑戰）的思想、論述、美學等，《70》都一律歡迎。也就是說，早期的《70》雖然是「沒有主義」的大雜燴，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思想、沒有內部邏輯、沒有要回應的脈絡。

⁴⁰ 莫昭如說，關錦標在派對放慢曲時聲言「益吓兄弟」〔給兄弟們點實惠〕，言下之意是說自己放慢歌是要製造出曖昧氣氛，讓男生「有機會」——至於有機會做什麼——實在是讓人不得不有性騷擾的遐想。

⁴¹ 聯陣，〈聯陣檢討大會紀錄〉，<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ids/MCY-001923/dates/1972-02/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8月1日）。

⁴²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頁9。

⁴³ 陳冠中，〈事後：本土文化誌〉（香港：牛津大學，2007），頁43。

不過，儘管《70》百花齊放的壯麗景象讓他們在面對當下社會問題時可以扯出千百種新的論述（包括但不限於西方新左翼思潮），但西方新左翼本來也是百家爭鳴，那千百種論述之間的矛盾又該如何處理呢？以及，知識脈絡不同的問題該如何應對？

我認為，《70》早期根本沒有想要處理論述之間的矛盾及知識脈絡不適用的問題，這可以在《70》諸多文章的理論混亂及「自相矛盾」中看到。譬如，在1970年10月號，《70》刊登了美國參議院的反共報告，稱毛澤東「以政治控制人民，發展獨攬大權所用的統治方式」；但在1970年11月5日《70》的「中國特刊」中，馮可強就訪問了包奕明，大講毛澤東主義中對尊重的重視何以使人免於非人化、物化、機械化、原子化、剝削化的痛苦。⁴⁴這種「自相矛盾」也見於他們對國族身份的看法。1971年，《70》的莫昭在保釣運動中需要回應香港和中國的民族主義時，曾一度認為民族主義是保守的，因而不願意以《70》名義參加，以至於吳仲賢需要另立名目發動保釣。⁴⁵然而，同年當《70》面對非中國的國族身份討論時，《70》又沒有那麼執著於教大家反思民族主義或「立國」的問題。《70》對孟加拉的民族解放就給予了很正面的支持：「基於民族自決和反對經濟剝削的原則，我們堅決支持孟加拉人民的獨立運動」。⁴⁶《70》的「（還）沒有主義」特色同時也被《70》侯萬雲以下這段話佐證：

不同派別當中也要問我們《70年代》作為一個整體立於什麼位置，我們用的語言是：站在人民的一邊。不管什麼派別，我們就是站在人民的一邊……《70年代》有個好處，沒有包袱，說什麼都可以。我們沒有一個統合的理論，為什麼要框住自己？這個是我們的優點來，要行動就行動。⁴⁷

⁴⁴ 馮可強，〈人的力量〉，收入吳仲賢、馮可強編《70年代雙週刊（中國特刊）》（香港：70年代編委會，1970），頁16-19。

⁴⁵ 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0），頁814-15。

⁴⁶ 聯合陣線，〈我們的聲明〉，收入聯合陣線編，《孟加拉特刊》（香港：70年代編委會，1971），頁2。

⁴⁷ 鍾耀華，〈沒有遺產的《70年代》——侯萬雲（下）〉，<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6-opinion-hou-manwan-b/>（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圖 13：1971 年《70 年代雙週刊》「中國特刊」封面

事實上，由於《70》的思想都是為了行動的需要，他們在什麼情況決定採用什麼理論語言和論述，都是為了應對當下擺在面前的、渴望衝破的困境。當聯陣面臨組織和行動瓶頸時，莫昭如就曾在保釣運動中的「聯陣」的檢討大會中反駁所謂「決定性是工人工作」的說法，並提出「不認為工人階級能接受革命意識」的立場，希望「聯陣」可以多做「社區工作」，這也接近「新左翼」的論述。他說：「姑勿論工人階級是否最富革命性，我們也不能否認工人工作與社區工作是並行不悖的。」⁴⁸而在 1974 年反加價運動抗爭中，為了支持自己鼓吹的行動升級，《70》對情勢的判斷就是依據「老左翼」的經濟決定論：認為通脹顯示了資本主義會「爆」，而人們就會跟隨造反（我將會在第八章再論及）——後來也被證實是唯經濟決定論下對情勢的誤判。也就是說，其實《70》並非嚴格意義的西方新左翼，他們也有「老左翼」的時候。而這些都依當時面對的事件而定，事後看來是會有立場理論飄忽的問題。

只要我們不是站在抽象的西方本位的理論角度去斷定他們是否「思路不清」、「理論混用」、「新舊混搭」，而是理解他們在每一個行動關節點上要面對的問題，就可以看到

⁴⁸ 聯陣，〈聯陣檢討大會紀錄〉，<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ids/MCY-001923/dates/1972-02/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 年 8 月 1 日）。

他們在思想上的選擇其實對本土政治來說確實是「新」的——因為都是指向打破之前「舊左派」和「舊右派」不願意行動的政治困局。反過來說，其實何謂「西方新左翼」，也不應該脫離西方左翼所面對的政治脈絡來談；如同西方新左翼從經濟決定論過渡到對身份認同政治予以關注以超克老左翼的單向度思考，到後來的後現代理論對身份認同政治中的本質化的、保守性問題的批判，皆是為了回應他們在自身社會改革進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事實上，所有「新」、「舊」定義都應該要被放置在具體脈絡下去理解，才可以發揮這些理論原本的批判力量。

不過，就算《70》一開始是「沒有主義」，但刊物的性格的確會隨著刊物的發展和累積而有所聚焦和轉變。1973年後，也就是吳仲賢離開《70》後，《70》的無政府主義色彩的確變得更為濃厚。不過，就算1973年後的《70》在理念和行動上有更明確的新左翼甚至無政府主義色彩，他們是否願意對外宣稱自身是無政府主義者又是另一回事。事實上，《70》除了在「Minus」系列刊物中有對自身定義外，《70》大部份時候對命名自己一事甚為謹慎（或扭扭捏捏）。「Minus」系列刊物自1975年開始，是由莫昭如策劃、目標在於促進與外國運動者串聯、與《70》相依的英文刊物，裡面開宗明義稱《70》行動小組「70戰綫」為「libertarian communist group」⁴⁹，又稱《70》為「libertarian socialist group」⁵⁰。但除此，《70》在香港絕少宣稱自己是什麼主義者。劉山青曾說：「『七〇』的人不認自己的是無政府主義，說沒有一套政治思想……」⁵¹

這種不願意稱自己為無政府主義的態度背後並不是對自己立場的隱瞞，而是認為在行動上能否堅持無政府主義的基礎——譬如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反對國家公有制、反對一切權威、反對先鋒黨、主張自由平等、互助合作、自由組合、生產資料社會化、取消分工制、取消金融制、取消僱傭勞動制、計劃經濟以人民需求釐定等——比是否宣示是無政府主義者更重要。⁵²《70》認為，「命名」在大部份時候只會讓人捲入無意義的、過度理論化、抽象化的概念辯論。這也是為什麼《70》說「『純粹XX主義』是毫無意義的」而只願意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思潮而不是單一的思想。⁵³要向無法一起進行行動的外國友人介紹《70》時，Minus宣稱《70》是「libertarian communist group」或「libertarian socialist group」，可以理解是為了

⁴⁹ Alternative Press Syndicate, "To the Readers, Friends, and Comrades," *Minus* 9 no. 11 (1975): 1.

⁵⁰ Alternative Press Syndicate, *Minus* 8, no. 5 (1976): 1.

⁵¹ 劉山青，〈七〇年—七八年：投身政治運動〉，《無悔的征途》（香港：明窗，1992），頁55。

⁵²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年6月26日。

⁵³ 70戰綫，〈我們的立場〉，版12-13。

方便交流。不過，無論《70》是否是嚴格意義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是否承認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都不妨礙它在火紅年代的歷史中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思想聚集的平台的事實。只是，把《70》定義為無政府主義刊物（特別是早期的《70》），實在是有誤導性的。

5-3-3 《70》的運作：「去組織化」的組織形式如何動起來？

《70》又是如何可以在不完全處理其內部矛盾的情況下組織下去呢？這就要從《70》組織內部的模式和文化說起。《70》成立的最初階段，主要是吳仲賢和莫昭如二人以巨大的熱誠維持報社的運作。首先是資金來源上，它不是從左派或右派獲取資助，而主要的資金來源就是靠成員捐款及賣書收入。創刊時，莫昭如從自己在外工作的1,200元工資中抽取1,000元來搞雜誌，自己留200元生活；而吳仲賢則領著這1,000元中的200元作為編輯工資，大部份時間都待在報社。⁵⁴資金的來源確保他們有很大的自由度，不用跟隨左派或右派的建制，也讓他們散發著自主自由的氣息。

此外，在組織形式上，《70》也不跟隨一般報社的組織傳統，而是跟隨文社運動同人刊物的組織傳統，這或許和《70》的文社背景有關（譬如莫昭如曾參與過「灝心文社」⁵⁵）。莫昭如在接受筆者訪問時說：「幾乎就是你肯寫，就會登……大家都是編輯。」《70》之所以沒有採取一般報社那種分工明確、層級明確的組織結構，抽空來講，是具備西方無政府主義組織那種去層級化的、橫向的、軟性的組織的性格——它彈性、鬆散、平等，著重激發個人的主動性及能動性作為推動工作的引擎，而不是以剛性的要求、以「責任感」和「服從感」去維繫組織的樣態。但我們也不該停在這裡，只是以教條化的「無政府主義」概念去定義及解釋《70》在組織形式上的偏好。以更脈絡化的方法來說，應該是去理解因為什麼經驗和理念傾向，使得他們採納了這種具備「無政府主義」特色的組織架構？

⁵⁴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年1月24日。

⁵⁵ 莫昭如在對吳萱人講述「灝心文社」的組織形式時，就提到「我們其實沒有什麼組織，是好同學好朋友來好玩把自己叫文社——沒有章程、沒章則、連成立文社的目的也沒有講清清除楚的討論過。」參見莫昭如，〈灝心文社的二三事〉，「莫昭如致吳萱人傳真：關於灝心文社」（70年代雙週刊及民眾戲劇：莫昭如及友人私人收藏檔案，1999），[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ids/MCY-001857/starts/0/dates/\[1999-01\]/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ids/MCY-001857/starts/0/dates/[1999-01]/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8月7日）。

首先，其組織上的鬆散，其實是和他們對組織化的忌諱有關。我們可以透過吳仲賢與鬍鬚佬就保釣中的組織問題的討論去理解《70》為何推崇「去組織化」。吳仲賢說：

鬍鬚佬來信說：「我們現在有進行另一次組織！一個群眾運動進入組織時，本質已變了，是否？」我不得不回答：「是。」

群眾運動初期，大家都是自發的。大家都覺得應該團結在一起，幹一點事。這是最可愛的階段。然後，由於整個文化傳統的影響，群眾開始要追求效率，追求分工，追求組織。預示群眾便組織起來了……隨著組織而來的，便是一個權力結構，便是制度化。到這時候，群眾運動是被阻止了，而組織的目的，已從本來的目標，轉移到維持組織本身，維持組織與會員關係，維持權力平衡等目標上，這種轉變便是官僚化……大家還記得中文運動嗎？還記得《70》發起過「工學聯盟」，開始時不乏熱心人士，但一開始嚴密組織，一有所謂核心組織，團結的力量立刻散了。大家讀馬克思著作時，可有留意他們的理想嗎？那是一個極自由的社會。然而，他的手段卻是非常極權。我是在無法想像由極權到自由的自然轉變！⁵⁶

在 1972 年前，《70》忌諱組織化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在經驗上，以行動指向為本位《70》歸咎組織化會帶來官僚化，並且窒息行動的發生。在此我希望先撇開去評論《70》這種總結是否粗疏及恰當、是否誤解「無政府主義」——《70》之所以對組織化會有這樣的認知和總結，首先是需要被解釋的。而在先前我已經提到過，《70》所象徵的是想要衝破舊有的左右格局的青年心聲，在此大脈絡下看，我們可以把《70》去組織化的選擇看作是在想要迴避左右派獨大、充當「極權者」下的反彈。從上文「無法想像由極權到自由的自然轉變」中我們可以看到，《70》的去組織化更大程度上是希望迴避走上左派或右派的道路，變成未來壓迫他人的霸權力量。這種情感初衷或理想也因此讓他們在組織上有了「無政府主義」的色彩——也就是認為「手段」必須和「目標」一致，並潔癖地認為組織化皆為先鋒黨和官僚主義的前身，也可以說是《70》開初發展了對無政府主義的興趣的原因。

這種「去組織化」的組織模式雖然使得《70》無論在出版還是行動上的組織門檻被降低，大大地鼓勵及提高了出版和行動的可能。然而，這種組織模式還是帶來了一定的

⁵⁶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70 年代雙週刊》23 期（1971），頁 23。

副作用。譬如，這種低門檻、低責任、低負擔的組織模式，就使得《70》的編輯團隊非常飄忽不定、出版時程飄忽、人數出入時高時低。一時間，《70》的編輯人數可以暴漲到一百數十位，甚至編者還要補上「我們以後不再刊登編會的名單了」，「要是讀者們希望認識我們，或者加入我們的工作行列的，請有空的時候到我們的報社或書店聊聊便是」⁵⁷的話，頁數也爆漲到40頁不等；但一時又可以跌到只有10多頁⁵⁸。又譬如，由於《70》對外開放的性格和擁有門戶大開的實體空間（後來甚至發展成「前衛書店」、「1984」和「紅黑書店」），甚至連《70》的鑰匙是大家可以隨意配的，使得《70》成為了一個奇妙的空間，形形色色的人都可以上來相遇及碰撞出奇妙的火花——甚至連1966年天星小輪暴動的蘇守忠都曾出現過。⁵⁹然而，這也造成了人員的流失。阮志雄就曾說過，他於1973年去《70》的時候，活躍的也只是有幾人而已。⁶⁰對唯自發的重視、對內部思想的矛盾和混亂以多元自發為由的刻意無視，到最後也只是讓一些成員自行流失——譬如後來馮可強也離開了《70》去《盤古》，而吳仲賢日後的離開，其實也和此組織問題有關。長期下去，這種唯自發的特性也反過來窒息了他們持續在運動的發展，反過頭來讓他們無法達到「行動」的目標，就如同侯萬雲所說：「〔《70》〕從來都不是處心積累或帶著願景去做〔運動〕，《70》根本不會延續自己發起的運動。」而這當然也會帶來一些問題，他說：「〔《70》的〕常態是火點著便離開，然後其他人跟進，壓力團體等就會把運動提升。他們的工作好像都是為後來者做的……」⁶¹

5-3-4 「去組織化」背後的隱形門檻：《70》的組織文化，兼談《70》的組織情感

雖然說，要進入《70》的門檻非常低，不論什麼派別和資歷都可以進入《70》。然而，這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在各式可能性中，《70》保持著超越本來「左派／右派」把持香港政治格局的初衷，而且持續保持著「戰鬥格」？

⁵⁷ 曾曉玲，〈Ways of Seeing：《70年代雙週刊》 50年來自昨日的自由呼應〉，<https://bit.ly/3ddPOkh>（檢索日期：2021年2月14日）。

⁵⁸ 譬如，第1970年1月1日第1期的《70》有12頁，但到了1971年1月1日第17期光是正刊（還沒算進來進去的釣魚台特刊）就有40頁。

⁵⁹ 莫昭如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曾提到：「1970年1月1日那天，我們在開party，其中有一個人突然出現的，是蘇守忠。」不過，莫昭如也有提到，蘇守忠「後來沒有什麼聯絡。他也沒有給我們寫文章。」參見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年1月24日。

⁶⁰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年6月26日。

⁶¹ 侯思傑，〈假如不只是一本雜誌、一個年代——侯萬雲、莫妙英訪談〉，收入周思中編，《1970s：不為懷舊的文化政治重訪》（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9），頁25。

首先，不得不提到吳仲賢個人對《70》的影響。莫昭如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提到，報社的廚房放了一個碌架床（上下鋪），他和吳仲賢就在那裡睡覺，而吳仲賢是長居報社的，他說：「吳仲賢之所以可以和報社的人建立比較深的關係，是因為他有時間，我就只和一些熟，一些人沒那麼熟。」⁶²也就是說，吳仲賢是《70》早期參與最多的一員，有最多時間與前來拜訪的人交談，而這某程度上為《70》的調性把了關，使《70》始終保持著「戰鬥格」。侯萬雲也曾提到吳仲賢的影響力：「當時都是一大班人開會，你一言我一語。如果問誰最嘈，反而是岑建勳！但吳說一句說話，其他人已會跟隨。」⁶³也可見吳仲賢在組織內的影響力。

除了吳仲賢以他超凡的論述能力及強大的人格魅力影響了《70》的性格；《70》開放的平台特性所累積到的一眾人等，也有份共同打造《70》自成一格的組織文化。進來的年輕人，大多是被組織形式所附帶的自由自在的氣氛吸引，這種自由自在的氣氛也附帶一些相關氣質，譬如反叛感、戰鬥格，也就是「野」。

《70》到底有多野呢？以下僅舉一些例子。話說，《70》曾為應付保釣示威而演習，在警察總部前與警察玩捉迷藏；曾在不懂駕駛的情況下於深夜路上「瘋狂駕駛」沒有上鎖的巴士，最後在山上被警察包圍拘捕；甚至，曾假裝作工人檢查消防局，最後把消防局內的斧頭偷走。⁶⁴郭達年也提到，《70》的人在外國朋友來訪時，時常會有酒局，大家一邊喝酒一邊暢談理想，他說：「《70》總是很熱鬧、大家很喜歡開 party、喝酒、抽煙……他們當然喜歡喝酒啦！譬如經常有外國朋友來，大家就交流啊，說說 idea 啊、situation 啊。」⁶⁵可說組織文化上的「野」，與思想上突破框框，在《70》是相輔相成的。

也就是說，《70》的整個組織雖然是水平的，要進入組織也沒有實際的、建制的門檻，但它的組織文化也注定讓《70》只吸引得到某類人、又排擠了某類人。可以說，《70》的文化也是一種門檻——譬如如果一個人在思想或行為上有建制或保守的特性，很可能一開始就已經發現自己無法完全融入《70》。譬如，陳冠中曾說，雖然《70》「鬼馬、洋氣、一副有猛又酷的樣子，好像玩得很過癮」，同時「只是他們太野了，隨時可

⁶²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年1月24日。

⁶³ 侯思傑，〈假如不只是一本雜誌、一個年代——侯萬雲、莫妙英訪談〉，頁211。

⁶⁴ 鍾耀華，〈沒有遺產的《70年代》——侯萬雲（上）〉，<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5-opinion-hou-manwan-a/>（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⁶⁵ 郭達年，私人訪問，2019年1月4日。

能犯事。我的中式布爾喬亞家庭教養告訴我要離他們遠一點」。⁶⁶他對《70》既崇拜又疏離的態度，剛好成為了《70》的組織形式及組織文化的最佳註腳。

除了「野」的組織文化以外，另一個可以把《70》的大家黏在一起的其實是友情，《70》也因此是一個情感團體。這種友情除了是建立在一起撒野、一起狂歡，也是建立在一起搞出版、一起去社會運動、一起被警察打、一起受傷，那是一種不被外界所容易下嚥的高度熱血和憤怒，但他們卻在《70》內部找到了可以共享這種情感的同志。譬如，侯萬雲提到：「其實也不是老想著革命的，反正是有種不滿，『唔妥你，就告你』，現在反而比較清楚要建立什麼。」⁶⁷莫昭如也對筆者提到，他認為留下來的人的共通性，就是都是「很有熱情，對社會很不滿，這使得他們走在一起有同志感」。⁶⁸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所有《70》中的友情最終都可以轉化為同志情感，讓他們在緊密的相處和合作中肯定地「要以一種 comrade 的身份一起幹一個東西」⁶⁹。由於《70》是很開放的、很平台化的，以至於《70》中各人所產生的對組織的歸屬的道路是高度因人而異的，莫昭如就說：「我們都會掛在口的是 love and peace 什麼的。但那些 love 有多 intense，每個人都不一樣。」⁷⁰

5-3-5 《70》與《盤古》：一對異卵雙胞胎？

《盤古》與《70》的生成，在思想脈絡可以說有相似之處：兩者一開始都是對中共文革反感、都有親自由主義的傾向、都因此對民國政府打壓自由主義而失望。此外，兩者的組織脈絡也和友聯系統有關：前者大量的人手都與友聯直接重疊，後者的莫昭如和吳仲賢則是圍繞著友聯場景中的常客。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同一時代下的產物。之後，《盤古》在 1968 年後，因為有包奕明的加入而注入西方新左翼的思想資源，《70》也同樣被西方新左翼思潮所影響。然而，兩者卻像是異卵雙胞胎，雖然同出一娘胎，卻長出不一樣的風格及面貌。

⁶⁶ 陳冠中，《事後：本土文化誌》，頁 43。

⁶⁷ 侯思傑，〈假如不只是一本雜誌、一個年代——侯萬雲、莫妙英訪談〉，頁 211。

⁶⁸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⁶⁹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 年 6 月 26 日。

⁷⁰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他們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兩點。第一，《70》是行動取向的，辦刊物只是他們引入西方激進思想及組織人們的一個方法；另一邊廂的《盤古》則像《文星》那樣，自我定位是一本思想性的、批判性的刊物，辦刊物的目的是希望促進關於國事的思想上的討論。定位的不同就使得他們有著不一樣的風格和文化，簡單來說，前者更野、更戰鬥格，後者較審慎、較書生氣。

第二，《盤古》一開始就向民族主義進軍，目標讀者是離散華人，這也讓他們更注重與離散華人的情感契合，也更有民族主義和家國情懷。而《70》則「恰好相反」，以吳仲賢的話來講：「〔《70》〕最初是從國際主義出發，所以初期把焦點放在捷·華拉（Che Guevara）、放在拉丁美洲、放在越南、放在南非、放在比亞法拉，卻忽略了中國問題。」⁷¹風格上，兩者就是一個「民族本位」，有家國情懷；一個「洋氣」，風格野性奔放。

《70》的國際主義焦點和「洋氣」的風格背後，很大一部份來自於對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民族主義的批判和不屑。譬如，吳仲賢曾提到：「根據他〔莫昭如〕的見解，現在的世界，目標應是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基本上是反動的。」⁷²《盤古》的包奕明及周魯逸等人則是對《70》對民族主義的不屑感到不屑，周魯逸認為莫昭如不過是「嬉癖士」、《70》只是「新潮反共」——與右派的反共比起來只不過多了一些「文化政治新潮的視野」而已。⁷³這也導致與《盤古》、「創建」、包奕明、周魯逸等人息息相關的「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下稱「保釣會」），與《70》在1971年保釣運動爆發時雖然同為最重要的兩個火車頭，但彼此互不信任、各走各路——保釣會的保釣運動路線是「統一運動」，而《70》保釣運動路線則是「反殖路線」。而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在1973年前，《70》對中國問題的探討確實很淺薄，他們分析不足的弊病也使得他們對中共的批評多流於理念上的宣示。關於兩本刊物在保釣中的作用，我將在下一章詳談。

⁷¹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頁9。

⁷² 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90〕），頁815。

⁷³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51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未出版，2018）。

5-4 莫斯科—中國—法國—香港：托派與《70》的相遇

在 1972 年保釣運動結束後，不少《70》的人開始跟隨中國無政府主義的傳統去西方勤工儉學，這些地點包括了加拿大、愛爾蘭、瑞典、義大利、挪威、英國等，而當中最多人去的是法國。1971 年七七保釣示威前後，吳仲賢也跟隨著這個潮流，離開香港往法國去了。⁷⁴為什麼是法國呢？因為 1968 年「五月風暴」一直是《70》人心中的革命標誌，前往歐洲也代表著尋找革命。⁷⁵這次旅途將完全改變吳仲賢及《70》的發展——吳仲賢在中國老托派彭述之的影響下成為了托洛茨基主義者，成為第四國際成員。吳仲賢等人轉向托派，使得本來在中國大陸沉寂下來的托洛茨基主義在香港獲得了新的生命。而《70》也將面臨如何和托派共存的課題。

5-4-1 從莫斯科到中國，從中國到香港：香港托派的脈絡

要理解吳仲賢等人為何去法國會遇到中國托派並繼承了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火苗，就要先理解為什麼中國托派要跑到法國去，也因此必須先理解中國托派的歷史。中國托派的起源可追溯到 1925 年，在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下，一大批中國學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接受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隨著共產國際及蘇共分成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兩派對中國問題有著不一樣的想法。1927 年 4 月 3 日，托洛茨基發表《中國革命中的階級關係》，提出中國共產黨應該退出國民黨的「共產黨完全獨立」主張。4 月 5 日，斯大林反對中國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主張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並要求中共在遭受國民黨右派進攻時妥協退讓。這也使得中國留學生分成兩派，其中以托洛茨基派的人數更多。⁷⁶4 月 12 日，蔣介石在上海捕殺共產黨員，史稱「四·一二事件」，清黨開始。這些都使得留蘇的中國學生更加支持托洛茨基的判斷。

由於 1927 年斯大林開始肅托，不但托洛茨基本人被開除出黨並驅逐出蘇聯，不少擁護托洛茨基的中國留學生也被遣送回中國——這就是中國的第一批托派。⁷⁷1928 年，

⁷⁴ 雖然有人會以為吳仲賢此時離開去法國，是和保釣運動結束後香港進入了社運低潮有關，但我認為並非如此——因為吳仲賢離開時保釣運動還呈上揚的趨勢，他在離開之時絕對無法預見保釣後的社運低潮。

⁷⁵ 說吳仲賢去法國是為了尋找革命，可參見電影《吳仲賢的故事》，此電影由莫昭如導演的同名舞台劇所改編，是紀念吳仲賢去世的作品。見陳耀成，《吳仲賢的故事》（香港：影意志，2004）。

⁷⁶ 劉平梅，〈中國共產黨與托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upingmei/mia-chinese-laupingmui-2004.htm>（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⁷⁷ 吳基民，〈斯大林為了援助中國革命而開設的中山大學，想不到卻成了滋生中國托洛茨基派的溫床〉，《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8），頁 18。

中國托派成立了第一個托派組織，名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創立了機關刊物《我們的話》，「我們的話派」成為了最早的中國托派機構。及後其他托派組織包括了「十月社」、「戰鬥社」、還有陳獨秀組織的「無產社」（陳獨秀為中共早期創黨人之一，當時他因為國民黨清黨而承擔革命失敗的責任，已經離開了中共領導層）。這些托派機構到最後於 1931 年統一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並選舉了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中央委員會，黨員約 500 人。⁷⁸當時，華南區委的總部就在香港，負責人是因蘇聯肅托而被遣返回中國後就被中共派往香港的區芳。⁷⁹

1931 年 9 月 18，九一八事變爆發，陳獨秀認為革命的高潮來了，所以要托派號召反日反蔣，建立國民會議去奪取蔣政府的政權和武裝，從而建立民眾政權。至於抗日方面，陳獨秀認為策略是要與中共共同行動。但是，陳獨秀無法統一托派黨內的意見。⁸⁰王凡西曾對抗戰初期托派中的內部分歧有過很好的概括：

然則在抗戰初期，中國托派內部有沒有原則性的政治意見分歧呢？有的。約略分別說來，可得三種：第一，為陳獨秀所代表，其主張可說是「無條件地擁護抗戰」；第二，為鄭超麟同志所代表，他不贊成「擁護抗戰」的說法，因為他覺得中日戰爭自始就應瞭解為新的世界大戰的一部份；第三，包括最大多數的托派同志，其立場可概括為「擁護抗戰，批評其領導」。屬於這一立場的，不僅「新人」，「老人」亦然；不僅有彭述之，而且有其昌和我。這三種意見，按理是要促發嚴重爭論的，但事實上未曾發生。因為陳獨秀既已自動聲明不代表托派，托派中亦無人完全同意他的意見；另一極端的超麟則住在偏僻的鄉下，他根本不擬將此意見在組織中提出，爭取影響。因此，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前夜（一九四一年冬），中國托派無論在領導機關中或下層群眾中，都不曾有過思想上的紛爭，故亦無組織上的對立。「新老」之分，只是暗地裡開放的曇花一現而已。⁸¹

⁷⁸ 劉平梅，〈中國共產黨與托派〉，<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upingmei/mia-chinese-laupingmui-2004.htm>（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5 日）。

⁷⁹ 關於區芳的生平，可見香港民間工運歷史研究者梁寶龍的文章，參見梁寶龍，〈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http://leungpolung.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⁸⁰ 關於陳獨秀的倡議，可參見唐寶林，〈夾攻中的顛仆與掙扎〉，收入張玉法編，《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1994），頁 131-205。不過，此書比較是站在「勝利者」的立場，以比較無情的態度敘述托派被鎮壓的歷史，當中的論述也傾向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因此此書在托派中不完全被接納，關於對《中國托派史》的批評，參見王凡西，〈評《中國托派史》〉，<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9506.htm>（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1 日）。

⁸¹ 王凡西，〈抗戰初期的陳獨秀〉，《雙山回憶錄》（台北：東方，2004），頁 234。

這個暗地裡的矛盾，在 1939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變得更加尖銳。1939 年的太平洋戰爭意味著中國的對日抗戰成為了世界大戰的一部份，而由於國民黨立心要把中國的抗日戰爭「系在美帝國主義的戰車上」——如何對待最新的狀況，成為了托派內部的爭論重點。⁸²彭述之、劉家良等「多數派」（又叫鬥爭派）認為中國抗戰具有進步意義；鄭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則被稱為「少數派」（又叫國際主義者派）則認為主要敵人在國內，民族主義抗日會偏擺了階級鬥爭，更認為太平洋戰爭後，革命者對國民黨領導戰爭的態度，應該採取列寧對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革命失敗主義」。最後，在 1941 年，「多數派」草率展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而產生出來的新的領導機關全部屬於「多數派」，他們拒絕在機關報《鬥爭》上開闢專欄讓「少數派」繼續討論自身對二戰的分析及看法，終導致中國托派再次分裂成兩派，至今都未曾合併。⁸³

1938 年 9 月，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創建了國際性聯合組織「第四國際」，與史達林所控制的「第三國際」相抗衡，彭述之被任命為中國支部書記。抗戰後，「多數派」重整了全國的組織，特別是在香港成立了香港特委、香港市委、港九特委會、社會主義青年團地方常委會。同時，國共內戰爆發，托派稱之為「第三次革命」，但第三次革命卻讓托派陷入不解，屬於「多數派」的向青寫道：「中國托派未能在第三次革命中強大起來，反而因為革命時出乎我們意料地在共產黨領導下以農民軍為主力取得勝利的：托派首先陷於思想上的動搖混亂，然後在中共的政治壓力和暴力迫害的雙重打擊下限於崩潰。」⁸⁴1948 年，「多數派」成立了獨立的「中國革命共產黨」；1949 年，「少數派」則成立「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此後，就有兩個自稱屬於第四國際的中國組織。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共需宣佈革命成功，兩派托派同樣就如何解釋這個狀況和斷定新政權的性質產生分歧。「多數派」的彭述之認為，新中國是一個畸形的工人國家。「少數派」的鄭超麟認為中共是代表工人階級的，但是它官僚化和特務化了。自此以後，托派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忠實的反對者。而隨著中共對托派的打壓，大多數托派都跟隨組織搬遷到了香港，香港因此成為托派自 1949 年以後最重要的活動基地。

⁸² 王凡西，〈太平洋戰爭與組織再分裂〉，《雙山回憶錄》（台北：東方，2004），頁 239-58。

⁸³ 王凡西，〈太平洋戰爭與組織再分裂〉，頁 242-45。

⁸⁴ 向青，〈中國托派和抗日戰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chinatrots-1977.htm>（檢索日期：2021 年 7 月 20 日）。

托派在香港一方面需要躲避國共圍攻，另一方面也因為組織工人罷工鬥爭而招惹港英「關照」。1950年，港英政府搜查第四國際寄來的刊物，逮捕了一些托派，也破壞了印刷所。⁸⁵托派在香港因此是非常孤立的一群——國民黨、中共、港英政府，都不歡迎托派。在各方逼迫底下，香港多個托派領袖展開了逃亡之旅：彭述之和劉家良先逃到越南，結果劉家良在越南時和越南托派被越共逮捕，死在越南獄中；彭氏夫婦則逃到巴黎，成為第四國際的中央執委和書記局書記。⁸⁶由於劉家良的喪生，組織機構進行了改組，1952年，香港的中國革命共產黨政治局撤銷了，成了全國臨時委員會（但基地依然在香港）。⁸⁷

彭述之到了第四國際之後，還一直和香港的托派領導保持密切聯繫，譬如會寄第四國際的文件給他們。但是，第四國際內部又發生分裂，這個分裂導致了香港的全國臨時委員會發生分裂：一派支持派人回大陸打入中共黨內部，另一派認為中共是小資政黨，所以要另起爐灶。但無論哪一派，都希望利用去大陸探親的機會和大陸的托派聯繫，企圖重建托派在大陸的潛伏組織。然而，中共在1952年進行了肅托，托派在香港的行動越發消極。以向青的話來說：「從五十年代的後期起，我們的組織尚未受到中共暴力打擊的海外部份也變成名存實亡了。」到了1965年，香港的托派只有70多人。⁸⁸

另一方面，「少數派」的王凡西在1949年11月被港英搜捕時逃到了澳門，只有很少「少數派」還在香港堅持活動——其中一個人就是樓國華（又叫樓子春）。樓國華也是《70》開始接觸托洛茨基主義的關鍵。

5-4-2 《70》份子於法國變成托派：在尋找法國革命中發現中國革命

樓國華和《70》的接觸，一開始主要是送書，這些書就是樓國華的順達出版社所出的。⁸⁹莫昭如回憶道：「他們出了很多書，譬如用Machiavelli〔馬基維利〕的《帝皇

⁸⁵ 劉平梅，〈遷移於香港的托派組織〉，<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upingmei/2005book/marxist.org-chinese-LauPingMui-2005book-12.htm>（檢索日期：2021年6月6日）。

⁸⁶ 鄭致祥，〈彭述之：我的一生經歷憶述（二）〉，https://october-review.org/241/241_c31.htm（檢索日期：2021年6月6日）。

⁸⁷ 劉平梅，〈遷移於香港的托派組織〉，<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upingmei/2005book/marxist.org-chinese-LauPingMui-2005book-12.htm>（檢索日期：2021年6月6日）。

⁸⁸ 向青，〈中國托派和抗日戰爭〉，<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chinatrots-1977.htm>（檢索日期：2021年7月20日）。

⁸⁹ 王凡西，〈悼念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樓國華〉，<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950408.htm>（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術》去解釋毛澤東……他們還出了一本說 1968 學生運動的書。他們做這些翻譯書，會送給我們，我們就各自看。後來是托洛斯基主義的書了。」

此外，樓國華不只是送書，根據劉平梅的《中國托派黨史》，樓國華在送書的同時也給《70》和其他托派牽線，譬如在澳門的王凡西。⁹⁰1971 年，王凡西曾撰寫 2 萬字的公開文章〈《七十年代》往哪裡去？——致編者信〉，以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批評無政府主義，同時批評雜誌政治立場反覆。⁹¹《70》的反應則是虛心受教，但表示拒絕把雜誌的政治立場統一化。由此可見，王凡西和樓國華沒辦法直接說服《70》的人成為托派或把《70》變成托派刊物（甚至，《70》的人當時還不知道香港還有中國革命共產黨的存在）。不過，樓國華的牽線依然重要，因為他也為《70》的人和法國的彭述之取得了聯絡。

1971 年後，《70》成員包括岑建勳、吳家麟，李金鳳、田偉貞、陳翹英、大昌、Johnny 和吳仲賢等，陸陸續續前往法國尋找革命。《70》當中最有影響力的吳仲賢，先去過南斯拉夫、荷蘭、挪威，最後在 1972 年 5 月抵達法國。⁹²由於在法國的《70》人數眾多，他們逐步成立了《70》的「法國支部」，除了在打工生活、串聯其他運動組織及學習革命知識以外，也繼續和香港的《70》聯絡並把打工的錢回捐《70》。⁹³而在法國期間，《70》一眾人也因此有機會與彭述之碰面，根據莫昭如回憶，首先去法國見彭述之的是《70》的梁宗廣，隨後才是吳仲賢：「梁宗廣 1971 年去法國的時候本來是為了追尋 1968 年的運動，他本身並不是托派，但有興趣。」⁹⁴根據 Yang Yang 對托派歷史的研究，去尋找彭述之的除了吳仲賢以外，還有岑建勳和吳家麟，他們請教彭述之對中國革命歷史的見解，以及斯大林及托洛茨基於 1925-1927 年期間就中國革命的爭論。在這個見面中，他們三人都更加了解托派的思想及其對斯大林主義的反對，並得知中國革命共產黨在香港的存在。同時，《70》法國支部成員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關注也有所提高。1972 年 9 月 29 日，《70》留法成員給《70》的信提到：「我們正在討論和努力研究一些

⁹⁰ 劉平梅，《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2005。

⁹¹ 王凡西，〈《七十年代》往哪裡去？——致編者信〉，<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7112.htm>（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1 日）。

⁹² 吳仲賢於 1972 年 5 月抵達法國之證據，見吳仲賢，〈吳仲賢致友人信函〉，<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dates/1972-05-25/ids/MCY-001607/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6 日）。

⁹³ 吳家麟、吳仲賢、Johnny 等，〈吳仲賢致友人書函〉，<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ids/MCY-001623/starts/0/dates/1972-12/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6 日）。

⁹⁴ 然而，根據聯陣檢大會的紀錄，梁宗廣 1972 年 2 月還在香港開會。莫昭如的記憶可能有偏差。梁宗廣參與聯陣檢討大會的紀錄，見〈聯陣檢討大會紀錄〉，<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ids/MCY-001923/dates/1972-02/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8 日）。

基本及原則性問題（例如工人階級革命行，無政府主義及托洛茨基主義）……」⁹⁵根據彭述之的說法，最後吳仲賢、岑建勳及吳家麟皆經過他的推薦加入中國革命共產黨。⁹⁶

雖然莫昭如在電影《吳仲賢的故事》⁹⁷中，總是把吳仲賢變成托派的說法戲劇化，彷彿彭述之是使得吳仲賢及《70》一眾人轉向托派的關鍵。然而，我們不該過分強調彭述之對吳仲賢的影響——不但因為吳仲賢與彭述之後來就香港托派青年該成立獨立的組織還是加入既存的中國革命共產黨有嚴重分歧，⁹⁸吳仲賢甚至很快就退出了中國革命共產黨；⁹⁹更重要的是，吳仲賢的托派轉向是受到不同托派的影響，他不只是和彭述之一個人交流而已，同時也屬於中國「少數派」的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王凡西¹⁰⁰和第四國際領導層 Pierre Frank¹⁰¹等人保持聯絡。莫昭如也曾說過，《70》有建立關係的托派，至少還包括了現為 *New Left Review* 編輯的巴基斯坦英國托派 Tariq Ali，以及一名來自日本的第四國際成員 Wataru Yakushiji。¹⁰²1973 年，吳仲賢跟法國托派組織 LCR 的五個月深度交流，對他轉向托派的影響也不容忽視。¹⁰³LCR 是第四國際的法國支部，由之前的「國際共產主義黨」、「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其他法國六八學運的激進份子於 1969 年合併組成，更曾推舉六八學運領袖 Ailain Krivine 選總統。吳仲賢在與共產主義者同盟交流期間，也經常在《中大學生報》上發表介紹法國社會運動的文章，當中經常報導托派組織在運動中的狀況。譬如，〈法國政府反革命的鎮壓〉一文報導了 1973 年 6 月 28 日法國政府禁制解散共產同盟，並且拘捕前六八學運領袖兼托派領袖的消息。¹⁰⁴

⁹⁵ 岑建勳、吳仲賢、吳家麟、田偉貞、李金鳳、陳翹英、杜準，〈留法成員致香港成員信函〉，<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ids/MCY-001614/starts/1/dates/1972-09-29/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6 日）。

⁹⁶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969-1981*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Essex,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18), 178. 不過，根據托派歷史研究學者 Yang Yang 的考究，此乃彭述之的一家之言，岑建勳認為，他們並沒有要求加入中國革命共產黨，而是被建議加入。

⁹⁷ 陳耀成，《吳仲賢的故事》。

⁹⁸ 關於彭述之與吳仲賢等青年托派的爭議，見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260-95.

⁹⁹ 關於吳仲賢退出中國革命共產黨，見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78.

¹⁰⁰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78.

¹⁰¹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69.

¹⁰²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¹⁰³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68.

¹⁰⁴ 吳仲賢，〈法國政府反革命的鎮壓〉，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業麗容，1997〔1973〕），頁 556-58。

5-4-3 從紅黑並舉到分道揚鑣

1973 年 5 月，吳仲賢等從無政府主義者變成托派的成員陸續回港，《70》進入了短暫的「無政府主義」與「托派」共存的「紅黑並舉」時期。¹⁰⁵然而，這個時期大概只維持了一個月。¹⁰⁶如莫昭如所說：「紅黑並舉是一個過渡。」1973 年 6 月，吳仲賢和其他托派與《70》非托派成員發生了「人事衝突」，並退出《70》，成立了自己的托派組織。

到底這則「人事衝突」是什麼呢？那就是《70》報社收到了來自第四國際的信函，《70》等人才發現《70》的地址原來已經被托派成員當作「第四國際的中國香港支部」使用。不過，就如同我之前所討論，《70》的編輯邏輯一向都相對開放，而且從來沒有要獨尊無政府主義。也就是說，不同編輯在意識形態上不一樣是《70》的常態。那麼，《70》被當作第四國際支部觸碰到了《70》的什麼底線呢？《70》經常也拿自己的地址來訂閱各方刊物，為何收到第四國際的信會導致《70》內部分裂？

首先，這個分裂在表現模式上不是意識形態矛盾，而是人事矛盾。曾是《70》保釣運動小組「聯陣」成員的劉健威就提到：「政治信仰不同都沒什麼所謂，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們〔吳仲賢等托派〕回來以後就在《70》那裡嘗試分化一些人出去。」¹⁰⁷也就是說，吳仲賢最大的問題在於隱瞞了自身組織理念的轉向。而把《70》當作第四國際支部一事，就暴露了吳仲賢想把《70》變作托派團體，甚至把人分裂出去另立托派組織的密謀，而這些都是吳仲賢沒有向其他《70》的人交代的計畫，《70》不少人因此對吳仲賢的隱瞞感覺到深深的背叛。¹⁰⁸

1973 年 6 月，吳仲賢和一些屬於國際多數派的托派成立了「革命國際主義同盟」（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League, RIL），自《70》內部分裂了出去。《70》中親彭述之的國際少數派托派沒有立刻跟隨，而是還想繼續留在《70》工作，甚至與《70》的

¹⁰⁵ 陳耀成，《吳仲賢的故事》。

¹⁰⁶ 從吳仲賢寄給友人的信件推斷，他於 1973 年 5 月 3 日從法國發出的信件表示，自己將於「三兩星期內赴港」。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推斷吳仲賢大約在 1973 年 5 月中回到《70》本部。由於 RIL 是在 6 月分裂出去的，所謂「紅黑並舉」時期，不過維持了一個月而已。吳仲賢的信，見吳仲賢，〈吳仲賢致友人信函〉，<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dates/1973-05-03/ids/MCY-001654/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30 日）。

¹⁰⁷ 劉健威，私人訪問，2021 年 4 月 25 日。

¹⁰⁸ 陳耀成，《吳仲賢的故事》。

無政府主義者一同「排擠老吳」¹⁰⁹。由此可見，吳仲賢等托派離開《70》，並不是彭述之等老托派所樂見的。

《70》內的托派沒有就分裂或統一達成共識，甚至各做各的，當中更深刻的原因是他們分別代表第四國際托派中兩個分裂的立場，在組織上隸屬不同派系。¹¹⁰根據托派歷史研究者 Yang Yang，在 1969 年第四國際第九次世界大會中，第四國際分裂成國際多數派和國際少數派，國際多數派認為要支持拉美的分支以游擊戰的方法對抗他們國內的資產階級政府，國際少數派則認為這沒有考慮到不同國家的特殊狀況，認為並不是每個國家都適用游擊戰的方法。此時，彭述之屬於國際少數派，他認為拉美並沒有足夠的革命條件，貿然使用游擊的策略是冒進的。¹¹¹

不過，親彭述之的國際少數派的托派也沒有在《70》中待很久。1973 年 9 月，屬於國際少數派的的另一位托派李懷明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社」(International Young Socialist Alliance, IYSA)，也從《70》分裂出去。¹¹²根據劉平梅的說法，1974 年初，IYSA 的何仁與老托派樓國華等人共同發起出版《十月評論》¹¹³，與彭述之領導的中國革命共產黨關係比較密切。¹¹⁴也就是說，在 1973 年下半年三個月內，《70》內部發生了兩次分裂，可謂元氣大傷。

事後，吳仲賢在自己的文章中交代了分裂一事，並認證了劉健威對分裂的分析：

RIL 認為，在七三年 RIL 分裂的時候，無論就可觀階級鬥爭形勢的需求，《70》政治分化的程度，以至這種分化對《70》在運動中作用的影響，以及托派傾向份子的政治成熟程度，都應該在最短時期內成了一個獨立的托派傾向政治組織。至於在《70》內部的政治介入工作，變得配合著獨立的托派組織的發展……¹¹⁵

¹⁰⁹ 劉山青，〈七〇年—七八年：投身政治運動〉，頁 58-59。

¹¹⁰ 劉山青，〈七〇年—七八年：投身政治運動〉，頁 58-59。

¹¹¹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271-72.

¹¹² 在《70》兩次分裂中，兩個托派組織的成員被迫在人事糾紛上互相敵對，兩個團體過了一陣子才基於同一政治基礎而合併（而不是一良好的人際關係為前提）成為社會主義同盟（Socialist League, SL），及後此組織更名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簡稱「革馬盟」）。參見吳仲賢，〈群眾組織的神話〉，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

¹¹³ 及後《十月評論》成為革命共產黨的喉舌，參見劉平梅，〈遷移於香港的托派組織〉，<https://www.marxist.org/chinese/liupingmei/2005book/marxist.org-chinese-LauPingMui-2005book-12.htm>（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6 日）。

¹¹⁴ 吳仲賢，〈群眾組織的神話〉，頁 214。

¹¹⁵ 吳仲賢，〈群眾組織的神話〉，頁 217。

也就是說，當時吳仲賢等後來成為了 RIL 成員的托派回港後之所以繼續介入《70》的工作，的確是如劉健威所說的想要「分化一些人出去」組織新的托派組織——也就是「配合獨立的托派組織的發展」的意思。

5-4-4 從《70》的分裂看組織的內憂外患

回到《70》兩次內部分裂，雖然表面上可以被理解為一次人事上的意外或單次性的糾紛，但此糾紛之所以出現，其實也來自《70》長期以來的「內憂」——也就是先前提過的過分著重於自發性而一定程度上懸置了理論矛盾及不以組織化延續運動的組織模式問題。與《70》分裂的吳仲賢，雖然事後是肯定了《70》的自發主義，認為這使得他們「越過毛派的控制」，是在運動中相對的「最先鋒」、「最自覺」的；但在分裂的時候，其實吳仲賢已經在開始懷疑這種自發主義有什麼出路，他在〈群眾組織的神話〉說：

自發運動往何處去？反對資本主義、殖民地主義後，以什麼來代替呢？對中國又要持有怎樣的態度呢？自發組織本身又怎樣發展？¹¹⁶

此外，在另一篇名為〈香港革命的前途與我們的任務〉的文章中，也提到《70》始終沒有統合的理論的狀態所構成的問題：

……《70年代》雙週刊和聯合陣線兩個組織，自從在運動中誕生，以至成長發展，以致合併，以至今時今日，始終仍然未能曾清清楚楚地提出對香港革命的看法，所以始終未能具體而徹底地解決組織對未來運動的長時期工作計畫。所以本身固然感覺到，外間亦批評到所謂「大路向」的問題……¹¹⁷

由此可見，《70》中的托派之所以想要分裂出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看到了《70》過度仰賴自發主義的問題。然而，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對自發主義的批評是在1973年出現？對自發主義的批評為什麼非得用分裂的方式出現？而且還是吳仲賢要離開自己有份一手創立的組織？而這除了訴諸他們變成了托派、在法國見識到了托派強大

¹¹⁶ 吳仲賢，〈群眾組織的神話〉，頁215。

¹¹⁷ 吳仲賢，〈香港革命的前途與我們的任務〉，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業麗容，1997），頁202。

的組織力的原因以外，和當時的更大的社會環境又有什麼關係——也就是說，是怎樣的「外患」才讓《70》的內憂得以被顯現成一個「問題」，使得他們想要拋棄自己「去組織化」的組織形式和「野」的風格？

我認為，這其實和 1972 到 1973 年的運動氣氛有很大的關係。事實上，自保釣後期統一運動路線持續上揚，甚至醞釀出一波認同中國的氣氛中，《70》的表現是比較無所適從的。《70》對民族主義的不屑態度讓他們顯示出曲高和寡的姿態——而這實際上是源自於他們無法深入地介入上升中的民族主義情緒，更遑論在之中挖掘行動的可能。吳仲賢就說道：

香港學生國際主義之落後，從歷史的發展已可以看到，以全世界意識發展的標準來衡量，香港青年學生連對自身的歷史關係、社會的地位，對身處社會、自己國家民族的認識亦是十分薄弱和落後，遑論國際主義！另外一點，我們也看到，香港青年學生的發展，大致是趨向民族主義（下面將會提及），中運如是，釣運亦復如是，形成七二年左傾成為潮流的基本因素。《盤古》一開始就是向民族主義進軍……《70 年代》雙週刊恰巧相反，它最初是從拉丁美洲、放在越南、放在南非、放在比亞法拉，卻忽略了中國問題，忽略了群眾接受能力的基礎。反過來這也顯示當時《70》編委思想意識的混亂和實踐上的紊亂，以致事倍功半。¹¹⁸

也就是說，《70》就譬如民族主義等思想問題和組織模式上的混亂及游移，構成了他們未能在保釣後有效地回應當時的民族主義潮流。這就使得吳仲賢等托派深感以往《70》那種不顧在地脈絡只管拼命以「大雜燴」的方式介紹外來運動思想，但又未能把這些外來思想與在地情況嫁接的做法是沒有效率、「事倍功半」的。先前提到的《70》在引用外來思想（包括新左翼思想）時不顧知識脈絡是否適合的問題，因此就顯現出來了。最明顯的客觀改變是，《70》的國際主義在民族主義高漲下變得沒有市場。一些例子包括：演變成「前衛書店」後所出版的許多書籍也沒有人買，財政也陷入了危機；《70》拖欠出版費用超過一萬元，1972 年的《70》已經脫期嚴重¹¹⁹；甚至在法國時的吳仲賢就曾要賣掉皮外套回捐《70》。簡單來說，《70》無法適應外部風向的轉變、經營

¹¹⁸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70 年代雙週刊》29 卷 1973，香港），頁 9。

¹¹⁹ 劉建華，〈在六〇、七〇年代之交香港文化雜誌的政治性視覺生產初覽〉（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碩士論文，2019）。

困難，經濟壓力也讓《70》內部失去昔日意氣風發、洋洋得意的氣息，內憂外患顯得特別明顯。曾參與其中的郭達年就認為《70》的分裂和再之後的解散，每一次都是和內部氣氛有關：「就是感覺到氣氛的衰退……這是經濟現實來的，出的報紙和書賣不會出去。但機器、紙、人、錢和時間已經放下去了。」¹²⁰就是在這個情況下，先前廣納百家思想的編輯風格和問題模式，才在吳仲賢等托派眼中顯現為「問題」——他們認為此前的做法已經無法再於當時激起行動——也就遠離了辦刊物的初衷。托派因此對《70》的組織形式、組織文化等能否持續、是否有成效等方面失去信心，離心就出現了。

事實上，根據吳仲賢的說法，《70》的紅黑並舉時期中曾有試著就「大方向」等一系列問題討論，大家爭論著種種社會發展史、革命組織的基本問題，是為了挽救一開始的自發運動的嘗試，想要證明靠自發主義的組織依然可以生出統一的綱領。¹²¹然而，或許是由於吳仲賢在紅黑並舉的政變時期所參與的爭論，背後其實已經預設了統一綱領的想像必須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甚至已經搶先一步把《70》當作托派香港分支，各種爭辯也顯得根本沒有誠意，《70》不少人因此對吳仲賢的隱瞞感覺到了深深的背叛。¹²²

吳仲賢說，這次分裂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及其同情份子與形形色色的自發主義者從政治上，以至於組織上劃清界線」，而《70》內部也在爭論期間發生「形形色色的政治分化，出現各種政治傾向，也就開始了自發組織中的政治化過程（politicalization）」。¹²³我們也因此可以說，是因為這一次分裂，《70》才真正從「沒有主義」變成更加明顯的「無政府主義」。《70》的無政府主義色彩在 1973 年以後更為明顯，或許也是由於這個原因。譬如，在 1974 年《70》一篇名為〈我們的立場〉的文章中，《70》終於顯現出比之前明顯的無政府主義立場，包括：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反對國家公有制、反對一切權威、反對先鋒黨等，並且主張自由平等、互助合作、自由組合、生產資料社會化、取消分工制、取消金融制、取消僱傭勞動制、計畫經濟以人民需求釐定等。¹²⁴我們也可以理解這些都是《70》在後續的行動中的「無政府主義基礎」（關於無政府主義更多具體的行動實踐，將在以後的章節中討論到）。

¹²⁰ 郭達年，私人訪問，2019 年 2 月 21 日。

¹²¹ 吳仲賢，〈群眾組織的神話〉，頁 214-215。

¹²² 陳耀成，《吳仲賢的故事》。

¹²³ 吳仲賢，〈群眾組織的神話〉，頁 214-215。

¹²⁴ 參見 70 戰綫，〈我們的立場〉，《學苑》，1974 年 11 月 1 日，版 12-13。

另一邊廂，托派就沒有以很負面的方式看待這次分裂——畢竟這也是「因理解而分開」——這次分裂不只是托派對《70》的自發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也是托派對自身的自發主義的起源、自己於《70》的歷史的一個總結。分裂出去的托派，正摩拳擦掌，想要以更嚴密的組織、更統一的理論、更遠大明確的目標、更清楚的戰略，在香港社會運動及政治的舞台上大展拳腳的機會。

5-4-5 從紅黑分裂看《70》的組織情感

《70》紅黑分裂一事雖然沒有對托派構成很大的影響，卻對《70》普遍內部的震盪非常之大。莫昭如認為分裂一事時的他對莫昭如「失去了同志感」，並認為托派這樣是在搞先鋒黨（莫昭如是反對先鋒黨的概念的）。而曾經在保釣時參與聯陣並且一直待在《70》中的劉健威則對這次分裂感到震驚和難過，他說：「我看到的是第二場政治鬥爭，很驚心動魄，我就意識到自己不是搞政治的人。我想要的理想和熱血只能用文化，所以我之後就離開了政治。」可見紅黑並舉的連番爭論，對本來的自發主義組織文化也有很深的傷害。

來到的《70》的人都是各自找出自己和這個組織連結的路徑、介入的手法，以至於留下的原因。譬如比較著重於思想性的吳仲賢在一開始創辦《70》時，就是想要以《70》傳播一些行動導向的、激進主義的思想——但當他的思想與行動越發明確地變成托洛茨基主義後，他就發現托洛茨基主義的剛性組織對比起《70》的自發主義組織模式更可以滿足他這方面的追求。又譬如，比較著重於美學的郭達年之所以留下來，主要是對小誌（zine）的美學上的偏好：「這個書不是一個人寫，而是很多 graphic，很豐富、很 fresh、很 virgin 的感覺。就覺得這個 medium 很好玩。」¹²⁵此外，我們也不可以排除還有更多種和《70》連結的模式。譬如，其他留在《70》的人，或許是喜歡《70》「野」的組織文化、生猛熱鬧的交際方式、或就是喜歡自發主義的組織模式，並在裡面感到平等、自在。

《70》那自由自在的、多元的、軟性的組織性格，使得每個《70》的人心中，都有自己獨有的一個《70》的模樣，以上一些例子，僅僅是捕捉到幾種認同《70》的路徑而已。我們從這幾種不同的路徑，實則可以側面看出，《70》的組織形式，如何給予空間

¹²⁵ 郭達年，私人訪問，2019年2月21日。

讓形形色色的人在《70》這個計畫中注入自己的關注、並且建立出對《70》的不同的歸屬感，卻又把《70》眾人以奇妙的方式黏合在一起——這也是《70》組織的一大特性。以至於，《70》作為一本刊物和一個組織，可以在火紅年代初期成為多種政治思想的搖籃。這也讓《70》成為火紅年代場景中成為最為耀眼、最為有趣、最為奇妙的一群。1973年紅黑分裂儘管使得《70》元氣大傷，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當中的各人依然在《70》或其他領域奮力經營革命的志業。《70》的遺產就像漫天閃耀的星塵那樣，以碎片的狀態繼續流傳至今。

5-5 小結

六七暴動雖然挑起了社會恐懼左派、恐懼政治的氣氛，社會在表面上回到了左右割據的超穩定結構。然而，當中所暴露的社會問題，都讓受到全球激進主義思潮的年輕人不甘於這種左右派的分野，對左右的批判也醞釀出《盤古》和《70》兩本刊物。事實上，《盤古》和《70》背後的起心動念，皆反映了1967-1970年期間本地年輕人求變的心態，而兩者思想資源的雷同——台灣自由主義、西方新左翼、無政府主義、毛澤東思想、托洛茨基主義——也極具時代的代表性。

雖然說《盤古》和《70》同出一「娘胎」，及後的發展卻如異卵雙胞胎一樣走出了各自的生命軌跡。《盤古》受到包奕明的啟發，在反思知識生產的道路上漸漸趨向毛派，大名鼎鼎的「回歸論」更是把毛澤東思想與新儒家話語無縫融合、接軌，為未來保釣運動中的統一路線和及後的「認識祖國」熱潮奠定了思想及情感的基石；而《70》則在吳仲賢及莫昭如的帶領下，在行動主義、自發主義的道路上漸漸趨向無政府主義，為未來一連串新生的社會運動及保釣運動中的反殖路線指引了方向；而從《70》分裂出來的托派，則承接了未竟的托洛茨基主義並給予創新。如果說，在保釣運動中，和《盤古》相生的保釣會是保釣運動中的統一運動路線的代表、《70》是保釣運動中反殖運動路線的代表，那《70》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的分裂就意味著在香港反殖運動上兩條不同的組織、思想和行動路線。隨著《70》和《盤古》的誕生，火紅年代正要燃燒起來，而下一章提到的保釣運動，就是促使火勢燃燒的關鍵事件。香港原本左右割據的政治版圖，將要進行一次轉風執位。

六、香港第一次保釣運動：打破後六七的恐政治難局

台灣自由主義被鎮壓，加上大陸文革及西方新左翼運動帶來的震動，透過第一波中運及珠海事件等本地抗爭，及《盤古》、《70年代雙週刊》（下稱《70》）等進步刊物的催化，本地青年於是越來越有介入社會和超越「左派」「紅色恐怖」及「右派」「白色恐怖」的動力。儘管此時依然是「扣帽子」的恐懼政治的年代，但接下來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下稱保釣運動），終會衝破這政治悶局。

釣魚台屬於釣魚台列嶼（日稱尖閣諸島）的一部份，為台灣東北與沖繩西南之間海域的一座小島，島上雖然無人居住，但該海域是鄰近漁民（由於風向原因，主要是中國大陸及台灣漁民）的傳統漁場。根據 1943 年《開羅宣言》和 1945 年《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文書》及 1952 年《中日和約》，日本答應將釣魚台列嶼隨台灣歸還中華民國。¹1945 年，美軍佔領沖繩。隨著二戰結束，世界進入全球冷戰後，美國為了防止共產主義勢力進入太平洋，因此認可日本對沖繩的潛在主權，並在 1951 年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使得美國可以繼續託管沖繩之餘，也把包括了釣魚台列嶼列明在沖繩範圍以內。因此，釣魚台列嶼的主權開始出現紛爭。

六〇年代，專家發現釣魚台周邊的礁層下有油田。1969 年 5 月 5 日，日本政府於釣魚台上立水泥標柱，表明釣魚台屬於沖繩，同時擅自將島上原有的標明島嶼屬於中國的標記毀壞。²1970 年 9 月 2 日，《中國時報》社會組記者登島採訪，除了插上了中華民國國旗，也留了「蔣總統萬歲」的大字，並且在 9 月 4 日於《中國時報》發表〈登臨釣魚台列島，看祖先留下一片洪荒〉的獨家報導，此舉引起日美兩國的戒心，沖繩遂於 9 月 15 日拔除國旗；9 月 21 日，沖繩政府的巡邏艇在美軍同意下兩度驅逐台灣漁船，而這消息又因為美聯社的報導使得台灣、香港及美國華人學生得知，遂引發海外（主要指美國）、台灣及香港出現第一次保釣運動。³

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從 1971 年 2 月開始，到 1972 年 5 月 13 日隨著美國將釣魚台列嶼行政權交予日本而結束。釣魚台列嶼主權歸屬衍生爭議至今仍未結束。在 1971 年第一波保釣運動期間，單在香港發生的集會、抗議、遊行、示威等行動就有大概三十次，

¹ 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釣魚台列嶼案答客問〉，<https://www.mofa.gov.tw/cp.aspx?n=215>（檢索日期：2021 年 7 月 1 日）。

² 姜宇晨，〈春雷怒吼釣魚台——1970 年代中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述評〉，<http://www.wyxxwk.com/Article/lishi/2009/09/44715.html>（檢索日期：2020 年 4 月 5 日）。

³ 本田善彥，〈「保釣」運動點火人〉，《保釣運動全紀錄》（新北：聯經，2019），頁 114-126。

參加人數超過千的有六次。⁴雖然從當下的角度（也就是在香港雨傘運動和反修例運動後）來看，人數以千計算不了什麼，但如果我們從香港歷史來看，這是自六七暴動後第一次出現的大型公開示威。而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它不但繼承了 1970 年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特別是中運——的本地運動風潮，同時也是全球保釣運動的一部份。⁵

這一章，我將梳理香港保釣運動和論述的發展過程，除了著重於香港本地的運動脈絡，也會將香港保釣運動和台灣、美國的保釣運動進行參照，從而探究香港保釣運動發展中的許多問題意識如何和國際大局以及台灣、美國的保釣運動息息相關。由於保釣運動經常被認為是激發火紅年代邁向高潮期的重要事件，而火紅年代又被認為是香港青年突破左右二元劃分、自主自發的激烈時代，指出本地保釣運動與台灣、美國保釣運動之間的相互影響，可以讓我們理解火紅年代中各種新生和自發的派別和路線，都不是「香港獨有」，他們背後的思想、情感與組織很多時候也是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響與啟發。

6-1 香港保釣運動的起源：本地、台灣及美國的影響

6-1-1 香港保釣運動的社會運動脈絡：山雨欲來的 1970 年

要理解保釣運動是怎麼在香港興起的，首先要講此前的本地社會運動風氣。1969 年的珠海事件雖然是在一片扣帽子聲中落幕的，但扣帽子扣得多了，在進入 1970 年時，香港青年開始看出了被左派、右派及港英政府箝制的主流媒體在報導社會運動時扣帽子把戲的荒謬之處。1970 年的社會運動討論開始比之前成熟。譬如，1970 年，因為《學苑》報導了曾鈺成變成左派的經歷，掀起了關於校園內是否潛藏左派的討論，且看到新一輪扣帽子風氣正在眼前醞釀，此時同學們的反應卻較之前要理性得多。因為大家開始認識到，揭發誰是左派還是右派等行為根本無法真的杜絕左派或右派，反而掩蓋了社會問題。一篇《中大學生報聯刊》的文章就提到：

筆者認為，要真名或揭發大學裡有左派學生存在，本身並無意義。在現世資本主義社會裡，使人左傾的因素有：社會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平、政府人員貪污、政府專為富人著想、社會缺乏理想等等，而這些都存在於香港。因此如果我們認為左

⁴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頁 193。

⁵ 當時發生保釣運動的地方，主要是香港、台灣和美國。美國爆發保釣運動的城市包括華盛頓、紐約、舊金山、西雅圖、洛杉磯、芝加哥等地。各地保釣運動的發源和進展，事實上都是相互呼應和帶動的。

是不好的話，那麼積極的做法就是消除這些禍根，而不是去揭發、證明左派學生的存在……蓋對社會不滿的人，共產主義是一個現成的思想出路。⁶

1970年，學生及大眾開始反省「扣帽子」的把戲時，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也就得以活躍起來，以下僅舉其中幾例。1970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為反對大學撥款委員會削減財政經費進行大罷課，有九成以上同學參加，2000多位罷課學生中有200人回校靜坐。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大學生罷課。⁷1970年5月，浸會書院也有學生組織反加費委員會，就學費上漲與校方談判。⁸可見青年在行動強度上正逐步升級，而這也有助於衝破社會上恐懼政治的氣氛。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7月的第二波中運——先前因被扣帽子而擱淺的第一波中運，過了三年後再次蓬勃起來。學生透過組成「中運聯」這一中運組織，與校外團體合作，共同推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使得中運從一場學生運動變成一場社會運動，也成功把議題帶入公眾視野。此為六七暴動後第一次大規模運動，羅永生更認為，此運動「對香港本土社會的發展、對華人地位的提升、對中文教育的促進，以致對繼後香港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勃興」，有「舉足輕重的深遠影響」。⁹第二波中運罕有地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支持，運動本身也衝破了社會禁忌——反殖與民族主義的論述自六七後再次高調出現（傳統左派則繼續對中運不以為然），為保釣運動中的統一運動路線和反殖運動路線皆建立起情感、思想與經驗條件。譬如，史文鴻曾說到：「『保釣』事件是由『中運』之普遍文化之關懷進而成著實之民族感情和國家主權關懷。我們大可說若沒有『中運』的培育，同學之意識未必能深化至關懷國家領土主權的問題。」¹⁰又如，在保釣中作為反殖路線要角的《70》在中運中也是一名猛將，曾調動數千人參與。¹¹可見中運對保釣影響之深遠。1970年的香港，正是山雨欲來。

⁶ 李紹明，〈漫談左派學生〉，《中大學生報聯刊》，1970年4月30日，版10。

⁷ 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香港學生運動大事年表〉，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頁4。

⁸ 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香港學生運動大事年表〉，頁4。

⁹ 中文運動的意義，參見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思想香港》6期（2015）。

¹⁰ 史文鴻，〈學運之回顧與憧憬〉，《崇基學生報》，1977年6月，版8。

¹¹ 羅永生，〈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

6-1-2 從台灣到美國，從美國到香港：香港保釣運動如何共襄盛舉？

雖然第一次保釣運動首先是在美國發起的，而美國的保釣運動也是台、港、美三地之中規模最大的；然而，保釣的議題首先是被台灣和香港的青年開始關注的。9月4日《中國時報》發表〈登臨釣魚台列島，看祖先留下一片洪荒〉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的《崇基學生報》於9月9日發表社論，呼籲「維護釣魚台主權」。¹²與此同時，香港的親國民黨右派報紙，也有重申釣魚台的主權，但在批評國民黨時，也會藉機打擊中共。譬如，1970年9月7日，《工商日報》發表〈不容日本覬覦釣魚台列嶼的主權〉，一方面批評日本違反國際公約、美國扶植日本，另一方面鞭策反應緩慢、消極的國民黨政府，認為外交部對國家主權利益的重大問題「竟出以一種『不足掛齒』的態度，是在匪夷所思」，文章也批評中共，認為「北平卻視若罔聞，未曾作出任何反應……顯然是配合它進一步滲透日本的計劃，居心毒辣，我們必須予以戳穿」。¹³中間偏右的《星島日報》也於1970年9月14日發表社論〈中日釣魚台群島主權之爭〉，同樣重申中國對釣魚台的主權，但對中共及國民黨的態度則明顯比《工商日報》溫和體諒，立場上表示「中華民國即使在國際間處境艱困，卻不容以凌辱主權做為外交上的交易。我們贊同中日兩國經由談判以求此問題的合理解決，同時也堅決反對任何有損國權與威望的退讓」。¹⁴

而自9月21日台灣漁民被驅逐的消息被報導以後，台港保釣的呼聲開始變得激烈，論述也從訴求政府作為轉向訴求自身的行動。1970年9月29日，香港開放社出了一本保釣特刊——根據吳萱人的說法，這是全球第一份保釣刊物，¹⁵裡面刊登了240人連署，主要連署者為教師和青年學生；¹⁶10月號的《明報月刊》也有支持保釣的文章。¹⁷但1970年9月前，保釣論述的主要關注依然落在要求國民黨及中共對此有所作為之上。

直到台大的王曉波（筆名茅漢）與王順於《中華雜誌》1970年11月號發表的〈保衛釣魚台！〉一文，保釣運動的論述才正式開始從「訴求國共有所作為」轉向「訴求自身的行動」——這也解釋了為何〈保衛釣魚台！〉會一石激起千重浪。文章除了引用了五

¹² 史文鴻，〈學運之回顧與憧憬〉，版8。

¹³ 工商日報，〈不容日本覬覦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0〕），頁115-16。

¹⁴ 星島日報，〈中日釣魚台群島主權之爭〉，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0〕），頁119-21。

¹⁵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187。

¹⁶ 尤，〈二百四十人聯名發表宣言 反對日本侵畧釣魚台列嶼〉，《中國學生周報》，1970年10月9日，版2。

¹⁷ 孫淡寧，〈釣魚台列島主權不容侵犯〉，《明報月刊》58期（1970），頁2。

四運動的論述，高呼「中國的土地，可以政府，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口號，更指出了日本對釣魚台聲稱主權是一種帝國主義的野心和國民黨政府在保釣議題上的昏庸無能，同時呼籲「我們要用力量和行動來證明，我們這一代的青年同樣具有包圍國土的能力和決心」。¹⁸這篇文章尤具代表性，因為它象徵著保釣的論述重點從直接訴求各國有所作為（對話對象為政府），開始轉移到鼓動群眾關注或行動（對話對象為民間）。而要求民眾自覺的保釣論述的出現，是使得保釣走向社會運動方向的關鍵。

王曉波與王順的文章的影響很快到達了美國華人留學生的圈子之中——這些學生大多來自台灣和香港。根據姜宇晨的說法，普渡大學的胡卜凱收到《中華雜誌》上的相關文章後，在他參加普林斯頓大學留學生社團「大風社」的每月例會時，提出了保釣議題讓大家討論，結果大家討論得熱血沸騰。然而，台灣學生就算滿腔熱血，也往往因為對台灣的白色恐怖猶有餘悸，怕被在美國的國民黨特務扣紅色帽子導致無法回台或回台後被興師問罪，而較少直接化為行動，但是沒有這些包袱的香港學生則更為積極（港英殖民政府未曾因為香港學生在海外的活動而抓人）。曾參與過反越戰遊行的香港學生沈平就是一例。在台灣的保釣運動進程中，僑生（包括了香港學生）的積極性同樣功不可沒，曾參加台灣保釣運動的僑生邱立本是這樣分析僑生在台灣保釣運動中擔任先鋒的原因：「戒嚴時期，在台灣若是因為政治事件遭檢舉是會被問罪的，搞不好還有銀鐐入獄的可能。因此，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本地生對於政治有所牽扯的事物感到極度恐懼。相對於此，僑生雖然也不是完全不害怕國府的特務，但就算是最壞的下場，頂多也只是被強制離開台灣罷了，因此大家敢於發言，敢於行動。」¹⁹值得一提的是，在台灣的香港僑生也是台灣保釣運動的重要推手——無論是美國還是台灣，香港留學生都比台灣留學生在一開始更沒有行動的負擔。²⁰

就這樣，保釣運動開始在美國、台灣及香港醞釀，當中又以美國保釣的組織和行動最為先鋒，帶動了台灣及香港保釣運動的後續發展。美國的華人留學生開始展開討論會、

¹⁸ 參見王順、茅漢，〈保衛釣魚台！〉，《中華雜誌》88期（1970），頁8-12。

¹⁹ 本田善彥，〈突破〉，《保釣運動全紀錄》（新北：聯經，2019），頁145。

²⁰ 黃錦滿就曾提到，由五個僑生組織——華僑同學會、港澳同學會、海洋詩社、綠濤出版社和海風出版社輪流出版的《台大僑生》就曾對台灣爭取大學生言論自由和推動保釣運動發揮巨大的影響力。特別是《台大僑生》和港澳僑生回攜手並於德明校友會貼出第一張抗議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台的海報後，在台大校園繼續宣傳保釣，更合師大、政大的僑生組織聯合僑生組織保釣示威。參見黃錦滿，〈《台大僑生》促成台灣學界保釣〉，收於專集組編《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香港：策劃組合，1998）頁101-102。

寫文章、寫信、開座談會、演講等方法，加上善用不同的刊物——特別是《科學月刊》——的網絡，²¹保釣議題因此為留學生所廣知，也慢慢往遊行示威等行動進發。而此時，美國的保釣運動主要還是以民族主義為主要驅動力。

此時，香港也開始收到關於美國保釣運動的消息，這也刺激了香港保釣運動的發展。曾為保釣運動中積極份子的吳仲賢就說：「海外保衛釣魚台運動，最初發動地是美國，這大抵是 1970 年末的事。當時我們香港的活躍份子，在美國保釣示威傳來之前，對此事基本上一無所知。」²²這說法也和周魯逸的回憶吻合。根據周魯逸的說法，他也是在 1970 年末香港海底隧道工潮期間，在大專社會服務隊的罷工論壇上認識了前《盟刊》編輯陳志強，才知道美國的保釣運動：「就是他最先將美國有台港留學生正準備『保釣』並希望香港能有配合行動的消息告訴我，我便立即與『阿包』、『阿樂』、『阿廉』及其時已是很熟落的吳兆華、關永圻、高耀、鄭炎淇等討論此事，都認為要迅速積極行動。」²³「阿包」指的就是包奕明，而「阿樂」及「阿廉」則與陳志強一樣，都是周魯逸口中「受 1967 年反英抗暴影響的『社會反叛青年』」。²⁴

其後，周魯逸與陳志強等人開始著手組織香港的保釣運動。首先，他們開始聯絡其他在香港有意發展釣運的人，很快就聯絡到中大的學生，包括譚聯輝、陳以衍等及關品方等人。²⁵譚聯輝與下徑口村的馬紹良²⁶在大學時期曾組織過多場與勞思光的「傾偈會」，奉勞思光為思想導師，一直比較反中共，譚聯輝甚至曾經向馬紹良提到：「我們有六億同

²¹ 關於《科學月刊》對保釣運動的貢獻，參見劉源俊、林孝信、李淑珍，〈《科學月刊》的世代：林孝信與劉源俊對談〉，收入王智明編，《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新北：聯經，2008），頁 49-79。

²² 參見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90〕），頁 814-15。此外，吳仲賢並不是沒有注意到，在 1970 年，一個叫作「開放」的文社就在其刊物《開放》中對琉球群島主權問題大表不平，也在日本驅逐台灣漁民等事情後辦了特刊，力爭主權，然而，我同意吳仲賢的說法：「但這份釣魚台刊物在香港掀起的反應卻十分可憐。主觀上宣傳做得不夠，客觀上香港青年對這件事還未有認識固然是反映薄弱的原因，但另一個原因是，『開放』社仍然保留著從文社運動中一脈相承的只重文字不重實踐的發展，否則的話，『開放』社大可以在出版特刊前廣泛聯絡各青年學生刊物，同一了宣傳的陣容，然後發展運動。但『開放社』畢竟沒有這樣做，畢竟缺乏社會運動的經驗，甚至在日後釣魚台發展成為群眾運動時，『開放』社的社員始終沒有居於領導地位。所以，當我們指出『開放』社是香港釣運的先驅時，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它的先驅地位只是在運動發展的時序而言。」見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70 年代雙週刊》29 期（1973），頁 9。

²³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未出版，2018）。

²⁴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²⁵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²⁶ 同時，馬紹良是下徑口村聚會的一份子，認識包奕明並且理解包奕明的自發毛派思想。參見中大校友編輯委員會，〈It 教育家——馬紹良〉，《中大校友》33 期（2003），頁 17。

胞仍在水深火熱之中」²⁷，意思是不同意中共的領導。陳以衍同樣受到反共南來文人的影響，其民族主義深受唐君毅及牟宗三形塑。而在此之前，陳以衍曾經到美國交流觀摩兩個月，深為美國民權運動和校園運動所震撼。本來已有的民族主義被美國的抗爭情勢所催化，使得他對保釣議題甚為關注。²⁸這也和周魯逸的回憶有所吻合，周魯逸看到他們身上南來右派文人的影響，即認為譚陳二人是「勞思光式反共右傾自由派」²⁹——這自然也和當時的包奕明、周魯逸及下徑口村的自發毛派有距離，當然地雙方也未能合作。³⁰

在意識到不能合作後，包奕明、周魯逸、陳志強等人決定與下徑口村部份關係密切者，於 1971 年 1 月初開始自行組織。³¹他們於 1971 年 1 月 30 日³²成立了「保衛釣魚台臨時聯絡小組」（下稱聯絡會），根據吳仲賢的理解，他們的工作內容包括了「對外聯繫美國的釣魚台組織、對內聯絡《中國學生周報》、《學苑》、《大路》（香港大專社會服務隊刊物），供給稿件和資料，踏實的進行擴大宣傳、號召群眾的工作」³³。從這段話，我們可以推斷陳志強、包奕明、周魯逸與馮可強都為保釣運動充分發揮其先前的人脈及能力，因為這個聯絡小組的聯絡對象剛好都是這四人本來的人脈範圍：陳志強與美國保釣組織之前已經取得聯繫、包奕明與友聯系統一直密切聯繫、周魯逸與香港大專社會服務隊曾有過往的合作、馮可強曾在《學苑》工作。此聯絡會，也就是日後「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下稱保釣會）的雛形了。

²⁷ 中大校友編輯委員會，〈IT 教育家——馬紹良〉，頁 16。

²⁸ 中大校友編輯委員會，〈生命就是偶然〉，《中大校友》8 期（1996），見 <http://www.alumni.cuhk.edu.hk/magazine/dec96/html/p03-12/P05-07.HTM>。

²⁹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³⁰ 事實上，周魯逸可能有所不知的是，譚聯輝雖然深受勞思光影響，但意識形態上可能不是「勞思光式反共右傾自由派」，他在 1970 年時是《中學生周報》的成員，甚至私下建立了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而《中學生周報》雖然在 1972、1973 年期間結束了刊物，並成為了新的工人刊物《揭露》，公開組織為「揭露社」。揭露社也有很強的列寧主義及托派色彩，而揭露設到了 1974 年以後趨向國粹派，隨著 1976 年國粹派普遍潰散時也瓦解了。他曾提到，《中學生周報》中的其中兩個成員是譚聯輝和陳以漢（應為「陳以衍」之誤植）。不過，由於我沒有在其他來源看到過指出譚聯輝是列寧主義者的說法，周魯逸到底是否錯判譚聯輝，實在難以說清。有關劉山青對揭露社的描述，參見劉山青，〈七〇年一七八年：投身政治運動〉，《無悔的征途》（香港：明窗，1992），頁 55-56。

³¹ 這是吳仲賢根據馮以超的消息得知的，見吳仲賢，〈八月的札記〉，《70 年代雙週刊》23 期（1971），頁 13。

³² 根據吳仲賢的說法，聯絡會是在 1 月 26 日成立的。見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71〕），頁 802。但是，根據周魯逸的說法，聯絡會是在 1 月 30 日成立的，見魯凡子，〈美日侵我釣魚台列島與二月中的香港反日示威〉，《盤古》38 期（1971），頁 2-4。

³³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2-03。

另一邊廂，《70》的吳仲賢在收到美國的保釣運動消息後，並沒有立刻像包奕明及周魯逸等人積極組織保釣運動——吳仲賢提到，他與《70》成員一時間對於要先發動示威還是先鼓勵學生組織還沒拿定主意，要到了1971年1月27日，吳仲賢才下定決心要發大來搞保釣運動。那天是年初一，吳仲賢去邱剛健家作客吃飯，同檯的還有《盤古》的胡菊人及戴天。戴天在飯局激賞了留美的華人學生的保釣熱誠，又對香港的冷漠十分不滿，還聲明如果香港為保釣而示威，他個人一定參加。³⁴要知道，在六七後大家對港英鎮壓猶有餘悸，儘管1970年的社會運動已經逐漸蓬勃起來，罷課、靜坐、集會、工潮都有發生，但香港社會運動還未出現過大型遊行。戴天的一番話讓吳仲賢理解到保釣議題的群眾基礎和發展潛能，因此立下決心要發動保釣運動。³⁵

同時，美國的保釣運動也進入了第一個小高峰。1971年1月29、30日，保釣運動的留學生們發動第一次大規模示威遊行，在美國六個城市——紐約、華盛頓、芝加哥、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同時舉行。此舉不僅使台灣留學生衝破了長期戒嚴下形成的恐懼感，對台灣後續的社會運動發展有著深刻意義。此消息傳到香港後，也震動了香港的活躍份子，保釣議題也正式進入公眾視野。受到美國保釣運動的鼓勵，香港各方人馬對在港推動保釣運動就更有勇氣和決心了。

6-2 二月保釣：保釣會與《70》長期累積的矛盾和各立山頭

先前提到，包奕明、周魯逸等人在成立保釣會前其實曾與崇基學生討論過合作的空間，但是發現他們為「勞思光式反共右傾自由派」³⁶而不能合作，眼見保釣運動又勢在必行，包奕明、周魯逸等人因此決定自立門戶成立保釣會。同時，他們也知道《70》等人在關注保釣，可是根據吳仲賢事後的看法，保釣會在醞釀成立之時沒有考慮要找《70》合作搞保釣運動。吳仲賢說：「早在今年一月初的時候……當他們〔保釣會〕在創建開會的時候，因為他們不相信《70年代》會熱心釣運，所以決定不邀請我們參加討論，也不擬邀請我們參加組織。」³⁷可見包奕明、周魯逸等人自始就懷疑《70》對釣運的熱誠，也沒有打算與《70》合作。兩批人馬因此在開始時就沒有合作。而雖然吳仲賢事後對保釣會

³⁴ 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頁814-815。

³⁵ 關於這場飯局如何激起吳仲賢的保釣熱情，參見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頁813-816。

³⁶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51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³⁷ 這是吳仲賢根據馮以超的消息得知的，參見吳仲賢，〈八月的札記〉，頁13。

此舉頗有微言，認為保釣會孤立《70》，然而，吳仲賢自己也坦承《70》的一些人一開始的確不熱心釣運。可見保釣會對《70》的懷疑並非空穴來風。吳仲賢曾在遺稿〈回憶保釣運動〉中提到：

在《70年代雙週刊》內部發動搞保釣，也遇到困難。莫昭如開始時候頗有保留，因為這位早在澳洲阿特雷特留學時便開始活躍的老戰友，認為保衛釣魚台似乎是民族主義色彩太濃，而按照他的見解，現在的世界，目標應是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基本上是反動的。³⁸

然而，吳仲賢與莫昭如不一樣，經歷了年初一與戴天的聚餐後，他對保釣已經決心要參與進去。因此，雖然包奕明、周魯逸沒有主動去組織吳仲賢或《70》搞保釣運動，吳仲賢還是跑去與周魯逸等人會面。可是，吳仲賢的熱誠並不能彌補包奕明及周魯逸的不信任。根據周魯逸的說法，在2月中，吳仲賢雖然曾多次與包奕明、馮可強及他本人在創建校址會面，並商量合作的可能；但是，包奕明和周魯逸對吳仲賢甚為堤防，並認為吳仲賢是借商討為名，實質是要拖慢保釣會的成立和工作進度，是「以時間換空間」的拖延戰術的「計謀」，好爭取時間說服莫昭如搞保釣運動，一旦成功就會搶奪運動領導權。周魯逸說：

吳仲賢的策略是借與我們「有得傾」及「保釣會」已經成立「勢在必行掌握學運主導權」回去向莫昭如施壓力要搞保釣，另方面要求我們拖慢步伐「看看可否合作」，其實是若莫昭如一表同意，他們便「搶在我們前頭」先發動示威「搶主導權」！我們當然看透其手法，而且阿包和我都早就已明確《70》乃不可合作，彼此都是「摸底」而已！³⁹

由此可見，吳仲賢自身對的熱誠並不可以解開包奕明、周魯逸對「《70年代》不會熱心釣運」的成見，反而包奕明、周魯逸都認為這個熱誠背後都是計謀，為的只是要搶奪運動主導權。然而，為何周魯逸、包奕明為何如此不信任吳仲賢？甚至要把吳仲賢的熱誠理解成是《70》要拿運動的主導權？又如此介意《70》取得運動的主導權？我認為，

³⁸ 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頁814-15。

³⁹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51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周魯逸、包奕明等人對吳仲賢、莫昭如等人的芥蒂及不信任，首先是來自於他們以為《70》想要與自己競爭。周魯逸就曾經說過：

他〔莫昭如〕由澳洲回來之後，是立心「要搞香港學運」；當他明確意識到與他眼中的包錯石——周魯逸「毛派社會主義親中共集團」不可能合作之後，便已知道他耍搞香港學運的主要「競爭對手／政治敵手」正就是我們，而且他們是處於「相對弱勢」。莫昭如對「反越戰」議題有很大興趣，但他這方面的連絡動員力遠不及「阿包」，《70年代雙週刊》核心份子們投入社會鬥爭的決心和勇氣或許不低於我們，但他們顯然遠沒有我們的思慮周密和理論水平，更不可能有「阿包」帶給我們的「高層次文化界」關係；但他們卻辦了一份具有「戰鬥格」的《70年代雙週刊》卻可以在社會層面廣泛吸引「西式新潮青年／社會反叛青少年／部份反共人仕」，而我們則多是「生活態度相對嚴肅／認真思考學習者」，雖然彼此平均年齡相若。⁴⁰

現在再去追究到底是《70》先把包奕明當競爭對手，還是包奕明先把《70》當競爭對手，就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無從說起。但包奕明、周魯逸等人把《70》的冒起解讀為要「一爭高下」、「你死我亡」的惡性競爭，而不是「齊頭並進」的良性競爭，更深的的原因還是來自於兩者政治理念、風格有所衝突。包奕明與周魯逸為何不滿《70》的政治呢？特別是包奕明——他作為聯絡會和保釣會的幕後軍師，又是周魯逸的思想導師，兩者皆對保釣會成立起到重要影響——又是一名新左翼自發毛派，與《70》一樣關注黑人民權運動及反越戰，難道不是應該會把《70》視為「自己人」嗎？

事實上恰恰相反，包奕明對新左翼的不同流派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我曾在第四章提到過，自1970年1月18日開始，包奕明曾在香港左派報紙《新晚報》的星期日副刊「風華版」上，發表過多篇長文介紹及批評西方新左翼。⁴¹而以〈試談「新左派」——由

⁴⁰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51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⁴¹ 參見崔華，〈嬉皮與新左的文化反叛一樣嗎〉，《新晚報》，1970年5月17日，版5；崔華，〈新左嬉皮合二為一（上）〉，《新晚報》，1970年5月31日，版5；崔華，〈新左嬉皮合二為一（下）〉，《新晚報》，1970年6月7日，版5；崔華，〈論「新左」嬉皮的異同——兼論兩者與自由主義的淵源（上）〉，《新晚報》，1970年6月14日，版5；崔華，〈論「新左」嬉皮的異同——兼論兩者與自由主義的淵源（下）〉，《新晚報》，1970年6月21日，版5；席辛佐，〈試談「新左派」——由垮而誇、由迷藥到火藥〉，《新晚報》，1970年1月18日，版8；席辛佐，〈挖美國新左派歷史的根——經濟大恐慌與三類反叛

垮而誇、由迷藥到火藥》一文為代表，我們可以理解包奕明基本上對除了有毛派傾向的 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學生爭取民主社會）和黑豹黨以外的新左翼外都持不屑的態度。⁴²他認為，西方新左翼起源於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而從此發展出了兩個方向：一個是走向用藥的嬉皮文化，是為「垮」；一個則是走向「火藥性的造反行動」，是為「誇大」的「誇」；但兩者都拘泥於「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侷限性。⁴³按照包奕明的邏輯，《70》的野性和戰鬥格只會被認為是「誇」，而《70》第 1 期文章中對嬉皮士之於新左翼的影響所採取的正面評價，甚至肯定嬉皮士反對暴力的論點，則會被認為是「垮」。⁴⁴《70》很明顯不是 SDS、非黑豹黨這種西方新左翼毛派——包奕明對其他新左翼的批評，完全可以將《70》對號入座。

此外，由於包奕明與吳仲賢初識時，吳仲賢是國民黨右派珠海書院的學生，還是反共和認同中華民國的自由主義者，包奕明及周魯逸等人早就認為與吳仲賢道不同不相為謀，周魯逸甚至稱吳仲賢是「反共極右派」⁴⁵——而包奕明不久前才為了躲避右派以扣帽子方法「追殺」而躲到左派工會去。因此，包奕明及周魯逸等人對吳仲賢、《70》甚至是其他「外人」採取了懷疑、不信任、不合作、以「摸底」態度敷衍、不願做開心見誠的討論態度，以致於不願意和《70》合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創傷反應。

6-2-1 保釣遊行前的最後 100 小時：兩派保釣、一種緊張

在吳仲賢發現與包、周等人商討無甚進展後，決定與《70》中一名代號為「鬍鬚佬」的成員自立門戶，在 2 月中開始準備在 2 月 20 日發動遊行。吳仲賢在 1971 年 9 月就說到：

的知識青年》，《新晚報》，1970 年 2 月 22 日，版 5；朱剛，〈新左派的失離〉，《新晚報》，1970 年 2 月 8 日，版 8；朱剛，〈新左派與新階級——看美國反叛的知識青年〉，《新晚報》，1970 年 1 月 25 日，版 8；歐陽敏惠，〈列寧誕辰日評新左派（上）〉，《新晚報》，1970 年 4 月 26 日，版 5；歐陽敏惠，〈列寧誕辰日評新左派（下）〉，《新晚報》，1970 年 5 月 3 日，版 5。

⁴² 包奕明以 SDS 通過了「堅決支持黑豹黨」及「反對美蘇串通反華」的決議，以及其旗下刊物《新左筆記》（*New Left Notes*）中所引用的毛語錄，去肯定他們的激進性。包奕明認為，這些是少部份意識到自己侷限性的新左翼，他們「和工人群眾相結合，和暴力組織革命相結合，並且到工廠中去體驗勞動生活及了解剝削制度。同時對於知道革命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在掀起學習的高潮」。參見席辛佐，〈試談「新左派」——由垮而誇、由迷藥到火藥〉，版 8。

⁴³ 席辛佐，〈試談「新左派」——由垮而誇、由迷藥到火藥〉，版 8。

⁴⁴ 關於《70》對嬉皮文化對新左派的影響是如何持比較正面的態度，見肯尼夫·甘里斯頓，〈嬉癡士與新左派〉（單周堯譯），《70 年代雙週刊》1 期（1970）。

⁴⁵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後來在二月中，我和鬍鬚佬覺得應該響應留美的釣運，所以漏夜趕起了第十九期⁴⁶的特刊，發動2月20日的示威。那一次是我們兩個人決定的，而且為免《70》其他編輯反對，便不用《70》名義，但一樣發動示威。⁴⁷

這個遊行剛開始宣傳時，其實也應驗了周魯逸的說法——莫昭如在當時的確沒有被說服（雖然我們難以因此就無限推演下去，認為吳仲賢一定是採取拖延戰略要拖慢保釣會的成立和工作進程以爭取時間得到《70》啟動「爭主導權」），以至於吳仲賢其實沒有採用《70》的名義發動遊行。⁴⁸

而他們發動2月20日示威的消息一出來，果然使得當時依然為「聯絡會」的保釣會成員震怒，吳仲賢說，當時與包、周等人關係密切但同為《70》編輯的馮可強打電話來，指責吳仲賢和鬍鬚佬是「壟斷革命」；而吳仲賢認為，保釣會為了重新爭取領導權，提前在2月18日發動第一次香港保衛釣魚台示威，事前保釣會也沒有通知《70》。⁴⁹周魯逸的公開說法是，遊行是聯絡會在1月30日後就有的想法，但因為有人在2月14日創建所舉辦的「保衛釣魚台座談會」後提出在2月18日舉辦遊行，而且大家也同意了，所以會後大家留下來並正式成立「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著手籌辦遊行。⁵⁰我認為兩個說法並無衝突。

根據吳仲賢回憶，保釣會的中心人物是包奕明、周魯逸、陳志強、馮可強、高耀等，⁵¹大約20人⁵²。根據曾參與保釣會的劉健威回憶，包奕明雖是中心人物，但比較是長居幕後，出面較多的是周魯逸及高耀。由於2月18日的遊行臨近，此小組在成立後第二日旋即開展宣傳工作，宣傳地點包括天星小輪、港大和中大等。⁵³劉健威說：「我當時有參

⁴⁶ 有趣的是，吳仲賢這一段有資料的錯誤——特刊很有可能不是在第19期發行的，因為《70》第19期是在1971年3月發行的，如果特刊此時才面世，是沒可能起到遊行的宣傳效果的。與此同時，「70年代雙週刊及民眾戲劇：莫昭如及友人私人收藏檔案」資料庫中，則把釣魚台特刊歸檔在1971年1月1日《70》第17期之下，這也很明顯是錯誤的歸檔，因為特刊上轉載了關於1971年1月15日美國加州的保釣討論會狀況的報導。唯一的可能是，吳仲賢所說的特刊，實際上是夾在1971年2月1日《70》第18期之中。

⁴⁷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頁13。

⁴⁸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頁13。

⁴⁹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

⁵⁰ 魯凡子，〈美日侵我釣魚台列島與二月中之香港反日示威〉。

⁵¹ 參見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

⁵² 此人數是從筆者訪問保釣會參與者劉健威得來，同時與周魯逸及吳仲賢的說法一致。周魯逸的回顧，見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51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⁵³ 魯凡子，〈美日侵我釣魚台列島與二月中之香港反日示威〉。

加保釣會的組織，我是幾個比較熱心的幾個人，譬如我們會上天星小輪，唱保釣戰歌、派傳單。」⁵⁴

在這段時間，周魯逸也得到了創建校方授權持有校址鑰匙並且在那裡過夜，和其他保釣會的人進行最後的物資準備。而此時的創建，更瀰漫著緊張的氣氛。他們知道，自己所參與的示威是非法的，而且這也將會是自六七暴動後第一次社會上的公開示威——警察到底會怎麼做、會否逮捕任何人、會否暴力鎮壓等，都是未知之數。曾參與籌備工作的陳強寫道：

1971年2月17日，深夜。

……這一個晚上，有十幾個青年人正在燈光下緊張地爭奪著每一分鐘的工作，他們有的在寫標語；有的在印傳單，有的在搖電話做聯絡；有的在一編又一遍反覆思慮天明後行動的每一步細節。

他們在等待著——黎明，這是保衛釣魚台的行動號令！

就是這一個晚上，對於這些青年人來說，它是多麼的平靜而又不平靜，平凡而又不平凡。

天亮後，決心和力量能為釣魚台說明幾許道理？示威，吹得起死水溝的半點漣漪麼？誰知道？但有人不畏惡臭，敢於開墾，看能造出個什麼世界！⁵⁵

由此可見，他們是抱著緊張而充滿希望的心情去迎接2月18日的遊行。此時的保釣青年，已經拋開在國共之間選擇困難、進退失據的心態，正準備急流勇進。這既是保釣的熱情、組織之間的競爭心態使然，更展現了本地「土生土長的第一代」的特徵。為何「土生土長」會成為運動爆發的條件？這一方面是一種「天然」的屬性——因為土生土長的一代並沒有祖父輩作為移民或難民的逃難記憶，也因此沒有偏安一隅的思維；另一方面，這也是因為港英政府無法再使用以前用來打壓移民一代政治運動的「遞解出境」手法，來對待土生土長的一代。土生土長一代的抗爭成本就此降低了。周魯逸曾說：

對於英國佬，在我們的保釣經驗裡面，頂多就是被打兩棍，總不會拉我去槍斃吧？我從來不認為我會被拉去槍斃。說〔港英殖民政府〕要遞解我出境嗎？我是香

⁵⁴ 劉健威，私人訪問，2021年4月25日。

⁵⁵ 陳強，〈衝破沈默——學運的醞釀期〉，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1〕），頁45。

港人，他們不可以遞解我出境。所以，我和正式有共產黨背景的始終心態不同。他們在過去那個年代，他們會害怕有遞解出境的問題。我從來不想這個問題。你解什麼我處境？我在香港出生的。⁵⁶（黑體為筆者所加）

同一時間，在另一邊廂，創建的其他人對遊行普遍持懷疑態度。周魯逸提到，「文社人」吳萱人就曾為了反對保釣會的行動和包奕明及周魯逸吵架，而負責學校行政的夏仲權則深夜苦口婆心兩小時，勸周魯逸放棄，因為「港英定會鎮壓拉人打人」。面對港英可能會鎮壓，保釣會等人其實並非完全不緊張、不打算，但他們的計劃就是在通知媒體的前提下，在港英出手鎮壓前迅速行動，務求在拘捕前自行解散。⁵⁷

到了遊行當日，大約有 40 多人分別在天星碼頭和九龍佐敦道碼頭會合，派發傳單，而當時警方已予嚴密監視，天星碼頭就有三輛警車準備。到了 8:45 左右，傳單派完，大家便在香港港外綫碼頭會合，步行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所在的國際大廈。到達後，四個代表——吳兆華（中大聯合學生、《盤古》編輯）、陳志強、馮可強、高耀——往十九樓的領事館遞交抗議書。抗議書內容提到：

我們四十餘人，只是中國人海中的一小點滴，然而以少見大，也能深知是非利害……石油是中國人民工業化的鮮血，誰要侵略釣魚台列嶼的石油資源，誰就對中國人民反了謀殺罪！……是否與七億三千萬中國人民為敵，日本軍國主義者仍可三思。

⁵⁶ 周魯逸，《周魯逸（魯凡之）——悼包錯石並論世局（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PM2HqhxkU>（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⁵⁷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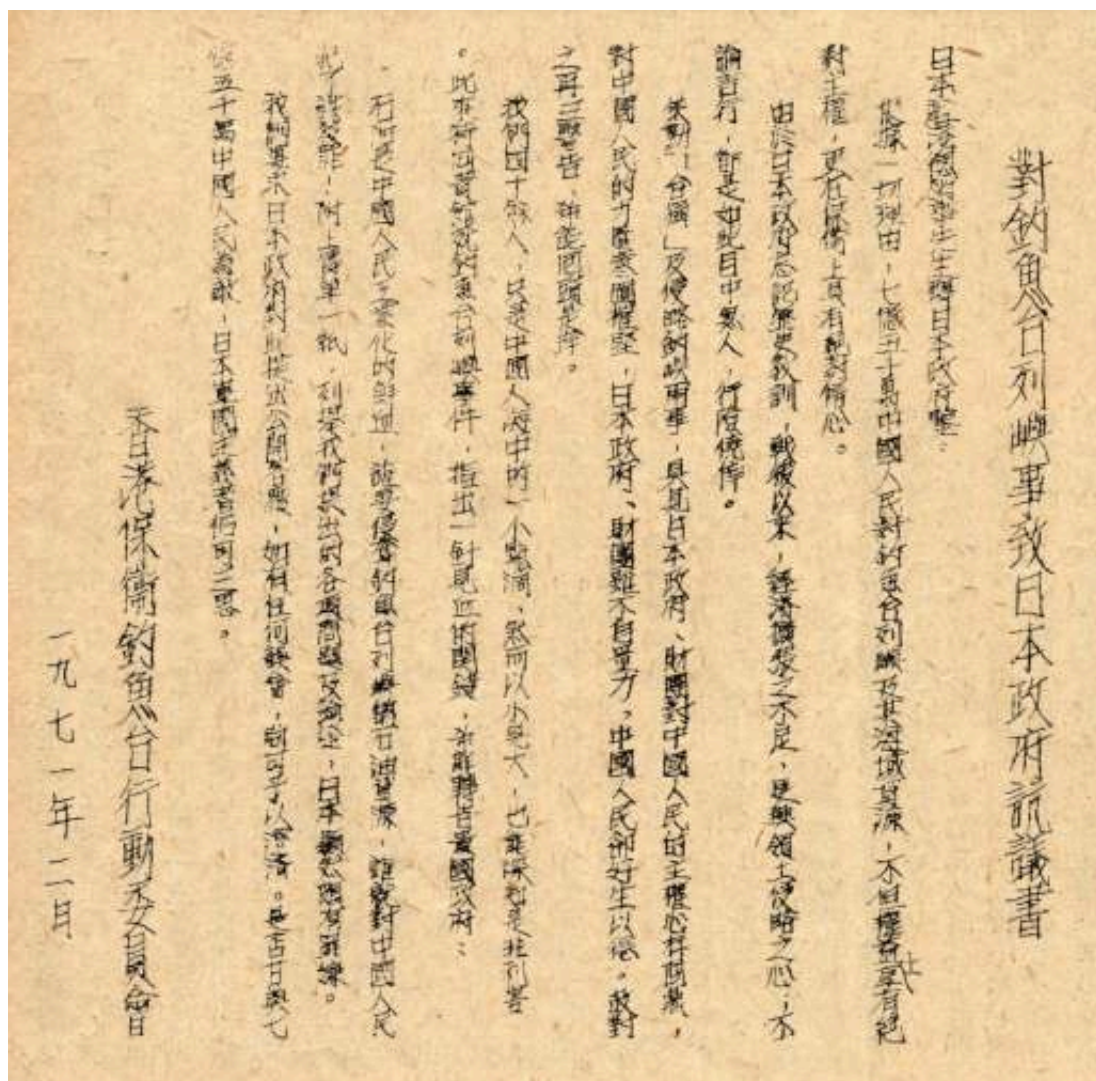


圖 14：1971 年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之對釣魚台列嶼事致日本政府抗議書（圖片來源：魯凡子，〈美日侵我釣魚台列島與二月中的香港反日示威〉）。

抗議書內容主要是訴諸民族主義語言，也加入對中國的現代化前途的重視。此外，現場沒有高舉標語，只有九位青年人在胸前掛著一塊白布，分別寫著「反日軍國侵掠釣魚台」，由於群眾開始圍觀，記者也越來越多，隨著警方干涉及恐嚇拘捕，他們在圍繞國際大廈遊行一圈、等到四個代表下樓後，保釣會就結束了示威。⁵⁸

⁵⁸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2-04。



圖 15：1971 年 2 月 18 日香港保釣示威者於身上掛上「反日軍國侵掠釣魚台」的標語（圖片來源：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 20）

另一邊廂，《70》的吳仲賢也正在思考被捕的風險。要知道，港英政府對六七暴動的鎮壓仍然歷歷在目，到底這次遊行會否惹來被捕，導致個人前途斷送等問題，都是大家必須要面對的。2 月 19 日，《70》籠罩著沉重和緊張的氣氛——吳仲賢及鬍鬚佬夾在《70》中的特刊早已經發送出去，2 月 20 日的遊行勢在必行，《70》於是跟打算去遊行的吳仲賢和鬍鬚佬等開會商討怎麼面對警方干涉。結果，有十多人決定「情願給警方拘捕也不願認命離開」。⁵⁹

從此結論我們可以看出兩件事。第一，面對同樣的被捕風險，《70》與保釣會相比起來，似乎更為「敢死」，投入社會鬥爭的決心和勇氣高不下於保釣會——這或許跟《70》的「戰鬥格」及在第二波中運中攢足了底氣有關——他們都已經不是運動的新手了。第二，此時的吳仲賢及鬍鬚佬，到最後也是在得到了《70》不少編輯的支持下去參與保釣運動。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吳仲賢在後來會自相矛盾，一時說 2 月 20 日的遊行「為免《70》其他編輯反對，便不用《70》名義」⁶⁰，一時說「2 月 2 日的示威，是由《70 年代》

⁵⁹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4。

⁶⁰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頁 13。

雙週刊發動的」⁶¹。這兩個說法，似乎都說得通。不過，不論發起 2 月 20 日遊行的組織為何，外界都已經把這一次遊行當作是《70》發動的。⁶²此遊行也標記了《70》正式加入了保釣運動的行列。

到了 2 月 20 日，大約 30 多人來到日本文化館前。與保釣會的遊行不一樣的是，這些人都高舉標語，包括「誓死保衛釣魚台」、「中國領土不容侵略」、「反對美日勾結」、「捍衛國土，人人有責」、「同胞們，行動起來吧！」⁶³、「行動起來，不可默然」、「日本人滾出釣魚台」、「抗議美國包庇日本」、「團結起來，抵制日貨」⁶⁴、「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八年仇恨猶未了、豈容再侵釣魚台」、「反對美資染指我國油礦」⁶⁵等，遊行隊伍中都是滿滿的示威牌子。而警方早已到達，現場附近也有大型警車。兩名警司到文化館前叫示威者散去，但沒人離開，反而人越來越多起來，到了 11:00，人數已經急升到 200 人。此後，人群結隊遊行到日本領事館樓下，並且站立示威，但停留不到十分鐘，便在警方的強硬態度下解散。有示威者收集了標語想上樓去領事館，但被警方攔截。雖然沒有人被捕，但是當中的緊張卻是貨真價實的，吳仲賢就提到：「原訂計劃的焚燒日相佐藤相，和焚燒日本軍國旗，在緊張的情緒下而沒有執行。」⁶⁶

⁶¹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4。

⁶² 譬如《曙暉》就把這次遊行報導成是《70》發行的，見曙暉，〈一九七一年的釣魚台事件進展〉，《曙暉》，1971 年 3 月 20 日，版 2。

⁶³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4。

⁶⁴ 參見《曙暉》的圖片報導，曙暉，〈中國領土，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曙暉》，1971 年 3 月 20 日，版 3。

⁶⁵ 魯凡子，〈美日侵我釣魚台列島與二月中的香港反日示威〉。

⁶⁶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4。



圖 16：1971 年 2 月 20 日香港保釣示威（圖片來源：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 20）。

6-2-2 腹背受敵：運動內部兩派撕裂、運動外部遭國民黨右派抨擊

由於「保釣會」和《70》各立山頭，因此，香港在 1971 年 2 月的三天內，就發生了兩次保釣示威，此為保釣運動先聲。而保釣會的周魯逸在兩次遊行結束後公開發文，在報導示威之餘，也寫下一段話：

我們的反日行動拯救時群眾開始覺醒的證明！但，此等行動卻必須自覺：自己究竟為什麼而行動？為「行動」而行動？為抽象而無原則的「反叛」而行動？為「時髦」而行動，為所謂「學生領袖」而行動，不！假如參加兩次示威的朋友當中有誰存過這類錯誤以至可恥的想法，那怕是與其他良好的動機所謂「混雜」「融化」在一起，我認為都是應該要自我檢討的。可以相信，真存這些不正確出發點甚至更惡劣用心的人是存在的但肯定只是少數——在反對美日勾結、保衛我國領土主權的口號標語下，絕大多數人都是真誠地愛國家、反侵略而將自己的態度表示到行

動上的！對於那些嘩眾取寵、別懷鬼胎的野心份子，人們遲早總會識破他們的偽裝，與他們劃清界線！⁶⁷

結合前述脈絡，我們就知道以上文字其實是矛頭指向《70》（而從此以後，兩個分明的山頭的對立越發明顯，而且這個對立也將不再只是建立在對對方的保釣熱誠不信任之上，也指向了路線的差別）。此時的香港保釣運動，兩派的撕裂日趨嚴重。

與此同時，這兩次遊行也需要面對左派的冷處理⁶⁸與右派的攻擊。1971年3月7日，親國民黨的右派報紙《工商日報》發表社論〈日毛利用「釣魚台」的詭謀〉，雖然一方面譴責了日本政府「侵犯我領土主權」，但另一方面則指責「毛共」有陰謀。此時的香港保釣運動，可說是腹背受敵。

細窺毛共的詭計，非真想得回該島，不外：一、加強反日反美的宣傳……擴大煽動、挑撥、自會增長對日媒的仇恨、激起熊熊的怒火，正好開展反日和反美的運動，破壞自由陣線的合作。二、打擊中華民國的威信……毛共更深入期間，故意阻擾中日雙方的談判，增加交涉的困難……三，破壞中、韓、日三國的經濟合作……

69

6-3 四·一〇保釣示威：警方打壓如何成為保釣運動的轉捩點？

美國保釣運動在1971年1月29、30日示威後，激發了五百位華裔學人共同發起連署，當中不乏鼎鼎大名的多位中研院院士，要求國民黨政府一定要保衛釣魚台。這大大鼓勵了保釣運動的進展，全球保釣運動也氣勢大增。1971年4月10日，美國保釣運動舉辦了第二次遊行，也就是四·一〇示威。另一邊廂，和《70》相關的「香港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也於同日舉辦示威，以響應美國的保釣行動。而在這一天，兩個地方的保釣運動都面臨了轉捩點：美國保釣運動因為四·一〇示威而對民國政府大失所望，因此開啟了「要認同哪一個中國」的反思，這也使得美國保釣運動中有人可以直接接上統一運

⁶⁷ 魯凡子，〈美日侵我釣魚台列島與二月中之香港反日示威〉，頁4。

⁶⁸ 根據顏美鳳的研究，中共在七〇年代其實都在低調處理釣魚台問題，而這是因為中蘇關係惡化，中共政府感覺到蘇聯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圍堵威脅。中國為了希望在未來從美國及其他盟友處取得經濟援助，外交上無能力及條件向美國索取釣魚台。參見顏美鳳，〈權力均衡：釣魚台事件——從釣魚台事件中、美、日、台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部哲學碩士論文，1998）。

⁶⁹ 工商日報，〈日毛利用「釣魚台」的詭謀〉，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及第四組編，《釣魚台列嶼問題資料彙編》，（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1〔1971〕），419-422。

動的關鍵；而香港的示威者則是對殖民政府的警察暴力感到不滿，所以才有從對暴力的反思中刺激出民族主義的思想（大專院校界的民族主義路線），以及從對暴力的反思刺激出反殖的決心（《70》的反殖路線）。

6-3-1 美國的四·一〇保釣示威

1971 年 4 月 10 日，美國保釣運動舉辦了第二次遊行，也就是四·一〇示威。示威在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及華盛頓同時舉行，當中又以華盛頓的那一場聲勢最為浩大，集合了美國東部、中西部的留學生，現場有 2,000 到 3,000 人，是為美國保釣運動的最高潮。遊行隊伍從美國國務院開始，抗議美國將釣魚台交給日本；再遊行到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而駐美大使周書楷卻沒有出來接見示威者，政府的消極反應讓在場人士失望，大家開始意識到，保釣的阻力不只有美國和日本，也有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政府。曾參與其中的台灣學生林孝信曾說過四·一〇遊行後的狀況：

這種狀況下，大家覺得再到日本大使館抗議，又能怎麼樣呢？如果我們的政府是這種態度，向日本抗議又能怎樣？……當天晚上我們在馬里蘭大學召開檢討會，邀集參加遊行的單位各派一、兩位代表參加，大概有一百多人，會議情形一面倒，大家都很生氣，都在罵台灣政府。同時，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在那樣的氣氛下，沒有人提出再舉辦第三次示威遊行。我們不是政府，沒有軍隊，沒有資源，憑什麼保衛釣魚台呢？⁷⁰

從這一段可以見得，美國的保釣運動開始懷疑自身的民間保釣的力量，並且希望國民黨政府可以擔起責任去奮力保釣；然而，因為國民黨在保釣一事上的懦弱，使得美國保釣人士當中有不少對國民黨徹底失望，認為國民黨沒有能力和魄力去保衛釣魚台，埋下了美國保釣運動日後有部份轉向認同中共籍統一運動路線的種子。

⁷⁰ 關於林孝信的保釣回憶，參見歐素瑛、林正慧，〈走過黑名單：林孝信先生的生平與志業〉，收入王智明編，《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新北：聯經，2014），頁 110-11。

6-3-2 香港的四·一〇保釣示威

另一邊廂，在之前已經得知美國將舉行四·一〇保釣示威的一些跟《70》相關的青年，也在香港舉辦了一場四·一〇示威，以響應美國保釣運動並重申香港青年的保釣決心。《70》的一些編輯在搞示威前，先後接觸過保釣會和學聯，邀請他們共同響應美國的示威，但他們沒有答應。⁷¹同時，保釣會的劉健威和梁宗廣跳槽轉去《70》的保釣陣營。劉健威說，他之所以要離開保釣會，是因為「當時保釣會中，幾個比較 close 和積極的都是年輕人。但這些積極份子之中，還有一個中年的教師，當時可能是包錯石對他很懷疑，懷疑他的來歷和用心，就用一些方法把他排除了出去。我當時是很簡單的，看到這些所作所為，我就是覺得是政治手段，是很殘酷，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幾個比較 close 的就覺得有點唔忿氣〔氣不順〕，所以就離開了保釣會。」⁷²不過，這使得《70》中搞保釣運動的人手增多了。

而此時，《70》還未就保釣運動取得共識——莫昭如依然認為保釣是民族主義的，而民族主義是反動的，吳仲賢則認為保釣必須搞下去：「保釣運動可以是兩面的，對內是愛國，但對外卻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擴張，而我們的重點，應該放在後者。」⁷³由於當時《70年代》採用參與式民主，而非投票決定，所以吳仲賢和其他意見相同的《70》成員，就組成一個保釣臨時行動委員會，開始號召示威遊行——這就是「香港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下稱臨時委員會）的由來，它並非《70》，但又和《70》有人手重疊。⁷⁴而臨時委員會對外宣稱自己為「臨時」，是因為它是「臨時」成立於學聯和保釣會不願意搞四·一〇保釣示威後。

為什麼後來很多人都認為四·一〇是《70》直接發動的呢？這是由於四·一〇的宣傳主要是透過學生與青年刊物、公開派發傳單（兩天內共發了四萬份⁷⁵）、吸引電台及電視等大眾傳媒的注意去發放消息的，又因為大部份學生刊物都不準時出版，所以當時只有《70》和《鋒芒》來得及刊登示威消息，以致日後大部份人——包括港英政府——都以為示威是直接由《70》發動。⁷⁶譬如，在示威開始前一星期，香港警務處處長發信給莫昭如指出

⁷¹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頁 13。

⁷² 劉健威，私人訪問，2021 年 4 月 25 日。

⁷³ 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頁 815。

⁷⁴ 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頁 815。

⁷⁵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 194。

⁷⁶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5。

示威是不合法的，莫昭如只好知會臨時委員會；但由於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需時，臨時委員會又想如期示威，因此這次遊行只能非法進行。⁷⁷

1971年4月10日，香港四·一〇保釣示威如期舉行，地點是中環日本文化館前的德忌笠街（現稱德己立街）。示威群眾於下午1:30開始集合，到2:00左右，現場已經超過1,000人⁷⁸。2:35，十多名示威者攜帶標語抵達現場，但遊行不過5分鐘，示威者已經被警察前後包圍，示威者一面嘗試和警察交涉，一面唱〈釣魚台戰歌〉；警方警告兩次後，開始使用暴力拘捕示威者，整個遊行不超過10分鐘。⁷⁹最後，21名示威者被捕，有些被捕人士在被捕時作和平手勢。⁸⁰被捕人士中，除了吳仲賢和多位大學生，還有創建的鍾玲玲（她當時也是《明報周刊》的編輯），也有趣地包括了保釣會的陳志強。⁸¹

拘捕發生後，除了籌款保釋、拍電報給美國保釣組織外，在場人士還決定下午在九龍明愛中心大專同學會會所辦記招。又由於被捕人士中有大專院校學生，所以除了《70》的莫昭如外，學聯的鍾倫納及大專同學會會長林永森都在記招上發言，譴責警方強橫粗暴的態度，重申和平示威的權利。

6-3-3 四·一〇保釣示威對香港保釣運動帶來的轉變

四·一〇示威後，因為國民黨政府的態度懦弱，美國保釣運動進入了短暫的沉寂，大家都感覺在保釣一事上孤掌難鳴、進退兩難。但在香港，四·一〇示威激起了各團體的積極參與，也就把香港保釣運動進入快速升溫期。這個保釣的新階段，幾個運動上的明顯轉變包括：（一）社會輿論的風向的改變，特別是中間派報紙和本來支持國民黨的右派內部都出現支持民間保釣運動的聲音；（二）大專院校——特別是學聯——的加入；（三）團體之間有了合作意識；（四）《70》發展出新的保釣運動路線。

第一個轉變是輿論風向的改變及民間保釣意識升溫。一個例子是，中間派報紙《明報》於1971年4月11日立刻發表社論〈美國聲明 偏袒日本〉，聲明認為美國和日本所

⁷⁷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805。

⁷⁸ 說遊行有1,000人參與，是吳仲賢的說法，參見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而根據雷競璇的回憶，雖然圍觀的有千餘人，但實際示威者只有百餘人，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187。

⁷⁹ 參見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

⁸⁰ 行客、星望、黃志，〈保衛釣魚台和平示威遭警方暴力制止——最詳細、最客觀的現場報導〉，《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4月16日，版1-2。

⁸¹ 被捕名單，參見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四一〇事件報告書〉，《70年代雙週刊》20期（1971），頁6。

訂立的任何條約，「絕對無權自相授受屬於第三國所有的土地」，而美國對日本的偏袒是「突然製造了糾紛」。⁸²與此同時，1971年4月16日，本來非常傾向國民黨的右派大專院校校長⁸³，也發表了〈擁護我國政府維護釣魚台主權〉的聲明，甚至在國民黨香港黨報《香港時報》上發表。雖然聲明的內容依然重申中華民國與美國的盟邦關係，並且表示「少數野心份子會企圖利用這次純粹出於愛國動機的運動，使之變質，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明顯與之前親國民黨的《工商日報》立場一致，但內容同時提到希望中華民國能夠堅定地保釣，以避免保釣「變質」之可能。⁸⁴雖然這些聲明大多是支持保釣，而不是直接支持保釣運動；然而，在遊行之後發表這樣的聲明，也間接地為此時一連串保釣運動助威吶喊了。

第二個轉變是大專院校——特別是學聯——加入保釣運動。這是由於四·一〇發生大學生被警察暴力對待的情況，使得大專院校組織開始明白，就算自己不搞保釣運動，學生已經參與其中，自己有必要回應同學的需求。此外，大專院校學生見識到警察暴力，開始反思警察暴力的問題，並從此反思中找到了與保釣運動理念接軌的入手點。我認為，1971年4月20日《曙暉》的社論在論及他們為何會從暴力問題中反思出加入保釣運動之必要，有很大的有代表性：

我們再不能容忍暴力。

暴力帶給我們生活的壓迫，精神的空虛。

放炸彈只是最易被感官神經細胞吸收的暴力。

我們要掃除一切比炸彈更可怕的暴力，但他們被我們的「紅色恐懼症」、「新左迷惑症」、「差不多先生症」、「自掃門前雪症」遮蔽。

暴力不但是拳打腳踢的襲擊，它包括任何一切輕視、剝奪及損害人權自由、人性發展的行動。所以，多我人權自由者是暴政；

妨礙我思想循理性發展者是暴力；

剝奪我人性最完滿發展者是暴力；

因此，

⁸² 明報，〈美國聲明 偏袒日本〉，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1〕），頁130。

⁸³ 包括珠海、廣大、香江、聯大、華僑、德明、清華、遠東等八所大專院校校長。

⁸⁴ 香港八大院校校長，〈擁護我國政府維護釣魚台主權〉，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1〕），頁130-31。

安我於「殘酷世界」過活是暴力；
坐視富商廠東剝削我勞動兄弟的是暴力；
放任加價影響我民生的是暴力；
努力填鴨教育防治我對現實做出批判性思想的是暴力；
不平均增減薪酬製造我社會階級分野的是暴力；
「容忍」非法僭建加高樓宇危我住客人身安全的是暴力；
坐視「保家」和「鴿母」迫害我六千少女操守淫業；
間接害我良婦為娼的是暴力；
袖手淫水氾濫不加堤補，封鎖性知識循正途傳播擾我道德判斷標準的是暴力；
造就倭寇奪我民族尊嚴的是暴力。
說到政府的治績則是乏善可陳，而造就暴力事件卻是罄竹難書。

我們在不能容忍一切損害人性的暴力行為繼續存在於社會，我們需要改革，徹底的改革，才可以使我們兄弟得稍似人形。

經常有人讚美：香港的學生是全世界有數最勤力的。那麼，現在就讓我們更進一步，在書齋以外，顯出我中華兒女的抗暴力量！⁸⁵（黑體為筆者所加）

從此可見，不少大專院校學生在四·一〇示威之前都以為，被捕的只會是暴力人士——就像六七暴動放炸彈的左派那樣。但是，當他們這些明明反對暴力、支持和平示威的人也被捕時，他們對警察的態度就改觀了：他們發現原來暴力的是警察而不是被捕者。所以他們就要追問為何警察如此暴力，而答案就是「權力的不平等」——就像階級的不平等、教育制度的不平等、殖民地的不平等、性的不平等、民族之間的不平等。在他們眼中，權力的不平等才是真正的暴力。所以，出於反對暴力的立場、也就是反對不平等的立場，他們必須反對日本侵佔釣魚台，因為它也是暴力和不平等的一種——正如他們所說「造就倭寇奪我民族尊嚴的是暴力」。也就是說，大專學生是從關注四·一〇警察暴力開始，思考暴力結構的問題，也認識到釣魚台北領土爭議背後的結構問題的暴力性質，從而找到了進入保釣運動的民族主義路徑。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的是，他們可以從自身被警察暴力對待聯繫到釣魚台被日本侵略是民族被暴力對待，兩者之間的感受之所以高度重疊、順理成章，也是因為本身就有民族主義情感的支撐。其實，新下水的大專院

⁸⁵ 曙暉，〈我們不要暴力〉，《曙暉》，1971年4月12日，版2。

校界別——特別是學聯——參與保釣運動時，主要憑藉著樸素的民族主義，這也是當時保釣運動的主流論述（而就算是被包奕明、周魯逸等自發毛派影響的保釣會，此時也沒有顯示出明確的親中共立場，而只是採取民族主義的論述）。

受到警察暴力的刺激，在 4 月 12 日也就是四·一〇示威的兩日後，《中大學生報》、《學風》、《臻文學訊》、《曙暉》、《學苑》、《學聯報》等大專院校刊物迅速地聯合出版了《特刊》，報導四·一〇示威之餘也譴責警察使用暴力，兩萬份特刊最後全數派發完畢。⁸⁶ 學聯也以「香港專上學生聯合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的名義，於 4 月 17 日在港大及崇基校園內發動示威，並且發表〈香港專上學生聯合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聲明〉，內容包括重申保衛國土完整、反對日美勾結的立場、呼籲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為中國領土主權吶喊奮鬥及發揚五四精神。⁸⁷ 4 月 18 日，保釣會和學聯合作，舉辦「釣魚台事件與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壇，有 500 人參加。

從此時起，香港保釣運動的三大火車頭正式成立，保釣會、《70》及其相關組織、學聯，三者終於全面發動保釣運動——而四·一〇示威就是關鍵。要知道，在此之前，學聯對保釣議題關注，僅限於發表了一篇僅 200 字的短小聲明。

我之所以要強調學聯加入保釣運動的重要性，是因為學聯在大專院校界有特別的地位。一般來說，在大專院校界都是學生報更為激進，學生會較為保守，而學聯由各大專院校學生會代表組成，在香港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歷史中大多扮演比較穩健的一方。所以，連傾向穩健的學聯也支持保釣，這可謂為保釣運動打了一劑強心針。此外，由於學聯始終有廣大學生的間接授權，因此代表著它一直是大專院校界別中最具權威性、代表性、支持度及動員力的組織。總括來說，學聯的參與讓保釣運動的認受性大大提高。⁸⁸

四·一〇示威帶來的第三個轉變是，團體間的合作增多。其實，四·一〇示威所有被捕者被保釋出來後，晚上 8:00，保釣會、《70》和其相關組織及學聯積極份子曾聚在一起商談、檢討。吳仲賢回憶：

⁸⁶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5。

⁸⁷ 香港專上學生聯合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香港專上學生聯合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聲明〉，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1〕），頁 131。

⁸⁸ 在〈專上同學意見彙整〉一文中，就有同學表示：「21 位被捕者中只有 7 位是大專學生，其他的真是品流複雜……確有使人想到背景不尋常之嫌。現在學聯親率其事，則能有明確澄清，不致受人有所質疑其真正動機。」可見在學聯介入保釣運動後，讓同學之前對運動的疑慮被清除了不少，這對運動發展實在是很大的幫助。參見學聯報，〈專上同學意見彙整〉，《學聯報》，1971 年 5 月 1 日，版 8。

當時有人詢問：「為什麼小小一個香港，連搞愛國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也不能團結一致？」當時沒有人作出圓滿答覆。⁸⁹

可見積極份子們在反省示威被鎮壓的過程中，開始理解到「團結力量大」的道理。在四·一〇後，跨團體的串連有明顯的促進。譬如，1971年4月18日的公開論壇，就是保釣會和學聯合作於聯合書院籃球場舉辦的。到了1971年5月4日保釣會的「五·四抵制日貨大會」，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刊物《曙暉》的曾永泉也有上台發言。在「五·四抵制日貨大會」當日有兩人被捕後，《70》也趕往創建關注事件，雙方甚至再度提出合作。⁹⁰

雖然這些合作並不是一帆風順，譬如，因為學聯的校內集會示威只限學聯成員參加，而且學聯曾在集會解散時，把學生提議立刻去日本領事館遊行示威的激烈氣氛壓下去，⁹¹因此被《70》說「與其是一小撮人龜縮於校園內來示威，不如在家中示威還好」⁹²。甚至，後來《70》與保釣會的合作也發生了巨大的矛盾。但這些摩擦變多，首先也是因為合作變多了。我們當然可以批評這些合作其實貌合神離、內存暗湧、並不真誠，但至少從合作的行動變多可見，四·一〇還是開啟了各派之間的合作空間。⁹³

最後一個轉變是，四·一〇示威雖然以警察暴力鎮壓告終，但對於《70》來說，警察暴力鎮壓更給予了他們參與保釣運動的原因。如果說，此前《70》的一些編輯會因為保釣論述過於著重民族主義而對搞保釣運動感到猶豫的話，四·一〇的警察暴力就給了他們充分的理由去搞保釣運動。因為，警察暴力象徵的是殖民地統治的暴力結構讓人民沒有充分表達自己的自由，所以《70》就有了可以以反殖論述去支持保釣運動的方向了。事實上，侯萬雲曾經提到對2月20日警察沒有行動感到「不高興」：「我們到達現場後，我們人多，有近200人在街上，警察不敢亂動。這反而讓我們《70》人很不高興，我們其

⁸⁹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811。

⁹⁰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頁13。

⁹¹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806。

⁹² 阿昌，〈和平、暴力、五四精神——四一〇事件前後〉，《70年代雙週刊》20期（1971），頁7。

⁹³ 然而，吳仲賢應該會對我所認為的串連「增強」不以為然吧。在保釣結束後，吳仲賢的回顧是這樣寫的：「事實上自此至終，幾個團體都強調團結一致，不分立場，然而這只不過是見諸於文，而鮮少見於行動。」我理解，這也是因為吳仲賢站在《70》的角度，以高度理想化的標準去評估各派之間的合作表現，因此他特別看到保釣會的敵意，也痛恨學聯不如預期中那麼積極。但是，如果我們站在其他角色——譬如保釣會——的角度來看，保釣會和大專院校之間的距離的確因為保釣而拉近了，甚至大力促進了保釣後校內毛派——也就是國粹派——的發展，這正是因為保釣會有意識地串連了大專院校。就算我們不是從保釣會的角度去看各派間的串連深度，客觀來說各派的串連也是四·一〇之後才開始。關於吳仲賢對串連的評價，參見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

實希望警察打我們，引起民憤。」⁹⁴也可以說，四·一〇示威的暴力鎮壓，剛好正中《70》下懷。吳仲賢因此說，關於先前的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的矛盾，「這個分歧，後來很快解決了，而由於當時港英的鎮壓，保釣運動逐加上了反殖的色彩」。⁹⁵《70》也終於找到如何深化「香港和釣魚台，都是中國領土」這一論述的路徑：

他們自始要把釣運與香港的現實結合，一方面固然是感覺到香港問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是出於對運動戰術性的考慮。他們的分析是：基於殖民地政府也深深明白殖民地的持續，不獨是由既定的不平等制度、武力所能完成，還要殖民地的人民合作。然而，倘若殖民地人民具有充分意識，洞悉制度的醜陋，他們便不會心甘情願地合作，甘心情願地任人主宰，所以殖民地還要以教育、以大眾傳播媒介來泯滅人民心智、壓抑人意識的發展，務求使人們無知無識。就是及法律方面，組織人民的團結，務求組織人們把力量團結起來，把意識實踐來。所以，殖民地政府屢屢使用種種直接與間接的方法，阻礙人民群眾的團結。由此可見，殖民地政府容忍任何浩浩蕩蕩的社會政治性運動，都是匪夷所思的事，因為就算不是以殖民地作為主要目標的群眾性社會運動，結果一定會直接或間接地危害殖民地的基礎。也就說明了香港政府不可能袖手旁觀地容忍釣魚台事件成為群眾運動。由於政府之不可能容忍這個基本矛盾，《70》、「聯陣」⁹⁶才找到講釣魚台事件發展成為群眾性運動的出路。⁹⁷（黑體為筆者所加）

上述對《70》路線改變的分析，已經說得很清楚：警察暴力使殖民地的暴力結構被暴露出來，在此視角下香港與釣魚台都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下的產物，反殖路線無論在行動上（透過遊行示威挑戰殖民地政府的正當性）還是理念上（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主義）都找到了和保釣運動接合之處。從上所見，四·一〇示威後《70》在保釣運動中終於發展出自己的反殖路線。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反殖路線與學聯的民族主義路線是有張力的。雖然兩者都是因為遭遇到警察暴力而被啟發的路線，但學聯會認為保釣才是目標和急務，反殖是次要

⁹⁴鍾耀華，〈沒有遺產的《70年代》——侯萬雲（上）〉，<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5-opinion-houmanwan-a/>（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⁹⁵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頁815。

⁹⁶吳仲賢所說的「聯陣」意思是「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五四行動委員會」和「中學生行動委員會」、「工人學生聯合陣線」各個與《70》相關的保釣團體的聯合陣線。

⁹⁷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頁8。

的，甚至提出了為了目標「繞道而行」——也就是不直接對抗英國殖民政府。⁹⁸至於保釣會則也對反殖路線並不感興趣，但卻不認為需要為了迴避抗爭而在港英政府前畏首畏尾。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吳仲賢在未完成的遺稿中的最後一句寫到：「四·一〇示威」是香港保釣運動的轉捩點。⁹⁹

6-3-4 五四保釣

1971 年 5 月 4 日，為了把保釣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遺產更加緊密地扣連起來，《70》與保釣會分別再次舉辦了不同的示威行動。《70》這次透過組成「保衛釣魚台五四行動委員會」臨時工作小組去籌備五四遊行，示威地點定在皇后碼頭空地。值得一提的是，這位置的選擇甚有挑釁意味，因為這意味著要對殖民政府表示抗議，幾乎等同於直接要求被捕。在 5 月 4 日舉辦保釣遊行有兩大意義：一是發揚五四愛國精神，重申香港的中國青年誓死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的決心；二是重申和平示威的基本人權。¹⁰⁰可以見得，第二點在當時的脈絡下，是要對港英政府喊話，指出四·一〇的鎮壓侵害了和平示威的基本人權。雖然這一次有了充分的時間準備，但因為政府反駁了他們以個人身份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所以示威最終同樣是非法的，遊行的危險性因此就更大的。

果然，5 月 4 日當天，警方出動大型警車超過 10 輛，準備對付 300 名附近的示威者。當帶頭舉標語的示威者從站立在附近的人群中走到空地上開始示威，武裝警察立刻把示威者重重包圍。最後，12 名青年坐在地上，自願被警察拘捕。¹⁰¹根據保衛釣魚台五四行動負責人的說法，青年坐在地上被捕，是為了凸顯自己正在行使和平示威的權利。¹⁰²同時，沒有被捕的則跑到美國領事館前繼續示威。遊行從 2:00 開始，到 5:20 結束。而跟四·一〇示威不一樣的是，這次被捕人士中並沒有大專院校學生。根據雷競璇回憶：「大專學生認為太激進，沒有參加。」¹⁰³吳仲賢也提及了沒有大學生被捕的影響：學聯並無後續反應，反而遠在密西根和芝加哥等地的保釣組織拍了發聲援的電報。¹⁰⁴

⁹⁸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 210。

⁹⁹ 吳仲賢，〈回憶保釣運動〉，頁 816。

¹⁰⁰ 保衛釣魚台五四示威，〈五四 1971〉，《70 年代雙週刊》20 期（1971），頁 4。

¹⁰¹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頁 8。

¹⁰² 保衛釣魚台五四行動負責人，〈各位參加的朋友〉，《70 年代雙週刊》20 期（1971），頁 4。

¹⁰³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 187。

¹⁰⁴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8。

同日，保釣會聯合「四報一刊」——即《曙暉》、《盤古》、《生活月刊》、《文社綫》、「香港向日葵償協會」——在九龍明愛中心籃球場舉行保釣示威集會，約 300 人參加。集會結束後，大會發動參加者往日本百貨公司「大人公司」堵塞他人購買日貨。時至 9:45，警察跟著到達，公司提早關門，警方拘捕兩名青年（但 10:00 就釋放了）。¹⁰⁵

當天晚上，《70》聽聞有二人被捕，也暫時放開了之前和保釣會之間的矛盾，連忙趕往創建。根據吳仲賢的說法，當夜保釣會再度提出合作，於是《70》提出了七七示威，保釣會也贊成一齊籌辦。¹⁰⁶

6-4 七七保釣示威：香港保釣運動最高潮

根據吳仲賢的說法，雖然 5 月 4 日當天，保釣會和《70》有同意合作一起搞 7 月 7 日的七七保釣示威，但此後保釣會一直拖延到 6 月都沒有動作。由於吳仲賢正準備出國，所以他讓陳強與保釣會協商共同辦七七保釣示威的事宜。然而，這使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矛盾：

到六月底，才知道保釣會的周魯逸，一直在欺侮年僅十六歲的陳強。一切詳細計劃，都是保釣會訂下，一切文字也由保釣會執筆，我們要做的只是簽名申請示威而已！知道這事後，我十分憤怒。因為這不是合作，而是操縱，而是利用。所以我立刻打電話找周魯逸交涉。他初時答應見面，後來索性躲了起來，直到我離港前夕，還是見不到他面。至於其他的保釣成員，則什麼都推在他身上。

大家也許會很奇怪，為什麼保釣會這樣辦事，這樣搞運動，而我則十分明白。

保釣會中，包錯石是毛派，周魯逸是毛派，高耀是毛派，這是三個我認識的毛派。但毛派也一樣可以搞釣運，這是天公地道。但不應該的是利用釣運來培養勢力，進行思想滲透，打擊如《70 年代》等異己……總而言之，釣委會攻擊《70》及聯線，我不感到意外，周魯逸這個無賴（未離港前我已罵他無賴）攻擊異己，我也不感到意外。感到意外的只是包錯石先生雖是毛派，但也不失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為什麼可以容忍保釣會這種手段？難道他看不出來這是道德上的墮落？

107

¹⁰⁵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8。

¹⁰⁶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頁 13。

¹⁰⁷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頁 13。

保釣會和《70》的爭論結果到底如何，我們已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最後七七示威是由學聯來主抓。1971年6月19至21日，學聯的保釣組織「保衛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在大埔舉行生活營，參加者20人，營隊結束時，定下了要舉行七七遊行等一系列工作坊計劃。從6月23日，學聯代表鍾倫納兩次向警察總部申請在維園遊行被駁回，直到6月28日警方表示原則上批准，但要求學聯向市政局申請維園的使用權；7月5日，學聯決議繼續在維園舉行示威，並選出陳以衍、鄭曾顯、雷競璇為負責人；7月6日，市政局否決學聯使用維園的權利，學聯則決定依然在維園舉行七七示威，並且對外發放信息。¹⁰⁸

6-4-1 七七保釣示威：示威者以肉身改寫歷史

七七示威原定在7月7日7:00開始，但6:15群眾已經開始入場集結，警察已經抓去四個青年。7:00集會開始，手持標語及孫中山遺像的學生出現，「七七大示威」、「保衛釣魚台」及紅布標語也被拉起，千餘群眾熱烈回應，高叫「支持學聯」，陳以衍則以擴音器呼籲群眾坐下，並開始宣讀示威宣言——但只是讀了幾句，就被衝入群眾的警察抓走。¹⁰⁹此時，在場的威利警司命令大家離去，並嘗試把人拉走，其中一名示威者因此把威利踢到了地上，根據侯萬雲回憶：「威利打人的時候連記者也不放過，因為他已經瘋了。作為白人警司被踢至地上打滾，在殖民時期裏是多麼丟臉的事。」¹¹⁰惱羞成怒的威利站起來後，見人就打。華警隨即也加入打人行列，一時之間，不少示威者血流如注。

¹⁰⁸ 雷競璇，〈七七大示威籌備記〉，《中大學生報》，1971年7月15日，版3。

¹⁰⁹ 勁松，〈七七示威真相〉，1971年7月15日，版1-2；勁松，〈七七示威真相〉，版1-2。

¹¹⁰ 鍾耀華，〈沒有遺產的《70年代》——侯萬雲（上）〉，<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5-opinion-houmanwan-a/>（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圖 17：1971 年 7 月 7 日警方於維園追打保釣示威者（圖片來源：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 27）。

7:25，示威者已經被警方驅趕到附近的小山上，示威者繼續高喊口號及高舉「保衛釣魚台」標語，示威者與警察開始對峙。警方重新列隊，以 40 人一隊進入示威地點待命。到了 8:00，列隊的警察頭戴鋼盔、手持藤盾、警棍、老虎槍及催淚彈，對剩餘的示威群眾進行包圍。示威者四散，警察繼續把群眾驅趕到公園對面的糖街馬路上，甚至追打至附近的豪華戲院內。¹¹¹《中大學生報》還稱，警方連發六響老虎槍。¹¹²8:30，警方全面佔據維園，學聯和在附近草地聚合的人群宣佈示威解散。但警察依然毆打正在散去的群眾，憤怒的途人縱火燒掉了交通警的機車，現場亂成一片。¹¹³

¹¹¹ 大專院校聯合號外，〈保衛釣魚台七七大示威——事實的報導〉，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1〕），頁 29-31。

¹¹² 勁松，〈七七示威真相〉，版 1-2。

¹¹³ 勁松，〈七七示威真相〉，版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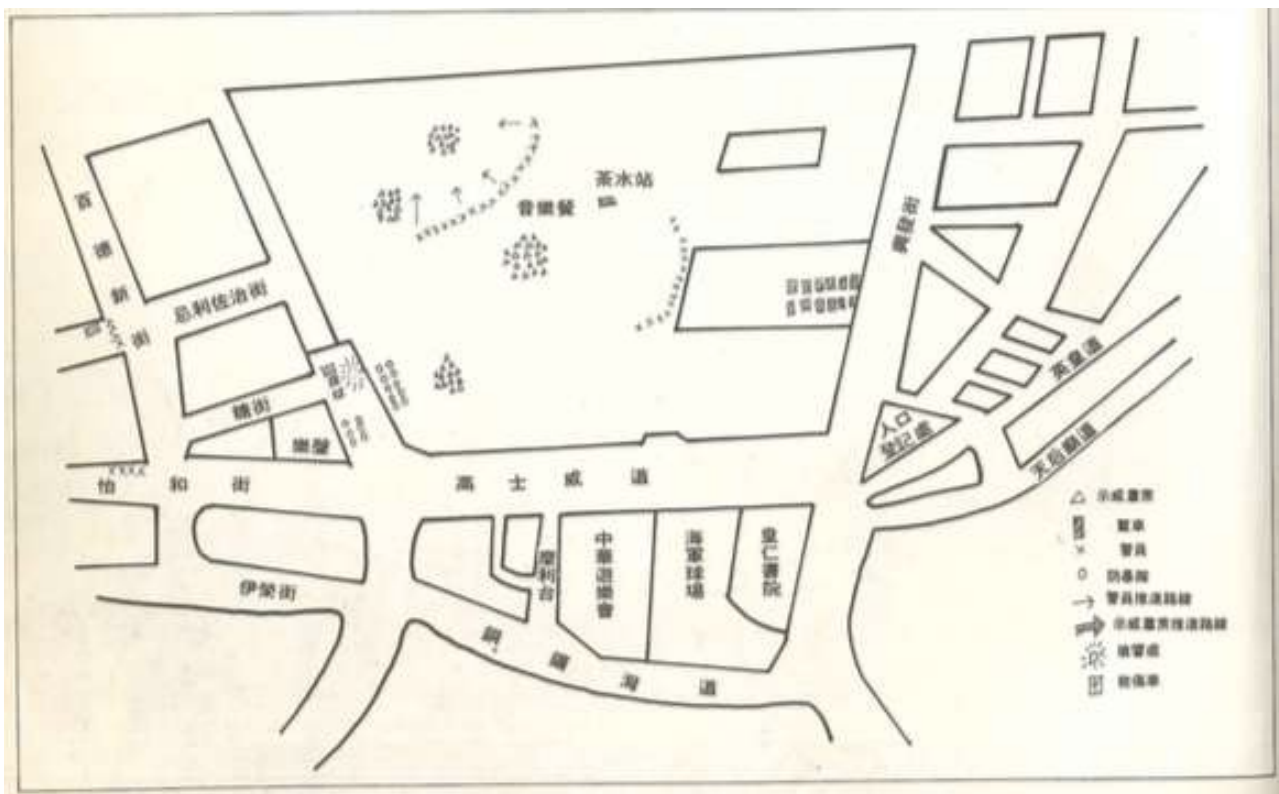


圖 18：1971 年 7 月 7 日香港保釣示威圖解（圖片來源：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頁 28）。

七七保釣示威是眾多保釣示威中警民衝突最嚴重的一次，也是香港保釣的最高潮。警方出動了與示威者一比一的武力，驅散一千名左右的群眾，最後共 22 人被捕。根據當年作為學聯七七保釣示威負責人之一的雷競璇回憶：「結果，示威前一直指責保釣份子的報章在示威後普遍改變態度，一方面譴責警方過份使用暴力，一方面稱讚保釣是愛國行動……」¹¹⁴學聯出版的《香港學生運動回顧》也提及，7 月 8 日的輿論反應是「各界一致反對警方的暴力鎮壓」。¹¹⁵其中一個指標是，大專學生界在 7 月 8 日出版了聯合號外報導示威，發行了 5 萬份，因為深受市民歡迎，再加印 2 萬份。¹¹⁶學聯也在港大陸佑堂舉行緊急會員大會，一千多名學生出席，並決議訴求要釋放被捕示威者、向傷者及被捕者道歉、將警司威利辭職等。¹¹⁷

¹¹⁴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 199。

¹¹⁵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保釣運動產生的背景及經過〉，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8〕），頁 34。

¹¹⁶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保釣運動產生的背景及經過〉，頁 34。

¹¹⁷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 200。

保釣運動自四·一〇示威以後，再一次升溫，並且進入更廣泛的大眾視線之中。1971年8月13日，由與《70》相關的聯陣在維園所舉行的保釣示威人數創新高，達3,000人，同日向美日領事處遞交抗議書。警方也沒有再出手打人。¹¹⁸更重要的是，保釣青年以肉身衝擊警察防線，居然影響了港英政府的公安政策：七七示威後不久，政府宣佈劃出五個地點供群眾集會之用。¹¹⁹這可以說是保釣中反殖路線的一大里程碑。

6-5 小結

香港第一次保釣運動是受到本地因素和美國、台灣保釣運動刺激下催生的一次民間自發的社會運動。保釣運動的三大火車頭雖然各有不同的路線主張，在保釣運動期間有不少不咬弦的地方，但最後還是發展出合作意識，這也是香港保釣運動可以發展起來的關鍵。現在若要評價這個合作是「好」還是「不好」、該更深度地合作還是互相批判，似乎都有點事後孔明。而事實上，正是因為三者的差異是如此大，才能打開足夠的空間讓許多保釣運動的參與者找到可以連結、認同的點，並且在運動中探索和思考香港（以至於世界）的政治出路。

在後六七暴動時代這個帽子亂飛、恐懼政治的年代，青年對此狀態及國共兩派皆出現厭倦。一方面，他們認同民族主義、同時渴望改變社會、改變政治悶局，另一方面，卻因為無法完全認同左右任何一方，加上社會恐懼政治而苦無出路，因此出現了無根和失落的狀態。那麼，保釣正是一個契機，使得左右光譜中任何一點的民族主義青年皆可參與。也就是說，正是因為保釣運動有不一樣的路線，才可以把社會運動的「餅」做大。如果說《盤古》、《70》等刊物豐富化了後六七的政治論述，中運是激起了後六七的政治氣氛，那承繼著中運、同時又有《盤古》和《70》在當中大力助攻的保釣運動，則是在行動的層面打破了後六七的政治悶局，這在香港的歷史中可以說是承先啟後的。

¹¹⁸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保釣運動產生的背景及經過〉，頁34。

¹¹⁹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199。

七、香港第一次保釣運動：統運路線和反殖路線的融合與決裂

國際局勢的大型變動深刻地影響了美國及香港保釣運動的發展。當中華民國在國際地位越發低落，中華人民共和國地位則蒸蒸日上之下，1971年7月9至11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並且在訪華結束後宣佈1972年尼克森總統將要訪問大陸。1971年，智利、科威特、喀麥隆等國家與中華民國終止外交關係，與中華民國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政治的聲望上漸漸超越中華民國。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的2758號決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擁有中國代表權席位。

同時，美日為了實現《舊金山和約》的約定，在1971年6月17日簽署《沖繩返還協定》，協定將於1972年5月15日正式生效，釣魚台列嶼將連同沖繩行政權返還日本。雖然全球保釣運動在表面上呈上揚趨勢，但保釣青年學生心中也都知道釣魚台很大機會會斷送到他國手中，面對這樣的困境，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形勢連帶著的對中共的態度突然改變，也將影響著保釣運動的走向。

7-1 基辛格秘密訪中與聯合國代表權更替：保釣運動路線的轉向

7-1-1 美國保釣運動的轉向

美國保釣運動中的台灣學生對1971年7月起一連串的國際大局變化是非常敏感的。特別是經歷了四·一〇保釣過後，一些美國保釣學生由於對國民黨失望，在世界舞台上正在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因此成為他們新的寄託，一些美國保釣人士就紛紛左轉了。這使得美國的保釣運動為著要支持哪一個中國而分為左中右三派。以「中國統一行動委員會」為代表的左派轉向統一運動（下稱統運），即延續保釣運動反美日勾結的問題意識，持續反對台獨，主張中國統一，而美國統運的方向則是以中共政權馬首是瞻，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台灣。中間派則有沈君山為代表的「革新保台派」和林孝信為代表的「第三條路線」；前者反共也批蔣，但主要認同中華民國，後者則把注意力放在在地社會的改造和主體的實踐及參與等。右派則成立了「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與左派打對台。

林孝信對於從認同中華民國轉向到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保釣運動的左派保釣學生的心理，有過非常精準的描述，也對理解這個轉向非常有解釋力，他說：

因為保釣一開始是抗議日本，到 4 月 10 日遊行的時候大部份人幾乎都已經知道國民黨政府不會對抗日本了，所以對國民黨非常失望。這時候剛好季辛格〔基辛格〕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出來了，保釣突然發現有一個那麼大的中國在那裡，雖然大家對中國大陸很不了解，但是很想要保釣，那是還有什麼大家湊一湊錢去買軍艦，這樣唐吉軻德式的想法都跑出來過，突然發現有一個中國在那裏，所以很多人就很積極去瞭解，這也是很多人左轉的原因。¹

1971 年 9 月 3 至 5 日，美國的保釣人士於安娜堡召開「全美國是大會」，史稱「安娜堡國是會議」，大家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的問題展開討論，屬於少數派的、支持中華民國的親國民黨右派，於第二天集體退席抗議，剩下中間派的沈君山（也就是後來革新保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繼續奮戰到底。安娜堡國是會議最後在只有五票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代表著美國保釣運動的分裂以及統運的開端。

面對保釣運動走向統運，當然有人歡喜有人愁。譬如，曾經參與在保釣運動，後來屬於「革新保台派」的邵玉銘提到，他在退席後感到的困惑和難過：

我是拿中華民國護照的。在台灣是父母把我養大，政府也沒有虧待過這些學生。當大會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時，絕大多數人同意，只有五票反對，這使我非常心寒。這批左派留學生，在台灣長大，但到了美國，怎麼會拋棄祖國如此迅速？……當時台灣一千五百萬百姓都希望留在聯合國，但在會場上只有五人投票支持台灣在聯合國席次。²

由此可見，由於當時支持統運的左派佔據美國保釣運動參與者中的大多數，其他依然認同中華民國的派別，因感到自己處於絕對的弱勢之中。加上眼看自己認同的中華民國同樣處於國際弱勢，並且即將丟掉聯合國的席位，他們當中更是瀰漫著一種感同身受的「亡國感」。邵玉銘接著說到：「這些學生怎麼會背棄自己的國家跟政府島如此絕情的

¹ 鍾瀚惠、蔡虹音、李雅雯，〈林孝信教授訪談〉，收入李雅明、謝小苓、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編，《保釣風雲半世紀：保釣運動領軍人士的轉折人生與歷史展望》（台北：時報文化，2009），頁 74。

² 李雅雯，〈邵玉銘教授訪談〉，收入李雅明、謝小苓、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編，《保釣風雲半世紀：保釣運動領軍人士的轉折人生與歷史展望》（台北：時報文化，2009），頁 388。

地步？……1971年7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基辛格〕宣佈，翌年尼克森總統要訪問大陸。8、9月保釣左派學生就開保釣大會，把中華民國一腳踢開，我當時想：有需要這麼絕情嗎？」³由於他們對左派的理解是「絕情」的，是在危急關頭「背棄」自己國家的，而他們又在某程度上認識到國民黨政府的問題，因此就有了「革新保台派」的起源，譬如邵玉銘當時就決定要回台灣服務。他說：「有一天趙林（何炳棣學生）突然找我，說何老師叫他轉告一些話給你：『何老師說你頭腦不清，再二、三個月台灣就要亡國了，你竟然還要回台灣服務？』我說：『你告訴何老師，大陸是中國的、台灣也是中國的；他愛中國請他回大陸，我愛中國我會回台灣，大家都不要留在美國過生活，我邵玉銘此志不渝！』」總之，他們對於留美台灣學生的左轉，漸漸認為那不過是一種趨炎附勢的「投機主義」。⁴

我認為，如果說是投機主義，可能會把這些左轉的保釣運動學生的決定理解得太個人主義——當時的中國還是一窮二白，認同中共有什麼「機」可「投」呢？當然，如果說是為了保釣成功等公共目標而左轉也算上一種「投機」的話，那也無可厚非。然而，面對這種「投機」，不該只有一種道德主義的批判——我們必先理解「投機」是如何發生的、是在怎樣的條件下發生的，這樣才可以協助我們去解開當時左轉背後所面對的難局。在「投機」背後實際的情感是：眼看釣魚台主權即將在1972年5月15日被送到日本手上，一直以來的保釣示威無法扭轉這個局面，大家心裡正渴望有一個更巨大的力量可以保衛釣魚台。儘管到了這時，中共並沒真的展現出實際上比國民黨更多的保釣決心，也不見得對保釣一事有什麼熱情；但比起軟弱無能的國民黨政府，政治力量上看起來正在上揚的中共，確實成為大家對國民黨失望時，認為可以託賴的力量。在這個轉變背後，保釣的決心始終沒變，轉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是一種「表面上」的變，最真實的改變是——轉向統運的保釣運動，從相信自身的力量到懷疑自身的力量，轉而把自身力量交託到更有能力、更巨大的政權手上。

而這種對自身力量的不自信甚至是自卑，一方面是因為在國際政治與外交議題上，群眾的力量一直都是很薄弱的，自身也不可能「湊一湊錢去買軍艦」去保釣；另一方面，這種自卑感並非單一的保釣事件（譬如在四·一〇看到國民黨政府的軟弱）所醞釀出來的

³ 李雅雯，〈邵玉銘教授訪談〉，頁388。

⁴ 參見李雅雯，〈邵玉銘教授訪談〉。

——它並非一朝一夕的結果，要一時三刻解開也非易事。林孝信對這些留美的台灣學生一直以來的心態，有過很準確、很脈絡化，而且很貼近心理狀態的解釋：

因為我們那時還有一個很特殊很複雜的心理背景，這個背景其實延續下來，到今天還一直存在，那時候覺得台灣是被孤立的，因為覺得台灣政府很多的統治都是建築在對美國的依賴上；但另一方面又覺得說，我記得從小學開始，一天到晚宣傳美國對中華民國多友善，但另一方面我們一直想要邀請美國比較高階的，像總統、副總統來台灣訪問，除了艾森豪 1960 年來台訪問外，後來都沒有成功過，所以一直有這種在外交上被人瞧不起的那種很複雜的心理。

在這種狀況下，在保釣時就發覺，台灣的政府不僅不敢得罪美國，而且拼命卑屈地想討好，對日本也不敢據理力爭，所以大家就覺得說，你作為一個國家完全沒有起碼的尊嚴可言，這也是大家對當時台灣政府一種不滿的來源。正在這時又發現說，尼克森好像以能夠得到中共的邀請，覺得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就突然發覺，中共那邊好像變成很有尊嚴的、連美國都必須很重視的，就覺得那邊也許有可能可以保衛釣魚台。⁵

由此可見，那個複雜的自卑心理，是一直以來國民黨政府在外交上被孤立而造成的，也是造成「投機主義」的關鍵。也就是這樣，認同在外交上強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被視為是眼前現成的出路。美國保釣運動的最大宗因此轉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運。

7-1-2 香港保釣運動的統運路線

（1）美國保釣統運路線的影響

與美國的保釣運動相比，香港保釣運動轉向統運的路徑就沒有那麼直接，一開始也不伴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事實上，基辛格訪華並沒有那麼順理成章地被理解成正面事件——此事對沒有涉入保釣運動的、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地傳統左派圈中，甚至引起不少困惑和反感。譬如，周奕曾就基辛格訪華一事回憶道：「那是一個矛盾的交叉點。基辛格訪華的時候很多人不相信，很抗拒。我們一直以反美為主，怎麼能夠和美帝接觸？這是很多人看法：覺得奇怪，有懷疑的目光。」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

⁵ 鍾瀚惠、蔡虹音、李雅雯，〈林孝信教授訪談〉，頁 67-68。

合國代表權，這個懷疑又很快被解開了，他接著說道：「但看下去……又覺得 OK，因為訪華之後立刻聯合國恢復。我們就覺得和美帝接觸是對的，覺得中央很高明。因為中國恢復合國席位是轉捩點……當時我們覺得抬起頭了，別人樂意接受我們。」⁶

香港保釣運動中的統運轉向並不是香港本地的傳統左派帶來的，而是受到美國保釣運動的統運轉向的影響。1971 年暑假期間，一些美國保釣人士返港參與保釣運動，同時也把統運的論述帶來。譬如，在保釣行動上，保釣會、《70》相關的「聯陣」、學聯三大火車頭就連同「海外留學生回港小組」共同派代表於 1971 年 8 月 20 日，前往美日領事館及港督府抗議。8 月 22 日，學聯、保釣會、《70》及包括柏克萊、威斯康辛、紐約大學學生的若干留學生於陸佑堂舉行「保釣聲討大會」，大約有 500 至 600 人參與，⁷會議結束後，人群前往美國領事館抗議「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⁸他們發表的聯合聲明提出四點關於展開保釣的原則和方針：（一）反對侵入，深入群眾，面向全中國，是運動的總方向；（二）加強各種形式的愛國教育宣傳，「國情、國是研究」將是保釣愛國運動的一個新重點；（三）繼續向美日侵略者抗議、示威和舉行群眾集會，抵制日貨等；（四）支持一切愛國運動。⁹同年 9 月 18 日，保釣會藉著紀念九·一八事變，發動保釣示威，同時反對「兩個中國」；示威獲得政府批准，代表們前往美日領事館及港督府提交抗議書，示威活動有 2,000 人出席。¹⁰

在保釣團體之外，一些進步青年刊物也有了從保釣走向統運的傾向，並且論道出香港保釣統運路線和美國保釣統運路線之間的關係。1972 年 3 月 5 日，《盤古》的「盤古之聲」（也就是《盤古》的社論）明確地發表了〈從「保釣運動」到「中國統一運動」——從保衛釣魚台到保衛台灣〉¹¹，文章第一段就提到柏克萊及洛杉磯保釣會聯合發表的「中國統一運動的草案」，提議在尼克松訪華前，對美、日、台三方舉行一次以統一方案為基礎的大示威，抗議美日製造「兩個中國」及「一中一台」。此外，在大專院校界，也開始有了討論統一問題的聲音。8 月 15 日，《中大學生報》刊登了社論〈從保釣運動到中國統

⁶ 周奕，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16 日。

⁷ 星望，〈記「保衛釣魚台聯合聲討大會」〉，《中國學生周報》，1971 年 8 月 27 日，版 2。

⁸ 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保衛釣魚台運動〉，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頁 33。

⁹ 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保衛釣魚台聯合陣線、海外各保釣行委會分會回港小組，〈保釣運動的新里程碑——保釣聲討大會八月廿二舉行〉，《中大學生報》，1971 年 8 月 15 日，版 1。

¹⁰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保釣運動產生的背景及經過〉，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8〕），頁 34。

¹¹ 盤古，〈從保釣運動到中國統一——從保衛釣魚台到保衛台灣〉，《盤古》45 期（1972），頁 1-3。

一〉，提到威斯康辛大學因保釣而出現的「國是研討會」在談論中國統一問題，並帶出必須面對國家分裂（台灣和大陸）和對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問題，找尋一個立場和出路，而「認識這兩個政權」「對促進中國的統一是極有幫助的」。¹²以上這些都顯示了美國保釣人士回港和香港統運論述的出現，在時間上高度重疊，而且香港統運在論述上也不時引用美國的統運，我們基本可以說香港保釣中統運路線是受美國統運深度影響的。

然而，由於在香港保釣論述和運動的發展中，其實並沒有像美國保釣那樣親身見識過中華民國外交部的懶散怠慢，所以不會因為對國民黨反彈而情急之下迫切地需要透過認同中共而得到寄託。因此，香港 1971 年的統運論述並不直接地指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出現的統運聲音，主要還是來自概念上的推演——如果保釣的其中一個重點是抗議美日勾結，那麼同樣是美日陰謀的台獨也需要被反對。也就是說，一些保釣份子會順理成章地認為統運和保釣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支持統一並不完全等於支持中共。

這種香港統運初期的特色——即不明目張膽地訴諸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主要是因為大家都有感自己並不了解中共或大陸，那就很難談要認同哪一邊（我們不可以忘記，六七暴動的恐共風潮依然存在）。因此，大家開始有感自己必須先多認識中國，才能做出選擇。這就是為什麼「國是討論」再度興起——在以統一為問題意識的前提下，香港保釣運動中的一支變成了「認識祖國」的熱潮。史文鴻曾經這樣回憶：「我們一方面承認香港是中國神聖領土之一部份，但香港切實的環境和中國截然不同，而我們民族熱情在眼前所牽起的问题如『保釣』等在中國製實際境況下又有何關切？這確實使我們疑惑，而學運也就邁上了新的一頁，要『認識祖國』了。」¹³

事實上，這種想要認識政治，甚至討論「國是」的呼聲，並不是在保釣運動才被提出。六七暴動之前，本地青年——特別是自明自己必須對社會負責的大專學生——已經開始有這樣的意識。譬如，1967 年《學聯報》社論就曾提到：「你不理會政治，政治卻闖進門來了。於是一個措手不及，攪得人心惶惶，連所謂知識份子的專上學生也茫然不知怎麼反應。什麼是『愛國』，什麼是『賣國』，什麼是『反動』，什麼是『毛澤東思想』……等等問題，一股腦兒放在眼前，我們的態度應該這樣？答案似乎是『坐以待斃』。看來似乎是專上學生要『政治覺醒』的時候了。讓我們多讀，多想政治理論和各種主義的書刊；多聽，多聽別人的和自己的政見。以理智的人的態度尋求政治問題的解答。這樣，政治再

¹² 中大學生報，〈從保釣運動到中國統一〉，《中大學生報》，1971 年 8 月 15 日，版 1。

¹³ 史文鴻，〈學運之回顧與憧憬〉，《崇基學生報》，1977 年 6 月，版 8。

闖進來的時候（而政治必然會再闖進門來），我們有足夠的信心實行我們的信仰。」¹⁴不過，兩者相比起來：1967 年的對「什麼是『毛澤東思想』」的好奇，主要是為了在抨擊香港左派時更有底氣，並且知道如何和毛澤東思想割裂開來；但 1971 年的討論國是風潮和「認識祖國」風潮，則懷抱著希望親近中國的心態，這也是為了回應新的問題意識——到底台港的未來是什麼？要怎麼樣的中國統一？和誰統一？我是否該多認識我的「祖國」？

（2）香港統運路線掀起的「中國熱」

1971 年 12 月 30 日，剛取得聯合國地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度在保釣運動發生後發表公開聲明表達官方立場，外交部稱：「〔釣魚台〕和台灣一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¹⁵這再次悄然點燃保釣運動人士對中共的期待。同月，港大學生會舉辦了第一個回國觀光團，觀光團歷時 29 天，跑了 8 個城市，穿越 10 個省份，參觀了公社、工廠、學校、醫院，也看了名勝古蹟、自然風光。一陣中國熱正要吹起來。

從大陸回來的港大學生回港後，立刻於港大陸佑堂舉行了盛大的簡介會。這就剛好回應了經過保釣運動後莘莘學子們腦中關於如何「認識祖國」、進而決定如何「認同祖國」的疑問——當日陸佑堂座無虛席。旅行團團長馮紹波之後更於《學苑》發表回國逛觀光團報告〈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沈！〉，這一期《學苑》一天裡賣完了 4,800 份，掀起校園內外一番熱議。¹⁶

在今天這個去大陸旅行非常方便的時代，一個回國觀光團可以引起風潮，聽起來或許非常奇怪。要知道，當時中國大陸正進行文革，雖然中港之間依然有人流互通，但可以訪問公社、工廠的機會依然很稀少，這使得大陸還是有很大的神秘感。而這個觀光團正可以帶來許多一般人不知道的訊息。〈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沈！〉一文報導了他們在觀光團中所觀察到的大陸社會的精神面貌、工農建設、教育改革、人民生活、風景文物等珍貴的一手資訊。馮紹波也提到了自己的轉變：如何從對「偉大領袖毛澤東」沒有感覺到觀光團結束時對「毛主席」感覺到愈發「尊敬」。¹⁷而此前，香港的反共論述，都認為

¹⁴ 學聯報，〈政治闖進來〉，《學聯報》，1967 年 7 月 20 日，版 1。

¹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

<https://www.fmprc.gov.cn/diaoyudao/chn/flfg/zcfg/t1304542.htm>（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4 日）。

¹⁶ 陳文鴻，〈前言：我們走過的路〉，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頁 7。

¹⁷ 馮紹波，〈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沈！〉，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2〕），頁 58-62。

毛澤東思想是一套洗腦思想，對毛澤東的愛戴也因此就是個人崇拜，但馮紹波卻引用武漢大學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說法，指出「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人的思想，而是廣大民眾經驗的總結，所以它合用」，更認為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是要「為人民謀幸福、要消除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個人是要以整體的利益為依歸，很多決策都是由領導安排，不容個人選擇」。¹⁸雖然文中並沒有提到他認為社會主義適用於香港，但也鼓勵大家要繼續探索及了解國情，而不能默默等待。他說：「我們是要決定自己走那一條路，做一個怎樣的人。」¹⁹

馮紹波的回國觀光團介紹雖然沒有明確表示支持中共的立場，但有鑑於內容幾乎都是關於中共的正面報導，作者的立場也呼之欲出。文章和陸佑堂講座所象徵的，正是支持保釣的大專院校學生從「恐共」變成「談共」，進而變成日後的「挺共」。一開始，恐共是因為對六七暴動的恐懼。隨著保釣運動帶出了統一議題，大家都有感必須拋開恐共，轉往談共，以解答統運要往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向統一——這不但被當成是一種關乎是非與正義的選擇，更關乎到「要做一個怎樣的人」——也就是指向了身份認同的問題。而進入 1972 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席位的大勢所趨，及回國觀光團、國是討論的推波助瀾下，大專院校界的一批學生開始出現趨向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統一對象的跡象——認同自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變成了大專院校界的最新潮流。

譬如，在 1967 年大力撻伐中共及左派的《學聯報》，在 1972 年 4 月刊登了當時學聯保釣中學生組組長陳毓祥²⁰所寫的〈釣魚台與統一中國運動〉，文章明確對國民黨及中共在保釣一事上不夠積極給予了兩極的評價——國民黨的不積極是「外交軟弱」、是「走上滅亡之路」，而中共的不積極則是因為「台灣問題一日未獲解決，中共既無由捏手釣魚台，這是關係到法理上的問題」。²¹這某程度上在當時來說是對的，因為釣魚台無論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的理解中，都是屬於「台灣省」的，然而對中共的體諒話語，明顯顯示出作者對中共比國民黨更寄託希望，也顯示了傾向中共的立場。可見 1972 年香

¹⁸ 馮紹波，〈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頁 58-62。

¹⁹ 馮紹波，〈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頁 62。

²⁰ 陳毓祥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是學聯保釣中學生組組長，他後續也是國粹派以至於建制派的大將，最後於 1996 年的保釣登島行動中意外喪生。

²¹ 陳毓祥，〈釣魚台與統一中國運動〉，《學聯報》，1972 年 4 月，版 6。

港的統運與美國的統運的支持中共的立場接軌，也就是說，大專院校界逐漸開始「挺共」，而校內的毛派——也就是國粹派——此刻悄悄萌芽了。

不過，面對著這新興的校內毛派的興起，保釣會的自發毛派並沒有特別的欣慰，他們也並不完全同意這些大專院校學生對統一路線等於完全挺共的解讀。譬如，周魯逸就認為之後國粹派對統一路線的演繹是在放棄了主動性、行動、和個體主體性的前提下進行的，是「唯中共當權派及『正統』左派組織馬首是瞻」的「欽差大臣」實質卻是「執著雞毛當令箭」；不過，他們在當時並沒有把此矛盾撕破臉地道出，而只是選擇了「反潮流地引退」。²²

7-1-3 香港保釣運動的反殖路線

由於七七保釣的警察暴力更為嚴重，使得保釣衝上新一輪高峰：1971年8月13日的維園保釣示威人數達3,000人、九·一八示威也有2,000人出席。但其實參與者普遍知道，釣魚台即將會被美國連同沖繩交給日本，示威也只是表態，實際上大家都開始對保釣的未來發展感到迷茫。譬如，陳平寬曾在10月10日的《盤古》發表文章，寫過對保釣發展的憂慮及對保釣未來發展的見解：

在香港而言，保釣運動只能算是我們對國事的關懷的一種表現，以及引發群眾對國事注意的一種努力，如此而已，因為我們是在不能對保釣有任何直接的貢獻。我們對保釣只能表示態度……我們已經做得很夠了，還能做什麼呢？

我覺得，值得珍惜的，是保釣運動的精神和意義，這便是關心國事，保土衛國。我們可以帶著這個精神，把保釣推倒另一個層面上，為本土本民做一點切實的工作。我希望目前的保釣組織，能蛻化成為另一些組織，其宗旨範圍不只是侷限於保衛釣魚台這一點上。政治立場雖然要顧及，但即使中共，也不會反對「反殖」的。²³（黑體為筆者所加）

這篇文章之所以有代表性，是因為他重提了當時除了統運路線以外的另一個可能——那就是同樣繼承中文運動精神的「反殖」路線。事實上，香港的保釣運動本來就承接

²² 周魯逸，〈香港學生運動與意識形態〉，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81〕），頁281-82。

²³ 陳平寬，〈短論香港保釣前途——「九一八」示威之後〉，《盤古》41期（1971），頁35。

了中運的民族主義及反殖動力而開展，而且在四·一〇和七七保釣示威遭到警察暴力鎮壓以後，這條路線的論述就一直在發展。此時重提民族主義與反殖的齊頭並進，也很切合當時的歷史脈絡：中運和保釣運動同樣繼承著關心國是、保土保衛國的方針——反殖是關心國是的表現，因為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保土」也可以指向保衛香港、反對殖民政府壓迫。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聯合國代表權後，統運開始和反殖運動在論述上有了連結。譬如，11月15日，也就是殖民政府為粉飾太平舉辦「香港節」時，大專院校界就得到契機把「統運」和「反殖」論述相結合。《中大學生報》的社論〈我們的方向〉就是一個例子：

這幾週來，由於國際局面的激烈變化，特別是中共在聯合國取代了台灣的席位以後，今日談香港的政治前途……這轉變的來臨，並不會是遙遠的事了，這是不久的將來，我們必須面臨的問題。那些把頭埋在沙中，或盲目接受政府「繁榮安定」宣傳的人，這該是反省的時候了……

但以英國及西方國家在香港的利益上看，香港在未和中國復合之前，必然經過一個「談判」階段。這談判的決定將支配了香港的前途。（以為中共是唯一決定香港前途主宰者的人是昧於國際形勢和為中共的對外政策所迷惑。）

現在問題是什麼人代表香港談判。是英國殖民地政府？是現任支配立法局的財團？抑是香港普羅大眾市民？如果目前形勢繼續下去，必是前兩者無疑……我們不能坐視一班並非以全體中國人利益為依歸的財團與殖民官員去安排我們的命運。

當今的急務，是團結全港中國同胞，反對不合理的殖民地政府統治，粉碎財團、大資本家壟斷立法機構的局面，爭取我們對香港事務決應有的權利。²⁴（黑體為筆者所加）

把以上這一段結合之前《中大學生報》支持統運的立場來看，可知《中大學生報》的立場演進為支持民族主義、支持統運，同時反殖。然而，這三者 in 論述上到底可以怎麼被連結在一起呢？畢竟，統運主要對應的是「台灣」，而不是香港。因此，這篇文章是非常有意義和代表性的。第一，它擴充了統運的範圍，藉著討論香港政治未來，把香港

²⁴ 中大學生報，〈我們的方向〉，《中大學生報》，1971年11月15日，版2。

回歸也放置在統運的範圍之中。第二，它把保釣中的民族主義、統運和反殖三個不一定相關的路線做了有機的連結：反殖被認為可以增加中共在和英國談判時的籌碼，使得代表全體中國人民（包括香港）的聲音、勢力更強勢，其利益也因此可以得到保障，而不會被一批「溜之大吉」的「財閥」或「可以搜刮民間財富」的「英國殖民地政府」所偏擺，對於無論是香港或是中國的發展都是好的；也就是說，這裡喊出的反殖路線，不但和民族主義不相衝突，甚至和統運也相互助益。²⁵

而進入 1972 年，隨著回國觀光團的推波助瀾，香港統運開始推廣「認識祖國」的風潮。此時，大專院校界對「民族主義—統運—反殖」應該互相連結的主張，開始演變成「民族主義—統運—認同中共—反殖」應該互相連結的主張。一個鮮明的例子是，1972 年 4 月，《學聯報》發表社論，除了表達了和《中大學生報》相同的立場——即認為「香港與中國的復合」需要建立在「對殖民地政府進行改革」和「認識中國」兩者之上——還加入了「承認中共政權合理化」及「肯定社會主義是中國應走的道路」兩點。²⁶

面對反殖路線和統運路線結合在一起的最新趨勢——也就是「民族主義—統運—認同中共—反殖」被扯到了一起，一直最主力堅持反殖路線的《70》及其相關的聯陣對此是很有戒心的。我們可以在聯陣 1972 年 2 月 6 日的會議紀錄中看到，他們認為「反殖」和「統運」是對立的，而統運的聲浪變得之高，是保釣運動的一種失敗：

保釣運動開始已註定了是必然的失敗，它的必然失敗源於它的口號「保衛釣魚台」的侷限，我們可從釣運看到香港青年人對「認同」的需要，而釣運的興起無疑滿足了它們的需要，而聯陣參與的目的是把群眾帶領到反殖方面去，就此點而言，我們雖未完全達到目的，但也在提高群眾意識方面產生了效力，但是，我們更忽略

²⁵ 這種「民族主義—統運—反殖」的有機連結，在我現在看來，依然覺得非常有趣。畢竟，香港與大陸的分裂是大國於殖民及冷戰角力下所產生的——而如果說釣魚台也是因為殖民和冷戰而被分裂出去，那香港怎麼才不會被永久分裂出去，變成另一個「釣魚台」？釣魚台被割讓的處境，和香港的狀況有一定的對仗性。那如果，為了反對釣魚台被割讓需要發展出與此相對的反美日的保釣運動，那發展出反殖的統運會否是香港的一條出路？這種說法雖然在當時沒有成為運動氣候，但對現在來說依然很具參考價值，甚至說挖掘了保釣的歷史潛能，對今日討論保釣發展時也有許多啟發——民族主義原來不一定代表就要對著某個政權搖旗吶喊，而也可以成為改革在地政治的動力。不過，回歸後的香港在政治體制上一直保留殖民性，在《國安法》之後，民間言論空間的收縮比殖民時期可能更為嚴重，這個時候講「反殖」的「統運」，就更顯得弔詭了——當「統一」已經被官方話語壟斷，當舊的殖民遺留與新的威權系統以「公安條例」及《國安法》的形式融合得天衣無縫……現今要反對政體下的殖民遺留就必須要觸及對中共威權統治的批判，而這都會被官方認為是反對統一的「港獨」路線。也就是說，反殖的統運或統一的反殖運動，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在現今的脈絡下都會被認為是兩組矛盾重重的概念。用今天的目光去看當年「反殖」與「統一」的連結，雖然一方面有所啟發，但這個啟發卻又因為現況的脈絡而讓我覺得有所隔閡。

²⁶ 學聯報，〈站起來，奮鬥下去〉，《學聯報》，1972 年 4 月，版 15。

了一點後果，此運動被帶領到認同中共方向，釣運因此消沉。²⁷（黑體為筆者所加）

由此可見，聯陣雖然曾經和保釣會及學聯合辦一些有統運色彩的行動，但並不代表《70》認為統運和反殖是齊頭並進的，而只是為了藉著運動的勢頭去宣傳自身的反殖路線；同時，他們認為反殖和統運是相互競爭的，統運只會「孤立」了反殖路線。而這就跟聯陣對國際政治的分析有關：他們並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強大及中共與美國建交代表了中共更有能力去保釣，「中美友好」只是代表中方不會批判美國，無助保釣。同時，他們對反殖路線開展的失敗也歸咎於港英的策略改變——由於港英開始「懷柔」，聯陣因此斷定「將來香港會繁榮下去」，所以無論是用工人運動還是社區工作去展開反殖，都沒有強效的發力點。而且，聯陣也有許多自我反省，他們認為反殖路線在運動中被統運路線蓋過，和自己開展工作時的錯誤有關。包括「為了急於激進化其他團體，表現自己的立場，常有過火行動，如在會議桌上與其他團體爆火」，「聯陣因代表開會時氣焰太盛」，這也讓他們失去了可以拉攏學聯或學生的機會。²⁸

總結以上，在保釣運動的反殖論述中，其實也分為與統運較為敵對的《70》和聯陣的反殖民論述，和嘗試融合統運、民族主義及反殖路線的論述，這是全球統運論述和香港反殖論述中曾經出現過的比較有趣的一段，也可以說是統運一次在地化的嘗試。兩者最大的差異還是落在兩點：（一）到底中共在世界舞台的崛起是保釣的助力還是阻力？（二）反殖和中共的利益是否完全一致？（三）對中共的社會主義路線是否完全認同？而這些問題，其實在當年有限的資訊下，也是很難被完全解答。關於要「統運」還是「反殖」、兩者可否融合的問題意識，將持續在整個火紅年代當中。

7-2 保釣落幕

保釣運動的路線轉向，其實已經自我預示著第一波保釣運動即將結束——然而這對於當時的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為保釣的問題意識還是可以透過統運或反殖的

²⁷ 〈聯陣檢討大會紀錄〉，<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ids/MCY-001923/dates/1972-02/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5月18日）。

²⁸ 〈聯陣檢討大會紀錄〉，<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ids/MCY-001923/dates/1972-02/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5月18日）。

方法繼續下去。步入 1972 年，保釣聲浪已經大不如前，1972 年 1 月 28、29 日，保釣會在美國領事館的示威和集會，高峰期也只有百多人參加。²⁹但保釣運動的三大火車頭都有意識必須要「負責任」地把保釣做到 1972 年 5 月 15 日——也就是釣魚台被美國連同沖繩交給日本的日子——才算是對保釣議題一次完整的表態。就這樣，五·一三保釣示威舉行了。

7-2-1 五·一三保釣示威

五·一三保釣示威是三大火車頭在 4 月開始共同籌辦的，地點定在維園。但後來因為意見不合，學聯決定聯同天主教大專聯會和大專同學會離隊，於同日在愛丁堡廣場示威。結果，剩下的《70》的聯陣及保釣會順利向警方申請到維園場地，學聯申請的愛丁堡廣場則不獲警方通過。學聯因此向港督請願、對社會賢達進行遊說、向新聞界解釋示威異議，甚至拍電報予英國首相、聯合國和全球保釣組織。³⁰然而，港英政府卻發動報章重提「繁榮穩定論」，指責學聯在中環示威是要「影響社會安寧」、「罔顧社會秩序」、「不負責任」、「引起香港大眾不便」，³¹更稱學聯示威的參與者為「保釣仔」、「agitatas」、「保釣友」、「鬧事份子」、「職業學生」等。³²由於輿論壓力，學聯最後宣佈取消中環的遊行示威，改而動員同學參加保釣會和聯陣舉辦的維園集會。³³

維園示威於上午 9:30 舉行，而這個集會最後竟演變成遊行——人群從維園遊行到中環愛丁堡廣場，人數也從 600 增加到 2,000 人。最後，大家繞到美日領事館遞交抗議書再回到愛丁堡廣場解散，示威於下午 1:30 結束。示威過程中，雖然警方持續用擴音器警告示威者，但並無與人群發生衝突。雷競璇回憶道：「在香港第一次保釣運動歷程中，『七七示威』和『五一三遊行』是氣氛最緊張、最受注目的兩次群眾行動。」³⁴

由於五·一三示威最後關頭，還是藉著三大火車頭的共同努力才發生的，這也使得第一次保釣運動至少不是以各派撕破臉的方式落幕，不至於為參與者留下難堪和不愉快的回憶。1972 年 5 月 15 日，美國將釣魚台列嶼連同沖繩交還給日本，保釣運動參與者一

²⁹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保釣運動產生的背景及經過〉，頁 35。

³⁰ 學聯報，〈待從頭 收拾舊山河〉，《學聯報》，1972 年 5 月，版 1。

³¹ 學聯報，〈待從頭 收拾舊山河〉，版 1。

³² 紅柏，〈從五一三看保釣運動的發展〉，《學聯報》，1972 年 5 月，版 3。

³³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頁 203。

³⁴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 204。

方面無何奈何，另一方面也在展望未來。回顧 1971-1972 年香港的保釣運動，以下表格彙整了各香港保釣示威的大事：

時間	地點	內容	參與人數/ 旁觀人數	組織	與警察之衝突
1971/2/18	日本領事館	保釣示威	約 40/不明	保釣會	無
1971/2/20	日本文化館	保釣示威	約 30/200	70 年代雙週刊	無
1971/4/10	日本文化館	保釣示威	約 100/1000	70 年代雙週刊（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	21 人被逮捕
1971/4/17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	支持於四一〇保釣示威中被捕學生、支持保釣運動	香港大學：700 崇基書院：500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學生會	無
1971/4/18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舉行「釣魚台事件與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壇	約 500	保釣會、學聯	無
1971/5/4	皇后碼頭空地	宣揚保釣、五四精神及和平示威的基本人權	約 40	70 年代雙週刊（保衛釣魚台五四行動委員會）	12 人被捕
	九龍明愛中心→九龍「大人公司」	保釣示威（呼籲抵制日貨）	約 300	保釣會、「四刊一會」	2 人被捕
1971/5/16	美國領事館	保釣示威	不明	70 年代雙週刊	無
1971/5/30	新界	保釣示威、野餐	不明	保釣會	無
1971/6/17	美國領事館	保釣示威、反對美日簽署《沖繩返還協定》	約 80	70 年代雙週刊（香港保衛釣魚台中學生行動委員會）	無
1971/7/7	維多利亞公園	保釣示威	約 1000	學聯（保衛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	21 人被捕
1971/8/13	維多利亞公園	保釣示威	約 3000	70 年代雙週刊（聯陣）	無，事前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1971/8/20	（8/20）美國領事館、日本領事館、港督府	提交抗議書	不明	保釣會、學聯、70 年代雙週刊、海外留學生回港小組	無
	（8/22）美國領事館	舉辦「香港—海外保衛釣魚台聯合大會」及保釣示威	約 50	保釣會、學聯、70 年代雙週刊、海外留學生回港小組	無

1971/9/15	港督府	抗議對七七示威者的判決	約 200	學聯	無
1971/9/18	維多利亞公園	保釣示威、抗議「兩個中國」	約 2000	保釣會	無，事前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1971/10/17	愛丁堡廣場	保釣示威	不明	保釣會、70 年代雙週（聯陣）、學聯	無，事前未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1971/10/20	維多利亞公園	抗議對「七七保釣示威」被捕者的判決	約 250	保釣會、70 年代雙週（聯陣）、學聯	無
1972/1/28 - 1/29	(1/28) 美國領事館	反對美日侵略、「一中一台」、「台灣獨立」	超過 100	保釣會	無
	(1/29) 美國領事館、日本領事館	反對美日的侵略及對中國的分裂活動	超過 50	保釣會	無
1972/5/13	維多利亞公園 →愛丁堡廣場 →美國領事館、日本領事館	保釣示威	約 400→約 600→約 2000	保釣會、70 年代雙週（聯陣）、學聯	無

表 1：1971-1972 年香港保釣運動大事彙整（資料來源：倪捷，〈1970 年代初期の香港における保釣運動の展開〉，《華南研究》3 期，2017，頁 69-70。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頁 804-808。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頁 195。保衛釣魚台五四示威，〈五四 1971〉，《70 年代雙週刊》20 期（1971），頁 4。）

7-3 火紅年代青年的後保釣行動與反思

7-3-1 「反殖」與「統運」如何融合？

總結保釣的三條路線：保釣會受到自發毛派的影響，一開始是用反帝愛國的保釣論述，後來則轉向統運路線，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70》及其相關組織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一開始保釣是出於反帝國主義，後來則藉著反對警察暴力轉向反殖路線，主張示威合法化；大專院校界則隨著學聯的領頭，在情勢所迫下參與保釣運動，路線上傾向樸素的民族主義。而因為學聯的積極參與——學聯又是大專院校界的最具認受性象徵——保釣運動有了正面形象，這對運動的發展起了關鍵作用。

不過事實上，大部份參與保釣的年輕人，並不一定那麼明確地知道三股路線之間的矛盾，他們大多都是坐落在「統運」和「反殖」的光譜之內中遊移、探索——有時候走到一端，有時候走到另一端，有時候又逗留在中間，想要積極地把兩者融合起來。

自從 1971 年保釣運動的震撼，到 1972 年六·一八救災行動和 9 月爭取仁義新村村民安置的行動結束後，學界和社會上有半年時間沒有再出現社會抗爭。當這種風平浪靜和之前的激烈抗議形成一些對比，有人在提出了在這沉寂期對運動的一些反思。譬如 1973 年 1 月，曾為學聯保釣運動學生領袖，當時已被選為中大學生會會長的雷競璇就在《中大學生報》提到：「自從 72 年 7 月以後，社會性的事件相對低減少，於是學生界的工作就像停頓下來了。在這個頗為沉悶的階段，我們應當望一下：究竟我們還應當為我們身處的一個社群感一點什麼的工作？」。³⁵

正是這個時間點，關於「統運」和「反殖」可以如何共存或融合的問題再度被提了出來。1973 年 5 月 16 日的《學苑》〈從大方向到現狀與個人〉³⁶一文，可以說是關於「統運」和「反殖」該如何結合的討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中首先分析到社會及學界的沉寂，一方面是因為之前激烈的運動導致了領導的同學在精神和實際工作上的沉重負擔，也就是「累了」；另一方面，他們在「累了」時也開始察覺，在平靜的氣候下應該要做「踏實」的工作，譬如對運動進行檢討、反省和自我充實。他認為，之前紅紅火火的運動中，大家都只是憑著「民族感情和知識份子的一份良知」，但思想上是真空的。於是，在 1972 年下半年開始的沉寂期中，實際上是大家積極增強理論基礎，從「感性認識提升到理性認識的層面」的一段時間。他因此也提到這段時間如同雨後春筍一般發生的文化活動，包括了歷史班、學術講座、文化之夜等。

在這一輪思考中，雖然他已經認定「認識中國」及「反對殖民主義」是學運今後的路向，卻不知道兩者「是不是兩回獨立不同的事情」，還是「有沒有主次和誰輔助誰的關係」。一方面，由於他對於愛國運動感到一種「遙遠的感覺」，因此在情感上更傾向「去反對在身邊壓迫著我們的萬惡資本主義」；但另一方面，他卻不了解反殖運動的終點是什麼，因為反殖民運動經常所指向獨立，但香港的處境會讓他認為香港獨立是分裂國家，是和愛國相違背的，因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於是，他認為「單談打倒殖民地政府，不顧及全中國的利益，是狹隘的左傾運動」。他進一步提出，今後反殖工作應該

³⁵ 雷競璇，〈對當前問題的顧攷〉，《中大學生報》，1973 年 1 月，版 1。

³⁶ 尚其，〈從大方向到現狀與個人〉，《學苑》，1973 年 5 月 16 日，版 2-3。

是著力於揭露「殖民地社會的黑暗與不平等，反對殖民地政府及和他們站在一起的資本家對我們的腐蝕、壓迫與剝削」，但重點並非直接推翻殖民地政府，而是在於「激起我們的民族情感，促進我們對認識中國的熱切」，就算是呼喊殖民政府做出改革，也應該是把改革當作「認識事物的手段」。

由此看來，在保釣後的一段時間，一些青年認為「反殖」與「統運」兩條路線是可以兼容互補的——因為重點並非形式上反殖與否，只要形式背後的目的同時指向認識中國及關心社會（簡稱「認中關社」），其實就並不矛盾。譬如，曾澍基說過他 1973 年時的想法：「殖民地不公義比比皆是，奉行社會主義的祖國大陸，沒理由反對在香港本土內進行抗爭行動。」³⁷也就是說，後保釣青年依然希望調和兩條保釣運動路線，想要把「反殖」和「統運」有機地、有論述地、有邏輯關係地黏合起來。

7-4 後保釣中的反貪污運動：「反殖」和「統運」的矛盾所引發的鬥爭

然而，這種想要把「反殖」和「統運」融合的嘗試很快被現實政治所挫敗。這要從 1973 年 9 月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下稱反貪污運動）開始說起。關於反貪污運動的起源和發展，《香港學生運動回顧》一書有非常簡潔的介紹：

1973 年 6 月 12 日，當時的警司葛柏在「警察監視」下潛離香港，社會哄動。而政府指成立了一個人的調查委員會——百里渠——來調查事件真相，但是一切資料保密，更利用法律漏洞，宣稱無法引渡葛柏回港，因而引起市民和大專界不滿，引發一連串社會行動。

初期行動乃是為期一個月的簽名運動，及於 8 月 12 日在港大召開一次辯論會，得到了同學的支持。其後更與工人組織組成了 13 反貪污團體，並於 8 月 26 日在摩士公園舉行反貪污集會，後因天雨關係，改為遊行，又於同日下午在維園集會。由於事前未得政府批准，該次遊行及集會被指為非法，因而有 21 位參加者被票控，後因證據不足罪名不成立。學界續於 9 月 2 日於九龍摩士公園集會，亦因該地不列入合法集會場地而被指為非法集會，有 12 人被控，於 9 月 18 日審訊後，有 12 人因拒絕轉庭而被通緝。

³⁷ 曾澍基，〈「國粹派」、「社會派」源考〉，<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1973.doc>（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8 日）。

9月16日，學界於維園舉行「貪污有罪，集會無罪」大會，同日下午由皇后廣場巡遊往督轅遞抗議書，要求（1）撤銷票控；（2）停止破壞反貪污運動；（3）政府表示肅清貪污的決心和拿出具體行動；（4）立刻引渡葛柏回港。在此次行動中，警方又再票控26人。³⁸

葛柏是皇家香港警隊外籍總警司，多年來暗地裡運用自己的職權收取貪污款項逾430萬港元，而被發現後居然得以安然搭747潛逃回英國。又由於英國沒有香港《防止賄賂條例》下「收入與官職不相稱」的罪名，以致香港政府一時間未能把葛柏引渡回港受審，而這就激起了反貪污運動。引文所說的「13團體」，包括學聯、天主教大專聯會、《70》及其相關組織「年青工人」，以及《每日戰訊》等。³⁹

7-4-1 社會派 vs. 國粹派

本來，面對反貪污此等大是大非，經歷過中運和保釣運動的青年，理應很有默契地共同炒熱運動氣氛。可是，事實並非如此。不少在回國觀光團的推波助瀾下成為愛國毛派的學生，根本性地不認同以抗爭的形式進行反殖，認為這與「統一」、「愛國」相矛盾而拒絕參與反貪污運動。這些學生與贊成參與反貪污運動的、主張反殖路線的學生起了激烈矛盾。曾澍基、王卓祺、黃醒華等較為重視推行本地抗爭的學生，因此開始自稱自己為「社會派」，並以「國粹派」一詞來嘲諷獨尊愛國統運路線而不願意參與抗爭的毛派學生。⁴⁰反貪污運動中大專院校界中兩派的分庭抗禮，象徵了保釣後統運路線和反殖路線的徹底決裂。

此外，剛離開《70》並成立了獨立組織的托派，和新成立的「社會派」連成一線，共同推動反貪污運動。反貪污運動是托派在戰後香港社會運動中首次參與的社會運動。雖然當時他們還沒有高調地亮出托派旗幟，但國粹派已經開始警覺到托派的存在。也就是說，保釣後自1973年開始，火紅年代青年大概可以被分為校內的「社會派」和「國粹派」，

³⁸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反貪污、捉葛柏〉，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8〕），頁78。

³⁹ 星河，〈香港托派與青年學生運動〉，收入香港大學學生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1978〔1975〕），頁196。

⁴⁰ 曾澍基，〈「國粹派」、「社會派」源考〉，<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1973.doc>（檢索日期：2021年5月18日）。

及校外的「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當中又以國粹派和托派的矛盾最為激烈。火紅年代從此紛爭不斷。

統運路線和反殖路線的決裂首先是大專學生界——特別是學生會內部——所發生的。在 1973 年，曾在保釣時期任中學生組組長、鼓吹統運路線的陳毓祥當選港大學生會會長，同期外務副會長為麥炳良（後改名為麥華章）、內務副會長為曾澍基。當時，陳毓祥和麥炳良為國粹派學生，只有社會派的曾澍基支持反貪污運動，學生會高層內部因此出現分歧。身為社會派的黎則奮（筆名 Q 仔）是這樣敘述這分歧的：

對於「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港大學生會不獨沒有出名支持，在幹事會內部，力主參加「反貪污」運動的，也是內務副會長曾澍基，而曾澍基是少數派，無論怎樣力爭，也敵不過幹事會內部的保守勢力，結果港大學生會又重複歷史，繼於釣運期間退出維園七·七示威，再度臨陣退縮，不支持摩士公園的集會示威行動。如果陳毓祥是支持摩士公園的集會示威行動的話，以他的身份和在學生會內的影响力，港大學生會又怎可能不出名支持該次行動？⁴¹

黎則奮說港大退出七七保釣示威固然是一個記憶錯誤（事實上，七七示威就是學聯發起的，港大也參與在內，黎則奮想說的「臨陣退縮」因該是指五一三保釣示威），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這段文字中理解到以陳毓祥為代表的國粹派和以曾澍基為代表的社會派的分歧已經被一個具體事件——也就是支持或不支持反貪污運動——所激發，使得兩種路線和理念不能再在實踐上融合。這些衝突遂以筆戰的方式被引爆，並逐步激化。「社會派」與「國粹派」的對峙日益深厚。

7-4-2 〈「反貪污、捉葛柏」我的一些不明白〉vs〈明白你的「不明白」反貪污運動的茶杯裡風波〉

這個筆戰首先由 9 月 16 日《學苑》一篇名為〈「反貪污、捉葛柏」我的一些不明白〉⁴²的文章開始。以國粹派立場書寫的作者畢捲鋒，雖然聲稱自己認同「反殖」可以與「全

⁴¹ 黎則奮，〈陳毓祥來函照登〉，<https://www.facebook.com/cfqilai/posts/10159136276558436>（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11 日）。

⁴² 畢捲鋒，〈「反貪污、捉葛柏」我的一些不明白〉，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頁 64-65。

中國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但推出的結論是反貪污運動還沒有形成足夠的民意，言下之意就是反貪污運動不值得參與。同時，他反過來建議說，應該要做的是「細緻、廣泛地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積極地去提高殖民地人民的思想覺悟」，也就是把組織群眾與抗爭行動也給對立起來。

這篇文章旋即引來阿丙（其實是已經成為托派的吳仲賢）以〈明白你的「不明白」反貪污運動的茶杯裡風波〉一文回擊。文章一開始就以極盡機智但嘲諷的語氣，稱畢捲鋒的建議為「革命安全論」，甚至還引用了 Q 仔（黎則奮）改的廣告歌來嘲笑國粹派的立場就是「安全第一，命長久」——意思是怕死。接著，吳仲賢提出把「反殖」及「全中國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的方式，應該是在本地推行「反資反殖」，而且還要進行「糾正社會主義落後官僚化發展的歷史革命」。他的主要論點在於，中國雖然有社會主義，但民主集中制中沒有民主，所以在香港進行反殖抗爭——譬如參與反貪污運動——不但符合本地需要，還可以推進中國改革及世界革命。而關於行動和組織（也就是團結群眾）誰先誰後的問題，吳仲賢引用了 Q 仔的話，認為「只有通過針鋒相對的鬥爭，人民才會察覺和充分了解港英殖民地主義者的猙獰醜惡嘴臉，從而嚮往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重歸祖國母親的懷抱裏」。⁴³也就是說，對他們來說，反殖與愛國是不衝突的，而行動與組織群眾是互為推進的——也就是把行動看作是一次教育和團結的手段。

7-4-3 〈「同志」讓我告訴你〉vs 〈與屠龍君討論「香港問題」〉

在〈「反貪污、捉葛柏」我的一些不明白〉文章發表的同時，學界於 9 月 16 日在維園舉行「貪污有罪，集會無罪」大會。此次行動後，警方再票控 26 名示威者，法庭最後判決為守行為，而這就使得運動元氣大傷。被捕的學生黃醒華曾說：「〔判了守行為〕當時對我們十多人而言是很嚴重。包括岑建勳那些。」⁴⁴反貪污運動中的《70》、托派和社會派，既要面對殖民政府秋後算帳，又要面對國粹派消極對待、袖手旁觀，就因此對國粹派更為批判。10 月 1 日，作者屠龍於《學苑》發表〈「同志」讓我告訴你〉一文，可說是反貪污運動支持者對國粹派的一次大力開炮。

⁴³ 阿丙，〈明白你的「不明白」反貪污運動的茶杯裡風波〉，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頁 66。

⁴⁴ 譚榮禧，〈什麼人訪問什麼人：那年頭的社運健將 與黃醒華憶曾澍基〉，<http://cihk.blogspot.com/2015/07/instead-of-being-self-righteous.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5 月 30 日）。

作者一開始苦口婆心地說服國粹派「同志」支持反貪污運動，但越寫越激烈，開始質問國粹派「我們一群曾與你們並肩作戰，早已從中運、釣運便被扣上不同帽子的青年，面對這一荒謬絕倫的場面，又怎能袖手旁觀，冷靜如你們一樣，可以『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但卻不針鋒相對，與殖民地主義者作無親的鬥爭？」他更指責國粹派的袖手旁觀，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與港英「聯手扼殺」社會派。這篇激烈的文章到最後再次把矛頭指向中共對港方針不透明，暗指中共封閉、官僚，作者認為儘管「香港人民」應該要為「中國人民的利益服務」，但「中國政府就從來沒有向我們公開說明」。文章最後更認為國粹派在以「民族主義的口號去壓抑我們」，而且做的活動不過是「空談」、「主觀唯心論」、「關在象牙塔」等。⁴⁵

這激起列兵以〈與屠龍君討論「香港問題」〉一文回應，並且開始針對托派：先是認為對國粹派的批評並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有一些「狡猾敵人掛著革命的面具滲透在群眾中，從中興奮作浪」；後暗指屠龍文中針對「中共允許有殖民地存在」的說法，為蘇修所為。⁴⁶列兵這樣去影射反貪污運動參與者中有蘇修間諜：

蘇修大軍壓境，國際局勢外緩內緊，是我們第一要注意問題。以前，蘇修曾以香港問題大罵我國容許殖民地存在，其用意是善耶？又蘇修屢派間諜來香港，他們與那些人接觸呢？要做些什麼？這點我們不能不提高警惕。⁴⁷

也就是說，國粹派暗指反貪污運動中的一些激進份子——也就是托派——為蘇修份子，而背後實際暗藏著反中共的陰謀。列兵的這種閱讀現在看起來很明顯是陰謀論，而這陰謀論是在以下兩個條件下才能發展出來的。

首先，國粹派抗拒加入反貪污運動做出具體反殖行動，是結合了對國際形勢和本港形勢的具體分析和判斷。列兵在上述文章中指控托派前，就用了毛澤東的「矛盾論」反駁屠龍君，認為「香港解放」並非主要矛盾，「中國統一及世界格局」才是——背後的判斷是認為香港進入 1973 年後就業情況較為明朗、階級矛盾緩和、市面歌舞昇平，發動鬥爭只會重複六七暴動的錯誤，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毛病，惹人反感；為了配合中共

⁴⁵ 屠龍，〈「同志」讓我告訴你〉，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頁 73-76。

⁴⁶ 列兵，〈與屠龍君討論「香港問題」〉，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頁 78-80。

⁴⁷ 列兵，〈與屠龍君討論「香港問題」〉，頁 80。

在國際形勢中的策略，在香港反殖民政府的手段，應該要以「深入群眾」、「組織」為手段，以「思想教育」、「製造輿論」為目的。也就是說，列兵文章背後的總體邏輯，其實是在重複香港傳統左派一直以來的策略——不做行動上的反殖，只是圈地自萌地讓大家做白蟻，以配合中共「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治港方針及面對國際形勢的部署。列兵甚至引用了「只有解放全人類，最後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作為總結去回應「坐待解放論」、「安全革命論」，認為自己正在做的，其實是如同《紅色娘子軍》中主角的覺悟——不可以為了私仇而「破壞隊伍的突襲行動」。⁴⁸

儘管列兵說得頭頭是道，然而為何列兵會那麼自然地認為「香港解放」並非主要矛盾呢？事實上，一切分析和判斷除了關乎客觀現實以外，也是關乎思想、價值、理論等。列兵之所以會有以上「客觀分析」，背後是和毛澤東革命外交策略的轉向有關。在第一章，我曾經提到毛澤東的「革命外交」策略本來是想要聯合亞非拉反對帝國主義，但毛澤東在步入七〇年代後認為此外交策略在文革時曾經因為結合了中國內部高漲的左傾情緒而有過於激進的問題，因此對「革命外交」策略做出了「調整」——「革命外交」背後的理論基礎不變，但實踐上更符合現實主義的外交模式——毛澤東此時認為：第三世界（包括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民族解放而不是共產主義問題，並主張以「反帝」、「反霸」組成國際統一戰綫。⁴⁹那麼，根據反帝反霸的路綫，英國只是個沒有即時威脅的沒落帝國，並不是需要首先打到的「第一世界」（也就是美蘇），而是「第二世界」。因此，中共認為香港留在英國手中名正言順地作為自由港，從而成為反美——也就是反「第一世界」——的窗口比推翻英國殖民政府要重要，英國殖民政府因此不被視為需要首先打倒的對象。也就是說，步入七〇年代，中共的治港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成為經過調整後的「三個世界理論」及「革命外交」策略的一部份，國粹派也因此主張以「愛國反霸」為出發點去繼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理解了國粹派的諸多判斷背後是被怎樣的理論影響的，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國粹派認定托派的反殖路綫不過是一種「擅自主張」——以美麗的反殖口號為標榜去傷害中共反美的大計——也就懷疑托派是蘇修間諜，實屬「第一世界」的蘇聯破壞中共外交的陰謀的一部份。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國粹派會認為社會派和托派是「破壞隊伍」的行為，甚至暗指這行為背後是有「蘇修屢派間諜」指使。

⁴⁸ 列兵，〈與屠龍君討論「香港問題」〉，頁 78-80。

⁴⁹ 賀艷青，〈毛澤東的國際戰略與第三世界〉，《中共黨史研究》3 期（2005），頁 86。

第二，國粹派之所以如此懷疑反貪污運動，是因為參與其中的托派的確是藉著反殖來反中共的。譬如阿丙（吳仲賢）的文章中，開宗明義認為以行動去反殖的最終目標是跟批判中共「落後官僚化」的計劃一致。雖然托派一開始這樣說是希望以此明志自己也是民族主義者，並顯示爭取香港的利益與全體中國人的利益相符合。然而，這卻打中了國粹派的敏感點，因為在國粹派眼中，只有中共才是符合全體中國人利益的代表——因為中共是堅持群眾路線的。而他們也難以相信堅持群眾路線的中共是「落後官僚化」，因此認為托派對中共的批判是一種違反事實的陰謀及抹黑。托派藉著反殖來推進對中共「落後官僚化」的批判和改革的「陽謀」，因此被認為是蘇修的詭計。這就埋下了 1974 年國粹派/本地左派與托派激烈鬥爭的伏筆（這將會在下一章討論）。

總括來說，反貪污運動可以被以下幾句話簡單總結：

貪污的，走了！

抗議的，被捕了！

參予的，分裂了！⁵⁰

7-4-4 從保釣到反貪污運動：「反殖」與「統運」的決裂、「社會派」與「國粹派」的敵對

社會派與國粹派的矛盾，表面上是因為是否參加反貪污運動而引發的。但事實上，兩派之間的矛盾，也可以被理解為跟保釣運動中統運路線和反殖路線的不調和有關。這種不調和背後，是統運路線已經被中共的「三個世界」理論和「長期利用、充分打算」對港方針所完全吸納，而失去了和反殖路線融合的彈性，變成一味地排擠反殖路線。吳仲賢甚至認為，統運路線演變成愛國路線，並且被中共治港方針所吸收，早在包奕明的「回歸論」中就可以找到端倪。總結國粹派何以從包奕明及保釣一路走來，變成此時的模樣，吳仲賢有著以下的總結：

「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回歸〉一文的作者包錯石，以他為代表的思想路線，便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就是香港正統左派以外的毛派，他們和其他團體不同的地方，便是對中國的看法。從包錯石〈回歸〉一文，到他在《70 年代》未刊行的〈人的因素〉那些文章，可以清楚地看見，在衡

⁵⁰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圖輯〉，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頁 35。

量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時……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就是如此，他才是最先發現香港的問題，原來只是中國近代史發展中的一個枝節問題，才在理論上，也滲入了極其豐富的民族主義色彩。可是，他最大的問題在於：在評價中國社會主義時，是從正方面出發，從肯定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方面開始，是從歷史的進步方面來看。所以，他們對中國只有「回歸」，只有要求自己適應祖國的社會主義，在中國這個大國家前，在社會主義這塊金漆招牌前，他們忽略了中國社會主義負面的發展……他們對釣運有三種希望：一、以釣運作為反美帝、反日閥的一個環節。二、從這個民族主義色彩十分濃厚的運動中，刺激意識較高的青年投入「祖國的懷抱」，從反帝到擁護中國社會主義。三、藉釣運團結香港學生青年和團結全球中國青年學生。為了完成這三項任務，他們便要在處理殖民地香港這個問題時，接受了北京的容忍路線，只是把它交在中國的手中，所以將殖民地的問題當作是次要矛盾，是運動以外的，所以始終避免與港英衝突。⁵¹

我認為，吳仲賢的說法大部分都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包奕明的保釣會所提倡的「回歸論」及統一路線，由於是選取了以現代化及群眾路線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值得「回歸」時，其實已經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正向認同搭好了跑道，讓本來行動上傾向保守、情感與思想上傾向於民族主義路線的大專院校學生發展出要認識中國、進而認同社會主義中國的意識。然而，自發毛派雖然擁護中國社會主義，但並不完全接受北京的「容忍路線」——要不然被自發毛派主導的保釣會就不會在中共沒有表明要保釣的情況下發動第一次公開的保釣示威了——甚至，其實自發毛派並不完全滿意國粹派的做法。所以，吳仲賢把國粹派的起源直接拉到自發毛派身上，是看不到兩者的斷裂，也是他上述論述的最大盲點。

事實上，自發毛派在面對國粹派的興起時，自身也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他們完全沒有足夠的組織資源與「光環」力量，與「正統」的本地傳統左派爭奪統一路線的詮釋權（無論是在本地傳統左派眼中、外人眼中、還是自發毛派自己的意識中，都知道自發毛派實際上是香港左派外的「異端」）。⁵²國粹派因著搞回國觀光團而與本地左派接觸，並且被統戰到願意服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中共對港方針下，結果「走了回頭路」，

⁵¹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70年代雙週刊》29期（1973），頁10-11。

⁵² 周魯逸，〈香港學生運動與意識形態〉，頁281-82。

是自發毛派沒有預料到也沒有資源去應對的一著。另一方面，自發毛派也在懷疑自己是否並不具備中共更廣闊的視野，特別是林彪的死也讓推崇林彪路線的包奕明意識到中共決策的封閉性使得外人幾乎無法有足夠的資訊去恰當地評論它的所作所為。自發毛派一方面不妥國粹派，另一方面在面對可以「直通天庭」的本地左派對國粹派的統戰，也沒有足夠的資訊和底氣提出反駁，一部分的自發毛派也因此選擇了默默地「反潮流引退」（而不是和國粹派撕破臉）——譬如包奕明完全淡出政治、沈迷藝術工藝品收藏——其實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投降，也是一種政治失落甚至是左派憂鬱的症狀。⁵³當然，也有一部分自發毛派是選擇了連結國粹派的路線——譬如，深受包奕明影響的《盤古》在 1972 年開始對中共的擁護越發狂熱，在編輯取向上全面轉向認同中共及認同文革，《盤古》甚至以文革用語抒發了自己的編輯立場是要「向香港的牛鬼蛇神宣戰」。⁵⁴可見，並不是所有自發毛派都那麼快陷入了政治難局之中而感到悶悶不樂。

國粹派的興起，使得保釣運動曾出現過的嘗試融合反殖與統運路線的嘗試難以發展下去——行動就會被國粹派認為是左傾盲動、不理大局，而心急的社會派在被國粹派打壓時，也只能防禦性地把不行動看作盲目愛國、被洗腦。一時之間，從保釣運動一路熱絡起來的運動氣氛就降下溫來，火紅年代也從高潮期步入僵化期。

7-5 「流」的討論：國粹派何以成為多數派？

在這場國粹派與社會派、托派的鬥爭中，勝利者實屬國粹派——因為反貪污運動最後是無聲落幕了。不過，這並不完全因為國粹派可以說服同學，而是因為港英政府的票控做法使得社會派及托派非常灰心，自己也敗下陣來。此時港英政府已經開始熟用新的鎮壓手段，對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的打壓也更有心得：警察不再做暴力鎮壓，只偷偷拍照然後採取秋後算賬的策略拘捕示威者。無論是因為經歷了 1973 年 9 月 2 日及 9 月 16 日集會，眼看多位運動領袖遭到票控，還是因為看到國粹派處處冷嘲熱諷，一般市民和

⁵³ 以上分析參考了周魯逸對包奕明的政治失落的分析，可參見附錄 4，或直接觀看其講座錄影，參見周魯逸，《周魯逸（魯凡之）——悼包錯石並論世局（三）》，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V0-5XWTcw&ab_channel=chowlouyik。

⁵⁴ 盤古，〈向本港牛鬼蛇神輿論宣戰——揭漢奸特務及「中國專家」的嘴臉 革洋奴買辦及封建餘孽的狗命〉，《盤古》44 期（1972），頁 1-5。

同學把這些看在眼內，也認為在香港採取任何行動都是無用的。國粹派與港英在打擊反貪污運動一事上，可以說完成了一次沒有預謀、沒有真實互動的「合作」。

這種灰心感其實並非在反貪污運動後才出現，而可以說是在保釣運動後就已經開始累積。在保釣中，學生和市民都發現就算怎麼風風火火地上街，怎麼勇敢地承受被捕、被打的風險，釣魚台還是會被美國交到日本手中，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終究被認為是無用的。就算抗爭強度繼續升級，六七暴動的經驗讓無論恐懼左派還是認同左派的市民和學生都認為，這並不會帶來什麼好的後果：因為只會招來更大的鎮壓，或者被市民深深地厭棄。火紅年代陷入僵化期的狀態可以顯示在《中大學生報》一輪關於「流」的討論——如果連一直在學運界和社運界都屬於比較激進的中大學生都如此灰心的話，抗爭的低氣壓可見一斑。

「流」的討論，意思是把中運和保釣運動等一連串學生運動看成「激流」，並評斷運動結束以後，激流是否已經變成死流。大家紛紛討論自己和運動的隔閡感，到底是來自自身的問題（激流中的死流），還是運動退潮的大環境問題（死流中的死流）。

〈校園裏的「流」〉把自身的死流狀態，歸咎為個人問題。作者認為，這是自己一開始對運動的理想放得太高所導致的，加上學生必須要以讀書為（尋求知識）主要責任，導致「知識」和「信仰」（社會運動理想）的衝突，到最後變成了「激流中的死流」。作者提到：

在某一項，或更恰當是一連串的活動中，我是為理想而來，結果示威理想而去。活動是實現理想的過程，對活動的熱愛現實了我這一個理想——政治性的——已成為我生命的一部份而已。但由於知識和信仰之間的衝突而引致生命領域轉移的不可避免，對該等活動的冷淡正式意料中事。

別人可以視而不見，見而不惑，以不見為見，以耳朵為真知；我卻做不到！至少目前尚有此自由。

「激流中的死流」！你懂我的意思？

把理想放得太「高」，是福還是禍？⁵⁵

⁵⁵ 〈校園裏的「流」〉，收入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編，《中大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84〔1973〕），頁13。

由於這篇文章傾向於「死流」只是個人問題，而客觀現實（運動氣氛）仍然處於「激流」，遂引起其他人的回應。

筆名為死流的作者在〈不負責任的說話〉中回應了「激流中的死流」的說法。他認為現實並不存在著真正意義的「激流」，「激流」只是表象，「死流」才是真實。因此自己是「死流中的死流」。也就是說，他認為自己之所以感到消沉如「死流」，終究自身狀態是因為整個運動氣氛在消退。他說：「除了那寥寥可數的運動員外，其他的往哪裡去呢？祇有他們自己才知道。」而這些人之所以消失，作者認為他們之前之所以有一番激流行動，只是知識份子所謂「革命性」、「動搖性」與「浪漫性」的驅動，他們只是「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他因此認為，該做的的是去元洲仔訪問、去認識祖國、去讀《盤古》的「今日中國」，並認為貼近無產階級，才是超克「激流」的假激進、真動搖和浪漫衝動。⁵⁶ 作者死流對運動低氣壓的看法，其實也繼承了國粹派對香港的分析——在香港無法做到真正意義的革命，因此所謂「激流」不過是振臂一呼的虛幻，而「死流」既然為常態，就該採取「認識祖國」和去元洲仔訪貧問苦等更為深耕的組織方法。

死流對學運和社運已進入低潮的判斷，也被鄔雍以〈這不是理想的時代〉一文呼應。鄔雍認為，學生本來就要兼職、談戀愛、讀書，儘管有心追求理想，也會折服於現實；就算是成本比較低的投稿，對他來說也要付出心理成本，而這些運動付出在殖民地政府的打壓下是不會有結果的。鄔雍寫道：

何苦來由，浪費寶貴的時間，噁心瀝血，到頭來，既沒有稿酬，且換得批評家的評頭品足……你們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政府到現在不是還在繼續拖延？……你們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不是受到政府的諸般警告和恐嚇嗎？香港的政府是在太有主見了，它不會輕易受你們的影響而改變方針，它才看不起你們呢。算了吧，誰叫我們生長在此時此地呢？⁵⁷

由此可見，作者對運動陷入僵化期的判斷，還加入了關於搞運動失敗後的心理創傷的描述。事實上對大多數人來說，每一場運動的興起除了是被理念所號召外，也伴隨著

⁵⁶ 死流，〈不負責任的說話〉，收入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編，《中大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84〔1973〕），頁14。

⁵⁷ 鄔雍，〈這不是理想的時代〉，收入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編，《中大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84〔1973〕），頁16。

運動勝利的決心。然而，隨著大部份運動訴求都無法即時實現（譬如中運），有些甚至落空了（譬如保釣運動），這種屢戰屢敗下，運動者感到灰心也是可以理解的。

「死流」除了可以被解釋成社運圈內鬥爭和港英政府的鎮壓等因素共同造成以外，也不可忽略中共文革的「巨流」如何對香港的「激流」製造了一定的壓抑或重心轉移。夏淞在〈中大學生會的發展〉一文中提到：

我是中國人，卻原來，在中國這個古老民族的奮鬥史中，我只是一個旁觀者，如此，則何以把自己的血肉投入這股中國的巨流呢？釣魚台去了，那股爆炸的氣氛亦去了，中國何其偉大，何其遙遠，只是我既認定中國為我們生命的母體，基於此一肯定，我們惟有努力地去認識，去了解，才能抹去那些由歷史積來的隔膜，我們方有了再舉步，再抬頭的勇氣。⁵⁸

從引文可以看到，把目光投向大陸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就是「巨流」），一方面可以看成對香港「激流」的壓抑（這更顯現於國粹派對社會派、托派的壓制）；但也可以理解成是，香港自身的運動本來就有陷入「死流」的所有條件。而把目光轉向「巨流」，其實是一種安置身心在運動中的失落和無力的方法，反而在某程度上拯救了運動創傷的人們不至於陷入癱瘓，而有了「再舉步」、「再抬頭」的勇氣。也就是說，形式和行動上較為保守的國粹派，之所以可以在 1973 年後成為主流，正因為它實際上契合了「死流」的趨勢——既然行動不可能，那「認識中國」就成了一種行動的取代。就好像以前新亞書院的南來右派文人以自我修為作為行動的替代物那樣，而此時國粹派左派的「認識中國」主張，其實也同樣是行動的替代物。然而不同的是，「認識中國」至少具備了一些「入世」的氣質，讓當時擺盪在「死流」和「激流」中的學生，認為是一個折衷的、可行的出路。

雖然，國粹派佔據當時主流的這段歷史，使得當時的學界疏於反殖為現在的人所詬病，譬如劉山青稱國粹派「埋葬了七十年代學運」⁵⁹；羅永生認為殖民管治以及七〇年代國粹派盲目親中共的民族主義讓「香港人」主體性被偏擺。⁶⁰我儘管某程度上認同這種說法，然而，總地來說我的判斷是——實際上國粹派憑一己之力也沒有那麼大影響，而傳統左派的統戰成功，歸根結底是因為國家主義的巨大誘惑。但這並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

⁵⁸ 夏淞，〈中大學生會的發展〉，收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編，《中大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學術部，1973），頁 106。

⁵⁹ 劉山青，〈七〇年—七八年：投身政治運動〉，《無悔的征途》（香港：明窗，1992），頁 60。

⁶⁰ 羅永生，〈邁向具體主體性的本土性〉，《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2014），頁 14-30。

——對第三世界經歷過戰爭、帝國主義侵略、殖民治理、冷戰、內戰、分斷體制的人民來說，渴望著尋求一個穩固的民族國家作為其歸屬其實是一普遍現象。而到底反帝反殖如何才可以不和國族主義及國家主義綑綁，是一個至今依然難以回答的問題吧？

綜合來看，托派和社會派在與國粹派鬥爭時，其實也沒有給予行動以外、比較溫和的路線建議，他們在這場鬥爭中的失敗也需要被「帶著建議性」地批判對待。儘管托派和社會派對國粹派有很多概念性的批判，但當他們鼓勵人們行動時，也只是在概念上說明群眾行動為何跟溫和的「團結群眾」路線是相通的。但是，托派和社會派並沒有著力回應一般學生和民眾對行動風險的實際憂慮，到最後學運走向下坡，也並非只是國粹派單方促成的。除此以外，托派和社會派也沒有重視回應「死流」中的無力感，而總是把一切不願行動的行為說成是負面的——譬如「革命安全論」和「怕死」，這變相推開了不能行動但支持他們的潛在朋友，終導致了國粹派變成唯一可以回應「死流」這一市場需求的政治派別，遂成為主流。進入 1974 年，國粹派積極團結到大部份同學。我們可以在黎廷瑤的〈洪流中的一點浪花〉看到這種轉向：

那時參加反貪污運動，兩度參加摩士公園的非法示威，面對警察的強暴，自己的的確要鼓起比五一三時還大的勇氣和狂熱。但在那次摩士公園的雨中有遊行裏，雨點卻把這份狂熱慢慢冷卻下來，為什麼要這樣？有什麼意義呢？什麼事長遠的目標？這樣可以達到長遠的目標嗎？這些問題使我又迷惘起來了。

反貪污以後，學生運動的一點進步就是能較理智地在每一個行動上考慮上面這些問題，有更確定的答案……

這一年學生對學生運動的問題，發生了很大的論爭，自己沒有積極參與進去，因為不同的意見在自己的腦子裏左衝右突，思想始終搞不通，所以不願意隨便下結論。但，目睹資展，社訪等運動的成就，目睹數以千計的大中學生參與運動那種熱情，想自己以往參與學運種種態度上的錯誤……開始感到：有事就攬，攬得愈有聲有色愈好，出發點是為了個人的心理滿足，而不是為了大多數，沒有原則和目標的那種人，只是學生運動的阻礙，他們在歷史發展上一定不會發揮積極作用，最後也只會被歷史洪流淹沒。⁶¹（黑體為筆者所加）

⁶¹ 黎廷瑤，〈洪流中的一點浪花〉，收入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編，《中大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84〔1975〕），頁 25。

雖然說黎廷瑤並不是國粹派，但這篇文章卻還是寫出了在托派和社會派等行動導向下的困惑。而國粹派提倡的「實用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拯救」了在運動中感到失落的「死流」，讓青年覺得好像還有事可做；反倒是托派和社會派的失敗，除了可以被歸咎成是總體的殖民地政治條件的不允許造成了「死流」，也是因為他們只採取否定的方法（譬如責備、嘲諷）去應對，而不是細細地疏導「死流」。

總結「流」的討論，行動上比較保守的國粹派成為多數派，至少是由以下因素所造成的。一是小的、「茶杯裡的風波」的社運場景內因——也就是說國粹派耍了扣蘇修帽子的手段、成功抹黑社會派及托派，並最後「勝出」。而是更大的本地政治脈絡因素——即六七暴動遺留下來的「暴動恐懼」一直盤旋在香港的上空、殖民治理的封閉性也使得社會運動的成果有限，造成了「死流」的根深蒂固、源遠流長，於是，行動上一直以來就趨向保守，情感和思想上又趨向民族主義路線的社會菁英大學生就藉著成為國粹派，以「統一」、「認中」、「愛國反霸」、「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為藉口去迴避掉直接發動抗爭的成本。三是「正面」的國族主義情感因素——也就是國家主義對被殖民者所允諾的歸屬是一巨大誘惑，但也是巨大的安撫。四是來自本地傳統左派的統戰因素——也就使得中共的「長期利用，充分打算」對港方針是和面向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族主義被完全綑綁銷售。

7-6 小結

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完結了，卻留下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特別是反殖和統運路線之間是矛盾或可以融合的問題，一直懸在參與第一波保釣運動的本地青年心中。在保釣運動後的反貪污運動中，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公開決裂，可以被理解成是反殖和統運路線融合的困難——因為統運路線已經被「長期利用、充分打算」收編。而兩派無論在運動策略以至對中國的態度上的意見分歧所導致的紛爭，將在後續的火紅年代中一直重演。

初成立獨立組織的年輕托派透過與傾向於行動的「社會派」學生合力推動的反貪污運動，是托派第一次在香港社會運動中露面。但這次露面觸動了國粹派敏感的神經，也使得托派、社會派與國粹派的關係日漸緊張。隨著學聯 1973 年 10 月的第一屆「中國周」活動開幕，反貪污運動也悄然落幕了。運動界又恢復到「死流」的狀態。不一樣的是，這次的「死流」將要徐徐匯入「認識中國」運動，算是力保了一點運動的元氣，也使得國粹派成為學生運動界的主流。然而，這股保留下來的元氣，除了對運動中的個人有意義以

外，到底對本地政治起到什麼積極的作用？1974 年，社會派、托派與無政府主義者將另闢戰場，發動反加價運動，而這也激發了毛托之間的大亂鬥。

八、「無關痛癢」的 1974：「毛托相爭」與港英的「漁人得利」

呂大樂曾經在〈無關痛癢的 1974〉中提到，香港社會的學術及普及論述，往往會跳過 1967 到 1974 年這段時間，然後「鏡頭一轉」地描寫 1974 年的麥理浩功績（特別是 1974 年「廉政公署」的成立），以此推論香港人身份認同與「殖民有功」有關。¹也就是說，1974 年的關鍵字總在後來被說成是「殖民政府懷柔政策—社會大眾」。但是呂大樂指出，當時的香港市民其實並沒有對殖民政策的懷柔政策立刻買單，站在 1974 年的上空，實在無法幻想人們會在日後對麥理浩留戀，更不要說會有「殖民有功論」的出現。因此，「香港人身份認同與殖民有功論有關」這套敘事必須被歷史化地理解、被重新理解。我強調要重新審視「殖民有功論」與「香港人」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並非出於抽象的、理念上的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希望透過更仔細地拆解殖民政府成功收買人心的經過，讓對殖民主義的功過評判可以有基於事實的判準，這也讓看起來一板一眼的敘事得以自行顯示自身所掩蓋的歷史——在 1974 年這個「無關痛癢」的年份，「社會運動」到底佔據了一個怎樣的位置？我將會用反加價運動去試探探問。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石油輸出國組織為了打擊對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佈石油禁運，暫停出口，造成原油價格暴漲。工業生產成本大大提高，連帶造成市場需求萎縮、經濟衰退、最終引發了戰后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一次經濟危機。1974 年，香港明顯感覺到來自發達國家的工廠訂單減少，由於香港經濟依賴出口工業，出口疲弱就導致眾多工人面臨減產停工及失業。通過民間的數據估計（因為官方並沒有公佈失業數字），1974 年香港有 10 萬工人處於半失業狀態，²多所工廠倒閉。³同時，社會也

¹ 呂大樂，〈無關痛癢的 1974〉，《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 13-20。

² 這個半失業數字，是陳以衍推斷的。由於港英政府當年沒有公佈總體的失業數字，當時總體失業人數到底是多少有不同說法。1974 年 9 月，學聯曾根據政府公佈的製造業人數的減少百分比，推斷單是製造業就有 3 萬人失業。此外，學聯也曾根據中華廠商會的調查指出 1974 年工人人數比 1973 年少 10%，結合 1971 和 1976 年工人人數為 81 萬及 98 萬來估算，1974 年單樹工人失業人數就有大約 8 萬到 9 萬人。此外，孫麗鶯、劉蜀永認為，到了 1975 年上半年估計全失業人數有 20 萬人。陳以衍的推斷，參見本刊通訊員，〈反物價高漲行動初步展開〉，《學聯報》，1974 年 4 月，版 7；學聯對製造業失業人數的推測，參見本刊評論員，〈要深入失業問題的根源〉，《學聯報》，1974 年 9 月、10 月，版 1；1971 年及 1976 年工人人數，參見呂大樂，〈無關痛癢的 1974〉，頁 19；關於 20 萬人失業的推斷，參見孫麗鶯、劉蜀永，〈戰後商業的發展〉，收入劉蜀永編，《20 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2004），頁 250-52。

³ 關於有多少工廠倒閉，學聯的報導是 500 所，陳以衍的推斷是 2,000 多所。學聯的報導，參見本刊評論員，〈要深入失業問題的根源〉，版 1；陳以衍的推斷，參見本刊通訊員，〈反物價高漲行動初步展開〉，版 7。

出現嚴重通脹，基層市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我們可以從甲類消費品物價指數⁴從 1972 到 1974 年的升幅看到通脹問題之劇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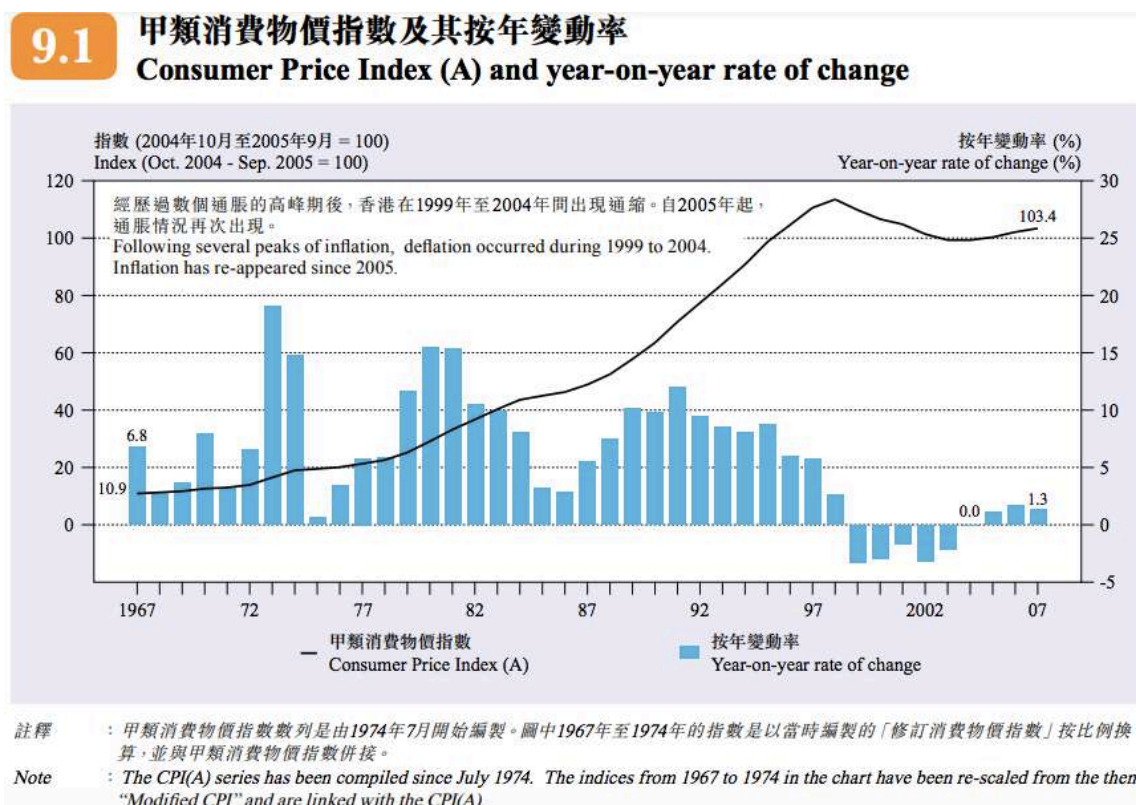


表 2：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及其按年變動率（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消費物價指數組⁵）。

這樣一種賺不到錢、物價上漲、錢不夠花的社會困境也反映在流行曲上，譬如許冠傑的〈半斤八兩〉唱到：「出咗半斤力／想話攞番足八兩／家陣惡搵食／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⁶——吃力做工得來的薪水無法糊口，社會上的潛在不滿可想而知。

面對這樣的社會困境，火紅年代的青年在 1974 年做了不同程度的回應：最激烈的莫過於由托派與無政府主義者推動的「反加價運動」。他們舉出反資反殖的旗幟，認為政府有責任平抑物價，更不應該在通脹期間加水費、電費等，並舉辦了集會及絕食等行動。

⁴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是政府統計處根據低開支範圍的住戶所編制的指數，反映了物價轉變對低支出住戶的影響。

⁵ 《香港的發展（1967-2007）——統計圖表集》（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頁 62。

⁶ 翻譯如下：出了半斤的力，想要獲得八兩的成果，但現在餬口艱難，哪裡有半斤可以換八兩那麼理想的事呢？

反加價運動又名「四反運動」⁷或「四不交運動」⁸。「四反」即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四不交」即不交租，不交電話費，不交水費，不交電費。雖然托派與無政府主義兩派在反加價運動中的原則皆為「四反」；但是無政府主義者更鼓勵「四不交」及「佔領工廠」等直接行動模式，並拒絕任何可能出現的談判。這也是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在反加價運動中最明顯的差別。「四反」運動和四不交運動兩個不同的命名，背後顯示的是以托派還是以《70》的無政府主義派的觀點去總結這個運動。在此論文中，我將採用「反加價運動」一詞。

然而，這些行動不但沒有成功引起社會的廣泛支持，反而隨後引發了校內國粹派和校外本地左派的抨擊。在抨擊當中，托派更被特別針對，從校內到校外都掀起一輪「批托」熱潮。另一邊廂，港英政府卻在悄悄修復民心失地——民生政策與「繁榮穩定論」再度雙重夾擊，間接和直接地撲滅火紅年代一切可能燎原的星火，以求收買人心。

在這一章，我將首先講述在反對通脹下，各個派別的回應方法和他們之間的爭論，包括了社會派、國粹派、無政府主義派和托派，同時爬梳反加價運動的發展。然後，我將稍微岔開一點，去討論本地毛派對托派的針對背後所隱含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創傷。而當這小小的運動貌似在「內鬥」中消亡，我將把整個運動重新放置在更大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分析，以了解 1974 年運動的爆發和失敗背後諸多複雜的原因。1974 年反加價運動反映了 1974 年惡劣的社會環境，以及一部份火紅年代青年的抗爭性，但抗爭不被社會正面回應卻也反映了社會的犬儒和人們對總體經濟環境的信心，而國粹派的「不行動」也與犬儒之間有著曖昧的關係。最後，在抗爭以外的各派之間的爭論，則反映了火紅年代青年的內部矛盾。換句話來說，火紅年代其實是被內外夾擊的。

8-1 回應通脹的兩條路線

火紅年代中的 1974 年，已經正式分化出校內的國粹派、社會派，以及校外的無政府主義派、托派。在回應此時的通脹及失業問題時，不同派別就有不同的提倡。以下，我將檢視推動行動和抗爭的一邊——也就是無政府主義派和托派——是如何發起反加價運

⁷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969-1981*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Essex,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18), 184.

⁸ 70 戰綫，〈為何要把「四不交」運動進行到底〉，《70 年代週刊》18 期（1974），頁 2。

動。反加價運動是 1974 年 3 月開始到 1974 年 9 月結束的一輪反對通脹的抗爭。1974 年 3 月開始，托派的《戰訊》及《十月評論》和無政府主義傾向的《70》及相關組織，開始鼓勵社會以抗爭的方法去回應通脹問題，這就衝破了社會只對通脹問題流於關注和評論的狀態——此為反加價運動的先聲。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及殖民主義是通脹的罪魁禍首，因此要抗議資本家及港英殖民政府。他們的主要訴求是希望港英殖民政府以不同手段出手抑制物價，及推出保障制度或民生措施。⁹隨後，他們也發動集會、絕食等抗議行動，而校內社會派也努力動員學生參與。

另一邊廂，此時掌管了學聯主導權的國粹派雖然也反對通脹和加價，卻不贊同抗議示威等行動，只願意搞論壇、講座、社區探訪和壁報版等溫和活動，這使社會派和國粹派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其實在之前的章節，我們已經看到 1973 年反貪污運動中，國粹派對行動的態度非常怠慢；不過，怠慢歸怠慢，國粹派一開始依然是 13 個反貪污團體中的一員，只是在運動後期退出而已。但是，在 1974 年反加價運動中，我們將看到行動和不行動的主張在一開始就已經明顯分化成兩派。而國粹派所領導的學聯更是有意識地把自己從行動的可能中隔離開來；國粹派直到反加價運動結束，都沒有參與組織任何公開抗爭行動。

8-1-1 無政府主義與托派的激進：鼓勵抗爭

在之前的章節，我們見證了無政府主義傾向的《70》如何從紅黑並舉走到紅黑分裂；從他們分道揚鑣到反加價運動開始，他們也各自經歷了不少組織上的變動。由無政府主義傾向者組成的《70》，在 1973 年依然陷入赤字問題導致長期脫期，此外他們在人手上也非常短缺。根據當時的《70》成員阮志雄回憶，1973 年《70》的聲勢已經大不如前，他說：「其實我上《70》的時候，應該有十個八個〔人〕，但比較經常上去的是五、六個罷，大家已經沒有什麼認真的政治討論。」¹⁰不過，即便在這個艱難的情況下，留下來的人依然有開展新的計畫。譬如，1973 年上半年開始，《70》的一些成員出版了《年青工人》；1973 年 11 月，《70 年代雙週刊》復刊，並改名為《70 年代週刊》——這本週刊份量較薄，文章數量較少，文章篇幅較短，而且比較少探討抽象的理論，但是每週出版，和《年青工人》皆是免費派發。也就是說，進入 1973 年，《70》本來的成員有了新的名

⁹ 70 戰綫，〈有誰能作我們的談判代表？〉，《70 年代週刊》18 期（1974），頁 2。

¹⁰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 年 6 月 26 日。

目和面貌來參與運動：他們以《70年代週刊》及《年青工人》的平台去發表對通脹的抗議，而行動時的組織名義則是「70戰綫」。至於托派，組織的狀況是漸入佳境的：《戰訊》與《十月評論》兩派托派在反加價運動中進行了合作，譬如，《十月評論》刊登了吳仲賢的反加價文章，這表示兩派托派的分裂在運動中有所消弭；及後，兩派托派在運動中完成合併，成立了「社會主義同盟」。

《70》成員所編的《年青工人》是最先以鼓勵抗爭的方式去反對通脹的，我們可以將其看作反加價運動的起源。1974年3月，《年青工人》發表傳單討論通脹問題，當中收錄了五篇文章，包括〈我們要生活，我們就要站起來！！〉¹¹、〈工資與物價的比較〉¹²、〈在繁榮安定以外的工人〉¹³、〈生活的壓迫！物價、失業的災難〉¹⁴及〈物價高漲與工人失業〉¹⁵。看文章標題，我們大概就可以感受到這份刊物的行動傾向。而從文章內容中，我們就更可以看到這些無政府主義傾向者對通脹的分析和取態。在〈我們要生活，我們就要站起來！！〉中，作者凌雁認為，通脹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導致的，但殖民地政府和資本家也應該被究責——因為他們沒有保障香港工人，反而是「扼殺香港工人」；及後，文章提到英國煤礦工人的罷工何以使得英國保守黨垮台，英國工人如何在已經有失業保險金的前提下依然提出加薪的訴求，以及英國、義大利、日本、美國、法國、印度等地的工人如何進行反對物價高漲和要求加薪的罷工和行動；最後，文章以煽動抗爭的口吻說：

他們恐懼工人的組織力量，因為他們知道工人組織起來以後，就會爭取工人應有的權利，他們再不能為所欲為地去剝削工人，而工人決不是弱者！……我們工人的缺應該明瞭我們並不是弱者，只要我們能夠組織起來，建立一支龐大的工人大

¹¹ 凌雁，〈我們要生活，我們就要站起來！！〉，[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¹² 禾草，〈工資與物價的比較〉，[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¹³ 黑兵，〈在繁榮安定以外的工人〉，[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¹⁴ 片木，〈生活的壓迫！物價、失業的災難〉，[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starts/1/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starts/1/dates/[1974-03]/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¹⁵ 方德生，〈物價高漲與工人失業〉，[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starts/1/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8/volumes//starts/1/dates/[1974-03]/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軍，我們的權利就可以爭取回來，爭取其他地區的工人早已得到的權利。殖民地政府和資本家亦不能再扼殺我們！¹⁶（黑體為筆者所加）

由此可見，《70》不只是討論通脹問題，而是鼓勵行動、鼓勵組織，這篇文章也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反加價運動的先聲。

1974年3月25日，兩派托派不甘示弱地出版了《十月評論》「反加價專輯」。雖然第一期的《十月評論》是由IYSA自出版的，顯示了托派依然分裂為革命國際主義同盟和IYSA兩派。但3月25日的這一本《十月評論》，則由兩個組織共同出版，象徵著托派在反加價運動中正朝向合併的方向。¹⁷在兩派合辦的專輯中，就有三篇文章直接鼓動群眾發起反加價抗爭，包括〈反加價鬥爭應該開始了〉¹⁸、〈高舉起反加價的旗幟〉¹⁹、〈經濟危機工潮、香港工人〉²⁰。

從這些文章的標中，我們可以《十月評論》看到和《年青工人》一樣具備鼓勵行動的煽動的特性。而托派與無政府主義派對通脹的分析也是相似的：認為通脹是世界性經濟危機的症狀，香港的物價上漲比世界總體通脹嚴重是因為政府並沒有著手管制物價。不過，相比起《年青工人》的無政府主義傾向者，托派在鼓勵行動時還有三個特色。透過閱讀《十月評論》的這些文章，我們可以發現，第一，他們組織了專門委員會去推進運動，譬如〈反加價鬥爭應該開始了〉就是以「全港反加價行動委員會」的名義發佈。²¹根據吳仲賢的說法，這個委員會由托派中的「兩個組織和最親密的同情份子」共同設立。²²第二，他們宣佈了三項具體訴求，包括（一）立刻凍結物價，（二）根據急劇上升的生活指數規定每月最低薪金900元，每日最低薪金20元，假期全薪病調整薪酬，及（三）

¹⁶ 凌雁，〈我們要生活，我們就要站起來！！〉，[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8A/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8A/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年6月1日）。

¹⁷ 吳仲賢一篇在1997年發表但沒有標明寫作年份的文章——但根據上文下理推斷應該是1974年寫作——提到過，兩個托派團體之間的許多矛盾（主要是自《70》分裂事件所累積的人事矛盾）自1973年12月到1974年2月期間已經透過聯席會議消解了，從此以後兩個團體已經朝向合併的方向進發，而當中具體標誌著合併的事實包括了兩派舉辦共同的內部學習班、共同發展反加價運動工作計劃，以及共同出版兩期（包括「反加價專輯」）的《十月評論》，吳仲賢甚至總結這個共同出版的工作經驗「合作得十分愉快」。參見吳仲賢，〈群眾組織的神話〉，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頁214-17。

¹⁸ 全港反加價行動委員會，〈反加價鬥爭應該開始了〉，《十月評論》3月25日（1974），頁2。

¹⁹ 毛蘭友，〈高舉起反加價的旗幟〉，《十月評論》3月25日（1974），頁3。

²⁰ 陳勝，〈經濟危機工潮、香港工人〉，《十月評論》3月25日（1974），頁4-5。

²¹ 全港反加價行動委員會，〈反加價鬥爭應該開始了〉，頁2。

²² 吳仲賢，〈群眾組織的神話〉，頁214-17。

立刻設立事業福利金。²³也就是說，相比《年青工人》的無政府主義傾向者，他們在反對加價時，不只提出行動的方向，更有具體的倡議。第三，托派的文章也對目前已有的工會提出了批判和意見，也就是對本來的工運版圖有了更尖銳的介入。譬如，作者陳勝這樣評論已有的工會：

面對當前危難之局，工人的傳統領導做了什麼呢？右派工會固然早已叛賣工人利益，而所謂左派工會，對工人階級的困難處境也熟視無關。他們正在搞認識祖國、愛祖國、用國貨等工作，對實際的階級鬥爭，早已忘記了。試問工人群眾連工都沒有了，那有錢來買國貨呢？²⁴

從這段引文，我們可以明確看到，裡面提到的「左派工會」就是六七暴動後轉向低調的工聯會。可見當托派在發起反加價運動時，對本地的政治與運動脈絡有更多的針對性，也對工運界別中既有的左右派都做出了評論。

不過，雖然托派對工聯會的批評是嚴厲的，但在結論時，文章還是鼓勵有工會的工人先去「向工會提出，向一切會友提出研究」，而沒有工會的才應該「按照各行業單位」、「各生產單位」組織起來。和《年青工人》鼓勵工人自發組織比起來，托派就比較跟隨工會工運的傳統。

接著，《70》成員也如托派一樣提出了比較具體的訴求。1974年5月的《70年代週刊》發表了標題為〈我們要活下去，就要鬥爭，但決不乞憐〉的聲明。聲明中有三個具體訴求，包括（一）凍結物價，遏止加價風氣；（二）設立失業保證金，以維持基本生活；（三），調回全部儲備金用以建設民生。這篇聲明也是以「70戰綫反失業·反加價臨時行委會」的名義發表的——可見《70》也為了推進反加價抗爭而成立了專屬的運動小組。²⁵新一輪反加價抗爭正如箭在弦。

²³ 全港反加價行動委員會，〈反加價鬥爭應該開始了〉，頁2。

²⁴ 陳勝，〈經濟危機工潮·香港工人〉，頁5。

²⁵ 70戰綫反失業·反加價臨時行委會，〈我們要活下去，就要鬥爭，但決不乞憐〉，《70年代週刊》12期（1974），頁1。

8-1-2 大專院校界的溫和：反物價通脹論壇及「探訪資展」

在另一邊廂的大專院校界，又怎麼回應通脹呢？1974年3月17日，學聯舉行了第17屆職員交職禮。曾經在保釣運動中積極支持統一路線並後來反對學聯參與反貪污運動的國粹派代表人物陳毓祥成為學聯主席，象徵著國粹派成為大專院校界的多數派，也佔據了學界最高代表的位置。在就職典禮中，陳毓祥宣佈學聯對學運的宗旨為「關心社會，認識中國」，陳毓祥對此宗旨的演繹是，這代表學界除了要延續自保釣後統一路線下的「認識祖國」及反對「侵略和干預中國主權的行為」以外，也要做到「關心社會」。而大學生為什麼要關心社會呢？陳毓祥說：

香港的大專學生，在社會裡是個**特權階級**。因此，如果我們抱有改革社會的熱誠，我們必須**摒棄個人利益，走到社會中去**，與廣大市民在一起，關心他們的問題，爭取他們應得的權益而共同奮鬥。²⁶（黑體為筆者所加）

陳毓祥的這一段講話讀起來甚為官腔，大概思路是首先以唯階級論的角度，認為大學生作為天之驕子在階級上是「特權階級」，所以大學生不應該為自己的階級打拼，在爭取權益時必須以「廣大市民」權益為依歸；但在此之前必須透過「走到社會中去」來達到個人的改造——也就是「摒棄個人利益」。這某程度上也跟隨了中共對知識份子一向的判定——認為知識份子落後於社會大眾的。而以大學生作為組織主體的學聯，首先對自我的認定就是沒有恰當的階級條件去發動一個進步的運動——除非大學生可以先「摒棄個人利益」。這雖然一方面展現了以陳毓祥為代表的大學生對自身既得利益的深切反思，但同時顯示出一些理論問題——以此理論必定會造成行動上的困境。首先，怎樣才算做到「摒棄個人利益」呢？如果說身為大學生本身就必然是「特權階級」，那就是說，只有輟學才能證成自己不是「特權階級」。也就是說，學聯已經給自己挖了一個坑，讓自己陷入無論如何都是兩難的局面。如果說，作為大學生是一個原罪，那麼大學生在不放棄「特權階級」身份的前提下（也就是不輟學的前提下），無論是發起任何爭取社會改革的先鋒行為，還是等待群眾或滯後於群眾運動，兩者都可以被拗成是沒有「摒棄個人利益」的「特權階級」所為——只不過，先鋒行為顯示了「特權階級」的莽撞，而等待群眾則顯示了「特權階級」的傲慢。此外，怎樣才算成功的「走到社會中去」呢？這幾乎是沒有判

²⁶ 陳毓祥，〈會長陳毓祥同學講話〉，《學聯報》，1974年4月，版9。

準的。而我們也將在後文看到這引發了國粹派和其他派別之間的矛盾——譬如，國粹派認為社會派沒有融入群眾和跟隨群眾的節奏，只想著往前衝，還認為自己在行動上的被動才叫「走到社會中去」；社會派則認為國粹派的不行動正是沒有「走到社會中去」的表現，托派甚至說國粹派是「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²⁷不同派別對同一個表現會有如此相矛盾的判斷，則是因為在其理論和立場的指導下，各自看到不一樣的現實。

不過，即便論國粹派一上任就預告了自己的不行動，由於「關心社會」還是學聯的宗旨之一，所以關注物價上漲也被列為學聯未來的工作項目——只是不是以抗爭的方法來做。²⁸學聯在3月17日舉辦交職禮後，隨即於3月18日在九龍安素堂舉辦反物價高漲公開論壇，並邀請了浸會講師劉佩琮、《揭露》編輯陳以衍及本地華人菁英馬文輝出席。此論壇最後共有四百人參加。²⁹3月25日（也就是《十月評論》提出訴求的同日），學聯也發表聲明，提出四項要求，包括（一）嚴厲管制物價，以公款津貼必需品的經營及於漲風繼續惡化時凍結物價；（二）調回儲備金，用以建設民生，穩定物價；（三）用直接累進稅以平均社會財富，不應對民生及重要的稅項帶頭提高；（四）加強社會福利，訂定最低薪金標準及設立失業福利金。³⁰4月17日，中大學生會及浸會學生會也舉辦了類似的論壇。³¹港大時事委員會也製作壁報及印發特刊，以回應通貨膨脹問題及政府財政預算案。³²學界各團體都在努力擴大反加價行動，然而由於大學生當時「都忙於應付考試」，而且國粹派認為這些活動「對於身為特權階級的大學生只是湖面漣漪」，擴大行動並不樂觀。³³

5月開始，學聯發動一連串社區探訪活動。對於這一輪活動，作為國粹派的陳毓祥就曾以個人名義在左派傾向的刊物《七十年代》發表自己對這些活動的見解，他認為「過

²⁷ 國粹派提到：「由於市民不支『托派』，學生會也堅決抵制了他們，於是托派便惡毒攻擊我們，說我們只搞『認識』，不搞『參與』，不支持市民大眾，說學生是『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學聯搞論壇，『托派』份子居然傾巢而出，要控制會場發言，甚至和大會主席『搶咪』！」不過，由於國粹派經常把社會派或無政府主義者錯認是托派的傾向，到底托派是否真的說國粹派是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是需要打上問號的。但在這裡依然引用這一點，是想要表示國粹派及其反對派之間的互相指罵，很多時都採用類似語言——互指對方不夠親近群眾、不夠左，這終究是因為對於何謂左及何謂正確的群眾關係有不一樣的判斷。上述引文見港大學生會通訊，〈托派如何插手學生運動〉，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5〕），頁96-97。

²⁸ 陳毓祥，〈會長陳毓祥同學講話〉，版9。

²⁹ 本刊通訊員，〈反物價高漲行動初步展開〉，版7。

³⁰ 本刊通訊員，〈反物價高漲行動初步展開〉，版7。

³¹ 本刊評論員，〈香港通貨膨脹的實質〉，《學聯報》，1974年5月，版1。

³² 本刊通訊員思寧，〈港大同學反加價行動的開展〉，《學聯報》，1974年4月，版15。

³³ 本刊通訊員思寧，〈港大同學反加價行動的開展〉，版15。

去學運常犯一個毛病，同學往往由理論到理論，欠缺社會實踐，因而影響我們對社會實況的掌握」，因此，「學生應該透過這種訪貧問苦運動，加強對勞苦大眾的思想感情，培養謙虛、謹慎、眼睛向下的良好工作作風」，並可以「逐步洗脫知識份子長期脫離社會實踐的陋習，消除知識份子的優越感」。³⁴如果單從字面看來，陳毓祥這樣說其實並無什麼不妥。

於是，6月25至7月21日，訪貧問苦計畫展開了。學生先後去了探訪油塘小販、倉碼工人、荃灣工人、大澳漁民和塘瓷工人，去了工場、徙置區、木屋區等地方，參加同學共達750人，部份是中學生。³⁵7月27到31日期間，學聯把社區探訪的成果做成「通貨膨脹資料展覽」在理工學院展出，展覽效果不俗，吸引了6,000人（中學生佔一半以上）前往觀看。³⁶從展覽的結構和內容，我們可以更理解學聯對通脹問題的分析——展覽分成「世界」、「中國」和「香港」三個部份，展覽的論述重點主要是回應一些把物價上漲歸咎石油產出國、把香港物價上漲（譬如大米）歸咎中國大陸的論述。³⁷展覽首先指出通貨膨脹是美蘇冷戰下第三世界常有的現象，石油危機不是根本原因，而第三世界國家為了減低過去被「超級大國剝削」，因此才需要把石油、原料、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價格提高；接著，提出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政府與財團勾結，所以才會有高地價、高租值、高稅收等問題；反觀中國大陸，因為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雖然物質生活落後，但物價基本穩定，而且「自力更生，自給自足」，「不受世界性通脹影響」；最後認為通脹是港英政府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問題，反通脹就要反港英、反資本主義及反對美蘇霸權；結論則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便是香港將來的出路」。³⁸由此可見，被國粹派把持的學聯對通貨膨脹的立場和托派及無政府主義派是有相似的：即認為資本主義和港英殖民政府需要為香港的通脹問題負責。

國粹派和托派、無政府主義派之間的細微差別在於，第一，國粹派在展覽中特別加入了中國是否導致香港通脹的部份，以中國物價相對穩定去對比香港的通脹以凸顯社會主義中國的優勢，這是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不會做的；第二，他們會在論述上運用第三

³⁴ 陳毓祥，〈物價問題與學運發展〉，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4〕），頁84-86。

³⁵ 學苑，〈到教室外的大課堂區〉，《學苑》，1974年年8月1日，版13。

³⁶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通貨膨脹資料展覽〉，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4〕），頁85-87。

³⁷ 陸新，〈探訪資展是正路——關於認識通貨膨脹運動的討論〉，《中大學生報》，1974年9月1日，版11。

³⁸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通貨膨脹資料展覽〉，頁85-87。

世界理論，認為石油輸出國加價是迫於無奈，並對第三世界國家提高初級產品價格採取比較認同及同情的態度，這也是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沒有提及的角度；第三，國粹派在結論加入了支持中共、反對美蘇霸權一項。

單從表面論點來看，這些都並無不妥，他們對通脹問題的分析其實也彌補了托派及無政府主義派的一些宏觀視野上的盲點——譬如對第三世界的敏感度是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在做反加價運動論述時不具備的。然而，當國粹派的論點融合到反加價的實際操作上，卻有了很大問題——由於國粹派的國族認同、左翼政治認同及三世界認同，完全濃縮成跟隨社會主義中國並服膺於中共的統一和回歸的大計。這意味著，國粹派認為為了方便中共利用香港反美蘇兩霸及穩固其社會主義，因此反對香港出現自下而上的、直接的反殖抗爭，甚至反對香港的行動者直接推動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陳毓祥自己的文章也呼應了這點，他說：「香港問題與中國、與世界一環扣一環，不可分割……今天，國際形勢的特點就是反對霸權主義，香港問題便是要服從整個世界形勢的主流。」³⁹也就是說，雖然國粹派的展覽中一些基本分析和托派及無政府主義一致，但到最後引向的行動方向是不一樣的，主要的分歧點在於認同社會主義是否就要認同中共的治港方針，於是國粹派跟托派、無政府主義的行動方向操作起來幾乎是相反的。於是，在論述上，國粹派理解的「關心社會」實際上是要服膺於中共的「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對港方針——這也使得社會派與國粹派之間進一步交惡。

8-2 展覽宣傳 vs. 抗議行動：國粹派與社會派的交惡

在國粹派搞展覽宣傳的時候，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正逐步升級反加價運動。1974年5月有維園的反加價集會（又稱雙反集會）；9月12日有青年在新蒲崗工業區絕食抗議；9月15日有九龍公園的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四反」集會（此遊行本來是打算在摩士舉行的，後來才改成了九龍公園）。

由於反加價運動發起時，被國粹派主導的學聯並沒有加入，這使得校內的社會派相當不滿。一直以來，學聯都是掌握最多群眾及資源的學生組織，而他們不願意參加反加價集會的做法，無疑使得先前保釣運動的升級公式不能被複製。心急的社會派於是對國粹派的展覽發動攻擊。

³⁹ 陳毓祥，〈物價問題與學運發展〉，頁86。

8-2-1 國粹派展覽展外的「傳單風波」

5月5日，托派在維園舉辦反加價集會，此集會又名「雙反集會」，也就是反加價、反失業，⁴⁰《70》的人也有參與——但根據托派歷史研究學者 Yang Yang 的考掘，當時的報章沒有提到舉辦單位；這場集會吸引到千人參加。⁴¹而且在這次示威後，大部份 RIL 及 IYSA 的成員終於合併成社會主義同盟（Socialist League, SL），並且出版《戰訊》。社會主義同盟也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Revolutionary Marxist League, RML）的前身。⁴²

另一邊廂，學聯內部對於對這次集會應該持什麼態度、是否該加入等問題發生了爭論：作為學聯多數派的國粹派認為不應該和托派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但作為學聯少數派的社會派則強調學聯作為一個組織沒有任何既定政治立場，因此可以和任何團體合作，只要大家的目標都是反通脹即可——最後，學聯參與維園集會的動議被否決。⁴³這次國粹派和社會派之間的爭論點，其實就是 1973 年反貪污運動的翻版——國粹派認為不應該在這些問題上上升到行動的層次，社會派則認為要行動起來；不一樣的是，1973 年反貪污運動中的辯論依然是關於理念和路線上的辯論，但此時國粹派對社會派的路線不滿，已經被濃縮及轉移成「不應該和托派有任何形式的合作」。社會派的建議最終被國粹派打回，最重要的原因已經不是不同意社會派對社會脈絡和運動情勢的判斷，而是認為社會派不該與托派作伍。

由於托派宣佈搞集會時，國粹派都在忙著搞社區探訪和展覽，又拒絕參加集會，社會派和托派當然知道這是一種對自身政治的間接和直接的孤立。因此，7月27到31日期間，社會派與跟托派關係比較親近的「進步青年社」（簡稱進青社）、「揭露」在展覽場地外以「發傳單」的方式反對展覽。⁴⁴而這次「傳單事件」終於以完全公開化的方法暴露了社會派、托派與國粹派之間的矛盾。

⁴⁰ 呂大樂，〈無關痛癢的 1974〉，頁 24。

⁴¹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969-1981*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Essex,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18), 191.

⁴² 吳仲賢，〈群眾組織的神話〉，頁 217。

⁴³ 星河，〈香港托派與青年學生運動〉，收入香港大學學生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1978〔1975〕），頁 199。

⁴⁴ 吳仲賢，〈對香港毛派路線的批判〉，《學苑》，1974 年 9 月 1 日，版 16。

派發傳單的進青社、揭露與社會派認為，行動比展覽更有意義，而展覽是「拖學運的後腿」、「展覽工人的眼淚」。⁴⁵傳單更稱學聯為「學生官僚」、「文化貴族」。⁴⁶也就是說，國粹派本來認為，自己去訪貧問苦而不是當社會運動先鋒，是一種刻意的對社會運動的滯後、是為了因應群眾還沒準備好——用陳毓祥的話來說，這是一次「社會實踐」——然而，學聯這種「刻意的滯後」在社會派眼中看來，是落後於群眾、落後於學運、落後於工人的表現。

8月1日，知涯在《學苑》的〈也談「物價問題於學運發展」〉中回應了陳毓祥在《七十年代》上的文章，這可說是社會派對反加價運動的立場的代表作。作者認為學生從中運到保釣到反貪污運動，已經是從要求改良到對殖民主義失望，並且發展到「反對殖民地主義和資本主義為目標的政治性運動」的階段。然而他認為陳毓祥為首的學聯沒有貫徹學聯「改革社會」的綱領，且沒有推進「反資反殖」的具體鬥爭，而是「跳回『認識關心』的層次，對邁進最終的道路不作展望」。這篇文章接續明確地批評，學聯只把眼界放在介入同學，藉口是因為學生「連對『物價狂漲背後原因』也未清楚」，實際上是因為把香港問題看成中國革命問題的範疇之一，而害怕香港的反資反殖會脫離這個範疇，結果就是未能將「廣大被壓迫、剝削，被物價狂漲、工廠倒閉嚴重打擊的，卻又限於實力條件而不能單獨作大規模抗爭（如小巴、小販）的民眾，一起團結在『反剝削』這個綱領下」，去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文章進而批判學聯未能觸及學生的內部動力，只是重複抽象的原則，然後「拱手推辭」運動，使他「非常失望」。⁴⁷這篇透過批評陳毓祥和國粹派領導下的學聯所辦展覽的文章，重點就是認為學聯沒有配合已經動起來的群眾，更沒有趁著學運激進化的趨勢以行動的方式推動反資反殖的反加價運動。這種聲音再加上社會派等人的「傳單事件」，被國粹派看在眼裡，都成了明白的挑釁。

我們該怎麼了解國粹派對反加價運動的按兵不動呢？雖然他們說自己按兵不動是因為要讓同學更深入認識通脹和群眾，不做脫離群眾的行為，然而，這時的社會大眾已經行動起來了——由托派積極推動的5月雙反集會就是最好的證明——那國粹派又怎樣理解這個擺在眼前的事實呢？要知道，國粹派在明知道有雙反集會的前提下依然決定不參加，而選擇只搞展覽——這種對群眾行動的態度明顯不是「不知」，而是刻意「不為」。

⁴⁵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通貨膨脹資料展覽〉，頁87。

⁴⁶ 陸新，〈探訪資展是正路——關於認識通貨膨脹運動的討論〉，版11。

⁴⁷ 知涯，〈也談「物價問題與學運發展」〉，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4〕），頁87-92。

這種「不為」背後，除了因為上一節提到的理念問題（即反加價應該扣連認同中國而不是反殖），也因為他們並不認為托派代表群眾。

認為托派不代表群眾的想法及對托派的不滿，是自第一波保釣運動及 1973 年反貪污運動一路累積下來的。國粹派認為當時托派「硬要把運動引向所謂『反資反殖』，不理會同學、市民的反應，要搞遊行集會」⁴⁸。這句是引用自 1975 年發表的〈托派如何插手學生運動〉文章，從文章標題我們就可以看到，國粹派一直都認為托派是「外來」於「同學」及「外來」於抽象的「市民」，因此認為托派沒有條件去介入運動，他們的行為是「插手」。同樣地，在 1974 年反加價運動中，國粹派根本不把雙反集會看作是群眾想要行動的證據，而只是托派一味煽動的結果。

國粹派對托派的批評，也第一次「衝破」⁴⁹了小小的學生刊物的園地——7 月 28 日，《新晚報》「風華版」（也就是包奕明以前評論新左派的版面）出現了石中英的〈且剝一剝托派份子的皮〉⁵⁰一文。這是「本地左派」第一次出手批評托派，也標誌著國粹派與托派的矛盾從學生刊物擴展到報紙上的討論，「批托」進入了更廣泛的公眾視野。這篇文章對托派的抨擊主要是四點：第一，作者認為托洛茨基誇大了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功勞；第二，作者認為托洛茨基主義不承認農民的革命力量，而且反對中共的工農團結；第三，作者認為托派宣稱自 1967 年後香港工運就沉寂了是錯誤的，托派宣稱自己的介入導致了工運的復甦更是造謠；第四，作者認為托洛茨基所稱的青年向「蛻化了」的老幹部發起鬥爭，是製造老工人和青年之間的矛盾。

我們在此先不討論這篇文章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批判會否過於片面和斷章取義，也先不討論為何石中英對托派那麼多怨氣。這篇文章的四點其實都在含沙射影地透過批評托洛茨基本人去批評香港托派：托洛茨基誇大自己的功勞，對應的是認為香港托派誇大了群眾是站在自己一方，卻看不到自己其實是「硬要把運動引向所謂『反資反殖』」；托洛茨基否認工農團結，對應的是認為香港托派要破壞國粹派和市民大眾的團結；而托洛茨基製造老一輩和青年一輩之間的矛盾，對應的是香港托派要奪取香港本地工聯會這等「老工會」的地位。這篇文章批評的範圍，不只超越了托洛茨基個人的歷史，而是借題發揮

⁴⁸ 港大學生會通訊，〈托派如何插手學生運動〉，頁 94。

⁴⁹ 雖然說「衝破」一詞可能會把學運描述得與社會的距離太遠——因為當年報攤上其實可以買到學生刊物——也就是說，之前的國粹派批托論述或許早已「出圈」了。

⁵⁰ 石中英，〈且剝一剝托派份子之皮〉，<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trotsandmaos-1970s.htm#1>（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地批評本地托派插手各種運動，甚至要動搖本地傳統左派的根基。在國粹派眼中，《新晚報》這篇文章無疑象徵著香港唯一的正統左派「中共」正帶頭批托（或者說是給國粹派本來的批托行為「開綠燈」）。

8月4日，《新晚報》「風華版」繼續刊登的批托文章終於不再只是對托洛茨基本人及其思想做批判，而是批評本地托派的具體行為。石中英的〈托派對「通貨展」的拙劣表演〉一方面為國粹派辯護，另一方面認為托派在「通貨展」外散發「破壞性傳單」、甚至想「衝入〔展覽場地〕搗亂」的行為，不過是仗著自己「最革命」，又以為自己才是「工人」的化身，透過以「工人」「代言人」的名義罵學生搞訪貧問苦是「學生官僚」，實際上是「想挑起工人學生間的矛盾」、「反對工人學生之間的團結」。這篇文章無疑幫助國粹派再一次坐穩自身對托派的偏見——認為托派以及親托派的社會派根本不是「真正的工人代表」，於是就可以否認所有托派對國粹派的批評。

本地左派為國粹派辯護、把所有反對展覽的人都說成是托派的做法，雖然是不符合事實的說法——譬如《70》就用「70戰綫」的名義反駁，表示自己雖然「非托派」但也有參與運動。⁵¹然而，這無礙本地左派繼續為國粹派護航，並且把所有對國粹派的批評都說成托派所為——石中英持續在「風華版」發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學習札記〉、〈托派對中國革命的破壞〉、〈托派要的是什麼「民主」？〉、〈托派到底在「反」什麼？〉、〈蘇修霸權主義的辯護士〉、〈托派份子是新左派嗎？〉、〈托派份子的「老譜」〉等批托文章，都說明了托派被針對性攻擊，甚至成了社會派和無政府主義派的替罪羊。而後來以「七四年度幹事會」名義發表的〈托派如何插手學生運動〉，更可以發現國粹派如何複製本地左派的批托論點。這是第一次本地左派與校內國粹派聯手，這無疑也複雜化了火紅年代的場景。

8-2-2 《十月評論》如何成為石中英的批托材料

面對「傳單事件」，石中英只批評托派而不罵社會派和無政府主義派，固然是搞錯了——吳仲賢就說「毛派是錯罵了分明不是托派的『揭露』和『進青社』」⁵²。不過，為何本地左派只是針對托派呢？石中英為何會搞錯呢？

⁵¹ 70戰綫，〈為何要把「四不交」運動進行到底〉，頁2。

⁵² 吳仲賢，〈對香港毛派路線的批判〉，版16。

我認為，這一來是因為社會派只是校內的政治宗派，只面向大專學生，並不被外界廣知；二來是托派有自己的《十月評論》和《每日戰訊》，而且又面向大眾發動反加價集會，有更多材料可以被拿來批評。外部搞不清團體的派系屬性，只從對展覽的批判角度及對反資反殖集會行動的擁護立場，去推斷「傳單事件」有托派參與，也不是完全不合理的推斷。吳仲賢也在以托派身份回應「傳單事件」時說到：「無論如何，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堅決地站在『揭露』和『進青社』這一邊。」⁵³可見本地傳統左派雖然把許多非托派所為的行動都扣在托派頭上，造成社會很多誤解（這點是需要還托派一個歷史公道的），但托派的確是願意為「傳單事件」站台的。

雖然本地左派誤打誤撞地以為托派是「傳單事件」的始作俑者，這一誤讀上不能完全構成對托派的抹黑——因為托派的確同意傳單中的內容——然而，石中英對托派的許多理念上的批評，卻是建立在非脈絡化的閱讀甚至扭曲之上。事實上，這兩篇批托文章的許多素材，均來自《十月評論》早期的文章。石中英行文對托派的許多批判帶有很明顯的情感色彩，而這些情感——譬如憤怒、不忿、不甘——並不只是單一的展覽而挑起的。我們需要從托派更早期的文章去了解他們是怎麼踩到了石中英的尾巴。

自 1974 年 1 月的托派刊物《十月評論》起，黃山所寫的〈香港學生運動的性質和趨向〉就開始批評工聯會，這就批評了本地傳統左派原來的場景構造。雖然這篇經常被引用來佐證托派如何仇恨本地左派和由國粹派主導的學聯，事實上這篇文章的討論重點不是這些派系，而是為了探討 1968 年後第四國際「紅色大學」策略下香港學生運動的策略。為了更全面地評價托派，以下我將嘗試以托派的脈絡去閱讀這篇文章的重點，而非跟隨著國粹派式的「對人不對事」的閱讀方式。

首先，什麼是「紅色大學」呢？根據梁國雄的回憶，「如何迎接青年激進化餘波是第四國際的很重要的分析，當時第四國際認為要建立一個名為『紅色大學』的策略，意思就是要以大學作為根據地推進革命」。⁵⁴第四國際之所以採取這樣的策略，是因為眼看西方的大學生正進入「無產階級化」階段——畢業後的學生沒辦法向上流動，讀書也不代表生活會變得更好，因此他們自身的階級地位使得他們可以了解經濟壓迫的實況，這時就適合乘勢在大學界別推行學生運動，打造「紅色大學」。因此，這篇文章首先提到，西

⁵³ 吳仲賢，〈對香港毛派路線的批判〉，版 16。

⁵⁴ 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方大學生如何成為「引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管」。⁵⁵作者接著和第四國際的分析對話，認為這種策略並不適用於香港，因為香港大學是政府為了「培養殖民地奴才」而設立的，這使得香港大學生被給予很大的保障，畢業後「相當於這個社會中的中產階級」。而隨著對本地大學的結構性批評，作者斷定，香港的由大學生領導的學生運動是保守的，而此保守帶來了「四個後果」：（一）小部份學生雖然投入學生運動，但他們沒有真正的後盾，而且受制於其他保守學生；（二）搞學生運動的大學生只會採取「改良主義」，本著「社會良心」去搞運動，卻又總要控制運動，不願意升級抗爭，與殖民地政府「面對面地作戰」；（三）學生領袖沒有自省能力，一方面以為香港學生運動可以和法國的 1968 年和美國的 1969 年運動相比，但沒有發現自身陷於低潮，「認識中國」也「流於口號」；（四）學運由一個「官僚架構」充當運動的角色，但「官僚架構」的組織形式並不適合運動的需求，是一個「僵硬的機構」、「反應遲鈍」、「被動地應付運動」。⁵⁶

文章中所說的四個後果雖然是以一種客觀中立、白描的語言去書寫，然而我們只要套到 1971 年保釣運動及 1973 年反貪污運動中，這段話要批評的對象完全可以找到「對號入座」的對象。當中所說的「沒有真正的後盾」的「一小部份學生」指的是社會派；「保守的學生」則是不鼓勵社會派在反貪污運動中升級甚至於中途退出的國粹派；「流於口號」的「認識中國」更直指國粹派；最後所說的「官僚架構」則不是指向國粹派，而是指向一直以來學聯的結構性問題。由此可見，托派並不是完全針對國粹派做批評，而是對社會派、國粹派以至於學運組織的結構皆進行批判。我們可以從這篇文章讀出更多重點：第一，社會派雖然經常和托派站隊，但並不代表兩者是一體的，托派對社會派的一些做法，譬如「沒有真正的後盾」——也就是沒有嚴密地組織起來——是有批判的（而關於托派和社會派的更多差異，我將在下一章仔細講）；第二，國粹派與托派對學生的激進性皆存疑，這是他們的相似性，不一樣的是，國粹派認為學生本身已經是特權階級（一種死板的階級決定論），但托派則只以此預測學生運動不會成為改革社會的先鋒，並沒有要評判一切學生的先鋒行動為「特權階級」表現；第三，托派對於學聯或當時學生運動採取了批評的態度，這代表他們並不完全同意國際托派組織第四國際要擁戴學生運動的路線，他們對學運的批判反映了他們對第四國際的不服從（可見國粹派以為托派是第四國際傀儡的想法是不準確的）。

⁵⁵ 黃山，〈香港學生運動的性質和趨向〉，《十月評論》1 月 5 日期（1974），頁 12。

⁵⁶ 黃山，〈香港學生運動的性質和趨向〉，頁 12。

不過，由於國粹派自 1974 年後正式掌權，而托派又經常批評中共官僚主義，因此，托派對學聯的批評很容易被認同中共的國粹派和本地左派看成是對自己的批評。這無疑是一種去脈絡化的誤讀，完全搞錯了托派文章中對學聯的批判重點——托派對學聯的批判關乎其官僚結構。但國粹派就是以這種誤讀，覺得托派在說國粹派本身是官僚，才讓國粹派及本地傳統左派覺得自身掌握了「鐵證」證明托派單單要針對自己。或許大家都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實」吧。而由於國粹派這種覺得托派針對自己的想法，被現實中的「傳單事件」所「證實」了，托派與毛派（校外本地左派與校內國粹派）的不咬弦從此變得難以逆轉。就因為托派在反對中共和國粹派上有太多公開素材，在國粹派與社會派的內鬥中，托派再一次被當作唯一的「始作俑者」，替社會派和無政府主義派承受了最多的批判；不只如此，托派之名已經徹底成為左報理所當然的攻擊對象，也成為托派自此之後的發展都非常坎坷的一個影響因素。

8-2-3 反加價運動高潮：絕食、集會，兼論無政府主義派與托派的差異與關係

1974 年 9 月是反加價運動的另一個高峰，也讓毛托論戰以最尖銳的形式爆發。首先是托派開始宣傳 9 月 15 日的摩士公園反加價集會。《年青工人》與「70 戰綫」也很有默契地趁勢而起，在集會前幾天於新蒲崗（香港最著名的工業區，也是六七暴動的發源地）組成街頭宣傳隊，呼籲工人與此時通過民主形式自我組織成立「工人工廠委員會」與老闆展開鬥爭，並提出了「四不交」的抗爭手段。⁵⁷

關於這個宣傳隊是如何發起的，阮志雄回憶：「第一個反加價集會應該是托派搞的，看到托派搞了集會以後，大家開始想要不要多做一點事情，這是初期的討論。我記得我們一堆朋友在想要幹什麼的時候，傅佬炳提議說：『我們做些什麼吧，譬如宣傳大家禮拜日去參加集會吧。』於是就有了街頭宣傳的行動。」⁵⁸而根據當時《70》出版物的說法，他們與一些「non-maoist radical groups」（指托派和社會派）自 5 月起就密切關注運動的發展，一同組織「mass rally」（5 月 5 日的集會）之餘也一起開會。⁵⁹可見托派與無政府主義雖然有不同的路線和主張，而且沒有組成一個統籌的運動團體，但還是有在運動路

⁵⁷ 70 年代週刊，〈編輯室隨筆〉，《70 年代週刊》18 期（1974），頁 2-3。

⁵⁸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 年 6 月 26 日。

⁵⁹ 70 年代週刊，〈四不交〉，《70 年代週刊：四不交運動特刊》1974），頁 2。

上互挺的意識。在 9 月的新蒲崗工業區，無政府主義者在街頭舉起了黑旗，托派則舉起了紅旗，一時間又出現了「紅黑並舉」的風景。

不過，兩派的合作也止步於此，並沒有進一步合作組成一個統籌運動的團體，但這不是關乎之前《70》「紅黑分裂」的人事問題了，而是關乎理念。理念上的分歧有兩個方面。首先是「對組織形式的看法」的分歧：《70》說因為「70 著重群眾自發性組織，反對被領導式行動……至於戰訊 9 月 15 日摩士集會事，該組織性質與 70 差別甚大，他們是著重於領導群眾，甚難有合作基礎」⁶⁰。第二，關乎「行動的想像」，兩派的方向也不太一樣：根據《70》的說法，托派是「改良主義者」，並且穩守著自己的「傳統訴求」。⁶¹阮志雄也說：「我們當時覺得托派整天在反，但『反乜 q』〔反什麼鬼〕呢？行動才是最實際的，行動才是對的。那四不交就是指向行動的。」⁶²簡單來說，托派是走訴求的路線，無政府主義派是走直接行動的路線。

不過，我們也不應過分放大兩個派別之間的不睦，因為理念差異並不影響兩者的外交結盟。如同「70 戰綫」自己所言，他們不打算搞「宗派主義」，兩者依然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和而不同地進行宣傳。⁶³宣傳隊開始工作兩天後，托派以《每日戰訊》的名義加入宣傳隊（雖然托派並沒有宣傳「四不交」）。甚至在 9 月 12 日，托派與《70》的成員也各派出一人絕食。⁶⁴

宣傳隊和絕食者原定把絕食搞到 9 月 15 日（也就是「四反」集會當天），但警方卻在 9 月 12 日調來防暴隊逮捕「70 戰綫」與《每日戰訊》成員（包括兩名絕食青年）到黃大仙警署。⁶⁵支持絕食的憤怒群眾因此包圍黃大仙警署，最後被捕人士被捐款保釋。9 月 13 日，被捕者在新蒲崗法庭提訊，各人否認控罪，兩名絕食青年返回新蒲崗繼續絕食，並於午後倒地送院救治，同時隊伍繼續在黃大仙散發傳單。⁶⁶9 月 15 日，原定在摩士公園舉行的反加價集會因為無法申請到不反對通知書，而改到可合法示威的九龍公園繼續

⁶⁰ 〈反加價集會事〉，[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dates/\[1974-09\]/ids/MCY-001981/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dates/[1974-09]/ids/MCY-001981/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8 日）。

⁶¹ 〈反加價集會事〉，[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dates/\[1974-09\]/ids/MCY-001981/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dates/[1974-09]/ids/MCY-001981/languages/zh)（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8 日）。

⁶²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 年 6 月 26 日。

⁶³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 年 6 月 26 日。

⁶⁴ 70 年代週刊，〈編輯室隨筆〉，頁 1。

⁶⁵ 70 年代週刊，〈四不交〉，頁 3。

⁶⁶ 70 年代週刊，〈編輯室隨筆〉，頁 1。

舉行，參與者有 1,000 人，遊行時也和警察發生了一些混亂的衝突。⁶⁷《70》稱此次遊行為「just a part of a long term struggle against the British imperialists, local and foreign capitalis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ts headed by Mao」（只是與英國帝國主義者、本地及外地資本家及被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官僚主義抗爭的第一步），並報導「70 戰綫」將繼續在屋邨推廣公民抗命及「四不交」的直接行動。⁶⁸

9 月 16 日，大眾輿論對集會的反應並不正面，多份報章推說混亂是由組織者引起。⁶⁹也就是說，「繁榮穩定論」再一次出現，成為壓抑社會運動的方法。而在這場批評示威者的大合唱中，本地左派聲音尤其出彩。1974 年 9 月 19 日，石中英再次於《新晚報》「風華版」發表〈托派份子舉的是什麼旗〉抨擊托派。文章一開始就提到，每一個托派出現的場合都會出現紅旗和黑旗，但作者認為托派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拿著「本來是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標誌」來「冒充革命派」，因為他們「圖唆使工人向自己血肉相連、命運與共的工會作鬥爭」、「把彈藥射向了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和朋友，罵學生運動，罵進步的知識份子，罵愛國的資產階級」，結果就是「不分革命階段，不組織廣大同盟軍，只懂喊出什麼『革命總爆發』，貿然進攻，視奪取政權如『兒戲』的行徑，不單是引導革命走向失敗的捷徑」。至於黑旗，則被作者說成是「反對一切政權、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當然，包括了社會主義」，甚至說托派在背後「另有其人，呼之欲出」。⁷⁰這種「另有其人論」也就召喚了香港恐懼六七暴動的情緒——當時社會不就是以工人背後「另有其人」來使得社會恐懼左派的嗎？曾被這種「另有其人論」壓垮的本地左派此刻居然與「另有其人論」出現了奇怪的合流，用一樣的論述召喚社會對托派及無政府主義派的不信任。

面對本地左派在《新晚報》上的攻勢，大專院校界也有回擊。〈反通貨膨脹的聯想〉一文稱石中英「連人家批評的內容也沒有看清楚便不斷罵人『破壞』、『打擊』了……連基本事實也未能掌握，便體認假亂套帽子的人。與其說是替人『剝皮』，倒不如說在人家面上塗黑」⁷¹。這無疑是對的——石中英對托派的惡語指控，把托派說成和蘇修有關，的確無甚事實根據。然而，為什麼石中英當年會有這些指控呢？除了因為托派有材料被誤讀，誤讀背後反映著石中英作為本地左派怎樣的歷史和心理呢？我們固然可以在思想的

⁶⁷ 70 年代週刊，〈12 Sept. Hong Kong 事件經過〉，《70 年代週刊：四不交運動特刊》1974，頁 5。

⁶⁸ 70 年代週刊，〈12 Sept. Hong Kong 事件經過〉，頁 5。

⁶⁹ 70 年代週刊，〈12 Sept. Hong Kong 事件經過〉，頁 5。

⁷⁰ 石中英，〈托派份子舉的是什麼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trotsandmaos-1970s.htm#3>（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⁷¹ 夏冰，〈反通貨膨脹的聯想〉，《學苑》，1974 年 9 月 1 日，版 14。

思辨和理據上反駁石中英的種種，但這不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本地左派為何一開始就以這種方式來誤解托派。而此時，我們不妨用石中英的個人經歷去解釋本地左派批托背後的脈絡和時代性（甚至，也可以去鬆動我們對本地左派的想像）。

8-2-4 石中英為何批托：批托第一人的經歷與時代性

石中英原名楊宇杰，在 1974 年寫批托文章時是一名教師。他對自己當時狀態的描述是一名「左傾知青」。他說：「但我本來是很開放的人，譬如《70》我也去玩，《盤古》我也去玩，《盤古》的馮可強當時搞七七〔保釣運動〕的時候還和我很友好問我去不去，我說：『去！』……他們都覺得我是左傾知青。」⁷²有趣的是，石中英不是工聯會成員，也就是說，他在寫文章時已經不是任何左派組織的成員。按照石中英自己所說，他批托不是因為受到任何組織指示，那麼批托的起心動念又是什麼呢？這要從石中英的過往經歷說起。

石中英的成長軌跡一開始其實是頗為典型的文藝青年：喜歡看文藝雜誌、有一點關心社會的意識、富有民族主義情懷。如果說他早期和左派有什麼關係，那就是他是左派青年文藝刊物《青年樂園》的派報員。⁷³《青年樂園》是左派拿來和《中國學生周報》打對台的刊物。⁷⁴儘管名氣一直無法超越《中國學生周報》，但市場佔比頗大。⁷⁵現在回頭來看，《青年樂園》的確是除了《中國學生周報》以外另一個孕育了一代文人的搖籃——文學史研究者盧瑋鑾（小思）也曾為《青年樂園》的學生編輯。⁷⁶石中英在中學時除了是一個典型的文藝愛好者，也是一個頗為典型的官校學生。值得一提的是，石中英就讀的金文泰中學，是香港歷史最為悠久的官立中文學校，也是今天少數被認為是「傳統名校」的中文中學。而在 1974 年還沒加入托派的梁國雄（長毛）、及 1974 年已經是學聯會長兼

⁷² 石中英，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31 日。

⁷³ 石中英，〈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頁 76-77。

⁷⁴ 梁慕嫻曾指出中共利用文藝活動「發展青年學生成為黨員幹部」，石中英作為《青年樂園》派報員的經歷現在經常因此被懷疑是與中共地下黨有關。不過我認為，如果說在《青年樂園》當派報員就可以咬定石中英是受到中共指使參加六七暴動，也未免把中共的保密工作及地下黨的入門門檻看得太低了。關於社會對石中英的懷疑，見立場報導，〈投資者推動六七和解 趙崇基望拍給傘運年輕人——風波裡的《中英街 1 號》〉，<https://bit.ly/3gaCWNn>（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⁷⁵ 石中英寫道，《青年樂園》與競爭對手《中國學生周報》相比，銷量是四六開，見石中英，〈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頁 76-77。

⁷⁶ 吳萱人，〈代變中看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承傳（講文提要）〉，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頁 116。

國粹派風雲人物的陳毓祥，也是鼎鼎大名的金文泰中學的畢業生。在這樣的環境下，石中英與許多官校學生一樣，一方面親身領教了奴化教育的問題，另一方面因在中文中學讀書而具備某種「天然」的中文語言認同以至於民族認同，對殖民地重英輕中就有了敏感。這些，都是六〇年代的年輕石中英「普通」的地方。

不過，「不普通」的地方是，石中英是一名六七暴動的 YP (young prisoner) ——不過，當時無論《盤古》還是《70》的人，都不知道他的過去。他說：「當時他們都不知道我坐牢，我也沒有告訴別人我是《新晚報》學生樂園〔的編輯〕，他們都覺得我是左傾知青。」⁷⁷原來，在 1967 年，還在讀中學的石中英因為考完試後突然空閒，又親眼目睹警察鎮壓六七暴動的群眾，因此以樸素的正義感和同情與同學組職了「六七戰鬥隊」——所謂「戰鬥」，不過是印製小報宣揚愛國、反英抗暴和反對奴化教育而已。最後，石中英被警察逮捕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罪」。本來法官說只要他認罪就可以免去牢獄之災，只是判他「自簽擔保守行為」；但石中英堅持不認罪，結果年紀輕輕就被捕入獄成為 YP。這段故事後來成為金文泰的激進學生暗中流傳的佳話，連托派的長毛也提過石中英的事蹟對他的影響，長毛說：「我讀金文泰，他〔石中英〕是我的偶像……我當時覺得，做人就應該像他那樣做，而這個啟蒙就是永遠的——在那個年代，居然有人可以放棄自己的學業。法官本來說判他守行為，他說『你有什麼資格審我？我來判你回去吃薯仔皮好了！』法官說：『那我就判你坐牢好了。』我當年聽到很激動，這個感悟是偶然性的。」⁷⁸

由於石中英成了 YP，在其他同代青年還在自由地探索要左派民族主義還是右派民族主義時，他已經在獄中和其他更成熟的工會左派一起被警察打，並因此在這樣的氣氛下醞釀出一種樸素的、對本地左派的革命同志情感及對毛澤東思想的認同感。石中英曾提到，坐牢一事在思想上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認識了國際主義，認識了「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要實現」。⁷⁹不過，我之所以說他此時的情感是「樸素」的，那是因為他自己也承認，他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要到七〇年代初才成型：「七十年代初，也就是尼克松訪京以

⁷⁷ 吳萱人，〈代變中看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承傳（講文提要）〉，頁 116。

⁷⁸ 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⁷⁹ 石中英，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31 日。同時，石中英寫道他在獄中的和其他左派 YP 一同高唱〈國際歌〉的一幕對他的左派理念的形塑：「『砰、砰、砰』，歌聲中，响起了一陣棍棒惡毒地敲打鐵門的聲音。可它是那樣的渺小、無力，在雄壯的歌聲中，它只不過是個可憐的噪音。『砰、砰、砰』，又一陣敲打的聖嬰。不過，聽得出，這不再是敲打在鐵門上，而是敲打在歌者的肉體上。然而，聽不到叫痛的呻吟，聽不到求饒的叫聲，只响起了更雄壯嘹亮的歌聲——『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奈爾，就一定要實現。』……自此以後，五月的歌，便成了我生命的歌。我知道，終有一天，我的生命會完結；然而歌的聲明，卻永不會完結。知道，那歌中『鮮紅的太陽照偏全球』的『明天』。」見石中英，〈那一夜，我們歌唱〉，《我愛秋風勁》（香港：火石文化，2016），頁 171。

後，我就因為義務協助去毛澤東韶山故居的學習班而認真學起毛語錄來。其實在反英抗暴以後，港澳同胞辦公室都著大家好好打工，回去自己的工作崗位，但其實大家都發現不夠，而是真的想要學毛澤東——特別是尼克松訪問以後，大家都真的想去北京看看。」而石中英有了跟毛派思想接觸的機會，也和他出獄後的工作背景有關——由於他背負的案底就像一個烙印，讓他被認為是「左仔」，他出獄後在《新晚報》當「學生樂園」欄目的編輯，也算是本地傳統左派組織對他的負責方法吧。

某程度上，非左派學校或左派工會出身的石中英後來有那麼深的左派認同，既反映了一種時代的普遍性，也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如果他沒有剛好被抓，或許也不會對左派有那麼深的認同感。我總是會想：同樣就讀於中文中學巴富街官立中學的周魯逸（保釣會領袖之一），當年也在六七暴動期間出版小報，如果他當時被抓，不知道會否因此變成另一個石中英？——那周魯逸就未必會遇上包奕明，也未必會有機會受惠於包奕明的人脈而影響到《盤古》，更不可能成為鋒芒外露的保釣領袖，引領了「自發毛派」；他可能只會是一個安分的左派編輯、記者、工會成員。而我也不是唯一會做這種聯想的人，就連長毛自己也有一樣的想法，要知道長毛的母親是工聯會的忠實會員，長毛因此是左派家庭出身，以概率來說，他走上毛派道路的可能性要比出生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家庭的石中英要高很多，而有趣的是，長毛一開始的確是一個毛派——他是石中英的師弟，受到石中英的事蹟感染，也被石中英的同學帶領接觸左派思想，連長毛自己也說：「我讀金文泰，他是我的偶像。我現在都覺得這些都是偶然：我早兩年入學的話，或者就會好像他那樣被判坐牢；但我後兩年入學，所以只能仰慕他。」⁸⁰

火紅年代的青年們，其實都在同一個大時代的普遍性中，但往往又因為一點點偶然，而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就是因為這些時代的普遍和偶然，長毛沒有因為六七暴動坐牢，而是自由自在地探索思想，並且接觸到托洛茨基主義，然後變成托派。這一邊廂，石中英有參與六七暴動並且入獄的經歷讓他對工聯會及本地左派有強烈認同感和歸屬感，並開始信奉毛澤東思想，並對反對中共官僚主義的托派保有懷疑；另一邊廂，長毛則越發傾向托派。

這個歷史和命運給他們開闢的不同道路，最後其實濃縮在一個場景之中：石中英去大會堂看國粹派搞的中國周展覽時遇到了年輕的長毛，長毛不知道他就是石中英，石中

⁸⁰ 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年6月8日。

英也不知道長毛對自己的仰慕，二人沒有相認，反而在展覽後在維多利亞港的皇后碼頭就中國問題展開了辯論。回憶皇后碼頭的辯論時，長毛說：「但我當時還不是托派……我當時就嗅出來〔石中英〕他應該是毛派。毛派就是要提防反共反華反人民嘛。那我一定不是反共反華反人民，我是支持共產主義的。我其實當年是毛派，所以我要過那一關，我在想的問題是：『到底社會主義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反殖民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我們已經有完全的認識。但我們要想的是，如果要社會主義的話，那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想要怎樣的社會主義？一國能否建立社會主義？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分別時，石中英向長毛拋下了一句話：「希望你以後不要做『背叛中國人民』的事情。」而長毛沒有跟他說，他其實並不是石中英那種毛派心目中的「反共反華反人民」，他只是懷疑什麼叫作真正的社會主義。⁸¹維多利亞港的海浪無情地沖刷著岸邊，兩人不歡而散。

回到 1974 年——石中英決定提起筆桿對托派大肆抨擊背後，很大程度是一個巨大的情感推動的決定。首先，石中英作為六七暴動的左派對國粹派有理念和情感上的認同。並且，石中英和陳毓祥是好朋友，陳毓祥參加回國觀光團也是石中英幫忙牽線的，石中英與國粹派因此是有人事上的親近。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由於石中英本身的經歷，使他當時的世界觀中會認為工聯會及工人是「一體」的——工聯會才是工人最正統的代表；在之前，儘管左派工聯會經常備受攻擊，但這些攻擊主要來自偏「右」的觀點（也就是打著「自由世界」論述反對社會主義），對於這種來自右邊的對社會主義的抨擊，石中英見怪不怪。不過 1974 年開始，托派的《十月評論》卻開宗明義地打著「左」的旗幟、以支持社會主義及支持工人抗爭的角度去抨擊工聯會——這種全新的批判是石中英之前沒有見過的，這使他非常懷疑托派是否真的「左」，或只是另一場來自右派的陰謀。他說：「一般人反毛都是堂堂正正的，但他們怎麼可能又裝作自己是左派但又反對我們呢？反對我們就堂堂正正地反嘛！」⁸²這意味著雖然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新左翼論述已經活躍了一段時間，但對本地左派來說，他們依然覺得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正統，所以當石中英看到充滿反英抗暴回憶的新蒲崗現場飄揚著對他來說「不倫不類」⁸³的紅黑旗時，他對托派的不滿更被燃到高點。

⁸¹ 當我在對長毛進行訪問的時候，石中英也在場，以上訪談，參見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⁸² 石中英，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31 日。

⁸³ 石中英，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31 日。

最後，我認為石中英會決心反托的一個原因是他當時的情感認同其實更傾向六七暴動中的「極左派」，那麼他就更難以有空間和情感條件理解世界上有比之更「左」的立場——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站在了左的極端。在第二章我曾經提到，部分左派群眾其實隨著造反派的趨勢往「極左」方向挪動——想以更激進、激烈的方法徹底推翻香港的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但在六七暴動後，工聯會卻帶頭想要把群眾從極左拉回來，此時就產生了一條群眾與工聯會之間的幽微縫隙。石中英就提到，他出獄後其實陷入了一個巨大的失落，因為他發現出來後居然「無殖可反」⁸⁴——這並不是因為殖民主義不存在，而是因為工聯會的改變。他說：「工聯會搞復轉改，surrender 統治、背叛革命——工人是 abandoned 的，作為學生的我也覺得被 abandoned」⁸⁵，也就是說，極左群眾與不再走極左路線的工聯會之間是有裂痕和縫隙的，這也是石中英說覺得自己「被 abandoned」（被拋棄）的感覺來源。然而，這條極左群眾與工聯會之間的裂痕，同時被左派系統化推行復轉改的路線而填補了，極左群眾也漸漸接受了自己不可以再仗著極左的理念而爆衝，而是要接受革命是有階段的，被拋棄的感覺也就慢慢被彌補了。所以，面對工聯會的路線改變，石中英也補上了一句：「又同時覺得明白。」⁸⁶

由於工聯會始終沒有否定六七暴動，極左的情感就被嫁接到並不是極左的工聯會復轉改路線上，兩者雖然理念上有矛盾，但當中的情感卻在歷史發展中理所當然地相承接。回過頭看，當石中英批評托派「不分革命階段，不組織廣大同盟軍，只懂喊出什麼『革命總爆發』，貿然進攻，視奪取政權如『兒戲』的行徑，不單是引導革命走向失敗的捷徑」⁸⁷，其實不只是矛頭對準托派，也對準了自己的極左派過去，而這種對外部的抨擊，也是為了更好地壓抑自己的過去，以安於工聯會拋棄極左路線的當下。又因為工聯會的確是左派在六七暴動後被全面污名的當下依然少有人同情和肯定六七暴動的團體，它對六七暴動的 YP 來說就像一個精神支柱、一個高度理想化的青春暗號那樣——成為了最極致、最正確、最犧牲自己、最為工人著想的左派圖騰。那托派想要涉獵工人運動，不但撰文批評工聯會，還和無政府主義在六七暴動的發源地新蒲崗揮舞紅黑旗，就狠狠地戳中石中英這種左派內心最柔軟的一點。

⁸⁴ 石中英，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31 日。

⁸⁵ 石中英，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31 日。

⁸⁶ 石中英，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31 日。

⁸⁷ 石中英，〈托派份子舉的是什麼旗〉，<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trotsandmaos-1970s.htm#3>（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石中英說，他當年寫的許多批評托派的文章，今天並不想再讓人看到，他說：「我現在會覺得自己當年是錯的，之後我有很多反省。」這並不是因為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錯的、托洛茨基思想是對的，而是因為他發現自己批評托派的許多論點，其實都可以拿來批評昔日自己的極左派毛派信仰，那麼無論是批托還是擁毛，兩者就一同隨風消散了。他說：「到最後批托其實變了批毛批自己。所以我是用了錯的思想——毛主義，去批評錯的思想——托派。」這一句的泛音是很延綿的：經過許多年的沉澱，關於批托的歷史，他記憶的湖面折射出的圖像，並不是兩個要爭個你死我活的「毛」和「托」在劍拔弩張，而是自己對自己的鏡像抽刀，在想要刺傷對方時卻發現刺傷的是自己。

我訪問長毛的場合是在石中英安排的午餐聚會上。在訪談外，兩人在閒聊中都提到當年「毛托之爭」下的緊張。石中英有點緊張地以探問的語氣跟長毛說，當年自己害怕得覺得托派可能會「找人來打他」。長毛則跟石中英說，當年托派看到石中英的文章，都以為中共在背後下了批托的命令。可見，毛托兩派當年互相批評時，其實是一邊害怕著一邊誓死奮戰。面對這些對對方的懷疑，兩人最終在談笑間發現都是「誤會一場」。⁸⁸原來，石中英不是受到中共指示去批托，托派也不是有什麼龐大的國際勢力在背後指揮。然而，在七〇年代當大家都背負著各自派系的歷史創傷，兩派沒有任何信任的條件及對話的空間，更不要說和解的可能。但到了今天，或許時間真的可以讓創傷褪去、開啟對話，以至於當石中英跟我說「聽到吳仲賢〔在 1981 年〕被〔中共的〕人抓了時我就覺得很難過」⁸⁹，我是真心相信這不是客套話。

理解了石中英的個人經歷，或許可以鬆動我們對本地左派的理解。事實上，他就如同先前提到的包奕明一樣，首先並不是因為身在左派所精心搭建的場景內而左轉——石中英是官校學生，並不是左校學生。此外，他更不是因為身處在一個嚴密的左派組織並受到由上而下的命令而為本地左派發聲——他在批托時已經不在任何左派機構工作，也沒有和左派組織有正式關係。他人生的一些重要決定，包括參與六七暴動和批托，是出於大時代的推波助瀾，以及在波瀾中累積的情感而自發行動。而他在無組織的情況下自發批托一事，其實顯示了七〇年代香港本地左派場景比以前更有彈性：左派場景不只是靠著港共的精心設計和搭建，而「成為本地左派」也不再只是依賴組織內部培育這一個源頭——受到全球六〇年代激進氣氛感染的自發毛派也參與了搭建場景。先前提到的自

⁸⁸ 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⁸⁹ 這句話是在石中英安排的午餐聚會——也就是我和長毛的訪談結束後——石中英對這次訪談的一些回應。見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發左轉成毛派的《盤古》以及國粹派，都屬於這一類。同時，屬於港共建制控制範圍內的本地左派組織如《新晚報》也意識到這些自發的力量，並努力吸收或收編之：包奕明的新左翼評論系列和石中英的批托系列就是例子。但這些收編和吸收，並不是說把這些自發毛派納入到自己的組織下工作，或形成正式的組織關係，而是允許他們遊走於組織邊緣，雙方既保持一定距離，又可以通氣合作。

那麼，接續的問題就是，被認為代表「本地左派」為國粹派辯護的批托寫手石中英，是否真的可以代表「本地左派」的立場？還是，基於他當時並沒有組織連帶，應該被歸類為「自發毛派」？我認為這是非常曖昧的，本地左派正在變動，並非鐵板一塊，而石中英當時對托派的異常憤恨，也折射出本地傳統左派中傾向極左派的一群在無解的死局中的困窘及憤怒。如他所說——「無殖可反」，那該怎麼辦？這種困惑正好鬆動了一般對本地左派的刻板印象：的確，從外部來看，他們好像全部支持工聯會、支持中國的對港方針，但內部的幽微情感又顯示了事情的複雜性。站在一個歷史化的角度來看，石中英的批托其實是一次內部的憤恨對往外部的投射。在石中英內心世界的實際感覺是：我那麼努力忍受著不反殖的困窘感，只為成就更雄偉的社會主義大業及成為最標準的「左派」，那豈能看到托派逍遙自在，莽撞地想要直接反殖，還要掛上比工聯會等左派更「左」的名義？石中英對托派的批評，其實也是對自己過去的批評，為的是讓自己更加可以跟上本地傳統左派的大趨勢。一種對自身的壓抑到最後沒有變成對六七暴動路線的批評、或對工聯會放棄極左的批評、或對毛澤東的搖擺的批評，被外部化成「批托」，並被再次收攏到「本地傳統左派」之下。

8-3 反加價運動落幕：港英政府的「漁人得利」

9月的反加價集會後，無政府主義派、托派和社會派合力推動的反加價運動遇到了極大阻力——無論是社會、校內還是來自殖民政府都對此起了不同的壓抑作用。在社會上，群眾對反加價運動都不太積極，市民普遍認為通脹為全球潮流，雖然大家都對殖民政府有所不滿，但咎責殖民政府的氣氛始終無法形成。在校內，托派被毛派大力打壓，一時間普通的抗爭運動都被說成陰謀重重，讓人難以安心加入。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也在出台，加上輿論再次使出「繁榮穩定論」，反加價運動也就因此意興闌珊地結束了。而1974年以後，社會運動也陷入了低潮，1974年也經常是許多人在討論香港歷史時，被回溯性地說成是殖民政府收割民心的轉捩點。

然而，以上所說的三方壓力——社會、校內和殖民政府——對運動所起到壓抑作用並不是等量及均質的。甚至，我們以此「解釋」運動的失敗前，這幾種力量是需要先「被解釋」的。也就是說，我們不能直接歸咎國粹派主導的學聯不加入反加價運動，使得運動失敗，因為這未免太抬舉單一團體（學聯）和單一派別（國粹派）的威力。同樣，我們也不能直接歸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終結了運動，因為這未免太把群眾看作是被動的。而我們更不能直接歸咎群眾不參與運動是運動失敗的罪魁禍首，因為這其實並沒有解釋到群眾為何動不起來。在理解所有的社會運動在能否動起來時，都必須要歷史地並且動態地理解各個因素之間的互動。

用另一番更顯淺的比喻來說，我們不妨把運動所遇到的阻力看成海浪、把運動者和群眾（社會大眾）看成衝浪者、把運動看成衝浪板。反對的浪潮可以把運動者連同運動一同拽入海底的深淵，讓人消沉、讓運動失敗；但總有些時候，衝浪者會找到方法順著大浪的脈搏滑翔到浪尖，飛到高空，越戰越勇。譬如，保釣運動也曾遭遇過社會的不聞不問、運動者之間的內鬥和殖民政府的暴力打壓，但運動者和群眾還是借助了全球政治的變化、台、美及香港上揚的運動氣氛、以及聰明的論述，把警察打人等阻力幻化成發力點，成功透過動員大專學生加入，慢慢在一年時間內滾動成一個大型運動。事實上，運動的阻力——無論是群眾的被動、反對運動的聲音、還是社會條件等——都會以不同程度和方法存在，但不是所有阻力都會直接壓垮運動。要理解 1974 年反貪污運動如何失敗，我們就不能把反加價運動的結束完全歸咎在單一阻力上，而是要結合對社會總體的分析，才能明白多種阻力如何以動態的、有機的邏輯關係被組織在一起，共同起到對社會、社會運動、及社會運動者等面向的影響及壓抑作用。以下，我會以兩方面去解釋運動的失敗。第一方面關乎「總體經濟上揚—社運內鬥—社會大眾的犬儒文化—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第二方面關乎「殖民政府懷柔政策—社會運動者」之間的關係。我必須指出的是，1974 年，「殖民政府懷柔政策—社會大眾」之間的關係並不突出；也就是說，在 1974 年的上空，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在「社會大眾對運動呈消極態度」及「認同殖民政府」兩事上，並沒有起到即時和明顯的作用。

8-3-1 總體經濟上揚—社運內鬥—社會大眾的犬儒文化—社會運動

1973 到 1974 年的社會雖然問題多多，經濟也出現問題。但如果我們拉長時間距，其實步入七〇年代，和六〇年代相比，香港的工業化進程的確帶動了經濟，而市民大眾的

生活因為總體經濟上揚而得到了穩步改善。也就是說，1967 年以後，香港進入了自己的「黃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我們可以透過香港自 1967 年以來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看到經濟上揚的威力。

4.2 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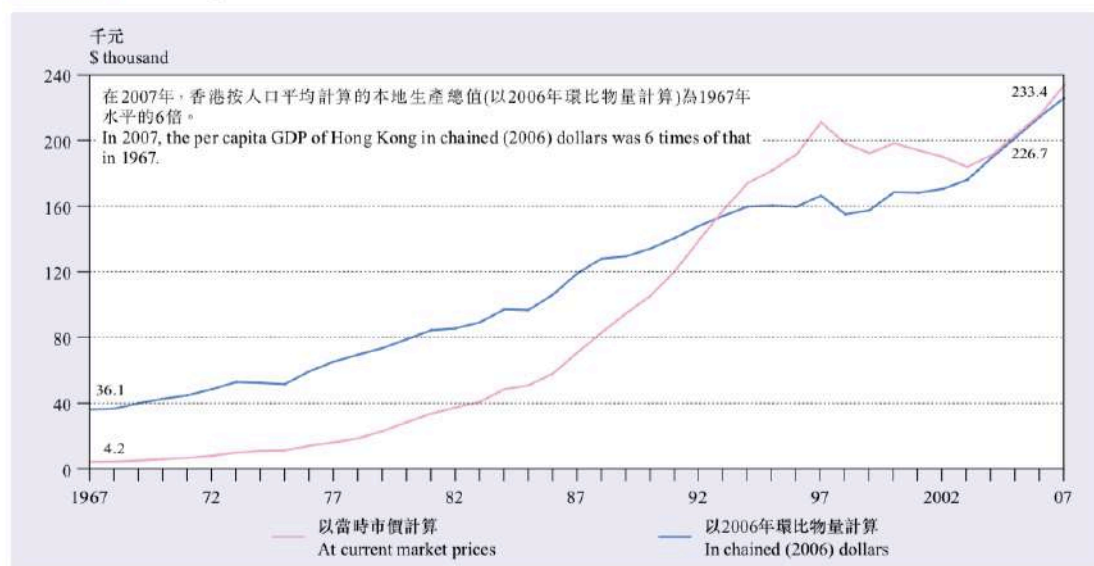


表 3：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國民收入統計科〔一〕⁹⁰）。

當然，經濟上揚的威力之所以可以被感覺到，要透過一些政策和事件才會顯現。譬如 1968 年，《僱傭條例》出台，雖然工人階級得到的保障非常少，但《僱傭條例》依然是第一個官方對勞工的保障。1972 年的全民炒股風潮，更為大家帶來「瞬間變富皆可能」的印象：有人靠炒股過著「魚翅撈飯」的生活，成為大家日常討論的話題。雖然不少人在 1973 年的股災損手爛腳，但至少「靠個人的努力和運氣是得以賺到錢」的想法廣泛地種在了一般人的心目中，當大家在炒股中經歷「和致富一線之差」，大家都突然看到社會向上流動的可能及空間（這和客觀事實是否完全相符是另一回事，但主觀感受就是會有這樣的判定）。那麼，要求集體參與、付出甚至犧牲的社會運動，就更顯得是一條太過「迂迴」的改變生活問題的途徑。其實 1973 年反貪污運動前後的關於「流」的討論，就已經初步顯示了無論是年輕人還是社會，都有了「社會運動是否是解決生活問題的最佳出路」

⁹⁰ 《香港的發展（1967-2007）——統計圖表集》（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頁 35。

的疑問。而大學生作為青年的一份子，更擺盪於六〇年代吹來的激進化風潮和七〇年代的經濟上揚氣氛之中，他們站在「該燃燒自己的生命去上街抗爭」還是「該乖乖讀書跟著社會一起慢慢發達」的十字路口之間——社會運動正進退兩難。

當國粹派和社會派及本地左派和托派出現激烈矛盾——特別是 1974 年國粹派及本地毛派誇張失實地抹黑托派時——造成的客觀效果其實並不是任何一方被徹底地打到，而是讓運動蒙上一種讓人覺得運動很亂、很不可靠的氣氛，一般民眾因此就會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去理解反加價運動，更認為以運動解決問題的方法並不可取。

《學苑》的〈另一角度〉一文可說是這種「各打五十大板」論的例子。雖然這篇文章的標題已經顯示了作者自知自己的觀點在火紅年代大學生中未必受歡迎，但我認為這也反映了一般社會大眾的一些感覺，而這些感覺其實也存在於大學生當中，只是大家羞於說出口而已。作者李煒佳開宗明義地說，香港的社會運動爭論反映的是一種「醜陋」：一方面，運動中要推翻殖民主義、推翻資本主義的主張，是「夢想推翻一切不平等的現象，以建立幻想中的大同」是「不可能」的，就算建立共產主義以後，依然會有通脹、貪污等問題，因為「歷史上任何空間，都有著貪污的存在」，而大陸來港的貨品也漲價了兩倍；另一方面，就算想要愛社會主義中國，「中共暫時還沒收回的意思」，而就算是獨立，新的統治者還是「不能使每一個人滿意」。⁹¹簡單來說，就因為沒有任何一派可以徹底說服另一派，而且在沒辦法說服另一派時又以內鬥方式攻擊對方而不是尋求合作，整個運動只是給人烏煙瘴氣的感覺。作者因此斷定各派都沒有「從別人的處境著想」，而連帶地他們的訴求也被理解成這些人不過是習慣了「任意不滿」、「任意指點」的結果⁹²——運動者先在內部「挑剔」，然後對香港社會「挑剔」，反抗也不過是「挑剔」。也就是說，社運的派別鬥爭使得人們對運動有了一個「人格化」的想像，認為運動是「挑剔」的人才做的——政治也就被去政治化了。

這種去政治化的對社會運動的解讀其實是一種非常「個人化」及「犬儒」的視角：〈另一角度〉的作者李煒佳不但把運動中的集體性都簡化為一些個別的、個人的挑剔，他自身立場的無稜兩可也體現了犬儒特色。這種個人化及犬儒的特色，其實在香港社會才是最流行的。這也不得不提 1972 年開始出現的彩色製作的電視節目的作用。當時唯一的免費電視頻道「香港無線電視台」的彩色電視節目使人們有了一個免費娛樂；由於免

⁹¹ 李煒佳，〈另一角度〉，《學苑》，1974 年 9 月 1 日，版 4。

⁹² 李煒佳，〈另一角度〉，版 4。

費電視牌照得來不易而電視台也需要營運賺錢，採取去政治化的立場、左右逢源，是一個當然的出路。不過，由於七〇年代的社會依然有很多問題存在，而一個得以打中觀眾的心的電視台，也不能迴避社會問題只講風花雪月，所以電視台選擇了以去政治化的方式介入社會議題。這一來使得一種去政治化的共同體得以誕生，以「個人化的集合」偏擺了集體的、公共的、政治化的組織的重要性；二來，這種去政治化也成為犬儒文化發芽的溫床。

1972 年 6 月 18 日，連續暴雨導致山泥傾瀉造成旭和大厦和觀塘木屋區倒塌，造成了前者有 67 人死亡、後者有 78 間木屋被山泥活埋。6 月 24 日，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也就是當時香港唯一的無綫電視台——舉辦籌款賑災慈善表演會。這是香港電視歷史上第一個馬拉松式的籌款節目，籌款從晚上 8:00 通宵到第二日早上 7:45，善款接近 900 萬元——當時一輛車只需 1 萬，一個住屋也只需 10 萬而已，這 900 萬打破了香港開埠以來賑災籌款的紀錄。這樣的直播電視節目意味著什麼呢？這除了意味著香港民間的互助團結精神，也顯示了相互幫助及互惠再也不只是依賴線下團體的組織平台。在第一章，我曾經提到左派和右派凝聚群眾的方法之一，就是透過給予救濟援助去塑造群眾對團體的向心力，但背後也附帶政治色彩。但這個節目意味了電視台那種去政治化的、以公益為名義去介入社會事務的方法是「有效的」——這就更加強了一種「沒有政府或政治派系幫助我們也可以透過互相幫忙而過得很好」的錯覺。雖然社會並不是對政府有效率地賑災抱有希望，但批評政府賑災不力或民生支援不足的社會運動，在電視台 900 萬的威力下也就顯得無所用和無所謂了。

此外，這個電視節目也顯示著一種新的「共同體」想像的誕生。此前，「共同體」的想像很多時候是藉由真實的組織生活去搭建的。在組織中，人們的生命軌跡被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大家會認為組織中的彼此是為了某種抽象但共同的理念奮鬥，生命與生命之間有了一種共融的想像。然而，電視台這種平台所醞釀的「共同體」想像並不具備政治或集體方向，換句話來說，這種共同體的團結幻想並不是出於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共融，而是各人都有不同的生命軌跡——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工人也好、資本家也好、運動者也好——總之我們打開電視的一刻、撥打捐款電話的一刻，感覺到「友愛」、「互助」，就成為了「共同」。可是關掉電視，你和我的生命軌跡依然互不相干、甚至互相衝突。

電視台去政治化的態度也催生了犬儒文化的誕生，譬如，從 1972 年開始播出的《雙星報喜》可以被理解成一個代表。這個節目總是一針見血地帶出許多民生議題、道出社

會的荒謬現象，但最後都總以「點到你唔服」（怎麼輪到你就不順服呢）為結尾。雖然這句「點到你唔服」在字面上非常霸道，彷彿有一個聲音讓大家做順民、要人們吞下一切的社會不公、要「順服」；但在節目幽默的效果下，這個霸道又被笑聲瓦解了。一切霸道、連同對社會荒謬而產生的怒氣，就這樣被笑聲化解了。這笑聲起到的效果也是一銀兩面：一方面，它是一種對權威的嘲笑，是「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種把糟糕的殖民現實輕描淡寫（*trivialize*）的方法。結果就是，它既讓人覺得欣慰、輕鬆，也顯示了反抗和憤怒是多餘的——如果笑聲就可以瓦解權威的壓迫感，那為何還需要抗爭呢？《雙星報喜》的幽默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它折射了犬儒文化的構造。犬儒並不是道家的逍遙或佛教的放下執著，它不追求更高的意境，更不追求尊嚴或個人的完整性。犬儒總是清晰地認知到權威的位置，但又總是以放下姿態的模樣取得權威的容忍，同時擺盪於出世和入世之間，做到「進可攻、退可守」——犬儒時而回頭給予權威近距離的嘲笑和攻擊，又可以隨時逃逸、隨時「認低威」。《雙星報喜》的「點到你唔服」做到的效果就是，觀眾可以以幽默的態度假裝「服」（逃逸和認低威），但其實那個笑聲也是對權威的繼續「不服」（嘲笑和攻擊）。

由於社會運動本來就被火紅年代青年以外的社會認為是無用的、迂迴的，甚至是烏煙瘴氣的，也就是說，社會問題和抗爭之間的連結本來就很弱，而社會的組織型態也開始變得去政治化——現在又有了像《雙星報喜》這種既指出社會問題但又不會指向抗爭的犬儒出路，於是，犬儒文化配合著整體正在上揚的經濟氣氛，就顯得比社會抗爭更為人所接受。也就是說，這個「既不同意運動，又不同意政府」的夾縫，騰出了空間讓犬儒文化進駐。回過頭來說，這是〈另一角度〉背後的社會氣氛，也解釋了為什麼作者的結論是何必要「發展仇恨」、「沒有愛心」、並讓大家「凡事從別人的處境著想，便不會太苛求了」——這不就是《雙星報喜》「一笑解千愁」的犬儒之道嗎？

我們也可以以夏冰在〈反通貨膨脹的聯想〉一文中，引用的一段電台諷刺片段為例，更明顯地看到在犬儒的氣氛下，一般民眾對社會運動的具體態度：

「哈！以前天星加斗零，就搞出個暴動，現在油麻地加一毫，一加就是百分之五十，但 D 人聲都唔聲！點解呢？」

「你都傻嘅！乜都加個陣時，D 人就會麻木啦！反對都無用！反來反去唔係又一樣，都無人理你嘅！咁反得多你自己都無癮啦！」

「咁我哋唔係任人宰割！」

「係咁㗎喇！」⁹³

這段文字大概是，兩個人在討論為何天星小輪的加價會引起暴動，現在通脹嚴重反倒沒有引發大規模的反對。其中一人說，那是因為反對也沒有用，大家就麻木，最後「係咁㗎喇」一句的意思即是「就是如此」，也有「認命吧」的意思。這一段話其實是非常犬儒的，它一方面道出加價的荒謬和殖民政府的無能，但結論卻是讓人似是而非的「就是如此」。上文的憤怒和下理的麻木，讓這個小小的段落充滿張力和矛盾，但也因為這種上文下理的整個感覺的不和諧搭配，而有了一分滑稽的感覺。這其實是一種《雙星報喜》的犬儒公式，犬儒的民眾總是可以道破社會問題的核心，又總刻意讓問題輕輕滑過。在這種社會氣氛下，連最激進、最有理想的火紅年代青年，也會受到影響。社會運動無法展開，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8-3-2 殖民政府懷柔政策—社會運動者

1974 年也是被認為殖民政府全面實行懷柔政策的一年。在這裡，「懷柔」指的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 1974 年 2 月成立的廉政公署和 4 月成立的消費者委員會。同時，《香港醫護衛生服務之進一步發展》白皮書及《未來十年香港中學教育》政策白皮書也公佈了。⁹⁴其中，又以 4 月成立的消費者委員會最直接回應了通脹之困，消委會免費派發的出版物《月報》中，列舉了各區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以幫助一般市民比價。⁹⁵這些利民措施讓人覺得，殖民政府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還是有幫助打擊趁著通脹亂世坐地起價的商家。

然而，我們必須理解這些懷柔政策並沒有在一年之間完全收復民心，讓社會上的人們對殖民政府拍手讚好。從前文提到的犬儒文化之中，我們可以看到民眾其實是對社會問題有清晰認知的，只是這些認知以犬儒的方法被消化，而不是以運動的方式被解決一

⁹³ 引文翻譯如下：「『哈！以前，天星小輪加價五先，就搞出了一個暴動，現在油麻地加一毫，一加就是百分之五十，但那些人一聲不響！為什麼呢？』『你真是笨！什麼都加價的時候，那些人就會麻木啦！反對也沒用！反來反去都一樣，都沒人理你的！反得多了你自己都沒勁啦！』『那我們豈不是任人宰割！』『就是這樣的啦！』」見夏冰，〈反通貨膨脹的聯想〉，版 14。

⁹⁴ 教育研究部，〈1974 年《未來十年香港中學教育》政策白皮書 學界三大訴求：取消淘汰試、母語教學、免費中學教育〉，<https://www2.hkptu.org/ptunews/593/p02b.htm>（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⁹⁵ Erichowc，〈香港大事 197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5Nhq29fdds>（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這才是火紅年代運動無法壯大的主因。我必須要強調，政府的利民措施對政府聲望的挽回並不是立竿見影的，而且對於社會大眾對政府的感觀的影響在一開始並不明顯。譬如，根據呂大樂的說法，雖然 1974 年 2 月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以特別回應紀律部隊貪污的問題，但警察聲望並沒有立刻提高——當香港於 1974 年 5 月 24 到 25 日發生著名的寶生銀行劫匪挾持人質事件（著名是因為電視台進行了連續 17 小時的現場直播，成為那兩天所有人都在看的新聞），而人質被釋放後，大家的反應並不是為警察喝采，而是為人質的團結喝采；在銀行外面一直等候時機，見到有人質自行掙脫挾持、跑出來後依然猶豫不決地沒有入內制服劫匪的警察「成為了下半年市民大眾經常掛在口邊的笑話」。⁹⁶可見在 1974 年，大家雖然對運動熱誠不再，但並不是因為認同「殖民有功論」——至少，警察以至於政府就是貪污、腐敗、無能的負面印象，還是普遍存在在社會之中。

如果說當時的殖民政府並沒有一下子成功收買社會人心，這些政策的出台和社會運動下滑的關係是什麼呢？政府懷柔政策對社會運動的影響，並不是透過改變社會大眾對殖民政府的印象，去起到對 1974 年社會運動的壓抑作用，而是直接地對社會運動者進行壓抑。

要知道，在之前提到的保釣運動中，警察是會用直接的武力鎮壓示威者的，然而，這反而給予了運動升級的發力點。於是，1973 年後，殖民政府顯然以更加「聰明」的辦法對待示威者，鎮壓手法也更為成熟。譬如，在 1973 年反貪污運動中，示威者並沒有在遊行過程中被捕，媒體也因此拍不到警察打壓示威者的片段，但大量參與者被秋後算賬，收到政府的檢控傳票。殖民政府以法律而不是武力打壓示威者的成熟手法，也就打擊了運動的士氣。

在警察對示威者的直接暴力減少的情況下，政府又對社會總體施展懷柔政策，這就使得運動者更找不到讓運動升溫的施力點。譬如在 1973 年反貪污運動發起後幾個月，港督麥理浩在同年 10 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成立一個向港督本人負責並獨立於警隊的反貪機構，終促成廉政公署在 1974 年成立。這無疑回應了火紅年代社會運動青年們的訴求。然而，這並沒有讓這些青年感到欣慰。在《鏗鏘集——流金歲月系列之四》的訪問中，1973 年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方蘇就提到對政府成立廉政公署感到「意外」，但並沒

⁹⁶ 呂大樂，〈無關痛癢的 1974〉，頁 12-23。

有因此覺得運動成功，甚至感覺「有失敗感、挫敗感，因為料不到殖民政府會做這些事」。

97

為什麼參與在火紅年代社會運動中的青年沒有辦法把政府的懷柔政策當作是自己的訴求成功呢？那是因為他們內心真正訴求的，往往是高於他們喊出來的訴求——他們要的是殖民主義的結束——喊出反貪污訴求只為揭露殖民主義的管理不濟而已。但最孤獨的莫過於彷彿只有自己「左眼看到鬼」（只有自己看到港英殖民政府的惡），然後眼睜睜看著政府以超高效率粉飾太平。港英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使得火紅年代的社運青年看不到後續的發力點或突破口，也更看不到反殖有望。這解釋了為何在政府開始響應民間給予的壓力的同時，卻是火紅年代青年挫折的開始。

比較激進的年輕人，對抗爭無路可走的感覺更是深刻和敏感，譬如托派的長毛就說：「四反運動以後，內部被打散了，很多托派走了，譬如岑建勳就出走了。」《70》的阮志雄也提到：「但運動結束後，也就是 1974 之後，我是 at a loss。我自己的設想是覺得社會運動需要很多的理論建設、組織建設，但我都沒有這方面的才能和想法。《70》那個時候，組織上頗鬆散，只是一些朋友很努力的支撐著做事。」不僅如此，運動的苦無出路如同小石激漣漪那樣，激發出許多運動者內心更多的不安和困窘感，這個不安和困窘感的內容會因人而異，但我們不可以輕看這些感受帶來的影響。阮志雄的個人經歷就是其中一例，他說到：「這個 at a loss 連帶的是我最大的恐懼——對於生命的不知所措。我心底裡面知道自己不是搞革命的材料，但我口說出來、我的行為做出來，都指向生命的 purpose 就是要搞革命的樣子，這就導致了我有了 existential fear。這也可能和存在主義的影響有關，存在主義說的 meaning of life 很影響我們，我就更覺得所有東西都 at a loss。所以 1974 年以後就一些憂鬱，身體 develop 另一個東西——所以 1974 年以後就有一些抑鬱，這抑鬱一直纏著我，到 89 後，那要命的腸病就來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⁹⁸或許，阮志雄並不是他所說的「不是革命的材料」，而是在大環境不利於革命（如果我們對革命的幻想只是建立在傳統意義的革命的話）的情況下，誰都難以當「革命的材料」。而 1975 年後，就有幾個成員離開《70》去讀書——當中也包括了阮志雄，《70》的人和聲勢就更弱了。

可能是任何政策都需要時間才被接受，1974 年後續的幾年，政府的懷柔政策漸漸收買人心，得到了社會的正面響應。大家開始覺得或許殖民政府也沒那麼壞——而社會運

⁹⁷ 黃婉兒，《鏗鏘集——流金歲月系列之四》（香港：香港電台，1997）。

⁹⁸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 年 6 月 26 日。

動更加寸步難行。面對港英政府的治理成功，《70》的侯萬雲提到一種被拋離的感受：「你說麥理浩比我們快，事實上大家都知道社會有許多問題，唯他有通盤改變的能力。當社會逐漸改變，我的感覺，我們已經被社會拋離，只能吶喊。」也就是說，懷柔政策使得火紅年代的行動派發現，自己的敵人比自己強多了，而且似乎無法擊破。正如莫昭如說：「香港政府很聰明，它並不愚蠢。」⁹⁹

也就是說，政府的懷柔政策及社會情況的改善，並沒有成為社會運動的信心和動力，運動者反而覺得挫敗、覺得自己找不到發力點，也就意興闌珊了。1974年後，港英殖民政府開始「漁人得利」。

8-4 小結

1974年末，反加價運動悄然落幕了。總結以上，這次運動引發毛派對托派的抹黑，社會上的「繁榮穩定論」也再次啟動，這是運動結束的表面原因。但更廣泛的社會狀況才是運動無法壯大的主因：香港總體經濟的氣氛上揚、加上流行文化以去政治化和犬儒主義的助攻，漸漸讓運動被偏擺、讓運動者灰心，一系列懷柔政策是殖民政府1974年後得以「漁人得利」的引子而已。

回過頭來看，在毛托論戰之中，毛派認為群眾未準備好，其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群眾的確是有犬儒的傾向。但這是否代表毛派就該以同樣「只是道出問題但不去抗爭」的方式去配合群眾的犬儒呢？這難道不就複製了《雙星報喜》的犬儒公式嗎？不過，當年如果沒有毛派透過批托抹黑反加價運動，是否反加價運動就有可能一飛沖天、捅破犬儒、開啟另一波反殖高潮？這都是無法說得準的。因為托派及無政府主義派，其實並沒有堅實的群眾基礎和組織手法。前者雖然有組織的意識，卻沒有系統地著手來幹，後者更是拒絕傳統的組織型態。阮志雄對當年《70》在反加價運動中的表現，也下了一個反思的註腳：

我們當時的分析是，資本主義會為了利潤的經濟運作一定會「爆」、會有金融危機，而資本主義爆也會伴隨不滿和抗爭。所以，從理論上來說，我們覺得資本主義爆的時候我們就要動員。加上當時在這個情況下還要什麼都加價：加水費、加電話費、加交通費、加屋邨租金……我們覺得自己抓到了一個點，一個大家直接影響

⁹⁹ 黃婉兒，《鏗鏘集——流金歲月系列之四》。

大家的、關乎民生的點，所以我們是從一種歷史觀和理論出發去發動四不交的。但現在看來，就會覺得當年有點一廂情願。我們當時搞社會運動時有一種很浪漫的情操，我們會以為自己叫的話，大家就會一起造反，後面就會有人跟。所以我才說長毛的分析是對的：就是從社會運動 1970 年之後社會運動就退潮了，那個經濟崩壞會讓運動氣氛稍微又好一點了，但終究來說，社會矛盾並沒有那麼突出，市民百姓都比較可以逆來順受。譬如，我記得有次有工會要求有薪假期，有一個社會人士——但我忘記了是誰——說了類似「香港的工人很喜歡上班，有假期是不好的」的話。他的 exact wording 我忘記了，但我記得的是除了 activist 以外，沒有太多人去反對這個說法。這就顯示了，事實上大家不太關心要不要放有薪假這個事情。所以回過頭去看，我們在 1974 年以為自己可以發動工人的規模抗爭，是有點脫節的。

100

引用阮志雄的話，並不是想為國粹派的不行動和本地左派的無理批托開脫——而是，無論托派還是無政府主義派，其實都有可以反省的空間。怎樣才可以讓運動的群眾基礎更加堅實？怎樣才可以更細緻地做組織？怎樣的論述才可以更有效地回應犬儒文化？此外，由大資本家電視台操控的流行文化和由殖民主義操控的政策方向，其實都有更多的通盤能力。這畢竟是一個實力懸殊的鬥爭。面對這些困境，作為運動者怎樣才能疏通自身「at a loss」的情緒，讓自己不至於耗損？這些都是他們當年開了個頭，但沒有足夠空間去想通的。雖然這個問題並非本論文的主線，但我也把當年相關人士的反思放在了附錄的部分供大家參考。

此外，反加價運動所激發的派系之間的相互不滿並沒有隨之結束，反而繼續升溫了——特別是在火紅年代的青年心中，大家都想找到另一個舞台把派系之間的矛盾辯個明明白白。大專院校的出版界舞台正要開始上演另一場派系之間的思想大辯論。

¹⁰⁰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 年 6 月 26 日。

九、「中國向何處去」：「四報聯刊」與逃港紅衛兵

1974年9月，反加價運動悄然落幕了，然而，國粹派與托派、無政府主義派、社會派之間的鬥爭沒有完全結束，而只是從運動的舞台搬到了學生刊物的舞台。同月，港大《學苑》、中大《中大學生報》、浸大《浸會學生報》和理工學院《理工學生報》共同策劃了「四報聯刊」計劃，編輯方針為「討論新中國」。¹而當時，屬於社會派的《學苑》編輯王卓祺找來《70年代雙週刊》（下稱《70》）同人的〈我們的立場〉、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及虞雪的〈理性的黃昏〉，分別代表無政府主義、托派及逃港紅衛兵對中共的批判立場。由於這三篇文章使得由國粹派把持的其他三份學生報非常不滿——不滿的主因在於這三篇都非由學生所寫的文章「托派傾向頗濃」，遂以篇幅考量、同學接受度、維持學生獨立性等說法，拒絕採用王卓祺的稿件。國粹派與社會派爭持不下，「四報聯刊」計劃終宣告流產。²

雖然「四報聯刊」計劃就像反貪污運動及反加價運動那樣，陷入了火紅年代的各派鬥爭，然而，這沒有讓〈中國向何處去〉、〈理性的黃昏〉及〈我們的立場〉三篇文章消失於人世。事實上，我們之所以在今天依然有機會讀到這些文章，是因為《學苑》中的社會派最後堅持獨立出版了「新中國專輯」，使這些文章得以見光。

「四報聯刊」事件之所以值得討論，是因為〈中國向何處去〉、〈理性的黃昏〉、〈我們的立場〉及〈香港往何處去〉這四篇文章，加上1975年12月曾樹基的回應文章〈香港往何處去〉，工整地代表了托派、極左派逃港紅衛兵、《70》無政府主義派及社會派的核心理念，是今日要去了解及比較火紅年代不同派別的思想時最重要的材料。

此外，在〈中國向何處去〉、〈理性的黃昏〉及〈我們的立場〉三篇文章裡共同出現的問題意識——「中國向何處去」，更標誌著，除了六七暴動以外，文革思潮在香港的另一種影響。這三篇文章的問題意識皆可上溯到早期的極左派文革造反派紅衛兵的「中國向何處去」討論。三篇各有特色和側重的文章則代表了「中國往何處去」中關於「中國問題」問題意識的各種延伸方式，當中的分析在今天看起來依然無比精彩及激進。

而順延著「中國向何處去」討論在香港的發展，我也會探討由逃港紅衛兵創辦的、致力於探討「中國向何處去」的兩本雜誌——《黃河》及《北斗》。有別於虞雪的〈理性

¹ 星河，〈香港托派與青年學生運動〉，收入香港大學學生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1978〔1975〕）。

² 梁卓恩，〈四報聯刊的初步檢討〉，《中大學生報》，1975年2月25日，版10。

的黃昏》，這兩本雜誌都遠離了極左派路線，這也因為他們屬於晚期的文革造反派紅衛兵思潮，繼承的是李一哲所掀動的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思潮。

因此，在這一章，我將會根據時序安排內容。首先，我會爬梳「四報聯刊」事件，包括當中出現的論爭、當中最為敏感的〈我們的立場〉、〈中國向何處去〉、〈理性的黃昏〉三篇文章。接著，我會分析〈香港往何處去〉一文——它代表了社會派對托派、極左派逃港紅衛兵、及《70》無政府主義派的回應，也可以彌補在之前章節中對社會派的討論的不足。最後，我會離開大專院校界的討論，著重探討《黃河》及《北斗》這兩本刊物。

9-1 〈中國向何處去〉：「四報聯刊」中的托派代表

「四報聯刊」中第一篇備受國粹派爭議的文章為〈中國向何處去〉，作者是當時已成為托派的吳仲賢。從文章標題可見，這篇文章呼應了 1968 年湖南造反派紅衛兵楊曦光的同名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以下我會以書名號標註楊曦光的大字報，以篇名號標註吳仲賢的文章，以作區分）。我們不妨把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看成是對楊曦光大字報的致敬以及呼應。

9-1-1 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與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

要理解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意識的從何而來，就要先理解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楊小凱原名楊曦光，是造反派組織「省無聯」成員，雖然他是造反派紅衛兵，但其實他出身幹部家庭，以背景來說，楊曦光作為造反派是非常不典型的。1967 年造反派的「一月革命」後，毛澤東對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表示反對，提出以「革命委員會」取而代之，這使得造反派一方面慢慢察覺到毛澤東對造派不是支持到底的，但一些造反派還是以革命委員會的名義成為了「半體制內」的一部份，並且繼續和體制外的造反派通氣。及後，軍隊和造反派紅衛兵的摩擦也越來越大，甚至出現大規模武鬥和 8 月的造反派搶槍的狀況，這就激發了造反派的武力升級，使得「半體制內」的造反派有藉口被清算，連累香港的六七暴動也要跟著停息——這些我在第二章曾詳述過。然而，我在第二章沒有繼續講下去的是，在大量造反派被要求交出槍枝、革命委員會的造反派無法繼續升級文革的同時，還有一部份造反派紅衛兵堅持在「體制外」把文革搞下去，也就出現了「反復辟」的呼聲。這些造反派紅衛兵意識到癱瘓一時的官僚統治要全面復辟，

所以第一個打著「反復辟」旗號的組織「省無聯」誕生了——此時是 1967 年秋天。根據虞雪的說法，省無聯是要「推翻新的官僚統治機構——革委會，並對中國社會進行尖銳的批判」³，而楊曦光在 1968 年 1 月發表的《中國向何處去》就經常被認為是造反派紅衛兵的一次立場聲明。楊曦光說：

中國「紅色」資本家階級目前的總代表——周恩來在二、三月的勝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圖在全國各地立即建立革委會，如果讓資產階級企圖實現，無產階級的退卻就會退入墳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會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發出了反擊的號令。從此偉大的八月局部國內革命戰爭開始醞釀……革命人民已經累積了兩次「財產權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綱領，在中國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資產階級，建立類似巴黎公社的沒有官僚的新社會——「中華人民公社」。還有八月風暴提出的逐步實現軍隊的革命變動。武裝奪取政權的方法，九月以後的反覆和較高級的鬥爭還告訴革命人民革命委員會是「罷官革命」的產物……並沒有消除新的資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尖銳對立，而新的形勢革籌小組和省無聯所代表的人民大眾的尖銳對立表現出來，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的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又出現了。徹底穩定的「財產權力分配」並沒有實現。罷官革命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這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逶迤曲折地變為**資產階級官僚**和幾個陪襯的群眾組織代表人物的另一種資產階級的統治，而革命委員會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產物。⁴

由此可見，造反派衛兵在 1968 年 1 月時，已經出現了「紅色資本階級」的說法，這意味著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並不只是揪出某幾個資產階級官僚而已，而是要有通盤的改造，以杜絕紅色資本階級再次出現。這也是為什麼他們提出了武裝奪取政權，以落實「中華人民公社」——這也意味著要架空黨的統治。

延續著《中國向何處去》的精神，吳仲賢以托派的身份在批判社會主義中國的時候也同意文革把中國推向巴黎公社的目標——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⁵，因此在大方向

³ 虞雪，〈理性的黃昏〉，《學苑》，1974 年 11 月 1 日，版 19。

⁴ 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njian-1966-1976/25.htm>（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 日）。

⁵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學苑》，1974 年 11 月 1 日，版 14-15。

和立場上，和文革造反派是重合的。不過，吳仲賢的文章對中共社會主義最主要的批判在於它的官僚制度，但他不認為這個官僚制度是「資產階級官僚」，也不會認同文革造反派所說的中國出現「紅色資本階級」的說法——因為托派此時認為中國的問題並不在於它是資本主義國家，而在於它有官僚制度。也就是說，兩篇「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意識是一致的，但分析是不同的。

9-1-2 吳仲賢的分析：中國官僚主義及官僚制度的前世今生

吳仲賢文章的主旨，是使用歷史化的方法，解釋中國官僚主義及官僚制度的起源，並且把對中國社會主義的總批評定位在反對其官僚制度之上。和楊曦光不同的是，吳仲賢的分析，首先建立在對於中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的肯定之上。他認為，中國革命「跳過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城市暴動路線模式」，毛澤東以「經驗主義」發現了農民的「革命動力」，發展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總路線是正確的。而第二次國共合作也是正確的，因為中共以此「借力」，沒有犧牲自己的「獨立性」之餘也「培養了儲蓄力量的方法」，使得紅軍成為「一支勁旅」，也使得後續的革命得以成功。而建國後，中共還是從「經驗實踐中加入了不斷革命的成份」，「衝破了革命階段論」——吳仲賢稱之為「人的力量」——這也是呼應了包奕明〈人的力量〉一文——並認為中共的這些是值得被肯定的。⁶

然而，吳仲賢認為，在建國後，中共對「資產階級有限度退讓」，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他提出要認可「人的力量」時，也說到不可以忽略或低估「客觀的力量」——而往往是這些客觀力量導致了中共官僚主義的出現。什麼叫作「客觀的力量」呢？在文章中，「客觀的力量」是多層的、也是被歷史地製造的。第一個「客觀的力量」是中共所依賴的農民力量。吳仲賢說，儘管農民在革命中有「英勇表現」，然而，這不可以彌補農民的「落後意識」一直在拖慢社會主義進程，而他們的落後意識是從「土地關係長期產生出來的」。⁷身為托派的長毛這樣去解釋托派為何認為農民的意識是落後的：「我和托派接觸一開始就是問他們，你們覺得農民沒有革命性，是什麼意思？托派認為農民是小資產階級，要一塊地，所以是工人要當先鋒。」⁸

⁶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版 14。

⁷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版 14。

⁸ 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因此，吳仲賢認為，中共在戰後改造生產關係、發揮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時，由於需要「遠遠高於農民中落後意識水平」的意識，這就「大大提供了官僚主義滋長的可能性」（吳仲賢也特別註明，此時的官僚主義並不等於官僚制度）。雖然吳仲賢指出了中共對農民的依賴導致了中國官僚主義的誕生，但他認為這可以用來否定中國革命，因為這是中共「不得不採用的實踐」——因為中共必須要依賴農民，才可以通過「農村包圍城市」，完成對國民黨的反抗。同時，吳仲賢批評老托派彭述之對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嗤之以鼻並只願意跟奉城市暴動革命路線為正典的看法為「右傾教條主義」。吳仲賢則認為，中共最大的問題並不是依賴及領導了農民進行革命抗爭，而是在借用農民階級的力量奪取政權後的幾年間，並沒有大力發展工人階級的鬥志。⁹由於吳仲賢認為中共在這幾年間「緩衝了階級鬥爭的發展」，阻礙了「社會主義意識在工人的迅速發展」，所以造成「不成熟」的無產階級，這就成為「最大的政治危機」——此為第二股官僚主義誕生背後的「客觀的力量」。¹⁰

另外，加上「農民和追隨者的過量」、「紅軍的建立」、「黨的軍事化」，這些連同之前所說的「客觀的力量」，導致了官僚制度在中國內部的誕生。吳仲賢接著提到，外部的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力量」的「圍堵革命」政策，也催生了內部官僚制度的發展；同時，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從中共建黨開始就一直存在，「蘇共的官僚控制和官僚制度，又腐蝕著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說，吳仲賢認為，國內和國外歷史中一連串事件所塑造出的推進革命的有限條件，都是導致了中國官僚主義及官僚制度的誕生的「客觀的力量」。在這些「客觀的力量」的限制當中，雖然中共很多時候是無可奈何的，但也錯失了一些客觀的時機和條件——特別是沒有在建國後幾年間發展出成熟的工人力量。¹¹

由於沒有成熟的工人力量去取代官僚層作為中國社會建設的動力，吳仲賢判斷官僚層因此成為一個「社會有機體」——也就是沒有和社會群眾融合起來、與群眾的利益結合，而是漸漸與群眾對立起來。吳仲賢認為，「大鳴大放」運動顯示出的對立，就折射了「社會各界及的關係漸趨於緊張」。與此同時，要繼續解決社會生產問題，「左」的官僚和「右」的官僚都給出了藥方：站在右邊的以「物質掛帥」來刺激社會生產；站在左邊的

⁹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版 15。

¹⁰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版 15。

¹¹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版 15。

毛澤東「以主觀能動性」的「精神力量掛帥」，「提高在垂直的集中統治下的群眾創發性」；而文革就是兩條路線之間的矛盾「從黨內以至於黨外的總爆發」。¹²

吳仲賢提到，文革初期，充滿理想主義的群眾在號召「中華人民公社」時，把一切不合理存在「完全放到劉少奇的身上」，而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本身也是官僚制度的一部份。要到了「二月逆流」後，吳仲賢認為造反派這些「極左紅衛兵運動已逐漸化成自覺的反官僚勢力」，「觸覺到決定將來中國命運的矛盾」。雖然從吳仲賢的標題來看，他是高度讚揚造反派紅衛兵的，不過，他並不完全同意造反派紅衛兵認為中上層有「紅色資本階級」的分析。吳仲賢說：

中國的統治階層不是「紅色資本階級」。在社會學意義上，儘管「省無聯」在「我們的綱領」中指出「整個龐大的上層建築都基本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總的來看礙事社會主義的。儘管上層建築對下層建築是必然不斷地發生作用，但只要下層的基本形式還未起質變——這就是說國有化財產關係和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官僚層是不可能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的。統治者對下層的作用，不是由於經濟上仍佔有關係，而是由於政治上的集中壟斷關係。¹³

這一段的重要性在於，他明確地總結了為何他對中共的批判只落在官僚主義，而沒有推演到認為中共是「紅色資本階級」，終究來說，那是因為吳仲賢認為國有化依然是中共在實行社會主義的證據——這正是他和《中國向何處去》之間最大的差異。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雖然吳仲賢在結論處對「中國向何處去」的解放和文革造反派有相似之處——即認為群眾應當發動「反官僚政治的暴力革命」、「砸碎國家機器」、讓中國走向「中華人民公社」的新社會¹⁴——但是，吳仲賢和楊曦光不同在於吳仲賢對應該發起的革命之性質依然鎖定為「反官僚政治革命」——其特色在於認為革命後要建立的社會主義政體雖然允許多黨存在，但依然還是存有「由無產階級指揮」的「集中管理分配」的行政機構，而且必須以有國有制，而公社的存在只因為它是無產階級專政下權力分配的一部份。同時，吳仲賢也特別提及他認為香港的未來路徑也要與中國「反官僚政治革命」連結，也就是香港應該繼續反資、反殖，成為中國反官僚隊伍中的力量之一。托派的長毛就對反

¹²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版 15。

¹³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版 15。

¹⁴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版 15。

官僚主義革命有以下補充：「當時說中國革命不是很遙遠的東西，不過是 30 年的事情。所以當時大家都要去解釋：為什麼中國革命會成功？托洛茨基的分析是很好的。當時就認為是社會主義的突變變成了官僚主義，所以是好像人生了腫瘤你就割瘤，而不是殺掉整個人，托派不是要除掉整個中國社會主義。譬如國有制，他們是覺得好的。所以我們收入，是從中國革命開始討論。」¹⁵簡單來說，托派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批評的重點在於其官僚主義、而不是其國有化體制，這是基於他們認為中國問題並非「紅色資產階級」的判斷，因此，托派倡議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路線並不同意省無聯把中共打掉重練的主張。

9-2〈我們的立場〉與〈理性的黃昏〉：「四報聯刊」中的「極左派」代表

社會派在「四報聯刊」中堅持收納的另外兩篇文章——〈我們的立場〉與〈理性的黃昏〉，前者為「70 戰綫」所寫，後者為逃港紅衛兵虞雪所寫。關於〈理性的黃昏〉的思想內容，葉蔭聰在〈人民的社會主義：初探《理性的黃昏》〉¹⁶一文中已經討論了不少，我非常認同他的分析；不過，由於葉蔭聰的文章比較著重討論虞雪本身的主張以及她對托派的批判，為了不要重複太多葉蔭聰的說法以及延伸葉蔭聰的研究，我將會主要聚焦於分析〈我們的立場〉與〈理性的黃昏〉兩篇文章的相同，並以此為引子，去探討虞雪等逃港紅衛兵的思想在香港的影響力。

9-2-1〈理性的黃昏〉所象徵的造反派逃港紅衛兵立場

「70 戰綫」的歷史，我們在之前章節已經提及，〈我們的立場〉因此可以理解成是代表著比較傾向無政府主義者的《70》對中國的看法。那麼逃港紅衛兵虞雪代表的又是什麼派別的看法呢？根據葉蔭聰的研究，虞雪「在 1966 年文革開始時是廣州七中的學生，與如今比較著名的前廣州造反派紅衛兵劉國凱、王希哲等是同代人，皆是文革初年的紅衛兵……虞雪就是在 1973 年逃到香港的。差不多時候逃港的有林志毅、余源宇、蔡志誠、蔡可風、吳甦等等」¹⁷。從〈理性的黃昏〉對省無聯的高度認可看來，我們可以把虞雪當年的文章看作是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的直接延伸，也就是說，虞雪代表的是逃港紅

¹⁵ 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¹⁶ 葉蔭聰，〈人民的社會主義：初探《理性的黃昏》〉，《思想香港》7 期（2015）。

¹⁷ 葉蔭聰，〈人民的社會主義：初探《理性的黃昏》〉。

衛兵中極左造反派的立場。事實上，我們不要被吳仲賢的致敬標題誤導了——虞雪的〈理性的黃昏〉比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更接近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的分析，也把《中國向何處去》中的「紅色資產階級」概念加以理論化。虞雪的伴侶吳甦這樣演繹《理性的黃昏》與《中國向何處去》之間的關係：

……虞雪的〈理性的黃昏〉一文可以說大致上是我們的看法……

自然，在〈理性的黃昏〉裡，有我們自己的新的觀點，相對於《中國往何處去》應該是認識的一個新階段。不過，《中國向何處去》以當時的形式出現時有它的種種限制。文革發起時，毛澤東以率領人民向官僚集團宣戰的姿態出現，到文革後期，群眾的自發的革命使毛澤東感到個人和政權的危機，換句話來說，毛澤東出於必然，實行由「革命」的姿態轉變為另一種姿態。

《中國向何處去》的作者是看到這一點的，但處於當時的情勢，〔楊曦光〕他只能把毛澤東給人民的許諾當作理想的旗幟高揚，並以此作為向整個官僚制度作戰的口實。¹⁸

也就是說，〈理性的黃昏〉認為《中國向何處去》礙於社會情勢的限制，不能把話說得太白，因此在批評以周恩來為首的紅色資產階級政權的同時還是肯定毛澤東的；於是〈理性的黃昏〉認為自己是建立在楊曦光的努力之上，一來把《中國向何處去》不敢說的對毛澤東及中共的批評說出來，二來完成了《中國向何處去》的理論化——把「紅色資產階級」的概念發展成完整的對中國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分析。

從〈理性的黃昏〉來看，虞雪所代表的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的理念及立場，首先是認可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三大原則——「剷除舊的國家官僚，實行人民選舉和撤換制，以保證政府工作人員成為人民的公僕」、「撤銷常備軍，代之以人民武裝」、「實現人民管理」¹⁹——並認為省無聯這樣的組織是和巴黎公社的追求一脈相承的，它象徵的是一股新生的社會主義潮流，對抗著「宗教社會主義」的專制，最重要的是消滅階級和資本。也就是說，〈理性的黃昏〉代表的是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的立場。²⁰在〈理性的黃昏〉中，虞雪討論的主題涵蓋四個面向：（一）以社會學及哲學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提

¹⁸ 吳甦，〈寫在再版之前〉，收入吳甦編，《敢有歌吟動地哀：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青年詩文選》（香港：70年代雙週刊，1975），頁6-7。

¹⁹ 虞雪，〈理性的黃昏〉，版17。

²⁰ 虞雪，〈理性的黃昏〉，版17。

出批判；（二）以巴黎公社的原則，對蘇聯及中國革命的歷史成效提出質疑；（三）對國有制提出分析及批評；（四）對文革做出歷史的分析。

首先，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討論中，虞雪同意馬克思主義中人文主義的成份——也就是「生命的本能」和「個人價值的重視」；然而，虞雪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特別是列寧主義的社會運動）到最後是對這些人文主義的貶抑。她認為這歸根究底和馬克思主義對辯證法的獨尊有關——辯證法被規定為「自然社會，以及歷史的內在規律」，但實際上卻是以「思辨邏輯代替世界自身的法則」，也就造成一種歷史的「必然論」，構成了中國「奴隸心理的精神因素」。²¹具體來說，虞雪認為辯證法規定了革命必須通過一個階段，要以一個階級打倒另一個階級才能產生，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階級的理論」，以「一個階級的狹窄利益取代人文主義的高貴價值」，而自命代表著無產階級的黨也被合理化了。但虞雪卻判斷，這最終只是重複了「新興的階級利用被剝削階級的力量奪取政權」，透過建立新的專制階級，進行「新的剝削形式」。²²

看到這裡，很多人可能會得出一種「去政治化」的結論，認為虞雪對馬克思主義實踐的批判，是否只是重複著「政治就是權鬥」的老套路？然而，虞雪透過對巴黎公社原則的認可，以及將蘇聯和中共進行比較的方法，顯示了其論述的政治化一面。她認為，巴黎公社的原則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精神實踐，因為它去除了「專制階級」，也就杜絕了專制階級進行新的剝削形式的可能性，因此巴黎公社才是消滅階級的做法。無論是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宣言》消滅私有制的提倡，還是對先進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統治提出的措施，抑或蘇聯及中國，都只是以「國有化」替代「私有制」。在她看來，這些只不過是以「國家佔有形態」來緩和「西方資本主義像壟斷資本主義形態發展」，人為地把資本主義推向下一個階段——國家資本主義，這也是虞雪對國有制的分析。虞雪站在支持社會主義的角度，認為不應將國有化「混淆」成了社會主義的標誌；而她認為一個國家是否實行社會主義的判準，應該是建立在「它的生產方式的性質」，而非是否「國有化」。因此，在文章結尾，虞雪提出四種改革，並認為只有完成這四種改革，才能被稱為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取消舊的分工；（二）取消貨幣、商品及商品價值；（二）取消工資制；（四）實現人民消費決定社會生產，需求決定供給的計劃經濟。前三點都比較容易理解，第四點的「人民消費決定」是什麼意思呢？虞雪認為，在蘇聯式的國家經濟中，追求最

²¹ 虞雪，〈理性的黃昏〉，版 16。

²² 虞雪，〈理性的黃昏〉，版 17。

大限度的利潤依然是國民經濟計劃的依據，因此，工人的工資被壓低就和以前資本家要剝削工人以提高利潤一樣，只不過現在換成國家資本在剝削。而虞雪認為，這樣的情況下所制定的工資及生產，並不是為了回應人民的需求，而是為了服務國家資本追求利潤的需求。

由此可見，雖然虞雪的〈理性的黃昏〉和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都同意巴黎公社原則，但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第一，虞雪對中國革命及中國社會主義是否定的，吳仲賢對此是肯定的。第二，虞雪延伸了楊曦光「紅色資產階級」的分析和判斷，更把特權階級的誕生和國家所有制聯繫起來，把國有制看作國家資本主義對生產資料的操控，因此推斷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和吳仲賢等托派對國有制的推崇有天壤之別。也因此，第三，虞雪為中國未來開的藥方，是推舉像省無聯這樣的造反派，認為他們的反復辟運動「處處露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自發萌芽」，「群眾開始接觸真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就是說，並認為只有省無聯所說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到達中華人民公社的彼岸——這跟吳仲賢認為只要一場「反官僚政治革命」就可以達到巴黎公社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值得一提的是，虞雪的〈理性的黃昏〉與 1972 年內蒙、陝西和北京幾位知青提出的「幹部是一個階級」論、1974-1975 年間南京的徐水良提出的「反對特權」論和 1974-1976 年間陳爾晉的「特權資本」論和「無產階級民主革命」論，都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論述皆指出了「國有制」和「特權階級」之間的關係，而且皆是對文革早期的造反派思潮的深化。²³這也反映了在文革期間，中國民間思想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理性的黃昏〉不該被當作是文革中可以徹底反思文革及深入討論政治出路的孤例。

9-2-2 逃港紅衛兵對《70》的影響及兩派的合作

誠如葉蔭聰所言，〈理性的黃昏〉所代表的極左派逃港紅衛兵的思想在香港屬於「曇花一現」，也沒有「生根發芽」；²⁴不過，如果我們看到〈理性的黃昏〉對〈我們的立場〉的影響，就可以說，虞雪一派的逃港紅衛兵思想曾被「70 戰綫」接棒，甚至成為「70 戰

²³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下）：1966-1976〉，《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台北：聯經，2012），頁 131-36。

²⁴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下）：1966-1976〉，頁 131-36。

綫」的立場。如莫昭如自己所說，《70》的思想資源有兩大源頭，一個是來自西方的激進思潮，另一個則是逃港紅衛兵。²⁵

根據長毛比較間接的認知，幾個最重要的曾和《70》合作的逃港紅衛兵，包括虞雪和她的伴侶——來自廣東的吳毗，以及名為黃望潮的逃港紅衛兵；及後，黃望潮成為托派，而長毛形容吳毗和虞雪是「無政府主義者」而非「馬克思主義者」。至於這幾個重要人物的下落，長毛說：「吳毗和虞雪後來也就走了，吳毗後來去了法國，在第七大學吧。黃望潮後來瘋了，死了。」²⁶

回到一開始，《70》是怎麼和逃港紅衛兵結緣的呢？莫昭如說：「《70年代雙週刊》有一期用毛澤東做封面，有一個黑色手的毛澤東，那一期叫『中國革命中的黑手』。那些前紅衛兵看到這個封面很興奮的來找我們聊天，我們就因此被他們的影響。」²⁷他所說的那一期，就是1971年10月出版的《70》第24期。但實際上，這些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並不是在1971年就去找《70》的。不少造反派紅衛兵是在1973年之後才逃到香港，也就是說，造反派紅衛兵對《70》的影響應該是在1973年以後才出現。這也解釋了為何1973年後《70》對中國問題的的分析要較之前有明顯的深入。



圖 19：1971 年《70 年代雙週刊》第 24 期封面

²⁵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²⁶ 梁國雄，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²⁷ 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 年 1 月 24 日。

關於《70》與這群逃港紅衛兵的相遇，阮志雄曾提到許多正面的印象和欣賞，譬如他就曾說過這些逃港紅衛兵「理論基礎很強」、「對本身的所學有反省」等。在阮志雄的印象中，他們與逃港紅衛兵的契合，一方面固然是因為《70》在他們身上獲得許多關於大陸的一手資料和深度分析，而且「我們當時覺得省無聯很正，很擁抱省無聯」。另一方面，這群極左逃港紅衛兵來到先港後，也積極地吸收新左翼的革命觀點。阮志雄說：「雖然他們長年以來在大陸受教育理論基礎是建立在毛派和蘇聯的革命理論，但是這一批紅衛兵他們來了香港以後，有機會接觸西方的革命理論，看到了新左派、佛洛姆、佛洛伊德、看到南斯拉夫講『人性的社會主義』，他們的辯證思維讓他們很容易就找到什麼 narrative 是 convincing 的，他們就會對本身的所學有反省。他們其實是知道本來自己的那一套很教條，而他們都知道這是有問題的、有不妥的，所以就會有不同的反省……他們看到自己的盲點，想從簡單的左右意識形態走出來，想回看文革這個事情。在港那群紅衛兵的那種行事的心態都和自己本身的討論及關注和想 overcome 的東西有關。」²⁸如果我們了解到這些極左派逃港紅衛兵對外在於中蘇革命理論的好奇，就不難理解為何《70》和吳甦、虞雪等極左造反派紅衛兵會如此投契——因為兩者皆對西方激進主義理論有莫大的熱誠。而理解到兩者得以彼此契合背後共同興趣，就不難理解為何〈我們的立場〉和〈理性的黃昏〉會如此高度相似。

〈我們的立場〉和〈理性的黃昏〉到底有多相似呢？首先，兩者的立場和分析是基本上一致的。在〈我們的立場〉中，「70 戰綫」對中共的分析，也是認為中共走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因為「中共政權下的經濟制度，僅是把生產資料國有化，以國家來控制國內市場，以國營企業代替私人企業」，「而生產資料國有化，並不等於生產資料社會化，更覺不等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²⁹甚至，兩者所倡導中國要走的路線都是一致的，當虞雪提出中共應該完成「取消舊的分工」，「取消貨幣、商品及商品價值」，「取消工資制」及「實現人民消費決定社會生產，需求決定供給的計劃經濟」四項改革時，「70 戰綫」也提出幾乎完全一樣的四項改革訴求，包括「生產資料社會化，而非國有化；生產管理方面全由工人選出的代表組成的工人委員會負責統籌和管理；在生產形式上，取消分工制」，「取消金融制度，包括貨幣和商品」，「取消僱傭勞動制」及「以人民消費決定社會生產和以需求決定供給的計劃經濟」。³⁰

²⁸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 年 6 月 26 日。

²⁹ 70 戰綫，〈我們的立場〉，《學苑》，1974 年 11 月 1 日，版 12。

³⁰ 70 戰綫，〈我們的立場〉，版 12。

如果硬要說〈我們的立場〉和〈理性的黃昏〉之間最大的差異，那就是兩者的研究方法不同：〈理性的黃昏〉在抽象的及哲學化的推論中結合歷史資料，以比較動態的方法去理解中國為何成為「國家資本主義」；而〈我們的立場〉只是以邏輯推論及理想的立場，靜態地比對中共當時的狀況與他們的理想之間的差距，從而得出中國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判斷。但除此以外，兩篇文章的分析、判斷、立場、結論和倡導的路線，都是一致的。

此外，極左造反派紅衛兵對《70》的影響不只見於〈我們的立場〉。1974年後，《70》有許多出版計劃和宣傳極左造反派紅衛兵的思潮有關。1974年，《70》以自己的出版社出版吳甦所編的《敢有歌吟動地哀：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青年詩文選》，幫助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出版了自己的專書。不僅如此，《70》在這本書的發行上也幫忙包辦了許多工作，其時身在《70》的阮志雄回憶：「譬如《敢有歌吟動地哀》出書的時候，我就是背著去不同的書局去賣。第一版的《敢有歌吟動地哀》賣得很快，這是最早期的傷痕文學——當時其實連傷痕文學這個詞都沒有呢。」³¹而正因為這本書在當時來說如此罕見，《敢有歌吟動地哀》在青年之間反響很好，三個月後又再版了一次。³²此文集收錄了逃港紅衛兵的詩歌、散文、小說、插圖，雖然這些文章並不是直接的政治評論，而是比較抒情和感性的文章，而且寫得比較抽象和迂迴，也用了許多象徵和隱喻的手法，但吳甦認為這是反映及批判了文革時的社會問題，因為「在長期的極權統治下，大家不能和避免用直接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這些文學的時代意義在於它們的存在是對中共所謂「寫實主義文學」（他認為那不過是「新理想英雄主義」文學）的回應。³³

1975年，《70》更是積極把極左造反派紅衛兵的思想介紹到英語世界中去。《70》出版的 *The Revolution is Dead. Long Live the Revolution!*（《革命已死，革命萬歲！》）一書就是其中一例。「革命已死，革命萬歲」一話雖然是馬克思的名言，而馬克思寫這句話時對應的是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義的預警；這本書收錄了從極左角度分析文革的文章，而根據《70》在〈我們的立場〉的說法，他們在引用這一句話時，對應的就是文革的語境。如同虞雪在〈理性的黃昏〉中提到的「真革命在假革命中誕生了」和「社會主義運動扼殺了，社會主義革命在前進」³⁴，《革命已死，革命萬歲！》標題的意思是，「肉體可以消

³¹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年6月26日。

³² 吳甦，〈寫在再版之前〉，頁1。

³³ 吳甦，〈寫在再版之前〉，頁13。

³⁴ 虞雪，〈理性的黃昏〉，版18。

滅，思想卻因強獲得鎮壓而茁壯起來」，也就是說文革中的極左造反派紅衛兵在鎮壓中興起了真正的革命。³⁵而這本書對推廣極左造反派紅衛兵的思想有很大意義。

同年，《70》中一些成員開始出版英文刊物 *Minus 9*。此刊物為獨立出版組織「另類出版聯合」(Alternative Press Syndicate) 亞太分支的每月評論。刊物的標題「減9」是以歐威爾的反烏托邦科幻小說《1984》為典，從出版當年向1984年的倒數；因此，在1976、1977年，《70》持續出版了 *Minus 8* 和 *Minus 7*。在這本刊物中，《70》成員翻譯了一些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的觀點。譬如，在 *Minus 8* 第5期，《70》的成員就介紹吳甦為「極左派」(Ultra-Leftist)，並翻譯了《敢有歌吟動地哀》前言裡《學苑》對吳甦的訪問。³⁶

阮志雄在訪問中也表示，*Minus 9*、*Minus 8* 和 *Minus 7* 此系列的出版之所以發生，一方面是因為《70》認為在香港辦雜誌沒有足夠的人和銷路，另一方面也是出於想要介紹香港和中國的運動及思潮到外國去的一次嘗試。他說：「莫昭如是個要不停繼續做事的人，他當時覺得在香港做雜誌沒有可能、沒有足夠的人和銷路，那做一個沒有《70》那麼 heavy 的一本東西，就開始對外國做 *Minus 9*。莫昭如想繼續發生一些東西，也想將香港發生的東西介紹到外國去。此外，香港也是一個窗口，一個認識中國的窗口……對莫昭如來說，任何可以維持社會運動的事情，無論是多微小的事情他都會 promote。」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70》對推動逃港紅衛兵的思潮如此不遺餘力——莫昭如認為這些思想可以為社運低迷期間的香港及世界社會運動帶來一些新的刺激。

雖然我同意葉蔭聰的說法——即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在香港是「曇花一現」的——但從以上種種《70》對推動逃港紅衛兵思潮的努力中，我們可以看到〈理性的黃昏〉的思想早已和《70》本身的理念及行動計劃融合起來。雖然「70戰綫」和這些逃港紅衛兵的能見度都是很短壽的——過了火紅年代就被遺忘了——但「70戰綫」的許多參與者如莫昭如、阮志雄等，多年來依然活躍於香港文化圈，〈理性的黃昏〉的種子似乎也在他們身上找到了新的生命。

³⁵ 70戰綫，〈我們的立場〉，版13。

³⁶ Alternative Press Syndicate, "An Interview with an Ultra-Leftist from China," *Minus 8*, no. 5 (1976): 14-20.

9-3 〈香港向何處去〉：「四報聯刊」事件餘波中的「社會派」代表

事實上，國粹派和社會派之所以會在這三篇文章上出現分歧並引發「四報聯刊」事件，正正又是延續著自反貪污運動和反加價運動一路以來國粹派和社會派的鬥爭。然而，在之前的運動中，由於社會派與托派、無政府主義派經常處於聯盟狀態，我們似乎難以明確指出社會派和托派、無政府主義派的差別。

那到底社會派是托派嗎？根據星河的說法，社會派有時看起來像是托派，或總是會站在托派那邊來反對國粹派，這不過是因為社會派和國粹派積怨已深，並不是因為社會派是托派；社會派事實上「對托洛茨基主義和托派的歷史還是非常膚淺，談不上贊成或者反對」，他們借用托派的論述，出發點也是對「國粹派搞『認識中國、改革社會』運動的態度和方法，有很大的不滿」，認為這是「一面倒」搞「感性的宣傳」，對「改革社會」越來越保守退縮。³⁷筆者沒有足夠資料、也認為沒有客觀的標準佐證或評論社會派是否對托派認識不深，但我們從社會派堅持刊登的三篇文章——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70戰綫」的〈我們的立場〉及虞雪的〈理性的黃昏〉——中看到，後兩篇文章確是與托洛茨基主義有很大距離。但從社會派對這三篇文章的堅持中，我們也可以推論說社會派其實並不是由單一理論或立場所構成，它只是一個校內批評國粹派的左傾思潮的代名詞。

既然社會派既不是托派、也不是「四報聯刊」中的「極左派」（無政府主義派和逃港紅衛兵極左派），那社會派是怎麼想的呢？我認為，在 1973 年出謀命名了「社會派」和「國粹派」的、屬於社會派的曾澍基的文章，可以說代表性地宣示了社會派的立場。

1975 年 12 月 5 日，曾澍基於《學苑》刊登了〈香港向何處去〉一文。由標題及內容可見，此文是為了回應自「四報聯刊」事件所引發的「中國向何處去」討論。不過，有別於「四報聯刊」中的文章主要是直接回應楊光曦的《中國向何處去》，並且延伸文革的思潮。〈香港向何處去〉並不花太多篇幅討論文革，而是在於總結社會派對香港和中國的現況分析及展望。和其他派別一樣的是，社會派一開始就開宗明義提到香港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部份，他說：

³⁷ 星河，〈香港托派與青年學生運動〉，頁 199。

我同意香港前途問題，一定要與中國結合來看。但問題不在香港何時或應否歸返中國，而是香港應以那種方式與中國復合；中國現行的是那樣的制度？她的發展如何？香港未來的發展如何配合中國未來的發展？這些才是問題的中心。³⁸

接著，曾澍基展開了兩部份的分析，一部份是分析香港，另一部份是分析中國。面對香港，曾澍基認為本地存在許多社會問題。政治上，英國下議院表明「香港不會有任何憲法上的改革」，因此香港存有著「代表英國籍本地少數資本家利益的落後政治架構」；經濟上，「高壟斷」的資本主義使得剝削問題嚴重；社會文化上，曾澍基認為香港有「黃賭毒氾濫」、「風氣敗壞」的問題。面對大陸，曾澍基認為幹部權力太大、不受人民管治是最大的問題。儘管在這方面，他的批判是接近文革極左派及托派的，但他對中國開出的「藥方」又和其他派別不一樣。他認為，中國應該「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化」——也就是以非暴力民主化運動的方式解決中國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

曾澍基之所以不同意「四報聯刊」中托派與極左派提倡使用「革命」這種特定的改變社會的方法，是因為：（一）革命會導致長期動亂，而中國收到蘇修及帝國主義環視，動亂尤其危險；（二）中國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國家，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三）曾澍基認為中共上層幹部是有自覺的，而且自身也有改變自身過分集中權力的內部動力，所以群眾運動可能與官方自身的改革動力配合。³⁹換句話來說，社會派與托派、極左派最大的差別在於，社會派認為「布拉格之春」的模式在香港和中國是比較可行的（而曾澍基的確在文章中用了布拉格之春為例子⁴⁰）。這是社會派與其他派別不同的第一個地方。

社會派與其他派別的另一個不同，在於對香港本土議題有更多關注，也比其他兩派花了更多篇幅去敘述香港的抗爭在原則上及實作上如何配合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首先，在原則上，曾澍基認為香港的反資反殖運動應該是「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一部份。在香港推行反資反殖運動，不但可以解決香港本身的社會問題，也不會與中國的方針相阻。⁴¹這個判斷很明顯和國粹派非常不一樣，那麼他是怎麼回應國粹派認為「反資反殖」與中國社會主義相矛盾的論點呢？他說：「中國從來沒有說不應反資反殖，只說香港問題應在

³⁸ 曾澍基，〈香港向何處去〉，《學苑》，1975年12月5日，版1。

³⁹ 曾澍基，〈香港向何處去〉，版1-2。

⁴⁰ 曾澍基，〈香港向何處去〉，版1。

⁴¹ 曾澍基，〈香港向何處去〉，版2。

時機成熟才解決。」而和國粹派把香港前途完全交託給中共不一樣：他認為，這個「時機成熟」不是靠等待來實現，而是透過在反資反殖的過程中加深對中國的認識、檢討和批評，以累積足夠的力量，「主動地提出與中國復合」並參與到未來會出現的「中國復合談判」之中。⁴²由此可見，社會派的理念，其實延續了保釣後期統一路線和反殖路線可以如何融合起來的思考——這和《70》無政府主義派及極左派逃港紅衛兵很不一樣，無政府主義派及極左派的討論從來都是與「統一路線」、「與中國復合」或「回歸」劃清界線的。社會派想像，如果香港有足夠的民間力量，那當中國、香港與英國三方一同談判解決香港的未來時，香港在這個談判過程中就可以擔當「最主動的一方」。這個主動性一方面可以保障香港及中國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動中國民主化運動。⁴³這也是自保釣後就出現的一種路線的倡議。

最後，曾澍基別具慧眼地指出白領階級的激進化是香港資本主義發展中會出現的新現象，而爭取白領群眾可以有效壯大反資反殖及認識祖國的力量。⁴⁴用現在的眼光看來，這的確是一個準確的判斷——八〇年代香港社會運動的關鍵字就是白領抗爭及壓力團體的興起。

9-4 「四報聯刊」事件餘波

《學苑》的「新中國專輯」出版後，社會派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批評終踩到了國粹派的底線，一些《學苑》內部的國粹派編輯對此專輯感到非常不滿，他們因此把「四報聯刊」流產的事情爆了出來，並將流產歸咎於社會派把持《學苑》的作風橫蠻、搞分裂。這場由國粹派發起的「內爆」本來是希望透過此事打擊社會派，但沒想到卻引來《中大學生報》及中大學生會中未能掌權的社會派的反擊。結果，國粹派研判形勢，認為這場內爆到最後只會引火上身，遂再次把所有對國粹派的批評說成是「與托派有關」。⁴⁵

這一次，國粹派動員了自己掌權的學生會人脈，在校內發表了明確的對托派的批評。在港大，屬於國粹派的學生會會長崔綺雲就向《學苑》提出不信任動議；⁴⁶在中大、崇基、

⁴² 曾澍基，〈香港向何處去〉，版2。

⁴³ 曾澍基，〈香港向何處去〉，版2。

⁴⁴ 曾澍基，〈香港向何處去〉，版2。

⁴⁵ 星河，〈香港托派與青年學生運動〉，頁199。

⁴⁶ 鍾耀華，〈家國、責任、香港——麥海華（上）〉，<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22-opinion-70s-makh-oiwah-a/>（檢索日期：2021年7月12日）。

聯合三所學生會的國粹派幹事則發表〈撥開雲霧，認清方向——就當前問題致全體中大同學書〉，把「認識中國、關心社會」工作所遭遇的各種問題全部歸咎為「三五個別有用心的人」——也就是托派——身上，說他們「造謠污蔑，人身攻擊，煽風點火，在同學中劃分派別」，甚至開宗明義說「聯繫到近期香港托派組織的頭頭頻頻出入中大，要在大學裡『成立激進之青年組織』，『讓學生會的「官僚」架構接替』，『清洗學生界的反動份子』等等言論，不是發人深省嗎？」⁴⁷而在學生報的江湖，《中大學生報》發表〈四報聯刊的初步檢討〉，呼應了〈撥開雲霧，認清方向——就當前問題致全體中大同學書〉，文中同樣提到托派有「國際背景」，而學生「不應有與之有任何組織上的連繫和瓜葛」，「應保持其純潔性和自主性」。⁴⁸由此可見，托派不但再一次成為社會派的替罪羊，國粹派這些左派此時的批托論述更是搬出「學生的純潔性」的說法為自己撐腰——這正是在六七暴動後恐左的氣氛下第一波中運期間反對中運及左派的論述。

不過，社會派並不是完全對此批托言論袖手旁觀。一篇名為〈政治恐嚇和訛詐〉的文章說道：「學生界中有沒有托派及其他政治團體是另一回事，同學們當然要關注，但這裡有的是同學們對幹事會的批評，學生會得不到同學的信任，絕對不是無中生有的，但今天的幹事會，卻置眾人之批評於不顧，動輒以『托派』之名含沙射影，並暗裡製造內部，放流言，帽子亂飛，以恐嚇同學。且看《撥開》一文中，引《每日戰訊》、《十月評論》之言論，更將本校同學的大字報，《新亞學生報》與此等言論連在一起，曰『三五人』芸芸，到底是何居心？」⁴⁹可見並不是所有同學都為國粹派的盲目批托埋單。

1975 年，港大的學生會幹事選舉中，社會派的麥海華閣擊敗了國粹派的鍾瑞明閣。雖然國粹派在其他院校的學生團體中依然佔據主流，但這次落敗象徵著國粹派正要漸漸失去本來的陣地。港大國粹派對此尤其敏感，因此，1974 年以國粹派為主的內閣便於 1975 年 1 月用「七四年度幹事會」名義發表了收錄在《學生會通訊特刊》的〈托派如何插手學生運動〉一文，孜孜不倦地希望透過批評托派挽回失勢。文章說：

今年九月，一群號稱「革命左派」的托派份子，在新蒲崗製造騷亂，又在九龍公園搞了兩次所謂「四反」「四不交」集會（反加價、反失業、反壓迫、反貧窮和不交租、不交電話費、不交水費、不交電費）。他們舉起黑旗（黑旗是托派的旗

⁴⁷ 星河，〈香港托派與青年學生運動〉，頁 199。

⁴⁸ 梁卓恩，〈四報聯刊的初步檢討〉，版 10。

⁴⁹ 星河，〈香港托派與青年學生運動〉，頁 199。

號)，號召工人佔領工廠，推翻殖民政府、推翻資本主義，要成立香港「社會主義」獨立王國……什麼是「托派」？「托派」是二十年代蘇聯的一個政治流派，後來逐漸墮落為一個特務組織，專門從事暗殺、焚燒工廠、綁架等勾當。托洛茨基一手締造了「第四國際」，其人數雖極少，卻散佈全球。過去，中國也有其支部。抗日期間，他們就反對和破壞「民族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充當日本侵略者的工具。

50

該文不但錯把「舉黑旗」看作是托派的旗號（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更曲解托派說他們要搞獨立，甚至造謠說他們是「特務組織」。而些資料錯誤顯示了大專院校界的國粹派為了打擊托派已經放棄了基本的事實核查。此時的國粹派，已經打算把社會派歸咎成由「特務組織」托派煽動。就如《70》的阮志雄所說：「他們的心態就是要打擊異己，要 isolate 敵人」。在之前的反加價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國粹派對托派已經非常有敵意，而當時對托派的針對，主要還是可以依憑托派的很多出版物可被拿來當批評的材料。但到了「四報聯刊」後，國粹派對托派依然鏖而不捨，則不僅因為材料多少的問題——畢竟《70》的〈我們的立場〉及虞雪的〈理性的黃昏〉都表明了更為徹底的反中共立場。對此，阮志雄的說法是：「那時托派是他們的大敵，要先孤立來打。無政府在他們眼中只是散兵游勇。」⁵¹

「四報聯刊」事件雖然只是校園內的小風波，但它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事件。首先，不僅因為當中涉及的文章都蘊含著思想的深度，也因為無論是這些文本本身，還是其引發的餘波，都顯示了各派的思想內容——這就讓我們看到社會派、無政府主義派和托派與國粹派之間的糾紛，其實遠遠大於在社會運動中行動與否等「實際操作」問題，而是涉及他們對香港及中國的具體分析和看法，以及這些看法背後的理論差異。此外，我們可以明確看到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對無政府主義派的影響，以及雙方的契合——這是六七暴動以後文革對香港的另一種影響。然後，透過並置及對比托派及（受到逃港紅衛兵影響深刻的）無政府主義派在「四報聯刊」的文章，我們終於可以釐清無政府主義與托派在思想上的分歧——雖然托派與無政府主義派經常一起在街頭行動，但是要在這些文章中，我們才可以理解彼此思想差異的內核，其實源自他們對中國的分析以至於

⁵⁰ 港大學生會通訊，〈托派如何插手學生運動〉，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5〕），頁94。

⁵¹ 阮志雄，私人訪問，2021年6月26日。

革命路線的想像都非常不一樣。最後，從「四報聯刊」事件中社會派對三篇文章的堅持，我們更可以理解社會派在思想上的特色——社會派並不服膺於任何一個理論，但是遊走在批判中共的左翼思潮之間。而「四報聯刊」事件所引發的批托浪潮，也反映了托派如何繼續成為社會派和無政府主義派的替罪羔羊——國粹派對托派的針對是包含了策略性的，當中也有做得不公平的地方。

9-5 「中國向何處去」的其他延續：《黃河》與《北斗》

以時序來說，虞雪和她的伴侶吳甦是最早在香港以逃港紅衛兵身份發表公開政治評論的，也是引起最多討論的（至少在火紅年代的青年之間）。然而，就如葉蔭聰所說，我們不該把紅衛兵看作一個社會性質和政治性質統一的群體，紅衛兵事實上有著不同的政治傾向。⁵²接下來，我將探討另外兩本逃港紅衛兵刊物——《北斗》及《黃河》，以更加立體化逃港紅衛兵的場景。

跟與《70》比較相近的虞雪、吳甦等極左造反派紅衛兵不一樣，雖然《北斗》和《黃河》皆為造反派刊物，但並不是極左派。雖然《黃河》中有個別人士和《70》比較親近，但兩本刊物都沒有顯示出在〈理性的黃昏〉中的極左派傾向。雖然這兩本刊物也延續了造反派在大陸時的「中國往何處去」問題意識，但其非極左派的轉向也顯示了大陸文革造反派從文革前期到後期的思考中心上的轉移。

我們不妨把文革分成上下兩個時期：上期是 1966 至 1968 年，下期是 1969 至 1976 年。其分水嶺在於 1968 年省無聯被鎮壓及之後出現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山下鄉運動的起源之一，在於毛澤東希望藉此去分散文革中造反派的力量，以杜絕再有類似省無聯這種造反派學生聯合起來的可能。

就這樣，本來在全國亂奔、自由自在地串聯的知識青年就被安排進行上山下鄉。1968 年，在學學生被調往農村的總數達到 1,600 萬人。一些知識青年是主動投入到上山下鄉去，也就是「緊跟統帥毛主席，廣闊天地煉忠心」；但另一部份知青是被逼下鄉的。而就算是主動投入上山下鄉的人，很快就遭遇了打擊和困惑：生活的困苦、看不到前路、和

⁵² 葉蔭聰，〈人民的社會主義：初探《理性的黃昏》〉。

當地農民關係不融洽、或對政治不滿等。同時，這些被打散了的造反派在農村看到了城市以外的中國，所以在思考中國的改革未來時有了不一樣的知識資源。

此外，在 1971 年林彪的喪生對造反派來說是非常震撼的事。1971 年，林彪集團與江青集團之間的矛盾白熱化，中國高層的派系鬥爭導致了林彪出逃墜機喪命；在此之前，由於林彪在造反派心目中是毛澤東的正統繼承者，而林彪的死似乎意味著用革命的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是此路不通的，這也造成了文革中的社會與精神危機。⁵³結果，一部份造反派的立場從省無聯的「把文革堅持到底」，改為要批判文革，認為文革反人道、反人性、反文化。⁵⁴

李一哲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造反派在文革後期的政治意識上的大轉變。「李一哲」其實並不是一個人，而是李正天、陳一陽和王希哲等造反派的聯合筆名。1974 年 11 月，李一哲在廣州街頭發表《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大字報。這篇大字報有許多典型的文革語言特色——以高度讚揚毛澤東的方式批評中共、以指桑罵槐的技巧和鞭屍林彪的方法批評四人幫如何破壞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大字報最後更提出六點要求：（一）「要法制不要『禮治』」，意思是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二）「限制特權」；（三）「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四）以明文規定「制裁反對派」，意思是制定條例嚴禁知法犯法、公報私仇、行私刑、草菅人命等「法西斯專政」；（五）「落實政策」，意思是政府和黨的政策不要經常改變；（六）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⁵⁵

這篇文章在政治立場上雖然有和極左派相似的地方，譬如「限制極權」和「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就和巴黎公社的第三原則一致，然而綜觀全文，文章想要到達「巴黎公社」的彼岸路線卻是離開了極左造反派一開始的倡議。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認為是走資派甚至「紅色資本家」的鄧小平、趙紫陽等人，現在被李一哲同情：「難道林彪一夥制造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成千成萬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麼？難道大批雖然犯過這樣成那樣錯誤但經過長期考驗證明是對黨忠誠的老幹部就不應該再使用了？鄧小平……趙紫陽這些同志根本就不應進入中央委員會是不是呢？即使給他們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眾』手里，隨時準備給他們再戴上是不是呢？」⁵⁶而第六點訴求「各盡所能、按勞分

⁵³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下）：1966-1976〉，頁 147。

⁵⁴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下）：1966-1976〉，頁 130。

⁵⁵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njian-1966-1976/41.htm>（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0 日）。

⁵⁶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njian-1966-1976/41.htm>（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20 日）。

配」的說法也鼓吹給予物質獎勵，認為可以「調動和保護人民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⁵⁷此外，李一哲對反復辟運動也不贊同，認為反復辟運動不過是跟林彪一夥的——是為了保衛文革的成果，無助於恢復被林彪破壞的「黨的、軍隊的、工人階級的革命團結」。也就是說，李一哲從保衛文革變成要結束文革。以《黃河》的話來說：「他懂得從知識份子的象牙塔裡走出來，不談共產主義的『中華人民公社』，不談毛澤東的『消滅資產階級的法權』『消滅三大差別』，不談『打爛國家機器，實行群眾專政』，而是談『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⁵⁸也就是說，其實李一哲距離極左派推崇的巴黎公社目標和手段已經很遠了。

1976年4月5日，周恩來去世引發了群眾在天安門聚集，透過悼念周恩來質疑四人幫，喊出了要民主富強的呼聲。這無疑是對毛澤東主義的間接批評，也象徵站在毛澤東的左的一方或比毛澤東更左的極左造反派思潮已經不被歡迎了。這是逃港紅衛兵造反派刊物《黃河》和《北斗》出台時的背景。

我們因此可以說，在1973年逃港的虞雪所代表的，是文革早期（1966-1968）的造反派。1974年發表的〈理性的黃昏〉則是極左造反派省無聯思潮的直接延續和深化。他們的思想特色是：在政治分析上鼓勵大民主，在經濟分析上也是極左派的。而另一邊廂，在1976年創立的《黃河》、《北斗》所代表的，是文革後期（1969-1976）的造反派。這兩本刊物是對李一哲思潮的承傳。文革後期造反派的思想特色是：在政治分析上著眼於建立法制和民主；在經濟分析上慢慢發展成稍微偏右。⁵⁹〈理性的黃昏〉與《黃河》、《北斗》之間的差異，也是文革發展中造反派的轉變所造成的。

9-5-1 《黃河》與中華人權協會

1976年創立的《黃河》所持的是人權立場，內容主要著重於對大陸社會政治的分析及人權情況的報導。《黃河》創刊號中〈編者的話〉就說：「《黃河》雜誌的宗旨，是為中

⁵⁷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njian-1966-1976/41.htm>（檢索日期：2021年6月20日）。

⁵⁸ 汝嵇，〈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專政無產階級——天安門事件說明了什麼？〉，《黃河》1期（1976）。頁數？

⁵⁹ 關於文革早期跟晚期的定義，參見莫昭如複述吳甦和虞雪等造反派的論點，他說：「文革早在1968年結束了……隨著省無聯在1968年被鎮壓……他們的分析就是，文革沒有十年，只有三四年，他們被鎮壓的時候，文革就已經完了。」見莫昭如，私人訪問，2019年1月24日。

國大陸人民獲得它們的基本人權而呼號。」⁶⁰雖然《黃河》沒有表明自己有任何除了呼喊人權以外的政治立場，編者還是列舉了「具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或許是可以保障人權的出路。但我們必須了解，這種對「具有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提議對《黃河》來說依然是服膺於更大的人權原則，編者說：「我們深切感受到，中國大陸人民這一作為人最低限度必須擁有的尊嚴和權利，正備受摧毀，以致造成了許多特別令人觸目的悲慘事實；同時，由此我們也深切地認識到，要爭取到一個叫公平和自由的社會——如具有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若沒有對基本人權的確認，是根本無從談起的。」⁶¹也就是說，《黃河》和虞雪〈理性的黃昏〉所運用的是全然不同的論述語言：虞雪等極左造反派紅衛兵以人文馬克思主義及左翼語言去倡導他們理想的社會——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世界；而《黃河》則以人權的語言去倡導他們理想的社會——不一定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他們所說的「具有民主的社會主義」不過是一個例子而已。左翼論述和人權論述這兩種論述語言雖然可以互相翻譯，甚至有所重合，但終究來自不同的論述脈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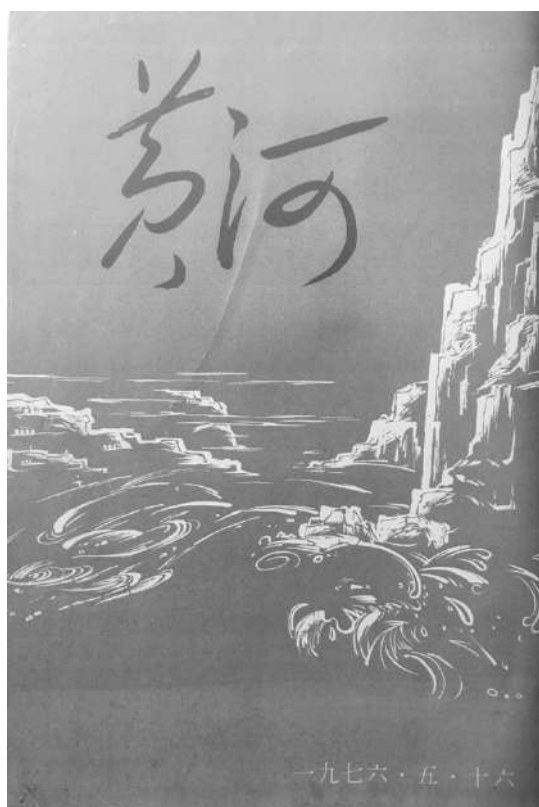


圖 20：1976 年《黃河》創刊號封面

⁶⁰ 黃河，〈編者的話〉，《黃河》1 期（1976）。

⁶¹ 黃河，〈編者的話〉。

那麼，《黃河》這些逃港紅衛兵的人權論述的脈絡是什麼呢？為什麼在眾多論述語言中他們選取了人權的語言呢？這除了因為他們在文革的慘痛經驗脈絡中的自發反思，對文革有了批判以外，也有來自海外華人的思想資源。我們可以從《黃河》的封面內頁看到，《黃河》雜誌編輯部其實屬於「中華人權協會大陸分會」。⁶²

中華人權協會於 1974 年 12 月在紐約由一些在美華人成立。保釣以後，一群來自《野草》、紐約《星島日報》及其他刊物的同人開始討論有什麼是海外華人可以做的，他們因此想到「應該為大陸及台灣同胞的人權與基本自由稍出一份力量，並應該積極推進海外（尤其是美國）華人民權」。⁶³1974 年 12 月 21 及 22 日，黃默、黃樹民、邱立本、張系國、嚴昭、郭正昭等 18 人召開了「人權問題座談會」，除了討論關於人權理論的哲學問題（包括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權觀），也討論到該如何回應現實問題（譬如柏楊和李敖被政治打壓、中國大陸對人權概念的接受程度、在美華人被槍殺等問題）。而在會議中大家雖然都認為難以斷定一些案例是對人權的侵犯還是具合乎地方脈絡的正當性，大家都傾向於認為在所謂「普世」觀念與「地方」觀念的矛盾中，需要理解到兩邊都是「發展中的觀念」，而成立一個人權組織對於促進這些觀念的討論和發展都是正面的——於是，中華人權協會成立了。⁶⁴中華人權協會的原則包括「獨立自主，不受任何政黨，政府或社團的影響於控制」，「也不為支持某一政黨或政府去攻擊另一政黨或政府」。⁶⁵成立後，中華人權協會的工作主要是關注在美華人的權益，以及關注中華民國的政治犯議題。直到，1975 年，中華人權協會開始就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展開工作，而《黃河》就是工作起步的關鍵。⁶⁶

那麼，香港的《黃河》如何和遠在紐約的中華人權協會取得聯絡？根據黃默的回憶，這跟他去香港訪問有關：「《黃河》的創刊跟我有些關係。我在 1975 年 8 月去香港訪問時與大陸來的紅衛兵見面，主要是陳璧華和其他幾位。他們當時就提出想要辦一個不定期的名為《黃河》的刊物……他們也同意說在讓中國人權協會透過香港的《黃河》，在大陸以這個名義活動。」⁶⁷就是這樣，《黃河》得到中華人權協會的經費資助。同時，根據《黃

⁶² 黃河，〈封面內頁〉，《黃河》1 期（1976）。

⁶³ 〈中華人權協會發展小史〉，《野草》30 期（1978），頁 2。

⁶⁴ 關於這次座談會的會議紀錄，見野草編輯部，〈中國人權問題座談會〉，<http://theintellectual.net/zh/political/weed/377-23-1974-10-4.html>（檢索日期：2021 年 6 月 12 日）。

⁶⁵ 〈中華人權協會發展小史〉，頁 2。

⁶⁶ 〈中華人權協會發展小史〉，頁 2。

⁶⁷ 黃默，私人訪問，2021 年 6 月 11 日。

河》首兩期的編輯林志毅說，參與者每人每月也會貢獻 500 元給《黃河》當出版資金，以維持出版經費的穩定。⁶⁸

不過，《黃河》正式開展工作，和 1976 年的政治事件有關。1976 年 4 月 6 日，也就是四五天安門事件隔天，自發悼念周恩來的群眾遭到中共政府逮捕，於是《黃河》以「中華人權協會大陸分會『黃河』雜誌」的名義發表了〈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華社〉公開信，並且致電新華社表達抗議。⁶⁹信中表達了「中國人民有理由、有權利」紀念周恩來的立場，並且認為自發的悼念群眾「不應受到政治迫害」。⁷⁰4 月 10 日，《黃河》繼續以「中華人權協會大陸分會」的名義發表〈就天安門事件的聲明〉，認為（一）本著維護基本人權的原則，中國人民應該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是為、罷工等自由；（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必須對被捕者履行正式的法律程序，不可侵犯基本的法治原則；（三）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人民的「鎮反」和思想入罪。⁷¹5 月 16 日，《黃河》第 1 期正式出版。《黃河》對人權立場的著重，也可以體現在他們對李一哲大字報的詮釋上。在〈當代中國的人權宣言——評李一哲大字報及他的成長〉中，作者就說「李一哲的大字報是當代中國大陸人權宣言」。⁷²

9-5-2 《黃河》人權論述與極左派之間的張力

《黃河》在論述上採用的人權立場有時候也會醞釀出反對極左派的論述。譬如，在《黃河》第 1 期中，就有文章稱李一哲比省無聯的《中國向何處去》更得人心，因為他「實在地說出群眾想講而不敢講的話」。⁷³汝嵇的〈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專政無產階級——天安門事件說明了什麼？〉則以更大篇幅比較李一哲和省無聯的差別，文章說：

他〔李一哲〕懂得抓住最成熟的矛盾，懂得指出最尖銳的社會問題，懂得如何作為群眾的代言人，而取得群眾的支持。在群眾的支持和敬佩下，他的一切犧牲便具有了價值。而這一點鬥爭策略，是省無聯當是未能領略和掌握的，李一哲的成長，是我們感到文化革命後省無聯人的新生……李一哲不但在政治思想上有所突

⁶⁸ 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 年 4 月 20 日。

⁶⁹ 〈中華人權協會發展小史〉，頁 2。

⁷⁰ 中華人權協會大陸分會黃河雜誌，〈就天安門事件的聲明〉，《黃河》1 期（1976）。

⁷¹ 中華人權協會大陸分會黃河雜誌，〈就天安門事件的聲明〉。

⁷² 天秤，〈當代中國的人權宣言——評李一哲大字報及他的成長〉，《黃河》1 期（1976）。

⁷³ 天秤，〈當代中國的人權宣言——評李一哲大字報及他的成長〉。

破，而且在道德上也有所突破，他徹底放棄了唯我獨左的造反派脾氣，他徹底批判了「誰反對我就給人扣帽然後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風」，他成長來為人權而鬥爭的戰士，是一個完全夠格的戰士！……李一哲的成功（指他在人民中留下的影響）正是因為他不是像省無聯一樣描繪革命任務，指責人民膚淺，而是正正真真和人民站在一起，提出最迫切的任務，從急需的改革做起。⁷⁴（黑體為筆者所加）

由此可見，《黃河》的人權立場雖然在一開始並無意在政治上站邊，但出於他們對路線和策略的判斷，他們認為省無聯的極左派路線是不利於爭取人權改革的。雖然在 1976 年 5 月無政府主義者出版的 *Minus 9* 中，傾向極左派省無聯的《70》成員就預告了《黃河》即將出版，並呼籲大家訂購。⁷⁵可見《70》私下與《黃河》有所聯絡，所以一早就知道出版的消息。不過，這並不代表《黃河》與托派、無政府主義派之間的關係是其樂融融地相處。顯然，《黃河》內部對極左派的不滿，不只體現在寫文章的立場上，也投射到香港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派身上。首兩期《黃河》的主編林志毅就認為，無政府主義及托派的影響使得《黃河》紀律鬆散，他說：「他們有受到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派的影響，認為不要組織架構，所以就是做一個聯絡小組而已。然後分九龍區和港島區，每個小組 7 人左右。但《黃河》沒有什麼紀律。」事情是否如此已難以追究，但這是林志毅的觀點——他認為《黃河》當中個別比較親近托派和無政府主義的人對《黃河》的事務不夠積極。

此外，林志毅在編輯《黃河》時則已經表明自己對托派的思想並不認同，他說：

在《黃河》的時候我有接觸過托派，譬如張立給我看過托派的書。我認為托派是極左——他們都是好人，但我不同意他們。我說他們是精神可嘉、觀點獨立，但是是空想，世界跟著他們走不會變好。他們太走極端、太烏托邦了，他們是設計社會，而不是要建立一個老百姓而生的社會。這和毛澤東是一樣的，馬澤東的問題也是空想，他是很有感情的人，聽過他開會說到「立國了但不可以腐敗」的時候都是掉眼淚的。他是一個革命家，是一個軍事天才，但他有一點他不好，就是他也是空想的，所以搞經濟時他是一塌糊塗。為什麼社會主義到最後要搞到所有東西都要集中、集權，譬如小買賣也不允許？那是因為政府要操控所有的資本。但這就使得生產的動力下降了，經濟就不好了。經濟的壟斷帶來了政治的壟斷。政治的壟斷就是

⁷⁴ 汝嵇，〈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專政無產階級——天安門事件說明了什麼？〉。

⁷⁵ Lee Ya See and Wu Che, "Some Thought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inus* 8, no. 5 (1976), 8.

專制……趙紫陽搞包產到戶很有成效，但毛澤東不願意，然後把劉少奇那些人打到……托派也是空想。我見吳仲賢的時候，我跟他討論時很直白，我說你們的規劃很美好，但無法實現，是空想。不符合歷史的方向，也不是工人要的東西。

簡單來說，《黃河》的編輯林志毅並不同意托派推崇的國有化社會主義，但也不贊同極左造反派紅衛兵的看法。不過，雖然《黃河》有不少對極左派的反感，但那始終並不是《黃河》對外的編輯立場。1977年4月，《黃河》從第3期開始和《野草》合刊了，依然是不定期出版。根據黃默介紹：「〔中華人權協會〕在1974年組成的時候，張系國已經辦了刊物《野草》，也就是中華人權協會的刊物。《野草》早期是張系國和他的朋友辦的，是比較文學性質的，但之後對人權會有更多的關懷。」⁷⁶

大約1979年間，《黃河》雜誌正式解散。黃默表示：「我記憶所得的是，他們到最後跟我說他們分裂了，有一些人也離開了。」⁷⁷分裂的具體原因是什麼，我們無從得知。但林志毅曾經提到，《黃河》從成立初期就已經面對內部不和的問題。他曾說過：「那些人在搞《黃河》之前，其實來了香港三年了，有14個，有一些在《星島日報》工作、有些在無綫電視寫劇本，都是文人。只有一個沒有工作，姓黃，因為沒事情做所以他寫的發刊詞而且會幫忙打點報社的工作。我來的時候這14人其實還在吵架，吵了三年都沒有成事，那是因為他們本來在廣州就是兩派不同的紅衛兵。都是造反派，但是是進入建制的造反派和還沒有進入建制的造反派。我加入《黃河》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調停雙方。」⁷⁸黃姓《黃河》成員是否是黃望潮呢？《黃河》的解散和這是否有直接關係？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

9-5-3 《北斗》與新亞及救總

林志毅在1976年離開《黃河》後，於1977年6月和其他造反派逃港紅衛兵創立了《北斗》雜誌。至於《北斗》的出版，是和新亞書院息息相關的。林志毅說：

我當時一邊在《黃河》，一邊在讀新亞。他〔徐復觀〕問我有沒有興趣自己搞一份文字成熟一點雜誌，以及有沒有足夠的能力，譬如人脈和人選。我的很多政治

⁷⁶ 黃默，私人訪問，2021年6月11日。

⁷⁷ 黃默，私人訪問，2021年6月11日。

⁷⁸ 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年4月20日。

觀點和他很像，就是既是對共產黨有批評，但也不喜歡國民黨，但也愛國。但他就是因為早預料到共產黨會贏內戰而自己可能會出事所以來的香港，但他也不喜歡國民黨。我們這種比較中立一點的獨立一點的觀點很像，我很受他影響。所以才開始做《北斗》。我找來了子川、吳甬、虞雪、宋榮、蔡可風，還有一些台灣的新亞的同學。《北斗》，但第1、2期都是讓子川做編輯。供稿的人有一些台灣的大學生，譬如東海、師大。《北斗》的都是造反派的領袖，《黃河》那些只是當時造反派的參與者而已。子川看不起《黃河》那些紅衛兵，覺得他們亂來，格格不入，選擇了不吸收……啟動經費是十四萬，是救總給的錢。但他們只是給我們一次性的錢，不是說會長期繼續給錢。

引文提及的「救總」就是我在第一章提到過的「中華救助總會」。此為具備國民黨官方性質的半民間團體，致力於「投入大陸災胞與海外難僑的救助工作」，逃港紅衛兵對救總來說，也是屬於「大陸災胞與海外難僑」的一部份。⁷⁹至於救總怎麼和林志毅取得聯絡的，則是因為林志毅在1975年來香港後，曾被救總邀請到台灣旅遊兼講學。林志毅說：「我一開始以為只是旅遊，後來才發現還是要去不同的地方講學，去不同中學、大學，從台南到台中，我們說了很多場。去完那個旅行就變成了反共義士。」⁸⁰林志毅口中的「台灣旅遊團」，據我推斷就是「中華民國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所記載的1975年4月13日「大陸逃港反共青年代表」來台參加蔣介石喪禮的事情。⁸¹林志毅為何會被救總認出是逃港紅衛兵，林志毅自己推斷這和他報讀新亞書院有關：「我1975年來香港以後，因為學歷不被認證，所以想要再讀，就報了新亞書院。但偷渡下來什麼文件都沒有，怎麼認證我的學歷呢？就是我要詳細的寫我的履歷。我後來才知道他們會把這些編輯成1976-1977年「匪諜情報」，上面就有我招供的資料，譬如我在履歷上解釋的大陸大學的架構。非常有趣，想不到他們會這樣做。」⁸²也就是說，《北斗》得以成立，除了在理念上受到新亞書院徐復觀的啟發，也可能是新亞書院在之間牽紅線使得救總和林志毅聯絡了起來。

⁷⁹ 中華救助總會，〈本會簡介〉，<http://www.cares.org.tw/CaresPortal/intro/introduction.do#>（檢索日期：2021年6月16日）。

⁸⁰ 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年4月20日。

⁸¹ 劉偉勳，〈大陸逃港反共青年代表一行十人，十三日下午搭機自香港抵達台北，參加故總統蔣公喪禮大典〉，http://nrch.culture.tw/view.aspx?keyword=%E9%80%83%E6%B8%AF&s=2393624&id=0000736925&proj=MOI_IMD_001#（檢索日期：2021年6月30日）。

⁸² 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年4月20日。

不過，可否說《北斗》的編輯取向受到救總的右派理念左右呢？林志毅說：「我覺得沒有。編輯室是坦蕩蕩的，沒有壓力。」⁸³根據林志毅的說法，《北斗》編輯部的編輯方針無關右派立場，有獨立的準則，他說：「《北斗》的審稿的標準是只要是探討『中國向何處去』的，他們都會登。」⁸⁴

9-5-4 《北斗》的趨勢和傾向：從李一哲到認同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北斗》自 1977 年 6 月開始出版。內容上，《北斗》選材跨度很大，從時事評論、文藝創作、遊記、詩歌、散文、論壇討論、報導都有，主要是一些和逃港紅衛兵相關的題材，也緊貼著大陸的時局發展。關於刊物的問題意識——即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探討——多見於其關於李一哲大字報的討論、時事評論及「中國前途論壇」這些欄目。

《北斗》為何會有那麼多篇幅討論李一哲大字報呢？根據林志毅的說法：「《北斗》第 1、2 期是子川做編輯，這個是筆名，他本來是廣州紅衛兵造反派的首領，和李一哲等人很熟悉。他要寫李一哲我很同意，因為當大字報首先在廣州出現的時候，北京也有貼那份大字報，也在同一個歷史場景，所以很有感覺，他要寫我也很支持。」⁸⁵從第 1 到第 7 期，《北斗》都有關於李一哲的內容，當中許多都是子川寫的——這也是《北斗》最重點討論的議題。對於李一哲，《北斗》的立場給予高度評價，更把四五天安門事件看作是李一哲的啟蒙所致。⁸⁶

至於關於中國政治和社會主義性質的討論，《北斗》相比以人權立場為主的《黃河》，有更直接的探討，但我們比較難以抓住其取態。因為，有別於《黃河》開宗名義地側重人權論述，《北斗》在一開始的〈我們的態度和方向〉就說明他們並不希望講「主義」，而希望採取論壇的模式使無論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觀點都可以匯聚於《北斗》。⁸⁷不過，就算《北斗》更像是一個論壇，包納各家所言，但我們也可以看出《北斗》有一定的趨勢和傾向。事實上，《北斗》曾經拒絕過本地左派的稿子，⁸⁸就算是由吳甦編輯的第 5、6 期

⁸³ 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 年 4 月 20 日。

⁸⁴ 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 年 4 月 20 日。

⁸⁵ 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 年 4 月 20 日。

⁸⁶ 子川，〈李一哲與我——兼評李一哲思想體制之形成（一）〉，《北斗》1 期（1977），頁 4-13。

⁸⁷ 編委會，〈我們的態度和方向〉，《北斗》2 期（1977），頁 1。

⁸⁸ 林志毅提到，工聯會曾經有人以讀者身份前來拜訪，並且問他們能否刊登自己的文章。對工聯會的來訪，林志毅判斷那是「間諜」，因為他們當時已經採取反共立場，來訪工聯會人士的文章最後也不獲刊登。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 年 4 月 20 日。

也不見〈理性的黃昏〉的影子。⁸⁹也就是說，《北斗》還是有一定調性。其對中國政治和社會主義性質上的立場的趨勢和傾向在第3期（也就是林志毅做編輯時）是比較明顯的。譬如〈論中共壟斷資本〉一文就認為要「科學地分析」中共的性質、探索「中國向何處去」，雖然其分析和〈理性的黃昏〉一樣認為中共是壟斷資本，但這篇文章最後把中共壟斷資本的原因歸咎為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有欺騙成份，本質上是有毒的，只是摻了科學的部份才讓人誤以為是甜的。⁹⁰這種對馬克思主義比較根本的、徹底的否定，可以說是《北斗》的基本傾向和趨勢。

在第4到第7期，《北斗》有了探討「中國向何處去」——也就是中共性質和未來出路——的「中國前途論壇」欄目，其對文革及對社會主義的反對也越來越明顯。特別是第6期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認為文革暴露了共產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問題、違背了經濟發展的定律，甚至認為西方比中國要富強的原因在於中國沒有市場經濟；最後更認為為了「唯物」地改變中國極權的問題就必須反對國有制，變成「全民私有制」——人民合資組合生產集團，中央經濟計劃部門防範生產氾濫，但不可以禁止經濟集團的投資和生產自由，經濟集團也要自負盈虧，自己受難，分紅也要按照投資額度。⁹¹由此可見，《北斗》在對中共進行批評時，已經不知不覺地變成支持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

根據林志毅回憶，《北斗》的反共立場愈發明顯也與銷量考慮有一定關係。譬如他在做第3期編輯時，就有刻意更顯明反共的立場，而銷量果然從500-700本上升到3,000本（最好賣的是第6期，賣了9,000本）。不過，我們也不能因此說《北斗》是為了銷量而反共，只能說編輯室對社會主義本來就有批判，而銷量只是激勵了他們更傾向於著重這一點的一個原因而已。

正如大部份同人刊物，《北斗》最後也面臨資金不足又沒有廣告的問題，林志毅說：「只靠賣的錢不足以維持，所以做不下去。」⁹²《北斗》最後在到1978年2月1日停刊。這本月刊從出版到結業總共有9期，而且當中從來沒有脫過期，這也是林志毅的驕傲吧。

⁸⁹ 根據林志毅的說法，吳甦「很難得拿到一些外國教授的文章想在我們這裡登」，但由於《北斗》的其他人不想，吳甦「不開心就走了」。可見吳甦的極左派立場也有可能是被《北斗》壓制的。不過，林志毅認為，《北斗》其他人和吳甦之間最大的問題是人事問題，而不是立場問題。他說：「我們都喜歡虞雪，覺得她很聰明很厲害，但覺得吳甦有書生氣，而且他難以溝通，譬如他很害怕處理有情緒的對話，一覺得對方有情緒就會中斷對話。」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年4月20日。

⁹⁰ 兆聲，〈論中共壟斷資本〉，《北斗》3期（1977），頁2-8。

⁹¹ 湛思，〈中國向何處去？（三）——中國的去向何從〉，《北斗》6期（1977），頁62-72。

⁹² 林志毅，私人訪問，2019年4月20日。

9-6 小結

之所以上述的小節要似乎「岔開話題」地講述《黃河》及《北斗》兩本刊物，是因為這兩本刊物和〈理性的黃昏〉一樣，都顯示了文革在香港的持續影響力。其實，文革對香港的影響不只有六七暴動。整個火紅年代，實際上都在被文革所帶來的問題意識所穿透。討論《黃河》和《北斗》，一方面是要顯示「中國問題」如何一直沒有離開過香港，另一方面也是要帶出文革思潮對香港的影響的多面性，同時折射出文革的複雜性。把《黃河》及《北斗》納入討論，是為了比較完整地引入文革的參照，讓我們更歷史地看到香港社會運動中的許多思想發展與「中國問題」的親密性。

事實上，如果我們結合前幾章來看，香港在運動發展上、在考慮自身未來時、「文革問題」一直都貫穿其中。一開始，《盤古》的創立就是為了反對文革，但當毛澤東思想隨著文革影響到黑人民權運動以後，從黑人抗爭中接觸到毛澤東思想的包奕明就把這思想重新包裝，以致《盤古》逐漸左轉。包奕明也透過保釣運動孕育出一批新的左派——包括《盤古》在保釣後完全成為自發毛派刊物、學校中的國粹派擴大影響力等，都可以上溯到包奕明及保釣。這些左派都支持「文革」，但對他們來說，「文革」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一部份，是毛澤東思想的體現。而香港前途問題不但不獨立於中國，更從屬於中國及中共，因此香港的發展應該聽令於中共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

另一方面，《70》雖然從保釣開始就對民族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感到不屑，但那並不代表他們拒絕討論中國文革。〈我們的立場〉顯示的是逃港紅衛兵中的文革極左派對香港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雖然逃港紅衛兵並沒有持續的組織和張揚的行動，也沒有成為香港明確的政治派系，但他們對於中共的社會主義及文革性質的理解，明顯地滲透到《70》的無政府主義當中。以至於《70》也是支持某部份的文革的——但「文革」對他們來說，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更是推翻中共、推翻世界一切國家機器的開端，為世界革命的一部份——這就和國粹派對文革的理解很不一樣。至於香港的未來，「70戰綫」認為這與中國息息相關：

中國革命的前途有繫於極左派能否掀起一場全面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香港的出路亦繫於中國這場全面性的革命〔文化大革命〕能否成功……我們要奮起反對一切

不合理的制度，以香港的群眾運動催化中國的革命。要使香港群眾運動免陷於俄國克朗士特的覆轍，中國革命是唯一的保障。⁹³

雖然對他們來說，香港的抗爭應該是中國以至於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並非可以獨善其身地運作，但他們不認為香港的前途需要從屬於中國革命或聽從中共的指指點點，並相信文革作為一個由下而上的運動是與香港反資反殖的自發抗爭齊頭並進的。

上承了中國流亡托派思想遺產的新進香港托派，也從文革中找到激勵和養分。吳仲賢的〈中國向何處去〉把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中對官僚的批評加以歷史化，並以托派的理論包裝，提出了文革是一次推翻中國官僚主義的嘗試，並在這個判斷下採取了支持文革的立場。類似於極左派，托派也認為香港的抗爭與大陸的抗爭齊頭並進，吳仲賢說：「香港革命運動不但反資、反殖，而更要成為中國反官僚隊伍中的一股力量。」⁹⁴

社會派與中國文革或許相距最遠。對他們來說，文革中無論是極左派還是毛澤東思想，都不利於中國及香港的發展。因此，社會派對文革中「革命」的部份提出質疑，並提倡以「社會主義民主化」取代之。儘管如此，他們一樣同意香港問題與中國息息相關，在香港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民主化」對香港回歸中國後能否改善本地社會問題也至關重要。而社會派對「革命」形式的質疑，也與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潮相對應：李一哲大字報象徵著大陸文革中的造反派從想要把革命進行到底，轉變到希望結束革命——這是因為支持李一哲的文革後期造反派認為，中國大陸的「革命」話語以至於道路已經被中共收編或堵死，人民也對「革命」厭倦；於是，溫和地要求法制與民主「改革」更是社會的心聲。而這個轉變也意味著從大陸而來的文革思潮，對香港的影響正慢慢褪去「左」的色彩。

那麼，我在「四報聯刊」的討論中，夾帶對《黃河》及《北斗》的探討，也是為了補完文革思潮的發展及其在香港的延續。《黃河》及《北斗》所代表的，正是文革後期的造反派紅衛兵思潮。這些思潮來到香港後，又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各地思想、人流、資金相對地自由進出的場域，而有了不一樣的發展：《黃河》在得到美國的中華人權協會的鼎力相助後把李一哲對民主與法制的倡議與人權論述結合起來；《北斗》則在救總和新亞書院

⁹³ 70 戰綫，〈我們的立場〉，版 13。

⁹⁴ 吳仲賢，〈中國向何處去〉，版 14。

的幫助下，對中國未來的思考雖然依然繼承了李一哲對民主與法制的倡議，但也沾染了右派的反共色彩。文革的民間思潮的改變——也就是文革初期極左派的省無聯反復辟路線，被文革後期的李一哲、《黃河》及《北斗》等所拋棄——反映在香港時，使得與文革極左派較為親近的托派、無政府主義派的革命路線，其實無法和《黃河》、《北斗》結成聯盟，這也是林志毅對托派、無政府主義派始終無法走近的背後脈絡。

雖然社會派不支持托派、無政府主義派及文革極左派的「革命」路線，也不會認同無政府主義對統一路線一直以來的冷漠，但這不妨礙社會派在反國粹派、反毛澤東主義及反資反殖的路線上，和托派、無政府主義派持續結盟。畢竟，從保釣一路走來，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是一直堅持反資反殖，並在不與中國「割裂」或「獨善其身」的前提下，推進本地的改革，並且和社會派一直抵抗國粹派。這也是一種革命友誼吧。

十、國粹派的潛伏與潰散：風格、組織、情感與思想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國粹派出現一開始是被本地左派及自發毛派所帶動的。在新左翼自發毛派包奕明「回歸論」及「國情研究」的影響下，一些原本批蔣反共、傾向台灣自由主義的《盤古》知識份子首先開始左轉，並且把社會主義及毛澤東思想以比較正面的方式帶進青年的視野當中。隨著包奕明等人透過組織保釣會直接介入保釣運動，獨立走出了運動的統一運動路線後，在基辛格訪華、中華人民共和國獲得聯合國席位等國際事件的推波助瀾下，引發了一股「中國熱」，一些本來是行動傾向溫和保守、情感上又樸素的中國國族主義認同的大學生開始因著組織回國觀光團而被傳統左派所影響，成為校內的毛派，國粹派就誕生了。這些國粹派在承接了保釣中自發毛派一開始倡導的統一路線後，則是將之闡釋為不反殖的愛國反霸路線。這不僅偏擺了自發毛派，也使得大專院校中想要融合反殖路線和統一路線的大學生感到非常氣憤，他們自稱社會派，並且聯合托派及無政府主義派和國粹派撕破了臉——壁壘分明的派系鬥爭也從1973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76年。

為了理解火紅年代各派之間的鬥爭，我在之前深入討論了無政府主義派、托派、社會派、逃港紅衛兵、自發毛派等背後所承傳的歷史、情感、思想、組織，並比較了它們之間的異同。儘管我提到過許多國粹派發表的論述（大家對國粹派對中國問題及香港問題的看法和倡議應該已非常了解），也提到過他們對托派的憎恨的情感邏輯；然而，我卻遲遲沒有進行對國粹派的組織型態分析，這也導致了對國粹派的描寫彷彿只有歷史、理念、論述、思想作為「骨架」，只有理想、情感作為「靈魂」，卻似乎沒有組織的「肉身」。在很大程度上，這跟此論文對托派、無政府主義派的分析是不對等的。因此，這一章的目的便在於補上國粹派的組織是如何作為「肉身」，並討論國粹派的「骨架」如何穿透和支撐著「肉身」，而「肉身」又如何承載了他們的「靈魂」。

雖然目前已有一些對國粹派的研究，但要提及他們的組織——特別是組織型態——的文章少之又少。為什麼關於國粹派的組織的研究如此匱乏呢？第一，有別於無政府主義派、托派、社會派、逃港紅衛兵或自發毛派那樣有自己的刊物、出版機關、實體空間及組織，國粹派並沒有明確的、實體的、公開的組織和刊物。儘管國粹派的聲音是公開的並且可以散見於各種刊物，他們的組織卻是採用了類近保密的、地下黨般的形式——這也讓分析及了解國粹派的組織型態、組織關係、組織生活經驗及這些與他們理念之間

的關係尤其困難，往往只能依賴當事人現身說法才有機會一探究竟。資訊的匱乏造成了研究的困難。第二，由於大部份研究都把國粹派看成港共地下組織在學院的延伸，對國粹派的研究也會被歸類為傳統左派組織的研究範疇。因此，對國粹派組織的研究關注往往落在揭露關鍵人物與港共之間可能的關係，對國粹派自身的組織形式本身沒有足夠的專注和停留——譬如，江關生所著《中共在香港》中的〈火紅年代 反思國粹（1971-1976）〉¹雖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研究材料，但卻是以「揭露人物關係」取代對國粹派本身的組織型態的研究，也就無助於我們理解國粹派成員為何會採取特定的組織樣貌，以及此組織形式的思想及情感。閱讀這些材料，再配合今天社會對中共極權主義的認知，我們很容易會誤以為國粹派只是中共的傀儡。第三，由於國粹派在 1976 年後就銷聲匿跡了，可以說是「曇花一現」的現象；因此，對國粹派的研究和討論，往往只把它看作港共深厚悠長的組織歷史中輕輕的一頁而已，相關研究本來就不多，更不要說細緻到要討論其組織形式了。

使用整整一章來討論國粹派和他們的組織形式，或許在整篇論文的架構中會過於突出；而且，在時序上，這一章也稍微跳脫了之前的敘事順序，以插敘的方式提到 1973 到 1976 年間國粹派在學運中的發展，這似乎也有過於聚焦、節奏突然跳脫的問題，和論文此前的部份有點格格不入。但是，為何我執著於花巨大的篇幅去討論國粹派的組織呢？第一，有鑑於目前對國粹派組織的研究實在太少，而以「揭露人物關係」或「揭露學生與港共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興趣大量地遮蔽了對國粹派組織的文化、邏輯及形式所影響的感情問題的關注——如果我不去細細討論國粹派的組織，就這把篇論文丟出去面對既有的知識脈絡，關於國粹派的部份或許會被既有研究的問題場域給帶偏，國粹派很容易被理解成只是巨大的國家機器的一部份，只有緊跟中共、唯命是從，而沒有自己的血肉與生命。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些部份，國粹派對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影響也只會被定格在其破壞性，而不是可以對話及介入的政治遺產。

為了回應這些問題，在本章的上半部份，我將著重去探究國粹派得以組織起來的風格、手法、形式及文化，以回答以下問題：國粹派是怎樣被一步一步煉成的？當中需要跨過什麼情感的矛盾與思考的門檻，需要具備怎樣的理想性及思想性？他們怎樣在組織面向及個人面向的內內外外去體現（embody）對國家和革命的想像？當中有什麼部份是有矛盾的，但在今天看來是被解開了的？由於關於國粹派組織的資料實在太少，在這

¹ 參見江關生，〈火紅年代 反思國粹（1971-1976）〉，《中共在香港（下卷）》（香港：天地，2012）。

部份，我將很大程度依賴本人對當時國粹派參與者——主要是楊寶熙和房遠華——進行的訪談。楊寶熙曾擔任中大社工隊成員及 1975-1976 年度中大學生會會長（也是第一位女性會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國粹派核心領導人物的思考，而她對國粹派整個江湖的分析也非常全面。房遠華雖然並不是國粹派的領導人物，而是一個熱心參與者，但他的說法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般國粹派成員的想法。此外，1970 年出版的《香港學生運動》中〈左派在專上學院的活動〉對傳統左派在校內的組織方法也是此文的重要資源。這篇文章雖然沒有針對性地研究國粹派（因為當時還沒有國粹派），但當中提到了六〇年代左派學生的部份，可以作為國粹派的參照，而國粹派和六〇年代學生左派兩者之間或許是有直接關係的。

第二，這一章之所以給予國粹派足夠的停留及關注，對整篇論文來講也有結構上的意義。整篇論文中，我在第二章給予文革及六七暴動巨大的篇幅以開啟後續關於火紅年代的討論。在各章節中，我都提到各派在本地的行動與思想是如何結合著他們對中國政治未來的想像——而這些都和他們對文革的理解息息相關。那 1976 年中國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等，對於火紅年代的影響是什麼呢？去探討國粹派在 1976 年的潰散，其實也顯示了文革對香港持續及多元的力道及影響。

因此，在文章下半部份，我將在對國粹派的組織形式有一定理解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時勢，去解釋國粹派何以潰散。這次潰散除了可以被解釋成布朗（Wendy Brown）所講的「左派憂鬱」症狀，我們也可以在國粹派潰散的實例中看到憂鬱中的癱瘓、潰散、失望、消沉何以不只是一個需要被割掉的病症，也內涵了對自身政治的反思和批判。如同周魯逸所說：「一般以為『國粹派』內部是統一的，其實並非如此，甚至有百分之百緊跟『四人幫』路線而與本港『正統』左派組織強烈抵觸者……『四人幫』垮台，『國粹派』全面潰散，這些『意識形態』集團亦就全部癱瘓，甚至放棄了他們從來所重視的在校內『培養』接棒人的工作。」²國粹派的潰散，也可以被理解成是一次「罷工」行動，其思想性恰恰是以癱瘓自身及離開學運的形式展現。補上國粹派潰散的情感部份，再結合第八章論及的石中英在批托背後的運動創傷，及阮志雄面對殖民政府收割運動成果時的「at a loss」，我們就可以看到「左派憂鬱」多樣、多層的面貌。最後，要在這一章給予國粹派的潰散那麼多的關注，也因為國粹派的潰散標記了文革帶來

² 周魯逸，〈香港學生運動與意識形態〉，頁 283。

的抗爭熱潮的結束，甚至是火紅年代走入下坡——香港火紅年代運動週期的興起和結束，也是和中國的政治週期相吻合的。

10-1 從國粹派的風格到國粹派的活動

10-1-1 國粹派的「土」風格

進入關於國粹派組織的討論之前，我會先簡單分析國粹派的風格。在〈前言〉中我曾提到，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情感結構」假設時認為每一個階級的崛起或內部出現矛盾、破裂、變種時，都是和一個新的情感結構相關，而我們可以透過捕捉當中風格的轉變，理解這個情感結構的肌理。³而我認為，雖然國粹派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階級」，但威廉斯的方法還是適用的。分析國粹派的風格是幫助我們理解這個新興派別的情感以至於組織的第一步。

如果要用一個詞形容國粹派的風格，那就是「土氣」。我在這裡用「土氣」一詞並不代表我直接將世俗加諸「土」的負面標籤不言自明地拿來使用，而是用來形容當時一般青年人對國粹派的印象。如同陳冠中在《事後》裡提到，國粹派是「土裡土氣」的，而且總是「千人一面」、「集體進退」。⁴這種樸素、土氣的形象，也被楊寶熙承認，她說：「外表上，我們是堅持要穿著樸素——雖然不至於每天都白衣藍褲，可還是會譬如特意地邋邋一點，穿拖鞋、女生不會穿裙子，更不要說化妝。」⁵

與「土氣」這種風格相對立的是「洋氣」，在當中又以《70》為代表。陳冠中接著說，《70》的鬼馬和洋氣，給人的感覺是「有猛又酷的樣子」，「好像玩得很過癮」。⁶就如同我們之前曾提到《70》的洋氣風格和他們的政治思想是氣質相通的；而國粹派之所以「土」、之所以要穿拖鞋、之所以總顯現出一副樸素及集體主義的風格，這美學風格背後追根究底是有意識、有情感、有政治想法的選擇。

³ Raymond Williams,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⁴ 陳冠中，《事後：本土文化誌》（香港：牛津大學，2007），頁 43。

⁵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15 日。

⁶ 陳冠中，《事後：本土文化誌》，頁 43。

10-1-2 國粹派的鄉土與故土

國粹派的土的氣質不只在於表面的言行舉止或穿著打扮，如「穿拖鞋」或「千人一面」，而是貫徹到他們會做的活動之上。在之前的章節，由於我經常提及國粹派不願意做社會運動的抗爭行動，或許會讓人覺得國粹派就是坐著不做事的類型，但事實上國粹派在活躍期間——也就是 1973-1976 年間——積極地辦了很多的活動，並以這些活動作為組織手法吸引成員加入。國粹派最具標誌性的活動，要數訪貧問苦、回國觀光團和中國週展覽。這三項活動之間的關聯性，其實延續了國粹派外表上、風格上對「土」的堅持。訪貧問苦希望做到的是接近「鄉土」，回國觀光團和中國週展覽想要做到的是接近「故土」。以下，我們首先檢視一下國粹派行動中的「土」為何物吧。

（1）訪貧問苦：「鄉土」與「接地氣」

國粹派最為人熟悉的「返貧問苦」活動其實並不是由國粹派發明的，而是當國粹派成為一個派別後，使本來已有的訪貧問苦被注入了國粹派的情感與思想。大專學生訪貧問苦的行動最早可以推至 1968 年的港大社會服務隊（Social Service Group）。根據香港大學學生會年刊 *The Union* 報導，當時就有大學生規律地探訪盲人工廠，為盲人提供娛樂、講故事及讀報的服務，目的在於推廣公共福利的意識。不但如此，港大社工服務隊曾去將軍澳修橋、去黃竹坑建河堤，並持續提供志工到港大教學醫院贊育醫院及著名的慈善機構明愛服務中心服務。⁷但到了 1974 年學聯組織的訪貧問苦中，我們則可以看到訪貧問苦在服務性以外，更具備了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意義——訪貧問苦不再只是單純為了扶貧濟困，而是為了「與工人群眾相結合」、「揭露社會現實的本質」。⁸再加上與訪貧問苦結合的資料展覽，此時的訪貧問苦更具有「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罪惡」、「認識社會主義」、「學運與工運結合」的意識，論述上也更接近國粹派。⁹而 1972 年因六一八水災成立的中大社工隊，更成為了國粹派訪貧問苦的重要機構，也呼應了學聯對學生要「關心社會」的號召。他們重點訪貧問苦的大埔元洲仔漁村更被喻為國粹派的「井岡山」。

⁷ Dennis T. W. Yau,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University," *The Union*, no. 23 (1968).

⁸ 靜莉，〈訪貧問苦小記〉，《中大學生報》，1974 年 9 月 1 日，版 10。

⁹ 陸新，〈探訪資展是正路——關於認識通貨膨脹運動的討論〉，1974 年 9 月 1 日，版 11。

¹⁰根據楊寶熙的說法，國粹派以中大社工隊作為其中一個據點，以「工作營」方式招募志工和潛在國粹派份子，工作內容包括「修橋鋪路」、「去農民家割禾」等。¹¹

訪貧問苦背後의思想和情感，事實上是受到文革的上山下鄉運動所影響。《學苑》一篇講述訪貧問苦的回顧中，作者就以〈革自己的命〉為標題，更提到籌備訪貧問苦的同學是想要學習「戰天鬥地」的精神——這些都是文革用語。¹²關於上山下鄉對訪貧問苦的影響，楊寶熙也說：「我們當時看到上山下鄉的時候，會覺得上山下鄉是好的」，又為了效法「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及學習「憶苦思甜」等文革精神，去鄉村及工廠訪貧問苦就成為上山下鄉的替代品。¹³這就帶出另一個問題：國粹派為何覺得上山下鄉是好的？為何認為要革自己的命？那麼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國粹派當中普遍出現的「大學生原罪論」及對自身「小資性」的批判。楊寶熙說：

我和身邊大批同學都是小資出身，譬如父母是知識份子或者不是草根，他們就會覺得這出身有原罪。但當然也有一些真的是工人階級出身，譬如父母是海員工會、紡織工會的。不過，家庭和個人是分開的，如果你個人沒有去工廠做工而去了讀書當大學生，就已經可以說你是知識份子「臭老九」了，這種情況，他們就會說是「沾染了小資產階級的習性」。所以無論如何都是有問題的：在大學裡，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覺得自己是無產階級的，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一個原罪，就是因為你是大學生就會被認為是一個原罪。所以我們覺得一定要批判自己。¹⁴

也就是說，在國粹派心中，永遠有一個無法完全磨滅的矛盾：大家都知道自己無法甘願放棄大學生身份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於是大學生身份就變成一個原罪。因此，訪貧問苦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為了讓國粹派大學生「自我感覺良好」，用周魯逸的話來說：「至於將『訪貧問苦』等活動當成『關社』（關心社會），則更以宗教式『自我救贖』的『自我矇騙』式心理滿足，阻礙了對真正社會改革的投入。」¹⁵

¹⁰ eg9515，〈六七後的抗爭：由火紅年代到過渡期〉，<https://bit.ly/3egcmBh>（檢索日期：2021年7月1日）。

¹¹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¹² 社工同學，〈革自己的命〉，《學苑》，1975年9月5日，版12。

¹³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¹⁴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¹⁵ 周魯逸，〈香港學生運動與意識形態〉，頁283。

這種以贖罪、「革自己的命」、「再學習」的方法去訪貧問苦，本來是來自自省的良好初衷，然而國粹派的這種自我定位帶來了另一個問題，楊寶熙接著說道：

我們雖然當年把「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興」掛在嘴邊，但其實我們對「農」這件事情——包括農耕、農業——其實都沒有一種落地的、真實的感情。我們對訪貧問苦、對農民、對工人等，有的其實只是一種階級情感，但這些情感是沒有根基的，而只是根據成分、出身來建立起來的。所以我才說我們是把工農包了起來、吊了起來欣賞、仰慕，但沒有真的「進去」他們的世界……

我覺得當時的我們其實很奇怪，因為我們當年如果真的要去做，是有條件的。七〇年代香港的農業還算蓬勃，我想香港本土農業的蔬菜供應量是到了本地需要的一半，但我們沒有察覺到這件事，更沒有覺得說我們去搞農業議題吧……現在馬寶寶農場的那些年輕人被稱為所謂的「農青」，回想起來我們和現在這些農青相比都是不如的。我們做的就是去割禾而已嘛。這也是為什麼我說我們根本察覺不到自己當時的問題和這些問題背後的內在矛盾，就只是做了比較表面的東西。而我們很多人到了這個地步就已經覺得安心了——或者叫「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己「去了工作營了」、「幫了哪裡哪裡起路了」，就是這樣而已。我們好像表面上做了很多東西，但回想起來其實又沒真的做什麼。你看今天那麼多年輕人是真的去認真種田、認真搞農業，但當年我們真的沒有。¹⁶（黑體為筆者所加）

也就是說，第一，參與的學生僅僅帶著自己的一廂情願去訪貧問苦。¹⁷國粹派與農業議題擦肩而過，正好說明了國粹派訪貧問苦的重點多是出於滿足自身對大陸上山下鄉運動的羨慕及對自己「小資性」的超克，而不是出於對現實工農生活有足夠的認識、承擔和熱誠。國粹派訪貧問苦時的贖罪心態也使他們始終執著於本位的思考而無法走入群眾。

¹⁶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¹⁷ 楊寶熙對國粹派的批評或許對於其他國粹派當事人來說並不好下嚥，然而，我有必要澄清兩點。第一，楊寶熙並不是否定國粹派對工農情感的真實性，她是在指出這些情感是沒有根基的，因為那是一廂情願的。第二，我認為楊寶熙的這番批評不是一個「無情的」、「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批評。今天的楊寶熙是一名積極及認真的農運者，她的投入和認真，或許正好是一種「以實踐作為反思」的表現。楊寶熙對國粹派的質問和批評，也是對過往的自己的提問。譬如，為何國粹派經常下鄉，卻沒有認真分析農業議題？楊寶熙今日對訪貧問苦的批判及質問不但建立在自己作為國粹派過來人的深刻自省，也建立在痛定思痛、自我梳理後的運動實踐之上。

第二，國粹派無法在訪貧問苦時進入工農的世界，一方面是因為被贖罪心籠罩，另一方面也和他們對於工農位置的認定有關：雖然社會主義中國賦予工農革命主體的位置，工農地位非常高；然而在香港，工農的進步性與革命、革新無關，因為國粹派並不希望香港出現反殖抗爭，而是要維持原狀——他們在訪貧問苦下的所見所聞，因此只是拿來填充及穩固既定的對世界的認知框架，而不是拿來修正及刷新自身對世界的認知框架。這也是為什麼房遠華會說：「我們對香港工農心中有數，覺得沒什麼好搞的。因為我們不打算要團結工農來推翻港英統治。」¹⁸簡單來說，在國粹派訪貧問苦前，本身已經杜絕了自己想要團結工農做任何進一步行動的可能性，因此訪貧問苦活動到最後也看不到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結果，訪貧問苦很多時候只停留在公益層面，頂多會上升到對權益的關注與認識，但這一切還是限制在國粹派整個堅硬的對香港定位的認知框架之中——也就是確保香港不會自主地爆發革命，觸碰中共治港方針的底線。歸根究底，國粹派在訪貧問苦前，其實是已經覺得自己掌握了一切社會問題的解藥——那就是跟隨社會主義中國就可以了，也就懶於再有更多的思考。

或許，國粹派對訪貧問苦的想法，和他們堅持穿著樸素是同一個道理——這並不是因為在生活上，國粹派有勞動的機能性需要，或沒錢買衣服，才選擇樸素的搭配——他們在無法在生活中成為「真正的草根」的情況下，這是表達自己對工農的情感及認同的方法。國粹派的「土」既是一種「接地氣」的幻想和嘗試，卻也和擺在眼前的「土地」、「本土」一次又一次地擦肩而過。

（2）回國觀光團：故土的宏大

在第五章中，我曾經簡介過回國觀光團的內容。自 1971 年 12 月第一次大專學生回國觀光團在保釣運動中掀起一股中國熱後，回國觀光成為國粹派重點推廣的項目之一。1973 年暑假，參加回國觀光團的大專院校學生有 1,300 人以上。¹⁹根據石中英的說法，這些旅行團都是由中旅社安排，²⁰國粹派在校內則會運用自己的團體力量動員學生參

¹⁸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21 日。

¹⁹ 中國週籌委會，〈中國週工作報告〉，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第十六屆週年代表大會文件匯編》（香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1974），頁 6。

²⁰ 石中英，私人訪問，2019 年 6 月 8 日。

加。參與後的同學也不時會在學校出版物中發表感言。國粹派對回國觀光工作的熱誠，也使得社會派戲稱國粹派是「觀光革命論」。²¹

這種觀光團不只增進了一般同學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理解，讓一些誇大的反共流言不攻自破（同時也掩蓋了中國社會問題的複雜性），更重要的是他給予參加的同學一種「回歸故土」的身體上的感覺。事實上，國粹派時刻面臨的一個拉扯在於：他們一方面說要認同社會主義中國，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卻看不到也觸不到社會主義中國；回國觀光團則是一次可以讓他們體會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寶貴經驗。

在〈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中，我們可以知道，這些回國觀光團會帶同學參觀工農建設、教育改革、人民生活、風景文物等，也給他們很多機會和當地人自由交談及討論。²²在這個過程中，同學除了得到許多一手的見聞和資料，以及感覺到大陸同胞的親切、人民在窮苦底下的努力以外，更多情況下他們的感受都與「宏大」有關。譬如萃華在《中大學生報》上發表的〈祖國行——漫談學聯北京，南上團之旅〉，在短短一段文字中就提到了不同種類的「宏大」：火車是在「祖國大地上奔跑」，北京是「祖國的第一大城」，對北京的印象由「雄偉壯麗的天安門」、「遼闊的廣場」、「高大的城樓」、「莊嚴的樂章」等組成——大地、大城、雄偉、遼闊、高大、莊嚴，這些詞語無不指向「宏大」的感覺。

接著，這些「宏大」感受更讓他們有所聯想——譬如「十萬烈士」、「千百萬中國人民」的努力付出和偉大等，²³景觀的宏大就扣連到精神的宏大之上。當時觀光團成員看到這些壯麗偉大的風光，他們都會好奇的是：一窮二白的中國是如何建立出這些建設？此時最直接的答案就是歸功為人民的團結。如同楊寶熙提到在回國觀光團中的經歷——她到了都江堰，在宏大的水利基建前聯想到「集體」的重要性：「很多東西一個人做不到，要集體才可以做到，所以我們才認為要服從集體，不可以有自我。」²⁴

而在看到集體的力量時，團員會接連開始思考的問題是：「是什麼讓這種集體主義得以可能？」在當時看起來比較直接的、簡單的答案，就是歸功為中共群眾路線的力

²¹ 阿丙，〈明白你的「不明白」反貪污運動的茶杯裡風波〉，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頁66。

²² 馮紹波，〈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2〕），頁58-62。

²³ 萃華，〈祖國行——漫談學聯北京，南上團之行〉，《中大學生報》，1975年8月15日，版18。

²⁴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量。在這個直接歸功的邏輯中，他們其實並不完全理解這種集體主義背後是否有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楊寶熙接著說：「我們經常會看到很 macro 的東西，蓋過了生活上一些 micro 的觀察和感受。」²⁵也就是說，眼前實體所見到的「宏大」建築，被簡單地轉譯成了「集體主義的宏大」以及「中共的宏大」，團員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感甚至仰慕（覺得中共的宏大偉業如同水利工程一樣複雜和高深），也就在肉身（bodily）的感知中被培養出來了。

（3）中國週：認識故土

不過，不是所有大專學生都有機會參加回國觀光團。譬如，中大學生會在 1972 年就曾辦過回國觀光團，報名人數有 200 多人，但只有 30 個名額。如果回國觀光團對把學生轉化成國粹派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國粹派因此要思考如何把回國觀光團的體驗分享給更多的人。在 1974 年學聯的工作報告中，中國週籌委會就對中國週的背景有以下敘述：

七三年暑假，各院校同學隨旅行團前往中國各地旅行……大大加深了同學們對中國的理解。而各院校國事活動亦有所展開。認識中國活動，逐漸形成潮流。由於各校實際環境不同，同學們的認識各有差距，認識中國運動在各校的發展時不平衡的。在此種情形下，互相促進共同體倒是相當需要的。²⁶

也就是說，「中國週」的舉辦是為了增加同學對中國的了解，也是要延伸回國觀光團的影響力。事實上，中國週並不是一個只為期一週的活動，而是一個短時間內密集舉行的系列活動，當中包括了文藝晚會、電影放映、討論會、特刊出版及巡迴圖片展覽等²⁷——中國週是一個浸沉式的「中國體驗」，致力把回國觀光團的體驗搬到香港。這也是為什麼中國週並沒有單一主題，從歷史、文藝、科學、科技、農業、醫療、考古等都有涉獵——就像回國觀光團那樣，也有每天不一樣的行程。不過，在中國週云云活動中，還是以巡迴圖片展覽最為矚目，而這個重頭戲的題目，也契合著他們在回國觀光團

²⁵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15 日。

²⁶ 中國週籌委會，〈中國週工作報告〉，頁 6-7。

²⁷ 〈第一屆中國週〉，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頁 79-80。

中的感受。根據楊寶熙回憶，1975 年中國週著重中國大陸的科技發展，甚至把巡迴圖片展覽的題目定為「中國科技史展覽」，很大程度也是為了推廣他們在回國觀光團中看到大型基礎建設時的震撼感。²⁸也就是說，中國週其實就是讓香港的同學可以「用眼睛去旅行」。

第一屆中國週於 1973 年 10 月由學聯舉辦，又以港大最為積極。²⁹根據《香港學生運動回顧》的說法，中國週是為了回應自 1971 年後「青年學生對中國之好感」而起的認識運動。³⁰而根據陳毓祥在 1974 年對中國週宗旨的詮釋，中國週的舉辦意義在於

（一）加強學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團結，將認識祖國運動推向更廣、更深；（二）與香港同胞共同提高民族意識；（三）通過介紹及認識祖國的過去和現在，展望祖國的將來；（四）介紹及認識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及迫切性。³¹也就是說，中國週這種「認識導向」的活動，是希望培養民族主義，把香港的命運連結回中國的發展。³²這個活動在青年界引起很大迴響，中學生也會被吸引參加，當時的中國週有多大規模、有多成功——以 1973 年中國週為例，「近代史圖片展覽」由八所大專院校同學合辦，在港大展出一週內就吸引到 5,000 人，在理工續展 3 天有 3,000 人參觀，此後在浸會和中大展也吸引到幾千人，總數超過 10,000 人。³³

10-2 國粹派的組織形式與思想資源

要了解國粹派何以身為天之驕子，依然決定要在資本主義文化興盛的香港高舉土的風格，那就要從他們的組織形式開始理解——是怎樣的場景，造就了怎樣的情感和思想，可以讓他們土得光榮、土得自豪呢？這就需要討論國粹派的組織形式與思想資源，以及從此衍生的組織文化。

²⁸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15 日。

²⁹ 學聯，〈像鮮花的盛放 像節日的來臨——記各院校的中國週活動〉，《學聯報》，1973 年 10 月，版 9。

³⁰ 〈第一屆中國週〉，頁 79-80。

³¹ 學聯，〈為什麼要辦中國週？訪問中國週籌委會主席陳毓祥〉，《學聯報》，1974 年 10 月，版 7。

³² 史文鴻，〈學運之回顧與憧憬〉，《崇基學生報》，1977 年 6 月，版 8。

³³ 〈第一屆中國週〉，頁 79-80。

10-2-1 潛伏的組織生活：關於開「黑會」和秘密「大會」

雖然國粹派作為校內的派別並沒有組織起自己的社團或發行專屬刊物，而是散落於各種學生機構之中。然而，這並不代表國粹派沒有組織、沒有場景。在公開的層面，他們以不同的組織名義發表言論，搞中國週、回國觀光團及訪貧問苦等活動，而在這些公開的活動背後，其實有小心的策略和私下的串聯。這些組織上的策略和串聯得以成功有兩層因素，首先是有意識地爭奪各個組織的領導權，第二是召開各種秘密會議把隱藏在各組織的國粹派串聯起來——這是國粹派場景的輪廓。

在爭奪領導權上，楊寶熙曾在一次訪問中提到，她之所以成為學生會主席，背後從組內閣、寫政綱及參選，都經過國粹派的組織安排。1974年，一些在中大讀碩士的國粹派提議她出來參選，原因是她的女性身份容易得到女同學的選票，而且形象溫和，又沒有暴露過其國粹派身份，不易被人以此作為攻擊；同時，這些國粹派幫她找來其他內閣成員、幫她寫政綱。³⁴

然而，雖然國粹派在私下仔細安排不同人去不同組織擔當要職以爭取領導權，但要順利選上還是要靠校內公開選舉和廣大學生的支持。譬如1975年——也就是「四報聯刊」風波之後——港大的國粹派鍾瑞明出來參選港大學生會會長，但敗在了屬於「民主自由派」（可以被理解為包含了社會派及大專同學會圈子的反國粹派聯陣³⁵）的麥海華手中，可見國粹派的策略也不經常奏效。不過，根據麥海華的說法，儘管國粹派在1975年並未在港大學生會幹事中得到領導權，但這不代表國粹派就放棄用其他方法取得領導權。譬如，落選的鍾瑞明此後依然可以用其他身份為學聯辦中國週。麥海華說：「我也不知道他〔鍾瑞明〕是以什麼身份去辦。國粹派仍然控制一些屬會，可能他輸了學生會選舉後選進去了屬會。亦可能因此國粹派要辦些大型活動，再叫他出來幫手……一方面是政治酬庸，另一方面則代表他們很有組織：若他們的人選不成學生會則會到學生會屬會參選。在我當學生會的那屆，屬會比以往都積極很多，辦很多活動，又辦得大

³⁴ 鍾耀華，〈割掉家國的火紅——楊寶熙（上）〉，<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08-opinion-yeungpohi-a/>（檢索日期：2021年7月12日）。

³⁵ 民主自由派是一個自1975年後新生的聯合陣線，當中主要是比較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派及傾向自由主義的大專同學會成員，但民主自由派除了在反對毛派及國粹派一事上比較有共識外，基本上內部思想傾向並不統一及協調。民主自由派的出現象徵了1975年後校內反對國粹派的主要陣營已經從社會派轉移。關於民主自由派的定義，參見麥海華、劉麗凝，〈民主自由派・反國粹大聯盟・香港前途問題〉，《思想香港》8期（2015）；陳莊勤，〈我看這三年的學生會〉，《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1978）；麥宗民，〈學運隨想〉，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81〕）。

型，令我們學生會超支二十多萬。以往從未試過。」³⁶也就是說，國粹派雖然輸掉了港大學生會的主要領導權，但依然努力取得學生會旗下屬會的領導權，並透過其廣大的組織網絡滲透及架空學生會以取得實際的運動影響力。

另一邊廂，中大的楊寶熙成功當選 1975 年中大學生會會長。但成功當選並不代表一勞永逸，要讓國粹派的議案在學生會內部成功通過，依然需要一些小策略。楊寶熙說：

譬如 1975 年英女王訪港，他們〔國粹派的領導〕希望學生會低調，發聲明譴責一下就好了，不要搞反殖示威。但要達到這些目標，還是需要通過全體人〔中大學生會 12 名幹事〕的表決，為了確保表決可以順著原本的設計進行，國粹派就有一種叫「黑會」的東西。學生會核心人物中的死硬國粹派會先開一個秘密的會，聊很多策略及應對做法。到了開 12 人的幹事會的時候，這幾個人就可以互相呼應、扯貓尾〔在暗地裏互通消息〕，去推「只是發聲明」、「不要示威」、要和托派劃清界線這些說法。這樣幹事會最終才能通過只是出聲明譴責的結論。我們實現這種已經完全聊好了、鋪好路了的做法，其實靠的就是一種秘密的組織，是不會讓人知道的。³⁷

國粹派除了透過「開黑會」在學生組織之內取得主導權，不同學生組織之間也要進行串聯才能取得整個學運的主導權——這就要靠「開大會」。這些大會也是秘密進行的，就像是比較大型的「黑會」。楊寶熙形容說：「這些大會不會像之前所說的 12 個幹事裡面只有幾個幹事才知道的『黑會』那麼秘密，而是 12 個幹事都會知道的，但所謂『一般的群眾』就不會知道有這些動員大會。這些大會最多會有百多人參加，但都是秘密的，或是說有限度地秘密吧。」³⁸此外，江關生對國粹派的研究也有關於「開黑會」的紀錄。他作為港大國粹派一員，當年也曾出席過一些討論學生會選舉策略的「黑會」。此外，他也提到一些港大國粹派同學在香港大學附近湊錢合租宿舍，名為「三友」。³⁹可見「開黑會」並非中大國粹派專屬，其他大學的國粹派也有一樣的操作。

³⁶ 鍾耀華，〈家國、責任、香港——麥海華（上）〉，<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22-opinion-70s-makhoiwah-a/>（檢索日期：2021 年 7 月 12 日）。

³⁷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15 日。

³⁸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15 日。

³⁹ 江關生，〈火紅年代 反思國粹（1971-1976）〉，頁 291。

這些大會一般有兩個作用，第一是為了動員及協調相互的工作。楊寶熙說：「譬如大選之前會搞大會，是為了發動大家去投票、或者『中國週』之前也會搞大會，是為了發動大家去拉人參觀。」⁴⁰第二則是為了分析形勢——上至國際形勢、小至大專院校界的形勢等，國粹派內部都會討論。房遠華說：「在『開黑會』時，他們〔國粹派領導〕會來中大開會——以最高領導的身份。我有時候可以參與，聽他們匯報大專界情況如何，譬如聽他們說有什麼反動的事，說天主教大專聯會反動，而他們會要我們留意這些東西。有時候也會說大的形勢，譬如說鄧小平右傾翻案風。」楊寶熙認為，這些大會在四人幫全盛時期開得尤其頻密。⁴¹

此外，被拉進「黑會」中過著隱蔽的組織生活，對國粹派來說是一種「認證」。就如同楊寶熙說：「我覺得那個感受比較像是被拉進了大會後，會有覺得自己是『已醒覺』的人……會覺得自己還可以從制度的層面去理解這些事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也就覺得自己提升了。」⁴²也就是說，這種從爭取領導權到串聯所採用的隱蔽的組織型態，不只在擴大影響力上有實際作用，被納入這種組織型態中的人，也會覺得自己被認證為思想上更先進的一類，認為自己是特別的、醒覺的、重要的一群，這反過來也穩固了這種地下的國粹派網絡的內聚性和隱蔽性。

10-2-2 內部的政治思想學習

除了開大會以外，國粹派內部也會舉辦不同形式的內部政治思想學習會。譬如，他們會開讀書會、學習會，學習一些經典理論。這些理論學習又分為正統馬克思主義及毛澤東思想兩個部份：前者至少包括了《共產黨宣言》和《哥達綱領批判》，後者則是《毛澤東選集》、一些經典的中共文獻（譬如《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及兩報一刊——大陸最重要的官方刊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⁴³

在閱讀理論和討論以外，國粹派在思想上的學習也包括文學及電影。文學以蘇聯文學為主，電影則以大陸電影為主。國粹派會去南洋、南華、珠江等香港左派的電影院看大陸電影，甚至試過被安派去深圳看電影學習文革狀況。⁴⁴楊寶熙說：「我記得當時有

⁴⁰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⁴¹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年5月21日。

⁴²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⁴³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年5月21日。

⁴⁴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一套電影，說的是文革中的人民如何打爛教育制度，說有一些學校收生不是看成績，而是看學生的手掌有沒有起繭——因為起繭的手才代表你是工人或農民的子弟——我們當時看到這一幕就大力拍掌，覺得『對！考試制度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會有自己的代入，我們覺得香港的考試制度是不公平的。」也就是說，當國粹派吸收中國的社會主義知識時，其實往往也是從自身的香港脈絡去理解，對社會主義中國及文革的嚮往，也往往折射了自身對香港制度的不滿及反叛。

回顧這些思想資源，楊寶熙認為，文學作品《青春之歌》及《紅岩》對她的影響最為深刻。⁴⁵而房遠華雖然認為《青春之歌》有點離地，但也認為《紅岩》帶來的感受非常強烈，很可以激勵自己。⁴⁶《青春之歌》講的是名為林道靜的中學生為了反抗封建家庭離家出走，逐漸參與抗日並走上了革命道路——也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如何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轉變。而《紅岩》講的則是國共內戰下共產黨員於渣滓洞監獄的慷慨就義與寧死不屈。而這兩本書共同的主題其實就是隱蔽、服從、寧死不屈、堅持。

為何這些主題可以如此打動國粹派呢？楊寶熙說：「要學像《青春之歌》和《紅岩》裡面的服從和隱蔽，一方面是情懷，另一方面也是和組織生活相符的。」⁴⁷也就是說，之前提到過的地下組織和「開黑會」這種隱蔽的組織型態，在經歷了一輪的政治學習後，被賦予了另一層精神價值——越是可以忍受隱蔽和服從，越是代表堅持和寧死不屈。

10-2-3 神秘的國粹派領導：中共與國粹派之間的線人？

在上述隱蔽的國粹派組織網絡中，楊寶熙和房遠華都曾提到「國粹派領導」這樣的人物，而他們對於國粹派組織的方向及活動都有很大影響力，甚至連楊寶熙參選學生會會長及營運學生會時的一些決策，也是受到他們的安排和說服。究竟這些領導是什麼人呢？

楊寶熙認為，他們多是出身官校的左派同情者，後來被納入到港共的系統中，成為職業學生——也就是以讀書維持學生身份，實際任務是幫中共發展學校內的統戰工作。楊寶熙說：「譬如當年皇仁等官校有很多洗腦了的學生，他們比我們早幾年先入中大，

⁴⁵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⁴⁶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年5月21日。

⁴⁷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然後就開始做職業學生，譬如不停讀書、延畢、轉系、升學，總之就是會維持一個學生的身份去帶著我們工作。這是我們的『老鬼』，但他們不曾是學生會的。」楊寶熙沒有直接提到建議她去參選及指導她工作的領導人名字，只表示領導她的「老鬼」（就是學長、學姊的意思）於八〇年代已經去世。⁴⁸房遠華則提到了蔡文田。⁴⁹而江關生說：「筆者兩位皇仁學長——蔡文田（歿）、戴希立（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會），就是中大國粹派的中堅。」⁵⁰至於港大方面，江關生則提到他在「三友」處曾經見過陳毓祥、鍾瑞明、梁錦松、程翔等人。⁵¹

這些職業學生「老鬼」是否真的受到港共指示？若是受港共指示，那連結了國粹派與港共的這些關鍵人物屬於港共的什麼系統？國粹派又屬於港共的什麼系統？這些領導是在什麼情況下被納入港共的系統？在系統中他們個人能動性的範圍在哪裡？這些問題，現在依然是未解之謎，但因為這涉及到港共在香港的秘密組織，當事人若真屬於港共系統，礙於組織的保密原則，更不可能暴露組織形式。我們只能從有限的資料——譬如江關生的《中共在香港》及《香港學生運動》中〈評介專上學生組織的活動〉一文——嘗試去推敲這些職業學生的背景及他們的組織方法。

1970年出版的〈左派在專上學院的活動〉是最早有系統性地分析校內左派的文章，當中就提及了大專院校中有職業學生的存在。作者認為，校內的左派學生又分「職業性的左派學生」、被職業學生組織起來的「附從性的左派學生」及「同情左派的學生」，而當中所說的「職業性的左派學生」如真實存在，或許就和楊寶熙所說的她在七〇年代遇到的職業學生「老鬼」們屬於同一組織脈絡。文章這樣形容這些左派職業學生：

此等左派多為左派世家，從父親以至兄弟姐妹都是左派份子，而且必定是從中學開始，由外界左派勢力嚴格挑選，經過長期薰陶，加強共產黨意識，再受特殊訓練，使之在學業上、體格上以及領導能力方面均高人一等，隨時可以考進任何一間優秀中學，獲取優異成績，又富有煽動、寫作及組織之能力；不虞欠缺。他們之中又分兩種；第一等的是潛伏性的，第二等是活躍的。第二等不過是校內左派活動的表面領導人，第一等的才是幕後指揮者，而幕後指揮者的第一等職業性左派學生則

⁴⁸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⁴⁹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年5月21日。

⁵⁰ 江關生，〈火紅年代 反思國粹（1971-1976）〉，頁294。

⁵¹ 江關生，〈火紅年代 反思國粹（1971-1976）〉，頁291。

同時負責與校外左派勢力聯絡和傳遞命令，他們通常不大受人注意，在校內各方面的表現均為優良之學生，他們不但不表露其左傾之立場，至多表示對政治不感興趣，甚至為了刺探各方面的虛實，他們往往偽裝反共的姿態，使人不加防範。職業性的左派學生一定不是就讀於左派的中學，他們通常就讀於第一流的中、英文中學，而且儘量進入政府所辦的官立中學就讀，如此當他們考進大學或專上學院時，大學當局亦不會懷疑其背景有問題，甚至以為他們才是最純良的學生，安和他們「虎披羊皮」？職業性的左派學生由此在非常容易的情形下進入了各大學和專上學院，一踏進大學校門，他們便受到外界的指示首先與大學內原有的左派份子進行聯絡，成為大學內的一批左派新血，他們在大學或專上學院內表面上裝作互相不認識，而實際上立即進行一年級新生之左派份子大聯合，一起組織級社活參加屬會，盡量多去大學一年級的領導權。⁵²

雖然此文章沒有列明例子和資料來源，對左派有何組織目標、為何危險也只是停留在「危害整個香港社會的安定秩序」⁵³等泛泛而談，讀下來讓人覺得只是一篇「為反共而反共」的標準範文。然而，當中所提到六〇年代職業學生的隱蔽性和背景等特徵，的確和房遠華、楊寶熙及江關生等人所接觸到的七〇年代國粹派領袖的特徵相符。譬如，國粹派領袖的確是官校出身（皇仁的確是本地歷史最悠久及著名的官立中學），而他們的確有努力吸收新人——譬如楊寶熙就是被他們說服參選。此外，他們的確在校內是低調人士，而且不擔任任何學生領袖的公職。而鑒於兩份資料的契合之處，或許我們可以大膽推斷，這些被推上領導校內左派及國粹派的位置的職業學生，有著共同的、深厚的組織脈絡，而且這個組織脈絡維持了至少 10 年——這很可能代表了這些國粹派學生領導的確與香港傳統左派相連。但到底他們是屬於港共底下的工會系統、新華社線還是什麼外圍左派機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國粹派領導要發展大專院校界的統戰工作的目標是什麼？楊寶熙認為是「接觸群眾」，她說：「我們會知道畢業後大學生會成為可以 occupy 社會中重要位置的人。所以如果我們認為可以影響到這些同學，讓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好感或認同社會主義，那社會

⁵² 張正平，〈左派在專上學院的活動〉，《香港學生運動》（香港：大學生活社，1970），頁 89-90。

⁵³ 張正平，〈左派在專上學院的活動〉，頁 97。

的未來就會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做『大學生』的工作很重要。」⁵⁴周魯逸則認為是「在校內『培養』接棒人」。⁵⁵兩個說法的指向是一致的：就是要發展出一個人際網絡，方便港共落實其對港方針。而為了發展出這個人際網絡，國粹派不只是接觸大學生，也會接觸將要考入大學的中學生。房遠華就說，國粹派利用學聯的中學生組（也就是陳毓祥曾經任組長的屬會）去挖掘積極份子，鼓勵他們考入大學，這樣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擴大國粹派在校內的勢力。房遠華說：「讓這些受我們影響的中學生下決心考大學，那他們就會自動成為我們〔國粹派〕力量的一部份。」⁵⁶

不過，到底這些學生是否有意識自己進大學就是要當「職業學生」呢？〈左派在專上學院的活動〉提到的職業學生彷彿都是被刻意安排和訓練的，事實上是怎樣呢？房遠華曾提到，成為「職業學生」比較是自然而然的，譬如他剛入學做崇基學生會社會部的職務時只是「淺紅」，但隨著第二年越來越想投身於國粹派的大業之中，才為了「革命需要」從理科轉文科（因為理科翹掉實驗課會影響成績，但文科翹課不會影響畢業）。而轉系的決定，也不是國粹派領導的硬性規定，雖然他一方面不是對理科完全沒興趣，但另一方面選擇了文科中的歷史系是建立在個人興趣的基礎上。他說當年做這個決定是為了「可以多一些貢獻自己，為了革命需要，需要轉移陣地」，而不是被人指示。所以，我們也不應該以過分死板的方法來理解職業學生的現象——彷彿他們做職業學生的決定就是受到上級命令。

事實上，儘管有些職業學生很可能與港共有聯絡，但他們在大專院校界要發揮作用，並培養出更多的職業學生，不是用強權壓制，而是透過勸導、說服等方法。譬如房遠華提到，國粹派受到職業學生領導的說服，很大程度是因為這些職業學生很有感染力，而且不會打壓學生，而是處處為學生解惑。他說：「我們之所以容易受到感染，是因為沒有打壓的氛圍，組織感覺比較平等，有疑問的話上上下下都會幫你紓解，而紓解不了不會硬來，他們會記下來，然後會翻炒疑惑〔持續說服疑惑〕。」⁵⁷不過，領導在說服的過程中遭遇失敗、左派中有群眾不服上級領導的指令，也是會發生的事。楊寶熙曾提到一個例子：「我記得當時有一個朋友，他到了中學畢業的時候有一些左派的朋友叫他不要入大學，就去工廠打工當工人吧。他表面上覺得『那試試吧』，但心底裡面卻

⁵⁴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⁵⁵ 周魯逸，〈香港學生運動與意識形態〉，頁283。

⁵⁶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年5月21日。

⁵⁷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年5月21日。

會覺得『我能讀書、我的成績可以入大學，我又想入大學，那為什麼不能去讀大學呢』。與此同時，有一些人會根據一些左派的提議要入大學、在大專院校中建立愛國群組而被分配入大學。那就更會讓像我朋友的那種人覺得：『那為什麼我不可以去讀大學呢？』題外話是，我朋友過了幾年以後終於進大學了。」在這個短短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左派和國粹派中，領導必須具備一定能力，才能說服下一級的群眾跟隨組織安排。如同楊寶熙所說，這些領導是很有說服力的：「他們的理論基礎的確比我們好，而且知道的資料也比較多，這樣才可以有效說服我們『這樣做就對了』，我們也都很信他們。」⁵⁸

10-3 抗爭？不抗爭？國粹派的情感矛盾、組織文化與世界觀

到底這些國粹派領導人如何一層一層地說服像楊寶熙那樣的國粹派學生領袖採納「不抗爭」的路線？被說服的人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要跨過怎樣的思考與情感關卡？當中又調動了什麼情感？也就是說，國粹派是怎樣一步一步變成國粹派並決定服從「長期利用，充分打算」治港方針？訪問楊寶熙時，她提到國粹派中有兩個「最殺」的說服大家以搞認識導向的活動來取代抗爭的方法：一個是「覺得自己是小資」，另一個則是「中國還是很弱」。⁵⁹「很殺」在廣東話中是指很有說服力、很正中紅心，但其「殺」字，其實也可以理解成「一招斃命」，讓人無從反駁。接下來，我將分析這兩個「最殺」的說法何以那麼有說服力。

10-3-1 說服方法一：「覺得自己是小資」

1975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運動的56週年紀念，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偕同皇夫菲臘親王首次到香港訪問。大專院校界除了發聲明反對，並無其他抗議表示。楊寶熙提到，當時有一些國粹派學生和國粹派領導進行討論：「英女王來的時候也會有人問為什麼不可以示威，但最終都會被說服了。」⁶⁰到底這個說服是怎樣做到的呢？其實就是通過讓你覺得，自己想要去示威的心態是一種「小資心態」。

⁵⁸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⁵⁹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⁶⁰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我曾在前文提到，由於國粹派認為自身作為大學生無論如何都有小資原罪，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到底什麼事情會被歸咎成是小資心態，其實定義非常廣闊，甚至可以無限上綱。而且，是否屬於「小資心態」的定義不是透過上而下的宣告，而是國粹派自身透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大會」中進行告解的方法去創造的。楊寶熙提到：「我們當時還會有許多批評與自我批評大會。譬如我記得有兩個同學。一個同學家裡是開士多仔的，他覺得『這就足以代表自己是小資產階級』，因為家裡有資本，為此他不停批判自己。另一個同學——我現在想起來可能更冤枉——他家裡有一個地方是租給別人開 party 的。七〇年代港英政府為了發洩青少年的精力很推廣辦舞會，譬如香港節什麼的，當時舞會很流行，而他家是租地方給人開舞會的。他和我們說他看到有人落藥迷姦——我也不知道是他真的見到還是只是見到了一次然後無限上綱上線——覺得自己家是幫兇，而源頭是因為覺得自己擁有資本，為此他也不停地自我批判。」⁶¹

就像傅柯論及性的論述如何在告解禁忌中被建立起來一樣。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告解過程中衍生的關於小資心態的論述，不只壓抑小資心態，更發明了各式各樣的「小資心態」，家庭背景、思想、慾望、情感等都可以被說成是滲透著小資心態。因為小資原罪論假定了小資心態會影響其政治及行動，國粹派領袖在進行政治路線的說服時，也會發明各種以管控「小資性」為理由的論述，勸說想要做抗爭行動的國粹派退卻。

那麼，想要抗爭如何和小資心態拉上關係呢？那是因為抗爭表現了反對港共對港方針中要國粹派「隱蔽」的原則，也是反對中國社會主義中被認為是革命的服從及集體主義精神。楊寶熙說：

其實我當時也有想過「示威一下也無妨」，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覺得要隱蔽和服從——這真的是拜《青春之歌》和《紅岩》所賜。我們會覺得服從和隱蔽是對的，因為上面一定有更好的理由要我們這樣做。而**如果我有二心，我就會想是不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好」，「有小資產階級的特性」，「還不是無產階級」**。如果背後還有什麼理由去支撐這個隱蔽跟服從，那就是「覺得自己小資」——這個是最殺的。」⁶²
(黑體為筆者所加)

⁶¹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⁶²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不過我必須強調，在「覺得自己是小資」後，國粹派最大的感受不是覺得自己想要抗爭的心被壓抑或不被領導理解，而是覺得昇華——成功拋棄抗爭心態會被轉化為一種正面感受，因為這代表自身克服了小資心態的缺陷，更可以走入群眾，並且更接近「為社會主義中國奮鬥」的理想。就如同毛澤東所說：「應該使每個同志明瞭，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⁶³國粹派把克服小資心態看作成為共產黨人的必修課。

「覺得自己是小資」不但是一個「萬能鑰匙」，讓國粹派在面對「抗爭 vs. 不抗爭」的矛盾時，讓這個矛盾轉化成一種自我對內的鞭策，同時也養成了國粹派對「土」（作為對小資的反抗）的風格的執著和對「潛伏」的組織文化的堅持；進而生產了國粹派的認識導向的行動路線（譬如搞展覽），因為這些展覽有效承載了他們在超越自身「小資心態」時對走入群眾的渴望。楊寶熙談到這種感受時說：

因為我們不能暴露身份，別人也有時候不明白，譬如會質問我們英女王訪港為什麼不去示威。但最終我們也會覺得這是「沒所謂」的……因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要別人去理解我，而是要堅持自己的理想，讓多一點人對新中國有理解、有愛、有希望——**總體正面的感覺比較強**。那個「不要讓別人搞亂香港」的使命感會蓋過「不被理解」的難受感。

因為我們相信毛澤東那一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搞展覽：我們以前是一般群眾，但當自己提高了，有更多的認識後，我們覺得自己要把已學會的帶回到群眾中去，把我們已經認識到的東西教給別人，譬如怎麼從制度的角度去看剝削的問題，而不是看到自己眼下的收入少、生活苦困就只想到個人問題。⁶⁴（黑體為筆者所加）

雖然國粹派的潛伏、不抗爭、不暴露身份總會讓人誤會，譬如社會派曾戲稱國粹派是「革命安全論」⁶⁵。但對國粹派來說，這些誤解是不需要執著的，因為他們看重的是對自身小資心態的超越和轉化——對比起抗爭，國粹派認為展覽這種「認識」導向的活動更有「服從組織—潛伏—群眾路線—集體主義—無產階級」的氣質。所謂群眾路線，

⁶³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5〕），頁1096。

⁶⁴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⁶⁵ 阿丙，〈明白你的「不明白」反貪污運動的茶杯裡風波〉，頁66。

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其實就是中共對領導群眾的方法的系統化、條理化的總結。那麼搞展覽，一方面是在身體層面上發洩或轉化了國粹派本來可以導向抗爭行動的心力；另一方面也讓他們把自身想要抗爭的心態打成「小資心態」後有一個行動上昇華的出路——也就是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作是為了群眾。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 1973 年反貪污運動及 1974 年反加價運動中，國粹派一直稱抗爭的托派和社會派「沒有跟隨群眾」，又認為自己才是群眾路線的代表。在表面的、理性的層次，這可以看作兩者對群眾行動力的理解有很大分歧——這在之前的章節已經討論過了——但在背後的層面、在情感上，這關乎國粹派對「抗爭」有了「不服從組織——強出頭一個人主義——小資心態」的理解，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國粹派會說示威遊行是「陷於自我洩憤、或陶醉」⁶⁶。歸根結底，那是國粹派對於搞抗爭都有「個人主義」、「小資」的認定——因為他們自身就是從想要抗爭的心態中一路走來，並且用「覺得自己是小資」的理由來克制搞抗爭的慾望和想法，並以搞認識導向的活動來做進一步的轉化或昇華。也就是說，搞展覽活動成為了國粹派自身走入群眾的勳章，搞抗爭因此就被認為是遠離群眾的小資操作而已。

10-3-2 說服方法二：「中國還是很弱」

在之前幾章，我們已經討論過國粹派的路線主要是跟隨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治港方針，因此要努力提防自發的反殖抗爭出現。然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為何可以成功說服國粹派呢？這首先跟他們對中國的觀感有關。

在國粹派內部的政治思想學習中，國粹派對中國的國際處境的認知，首先是停留在一種中國處在極大危險的理解中——認為世界很動盪，中國隨時會捲入大型戰爭之中，這種腹背受敵的狀態使得「中國還是很弱」。二戰、國共內戰、韓戰等雖然距離七〇年

⁶⁶ 畢捲鋒，〈「反貪污、捉葛伯」我的一些不明白〉，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頁 64-65。

代已經有二十年或以上，但國粹派的學習材料中，這些戰爭的例子依然經常被引用，這使得國粹派對中共的認同感很大程度上定格在這些戰爭的處境之中。譬如，楊寶熙提到霍英東利用香港幫中共在韓戰中突破禁運的例子是經常被傳頌的。⁶⁷又譬如國粹派場景內備受傳閱的《青春之歌》及《紅岩》，前者的背景設定是二戰的抗日時期，後者的背景設定是國共內戰。所以，儘管文革暴露了中共內部的權鬥問題、官僚問題及經濟問題，香港、中國也有許多不同流派的民間批判思潮湧現，對中國社會主義提出了不同的質疑；但這一切對國粹派來說，都只是騷不到癢處的消息而已。因為國粹派對中共的理解是浸淫在二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政治脈絡當中，因而整個理解的框架——也就是「中國還是很弱」、「世界還是很動盪」等前提——沒有被適當地更新過，也沒有注入更細緻的分析和解釋，以致托派、無政府主義和逃港紅衛兵的批判都未能切合國粹派對「脈絡」的理解。就如同楊寶熙所說：「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這樣想的，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自己當時對中共的理解是完完全全停留在國民黨時期，也就是白區時期。所以我們一想到解放軍就不會想到紅衛兵派系鬥爭中的解放軍、不會想到三反五反，我們一想到解放軍就是想到長征。」⁶⁸

儘管國粹派的內部學習中的確包括了國際形勢的探討，也會更新中國的最新狀態，但楊寶熙說，這些國際形勢探討中最為印象深刻的依然是「美國、蘇修大敵當前」、「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也就是說，關於國際形勢的資料更新，依然是餵養國粹派關於中國處於極端危險及「中國還是很弱」的認識框架。

這個對「中國還是很弱」的認知因此會在三方面影響他們對現實及理論的判斷：

（一）由於「中國還是很弱」，國粹派認為自身必須利用香港本身作為殖民地的優勢去幫助其發展——譬如為隨時可能爆發的戰爭做準備——「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因此被國粹派接納，也順道偏擺了香港自身的抗爭議程；（二）由於「中國還是很弱」，國粹派認為自身必須保護這個很弱的中國，一切批判的聲音和以香港為本位的抗爭議程都被認為是在「攪局」及偏擺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打算；（三）對「中國還是很弱」的籠罩性的認知使得國粹派對第三世界理論停留在一種「中國本位」的理解，認為連結第三世界是為中國的戰略服務。以下，請讓我逐點解釋。

⁶⁷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⁶⁸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楊寶熙說，大資本家霍英東在韓戰中幫中共走私戰略物資對他們的影響很深刻：「我們〔國粹派〕總想像未來幾十年內可能會遇到像韓戰這樣的場合——需要香港幫助運輸戰略物資、醫療物資等——所以我們會說不要逼迫中共出動解放軍改變香港現狀。」⁶⁹而為了讓香港在幾十年內可能出現的戰爭中為「還是很弱」的中國做準備，國粹派認為自身必須接受「長期利用，長期打算」的中共治港方針。如同楊寶熙所說：「革命要看策略、看時機，就好像抗日戰爭時期或者國共內戰時期那樣。」⁷⁰香港的抗爭議程因此會被偏擺，國粹派對自身的定位也會變成如霍英東那樣的「潛伏」。楊寶熙接著說：

左派當年是不能夠站起來、不能夠振臂高呼的，他們還是要忍耐、要等。況且我們想的香港的未來不是革命，而是響應中共的號召，反正也是要中國政府覺得可以解放香港才行。

所以我們想的不是在「等待革命」，我們是在配合。我們當年完全明白香港只是一隻棋子，什麼時候該幹什麼的，我們完全懂。事情應該讓中央去決定，我們可以給意見，因為我們熟悉香港的情況，但怎麼做輪不到我們話事……

我們當年已經完全清楚知道〔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方針，這不是事後才知道的。而且我們還用這一點去說服同學不去衝擊殖民政府。這也是我們和社會派及托派最大的差別——他們可不只是口頭反殖，而是要反到底、抗爭到底。而很多同學看到社會派和托派這樣做，就會覺得我們很怪，就會問我們「你們整天說殖民政府的不是，那國粹派幹嘛不搞反殖的衝擊？」而我們總得解釋吧，所以我們就要用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句話去說服同學，告訴他們香港作為殖民地還是有利用價值，所以我們不要打翻香港作為殖民地的身份。如果能接受「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說法的話，就不會再反對我們了。⁷¹（黑體為筆者所加）

也就是說，國粹派為了協助「還是很弱」的中國，於是主動接受「長期打算，充分利用」。而國粹派對於本地抗爭不參與的狀態背後，是基於「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策略中的「主動等待」（active waiting）。他們在外表上雖然像在被動地等待中共解放香

⁶⁹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⁷⁰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⁷¹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港，像是將香港的未來完全交託在中共手中，而自身則是休眠一般；然而，國粹派其實對這個等待的狀態賦予了積極的、主動的意義。換句話來說，「潛伏」不是休眠，「潛伏」本身就是一種「工作」。這種「潛伏」工作未必在一時三刻看得到有任何表面效益，但國粹派在隨時為自己可以當「霍英東」的一天做準備。

對「中國還是很弱」的認知，也成為國粹派為了打擊托派而不問是非、不問青紅皂白、甚至為托派扣「蘇修間諜」⁷²等帽子背後的情感基礎。對國粹派來說，世界是在大亂的邊緣，戰爭是一觸即發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處境總是在危險與緊迫當中，所有對中共有所批判的聲音因此只會被閱讀成是在添亂、擾亂軍心、甚至別有用心。這也是為什麼國粹派會一直針對托派，因為托派在當時最有理論、有組織地批評中共及策劃香港的社會運動——而這些都被國粹派看成有理論、有組織地扼殺「還是很弱」的中國的革命成果。國粹派對托派所扣的這些帽子固然經不住事實的敲打，然而卻不是沒有情感來由。

最後，國粹派對「中國還是很弱」的認知，也會作為前提影響著國粹派對毛澤東的第三世界理論的理解。雖然托派及《70》的無政府主義傾向者在世界觀上，也具備第三世界理論的問題意識——也就是對亞非拉的反帝反殖抗爭有很大的關注與支持。然而，第三世界理論得以戳中國粹派的點和得以戳中托派及《70》的無政府主義傾向者的點是很不一樣的。國粹派雖然經常提到「愛國反霸」、「第三世界」等概念，但他們對第三世界理論的理解，是以「中國依然很弱」為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他們對第三世界理論的理解是以中國為本位思考的。在此基礎上，對他們來說，聯合第三世界抗爭及不首先針對第二世界（譬如英國）是中共為了解除自身危機下的戰略，而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支持者就應該跟隨這種鬥爭策略。然而，對於托派及《70》的無政府主義傾向者來說，他們更多是以第三世界亞非拉的人民本位去理解第三世界理論，於是香港之所以要關注甚至聯合第三世界，是因為這些地方共同有著被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侵害的歷史經驗，香港和第三世界人民之間都有著類似的抗爭；而對中國官僚主義及極權的批判，也是建立在優化第三世界抗爭基礎的關注之上。這也是為什麼兩者雖然都對第三世界關注，但在對香港抗爭路線的判斷上卻有天淵之別。總之，「中國還是很弱」成為回應國粹派在「抗爭 vs. 不抗爭」的情感矛盾的「萬能鑰匙」，也促使國粹派接納等待、潛伏的組織

⁷² 列兵，〈與屠龍君討論「香港問題」〉，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頁78-80。

文化，甚至影響了他們對第三世界理論的閱讀，使得他們儘管擁有第三世界的世界觀，但依然跑不出唯中國本位的思考。

10-4 國粹派何以潰散？

1976 年是國粹派動盪的一年。1976 年 4 月 5 日，大陸民眾透過悼念周恩來逝世表達對四人幫及文革的不滿，北京出動 1 萬多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驅散在廣場悼念的群眾，此為四五天安門事件。由四人幫把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悼念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並以鄧小平是四五事件的後台為理由撤掉其國務院副總理的職位，同時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1976 年 5 月 3 日，學聯內身為大專同學會會長的麥宗民提出「譴責中共中央違憲」議案，認為學聯應該譴責中共中央政治局越權違憲撤掉鄧小平的職。⁷³此議案遭到身為中大學生會會長的國粹派楊寶熙反擊，最後通過的決議是反擊「右傾翻案風」——四五天安門的群眾悼念運動不但沒有被學聯支持，更被說成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黨行為」。⁷⁴5 月 4 日，大專同學會發表〈「五四」人權宣言〉支持四五天安門的群眾悼念運動。同時，已經合併並改組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計劃在維園搞集會。5 月 7 日，港大學聯代表團成員甘志強和鍾子維在港大發表大字報指麥宗民反華反共，同時把麥宗民與托派扯上關係。⁷⁵國粹派看起來依然意氣風發，渾然不知翻天覆地的變化正要開始。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9 月 9 日，毛澤東逝世。地動山搖的不只有中國，香港的國粹派也為之震動。理工大學直播了北京的百萬群眾追悼大會，賈士域堂擠了 2,000 同學及市民。楊寶熙於直播後致辭：「毛主席為我們遺下了寶貴的革命財產，千車萬船載不完，過去舊中國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真理和救國救命，奮鬥犧牲；今天我們香港青年學生在社會主義祖國的陽光下茁壯成長，今昔對比，我們是何等幸福。」⁷⁶場內同學放聲痛哭，但他們不知道，更大的痛苦即將在一個月後發生。

⁷³ 學聯，〈在學聯第十九屆代表大會中動議之譴責中共中央違憲議案〉，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6〕），頁 120。

⁷⁴ 麥海華、劉麗凝，〈民主自由派·反國粹大聯盟·香港前途問題〉。

⁷⁵ 甘志強、鍾子維，〈反對麥宗民同學利用學生會達到其反華反共的政治目的〉，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6〕），頁 126-27。

⁷⁶ 尚進，〈哀思凝聚 熱血奔騰——記學聯追悼會〉，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6〕），頁 129。

10月6日，華國鋒聯合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等黨政軍要人以「隔離審查」名義抓捕並拘禁四人幫，四人幫正式倒台。及後，華國鋒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文革結束了。國粹派一時之間受到嚴重震攝。之後的兩年間，國粹派其實都在消化四人幫倒台的消息，在行動及組織上就逐漸潰散了。

10-4-1 「神秘」潰散背後：組織形式的侷限、「想不通」的感覺

有不少人都以四人幫倒台去解釋國粹派的潰散。《中大學生報》出版的《迎新特刊 2012》的學史部份就寫道：「1976年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的結束，使『國粹派』失去了精神支柱，同時亦標誌著他們的沒落。」⁷⁷這固然是符合歷史的、理所當然的敘事，但跳過了一些需要解釋的步驟。要知道，中共並非第一次有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劉少奇被打到、造反派被鎮壓到中美建交、林彪墜機，中共從六〇到七〇年代經常是「五時花、六時變」，何以國粹派就無法承受四人幫的倒台呢？隱蔽、緊密又穩定的國粹派地下組織網絡，何以無法在此時團結起大家，為大家排走疑惑？國粹派一直以來對社會主義中國的信心，此時又到哪裡去了呢？最重要的是：國粹派疑惑的「點」、潰散的「點」到底是什麼呢？這些都是需要被展開來分析及討論，才能理解潰散的全貌。

根據楊寶熙的說法，四人幫倒台後，國粹派內部至少分成三種不同的反應。第一種國粹派並沒有被四人幫倒台及文革結束的消息震驚，甚至有一種鬆綁的感覺。楊寶熙解釋說：「那個 relief 是源自於在四人幫時期自己已經有很多矛盾，其中一個矛盾就是覺得四人幫一方面說要反對資本主義，另一方面香港在四人幫當權底下卻還是有資本主義……所以四人幫倒台有些人會 relief，是因為他們覺得『唉！這樣就不用再面對內心的矛盾了，不用再壓抑自己、不讓自己做自己了』。」類似的鬆綁感覺也見於更廣大的傳統左派圈子。在左報工作的周奕提到，他與身邊的左派對四人幫倒台的感覺也是類似的——大家覺得覺得一個「無形的緊箍咒」被「鬆綁」了。他形容那個緊箍咒是一個「極左的東西」、「讓人不舒服」。他解釋道，在四人幫當權期間，新華社對左報的審查尤其嚴謹，當時《文匯報》第1版的主任經常害怕選錯稿題、標題而失眠，報社內部也經常為了符合四人幫的政治審查而爭持不下。到了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大家覺得審查也將連帶著鬆綁。周奕說：「譬如內部再有爭論，我們就說——四人幫都倒台了，還

⁷⁷ Jaco，〈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迎新特刊 2012》（2012）。

爭什麼？」⁷⁸這類人也是最容易接受四人幫是「有問題的」、「反革命的」說法的一群人。

還有第二種國粹派——也就是認同四人幫路線的國粹派，他們會認為「鄧小平和華國鋒趁著毛澤東死了奪權，認為四人幫倒台背後是路線鬥爭」。⁷⁹然而，這種想法從中共那邊是得不到任何迴響的——這群國粹派因此也最為痛苦，也最陷入自我懷疑的。到了1978年，他們的痛苦就更深了：文革結束，社會主義還要發展下去嗎？中共搞改革開放，是在走回頭路嗎？中共還是在實行社會主義嗎？曾經對於中共等於社會主義的認定，在此時還成立嗎？在四人幫倒台後，依然支持四人幫的這群國粹派，與中共之間就有了極大的拉扯和張力。楊寶熙說，直接領導她的國粹派就是屬於這一類人。⁸⁰

在以上兩種國粹派以外，更多的左派和國粹派其實陷入不知所措之中。四人幫倒台後，左派報紙雜誌開始跟隨著中共的宣傳陸陸續續地揭露四人幫的黑材料——譬如四人幫私生活腐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指控就出現了，這不只對校內國粹派造成影響，對傳統左派來說也受到震動，覺得自己被騙了。江關生提到，當時已經加入工聯會、現為工聯會榮譽會長的陳婉嫻就曾認為四人幫倒台是她「人生中最大轉變，信念潰散了」，因為「突然知道這四個人咁衰〔那麼壞〕，我髒〔生氣〕得好厲害。也有人說，我們被騙了。當時有很多人離开工會……那段時間，我在聖士提反灣日日看海，思考自己走的路有沒有錯，全部都寫在一張紙上」。⁸¹同樣，當時在左校教書、後來成為立法會主席及民建聯創黨主席的曾鈺成也說：「打倒四人幫後，我和學校其他同事都感到被騙。那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我們只專注於教學工作。」⁸²

為何有些本地左派或國粹派會因為被四人幫騙了而陷入如此大的痛苦之中？難道他們不是應該要為了不再被騙而感到開心嗎？而且，如果他們確信四人幫如黑材料所說的如此不堪，那以推倒四人幫而同時尊毛澤東為正典的華國鋒難道不是應該更得民心，讓這些左派和國粹派再次對成功打到反革命的中共感到信心大增嗎？為何在意識到自己被騙後，一些左派和國粹派所感覺到的不是「真相大白」的明快，而是「信念崩潰」痛苦？這很大程度是因為這些左派和國粹派實際上是認為「四人幫」就等同的毛澤東，四

⁷⁸ 周奕，私人訪問，2019年1月16日。

⁷⁹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⁸⁰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⁸¹ 江關生，〈火紅年代 反思國粹（1971-1976）〉，頁291。

⁸² 江關生，〈火紅年代 反思國粹（1971-1976）〉，頁291。

人幫的倒台意味著剛死去的毛澤東也是騙他們的一份子。以下，作為國粹派的房遠華就對這個「被騙」的感覺有所闡釋：

我們想不到形勢會急轉直下，然後會抓了他們〔四人幫〕說他們是反黨反革命份子。那如果他們是這樣的話，那毛澤東呢？毛澤東難道不是反黨嗎？**如果說四人幫是壞的話，那最主要的人物就是最壞的人物，那四人幫就不是四人幫——而是五人幫，包括了毛澤東……**

我們開始覺得被**欺騙**。毛澤東原來和四人幫在一起。說四人幫，他們有很離譜的東西，譬如江青進口色情電影，有很大的影院，我們覺得很過我們的界線。那是腐朽資本主義的墮落的東西，為什麼革命派會這樣做？他們用國家的財產做私人的資本主義腐朽的享受，我們不可以接受。⁸³（黑體為筆者所加）

由此可見，面對突然的四人幫倒台的訊息及源源不絕的四人幫黑材料，不知所措的國粹派也只能儘快去理解四人幫路線背後的「幕後黑手」已解開心中的疑惑——但也就是這個時候，一些國粹派就會開始懷疑到已死的毛澤東頭上去：四人幫的墮落會否也意味著毛澤東其實也是一樣墮落的？到底中共還有瞞著多少東西？

不過，這些懷疑之所以會骨牌式的發生，甚至到最後擴散到懷疑毛澤東思想、懷疑社會主義等。很大程度也是因為此前樂於為國粹派成員排解思想困惑的組織場景也分崩離析了。房遠華就提到，在四人幫倒台後，他的上線和下線就自行瓦解，而且大會也沒有再開了。他說：「以前形勢會有 100 多人，學習會也有 10 多人，但四人幫倒台後全部都沒有通知我，我一開始懷疑是不是被人排斥，但其他人也聽不到風聲……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組織突然斷了。沒有人通知我們做學習會，上面可能混亂了，一般應該要穩定人心，但突然散了，甚至沒有人通知我擁鄧。我們各自很消沉。覺得自己很幼稚很麻木。」⁸⁴同樣，楊寶熙也提到，「開大會」的確是在四人幫興盛時比較多，而在四人幫倒台前，個體比較可以透過集體的組織生活互相依靠；但四人幫倒台之後，就開不成任何大會了，「不但是這些批評與自我批評，所有大會都沒了，因為大家潰散了，根本沒

⁸³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21 日。

⁸⁴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21 日。

有人再召集大家去總結和理順這個思路。可能私底大家三三兩兩會做？但沒有大會了，組織也散了，互相依靠的支柱也就沒了。」⁸⁵

也就是說，從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的結束，到國粹派潰散，至少還要經歷「舊有的組織生活的消失」和「對四人幫以至於毛澤東有所懷疑」這關鍵的兩步，才讓國粹派都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共同走出思想的疑惑及精神的困境。那麼，為什麼國粹派內部沒有再召開大會，導致「舊有的組織生活全然消失」呢？既然大家都有疑惑，不是更應該有人召開會議嗎？或者，就算上線沒有要求開會，內部為何不能自行組織討論？楊寶熙的猜測有二。首先，因為國粹派內部「不習慣這種爭論的情況」。⁸⁶在前面的小節我們看到，國粹派內部有很明顯的「上線／下線」意識，也就是大家都習慣在一個有「領導及重屬」的結構下工作，而之前的大會都是自上而下地發動的。因此，下層國粹派就算在四人幫倒台後有參與大會的需要、也有共同解決問題的想法，在組織文化上，下層國粹派本身並沒有賦予自己召開大會的習慣及權力，更沒有橫向地自主討論的風氣，也就是「不習慣」的意思。換句話來說，在先前的組織結構中，如果一個國粹派成員對政治有疑惑，解決方法大多時候不是透過自行爭論和自主地探討出答案或結論，而是依賴上線的介入去調停或解答這個疑惑。這也使得一旦上線沒有召開會議，沒有自我充權的、不懂得也不習慣在內部進行爭論的國粹派，就會不知道如何是好。在不知道如何處理「到底文革結束是否代表中共要放棄社會主義路線」、「四人幫倒台該如何評價」這些可能引發紛爭的議題的情況下，國粹派內部能談的就不多了。而為了不去影響表面上的和平及團結，楊寶熙補充說：「所以在不習慣這種爭論的情況下，大家只能去聊比較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國家要富強，因為在這點上大家沒有爭論。」⁸⁷就是這樣，國粹派的社會主義理念的部份變得隱蔽起來——因為一旦要討論社會主義，就必須處理對文革和四人幫的看法的分歧。於是，國粹派在表面上只剩下愛國、富強等主旋律，從表面來看也就完全遠離了原本的社會主義初衷。

那麼接續的問題是，為什麼國粹派的領導——也就是職業學生——沒有召開大會讓大家討論問題呢？是因為這些職業學生的上線跟著四人幫倒台而倒下嗎？是因為他們的上線也正跟隨中共的權力交替，而出現工作指示和路線的更改嗎？我認為，另一個更為明顯的可能的原因是這些職業學生領導，事實上具備非常強的理論能力，而他們看到當

⁸⁵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⁸⁶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⁸⁷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時中共路線的改變是沒辦法自圓其說的，一直緊跟中共的職業學生也陷入無法自治的局面。如同楊寶熙提到，她的領導就屬於依然支持四人幫的國粹派，在四人幫崩潰時也陷入了痛苦。⁸⁸不過，就算不訴諸由上而下的解釋，國粹派整體的氛圍其實也陷於一片混沌與窒息的沉默之中。楊寶熙認為，這種潰散前的沉默也反映了他們「想不通」的狀態——也就是「對四人幫以至於毛澤東有所懷疑」。⁸⁹楊寶熙在自己的書中寫到：「我自己對中共的路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抑或都只是中共中央的權力鬥爭，已經無所適從。」⁹⁰而房遠華則比較明確地闡述了他當時想不通的部份，他說四人幫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革命典範，又由於成為毛澤東是一個禁忌，大家都覺得自己可以「成為江姐」，於是，四人幫的突然倒台就引爆了一連串懷疑：

由此我們就開始理解毛澤東的東西是否合理。以前不會挑戰的我們開始會挑戰，之後會覺得人民公社有問題。之前我們覺得是沒經驗的實驗，過龍了也會接受；之前我們知道有很多人餓死了，但我們覺得是自然災害。但後來，我們覺得無法解釋——那根本就是毛澤東一個人搞出來的東西。毛澤東形象破滅，不再是革命舵手、革命導師。我們有了疑惑。⁹¹（黑體為筆者所加）

楊寶熙和房遠華提到的「想不通」和「疑惑」，正顯示了國粹派緊跟中共背後並不只是因為對中國的發展感到同情（「中國還是很弱」）或自我贖罪（「覺得自己是小資」）等情感——這些部份之所以水到渠成，也在於這些部份被組織作為「肉身」及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理念作為「骨架」所承載與支撐。而四人幫垮台之所以會發骨牌效應，首先在於擊潰了國粹派的「骨架」——四人幫、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文革、革命……一系列曾經投注過的信仰都兵敗如山倒——理念上的骨牌式地產生的疑惑也就癱瘓了肉身（組織）。而肉身礙於自身先天的不靈活的屬性，也無法再有動力去重構骨架（思想與理念），於是國粹派就潰散了。根據房遠華和楊寶熙的說法，這個從懷疑到完全潰散的過程，持續了至少兩年。⁹²

⁸⁸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⁸⁹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

⁹⁰ 楊寶熙，〈一個七十年代國粹派的自白〉，《走過火紅的傘下銀髮》（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15），頁40。

⁹¹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年5月21日。

⁹² 楊寶熙，私人訪問，2019年5月15日；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年5月21日。

10-4-2 左派憂鬱？左派罷工？左派反思？

這種潰散是否是布朗所說的「左派憂鬱」？我認為，這種潰散的確具備一些左派憂鬱的特性，譬如一些國粹派從此離開政治，國粹派在總體上也展現出政治行動上的癱瘓。但是，在國粹派自身形體俱滅之時，小部份成員其實也在對舊有路線的重新反思及批判之上另闢蹊徑。所以，國粹派的潰散，部份也是出於有意識的路線調整和對舊有路線的罷工。以下引用古兆申的《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的一段話來做解釋——儘管古兆申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國粹派，而是屬於《盤古》的自發毛派，但他提到的當時思想上的衝擊和之後的變化，其實也和部份國粹派相似。他說：

到了後期，也是時代的影響，周恩來逝世，四人幫倒台對我們的衝擊很大，但是現在回看，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因為我們始終不是生活在中國大陸，中國歷史的實踐最大幅員畢竟在大陸，其次在台灣，第三才是香港，香港始終是個很小的地方。我們的好處是由點隔岸觀火的性質，火光映過來時我們也會覺得熱，但畢竟隔著河、隔著海，還有呼吸、冷靜的空間；壞處則是我們看不清楚，特別是知識份子很多時候理論先行。我們否定或肯定文革時，都可能從理論層次多於實際層次去思考，所以保釣運動使我們對文革的看法有所轉變，從否定變成肯定。但無論肯定與否，我們在香港這失控裡實際上是從歷年層面去理解它，而實際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現象，我們不是身受，所以會通過理念或意識形態本身的思考去批判它或肯定它、將它合理化，兩種情況都有。當我們比較右傾時，從較抽象的角度去批判、否定它；我們比較左傾時，從理想、理論層面去肯定它，將它放在長遠、理想的高度將它合理化。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的結束，毛澤東、周恩來的逝世，令我們比較能都回到客觀現實的複雜性中，雖然我們無法實際考察，因為已經過去了，大部份的實踐都過去了，但我們至少可以通過別人的回憶、反省……那時我們也有機會回去接觸真實的人物，聽他們的心聲，於是我們可以檢討前一階段的思考，在這段落潮時間能冷靜反省。當時我們的熱力還在，始終覺得在那階段、那所謂「火紅的年代」是走偏了，有點偏離了我們辦這些活動、刊物的初衷，甚至是在相當程度上偏離了。因為我們歸根究底關切的是文化、藝術，但在若干階段則集中在政治上，所以後來產生了《文美》、《文學與美術》，作為過渡的產物，本身有前人的足

跡遺留，但那不是簡單的重複，實際上那視野在某程度上是擴闊了。⁹³（黑體為筆者所加）

和國粹派的潰散一樣，《盤古》在 1978 年就宣告結束了——雖然這也是組織潰散的一種，但不代表古兆申從此停止行動。四人幫倒台後，他反省了自身在火紅年代中有過度美化中共的問題，及後重拾耕耘文學與美學的討論，創辦了《文學與美術》、《文美月刊》等刊物。

儘管不是所有國粹派或左派在此以後依然敢於面對政治，或能尋找出一條新的政治路線，但這段歷史經驗依然以不同的方式在各人身上留下痕跡。對房遠華來說，四人幫倒台雖然讓他不再相信社會主義，不再相信人可以徹底大公無私，但他依然相信樸素、相信為人民服務、甚至也表示毛澤東思想中的一些概念成為自己日後思想的基礎。他說：

我們〔在四人幫倒台後〕各自很消沉。覺得自己很幼稚很麻木。但不是所有人都会覺得自己是完全浪費時間、沒有意義，因為我們目標純潔、手段沒什麼骯髒、服務低下層。我們學會了批判思想。我們麻木相信共產黨的一套，但學會了批判：矛盾論、實踐論還是可以用的。很多毛澤東的說法或許是普遍真理，內因決定是根本的，是不自覺到現在也是這樣想的。然後矛盾也有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也很適合分析很多東西，這些會成為思想的基礎。還有辯證法、否定之否定，這些都是受用不盡的，不自覺都會用到的。⁹⁴

話說，後來房遠華被一個左派師姐招募去辦學，大家雖然沒有了往日革命意識、不再火紅，但也不屑於往上爬，而是選擇把一生貢獻於教育事業中。這表面上遠離了政治，但也可以理解成是昔日國粹派的政治理念在日後生活實踐之中的滲透，或許也是政治的一種吧？

另一邊廂，楊寶熙在《走過火紅的傘下銀髮》一書中說：

⁹³ 古兆申，〈現實的回歸〉，收入盧瑋鑾、熊志琴編，《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2010），頁 150-51。

⁹⁴ 房遠華，私人訪問，2019 年 5 月 21 日。

我們經常自嘲是喝四人幫奶水長大的，所以四人幫的下台，確實令大部份的國粹派崩潰，因為失去了一直信奉的精神支柱……唯有對政治採取冷漠，不聞不問，但同時亦由於一直以來深信四人幫的宣傳，令我至今依然堅持著「艱苦奮鬥」和「為人民服務」這兩個信條。⁹⁵

雖然在表面上，她於國粹派崩潰後已經遠離政治，埋首教育事業，甚至認為自己是在「逃避政治」、「埋首教學、社區環保、有機耕種、佛學禪修」。⁹⁶然而，儘管在她自認為不聞不問政治的時候，依然相信「艱苦奮鬥」和「為人民服務」。

這種國粹派的潰散是布朗所說的左派憂鬱嗎？還是布朗會認為楊寶熙已經從負面的憂鬱過度到健康的哀悼？那依然相信及實踐「為人民服務」是哀悼還是憂鬱？在香港這個輕視農業的社會做有機耕種，如果是一種對過往政治的反思及劃出界線的健康的哀悼表現，但她出於「逃避政治」去做有機耕作，過程中又是否有癱瘓的症狀？從楊寶熙的例子中看來，首先，憂鬱和哀悼兩種情感／精神狀態如果分屬兩個不一樣的結構，其症狀和表現也可能是相似的；症狀與結構並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地對應，而可以幻化出不同的樣態——同樣的行動或症狀可以既包含著憂鬱的成分，也包含著哀悼的成分。歸根究底，從憂鬱到哀悼的過渡雖然在概念上可以做出明確劃分，但在肉身所經歷的一生中，兩個結構之間的過渡和轉換是曖昧反覆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就是說，這個肉身從憂鬱到哀悼的過渡，很多時候無法被兩個乾淨的概念所完全工整地分類及完全地解釋。

回過頭來看，對左派的情感斷診，或許也需要這種曖昧性——也就是看到左派憂鬱者與逝去之理想、政權、路線、年代無法避免的糾纏，或許能激發出當中的能動性吧。如同楊寶熙自己引用了佛家的「空性」來總結自己離開國粹派後的轉變，她的頓悟是：「天上的雲、地上的花、甚或各個極權者，都是『我』的一部份」⁹⁷——楊寶熙後續的能動性，也是建立在她要對過往的憂鬱的完全接納之上，包括接受自己與中共、與四人幫、與極權、與土地及與人民的糾纏。說到底，經歷過這一切的人，有可能與其曾經所愛但逝去之物割捨，然後順理成章地告別那些使其癱瘓的部份嗎？這個過程可能是單向

⁹⁵ 楊寶熙，〈一個七十年代國粹派的自白〉，頁 40。

⁹⁶ 楊寶熙，《走過火紅的傘下銀髮》（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15），封面內頁。

⁹⁷ 楊寶熙，〈一個七十年代國粹派的自白〉，頁 53。

的嗎？我認為，這不只是不可能的，也可能是砍斷了其能動性的來源。要求對左派憂鬱斷診要存有曖昧性，為的就是保留這些內部的翻轉之泉源。

10-5 小結

儘管其他派別必然沒有因為文革結束而出現像國粹派般激烈的潰散反應，但在此以後，之前反對國粹派、毛派的其他派別的也意識到自己過往的工作是「依附『毛派』的泛政治而存在」而需要重新自己調整工作方向，⁹⁸同時，他們也如同國粹派般都在反覆思考文革結束的意味，以及在琢磨香港抗爭在中國巨變中的位置——火紅年代的火熱也就慢慢退去了。就如同 1978 年出版的《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中所說：「七六年國內發生的『四人幫事件』對『國粹派』衝擊甚大，他們在組織上及聲勢上收到的削弱令他們在近年顯得沈默無聲，而作為依附『國粹派』而存在的『民主自由派』亦跟著退隱，學界現時出現一付異常沉寂的氣氛。」社會運動路線已被拋棄——火紅年代作為一個大的運動週期隨著文革的結束步入尾聲……

儘管國粹派的潰散的確讓出了不少位置，讓運動圈此後多了有關「本土」的討論，而 1978 年和 1979 年的金禧事件和艇戶事件也似乎是火紅年代的短暫復甦——但事實上是，對本土問題的討論並沒有吸引學生大量地參與社會運動；1977 到 1978 年學界的討論已經是「學運」應放在什麼地位，可見學運遭遇了存在危機；1978 到 1979 年的金禧事件和艇戶事件也不過是「迴光返照」⁹⁹。

在火紅年代過後，最大宗的現象其實是去政治化的本土化和個人化。作為「民主自由派」的陳莊勤甚至在 1978 年說：學生運動以至於社會運動都被認為是「沒有新意」，當中的紛爭也「惹起了沈默的大多數的反感」，港大的學生也從昔日的火紅轉向追求婚姻、事業、愛情、人生、宗教、宿舍精神等等¹⁰⁰；而在 1979 年的中大，也出現了社運世代的斷層，舊有的火紅年代積極份子丟棄了新生一代的積極學社，《CU 仔去死吧！》大字報，這是火紅年代末期的最後的吶喊：

⁹⁸ 陳莊勤，〈我看這三年的學生會〉，頁 228。

⁹⁹ 周魯逸，〈香港學生運動與意識形態〉，頁 283。

¹⁰⁰ 陳莊勤，〈我看這三年的學生會〉，頁 226。

曾經在荒原中奔馳那案的老鬼，現在是一座座動也不動的石佛，喃無阿彌陀佛！

誰也無法懂他們一根皮毛，雖然他們有著無窮的能力，但這一切也似乎停留在 potential energy，永遠也不能變成 kinetic energy，推動社會的發展。

除了聲色犬馬、吃喝玩樂、鴛鴦加蝴蝶以外，一切都是冷漠、空白、死寂——中越戰爭也能引起一絲的關注，但哈囉〔Halloween〕夜歸人更值得操心。

完了！兮！CU 仔，完了！¹⁰¹

火紅年代的消逝，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歸咎成是之前濃厚的國族主義隨著國粹派的政治失落而消逝，連同附帶著國族主義的一系列（左翼）政治論述也沒有了市場。但這是否代表國族主義是個「好東西」，沒了它就沒有了政治激進性呢？我認為各派對此也有很不一樣的分析——後續的左翼政治道路該和國族主義保持著怎樣的距離，皆是各派在沉思的問題。

在這個情況下，譬如自發毛派的周魯逸就有加入八〇年代民主回歸論的討論；托派則繼續探索反對中國社會主義官僚主義的革命道路並介入中國民主運動（吳仲賢最後於 1981 年於大陸組織民運時被捕並「投降」，背上了背叛革命的罵名）；《盤古》中的古兆申則選擇回到一開始所關切的文化和藝術討論；社會派則判斷香港社會進入末期了資本主義時期，對左翼的文化分析及後馬克思主義發展出興趣，創辦了《文化新潮》；無政府主義派也有一定的「文化轉向」，八〇年代的民眾劇場及黑鳥樂隊就為其中一例，但其政治性不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歷了火紅年代的洗禮以後，《70》的成長尤其明顯。在 1978 年 7 月，《70》曾短期復刊，封面上被淋上紅漆的英女皇像圖片也顯示他們沒有放棄抗爭性。

¹⁰¹ 陳偉傑，余奇里，〈Cu 仔去死吧〉，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9〕），頁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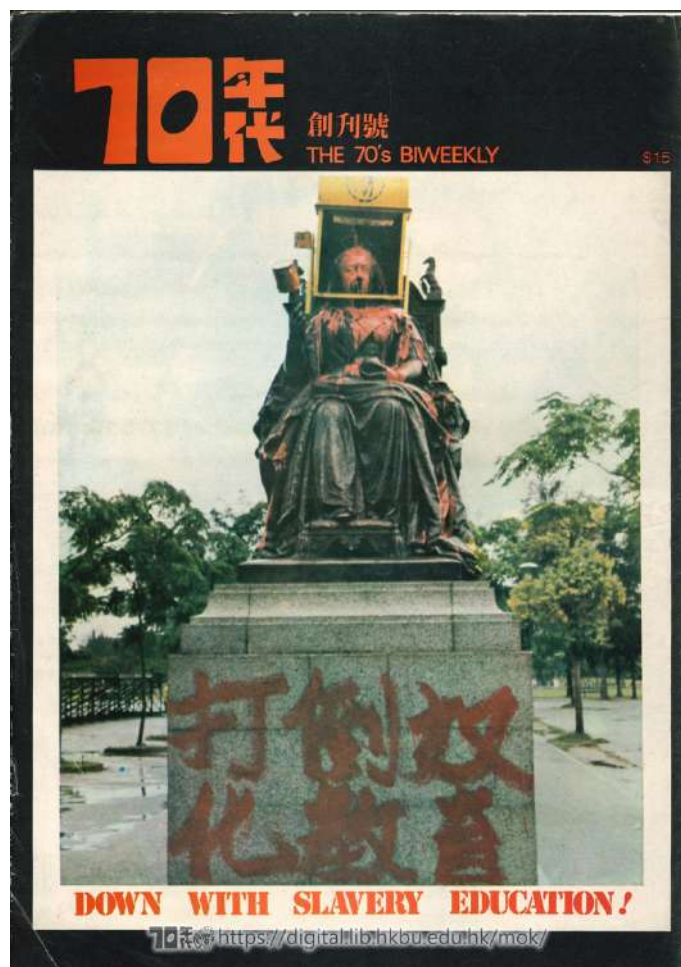


圖 21：1978 年《七〇年代雙週刊》復刊創刊號封面

在創刊辭中，《70》提到了要反映「世界各地的社會革命和反權威運動」、批判「亞非拉的所謂民族獨立運動」。¹⁰²可見他們對國族主義的批判更為徹底，也少了此前理論混亂的問題。延續著《70》而生的《民眾報》，也更明確地提到了他們對「國族主義」的反思，〈香港人、中國人、人〉一文說道：

那我們是否應該重提國族主義呢？不！我們向來都不是國族主義者，而事實上七〇年代初期的青年學生運動中出現的國族主義正好把可能成為真正的更深入的革命引進中英外交的死胡同裏；只是我們實在討厭那些自以為了不起而實際上被擺佈如棋子的「香港人」，他們低視、甚至賤視大陸同胞，又卑躬曲膝討殖民政府的可憐，短視而又功利主義抱著 1997 年中國不要收回香港的念頭。

¹⁰² 70 年代雙週刊，〈為什麼我們要復刊〉，《70 年代雙週刊》創刊號（1978），頁 2。

我們的不是中國人或香港人的身份，而是人的身份，即使不要被這個或那個政權玩弄於掌上，我們要決定自己每一天的生活。¹⁰³（黑體為筆者所加）

雖然，《70》的這種政治化的論調在失去火紅年代的運動風氣推動之下，其實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之後，都是少數中的少數。但這也是香港左翼政治中重要的一頁：香港作為第三世界一員的反殖及解殖計畫能否不是訴諸國族主義與立國？此乃《70》以肉身經歷了火紅年代後的反思。

雖然火紅年代是消逝了，但它是否就此結束、要被蓋棺論定，我又認為不必如此。本論文的初衷之一，就是要去激活一段被認為是死掉的歷史，把盤旋於香港上空的幽靈號召出來，但如何讓此幽靈重新具備適合當下的骨架和肉身，卻是論文以外要做的事，而這也最後關乎到我們要怎麼擺放自身和火紅年代的關係、並打算怎樣去理解及承傳這些火種。有些人或許會選擇了革命的火苗，想要開天闢地，打造一個社會主義新世界；又或許是會選擇了反革命的部份——就算是曾為國粹派革命份子，今為政商名人的火紅年代份子也沒有完全丟棄火紅年代，而認為自己從商或做官，也只是為了繼續潛伏，等待被中共召喚的一天。這革命與反革命的真假，也只有自己知曉。

但對於歷史本身，我也只能止步於此。這篇論文或許有許多不平整部份和曖昧的尾巴，但我認為，這才是一個可以開啟可能性的敘事。

¹⁰³ 大舊熊，〈香港人、中國人、人〉，《民眾報》10期（1981），頁1。

十一、結論

本論文的問題意識循著「火紅年代」與「香港七〇年代」神話之間的矛盾和張力，以火紅年代這段「失敗者」的歷史作為突破點，試圖複雜化從「七〇年代神話」而來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尤其是貫穿於火紅年代討論的「中國問題」，除了關乎身份認同，有些時候甚至折射出超越國族身份認同的政治範圍，而應該被理解為左翼政治的一部分。

延續著此問題意識，本論文的研究問題如下。第一，火紅年代是如何爆發的？第二，火紅年代青年的思想、組織與情感是如何在運動發展之中演變的？這和此前的歷史及運動經驗有什麼關係？有怎樣的承傳和斷裂？這傳承和斷裂在社會運動發展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和副作用？第三，在火紅年代的運動發展中，青年為何及如何構想「香港」的未來及與「中國」的關係——也就是「中國問題」的討論？我也要回答的是，這些構想除了與身份認同有關，又關乎怎樣的左翼政治想像？這些香港左翼政治在對照西方新左翼歷史時，該被怎麼理解？

為了回應以上問題意識及研究問題，本論文的研究框架用了歷史化的方法去書寫火紅年代從 1967 到 1976 年的史前史及發展。這個時間涵蓋了火紅年代從萌芽、爆發到轉入低潮的一個完整的社會運動週期。本論文除了從情感、思想與組織的面向去書寫這段歷史，也拉入了文革作為參照，使得火紅年代不但可以被看作西方新左翼在香港的延伸，也說明了其和文革之間的關係。

以下，我將會分兩個部分總結這篇論文。在第一節，我將跟隨著章節安排，總結論文如何透過跟蹤火紅年代各派的情感、思想與組織，回答上述三個研究問題。在第二節，我則會指出國族身份認同政治，是如何鑲嵌在火紅年代各派的左翼政治中，從而總結作為一段「香港（新）左翼史」的火紅年代歷史。在第三節，我將提到本研究的侷限，特別是我如何、為何回答不了某些問題。最後，我也希望提及對未來研究的一些期許：這些期許並非與本研究直接相關，卻又來自本研究，且指向了不一樣的方向，我把這些對於開啟未來相關研究有幫助的資料——包括田野筆記、訪談及講座節錄等——放在附錄。

11-1 火紅年代的思想、組織與情感

11-1-1 關於火紅年代的爆發與演變

本論文在章節安排上以時序順序為主，並以思想、情感、組織作為切入點，去分析火紅年代中的一些關鍵事件。不過，章節與章節之間討論到的事件彼此或有所重疊，導致時序上有一點跳躍。此外，每一章中對思想、情感及組織的討論的份量，不是工整地對等的：有一些章節有較多情感的討論，有一些章節會較多思想或情感的討論。以下，我會以章節中關於火紅年代的思想、情感、組織為軸線，總結各章節的重點。

第一章，我首先提到從戰後到火紅年代前，左派與右派如何割據香港的政治版圖。我一開始就對左派、左翼等詞提出明確定義，避免閱讀上的誤會。我討論了左右組織背後的政治思想、對港策略和方針等，如何與港英政府共構了一個民間不大會出現政治反抗的「超穩定結構」的社會。從整個論文出發，我之所以要在第一章提到左右割據的政治局面，是為了鋪墊之後火紅年代的爆發的重要性——如何打破了此前左右二元的政治局面。我在這一章的處理上不對等地突出了右派的情感，特別是「花果凋零論」，這是為了鋪墊第四章關於包奕明把毛澤東思想和「花果凋零論」相融的嘗試，以解釋毛派思想何以在後六七的恐左氣氛下發芽。這一章對左派在組織上的突出，則是作為第二章、第三章關於六七暴動的部分之鋪墊。

第二章，我寫到 1967 年的六七暴動。雖然六七暴動是由傳統左派發動的，是屬於前一個政治局面下的產物，一般不被歸類在火紅年代之中。但是，在論文結構上加入六七暴動的討論，是希望顯示出火紅年代和六七暴動之間一些辯證地傳承的關係，也為貫穿全論文的文化參照提供基礎。比較特別的是，我把六七暴動當作文革造反派的歷史來處理，說明了六七抗爭中許多關節點如何和中國文革中的造反派得勢有關，這種寫法是六七暴動研究上的創新——這一方面可以細緻化什麼叫作「六七作為文革的延續」；另一方面，由於過往相關研究無論是從下而上還是從上而下的角度，都過於把「上」、「下」描述成是無縫銜接的，並過多地預設六七暴動及文革皆以中共中央為穩定核心；本論文這種拉進造反派的書寫方法就可以鬆動這個大前提，使六七暴動歷史可以被當作屬下集團的歷史（subaltern history）。這一章我比較少談論六七暴動的思想部分，比較多偏重左派的情感起伏及組織樣態，是為了凸顯情感及組織上的突破是左派的非常態，但也是構成六七暴動爆發及升溫成暴力事件的關鍵。這突破也是受到內地文革造反派的鼓動所致，

但當中被鼓動的主張以武力推翻殖民地的新生本地極左派，很快就受到內部（港共）和外部（港英政府）聯手壓制，最後又溶回本地傳統左派之中。

接續著第二章，第三章要去寫後六七暴動的社會及學界中，比較負面的反應是怎麼出現的。這一方面與六七暴動期間的遍地「菠蘿陣」有關——土製炸彈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如此直接，會引起社會反彈是意料之中。然而，當中幾乎一面倒的負面評價，其實又和第一章提到的左派在組織上儼如於香港自成一國有關；也就是說，左派無法團結非左派的大眾，而六七暴動中的極左派，更是與其他非左派青年之間完全斷裂。殖民政府這時「趁虛而入」，以仔細的媒體策略控制了輿論的大風向，逐漸用「繁榮穩定論」來打擊左派的暴動。在大學內，由於學生自命有知識分子的責任，他們在緊跟「繁榮穩定論」去譴責左派的同時，也藉著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發展，而開始想要回應及探討六七暴動所暴露的社會問題並為此開出藥方。他們的方法就是搞起第一波中文運動：透過爭取中文成為官方除英文以外的法定語文。這些大學生在回應社會問題時，希望以改良的路線取代及反擊左派所提出的反殖革命路線。跳脫於傳統左派和右派把控的火紅年代，也就此在六七暴動後開啟了。

然而，在後六七之後兩年，也就是 1968 到 1969 年期間，包括第一波中運在內的許多社會運動（包括學生運動）的嘗試是失敗的。這是因為社會的恐政治、恐左氣氛，都使得任何的運動份子會被扣上帽子。這些帽子有時候是社會於「繁榮穩定論」的催眠下一種反射式的回應，有時候則是比較有意的打壓（特別是第五章提到的珠海事件）。而在第二章在討論到第一波中運的爆發時候，我是比較側重在寫學生的思想，特別是他們是怎麼去積極思考要回應殖民地的社會問題但同時又要和反殖的左派暴動劃清界線；最後，在寫關於扣帽子的部分，我比較突出寫運動創傷的情感，以描繪當時一種壓抑的、讓人意興闌珊的運動低潮的總氣氛。這也才可以解釋從 1967 到 1970 年間為何並沒有發展出有規模的社會運動行動。

1967 到 1970 年社會運動的火苗，總是被快速點燃卻被快手以扣帽子的方式壓抑。我們不應只看到運動被壓抑的部分，也應該探究這些火苗得以不停冒竄的原因。因此，在第四及第五章，我著重探討《盤古》和《70 年代雙週刊》（下稱《70》）兩本刊物對激勵社會運動的作用。我特地在這兩章用了類似的標題，並且在內文進行了兩者的比較，呈現兩者如何是同一時代長出的「異卵雙胞胎」，這也是本論文的另一個創新。這兩本刊物對火紅年代得以萌芽可說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方面，它們給予青年們很多思想資源

——有來自毛澤東思想的、西方新左翼的、西方激進主義的、第三世界反殖思潮的、台灣自由主義的等等。「社會運動」以至於「革命」的概念，才因此進入火紅年代青年的視野，被理解為回應社會現實的出路，並取代了六〇年代的文社運動，進而開啟了火紅年代社會運動。另一方面，除了思想啟發，這些刊物也凝聚了一群忠實讀者，形成了一個文化場景，而這也將成為火紅年代社會運動場景的輪廓。

第四章主要探討《盤古》。我並沒有深入討論《盤古》組織的內部運作，而比較多去寫《盤古》思想性的一面，很大原因是相關討論其實已經被討論過了（譬如《香港文化眾聲道》叢書），而且《盤古》自己的定位也是一本思想性刊物。而在這一章，我特別論及包奕明這個人對《盤古》的影響，並把他歸類為自發毛派。我理解，香港甚少有關於毛派的研究，但有很多關於左派的研究。那是因為，左派這個派系分類其實經常遮蔽和取代了毛派這個分類。不過，左派經常被過度強調其與中共的組織聯繫，以至於對香港左派的思想研究只集中於對上層和官方論述，因為下層經常會被簡單化約為「奉上層之令行事而已」。我特別花了很多篇幅去分析包奕明，就是想指出有一種「左派」是「自發」而不是被「命令」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在論文中稱這些人為「自發毛派」。透過介紹包奕明的生平及其寫作中的思想，我們不只看到為何包奕明何以成功在本來是反共的《盤古》雜誌中介紹毛澤東，並且把毛澤東思想和「花果凋零」的右派情感進行順暢的結合，使毛澤東思想有了在地性，這些都是其「自發性」的表現；我們也可以在這一章看到毛澤東思想傳播到香港的另類途徑——包奕明從台灣自由主義知識界出道，然後在美國受到黑人民權運動中的毛澤東思想影響，進而成為毛派並提出「回歸論」。發軔於自發毛派的保釣會，也因此迂迴地繼承了不一樣的「毛澤東思想」，跳過了本地傳統左派的限縮，並發動了六七暴動後的第一場遊行（也就是第六章提到的第一次保釣示威）。

我在第五章討論到《70》時，則是反過來比較少分析他們的思想，反而稱他們初期為「沒有主義」，並著重於分析他們的組織文化。這是因為《70》（特別是初期）內含的思想是發散的，內部唯一的共同性就是行動導向、自發主義——也就是「戰鬥格」。在這一章，我比較多討論他們的編輯邏輯，以及其組織模式、情感是怎樣被培養出來的，而這又是為了回應怎樣的社會大環境。及後，從歐洲回來的《70》成員後來從《70》分裂出去，不完全因為他們的托派思想轉向不容於《70》的無政府主義傾向，而是在於他們對於自發主義的組織有了反省，鬆動了此前《70》聚首的大前提；並且，托派用隱瞞的方法去策劃自身的政治議程，傷害了《70》內部情感。值得一提的是，托派的出走也激發

了《70》的內部討論，是《70》從「沒有主義」變得更具無政府主義思想色彩的關鍵之一。而托派及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部分，我在第八、第九章也有深入討論——尤其是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也被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所影響，所以留待第九章專論。

第六和第七章寫的是保釣運動。從第六章開始，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保釣運動的起源除了有來自台灣和美國保釣運動的影響，也有本地因素。中運在此前已開始打破後六七的政治難局，此外，保釣運動的三大火車頭——學聯、保釣會和《70》——當中，《70》和保釣會都和此前的出版有關（譬如《盤古》的包奕明是保釣會的幕後軍師）。因此，保釣運動可以看成上兩章提到的《70》的反殖「戰鬥格」和《盤古》的包奕明「回歸論」，在運動實作上的一爭高下：《70》主張反殖路線，想藉回應保釣運動中的警察暴力去探討殖民壓迫；保釣會則主張統一運動路線，想藉保釣運動中的國族主義去激發關於香港未來如何與中國發展齊頭並進的路線探討。這一章中我花了較多篇幅去描繪保釣運動中各組織間的串聯、本地組織和海外組織的串聯等。這也是為了讓本地保釣運動和海外保釣運動可以形成有效的參照條件。

第七章延續第六章的討論，特別提到統運路線和反殖路線之間的關係和背後的思想、理路。其實，進入保釣後期，無論香港還是美國的參與者，都有感保釣難以成功，那麼運動要向何處去呢？而在基辛格訪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等國際事件的推波助瀾下，統運路線開始成為大宗。儘管我們看到不少年輕人都曾試圖把反殖路線與統運路線融合，然而在1973年反貪污運動中，我們終於看到兩條路線之間的矛盾爆發成水火不容的狀態。當中的關鍵在於本地學生會和傳統本地左派因著回國觀光團而取得聯絡後，就被收束到本地傳統左派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中共對港方針之中，變成了「不行動」的國粹派，主張不參與反貪污運動的抗爭。於是，在內部，曾經既鼓勵行動又鼓勵統一運動路線的保釣會自發毛派，被這新興的國粹派所偏擺；在外部，國粹派不行動的特質導致了社會派自立派別與之分庭抗禮。從此以後，火紅年代的主要派別——社會派、國粹派、無政府主義派和托派——就出現了。

由此可見，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爆發之緣由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在西方，戰後一代沒有經歷過大規模戰爭和逃亡，也不把「委屈自己」、「忍耐」當作必須，於是求變之心激發了西方六〇年代的激進主義運動——而這些運動中的思潮被《盤古》和《70》等刊物介紹到香港。而在香港，這些思潮同樣吻合本地情況：火紅年代青年沒有經歷戰爭與逃亡、也沒有難民包袱，再加上土生土長一代香港人在社運行動中無法被港英政府用

遞解出境的手法鎮壓，就更有條件做激進化的社運行動。因為本地條件的允許，西方六〇年代的新左翼激進主義才成為思想資源，點燃本地社會意識的激進化。此外，中國之於香港如近水樓台，香港對大陸政治的轉變尤其敏感。1967年六七暴動就是文革初期在香港的延續，而暴動又以間接方式點燃了青年人的社會意識。那麼，在保釣運動中，反殖路線和統一路線也延續著六七暴動以後的社會意識，青年對本地的發展及國族身份認同的探討意欲變得強烈。此時，毛澤東思想中關於國族主義、反帝國主義的理念，以及群眾路線的實作性，因此直接地（透過本地左派）或間接地（透過黑人民權運動）影響了火紅年代，催生出自發毛派和國粹派。總之，這些來自西方、中國大陸的外部影響及香港內部的驅動，造就了被冷戰與殖民雙重壓制下香港一道奇特而亮麗的風景——火紅年代青年短暫地衝開了冷戰下「左右割據」的「超穩定結構」、拋開了呂大樂所說的「殖民冷經驗」、繞過了自身向上流動的誘惑、對抗了殖民主義的強權，並為本地方方面的改革打開了前所未見的空間——也就是火紅年代爆發的模樣。

在第七章最後，我特別加上了在保釣運動和反貪污運動兩場運動後對「死流」的討論，這一方面捕捉了火紅年代從激烈走入僵化及困頓的情感轉向，另一方面也試圖用此情感轉向去解釋此後火紅年代的發展——如果說，1968-1970年是火紅年代的醞釀期，1970-1973年是火紅年代的爆發期及高潮期，其實1974年後就已經是僵化期了——「死流」討論似乎預告了這僵化期的開始，也為後面一章1974年反加價運動的失敗做了鋪墊。

在第八章，我聚焦於托派自《70》分裂以後的組織狀態，並且凸顯他們在1974年反加價行動上和無政府主義派在組織與思想上的差別。我特別關注的是「毛托之爭」，分析作為毛派或左派的石中英在批評托派背後的一連串思想根據，包括：外交政策變成愛國反霸、中國對港方針、托派自身比較多公開材料，也有剛才提到的他作為六七暴動中極左派的「左派憂鬱」經驗。這章的最後，落腳於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及犬儒文化對社會運動及社會的影響。當時，港英殖民政府已經意識到要為後續回歸做準備，並想從中獲得最大利益，於是積極改善其治理，與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競爭，希望透過懷柔政策培育市民自豪感（civic pride）以贏得人心支持，同時對運動以更「聰明」的手段進行打壓。由此我們可以看到，1974年後社會運動進入僵化期，實際上是多方原因互相借力對運動造成的壓抑結果，實難歸咎於任何一方的責任而已。

第九章圍繞著「中國向何處去」中關於「中國問題」的討論。由於運動進入僵化期，許多運動上的討論又回到了刊物上。這一章比較工整地處理了無政府主義派、托派、社

會派及逃港紅衛兵的思想；我特別探討了不同的逃港紅衛兵如何帶來了不同時期的文革造反派思潮，深刻地影響了無政府主義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我特別著重於分析社會派、托派、無政府主義派、和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對於中國和香港的關係的看法，較少講組織和情感（這部份我在其他章節已經有所涉及）。此外，我也加入了關於《黃河》和《北斗》兩本雜誌的討論，以顯示造反派逃港紅衛兵思潮是在怎樣的大環境脈絡下褪掉原先的極左翼色彩——這裡有大陸造反派思潮自身轉向的因素，也有來自海外華人所組成的中華人權協會及來自台灣親國民黨右派的影響。

在第十章，我專門用一章的篇幅處理國粹派的組織與情感。這是因為我們在第七、八章已基本認識了國粹派的思想、理念、論述、情感，但對於他們的組織則比較少涉及。這裡補上關於國粹派組織的討論，是為了更充分地解釋國粹派為何會在四人幫倒台及文革結束下崩潰。面對四人幫倒台，國粹派為何沒有被四人幫的黑材料說服？反而擴散到懷疑文革、懷疑毛澤東、甚至懷疑毛澤東思想及社會主義？除了涉及到文革結束所帶來的情感及思想困惑以外，也涉及到組織因素：國粹派內部組織的中斷，導致思想與情感無法被疏導，才使得國粹派內部在思想上發生骨牌式的塌陷，最終導致國粹派的潰散。事實上，如果不理解國粹派的組織和情感面向，就無法完全解釋其潰散。

隨著文革落幕、四人幫倒台，不只是國粹派潰散，火紅年代也步入尾聲。香港社會運動也將終於完成一個週期。不論是六七暴動中本地傳統左派及由此而生的極左派，還是之後出現的無政府主義派、托派、逃港紅衛兵、國粹派和社會派，都被中國大陸政治局勢的變化——特別是文革的起起落落——而帶動，這些帶動滲透在各派行動背後的思想、情感與組織。這樣說來，不只是六七暴動，整個火紅年代的一大部分也可以被鬆散地理解為文革的延伸。

論文不同章節對情感、組織與思想的側重雖然不一樣，對不同面向的側重卻有一定的邏輯。各章不同的面向側重，首先是為去鋪墊及解釋火紅年代的起承轉合。此外，在情感上，我主要著重去提及國族主義的情感、運動中的負面情感、以及兩者之間的連結。這除了是為了鋪墊火紅年代運動風潮的發展及起落，特別是解釋他們的行動傾向及節奏外，對各派負面情感與國族主義情感之間關係的凸顯是為了呈現國族主義與左翼政治的拉扯如何把青年放置在一個情感的「難局」（*impasse*）。譬如，當身處於殖民地下的身體感是指向反資反殖、但心中歸屬的社會主義中國卻不允許他們做公開抗爭時，該何去何從？這是六七暴動中極左派、保釣後「反潮流地引退」的自發毛派、受組織規訓的國粹

派、被國粹派抨擊但依然具備國族主義情懷的社會派和托派都有的共同感受。但是，他們確實用了不同的思想與組織去安放情感上的難局與拉扯。國粹派就將此理解成「潛伏為革命」的必經之路去下嚥眼前的難局，並自責自己的不安感為「小資產階級特性」；托派則選擇積極反思自身及對外戰鬥，甚至在過程中摒棄了此前自發主義的組織模式。

在組織上，我更多注重從兩方面去勾勒不同火紅年代派別中的組織成員的背景脈絡和他們的組織偏好，這是為了以下的敘事效果：（一）以組織成員的背景為線索，勾勒組織的特性，以解釋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合作契機或敵對原因；（二）討論各派的成員個體所感知到的歷史如何影響到他們的組織偏好，這組織偏好又如何承載了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想像和情感，並影響他們的（不）行動傾向。譬如，關於組織的公開度，我們可以看到自發毛派在下徑口村採取半公開聚落的形式，是來自於包奕明被右派狙擊的陰影，而這又勾起他曾經被國民黨白色恐怖折磨的慘痛歷史；相似地，國粹派的地下黨組織模式，除了理性上可以解釋成為了契合中共的治港方針，此「理性」也因為傳承了左派面對殖民政府打壓的經驗與記憶，才得以發生。相反，《70》則一開始就選擇中門大開、廣納各方運動俠客的形式，這一方面延續了本地文社運動的開放性及西方激進思潮中「自由大學」的公開性質，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沒有白色恐怖或殖民打壓的記憶，所以才有完整的「戰鬥格」，甚至在保釣示威中面對警察打人會被激發鬥志。

在思想上，我則著重在各派對於「中國問題」的討論。縱觀論文，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針對國際政治的保釣運動，抑或是回應本地殖民治理的中文運動、反貪污運動、反加價運動等，一個永遠無法繞開的議題就是「中國問題」。每個運動似乎都需要論述其與中國的關係才能被證成——儘管在這當中，《70》特別想要繞開國族主義及「中國問題」，但當每個運動都逼問著他們就國族身份認同政治、中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性質及中港關係時，他們在「中國向何處去」的討論中也終於要回應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事實上，當六〇年代亞非拉殖民地都在用獨立建國的方法實行反殖、冷戰下的社會主義陣營提出對帝國主義的批判、特別是第三世界的反殖國族主義被社會主義中國賦予了崇高的左翼激進性時，香港作為第三世界殖民地，在面對殖民壓迫下很容易會對國族政治（特別是面向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族政治）寄予希望。火紅年代青年濃烈的中國國族主義氣氛滲透在每一場社會運動之中，迫使了每一場運動的思考都要回應「是否認同中國」、「為何認同中國」、「如何認同中國」、「中國是什麼」等「中國問題」。關於「中國問題」的思考也成為了我在討論火紅年代各派思考時的一條主要軸線。

11-1-2 火紅年代與此前政治局面的傳承和斷裂

到底火紅年代和此前的政治局面，應該被總結為是斷裂還是傳承呢？儘管我在前言就表示了我認同羅永生對火紅年代的定義，即火紅年代青年對此前的政治局面是有批判的，並試圖實現一定程度的斷裂。然而在論文中，我們卻經常可以看到斷裂不是絕對的，傳承亦然。斷裂和傳承的問題被放置在不同的時間和地理範圍中，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在香港本地的範圍來看，火紅年代的爆發，絕對是和舊有的左右派別的政治局面有很大程度的斷裂——包括國粹派，其早期於保釣中的參與都和本地左派無關（事實上，本地左派對保釣甚為冷淡）。然而，如果拉長時間線來看，自保釣後期開始，左派的確努力地拉攏及收編國粹派；這導致國粹派與此前的政治局面貌似有延續性的模樣，特別是其對「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中共對港方針的接受，結果帶來一種運動的「副作用」——也就是國粹派的「不行動」。然而，如果我們再把時間拉長到 1976 年，國粹派的潰散似乎意味著其和傳統左派之間在組織上的距離，才使之「不受控」地自行解體。同樣，逃港紅衛兵一開始自發的對中共的批判，本來不屬於本地左派或右派範疇，但我們也看到《北斗》如何被右派積極拉攏。冷戰下的左右派統戰力度的延續，也貫穿了整個火紅年代，但這和火紅年代眾人希望自發、突圍、求變的努力並不衝突。

此外，如果我們把火紅年代的爆發放置在更大的時間及地理範圍來看，火紅年代並非特別突出地與更長、更廣的歷史有所斷裂。譬如，火紅年代對西方六〇年代和文革的傳承是顯然易見的——譬如包奕明的毛澤東思想有「花果凋零論」及黑人民權運動的影子、《70》的無政府主義有文革極左造反派的影子、香港托派被法國及中國老托派所影響（雖然年輕一代的托派並不完全緊跟老托派）。然而，這些對六〇年代中西激進思潮的「傳承」，也是要建立在理解「六〇年代」與冷戰有一定的斷裂關係的基礎上。

其實，要論斷是斷裂還是承傳，我們都知道答案一定不是絕對的。思想、情感、組織沒有可能是從石頭中爆出來的，而是要借用各家各派之力度，但自身又持續地演化和創新。但是，本論文作為一種歷史書寫，在寫作時又該怎麼去取捨呢？有別於其他關於火紅年代的書寫比較著重於其開天闢地的、斷裂的（但也曇花一現）的性質，我在論文中總體來說更樂於呈現其與此前的歷史與政治的延續性。歸根結底，這並不是因為我想挖掘在香港作為左派或左翼有什麼完整的根源——雖然從中知道自己作為香港少數的無政府主義左翼不完全是「從石頭中爆出來」、當年的人所留下的資源如何一代代流傳到我

輩身上也是很有趣的事情；但我在寫作上對延續性的強調，更多是因為我不忍心拋下歷史中的左派憂鬱——特別是失敗的運動、失落的政治。

我認為我們需要繼承、承傳的，並不是一個完整的歷史，而是一個不斷被中斷、「支離破碎」、失敗的歷史。事實上，造反派、極左派、自發毛派、國粹派、無政府主義派、托派所信仰過的文革，還有社會派、自發毛派、無政府主義派、托派賴以寄託的西方新左翼歷史，在今天資本主義全球化及新冷戰格局下，不也是支離破碎的嗎？我想要強調的是一種對破碎的歷史、未解的歷史難局的承傳——這也是因為我認為對未來的打造，也必須要讓「最倒退」的人及情緒得以進入，也要充分檢討以上左翼歷史的失敗。

換句話來說，我在把火紅年代當作一段香港左翼歷史來書寫時，並不是出於我認為我們現在有可能照搬、重複他們的思想、情感與組織，並幻想我們會有一個完整的根源可以在現在被輕易地複製或復興。我更希望的是透過講述當年的火紅年代青年如何對他們的歷史有所回應（包括完全丟棄、局部創新、融合新舊、局部傳承、完全傳承等），來給予現在的政治一點可能：我們要的政治出路，會否就蘊含在這「支離破碎」的歷史中？當下的左翼在思考未來時，能否讓這當中的憂鬱被揭開？我們可以如何檢討當中的失敗，使得憂鬱不會再被生產？以上才是我對「延續」的理解。

11-2 作為香港左翼政治史的火紅年代

11-2-1 火紅年代各派對國族主義及相關國族身份認同的討論，關乎的是其左翼政治

在理論層次，我們早就可以推論說身份認同從來都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概念，也因此不可能抽空於現實和歷史中的許多他者——事實上，身份認同作為一個自我命名，總是深陷於被各種權力關係所塑造的符號系統之中，也會在歷史中因著自身的位置變動，與他者發生不一樣的社會關係，而導致內涵上的改變。也就是說，身份認同從來都是「相對的」(relational)。但這篇論文，是想要加入歷史化的角度，脈絡化地指出火紅年代各派的行動與論述中所探討的「香港」的出路、「香港」的未來、「香港人」的責任及理想，那個「相對的」具體是什麼人、什麼政府。而不同派別之所以會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政府，其不同的視野背後是被不同的左翼政治所引導——總之，不同派別對國族身份認同的不同處理手法，都和他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才是正確的社會主義革命」有不同看法，而這些問題意識，又經常可以在各派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中顯現。

本論文一開始想要探究火紅年代各派對國族身份認同的討論，但一路寫下來，我才發現各派對國族身份認同的看法不能被單獨抽出來討論，而必須被放置在更大的脈絡及更大的思想框架中去理解。其實，火紅年代各派對國族身份認同的興趣，並不只是關乎情感／理性上要認同哪一個共同體、要追認怎樣的根——也就是非關「身份認同」的議題本身而已——更多地、同時地其實關乎他們的左翼政治。左翼政治及國族身份認同，在不同派別中也形成了不一樣的關係：時而矛盾、時而兼容、時而互相利用。因此，我們必須對各派的左翼政治有充分的理解，才可以捕捉到國族身份認同在這裡的位置。

首先，在六七暴動前，關於國族身份認同的討論只有左派和右派兩種選擇。左派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要配合其社會主義大計，恰當的愛國／民族主義表現應該像「白蟻」那樣，無聲無息地潛伏於社會領域，隨時被「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應反殖。另一方面，右派認同流亡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面對國民黨政府偏安一隅，在政治上自然有失落感；與此同時，這個政治上的失落也在右派新儒家南來文人的影響下被論述為中華文化的失落——「花果凋零論」。這些南來文人配合國民黨政府的對港方針，努力生成一種文化國族主義，把愛國的表現演繹成弘揚中華文化，以轉化青年的反殖念頭。

然而，由於大陸文革中，造反派短暫瓦解了中共中央的絕對權力，導致香港左派趁勢而起——以反帝、反殖、反英、愛國為名的六七暴動爆發了。這起事件在質問著土生土長的本地年輕人「愛國為何物」、「民族主義情感該如何安放」。這時的青年都陷入一系列的困惑之中：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本身烙印著帝國主義的侵略歷史，那愛國是該反帝反殖嗎？如果反抗了外來殖民政府後，又該想像回歸哪一個中國，自身身份認同該歸屬何方？或者，香港應該訴求獨立，創立一種「香港人」身份認同？訴求獨立會否是對自己的根源的否定？會否是對帝國主義分裂史的無視？甚至正中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下懷？此外，反殖該出於什麼原因？是出於反抗殖民政府對香港的剝削，還是出於愛國？要針對的是殖民政府的治理問題還是主權正當性？抑或兩者皆是？反殖應該訴諸改良手段還是暴力革命手段？改良又會否只是維穩了殖民統治？又由於舊有的割據民間政治局面的左右兩派在六七暴動後訴諸不願反殖的舊貌，對殖民政府感到不滿及對身份認同感到困惑的「無根的一代」有感自己必須尋求另類的出路。

首先提出另類出路的是以包奕明為代表的自發毛派。在第四章我們可以看到，包奕明在「回歸論」中指出，香港作為「海外中國」的一部分其前途是與中國綑綁的，他借此鼓勵年輕人理解中國與台灣、香港分裂的歷史，並思索未來回歸的可能。而當包奕明理

所當然地論述香港與中國為民族共同體時，其實是借用右派的國族主義情感——透過「花果凋零論」，包奕明把後六七年輕人心中所面對的困惑和失落解釋成是沒有真誠地感受內心的民族情感、並於行動及思考上認真地「入世」的結果。自發毛派因此主張香港的「中國人」應該透過自發的「國情研究」介入本地及中國的社會發展，最後主動回歸到一個更尊重群眾及走現代化道路的「中國」中去——言下之意，「中國」也就是社會主義中國。由此可見，在自發毛派心中，國族主義是其左翼政治的大前提，對自發毛派來說，面向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族主義蘊含著天然的反帝、反殖及民主力量，也是符合最大多數群眾的利益。在自發毛派眼中，傾向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族主義及其衍生的身份認同與左翼政治是無縫接軌的，兩者是齊頭並進的關係。此外，此「中國人」身份認同也和在本港進行反殖沒有衝突——畢竟，介入本地的反殖抗爭也是介入「中國」——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是指向「回歸」，本土意識、國族主義與左翼政治就不矛盾。

接著登上火紅年代舞台的是《70》。在第五章，我們看到《70》在面對香港糟糕的政治、社會局面及青年人普遍的困惑時，跟自發毛派採取了不一樣的路徑——《70》一開始就否定國族主義，並認為國族主義不過是左右兩派的洗腦把戲，目的在於讓人臣服於他們的極權統治之下。既然左右兩派的一切皆不可取，那《70》認為可以如何改變社會呢？他們希望取經於亞非拉的第三世界反殖抗爭、取經於西方新左翼等，也就是去學習「洋」的邏輯。值得一提的是，由於《70》一開始就迴避及抗拒討論關於中國國族主義的問題，並懸置了關於「香港人」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討論，這也連帶使得他們早期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並不深入。

1971年，保釣運動展開，自發毛派組織了保釣會，發動了第一場後六七的遊行示威。自發毛派也透過這次運動，把此前的「回歸論」付諸實行，摸索出運動中的「統一路線」。當統一路線碰上基辛格訪華、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代表權等事件，就激發了一輪「中國熱」。莘莘學子們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興趣大增時，他們在與香港本地傳統左派接觸後遂變成大專院校內的國粹派。國粹派無論在思想、情感和組織上，都承傳了本地傳統左派的遺產——包括了不反殖的部分。

也就是說，國粹派和自發毛派相似的地方是，兩者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可敬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且認同它在排除萬難地逐漸崛起中，而其崛起對中國大陸人民以至於第三世界人民的影響是正面的——這種判斷也因為他們確信中共在走社會主義之路、中共所跟隨的毛澤東思想中的「群眾路線」可以確保中共代表了無產階級的意志，

他們因此認為中共的理念、組織方法、領導方法等，總地來說都對自身及世界帶來正面影響。也就是說，國粹派和自發毛派都認為國族主義與其左翼政治是毫無矛盾的，在他們的世界中，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抱「中國人」身份認同、認同中共、愛第三世界和愛社會主義基本上是同一件事。然而，國粹派和自發毛派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自發毛派並不認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中共合法性」、「認同『中國人』」就代表要「緊跟北京」、「緊跟中共」——他們還是希望可以對中共提出內部批判，也不贊成在香港這片殖民地放棄一切公開抗爭。另一邊廂的國粹派卻不一樣，他們認為「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中共合法性」、「認同『中國人』」等就代表要認同中共中央、「緊跟北京」。於是，國粹派完全同意了中共中央對「愛國反霸」的外交路線的詮釋——把英國只是當作「第二世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協助中共對抗「第一世界」的美蘇。就是這樣，國粹派把香港未來、中國未來及世界總體革命的希望完全押在了中共的社會主義藍圖之上，並沒有提出修正的意願，甚至要為這個藍圖放棄自發的部分，只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做準備。而在第十章，我們也看到國粹派這種思想和情感上對中共的認同，甚至使得他們在組織上也主動接受或自行複製了本地傳統左派慣常的「潛伏」的、由上而下的組織模式，也因此沒有自發毛派那種勇於自發地組織及公開行動的特質。不過，由於國粹派成了大專院校界的大多數，自發毛派的影響力慢慢被蓋過，自發毛派也有點意興闌珊，在保釣後反潮流地引退了。

國粹派興起後不願意搞任何反殖行動的做法，不但使得自發毛派不滿，一些校內的學生因此自稱「社會派」與國粹派分庭抗禮。總的來說，社會派也是左翼的、信仰社會主義的。不過，其思想並沒有那麼完整，其特色主要在於主張行動及抵抗國粹派兩點。在第九章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派認為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路線總體而言是正確的，但他們卻認為中共存在不民主的問題，因此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他們對中共不民主的批評，不只在於認為中共對民間聲音的打壓妨礙了中共自身本來已有的改革動力的發展，更認為香港若要回歸中國，這種不民主的做法也將壓迫到香港。最後，出於對回歸的認同、對「香港人」和「中國人」自身利益的考量、對中共民主化及本地議題的特別關注，他們因此認為在香港應該推行溫和的反殖社會運動。社會派雖然也同意面向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族主義，但在此以外他們認為「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認同可以並存、並不衝突——前者反而可以幫助後者，特別是在未來回歸的談判桌上，反殖愛國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意識若被培養出來，可以讓屬於中港人民的集體利益被最大化。某程

度上，自發毛派和社會派有相似之處，但社會派更看重本土的反殖意識。雖然社會派與托派一樣是「策略上」介入中國國族主義，但相較而言托派則採取「防禦性質」的態度——其對國族主義的討論主要是為了防止中國身份認同窒礙本土意識的發展。

1973 年，保釣運動過後，由於國族主義情感隨著國粹派的興起被炒熱，一直與國族主義保持距離的《70》失去介入力及影響力。於是，《70》成員開始反思此前對國族主義的不屑態度，進而引發他們反思此前《70》大雜燴式地引入「洋」理論和對「中國問題」討論脫節的狀況。但當《70》內部想要就各種運動的大問題、大方向（包括對中國社會主義、對國族主義的看法）展開爭辯時，才發現內部分歧之大。《70》中受到中國老托派及西方托派影響的新生本地托派因此離開，另立獨立托派組織，也與此前《70》的自發主義（顯見於其組織的鬆散及思想的大雜燴）劃清界線、分道揚鑣。同時，留在《70》的人越發傾向無政府主義，這當中也與被逃港紅衛兵帶來的文革極左思潮有關。

在思想上，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最大的分歧在於對革命的組織手法以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特別是在「中國問題」上，托派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走社會主義路線總體來說是正確的，公有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乃社會主義國家的指標。但是，他們認為中共有官僚主義問題，而香港作為世界的一部份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出於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需要及修正中共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考量，因此要在香港推動社會運動以至社會主義革命。同時，托派也批判本地傳統左派及國粹派，認為他們只是在維穩中共的官僚主義，窒礙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托派也批評自發毛派過於推崇中共的現代化路線，此單一指標容易構成其思考盲點，無法對中共提出總體及恰當的批判。而國族主義在托派的左翼政治藍圖中，則被放置在一「策略」位置。托派認為，認同國族主義情感可以讓人從自身的處境出發，連結到國內人民的處境，從而連結到其他各地人民的抗爭，最後理解到個人、國家、國際為同一共同體，都面臨相似的社會及政治問題，也終從「香港人」、「中國人」演進為「國際主義者」。所以，托派對國族身份政治的介入，主要是為了提煉當中的激進性，而非在於認為國族身份中有當然的、內在的、獨立於左翼政治的正當性。托派對國族主義的認同必須被放置在他們對國際主義、社會主義總革命的藍圖中去理解，才能明白其政治指向。

另一方面，在 1973 年受到極左造反派逃港紅衛兵影響、並對「中國問題」有更深入探討的《70》無政府主義派則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社會主義國家、中共並不代表人民意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性質為「國家資本主義」。而香港作為世界的一部份，要推

進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就要在香港以社會運動的方法激起本地革命以至於世界革命的可能。在這條路線上，無政府主義派認為無論是中共、港共、本地左右派、還是港英殖民政府，均要被毫不留情地徹底推翻。也就是說，托派和無政府主義派的革命思想所指向的終極目標（也就是對社會主義總革命的想像）是不一樣的：托派要的是建立非官僚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不認為需要摧毀社會主義中國；無政府主義想要摧毀一切國家，建立公社制度，摧毀中共是其中一步。而在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藍圖中，國族主義始終被認為是一個阻力、是一個反動的情感及意識形態。

從以上所見，火紅年代各派的思想、情感、組織與行動，除了持續地與此前的左右派對話以外，同時也在開創自身對「香港」未來及作為「香港人」、「中國人」的認同及責任的一系列看法。然而，這些關於身份認同及其附帶的責任的討論，不只和國族主義情感及國族身份認同政治有關，背後其實是更廣闊的左翼視野：各派都是基於對社會主義是認同，但同時對社會主義有不同的理解，才會有著不一樣的政治路線，並把國族主義及國族身份認同的問題放置在不同位置。無論是自發毛派以國族主義作為「回歸論」和自發抗爭的前提、國粹派以國族主義融合「長期利用，充分打算」及「愛國反霸」路線、社會派以國族主義鼓勵在香港發動反殖抗爭以催化中國民主化並促成民主回歸、托派以國族主義為策略去連結香港反殖抗爭以修正社會主義中國的官僚主義並最後參與世界社會主義總革命、無政府主義以拒絕國族主義去迴避被傳統左右派挾持以達成反殖、推翻黨國並點燃世界社會主義總革命等……火紅年代各派在論述國族主義時，都是多於「香港人」及「中國人」的國族認同情感，而是關乎對「中國」、「世界」和「社會主義」的總理解。

11-2-2 香港火紅年代是新左翼嗎？新在哪裡？兼談國家建構的引誘和隱憂

我曾提在前言到西方新左翼的起源以及他們與新社會運動的關係。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赫魯雪夫否定斯大林、蘇聯入侵匈牙利等，都讓當時的新左翼為了在正統馬克思主義及蘇聯斯大林主義等舊左翼以外尋找新的出路。加上六〇到七〇年代，反殖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及女性主義運動等新社會運動的發展，以及流行文化對個人身份的主張等，新左翼開始關注身份認同政治的問題。在西方，新左翼對能動性的思考是最為開天闢地的，他們對機械式的唯物主義及經濟決定論的批判也使得他們得以看到不一樣的革命主體。譬如，黑豹黨受到毛澤東主義的影響，把黑人抗爭也看作第三世界抗爭及社

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以上，皆是西方新左翼在面對「舊左翼」及「舊政治」時的「新」的特色。我要再三強調的是，對「西方新左翼」的定義不該固化為一些表面的形式和特色。因為，若抹走了他們的社會及政治脈絡、抹走了他們當時想要回應的問題，也就無法理解他們「新」在哪裡，以及他們的「新」的激進性是什麼。

這樣比較起來，火紅年代的各種左翼是否為「新」左翼，也該被放置在本地脈絡中去理解，而不是和西方新左翼做表面上的比較以斷定它是否為「新」。那麼，到底本地的脈絡和西方的脈絡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以至於我認為對香港新左翼的定義不能照搬西方的呢？

第一，最早進入香港的「老左派」——也就是以中共為核心的傳統本地左派，在其革命實踐及理論中早就摒棄了機械化的唯物主義觀點（中共革命的成功就仰賴農民的力量），「經濟決定論」對本地左翼來說從來不被認為是最需要超克的問題。也就是說，香港老左派和西方老左翼，是在不一樣的軸線上，香港新左翼和西方新左翼之間若有參照，也應該要顧念到這部分的脈絡不同。

第二，香港要面對的主要政治問題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冷戰、分斷體制……這些問題都是西方老左翼或新左翼沒有經歷、也因此不需要直面的課題。香港與西方新左翼彼此相異的知識脈絡也導致西方新左翼在思想無法直接解答以上問題，但那卻是香港——也是廣泛第三世界——要面對的課題，也是香港的新左翼作為第三世界左翼的思想特色。

這樣說起來，火紅年代各派之所以為「新左翼」，是在於他們對國族主義的思考有別於此前的本地傳統左派，而不是在於他們是西方新左翼的翻版。在香港絕大部分時候，傳統左派對國族身份認同政治的理解及論述只是在於要去休克本地的一切抗爭。於是，火紅年代的創新在於突破之前的左派的限制，重新思考國族主義與左翼政治的關係以激發政治能動性。雖然西方新左翼對能動性的思考是出於不一樣的問題意識，但因為他們對能動性的思考與香港對能動性的思考有重合的部分，火紅年代青年也有參照西方新左翼的思潮與行動——當中又以《70》最有標誌性。事實上，《70》的初衷是想要繞過中國國族身份認同，打造一種和中國國族主義斷裂的左翼政治。而為了「繞開」，初期的《70》有時候會借用西方「老左翼」的思潮（譬如，在反加價抗爭時，《70》主要是訴諸「經濟決定論」，並以「經濟決定論」對抗國粹派的「國族主義」），有時候則是對本地國族身份認同以外的其他身份認同展現高度興趣（譬如，可以看到他們對女性身份認同、黑人身

份認同非常推崇)，甚至對其他地方的反殖運動的國族主義和國族身份認同在初期也不排斥（當然《70》後來在這方面是有轉向的，但這是後話了）。

因此，在抽象的理論邏輯上，《70》早期對國族身份政治在左翼政治中的位置，呈現出若干混亂——譬如早期的《70》支持其他第三世界的反殖下所出現的國族主義及獨立建國議程，但對香港的任何形式的國族主義都不支持，也就出現了「雙重標準」的問題。不過，火紅年代結束後，《70》實際上對國族主義進行了更為深刻的反省，並想要探索一條全然國際主義的、不依賴獨國族主義的、不以建國為終極目標的反殖反帝左翼政治路線。總括而言，其實火紅年代各新左翼的「新」，是在於面對「舊」的傳統左派時，對國族身份認同的重新利用和闡釋，和對左翼政治和國族主義之關係的重新論述，而這都是為了釋放當中的政治能動性（反而國粹派和舊左翼頗為重合，其「新」的部分，往往是在火紅年代以後才被釋放）。

火紅年代香港新左翼的反思，對於左翼——特別是第三世界左翼政治——的思想價值，也在於關於國族主義的討論。到底國族主義和左翼政治應該是什麼關係？國族主義的正當性為何？被民族國家的建構（**nation-state building**）計劃所形塑的民族主義／國族主義，是否只能訴諸一種封閉的定義——即預設同一個身份認同下的眾人皆有著整全的、共享的「本真性」？這種保守的「共同體」身份認同能否締造出反帝反殖的革命主體？還是最後只會變成對其他非我族類的排擠，錯失了其他形式的串聯的可能，最後得不償失？甚至，國族主義會否永續其內涵的殖民性？還是國族主義不一定指向民族國家的建立、不一定被國家主義吞併？國族主義的開放性是受制於現實政治，還是受制於理論侷限？左翼政治對國族主義的介入，只是受限於現實政治而已嗎？還是來自於理論上的不可能？最後，反殖、解殖運動的革命主體為何？

我認為，這是火紅年代最為寶貴的問題意識，但也是無法完成的一次探索。非常可惜的是，由於此探索被「香港七〇年代」的神話所淹沒，左翼政治在香港處於邊緣，內涵其中的關於國族主義與左翼政治的討論更難以在今日被捕捉。

我認為，回看火紅年代在締造左翼政治與國族主義之間的連結時的「失敗」，一方面可以歸咎為現實政治的殘酷，特別是香港左翼政治總是被中共領導的傳統左派過份鉗制，導致非國粹派的各派左翼在國族身份認同政治上的創新被「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長期偏擺——也就是羅永生的看法。另一方面，我認為，就算我們設想深圳河的對面並非中共的社會主義政權，而是國民黨政府、民進黨政府、美國政府、英國政府……難道國家

主義的箝制就不會出現嗎？羅永生的只是訴諸現實政治的、由上而下的分析所忽略掉的問題是：就算沒有面向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族主義、沒有執意要犧牲掉香港社會主義發展的中共——歸屬於一民族國家的慾望、甚至主動渴望著被國家主義收攏的慾望，依然會存在。對經歷過二戰、內戰、冷戰、分斷、政治打壓、社會分裂的第三世界殖民地來說，渴望著永恆的安全感、穩定的根源、堅固的核心，並且只能想像這些渴望可以被主權民族國家建構拯救——這才是香港政治最根本的問題。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因為我看到了自發毛派和國粹派在初生時都有自發的部分。就算不是在香港，台灣在與中國大陸長期斷裂之下，也有統左及左統的存在。國家主義、穩固的國族身份認同，對政治失落的人來說為何總是一個引誘／隱憂，他們在政治失落時為何沒有其他出路——這難道不才是最根本的問題嗎？總體來說，這世界諸多的反殖計劃為何都與民族國家建構綑綁，在此以外我們有什麼參照、有什麼想像的資源？這才是火紅年代所開啟的，對包括香港在內的第三世界及對當下政治局勢最有力的提問。

寫論文過程中，帶給我的最大的憂傷，或許是看到了以上問題如何在現在的政治中一直輪迴而沒有被解決——甚至沒有被好好地提問。在台灣讀書及回香港蒐集資料的這段時間，我剛好經歷的是中國大陸的佳士運動、香港反修例運動、台港兩地獨派的興起、台灣左翼青年被民進黨打壓、「台港共同體」背後的獨派國家主義預設對非公民政治的壓制。我看到大陸左翼青年手捧毛澤東像，想以文革中的左翼力量衝擊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資本主義傾向，同時以「作為中國未來棟樑的工人與學生」的身姿，重新定義「愛國」、「愛毛」的內涵。我同時看到香港支持香港獨立的青年揮動美國星條旗的做法如何得到大部分示威者的默許，認為這不過是一種「國際連結」。我聞到的是催淚彈的辛辣、燃燒瓶的焦臭混雜著示威者的汗味；我聽到的是蔡英文的競選演講、大街上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

我感知到新興的國族主義在開創時的抗爭性、開放性、爆炸性、充權威與「魅力」，也看到國族主義在指向民族國家建構時的保守性、排他性與「慕強」。但這兩種特性能否被分開？左翼政治與國族政治的結合，或左翼政治對國族政治的介入可以到什麼程度？有什麼東西——特別是情感上的——是左翼政治無法允諾，但又能被國族主義政治所滿足的？我認為這不是現實政治的問題（也就是有沒有新冷戰、有沒有中美介入等問題）而已，也是理論上的問題、情感政治的問題。國族主義中那些左翼政治所「不能滿足」的部分——特別是情感的部分——能否成為我們反思及修正左翼政治的契機？抑或，這

些情感也該被通盤檢討，以化解當中的殖民性？被強權打壓和拘禁的苦難，在被國族主義轉化後，會否也餵養出最狠辣的國家機器，造成人民與人民的互相廝殺？

火紅年代青年所開啟的一系列政治嘗試和思考實驗，或許是我們反思今日政治出路的契機。特別是當今天「台灣人」、「中國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都史無前例地高漲，當各地的民族國家建構路線都被說成是「唯一出路」，我們如何可以避免複製了在香港七〇年代初當「中國人」、「香港人」等概念初出台時，想要反抗的國家主義帶來的限縮性問題——特別是國家主義引發的切割、劃地自牢、慕強、保守、河水不犯井水、故步自封、拒絕溝通等現象？換句話說，火紅年代左翼歷史對今天最切身的質問是：「台灣國」及「香港國」怎樣才不會變成另一種國家主義，甚至最後壓迫了具激進意義的左翼政治（對香港來說，還要提防栽進了永續「七〇年代神話」的殖民主義圈套中）。

重回火紅年代，特別是重回自發毛派、托派、社會派、無政府主義派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複雜糾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種邏輯可能，特別是左翼的國族身份認同政治或去國族身份認同政治如何可以對抗國家主義、激發本地能動性，並成為連結兩地人民齊頭並進以共同克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冷戰等問題的另類出路。更具體來說，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示威者可否以愛國為名號召大陸對中共不滿並感到自身政治能動性被壓制的人民，對中國政府施壓並對香港鬆綁？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大陸人民又可否不只訴諸自由派語言，而是以左翼政治看到香港運動對中國社會主義可能的推動力？台灣對反修例運動的支持，可否不是拿來餵養壓迫非公民政治的國家主義？甚至，香港示威者揮舞星條旗的「國際串聯」慾望能否轉化為左翼的「國際主義」慾望？如果說，以上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不可以」、「很困難」、「不可想象」、「天方夜談」的話，那麼火紅年代的存在，就是要逼令我們望向那被遮蔽的視野、看清及檢討那遮蔽我們的種種，也就指向了另類出路（*alternative*）的可能與困難。

換句話說，寫出火紅年代中國族身份認同政治與左翼政治（不）結合時可能引發的激進性，並不意味著我認為我們可以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要理解回不到過去的原因。而這遠遠多於國粹派和本地左派在歷史中對這些激進性的打壓、也多於殖民治理的狡猾——而是關乎第三世界反殖中的國族慾望。而當下左翼最大的功課，或許就是要具備這方面的認知。只有這樣，對任何一種國族主義的批評才不會只是立場的宣示，不會只是使用左翼的語言做出離地的批判，而是得以具備介入社會與創新的力度。

11-3 研究侷限

這篇論文最大的侷限在於，作為一個社會運動研究，我沒有和社會運動理論展開對話，這也是我覺得非常可惜的。或許，用社會運動理論可以讓我以更有系統的方式去呈現運動的發展，並且把組織、資源、政治機會結構、動員框架、認同、社會網絡等因素之間的關係以更有條理的方式組織在一起。

在具體內容上，第一章對左派、右派和第三勢力的分類或許略顯簡化，這種分類是為了鋪墊 1967 年後火紅年代的背景，但無法動態地捕捉左右派——特別是當中的右派和第三勢力——在 1967 年前的細微轉變和內部的多元性。譬如，我們該如何理解新亞書院和台灣自由派之間的關係？創辦了《民主評論》的新儒家徐復觀對國民黨的批評，算不算是一種行動？我對右派在火紅年代的「不行動」的判斷，是我立足在火紅年代青年的角度——亦有香港本位之嫌——去審視歷史的結果，或許也欠缺更多歷史化的深度。

關於第三章後——六七暴動後——整個恐左氣氛及恐政治氣氛到底是如何出現的，有很大部份是基於二手研究，沒有細細研讀 1967 到 1970 年社會上對六七暴動的評論及港英政府在打擊左派上所做的部署。這裡很大的原因是我離開香港回台灣時，沒有意識到檢索這方面的資料和政府檔案，也因為我的研究重點不在治理的部分。然而，由於這方面資料的欠缺，也使得我在第八章對殖民治理的分析——也就是港英政府懷柔政策——並不充份。同樣，在第八章中，我提到流行文化的興起對運動所起到的擠壓作用，但我對流行文化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探討也是比較粗疏的。為何文化產業會上升？如果流行文化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領域，哪些因素催生了這樣的流行文化？

我在訪談和閱讀文本中，也發現大部份的研究、回憶錄、訪談等資料來源均為異性戀男性。女性及性多元的討論在火紅年代的缺席，也折射了其實新左翼的許多問題意識並沒有在火紅年代各個派別中被充分展開。但我並沒有去再探索這方面的資料，也沒有去尋找多一些女性受訪者，這是另一侷限。

火紅年代的生成有一部份有賴於六〇年代文社運動的推波助瀾，兩者亦有競爭關係。針對前者，我應該加入文學方面的討論——特別是關於香港文學的討論，都認為七〇年代是香港本位的本土意識的起源。這種說法和我關於火紅年代的研究，固然有一些縫隙。文社與火紅年代兩者之間更多重的關係為何？這是值得探討的。

最後，我對社會派的討論其實沒有完全展開。社會派在 1976 年失去了國粹派這個對手後，一方面是沉寂了，另一方面也醞釀出更獨立的問題意識，而有了自己的發展路線，也就不再像火紅年代初期那樣好像跟著托派及無政府主義派了。也就是說，社會派的特色其實是在 1976 年後才更為凸顯——特別是曾澍基在 1978 年自立門戶做的《文化新潮》中的左翼文化批判路線，就可以被當作社會派在面對社會問題時的一個取徑。1976 年，《號外》創刊；1979 年開始，吳俊雄、呂大樂等在《學苑》講普及文化，《文化新潮》批判《號外》，無政府主義派批判《文化新潮》。這無疑是一種文化轉向，顯示了火紅年代社會運動的討論轉離了以國族認同政治為核心。然而，因為論文涉及的歷史時期到 1976 年就打住了，並無論及 1976 年後的運動發展。對文化和文藝討論的關注不足，或許也使我錯失了其他火紅年代的激進性。如果加入這部份的討論，或許可以使得整個火紅年代更被複雜化，甚至可能會得出火紅年代並沒有在 1976 年完結的的結論。我想，這也是我論文最大的侷限。

11-4 火紅年代事後記：昨日之火在今日留下了什麼？變成了什麼？

火紅年代雖然已成過去，對當事人來說，這段歷史到底留下了什麼？他們又有什麼反思和自我批判？抑或，這些反思其實也是運動創傷的一銀兩面？歷史的記憶和當中的傷痛，到底是經驗上的累積、抑或是政治思考上的卡頓？他們對國族主義的反思，又怎樣影響了後續的工作甚至是下一代的社會運動？下一代對上一代的承傳，是思考的啟發、精神的傳承、還是創傷的擴散、盲點的遺傳？這雖然不是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但也是非常值得在未來探索的研究方向。在附錄的部份，我將會納入自己的一些田野筆記、逐字稿和訪談稿，讓這些來自火紅年代的反思聲音可以自己現身說法。希望我的附錄可以更大幅度地開啟火紅年代的未盡之處。

至於火紅年代本身在展示其歷史的複雜面目後，何以成為一個活的歷史，其實本論文可以做得真的太少了。更直接的做法，或許是在社會運動的行動中把這些火紅年代所帶來的靈感持續創新、實踐、修正，但這也是論文以外的事了——盼日後，街頭相見。

參考文獻

專書與專書章節

-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Foucault, Michel.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Chap.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edited by James D. Faubion, 386-87.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 Gramsci, Antonio. "Notes on Italian History." In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44-11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92 [1971].
- Hall, Stuart. "Gramsci and Us." In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171. London: Verso, 1988.
-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edited by Kathryn Woodward, 222-37. London: Sage, 1997.
- Keucheyan, Razmig. "A Brief History of the 'New Left'."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 In *The Left Hemisphere: Mapping Critical Theory Today*, 33-50. London: Verso, 2014.
- Mark, Chi-kwan. "Introduction." In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1-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Mark, Chi-kwan. "Hong Kong in British,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d War Thinking." In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12-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Nadler, Steven. "The Passions." In *Spinoza's 'Ethics': An Introduction*, 190-21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6.
- Patten, Chris. *East and West: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on Power, Freedom and the Future*. London: Macmillan, 1998.
- Williams, Raymond. "Structures of Feeling." In *Marxism and Literature*, 128-3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Wu, Yiching. "Revolution Alchemy: Economism and the Making of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95-15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Wu, Yiching.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1-1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人民日報》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收入張家偉編，《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1967〕。
- 〈校園裡的「流」〉，收入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編，《中大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84〔1973〕。
- 〈第一屆中國周〉，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
- 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67。
- 大專院校聯合號外，〈保衛釣魚台七七大示威——事實的報導〉，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1〕。
- 工商日報，〈不容日本覬覦釣魚台列嶼的主權〉，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0〕。
- 工商日報，〈日毛利用「釣魚台」的詭謀〉，收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及第四組編，《釣魚台列嶼問題資料彙編》，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1〔1971〕。
- 中國週籌委會，〈中國週工作報告〉，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第十六屆週年代表大會文件匯編》，香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1974。
-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45〕。
- 毛蘭友，〈回憶六十年代〉，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88〕。
- 王凡西，〈抗戰初期的陳獨秀〉，《雙山回憶錄》，台北：東方，2004。
- 〈太平洋戰爭與組織再分裂〉，《雙山回憶錄》，台北：東方，2004。
- 白承旭，〈文化大革命與陳伯達〉，《文革的政治與困境：陳伯達與「造反」的時代》，新竹：國立交通大學，2014。
- 本田善彥，〈「保釣」運動點火人〉，《保釣運動全紀錄》，新北：聯經，2019。
- 〈突破〉，《保釣運動全紀錄》，新北：聯經，2019。

- 弗朗茲·法農，《大地上的受苦者》（楊碧川譯），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9〔1961〕。
- 古兆申，〈現實的回歸〉，收入盧瑋鑾、熊志琴編，《雙程路：中西文化的體驗與思考 1963-2003——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2010。
- 石中英，〈那一夜，我們歌唱〉，《我愛秋風勁》，香港：火石文化，2016。
- 〈我們認識的《青年樂園》〉，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
- 甘志強、鍾子維，〈反對麥宗民同學利用學生會達到其反華反共的政治目的〉，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6〕。
- 伊雲，〈從夢想到絕望〉，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69〕。
- 列兵，〈與屠龍君討論「香港問題」〉，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
- 死流，〈不負責任的說話〉，收入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編，《中大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84。
- 江關生，〈火紅年代 反思國粹（1971-1976）〉，《中共在香港（下卷）》，香港：天地，2012。
- 吳仲賢，〈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71〕。
- 〈法國政府反革命的鎮壓〉，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73〕。
- 〈回憶保釣運動〉，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90〕。
- 〈香港經濟發展的批判理論〉，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
- 〈堅持世界革命總路線〉，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
- 〈群眾組織的神話〉，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
- 〈香港革命的前途與我們的任務〉，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
- 吳荻舟，〈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紀錄〉，收入程翔編，《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
- 吳萱人，〈青石的歲月〉，收入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1997〔1996〕。
- 〈代變中看六、七十年代文社運動承傳（講文提要）〉，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
- 吳基民，〈斯大林為了援助中國革命而開設的中山大學，想不到卻成了滋生中國托洛茨基派的溫床〉，《煉獄：中國托派的苦難與奮鬥》，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8。
- 吳甦，〈寫在再版之前〉，收入吳甦編，《敢有歌吟動地哀：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青年詩文選》，香港：70年代雙週刊，1975。
- 呂大樂，《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2007。
- 〈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 〈殖民冷經驗〉，《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 〈無關痛癢的1974〉，《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 〈重新認識七十年代〉，《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 〈「麥理浩時代」的殖民性〉，《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香港：中華書局，2012。
- 〈香港故不易講／非歷史的殖民地成功故事〉，收入潘毅、余麗文編，《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2003。
- 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導言：文化中的生活，生活中的文化〉，收入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2011。
- 何家駒，〈編者的話〉，收入何家駒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1978。

- 李孝智，〈一二·三事件期間報紙建構的事件〉，《澳門一二·三事件：細說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7。
- 李雅雯，〈邵玉銘教授訪談〉，收入李雅明、謝小琴、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編，《保釣風雲半世紀：保釣運動領軍人士的轉折人生與歷史展望》，台北：時報文化，2009。
- 李詩聰、梁可欣、田曉彤、溫秀倚、湯澤恆，〈陸德成訪問〉，收入李詩聰編，《六七暴動：工會運動的分水嶺》，香港：迦密柏雨中學，2010。
- 阿丙，〈明白你的「不明白」反貪污運動的茶杯裡風波〉，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
- 林悅恆、盧瑋鸞、郭詩詠，〈林悅恆〉，收入盧瑋鸞、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一）》，香港：三聯書店，2014。
- 明報，〈美國聲明 偏袒日本〉，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1〕。
- 尚進，〈哀思凝聚 熱血奔騰——記學聯追悼會〉，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6〕。
- 周永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香港：中華書局，2019。
- 周奕，〈兩大陣營的組成〉，《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
- 〈兩次反共高潮〉，《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
- 〈重整會務的艱辛〉，《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
- 〈海塢閉廠與大躍進〉，《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
- 〈羅素街血案〉，《香港工運史簡篇》，香港：利訊，2013。
- 〈反英抗暴之「復轉改」〉，《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訊，2017。
- 〈反英抗暴之真假炸彈〉，《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訊，2017。
- 周思中，〈從來存在、且命定回歸的幽靈——「本土」的本體論〉，收入馬家輝、梁文道、王慧麟編，《本土論述 2009：香港的市民抗爭與殖民地秩序》，台北：漫遊者文化，2009。
- 〈編話：拒絕認命，重複《70》〉，收入侯萬雲，《《1970s》不為懷舊的文化政治重訪》，香港：進一步，2009。
- 周魯逸，〈香港學生運動與意識形態〉，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81〕。
- 知涯，〈也談「物價問題與學運發展」〉，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4〕。
- 星島日報，〈中日釣魚台群島主權之爭〉，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0〕。
- 星河，〈香港托派與青年學生運動〉，收入香港大學學生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1978〔1975〕。
- 侯思傑，〈假如不只是一本雜誌、一個年代——侯萬雲、莫妙英訪談〉，收入周思中編，《1970s：不為懷舊的文化政治重訪》，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9。
- 香港八大院校校長，〈擁護我國政府維護釣魚台主權〉，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1〕。
- 香港專上學生聯合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香港專上學生聯合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聲明〉，收入浦野起央、劉甦朝、植榮邊吉編，《釣魚台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香港、東京：勵志、刀水書房，2001〔1971〕。
-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通貨膨脹資料展覽〉，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4〕。
- 〈保釣運動產生的背景及經過〉，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8〕。
- 〈反貪污、捉葛柏〉，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8〕。
- 〈衝破沉默——學運的醞釀期〉，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8〕。
- 〈圖輯〉，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

- 香港工會聯合會，〈第二部份專題訪問〉，《工聯會與您同行：65 周年歷史文集》，2013。
- 馬繼森，〈一月奪權〉，《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六三社論〉，《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八月大亂〉，《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文革初期的對外關係〉，《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姬鵬飛：「現在領導運動就是報紙。」〉，《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砲轟陳毅」〉，《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砸政治部〉，《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總部」和「攀險峰」的誕生〉，《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聯絡站奪權初期〉，《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夏淞，〈中大學生會的發展〉，收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編，《中大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學術部，1973。
- 海澀·愛，〈毀壞的身份認同〉（洪凌譯），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憂鬱的文化政治》，新北：蜃樓，2010〔2001〕。
- 〈拒絕的政治〉（鄭聖勳、翁健鐘譯），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憂鬱的文化政治》，新北：蜃樓，2010〔2007〕。
- 〈論情感政治：感覺倒退、感覺「背」〉（張瑜珩譯），收入劉人鵬、宋玉雯、鄭聖勳、蔡孟哲編，《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新北：蜃樓，2012。
- 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凋零〉，《說中華民族之花果凋零》，香港：三民書局，1974〔1961〕。
- 〈花果凋零及靈根自植〉，《說中華民族之花果凋零》，香港：三民書局，1974〔1964〕。
- 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中國文化與世界〉，《說中華民族之花果凋零》，香港：三民書局，1974。
- 唐寶林，〈夾攻中的顛仆與掙扎〉，收入張玉法編，《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1994。
- 孫麗鶯、劉蜀永，〈戰後商業的發展〉，收入劉蜀永編，《20 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聯書店，2004。
- 張正平，〈左派在專上學院的活動〉，《香港學生運動》，香港：大學生活社，1970。
- 張春橋，〈張春橋傳達毛主席最新指示〉，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公交研究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北京：內部刊行，1988〔1967〕。
- 張家偉，〈引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 〈《人民日報》「六·三社論」及左派大罷工〉，《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 〈六七暴動的前奏〉，《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 〈沙頭角事件與「真假菠蘿陣」〉，《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 〈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事件〉，《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 〈改寫香港歷史的六七暴動〉，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
- 張連興，〈堅尼地〉，《香港二十八總督》，香港：三聯書店，2012。
- 〈葛量洪〉，《香港二十八總督》，香港：三聯書店，2012。
- 麥克法夸爾，〈五十天〉，《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2009。
- 〈圍攻北京市委〉，《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2009。
- 麥宗民，〈學運隨想〉，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81〕。
- 畢捲鋒，〈「反貪污、捉葛伯」我的一些不明白〉，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
- 符鵬，〈回向「經驗」的可能方式與人文知識思想的社會想像力：從嘗試理解賀照田當代人文學的探索出發（初論）〉，收入賀照田、陳明、符鵬等，《人文知識思想再出發：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19。

- 屠龍，〈「同志」讓我告訴你〉，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3〕。
- 陳文鴻，〈前言：我們走過的路〉，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
- 陳冠中，《事後：本土文化誌》，香港：牛津大學，2007。
- 陳美燕、楊聰榮，〈從香港本土文化看香港人意識之形成〉，香港：香港問題研討會，1994。
- 陳莊勤，〈我看這三年的學生會〉，收入香港大學學生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1978。
- 陳偉傑、余奇里，〈Cu 仔去死吧〉，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9〕。
- 陳強，〈衝破沉默——學運的醞釀期〉，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1〕。
- 陳順馨，〈遭遇「中國」與民族身份的追問〉，《正值銀杏生輝：記北大》，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0。
- 陳毓祥，〈物價問題與學運發展〉，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4〕。
-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香港文學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素葉，1996。
- 黃錦滿，〈《台大僑生》促成台灣學界保釣〉，收於專集組編，《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香港：策劃組合，1998。
- 程翔，〈1967 年聯辦工作情況〉，《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
- 〈六七暴動的指揮和組織機制〉，《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
- 〈六七暴動發動的原因和目的〉，《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
- 〈六七暴動的發動及進程〉，《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2018。
- 鄺雍，〈這不是理想的時代〉，收入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編，《中大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84〔1973〕。
- 馮紹波，〈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收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1983〔1972〕。
- 馮可強，〈人的力量〉，收入吳仲賢、馮可強編《70 年代雙週刊（中國特刊）》，香港：70 年代編委會，1970。
- 港大學生會通訊，〈托派如何插手學生運動〉，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5〕。
- 賀照田，〈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潘曉討論」與當代中國大陸虛無主義的歷史與觀念構造〉、〈後記〉，《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台北：人間，2016。
- 楊寶熙，〈一個七十年代國粹派的自白〉，《走過火紅的傘下銀髮》，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15。
- 楊慧儀，〈革命〉，《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劇場》，香港：手民，2019。
- 雷競璇，〈香港的第一次保釣運動〉，收入關永圻、黃子程編，《我們走過的路》，香港：天地，2015。
- 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保衛釣魚台運動〉，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
- 〈香港學生運動大事年表〉，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
- 溫蒂·布朗，〈抗拒左派憂鬱〉（張永靖譯），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編，《憂鬱的文化政治》，新北：蜃樓，2010〔2001〕。
- 鈴木將久，〈序一：當我們直面在危機重重崛起的中國大陸〉，收入賀照田，《當社會主義遭遇危機》，台北：人間，2016。
- 趙永佳、冼基樺，〈兩岸三地的政治差異與文化經濟的融合——銀都在華語電影產業鏈的角色〉，收入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編，《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2014。

- 趙雨樂，〈序言〉，《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三卷合訂本）》，香港：三聯書店，2016。
- 歐素瑛、林正慧，〈走過黑名單：林孝信先生的生平與志業〉，收入王智明編，《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新北：聯經，2014。
- 劉平梅，《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2005。
- 劉山青，〈七〇年—七八年：投身政治運動〉，《無悔的征途》，香港：明窗，1992。
- 劉翠珊，〈國家權力與教育〉，收入趙永佳、呂大樂、容世誠編，《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2014。
- 劉銳紹，〈我在 67 暴動前後的經歷〉，《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上）》，香港：次文化堂，2017。
- 劉源俊、林孝信、李淑珍，〈《科學月刊》的世代：林孝信與劉源俊對談〉，收入王智明編，《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新北：聯經，2008。
- 黎廷瑤，〈洪流中的一點浪花〉，收入中大二十年檢討活動委員會編，《中大二十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1984〔1975〕。
- 駱穎佳，〈怨恨的生命政治：毛派國族論述對香港人身體想像〉，《邊緣上的香港：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香港：基道，2016。
- 學聯，〈在學聯第十九屆代表大會中動議之譴責中共中央違憲議案〉，收入遠東事務評論社·香港問題小組編，《學運春秋：香港學生運動》，香港：遠東事務評論社，1982〔1976〕。
- 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香港故事：個人回憶與文學思考》，香港：牛津大學，1996。
- 錢理群，〈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台北：聯經，2012。
- 〈文化大革命時代（下）：1966-1976〉，《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台北：聯經，2012。
- 錢穆，〈招生簡章節錄〉，《新亞遺鐸》，台北：聯經，1998〔1950〕。
- 〈總統蔣公八秩華誕祝壽文〉，《錢賓四先生全集 23》，台北：聯經，1998〔1966〕。
- 戴天、盧瑋鸞、熊志琴，〈戴天〉，收入盧瑋鸞、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一）》，香港：三聯書店，2014。
- 鍾瀚惠、蔡虹音、李雅雯，〈林孝信教授訪談〉，收入李雅明、謝小琴、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編，《保釣風雲半世紀：保釣運動領軍人士的轉折人生與歷史展望》，台北：時報文化，2009。
- 羅永生，〈邁向具體主體性的本土性〉，《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2014。

期刊論文

- Farred, Grant. "Endgame Identity? Mapping the New Left Roots of Identity Politics." *New Literary History* 31, no. 4 (2000): 627-48.
- Hambro, Edvard.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The Phylon Quarterly* 18, no. 1 (1957): 69-81.
- Madokoro, Laura. "Surveying Hong Kong in the 1950s: Western Humanitarians an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9, no. 2 (2014): 493-524.
- Tong, Clement Tsz Ming. "The Hong Kong Week of 1967 and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Identity through Contradistinctio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 56 (2016): 40-66.
- Yau, Dennis T. W.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University." *The Union*, no. 23 (1968).
- 卜偉華，〈文革中的外交極左問題〉，《二十一世紀》95期，2006，頁36-45。
- 王永華，〈博奕與制衡：香港禁運歷史的解讀〉，《二十一世紀（網絡版）》51期，2006。
- 印紅標，〈文革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二十一世紀》36期，1996，頁37-45。
- 宋國慶、董國強，〈社會主義中國的危機與轉型——評 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二十一世紀》156期，2016，頁119-31。
- 李遜，〈巴黎公社原則在文革中的蛻變〉，《二十一世紀》155期，2016，頁15-28。
- 倪捷，〈1970年代初期の香港における保釣運動の展開〉，《華南研究》3期，2017，頁55-84。
- 許崇德，〈攻心為上：香港政府應對「六七暴動」的文宣策略〉，《二十一世紀》147期，2015，頁64-81。
- 〈「六七暴動」與「香港人」身份意識的萌生〉，《二十一世紀》169期，2018，頁77-94。

- 麥海華、劉麗凝，〈民主自由派・反國粹大聯盟・香港前途問題〉，《思想香港》8期，2015。
- 陳正茂，〈另一條道路：左舜生與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學報》5期，2016，頁219-49。
- 傅葆石，〈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二十一世紀》173期，2019，頁50。
- 黃克武，〈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二十一世紀》162期，2017，頁47-63。
- 賀艷青，〈毛澤東的國際戰略與第三世界〉，《中共黨史研究》3期，2005，頁81-87。
- 葉蔭聰，〈人民的社會主義：初探《理性的黃昏》〉，《思想香港》7期，2015。
- 齊鵬飛，〈新中國成立後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戰略出台始末〉，《黨史博采（紀實）》7期，2007，頁4-8。
- 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思想》26期，2014，頁113-51。
- 〈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思想香港》6期，2015。
- 〈「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二十一世紀》161期，2017，頁71-83。
- 羅永生、劉麗凝，〈「珠海事件」：由一篇悼念殷海光文章而起的香港學生運動〉，《思想香港》8期，2015。

學位論文

- Yang Yang, *Radicalism at the Margin: The New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Trotskyist Movement in Hong Kong, 1969-1981*.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Essex,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18.
-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 萬麗鵬，〈1950年代中國第三勢力運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鄭蕾，〈香港現代主義文學與思潮：以「香港現代文學美術協會」為視點〉，嶺南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2。
- 樊俊朗，〈國民黨在香港的組織、活動與困境（1949-1970）〉，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 劉建華，〈在六〇、七〇年代之交香港文化雜誌的政治性視覺生產初覽〉，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碩士論文，2019。
- 顏美鳳，〈權力均衡：釣魚台事件——從釣魚台事件看中、美、日、台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部哲學碩士論文，1998。

報紙與雜誌文章

- Che, Lee Ya See and Wu. "Some Thought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inus* 8, no. 5 (1976): 8.
- Jaco, 〈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迎新特刊2012》2012。
- Syndicate, Alternative Press. "To the Readers, Friends, and Comrades." *Minus* 9 no. 11 (1975): 1.
- "Tien An Man Forum 16th May 76 Hong Kong." *Minus* 8, no. 5 (1976): 1.
- "An Interview with an Ultra-Leftist from China." *Minus* 8, no. 5 (1976): 14-20.
- 〈中華人權協會發展小史〉，《野草》30期，1978，頁2。
- 〈前校長錢賓四先生接受本報記者訪問：身體無恙著作有成 山居生活閒而少暇——詳談學生對「娛樂」「談政治」當有態度〉，《新亞學生報》，1966年9月25日，版1。
- 70年代週刊，〈四不交〉，《70年代週刊：四不交運動特刊》1974，頁2。
- 〈12 Sept. Hong Kong 事件經過〉，《70年代週刊：四不交運動特刊》1974，頁5。
- 〈編輯室隨筆〉，《70年代週刊》18期，1974，頁2-3。
- 70年代雙週刊，〈為什麼我們要復刊〉，《70年代雙週刊》創刊號，1978，頁2。
- 70戰綫，〈為何要把「四不交」運動進行到底〉，《70年代週刊》18期，1974，頁2。
- 〈有誰能作我們的談判代表？〉，《70年代週刊》18期，1974，頁2。
- 〈我們的立場〉，《學苑》，1974年11月1日，版12-13。
- 70戰綫反失業·反加價臨時行委會，〈我們要活下去，就要鬥爭，但決不乞憐〉，《70年代週刊》12期，1974，頁1。
- 二馬，〈美國黑人姊妹的鬥爭——婦女解放與黑人解放運動〉，《女權》6期，1974，頁1。
- 大舊熊，〈香港人、中國人、人〉，《民眾報》10期，1981，頁1。

小娥，〈墮胎是否人道〉，《女權》6期，1974，香港，頁2。

子川，〈李一哲與我——兼評李一哲思想體制之形成（一）〉，《北斗》1期，1977，頁4-13。

中大校友編輯委員會，〈生命就是偶然〉，《中大校友》8期，1996。

——〈It教育家——馬紹良〉，《中大校友》33期，2003，頁16-17。

中大學生報，〈從保釣運動到中國統一〉，《中大學生報》，1971年8月15日，版1。

——〈我們的方向〉，《中大學生報》，1971年11月15日，版2。

中華人權協會大陸分會黃河雜誌，〈就天安門事件的聲明〉，《黃河》1期，1976。

天秤，〈當代中國的人權宣言——評李一哲大字報及他的成長〉，《黃河》1期，1976。

尤，〈二百四十人聯名發表宣言 反對日本侵畧釣魚台列嶼〉，《中國學生周報》，1970年10月9日，版2。

王順、茅漢，〈保衛釣魚台！〉，《中華雜誌》88期，1970，頁8-12。

毛蘭友，〈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70年代雙週刊》29期，1973，頁6-11。

——〈高舉起反加價的旗幟〉，《十月評論》3月25日期，1974，頁3。

史文鴻，〈學運之回顧與憧憬〉，《崇基學生報》，1977年6月，版8。

未名，〈港大二月七日的兩次非常會員大會感言〉，《學聯報》，1969年3月31日，版7。

本刊通訊員，〈反物價高漲行動初步展開〉，《學聯報》，1974年4月，版7。

——〈香港通貨膨脹的實質〉，《學聯報》，1974年5月，版1。

——〈要深入失業問題的根源〉，《學聯報》，1974年9月、10月，版1。

本刊通訊員思寧，〈港大同學反加價行動的開展〉，《學聯報》，1974年4月，版15。

四洲，〈爭取同工同酬的意義〉，《女權》3期，1974，頁3。

包錯石，〈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盤古》8期，1967，頁24-28、33。

——〈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續）〉，《盤古》9期，1967，頁31-37。

——〈試從就業與教育看美國黑人的命運（上）〉，《盤古》13期，1968，頁37-41。

——〈試從就業與教育看美國黑人的命運（下）〉，《盤古》14期，1968，頁11-15。

包錯石、張懷人、陳齊等，〈論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盤古》10期，1968，頁2-16。

包少昕，〈再論人物、人群與思想——也是一篇自我審查，兼答守拙齋主人暨「思與言」雜誌諸君子〉，《人物》16期，1968，頁3、10-12、43。

朱剛，〈新左派的失離〉，《新晚報》，1970年2月8日，版8。

——〈新左派與新階級——看美國反叛的知識青年〉，《新晚報》，1970年1月25日，版8。

行客、星望、黃志，〈保衛釣魚台和平示威遭警方暴力制止——最詳細、最客觀的現場報導〉，《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4月16日，版1-2。

全港反加價行動委員會，〈反加價鬥爭應該開始了〉，《十月評論》3月25日，1974，頁2。

兆聲，〈論中共壟斷資本〉，《北斗》3期，1977，頁2-8。

汝嵇，〈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專政無產階級——天安門事件說明了什麼？〉，《黃河》1期，1976。

安奇，〈從幾種論調看墮胎問題〉，《女權》6期，1974，頁2。

西窗，〈向正義的工友們致敬〉，《學苑》，1967年7月13日，版1。

忒倫詩，〈說香港學生運動〉，《學聯報》，1968年12月16日，版3。

杜萊，〈我認識「盤古」之後〉，《新亞學生報》，1967年4月7日，版4。

李金嘩，〈為發「回歸」熱的人醫病·從包錯石的文看包錯石〉，《盤古》17期，1968，頁2-5。

李心木，〈「抗議珠海無理開除學生」事件〉，《學聯報》，1969年9月19日，版1。

——〈十月感言〉，《學聯報》，1969年10月5日，版9。

李紹明，〈漫談左派學生〉，《中大學生報聯刊》，1970年4月30日，版10。

李煒佳，〈另一角度〉，《學苑》，1974年9月1日，版4。

吳仲賢，〈八月的札記〉，《70年代雙週刊》23期，1971，頁13。

——〈對香港毛派路線的批判〉，《學苑》，1974年9月1日，版16。

——〈中國向何處去〉，《學苑》，1974年11月1日，版12-15。

吳萱人，〈同一序幕，不同演出——九七時期探六七十年代文社青年〉，《讀書人》25期，1997，頁16-21。

——〈一條血脈一種姿勢〉，《70年代雙週刊》9期，1970，頁9。

肖其，〈從大方向到現狀與個人〉，《學苑》，1973年5月16日，版2-3。

社工同學，〈革自己的命〉，《學苑》，1975年9月5日，版12。
 阿昌，〈和平、暴力、五四精神——四一〇事件前後〉，《70年代雙週刊》20期，1971，頁7。
 肯尼夫·甘里斯頓，〈嬉癲士與新左派〉，《70年代雙週刊》1期，1970，頁5。
 林翠華，〈墮胎問題之我見〉，《女權》6期，1974，頁1。
 奕翰，〈由澳門事件說到我們的人生〉，《新亞學生報》，1966年12月25日，版4。
 胡菊人，〈像樹木一樣的生長〉，《中國學生周報》1期，1961。
 勁松，〈七七示威真相〉，《中大學生報》，1971年7月15日，版1-2。
 香港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四一〇事件報告書〉，《70年代雙週刊》20期，1971，頁6。
 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香港保衛釣魚台聯合陣線、海外各保釣行委會分會回港小組，〈保釣運動的新里程碑——保釣聲討大會八月廿二舉行〉，《中大學生報》，1971年8月15日，版1。
 保衛釣魚台五四示威，〈五四1971〉，《70年代雙週刊》20期，1971，頁4。
 保衛釣魚台五四行動負責人，〈各位參加的朋友〉，《70年代雙週刊》20期，1971，頁4。
 星望，〈記「保衛釣魚台聯合聲討大會」〉，《中國學生周報》，1971年8月27日，版2。
 紅柏，〈從五一三看保釣運動的發展〉，《學聯報》，1972年5月，版3。
 夏冰，〈反通貨膨脹的聯想〉，《學苑》，1974年9月1日，版14。
 容啟聰，〈民主社會主義在冷戰香港：從理論闡述到參與本地政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7期，2018，頁229-49。
 郭勳亮，〈對學生會諸公進一言〉，《學聯報》，1969年3月31日，版7。
 席辛佐，〈試談「新左派」——由垮而誇、由迷藥到火藥〉，《新晚報》，1970年1月18日，版8。
 ——〈挖美國新左派歷史的根——經濟大恐慌與三類反叛的知識青年〉，《新晚報》，1970年2月22日，版5。
 孫淡寧，〈釣魚台列島主權不容侵犯〉，《明報月刊》58期，1970，頁2。
 陸新，〈採訪資展是正路——關於認識通貨膨脹運動的討論〉，《中大學生報》，1974年9月1日，版11。
 崇基書院學生會、香港工業學院學生會等，〈聯合聲明〉，《學聯報》，1967年6月30日，版1。
 崇基學生雙週報、新亞學生報和「聯合學生」聯刊，〈中文必須儘早被列為官方語言〉，《崇基學生雙週報、新亞學生報和「聯合學生」聯刊》，1967年10月17日，版2。
 ——〈對華僑日報社評「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問題」的商榷〉，《崇基學生雙週報、新亞學生報和「聯合學生」聯刊》，1967年10月17日，版3。
 異鄉人，〈當代大學生的困境〉，《學聯報》，1968年6月7日，版3。
 逸飛，〈最近騷動對香港的影響——並論香港的勞資關係〉，《新亞學生報》，1967年6月30日，版2。
 梁卓恩，〈四報聯刊的初步檢討〉，《中大學生報》，1975年2月25日，版10。
 崔華，〈嬉癲與新左的文化反叛一樣嗎〉，《新晚報》，1970年5月17日，版5。
 ——〈新左嬉癲合二為一（上）〉，《新晚報》，1970年5月31日，版5。
 ——〈新左嬉癲合二為一（下）〉，《新晚報》，1970年6月7日，版5。
 ——〈論「新左」嬉癲的異同——兼論兩者與自由主義的淵源（上）〉，《新晚報》，1970年6月14日，版5。
 ——〈論「新左」嬉癲的異同——兼論兩者與自由主義的淵源（下）〉，《新晚報》，1970年6月21日，版5。
 張雪夫，〈也算是獨白日〉，《學聯報》，1969年1月12日，版7。
 張喜民、砥柱、方清、雲濤、王五，〈讀者對「未發回歸熱的人醫病」一文的意見〉，《盤古》18期，1968，頁43-45。
 陳平寬，〈短論香港保釣前途——「九一八」示威之後〉，《盤古》41期，1971，頁35。
 陳光興、林麗雲，〈在六、七〇年代急流中勇退的漂浪哲學家：陳鼓應訪談〉，《人間思想》14期，2016，頁4-29。
 陳婉瑩、莫壽平等，〈第一塊石頭——我們對回歸運動的一些建議〉，《盤古》13期，1968，頁48-52。

陳勝，〈經濟危機工潮、香港工人〉，《十月評論》3月25日期，1974，頁4-5。

陳毓祥，〈釣魚台與統一中國運動〉，《學聯報》，1972年4月，版6。

——〈會長陳毓祥同學講話〉，《學聯報》，1974年4月，版9。

黃山，〈香港學生運動的性質和趨向〉，《十月評論》1月5日期，1974，頁12。

黃守拙，〈「新左派」對美國民主政治的挑釁〉，《人物》16期，1968，頁13。

黃河，〈編者的話〉，《黃河》1期，1976。

——〈封面內頁〉，《黃河》1期，1976。

萃華，〈祖國行——漫談學聯北京，南上團之行〉，《中大學生報》，1975年8月15日，版18。

馮可強，〈原則與政治恐懼狂——珠海靜坐示威的前後〉，《學聯報》，1969年10月5日，版8。

曾澍基，〈香港向何處去〉，《學苑》，1975年12月5日，版1-2。

湛思，〈中國向何處去？（三）——中國的何去何從〉，《北斗》6期，1977，頁62-72。

董堅白，〈讀包錯石先生「研究全中國——從匪情到國情」有感〉，《盤古》11期，1968，頁0。

雷競璇，〈七七大示威籌備記〉，《中大學生報》，1971年7月15日，版3。

——〈對當前問題的顧攷〉，《中大學生報》，1973年1月，版1。

新亞學生報，〈本校師生贊成列中文為官方語文〉，《新亞學生報》，1967年12月22日，版1。

——〈忍心見中文衰萎下去？研究所所長兼哲學系主任唐君毅先生訪問記〉，《新亞學生報》，1967年12月22日，版2。

虞雪，〈理性的黃昏〉，《學苑》，1974年11月1日，版16-19。

歐陽敏惠，〈列寧誕辰日評新左派（上）〉，《新晚報》，1970年4月26日，版5。

——〈列寧誕辰日評新左派（下）〉，《新晚報》，1970年5月3日，版5。

盤古，〈給讀者的報告〉，《盤古》1期，1967，封面內頁。

——〈目錄〉，《盤古》1期，1967，頁1。

——〈從保釣運動到中國統一 從保衛釣魚台到保衛台灣〉，《盤古》45期，1972，頁1-3。

——〈向本港牛鬼蛇神輿論宣戰——揭漢奸特務及「中國專家」的嘴臉 革洋奴買辦及封建餘孽的狗命〉，《盤古》44期，1973，頁1-5。

德寬，〈漫長的行程——致敬讀者、作者和關心本報的朋友們〉，《中國學生周報》1期，1953。

魯凡子，〈美日侵我釣魚台列島與二月中之香港反日示威〉，《盤古》38期，1971，頁2-4。

編輯室，〈給讀者〉，《盤古》27期，1969，封面內頁。

編委會，〈我們的態度和方向〉，《北斗》2期，1977，頁1。

學苑，〈我們要求安定〉，《學苑》，1967年5月17日，版1。

——〈到教室外的大課堂區〉，《學苑》，1974年年8月1日，版13。

學聯，〈創刊辭：寄言論自由於自由大學〉，《學聯報》，1966年12月20日，版1。

——〈社評：亡羊補牢〉，《學聯報》，1967年6月30日，版1。

——〈政治闖進來〉，《學聯報》，1967年7月20日，版1。

——〈市政局民選議員胡鴻烈說〉，《學聯報》，1967年8月10日，版3。

——〈革新會主席貝納祺大律師認為〉，《學聯報》1967年8月10日，版3。

——〈專上同學意見彙整〉，《學聯報》，1971年5月1日，版8。

——〈站起來，奮鬥下去〉，《學聯報》，1972年4月，版15。

——〈待從頭 收拾舊山河〉，《學聯報》，1972年5月，版1。

——〈像鮮花的盛放 像節日的來臨——記各院校的中國週活動〉，《學聯報》，1973年10月，版9。

——〈為什麼要辦中國週？訪問中國週籌委會主席陳毓祥〉，《學聯報》，1974年10月，版7。

——〈就學苑編輯委員會 the Nationalists in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Students 一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問題研討會」執行委員會公開聲明〉，《學聯報》，1978年1月14日，版4。

靜莉，〈訪貧問苦小記〉，《中大學生報》，1974年9月1日，版10。

龍戰，〈我們還有話說〉，《學苑》，1967年7月13日，版1。

曙暉，〈一九七一年的釣魚台事件進展〉，《曙暉》，1971年3月20日，版2。

——〈中國領土，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曙暉》，1971年3月20日，版3。

——〈我們不要暴力〉，《曙暉》，1971年4月12日，版2。

聯合陣線，〈我們的聲明〉，收入聯合陣線編，《孟加拉特刊》，香港：70年代編委會，1971。

鍾植，〈淺談李金曄〉，《盤古》18期，1968，頁9、20-21。

蘭芷，〈報界請拿出良知來〉，《學聯報》，1969年10月15日，版8。

網路資源

Ahchoii，〈七月二十九日下午皇后碼頭速記〉，2007年7月30日，<https://www.inmediahk.net/node/249434>。

Centre, The Online Collection and Catalog of Rockefeller Archive. "Ford Foundation Records, Office of the Vice President, Logistical Services, Office Files of James T. Ivy, Summary." 1956-1980. <https://dimes.rockarch.org/collections/YbWbM5edZUpwALjsrCVqLu>.

eg9515，〈六七後的抗爭：由火紅年代到過渡期〉，2010年11月12日，<https://bit.ly/3egcmBh>。

Elsie Chen、Mike Ives，〈香港六七暴動的親歷者看「反送中」〉，2019年9月20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920/hongkong-north-point-1967-riot/zh-hant/>。

UNHC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Archival Description: Fonds Unhcr 23 - Hong Kong Refugees Survey Mission." 21 August 2001, <https://www.unhcr.org/en-au/research/archives/43fdd8553/%E2%80%9D/www.googletagmanager.com/ns.html?id=GTM-R6MF%E2%80%9D>.

〈反加價集會事〉，1974年9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dates/\[1974-09\]/ids/MCY-001981/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dates/[1974-09]/ids/MCY-001981/languages/zh)。

〈周恩來就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事與外事口各組織負責人的談話〉，1967年8月23日，<http://marxistphilosophy.org/ChenBoda/120601/173.htm>。

〈聯陣檢討大會紀錄〉，1972年2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ids/MCY-001923/dates/1972-02/languages/zh>。

《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67年8月15日，<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2322>。

人民日報，〈放手發動群眾，進一步壯大反英抗暴鬥爭隊伍〉，1967年7月5日，https://hk1967.org/beijingviews.asp?this=670705_1。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16日，<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4%BA%94%C2%B7%E4%B8%80%E5%85%AD%E9%80%9A%E7%9F%A5>。

中華救助總會，〈本會簡介〉，<http://www.cares.org.tw/CaresPortal/intro/introduction.do#>。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1958年9月4日，<https://www.fmprc.gov.cn/diaoyudao/chn/flfg/zcfg/t1304542.htm>。

王歡、王曉東，〈重溫毛澤東關於密切聯繫群眾的經典論述〉，2013年12月26日，<http://www.wywxwk.com/Article/lishi/2013/12/311797.html>。

王凡西，〈悼念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樓國華〉，1995年4月8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950408.htm>。

——〈評《中國托派史》〉，1995年6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9506.htm>。

——〈《七十年代》往哪裡去？——致編者信〉（筆名耕莘），1971年12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arxist.org-chinese-wong-197112.htm>。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5-202.htm>。

方德生，〈物價高漲與工人失業〉，1974年3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volumes//starts/1/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volumes//starts/1/dates/[1974-03]/languages/zh)。

立場新聞，〈《大公》兩版轟「消失的檔案」斷章取義 受訪者「熱愛祖國」內容被刪走〉，2017年4月24日，<https://bit.ly/3zHprw4>。

立場報導，〈投資者推動六七和解 趙崇基望拍給傘運年輕人——風波裡的《中英街1號》〉，2018年5月15日，<https://bit.ly/3gaCWNn>。

石中英，〈且剝一剝托派份子之皮〉，1974年7月22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trotsandmaos-1970s.htm#1>。

——〈托派份子舉的是什麼旗〉，1974年9月19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chinatrotsandmaos-1970s.htm#3>。

世代懺悔錄，〈民族論爭史前史：戰後嬰兒潮崛起〉，2017年8月24日，<https://medium.com/rccall-hk/f-d41262ffdbf>。

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釣魚台列嶼案答客問〉，2013年6月14日，<https://www.mofa.gov.tw/cp.aspx?n=215>。

禾草，〈工資與物價的比較〉，1974年3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8A/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8A/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

片木，〈生活的壓迫！物價、失業的災難〉，1974年3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8A/volumes//starts/1/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8A/volumes//starts/1/dates/[1974-03]/languages/zh)。

向青，〈中國托派和抗日戰爭〉，1977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chinatrots-1977.htm>。

岑建勳、吳仲賢、吳家麟、田偉貞、李金鳳、陳翹英、杜準，〈留法成員致香港成員信函〉，1972年9月29日，<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ids/MCY-001614/starts/1/dates/1972-09-29/languages/zh>。

吳仲賢，〈吳仲賢致友人信函〉，1973年5月3日，<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dates/1973-05-03/ids/MCY-001654/languages/zh>。

——〈吳仲賢致友人信函〉，1972年5月25日，<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dates/1972-05-25/ids/MCY-001607/languages/zh>。

吳家麟、吳仲賢、Johnny等，〈吳仲賢致友人書函〉，1972年12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ids/MCY-001623/starts/0/dates/1972-12/languages/zh>。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1974年11月7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njian-1966-1976/41.htm>。

林艾德，〈留住語言跟文化，香港總會是香港人的香港〉，2020年7月12日，<https://vocus.cc/article/5f0a1ec7fd89780001f4350d>。

林怡，〈港媒體人：中共欲經香港滲透各國〉，2018年10月2日，<https://bit.ly/3eCLDxM>。

明報，〈沒有槍炮的內戰〉，1967年8月8日，<https://www.facebook.com/vanishedarchives/photos/pcb.1905605716196246/1905602196196598>。

——〈兒童無罪！抗暴有理！〉，1967年8月23日，<https://www.facebook.com/vanishedarchives/photos/pcb.1905605716196246/1905601972863287>。

——〈燒不滅正義的聲音〉，1967年8月25日，<https://www.facebook.com/vanishedarchives/photos/pcb.1905605716196246/1905602099529941>。

姜宇晨，〈春雷怒吼釣魚台——1970年代中國留美學生保釣運動述評〉，2008年8月30日，<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44715.html>。

凌雁，〈我們要生活，我們就要站起來！！〉，1974年3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8A/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8A/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

陶傑，〈中國人的小農基因〉，2020年5月13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duomeiti/guandian/gd-05132020170005.html>。

——〈他沒有銅像〉，2019年10月4日，<https://hk.appledaily.com/columnist/20191004/J7RIB4AY5V3IV3MEFQI7BFJO7I/>。

梁寶龍，〈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2014年3月5日，<http://leungpolung.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html>。

莫昭如，〈莫昭如致吳萱人傳真：關於瀨心文社〉，1999年1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dates/\[1999-01\]/ids/MCY-001857/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Letter/dates/[1999-01]/ids/MCY-001857/languages/zh)。

教育研究部，〈1974年《未來十年香港中學教育》政策白皮書 學界三大訴求：取消淘汰試、母語教學、免費中學教育〉，<https://www2.hkptu.org/ptunews/593/p02b.htm>（連結失效）。

野草編輯部，〈中國人權問題座談會〉，1974年12月1日，<http://theintellectual.net/zh/political/weed/377-23-1974-10-4.html>。

陳嘉文，〈掘史達人：不認識歷史，定性暴亂太危險〉，2016年2月21日，<http://goo.gl/vfOjYx>。

陳珏明，〈港中大掛青天白日紅旗 校方擅拆除〉，2017年10月12日，<https://anntw.com/articles/20171012-c043>。

- 華僑日報，〈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的問題〉，1967年10月2日，<https://1967riot.wordpress.com/2012/10/02/wkyp-19671002/>。
- 〈解決困難穩定局勢〉，1967年8月28日，<https://1967riot.wordpress.com/2012/08/28/wkyp-19670828/>。
- 黑兵，〈在繁榮安定以外的工人〉，1974年3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Copyrighted/ids/MCY-000193/magazines/%E9%80%9A%E8%A8%A/volumes//dates/[1974-03]/languages/zh)。
- 曾曉玲，〈Ways of Seeing：《70年代雙週刊》50年來自昨日的自由呼應〉，2020年7月5日，<https://bit.ly/3ddPOkh>。
- 曾澍基，〈「國粹派」、「社會派」源考〉，2001年3月5日，<http://www.sktsang.com/ArchiveIII/1973.doc>。
- 程翔，〈觀點：港片《中英街1號》為何引發「漂白暴動」爭論〉，2018年6月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4316504>。
- 萬人傑，〈愛國〉，1967年6月16日，<https://www.facebook.com/wanrenjie/photos/1469242119810369>。
- 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1968年1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njian-1966-1976/25.htm>。
- 鄭致祥，〈彭述之：我的一生經歷憶述（二）〉，1976年1月，https://october-review.org/241/241_c31.htm。
- 衛毅，〈施永青的60年：從革命青年到地產巨商〉，2010年5月21日，<http://news.sina.com.cn/c/2010-05-21/134820319992.shtml>。
- 黎則奮，〈陳毓祥來函照登〉，1988年，<https://www.facebook.com/cfqilai/posts/10159136276558436>。
- 劉平梅，〈遷移於香港的托派組織〉，《中國托派黨史》，2005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upingmei/2005book/marxist.org-chinese-LauPingMui-2005book-12.htm>。
- 《中國共產黨與托派》，1994-1995年，<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upingmei/mia-chinese-laupingmui-2004.htm>。
- 劉偉勳，〈大陸逃港反共青年代表一行十人，十三日下午搭機自香港抵達台北，參加故總統蔣公喪禮大典〉，1975年4月13日，http://nrch.culture.tw/view.aspx?keyword=%E9%80%83%E6%B8%AF&s=2393624&id=0000736925&proj=MOC_IMD_001#。
- 幫港出聲，〈六七暴動50周年 團體要求還原真相〉，2017年5月8日，<https://www.silentmajority.hk/articles/31227>。
- 聯陣，〈聯陣檢討大會紀錄〉，1972年2月，<https://digital.lib.hkbu.edu.hk/mok/types/Meeting/ids/MCY-001923/dates/1972-02/languages/zh>。
- 鍾耀華，〈割掉家國的火紅——楊寶熙（上）〉，2015年8月7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08-opinion-yeungpohi-a/>。
- 〈家國、責任、香港——麥海華（上）〉，2015年8月21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22-opinion-70s-makhoiwah-a/>。
- 〈沒有遺產的《70年代》——侯萬雲（上）〉，2015年9月2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5-opinion-houmanwan-a/>。
- 〈沒有遺產的《70年代》——侯萬雲（下）〉，2015年9月2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06-opinion-houmanwan-b/>。
- 羅恩惠，〈當政治凌駕法律 重看「六七暴動」案例〉，2019年11月20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27681>。
- 譚榮禧，〈什麼人訪問什麼人：那年頭的社運健將 與黃醒華憶曾澍基〉，2015年7月11日，<http://cihk.blogspot.com/2015/07/instead-of-being-self-righteous.html>。
- 蘇美智，〈【人物專訪－羅恩惠】「我極度憤怒那是作為公民的憤怒」〉，2017年1月23日，<https://bit.ly/3DILaWO>。
- 〈【人物專訪－羅恩惠】四年追蹤六七暴動歷史真相〉，2017年1月23日，<https://bit.ly/3n0r2JS>。
- 〈【人物專訪】羅恩惠：無論高牆有多高 要尋找真相的話也會做得到〉，2017年1月23日，<https://bit.ly/3gXpYIW>。

影片

〈香港大事 197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5Nhq29fdds>。

周魯逸，《周魯逸（魯凡之）——悼包錯石並論世局（二）》，2019年4月13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PM2HqhXkU>。

——《周魯逸（魯凡之）——悼包錯石並論世局（三）》，2019年4月13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V0-5XWTcw&ab_channel=chowlouyik

陳耀成，《吳仲賢的故事》，香港：影意志，2004。

黃婉兒，《鏗鏘集——流金歲月系列之四》，香港：香港電台，1997。

黃華麒，《警察》，香港：香港電台，1974。

未刊稿

周魯逸，〈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緣識 51 年的若干有關事記——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未出版，2018。

附錄一、訪談與田野紀錄清單

日期	對話者 / 活動	地點	形式
2019 年 1 月 4 日	郭達年	香港，太子某公園	正式訪問
2019 年 1 月 16 日	周奕	香港，周奕住所	正式訪問
2019 年 1 月 19 日	梁寶龍	香港，屯門某咖啡廳	正式訪問
2019 年 1 月 24 日	莫昭如	香港，油麻地碧波押	正式訪問
2019 年 2 月 8 日	陳寶瑩	香港，理工大學某飯堂	正式訪問
2019 年 4 月 5 日	甘浩望神父	香港，旺角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正式訪問
2019 年 4 月 20 日	林志毅	香港，何文田某運動中心	非正式訪問
2019 年 5 月 5 日	六七公祭	香港，粉嶺和合石墳場	田野考察
2019 年 5 月 5 日	陳 YP、高 YP、石中英	香港，油麻地金皇庭酒樓	非正式訪問
2019 年 5 月 11 日	林志毅	電話	非正式訪問
2019 年 5 月 15 日	楊寶熙	香港，紅磡某美食廣場	正式訪問
2019 年 5 月 21 日	房遠華	香港，中文大學某咖啡廳	正式訪問
2019 年 5 月 31 日	石中英	香港，銅鑼灣某美式餐廳	正式訪問
2019 年 6 月 3 日	林致良	香港，旺角序言書室	非正式訪問
2019 年 6 月 8 日	梁國雄（長毛）	香港，灣仔某泰式餐廳	正式訪問
2019 年 10 月 4 日	陳順馨	新竹，某客家餐廳	非正式訪問
2021 年 4 月 2 日	陳鼓應	台北，陳鼓應住所	非正式訪問
2021 年 4 月 8 日	周魯逸	簡訊	非正式訪問
2021 年 4 月 9 日	周魯逸	簡訊	非正式訪問
2021 年 4 月 25 日	劉健威	電話	正式訪問
2021 年 5 月 13 日	雷競璇	電話	正式訪問
2021 年 5 月 17 日	H	視訊	正式訪問

2021 年 6 月 11 日	黃默	視訊	正式訪問
2021 年 6 月 26 日	阮志雄	視訊	正式訪問

附錄二、2019 年粉嶺和合石墳場公祭田野筆記

日期：2019 年 5 月 5 日（清明節）

地點：粉嶺和合石墳場（在上水集合再坐旅遊大巴上山）

活動：六七公祭

兩個大巴坐滿了 70 歲左右的老人，大部分都是六七暴動中坐過牢的 YP（young prisoner）。我在大巴上認出了石中英，石中英說：「很開心有年輕人參加公祭，六七一定要有多些年輕人認識。」石中英在問了我的年齡後說：「你是這裡最年輕的。」

車停了以後還要走一段山路，有些老人都是撐著拐杖走上去的，走得非常緩慢。我跟在後面也不好超前，一路上大家討論的話題，大多都跟身體和旅遊有關，譬如癌症復發了該如何治療、前幾天有血尿要多喝水、去貴州看了什麼景點。

位處小山上的和合石墳場，到了 5 月依然清冷，穿了毛衣還是有點哆嗦。有趣的是，這裡大部分的墓都是 1973 年樹立，我問身邊的 YP 為何如此。

A YP：雖然死者都是在 1967 年死的，但屍體死後一直被英國殖民政府扣留，不讓家屬取回，但因為有規定屍體必須要 6、7 年內入土，所以在 1973 年，港英政府才聯絡了工聯會安置屍體。

B YP：安葬時周恩來很重視，批款 3 萬，尋找了墳場中這個風水比較好的角落。

我：你們聽過文革造反派和周恩來之間的關係嗎？

眾 YP：（沉默）

C YP：唔知。

A YP：都是周恩來好。

B YP：周恩來安置了這些死者。

C YP：還是周恩來講義氣。

公祭開始，流程是發言、鞠躬和默哀。默哀的時候有幾個人在流淚，然後一下子周圍的人似乎也被傳染了那樣，開始越來越多人哭。默哀後，石中英跟我說：「我在想，差一點點我就是躺在這個裡面的人了，為什麼死的不是我，是他？」到了真的要離開時，氣氛才逐步緩和過來。有些人開始拍照留念。一個穿了雙襟有龍圖案亞麻軍裝、帶著有中國國旗圖案鴨舌帽的 YP 在拍照時特別踴躍，一直說：「我當年不是任何團體的，我是獨立參與的！」不過沒有人理會他。

高 YP：「中共當時是不是真的號召我們去搞革命？去死？」

日期：2019 年 5 月 5 日（清明節）

地點：油麻地金皇庭酒樓

活動：六七公祭後的飯局

吃飯的時候，我那一桌都在討論為什麼六七暴動還沒有被平反。

陳 YP：好像晚清的革命者到了民國成立還是會被追封烈士，所以道理上我們是愛國犯，一定會被平反。

眾人：（紛紛點頭）

石中英：我們何罪之有？反殖民何罪之有？我們是應該要被平反的，你看他〔手指指向高 YP〕，就是因為這個暴動罪的罪名，背了一輩子，這個案底……我們這樣做只是希望五星紅旗可以早一點飄揚在香港上空而已！現在五星紅旗已經飄揚了，但為什麼香港還沒有為我們的罪平反？這是沒有道理的。

高 YP：（默默喝茶，沒有回應）

我問高 YP：「YP 們是不是都喜歡《集結號》這部電影？我記得在哪裡聽過你講這部電影。」高 YP 說他自己是很喜歡。這部電影以一個名叫谷子地的軍人的視角敘述，講述

了他與他的小隊戰友在打國共內戰時，一直在前線等待後方總營的集結號號召。他們相信，總營在撤退的時候絕對不會拋下他們在前線，於是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前線全隊戰死。谷子地因此陷入了深深的內疚之中，他也開始懷疑，會不會集結號已經吹了，只是因為自己被子彈震聾了耳朵才沒有聽到，還害死了一整隊的戰友。谷子地作為唯一生還者，後來被懷疑是不是真的是軍人、甚至被認為是間諜，同時其小分隊也無法被正名。電影後半截主要都是描述谷子地的自我懷疑，以及為小隊正名的過程。結局，谷子地放下了憂鬱，他發現，當時撤退的本營確實刻意犧牲了他們，以拖延敵人時間，換取主營更多人活命，所以是「情不得已」、「為勢所逼」。

我：那你為何喜歡這部電影？

高 YP：就是很〔切〕中我的心……我看的時候是一邊看一邊哭，覺得很難過。難過的點是，到底我當年是不是真的有聽到集結號？還是根本沒有吹過集結號？中共當時是不是真的號召我們去搞革命、去死？我搞不清楚。

筆記：六七暴動過後，左派——特別是極左派——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像集結號谷子地那樣的難局狀態中。當年已經被挑起的反帝、反殖、反英的思想和情緒，在六七暴動後，該如何安放？當左派領導都不再鼓勵搞抗爭時，又該怎麼安置自己曾經相信過的抗爭理念和抗爭手段？左派領導在六七暴動後轉向保守、低調、韜光養晦，是有錯嗎？還是，中共欺騙了 YP，讓 YP 一直往前衝、搞革命？又或是，自己一直誤解了中共，退出暴動的集結號曾經吹奏過，但自己陷入了港英子彈射殺左派群眾的創傷中，才沒有聽到集結號？在沒有理解造反派和黨之間的張力底下，這些矛盾更會顯得尖銳難解，把他們推向一個難局。六七暴動之所以一直以來被說成是香港左派的創傷和禁忌話題，除了因為港英鎮壓的傷痛感、暴動附帶的污名，其實也因為這件事對左派本身來說，就是一個無解的難局吧。

或許，和造反派一樣，六七暴動既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也是在實踐中走到了毛澤東的反面——這也可能是毛澤東從未想過的一次擦槍走火。而毛澤東從支持造反派到打

擊造反派過程中，也可見是有所搖擺的。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個邏輯可以完全貫穿的人，他也在思考、在擺盪。當他的權力和影響力如此之大，結果就是文革也是在擺盪的：這一秒造反派被鼓勵實際地奪權，搞公社式的人民民主，衝擊一黨專政的官僚體制，推翻極權國家的政治體制，下一秒他們就被認為毛澤東收拾了。

而因為造反派反映了毛澤東的擺盪，而且對香港左派又有很大影響力，結果造成香港左派自己也是擺盪的：這一秒左派場景上下鼓勵群眾自發，繞過左派及社會本來的建制，以暴力推翻殖民統治；下一秒則是「復轉改」了。六七暴動和造反派，是這個擺盪下的產物，象徵著毛澤東理想的一面、高於權鬥的一面、激進的一面。然而，毛澤東最後推翻了自己的理想面，為了穩固黨在國家的權力，最後都希望保留原本的官僚及國家結構，他沒有走向造反派的公社化理想，而只是希望把原本掌權的劉少奇班子換下來或馴化。而造反派一旦超出他的這個打算，就被說成是「無政府主義」且被打壓了。

或許，如果造反派沒有被鎮壓，香港左派就會等來中國的救兵；也或許，如果造反派從來沒有出現過，香港左派根本不需要去搞革命、去死。而在集結號和革命號角的矛盾中，我覺得對左派來說，剩下唯一的真實是，你是否認同造反派想要結束一黨專政的理念？你是否同意武裝左派？你是否要反殖——不只是改變殖民政府形式上的統治、換個腦袋而已，也包括改變他們遺留下來的政治經濟結構？甚至走向民主、或是「大民主」？

陳 YP：「我愛國有什麼錯？」

吃飯時，陳 YP 跟我有以下對話。

我：你們當年相信社會主義嗎？真的相信反帝反殖嗎？

陳 YP：當年〔參與六七暴動〕反帝和反殖是其次，主要是為了愛國。而反帝和反殖的訴求也會隨著愛國和支持全面回歸而被回應。

我：那你怎麼「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說法？

陳 YP：遲早真的回歸了，一國一制了，就不需要再被利用了。

我：被利用不會覺得委屈嗎？畢竟我理解是因為要被長期利用，當年六七才鳴金收兵。

陳 YP：雖然有一點委屈，但這只是一個過渡期，而且委屈自己，為的是成就中共更宏大的建國大業。其實當年要徹底反殖、反帝，就是像讓中共來領導香港。現在只要支持香港全面回歸大陸，這些問題就會被迎刃而解。

在飯桌上，有 YP 提到 2013 年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原則，即「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也就是把文革與改革開放的矛盾懸置。面對這個議題，以下是我和陳 YP 的對話：

陳 YP：文革被鬆綁，我們的平反就有望了。

我：難道不會覺得中國大陸的「兩個三十年」，在道路上的確就是互相挑戰著彼此的嗎？現在還是你們想要的社會主義嗎？

陳 YP：我對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有信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見的正面成果。只要繼續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相信我們的愛國心總有一天都會被承認。而且你看現在修《逃犯條例》，現在中國對香港所做的各種改變，就表示香港是會改變的。只要全面收回香港，我們對平反六七的等待是會有終結的一天的。

筆記：（1）中共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六七暴動被終結的原因之一，也是 YP 們無法繼續抗爭的緊箍咒，但他們都相信只要愛國，這個緊箍咒總有一天就會被鬆開。而此刻忍耐的痛苦，其實對比起建國大業，也不需要過份執著。

（2）「愛國」是唯一使得六七的評論，在無論是冷戰還是後冷戰的語境下可以連貫的，可以讓當事人依存的一種說法。對六七暴動的心心念念，在愛國心的加乘下，也影

響了他今日對許多事情的看法——譬如他把一國一制、平反六七、支持政府修《逃犯條例》這些議題緊緊地扣連。

(3) 事實上，陳 YP 今日也是一名親建制的「藍絲」。直到今天，我還是每天收到來自他的 WhatsApp 訊息，內容大都是評論反修例運動的顏色革命性質，還有關於中國科技、經濟及國防發展的躍進和突破、或是關於平反六七暴動的資訊。

附錄三、周魯逸「悼包錯石並論世局」講座節錄

講座節錄

我是老左還是新左也很難說，我的思想是典型的新左。你如果沒有機會看西方新左翼那你就看我好了，我簡直就是樣板，我覺得自己像。但離奇的是，我的淵源、我的家庭背景是親共產黨的，但到了我成年一左起來，也就被稱和自稱是毛派——很少人說我是共產黨，就說我是毛派，因為毛派可以不是共產黨也可以是共產黨……

包奕明是我的亦師亦友……我這一代的人如果是從事學運或者是和文化界友長久淵源的人，都會聽過包錯石的名字。他的真名是包奕明。他本來從〔抗爭的〕事是在台灣〔開始的〕，因為他是台灣人嘛。他是高官子弟，小時候跟著家人去了台灣，他很早就思想左傾——他媽媽就去了延安。其實這是當年的國情，當年國民黨的家庭中也有人是會反蔣反獨裁……

包奕明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失落的人，他 82 歲〔過世〕，51 年都在香港……但他最早在台灣——用比較中性的話來說——已經是在「搞革命」的型態了。你說已經是「進入革命狀態」我覺得還是差一點——他到了邊緣就被破獲……但為什麼這樣的人後來會政治失落呢？

當然他一開始幾年不是這樣的，頭幾年我們搞保釣時他是我們背後的師爺，我是做出頭的那個。保釣運動三五個陣營，譬如我們保釣會是總的來說比較左的，但我們當中什麼人都有，我是〔當中〕比較親北京的……還有就是《70 年代》〔《70 年代雙週刊》〕那批人，他們兩個搭檔，一個是無政府主義，另一個說白了原本是國民黨黨棍，是極右派，後來變成托派。這是很有趣的。反而一路以來沒有變的是我這類人——阿包也沒有變……

但當整個中國的走向是這樣，台灣又是在這個中美關係裡面，一個思想左傾，又反美、又反帝、又反資本主義、又說自己是社會主義、但又不不是〔中國〕共產黨、又不願意緊跟北京——即北京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的話——那你可以有什麼

出路呢？〔說沒有出路也是〕包括我在內——其實我說阿包的時候我也是在說自己。

不過阿包還有一個「缺點」，對香港人來說他不是香港人，是台灣人。他心裡面，專制政治〔留下的〕的陰影很重。但這是我沒有的。到了這裡雖然我不會感謝英國佬，但英國佬的專制獨裁，在世界的專制指標來說是很低的。要不然甘地也不能用非暴力主義抵抗吧？……甚至，英國有些人都會覺得我是受到英式教育長大，只是有反叛性而已。那些左校的呢，就不是這樣的。細心的深層結構分析，或許真的有這些因素。因為我們講到最怎樣，到最後都是西方新左派而已，分別在哪裡？就是我們還是有個人本位，不會那麼樂意緊跟黨，我不會覺得〔緊跟黨〕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會比較看大情勢〔去選擇跟不跟〕，在某些情勢，譬如大戰當頭，你不要倒米，我們也是知道的，那就不出聲咯。但總得來說，是有批判性的，是其是，非其非。但中式〔傳統左派的〕思維就不一樣，他們真的會一直的跟。今日中國興起，將會面對的世界，其實在今日香港已經看到縮影。他們以為的世界是經濟發達就可以解決了，但香港你都搞不定啦，台灣你也搞不定……你怎麼可能搞定整個世界。¹

但阿包是台灣人，台灣這些左派，最大的分別是，他們在蔣介石的高壓下，他們是靠什麼去支撐著自己的左呢？就是寄望於大陸。他們消息封閉，當國民黨說到大陸地獄那樣的時候，他們唯有不信，然後就會理想化了大陸……但我們這些在香港長大的，文革的時候，荃灣的浮屍體我們都見過，我是真的看到過……我們在香港長大，1962年走了十幾萬人，我是年輕人，但大陸來了幾十萬我們當然知道。所以〔中共〕很多東西騙不到我們，但可以騙到台灣的左派。至於左校出身的那些，民建聯的那些，他們其實也是知道的，但他們在那個年頭是不理會的。但我是

¹ 周魯逸，《周魯逸（魯凡之）——悼包錯石並論世局（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JPM2HqhXkU>。

官立學校的，我們是會理會的，整個思想方式是不同的。結果就是，他們〔左校和民建聯出身的〕變成了選舉機器——當人大、當政協、當議員。我也經常說，我也想去人大政協說話啊！但我要用我自己的意志說話，你要我〔緊跟黨〕這樣說話，他們當然不找我。

就算我很客氣的說：「那我可不可以在邊緣打個擦邊球，在旁邊批判你一下？可不可以啊？」他們也會覺得不可以。但我已經很客氣了，說：「我批判了你以後我總體還是尊重你的，可以了吧？？都不可以！那我說來幹嘛？」……

就好像徐四民那樣，在不止一次的場合可以看到，他根本不是這個時代的人。他唯一的資本就是當年周恩來親自提名他當政協，但在我們這類人的思想裡面，周恩來提名又算什麼呢？根本不是考慮問題之列。但那些親共的系統裡面，會覺得我〔這樣想〕是妄自尊大，但我又不覺得自己是妄自尊大，因為我根本沒有這個觀念。我想怎麼所就怎麼說，如果那個場合不可以讓我暢所欲言，我根本就沒興趣說……好像林鄭月娥有什麼厲害的？她連照著稿子唸都不行呢。

自古以來，人都有不同的類型的。所以我還是覺得比較開放的社會是比較好的。有什麼〔異議〕就公開撼過〔論爭〕就好了啊！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不公平的——香港根本沒有真正的左派。雖然歐洲的左派政黨也不是真的左派，都變質了，但他們有一股勢力，譬如法國都有《解放報》，加入我是法國人，可能他們也會找我說些什麼、寫些什麼。但香港沒有左派，本來左派報紙應該算《文匯報》，但現在〔香港〕左派變成了最右的那一派，香港沒左派！

可能有人會問我：「譚耀忠是左派還是你是左派？」我當然會說我是左派！很多人以為譚耀忠是左派，但他不過是親中派，要把親中派和左派分開。若問我：「那你是親中派嗎？」我從來都是親中的，我不會給北京倒米。但我不緊跟北京。誰說親中就要緊跟北京呢？文革時候你緊跟北京不即便成緊跟四人幫嗎？當時他們〔左派〕覺得自己是緊跟北京而已，其實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緊跟四人幫，換了一個人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樣的。不過今日氣氛沒那麼緊張而亦，緊跟錯了沒那麼

大獲〔不是大的事〕，不像以前你跟錯了你就大獲了〔糟糕了〕。這是我們在香港看得很清楚的事……

其實所謂的左，就是對資本主義有批評、對帝國主義有批評，對現在最大的霸權美國有很多的批評，在現實社會也是同情中、下階層的，希望社會更多的公義。一般的左也是這樣，**不是說一定要緊跟共產黨的啊**。在西方你不跟共產黨，也有很多其他黨可以選擇。有社會民主黨、工黨的——雖然說這些黨一般都比共產黨要右一點。但後來共產黨自己都變得更加右了。這些共產黨一般都是發現革命搞不下去了，所以要走議會選舉道路，但你怎麼可能和那些已經搞了十幾年選舉的政黨競爭？結果就是他們都普遍走上了更右的道路。所以這是死路一條。法共到今天還存在，結果總統選舉只是拿到了 0.8% 的選票，托派都能拿 5% 呢！……

老包的問題也是這個問題。為什麼這樣的一個人後來會這樣〔政治失落〕呢？他如果當年〔在台灣〕革命成功，他就會是查韋斯來的，或卡斯特羅……雖然中國經濟已經追上去了，科技已經追上了一半了，但其文化構造還是落後的——老包未死前我們聊天時他也跟我說，而我是同意的，他說：「中國實際上還是一個封閉的國家」。

他問：「到底中央現在在鬥什麼？你們到底在鬥什麼？」是真的不知道的，大家都只能猜測，**靠消息推論**——好像《爭鳴》那樣。但你看美國，民主黨和特朗普鬥什麼，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還會有幾十頁的官方報告……**最低限度大家至少知道在發生什麼事。但中共現在在鬥什麼，大家知道嗎？**

不過，專權、集權，在一個情況下還是有理由的，那就是革命。等於打仗、戰爭、軍事狀態，總司令當然要集權。就好像為什麼船長權力那麼大？遇到危險，大家都可以講意見，但下決定的時候還是要獨裁。為什麼要 dictatorship？所以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很可能是翻譯錯的，dictatorship 可能是獨裁。不過，專政和獨裁事有分別的。專政是可以把對方消滅。獨裁的意思是決定的時候我決定——因為不能你一句我一句，但大家說完以後，總要下個決定。那怎麼下決定呢？西方式民主就是投票。結果其實脫歐也是大部分人決定的結果。

但馬克思說的 proletariat dictatorship 我覺得並不是不允許你說，其他階級繼續存在，但決策是由階級獨裁來決定，是階級的獨裁，不是個人的獨裁去決定的……

西方的多黨政治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好的，至少你不用搞得大家動刀嘛……但一個特朗普在美國、一個脫歐、一個歐洲難民問題，我們可以說西方的民主式政制也去到盡頭了。讓人民決定的結果就是這樣，還是需要領袖那樣的人。但也不是好像中國那樣說不搞選舉。選舉還是要選的。

我認為，地區層次、大城市層次是要直選的。但我覺得民主派也有不對，你不能什麼都要〔普選〕到盡頭，你明知道中共不會給你的時候，那是行不通的。我所理解的泛民，他們的認識的水平，是絕對不會接受「袋住先」（只要一半的普選），因為他們以為〔普選〕這個是不可動搖的，也不懂得透過理解整個中國的去香港問題。但我不一樣，你當然得從整個中國的政治角度去看香港。此外，有得選當然好過沒得選，但泛民也不可以理想化西方式民主。²

筆記

周魯逸詳細地比較了自己作為自發毛派和本地傳統左派的政治差別背後的原因，去說明自己為何並沒有像傳統左派那樣，時刻「緊跟北京」。這有周魯逸個人的特質原因，但此特質背後也有時代性——特別是他在官立學校的養成、與自發毛派包奕明的相遇，及西方新左翼的思想脈絡，讓他自政治啟蒙以來一直強調自主性和獨立性的要求。然而，這不代表他沒有任何政治失落。在講座中，他一直提到了包奕明的政治失落與自己的相似性，而這種政治失落最大的原因是在於，自發毛派在歷史發展中漸漸發現中共的封閉性，以及本地傳統左派對非出自自身系統的人的絕對排斥。

周魯逸從自發毛派出發，至今依然是親中左派中有趣的人物，他至今依然以左翼毛派自居，在許多其他作品中均有對中共改革開放後資本主義特性的批評。在政治上，

² 周魯逸，《周魯逸（魯凡之）——悼包錯石並論世局（三）》，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HV0-5XWTcw&ab_channel=chowlouyik

周魯逸依然信仰無產階級專政，但並不排斥要在本地要求更大層面的選舉。八〇年代，周魯逸是民主回歸論者之一，其民主回歸論的特色是有大量的中國分析和論述。把香港未來的路向放置於中國發展的框架中去理解，依然是他政治思想上的特色。

附錄三、2021 年 5 月 13 日雷競璇訪談

劉璧嘉（以下簡稱「劉」） | 請問雷先生是哪年出生的？是什麼時候到港生活？求學經歷大概是怎樣的？譬如怎麼入讀中大的？家庭背景對你當年的政治理念有怎麼樣的影響？

雷競璇（以下簡稱「雷」） | 我是 1951 年出生，鄉下是廣東台山。那裡是僑鄉，我祖父、爸爸都在古巴，是古巴華僑。當時很多台山人去古巴搵食。當時的華僑都是單身出洋，不帶家眷的。所以我是在台山出生的。五歲時跟祖母來香港。我是大仔，祖母先帶我來香港，不久之後母親帶我兩個弟弟也來香港定居。1959 年古巴革命以後實行社會主義，華僑搵食無機會，他們之前在古巴賺錢本來很不錯的，但之後由於國有化和推行社會主義，就變得很艱難了。所以我們家的上一代很痛恨共產黨。

1967 之後，香港的社會氣氛很反共。當時對我來說，無論是家庭還是社會氣氛，都是反共的。所以我小時候也很反共。

為什麼祖母帶我們來香港？估計是 1949 年革命後中共搞社會主義，充公農地，搞合作社，當時鄉下有條件的都是想走，我估計那是大氣氛，但我也不肯定。我懷疑我們家庭當時來香港也是 *stepping stone*，本來計劃從香港去古巴，我們上兩代人都在古巴，在當地是有基礎的。但我們來港兩三年之後古巴就發生革命，也只能留在香港。我們從大陸來港在當時是很 *common* 的狀況：大陸變成共產主義後有條件的都想來香港，沒條件的就偷渡、游泳。我們不用偷渡，是用海外關係申請過來的。來香港是很自然的。

我到香港之後就開始讀書，我們家在香港的最初幾年很順利，因為有祖父和爸爸在外面接濟，但古巴革命解放以後，禁止華僑將錢匯出去，我們在香港就變得困難了。我去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古巴家書》，收錄了我爸爸從古巴寄回來的信，從那些信你會看到，當時我爸爸最大的掙扎就是無法匯錢給我們，他很困擾，覺得自己無法幫助家庭。

來香港後我和兩個弟弟先在私立學校讀書，我媽媽比較留意讀書的資訊，知道當時有一個新的官立小學開辦，在蘇屋村，媽媽給我們都報讀了。當時我們在旺角住，去蘇

屋村覺得很遠。但那是政府學校，學費很便宜，師資也比較好。中學我也是讀官立中學，讀的是巴富街官立中學，也就是現在的何文田官立中學。不過，官校的情況就是學校禁止談政治，中國歷史只教到 1911 年就停了。英國人不想讓我們多吸收中國文化，也很避忌政治。

巴富街官立中學是一個中文中學，當時讀中文中學，會覺得被人歧視，別人會說：「啊！你怎麼讀中文中學啊。」我還記得，當時有個同班女生，是班長，又是 **prefect**，結果她中一學年結束就轉校了，她說：「讀中文中學沒有前途。」當時我很不理解，對我來說，讀一個用自己的語文來教學的學校，為什麼會沒有前途？而讀中文中學，升大學的途徑也唯有中文大學了。所以我後來就讀了中文大學。

我中學喜歡看課外書，當時看《中國學生周報》會有觸動，覺得國家很多問題，但該怎麼搞呢？《中國學生周報》會觸動我去留意外面的事情。

另一個有趣的事是，由於當時我們有華僑背景，所以有能力在旺角買樓，後來家境不好的時候我們把兩個房間租出去幫補家計，其中一個租戶有個男孩在德明中學讀書的，德明中學和大同中學都是右派學校，這男孩自然也很反共，常跟我說反共的道理，這加深了我的反共傾向。

我中學成績很好，所以入大學沒有問題，很順風順水。中學階段我很乖，沒什麼反叛。政治意識的啟蒙是入大學才開始的，很短時間一下子發展起來。

劉 | 請問雷先生當年參與保釣，是什麼契機？

雷 | 其實我中六就參加過一些社會運動，主要是中文運動，但當時還不敢積極投入，因為六七暴動以後，公開集會都是非法的，會覺得很危險，沒真正地走出來。

但進了大學，我就開始參與運動了。入大學很有解放的感覺，脫離父母的控制，覺得自己很自由。當時中文運動還未結束，有一個拳頭 **T-shirt**，不知道是誰弄的，我當時也買來穿，穿著就覺得很有型很威風。中文運動時，我已經積極參與，覺得將中文作為官方語文是天經地義。我當時是單純的參與者，開始時去靜坐也很擔心，擔心被拘捕，

但也會去。

第一年入大學還有一個很影響我的事，就是反越戰。當時有一個老師是美國人叫 Mr Knowles。他是教英文的，很喜歡談政治，他在美國應該是新左派，教書以外他還帶我們去美國領事館示威，反對越戰。當時我就跟著他去。當年美國領事館和現在的守衛森嚴很不一樣，當時是開放形式的，內裡有一片草地，參加示威者就坐在草地上彈吉他唱歌，我當時發現，原來集會可以那麼自由、奔放、沒有恐懼！那次示威的體會很深。聽說 Knowles 回到美國後從政了。以上這些都是保釣之前的事。

很多年以後英國有些檔案解密，裡面有些檔案是香港政府向英國報告香港狀況，裡面就提到香港政府對兩股力量很擔心，一個是怕香港左派滲透大學生團體，影響大學生思想，另一個是害怕西方 new left 力量在香港策動學生運動。現在想起來這個美國老師 Knowles 應該是屬於 new left 背景的。

保釣一開始我就很興奮，覺得找到機會可以自己行動。我這個經歷在當時大學生中有一定普遍性。作為積極份子的朋友裡面，大概都是像我這樣的經歷過程：早期反共是代表你留意政治，到一定時機就會看《中國學生周報》，看文藝刊物，想要在文化與語文上進修自己，但又覺得社會上很壓抑，很想做點有意義的事。我當時是活在這個氛圍之中。

劉 | 雷先生作為學聯組織七七遊行的負責人之一，可否回憶一下當時學聯為什麼會突然下水？

雷 | 當年我們不用加入學聯，因為如果是中大、港大、浸會或者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自然成為學聯會員。我們每年都交會費給自己大學的學生會，裡面有一部分會轉給學聯，所以每個大學生都是學聯成員。所以我不是以個人身分參加學聯的，是以中大學生會的成員身分而成為學聯會員。我自己接觸學生運動是從當《中大學生報》編輯開始的。當時我們有一個小圈子，是比較積極的份子。內中有崇基學生鍾倫納，他後來當上了學聯會長。我一開始參與學聯的保釣小組是擔任宣傳組組員，具體參加過程我現在已記不起

來了。不過到了準備七七示威的時候學聯要找三個人負責，我就成為負責人之一。但在七七之前，已經有過一連串集會、示威、遊行，有很多次上街抗議。

關於為什麼由學聯來主辦七七示威，而不是保釣會或聯陣，我已經忘記了。籠統的趨勢是這幾個保釣團體不斷分分合合，具體過程我不記得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主要有三個團體。第一個是保釣會，代表人物是周魯逸，吳兆華。他們這個組織政治性很強，民族主義很強，很早已經認定要肯定社會主義中國。香港當時還很反共，但他們已經有肯定社會主義這個判斷。二·一八示威是他們發起的（這是香港保釣運動的第一次示威行動），當時覺得他們很有膽量。因為他們承受的壓力真的很大，去遊行的話，政府是可以拉你、告你的。所以他們都做了很多準備，譬如把標語分別縫在各人衣服上，用外衣蓋著，到了示威開始時才將外衣打開露出標語。我事後看報紙，看到他們的示威行動，很驚訝，很佩服他們的勇氣。這在當時的社會是極不容易啊。

第二個保釣團體就是吳仲賢他們的「陣線」，他們政治上比較早熟。記得岑建勳當時和吳仲賢很要好，以《70年代雙週刊》為基地。理念上有比較強的國際主義，也受到新左派思潮影響。他們看到保釣是契機，覺得可以通過保釣動員民眾參與吸收會員。他們的特色就是政治成熟度比較高。

第三個保釣團體就是學聯。其實學聯主要是一腔熱血，相對另外兩個團體來說是不成熟的。不過學聯有其優勢：保釣活動很需要群眾，學聯群眾最多，很容易號召人來；另外，我們人手又多，譬如派傳單等工作就需要不少人參與；而且，學聯還有場地和經費；最後，又出師有名，社會上聽到是學聯的活動，都比較關注和接受，當時大學生人數很少，我們被認為是矜貴的，是有理想的份子，所以有種天然的號召力。但是，其實我們在三個團體之中理論最弱，我們靠的是民族感情，當時的感覺是香港政府高壓，又覺得日本侵略我們，忍無可忍，就是這麼一種情緒推動的。

所以吳仲賢說學聯保守，那是真的。當時一起開會，吳仲賢他們有很多主義、很多分析、很多形勢判斷、很多一套一套的論述，說得很多，我們無從反駁，但是又不怎麼相信。其實當時學聯的積極份子害怕被人拉著走，也很害怕激烈的行動。所以我印象中，三個保釣團體是合作少，紛爭多。

大學生內部也有紛爭，譬如，我就記得五·一三示威的時候，港大學生會到最後階段臨時退出，原因是怕得不到政府批准，成為非法遊行。我們中大學生比較激進。中大、港大動員能力最強，但港大是天之驕子，是香港的菁英，比較親港英、比較怕死、比較保守，應該是因為很多人畢業後想要做官吧，所以港大學生很多行動都很猶豫。師範學生最怕死，因為他們畢業之後要做老師，怕生事端，影響前途。浸會是私立大學，很多學生都要兼職搵食，也不積極。中大的我們，則是二奶命，中大沒那麼多人想做官，壓力少點。

至於天主教大專聯會和大專同學會，後來也退出五·一三示威，為何退出我忘記了。但是這兩個團體一向是比較次要的角色。天主教大專聯會由信奉天主教的大專學生組成，人數比較少。大專同學會我不太了解，但也是成員不多。兩個會都是經費少、人也少的組織，成員是自願加入的。在我記憶裡面。他們退出五·一三示威，主要是顧忌行動不合法，怕付不起代價。

不過，學聯其實在五·一三示威之前也很多掙扎，怕被抓，會長鍾倫納也怕招惹官非。我們幾個是比較勇的，一直推著學聯走。其實就當時大學生的總體氛圍來說，真正願意參加的學生也是很少的，雖然同情運動的不少，但參加者不少是覺得朋友之間「你去我才去」，真正的積極份子人數甚少。七七以前，社會上反對遊行示威的力量很大，學生會領導人都很害怕。可能現在看起來會以為我們當年義無反顧，但實際上並不是這種狀況。我們要面對父母的壓力，父母都反對子女搞運動；同學也覺得不要搞比較好。七七之前，輿論幾乎一致地譴責學生運動。所以，學聯、學生會負責人當時顧忌是很自然的。當然，你也可以說他們很難得，頂著那麼大的壓力還敢挺身而出。但實際狀況就是，站在社會運動第一線的人是很有限的，心裡也不免害怕。

劉 | 在學聯籌組保釣行動的過程中，和海外保釣團體的關係是怎樣的？譬如，有什麼具體接觸？什麼人和海外保釣組織有具體聯絡？海外保釣的論述怎麼流到香港？這在多大程度影響不同的團體？

雷 | 我們和海外保釣團體的接觸很少。如果要確定有什麼聯絡，可能要去中大圖書館看看資料。今年是保釣五十年，我把一批資料交給中大圖書館，裡面包括學聯的會議紀錄，也有幾份加拿大、美國、英國的保釣刊物。

比較有聯絡是 1971 年暑假吧，當時有部分留學生回來香港，搞了一個聲討大會，聲討美國、日本。當年和海外聯絡是靠書信，沒有今日的各種通訊方式，所以和海外保釣團體很少聯絡。但那個暑假，的確有和海外保釣相關的活動。

至於說中國統一的立場，一開始討論統一時，沒有明確說要和中華民國統一，還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這方面的關注很不明顯。台獨是誰都反對的，那是當時不用討論的東西。但反台獨在當時不代表要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要認同中共還是國民黨，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 issue，這也是毫無疑問的。唯一大家可能會有分歧的，是如何統一，譬如和是和解、談判還是打仗？但當時沒有什麼深入討論，譬如統一也可以是反攻大陸、光復大陸。大家都是同意統一才能一致向外，這是一個很天然的結論，是一個 consent。

1972 年，因為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氣氛的確有了變化。但我自己的記憶裡，在統一運動的討論中，到底是認同中共還是國民黨的爭論是不明顯的。香港對待這問題並不像美國保釣運動那樣需要迫切地選擇。美國保釣有很多台灣留學生參加，他們要面對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看到台灣國民黨政府依靠美國、依靠日本，而且在保釣行動中，台灣特務也打壓很厲害，他們被說成是共匪，很氣憤。所以他們很早便有這個困擾，覺得國民黨很不妥。因此，他們就有了是不是要考慮一下共產黨的想法。海外保釣後來有幾個主要成員去了北京訪問，影響很大。但這種氣氛在香港不明顯。我們面對的打壓是來自港英政府，是被第三方打壓，不是被中國人自己的政府打壓。所以我們講統一的時候也很單純，反對台獨是理所當然的，但沒有海外保釣那邊那麼大的困境和掙扎。

劉 | 在學聯籌組保釣行動的過程中，和其他團體，譬如保釣會及《70 年代雙週刊》的關係是怎樣的？現在看起來，當年保釣會比較傾向統一運動路線，而《70》則比較主張反殖。兩個團體經常傳出不和，請問學聯怎麼看待這些路線的不同？學聯和其他團體的合作中體矛盾點在哪裡？有怎樣影響之間的合作嗎？還是依然可以和而不同地繼續推進工

作呢？

雷 | 學聯內部開會的時候，談的較多的是實務性質的事情，發表意見、理論和批評不多。我自己是比較積極的人，也偶然參與辯論一下，譬如討論一下是不是要服從殖民政府的法律之類。

如果和其他團體開會，就會有一些爭論，我記得學聯成員當時在理論上處於弱勢。因為吳仲賢等人總是有一套套的論述，我們說不過他，但又不想那麼激進，不想付出那麼大代價。比較單純的一批學生和一批成熟的政治人物之間，難免會有不信任，我們會擔心自己成為他們的馬前卒。我的理解是：吳仲賢、周魯逸等人是有志投身於政治的，是要走政治道路的；我們大學生只是以一種責任心來搞保釣，覺得責無旁貸，覺得自己是大學生，有條件搞運動，如果不搞的話對不起情勢，但也是很單純的情操，沒有政治上遠大的構思，也沒有他們的政治志向。我們當時搞保釣，其實不覺得需要講大理論，而吳仲賢講的很多理論，其實又說服不了我們。同時，他們要靠我們大學生打頭陣，不能沒有我們。大家之間會有拉扯。

至於領導保釣會的周魯逸，他其實是我中學的師兄。我理解他也是全心全意投入政治的人，想要做一番事業。他們早就信服了共產主義，傾向統一。同時，他們有政治敏感度，不過他們在香港的同志很少，搞保釣同樣也不能沒有我們。他們的主張離開了學生可以接受的範圍。譬如我當時還是相當反共，很晚才放棄反共立場。那對的我來說，保釣會擁共的立場，我是無法一下子 180 度轉變過來接受的。

如果說當時這兩個團體誰對大學生比較有影響力，那就是吳仲賢相對上比較可以影響我們。周魯逸和我們關係比較疏遠。但對吳仲賢，我們這些大學生還是會有一點猜疑，我們會猜疑他們的動機。因為當時覺得搞保釣不需要那麼多的理論。

劉 | 關於陳以衍，劉山青說揭露社暗地成立馬列黨，你怎麼看？

雷 | 陳以衍是崇基學生，讀英文系，副修哲學。他是揭露社的成員，但揭露社其實很單

純，就是要揭露社會上的問題，我沒有感覺到他有托派傾向。

他一開始就參加保釣，很堅決的一個人。我們曾經一起去面對吳仲賢，他覺得我們不需要吳仲賢那些一套一套的論述。所以我對劉山青的說法有點保留。

陳以衍基本上是行動派人物。譬如在盲人事件中，他很活躍，因為他英文好，就去幫忙盲人翻譯，是很 **devoted** 的人。後來他去了美國，在唐人街組織車衣女工公會。這幾年我沒有和他聯絡，但記得他不是搞理論的人。

劉 | 關於關品方，你有什麼印象？

雷 | 關品方是典型的港大學生，1971 年港大學生會的副會長。可以說他是天之驕子，說話比較官腔，談吐很「骨子」，但有點「怕死」。我的理解是他很想進步，但同時很顧忌，所以開會時會比較主張我們要對港英退讓一點。我當時不認同，認為難道港英不給你示威你就不去示威了嗎？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沒有出現保釣運動的話，他這樣的人一定會變成 AO（Administrative Officer，政務官）（笑）。

劉 | 保釣以後你去了哪裡呢？

雷 | 五·一三以後，大家都覺得沒有下一步可走了，沒有了共同目標，什麼都做不了，學生突然之間沉下來。下一步該怎麼走？保釣時有人就說保釣沒有前途，但我們當時覺得不迫切，覺得還是搞好眼前的保釣就好了。這也是為什麼反殖還是統一這個分歧，在保釣中沒有形成明顯的衝突。反而是 1972 年五·一三之後這些路線分歧才顯露，結果出現了國粹派和社會派之間的爭論。

我 1972 年當中大學生會會長，上任時寫過文章，就表示過對下一步怎麼走很困擾（刊登在《中大學生報》）。當時國粹派主張要認識中國，我們無法認同——因為，面對香港殖民地那麼多不平等，難道就壓抑下去不去面對嗎？眼前的事情怎麼可以不做？

其實保釣以後社會派很快就投入反貪污運動了。那是承接著保釣的勢，大家覺得找

到了一個具體的目標，可以凝聚一些人。當時大家都覺得，保釣開了一個頭，人們可以開始示威遊行了，政府至少讓你去做一點反抗行動。當時發生了很多次社會行動，是保釣後對香港社會不公的宣洩。反貪污在當時的社會運動來說，是很重要的，難得地得到社會支持。不過 1973 年我們還是被檢控了。當時警方不是在現場抓人，而是拍下照片，事後上門發傳票給示威或遊行參加者，敲門要你簽收，要你上庭。說來很好笑的是，那個給我的告票上，我的英文名字又錯，中文名字又錯，我其實可以說這個人不是我，因為名字錯了，就不去上庭。但當時我沒有這個想法，覺得既然做了就不怕承認。如果我媽媽知道我被告，壓力也很大，於是乖乖就將傳票簽收了。到了法庭上我還說，你們把我的名字寫錯了，他們就說「是嗎，那我們再更正」，到最後罪名成立，留了案底。

我後來去外國讀書，所以對於社會派和國粹派的紛爭沒有很了解。但後來看紀錄，知道學聯 1974、1975 年曾經通過支持打擊右傾翻案風、攻擊鄧小平，當時學聯很左啊。不過社會派和國粹派的紛爭到了 1976 年就完結了。四人幫倒台，國粹派看到中國大陸政治的黑暗面，看到文革的可怕一面，覺得沒有辦法自圓其說，就沉靜下去了。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在麥理浩領導下進行改革，社會派的訴求都被英國佬滿足了，反殖的訴求變得沒有吸引力。這兩派的對立不過是兩三年間的事，很快就結束了。

劉 | 回看七〇年代，你會有什麼回顧性的總體分析嗎？

雷 | 其實，香港社會運動以風氣而言和世界很有呼應性，法國、美國等地當時都有學生運動。當然之間沒有串聯，但那個氣氛是大家都感受到的。這是一種時代的感覺：戰後重建，大家逐漸忘記了戰爭痛苦，但對現在體制的發展有期待，認為應該是一個更理想的局面。但看到了越戰，看到了那麼強大的美國欺負小小的越南，覺得很有問題。老師教我們反越戰，教我們不能以強凌弱。這種氣氛其實在《盤古》等刊物時也可以看到，大家都關心世界現體制是怎麼一回事，那個觸動很有全球性。保釣也是在這個觸動下發生的。

附錄六、2019 年 6 月 8 日梁國雄（長毛）訪談

參與者：長毛、石中英、劉璧嘉

長毛 | 李怡、劉銳紹、程翔、麥炳良，這些人以前都參加過國粹派的運動，後來程翔一說到共產黨就咬牙切齒。

石中英 | 麥炳良當年是第一團去北京的國是學會，那些旅行團都是中旅社搞的。

長毛 | 他用「麥華章」這個筆名也有很多政治決定。

其實一個宗派很多時候都是先從身邊的人發展關係。革馬盟比較多發展群眾運動。《十月評論》就是小圈子，因為他們是地下黨，而革馬盟是公開的。我們托派當年採用了歐洲六八學運的「群眾先鋒」理論，托派覺得要在群眾裡建立群眾先鋒，然後組織群眾先鋒。所以用這個策略，我們就不停地介入社會運動。革馬盟比較像是宣傳性的團體，但它是介入運動的。《十月評論》就是出版刊物，是內聚的。

石中英 | 法國會有人來嗎？

長毛 | 很偶然會有人來。

革馬盟是 1974 年成立的。《70 年代往何處去》這本書很重要。是雙山、向青對《70 年代雙週刊》的看法。《70》有兩批人，一批去了法國，就是吳仲賢他們。他們見了第四國際的人，也有見老托派彭述之，但其實他們不喜歡彭，覺得他喜歡教訓人。鄭超麟也稱呼彭是「夫子」。

本來根叔——也就是雙山——也有〔從大陸〕來香港，但第四國際寄東西給他，結果被港英政府攔截下來，直接遞解了他去澳門。英國佬有他們處理政治犯的邏輯。老托派以前會一個假地址，譬如某街只有 200 號，他們就會寫 201 號，然後在那裡放一個郵

箱，郵差就會放進去。雙山就笨了，他在中央郵局弄了一個郵箱，政府看這個郵箱經常有外國的信，就攔了下來查。

雙山 1975 去了英國，Essex 請他做客席教授，就變成了 political asylum，但是他又對社會有貢獻，就是變相歸化成英國人，留下來了。

托派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分歧是，鄭超麟相信國家資本主義，覺得世界大戰美國一介入，就應該採失敗主義，而不是抗日，對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無產階級應該採取失敗主義，他的這種意見是少數的。彭是多數。說分裂也好，開除也好，總之兩方就分開了。多數派和少數派是抗戰時就發生〔分歧〕了。具體的分裂是 1941 年 11 月太平洋戰爭以後，在 1942 年。少數派覺得那個時候開始，已經變成世界大戰，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何必摻進去呢？太平洋戰爭之前抗日是沒問題的，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抵抗日本侵略很合理。但中國不是帝國主義國家，沒有資本輸出、沒有金融資本，因此不應該加入世界大戰。

共產黨勝利之前，多數派的 RCP——中國革命共產黨——就走了；少數派大部分留在了大陸，老毛〔毛澤東〕在斯大林生日〔時〕給他獻禮，抓了那些留在大陸的托派。托派大逮捕就是斯大林生日那天，是 1951 年年末。抓了以後，香港那一半托派也感到不妙了。香港有廣西系、溫州系。

托派運動歷史很有趣，很多人〔之前被國民黨〕抓了以後去不了上海，就留在老家。桂系就是廣西的，他們和國民黨不和。廣東中山也有很多托派。最後就是上海，他們在租界裡面，國民黨抓不了他。

話說，蔡和森就是在香港大館被抓的，我覺得應該要紀念他，當年就是英國遞解他給國民黨抓的。英國人所謂三權分立是假的，你看空間的設計就看到了：大館、域多利法院、域多利拘留所也就是監獄，都是一條龍的。根本沒有真的 separation of power。

陳寶瑩在 1975 年很年輕時就加入托派，她是讀培正中學。她當時被《左岸》吸收，《左岸》裡面有托派，但不都是托派。四反運動以後，內部被打散，很多托派走了，譬如岑建勳。吳仲賢把國社青變成革馬盟。1974 年，《十月評論》很多人就搞了《左岸》，另一些繼續搞《十月評論》。老托派在五〇年代就被壓迫到地下了，息微了

很多。他們看到年輕人出來以後，很積極地介入。首先是《70》。四反四不交你知道嗎？

劉璧嘉 | 知道，我看過《他們如何反對托派》。

長毛 | 當時石中英在「風華版」批評托派。其實我很喜歡《新晚報》：波經又好看、「風華版」又好看。

石中英 | 羅孚思想比較開放，他後來也被人批。《新晚報》很另類。羅孚死了以後也沒有人肯給他主持追思會。羅海星搞民運，被人抓了，唯一一個黃雀行動的香港人這樣被抓。坐了五年牢以後得了癌症，大家都不敢給他搞追思會。

長毛 | 他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被人跟蹤。我覺得，他有癌症是因為坐牢的地方有輻射性物質。劉山青也曾經在懷集坐過四五年〔監獄〕，那裡也有放射性的礦，劉是檢回了一條命。

石中英 | 後來他放出來了。

長毛 | 是香港人聲援，要放他出來。

石中英 | 羅海星不是英國人，英國首相叫人打電話給我，要見羅海星。當年是很大的事情，人變成了籌碼。

長毛 | 羅孚當時太相信共產黨了，沒有把報紙變成生意。金庸都有做個《明報》嘛。

劉璧嘉 | 1974 年四反時的批托是怎麼開始的？

石中英 | 六七之後工聯會搞復轉改，其實已經沒有搞工運。我還記得在雅雲電子廠外面，看到有人在搞運動，我很好奇過去看，就看到紅旗和黑旗在飄揚。

長毛 | 其實黑旗是《70》帶來的。當天拉了兩個人，一個已經死了的是傅佬炳，另一個是雄仔叔叔。他當年在那裡靜坐，後來去了歐洲，你可以去問他。

我是 19 歲 1975 年入托派的。我有個朋友姓駱，他現在已經沒有搞運動了，是他首先叫我看那些托派的書。他說：「你看看這些書吧。」包括了《十月評論》、《中國革命的悲劇》、《他們如何反對托派》。我就開始看了。他其實一輩子都不是托派。《左岸》是托派的外圍組織，你進入裡面以後，也是會知道有一些人是托派，但主要是靠親和力，透過十幾二十人在日常相處，大家一起工作、相處、開會，慢慢思想就會轉變。當時《左岸》裡面有一些是朋友，有一些是兄妹，有時候是一家人都是托派的。《左岸》反資、反殖、反官僚，就是左翼刊物。

劉璧嘉 | 裡面有老托派嗎？

長毛 | 有，焚火，姓陳的，我們叫他老陳。他是真的姓陳，但不會說真名，因為他們經歷過清洗和鎮壓，所以都用假名。革馬盟裡大家都知道大家的真名，但也會用別名，我們叫「校名」。對我們來說，黨就像學校一樣，進了黨就會有校名。我的校名叫做梁鳳嬌，所以猜不到我是男生吧。其實毛派也是這樣的。這真的有用，當年沒有電腦，有假名是有用的。

《十月評論》、《左岸》、《每日戰訊》，在四反四不交的時候就有了。《左岸》取材於法國的左岸，應該是陳喬英改的，一聽就知道是一個很文青的名字。《左岸》用的是社青社的地址。當年也有組織，是「十月書局」，在新蒲崗。

劉璧嘉 | 是為了靠近工人嗎？

長毛 | 是的。因為新蒲崗就是六七發源地，很多工人都在那裡打工。我們四反四不交也是回到了現場。

社青社就好像共青團的概念，青年才可以加入；RCP 已停了很久；《十月評論》復甦、重組；《70》是泛左翼，青年看到美國青年激進化運動，對社會有一些不滿，覺得香港也可以這樣搞，比較著重 direct action。楊寶熙也去過《70》，她雖然後來是國粹派，但她是比較開放的。

六七暴動以後，英國殖民政府搞懷柔改良，認為要有香港週那些東西，要有香港意識。中運是六七後的第一個大運動，很多人都有參與。基督教協進會下面有很多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工業委員會，當時很多工運，沒有人做，他們就來做。青年激進化運動的 revival，是托派的脈絡，但 direct action 以後要有什麼信念呢？

當時說中國革命不是很遙遠的東西，不過是 30 年前的事情。所以當時大家都要去解釋，為什麼中國革命會成功？托洛茨基的分析是很好的，認為社會主義的突變成了官僚主義，所以好像人生了腫瘤就要割瘤，而不是殺掉整個人。托派不是要除掉整個中國社會主義，譬如國有制，他們覺得好。所以我們收人，都是從中國革命開始討論。《中國革命的悲劇》是我們經常會看的書。二〇、三〇年代的中共領導人變得很快，瞿秋白、陳獨秀等都被換掉了，瞿秋白後來被第三國際吸收了。斯大林後來主導把整個黨俄國化，彭述之是當時的領導，鄭超麟很看不起彭。當時有幾個問題，中共為什麼會變惡魔？1925-1927 年，中共已經被斯大林主義吃了。所以我們收人第一次就是講這些。老人家陸續翻譯了很多這些資料給我們。1975 年，我進入了 YCS。我們雖然是屬於彭那邊，但並不是很重要，革馬盟的總部後來也用了《十月評論》的總部，在崇齡街。《每日戰訊》後來 1975 年去了土瓜灣。

石中英 | 我記得我們一起去看大會堂的中國周展覽，在皇后碼頭那裡遇到對方，有了一些辯論。

長毛 | 但我當時還不是托派。我倒是記得你〔石中英〕到最後說：「希望你以後不要做『背叛中國人民』的事情。」我當時就嗅出來，他應該是毛派。毛派就是要提防反共反華反人民嘛。那我一定不是反共反華反人民，我是支持共產主義的。我當年其實是毛派，所以我要過那一關，我在想的問題是：「到底社會主義是什麼？」意思是，反殖民主義和反對資本主義——我們已經有完全的認識。但我們要想的是，如果要社會主義，那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想要怎樣的社會主義？一國能否建立社會主義？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不是社會主義？關於這些有很多解釋，其實有官僚雜產主義——這是王凡西的說法，是用美國社會學家布肯南的說法；就是資本主義是多餘的，管理層是一個階級。鄭超麟的說法是國家資本主義。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無政府主義。當時百花齊放，我們需要一個書店，才可以聚起人來。《70》也有紅黑書店，這樣才可以聚集人。馬列主義的教義是，要組織先鋒黨來聚集人。不過，我們認為可以有派別，在工人裡面、在托派裡面都可以允許有托派的爭論。

當時的青年普遍都是要找一個答案，在當時生活就會感覺到……譬如 1970 年反貪污捉葛柏，莫昭如也有參加。當然相信社會主義是少數的，我們那一輩年輕人都是這樣的，只看有沒有機會被點燃。當年只有兩個大學，你說年輕人有什麼出路？理工是 1976、1977 年才有；有錢人可以去浸大——但那也是少數。有些人覺得香港必須要改變，這和西歐很像，但西歐規模大，他們有左翼的政黨，社會黨和共產黨一開始並不是很支持 68。1945 年打完歐戰，1945 年出生的，在 1945-1968 年期間長大的戰後第一代，就會覺得世界要變。他們會說：「不要跟我說什麼冷戰。」——就好像三四年前的香港本土派、獨立派，他們覺得自己是新生的，自己要說話。

但香港沒有左翼政黨，所以有火一燒的時候其實沒有辦法被黨去 absorb。六七和香港社會也是疏離的，當年大學生沒有參與在裡面。這和港英的策略有關，暴動以後就懷柔改良，建立香港人意識，對政治的壓迫稍微鬆一點。保釣當年都是碰孫中山，大家都是在追辛亥革命。因為老毛蔣介石都不可以，所以要碰孫中山。所謂性格決定命運，但性格如何決定命運和時代有關。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中共是不是社會主義也是一個大問題。1975 年我已經覺得自己是社會主義者，是毛澤東形式的社會主義者。

但看書看到中共做了這些東西，自己很容易被 trigger。就像看了《國家與革命》以後，覺得裡面說的巴黎公社原則在哪裡？事後看很多資料以後，會覺得文革激進派是可取的，他們認為有走資派，要打倒新生資產階級。托派說老毛不是資產階級，但是是一個 caste。我覺得說得很對，社會主義沒有錯，共產黨錯了。我是毛派為底的，更加一拍即合。省無聯楊犧光的《中國往何處去》就是用毛澤東去革周恩來的命，毛澤東先把他給杜絕了。回看當時，《70》有逃港紅衛兵，譬如黃望潮、吳甦和虞雪不是馬克思主義，是比較無政府主義。吳甦和虞雪後來也走了，吳甦去了法國，在第七大學吧；黃望潮後來瘋了，死了。

在接觸托派之前，大家都會知道一點無政府主義。《70》是有鬆散組織，但沒有真的組織，所以做不到事。他們四反以後就無以為繼，很快 decline 了。他們其實沒有在輿論上很厲害，但是在年輕人圈子裡面很厲害。

其實火紅年代，也不過是很小的火。香港人自己也不知道。大家搞搞震，但都是青年而已，是青年激進化的餘波。如何迎接青年激進化餘波是第四國際很重要的分析，第四國際認為要建立一個「紅色大學」的策略，意思就是要以大學作為根據地推進革命。這個說法當然是錯的，在香港不會發生。因為歐洲很多大學，香港很少大學，歐洲大學生多，出來也是無產階級化的。但香港兩所大學而已，大家出來都是天之驕子，激進一下去做政務官了，走出來就已經是人上人了。西歐不是這樣，不是 upper class，所以個人心理狀況也是這樣來的。窮人讀大學當然會激進，但出來以後不用當窮人，就不會激進了。因為所謂大學生的貧困、大學生的無產階級化西歐六〇年代就發生了，香港不是，而且香港只有千多大學生。我自己是工人階級出身，知道這個制度無論如何就是不對的。但我同輩的窮人很多都不是這樣，人都會隨波逐流。

石中英 | 我爺爺是買辦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敵人。我爸爸沒那麼糟糕，是教書的、做生意的。我外公是民族資產階級，解放後捐東西給大陸，但也是建制。他是 1929 年創辦保良局和東華三院的人之一，是何東找他的，他沒有錢，但肯做，就做了 CEO。

長毛 | 沒有錢，但有面。

石中英 | 對，但這樣看我其實也背叛了自己的階級。他們說共產黨害死了全家，我親共就是背叛了家族。我曾祖母在順德是地主婆，是階級敵人。

長毛 | 共產黨的大部份 founder，其實都是背叛自己的階級，要不然幹嘛要讀書呢。當年讀完小學就是知識份子，讀完中學一定是背叛自己的階級。那些人可是中學生、大學生，一定是背叛自己的階級。

石中英 | 所以不要相信共產黨，都是知識份子而已。

長毛 | 也不是這樣說的，共產黨在 1921-1927 年死了很多人，長征也死了很多人，後來吸收了很多軍人、農民。瞿秋白也死了，白區上海的知識份子死了多少人。這些被殺的都是知識份子。所以要理解當時的 psychology，你要理解人和背景。

很老實說，記得有一個人教我——但我忘了是誰——他說，用鐵來烙你的手，一百個人都會叫「啊，很痛」；但是如果用羽毛來搔你的手呢？一百個人會有一百種感覺，很美妙、很癢、什麼都有。但革命是什麼？革命就不是羽毛，我們革命份子都渴望革命的到來，以為很美妙，但革命其實是那塊鐵烙。革命來的時候，革命者會首先死。

不過，這不是最大的悲劇，**最大的悲劇是革命來了以後，你發現革命錯了，這個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劇**。所以很多人參加了一半革命，就會突然發現，真的不對路，然後就不搞了。或者有些人覺得他們的人生不值得為了一場無我的革命而犧牲，那就會放棄。**革命是很嚴肅的事，是會死的，會連累你周遭的人**。我們參加革命黨的人看到的是，為什麼青年運動那麼快就死了？很多人參加革命都是少不更事，聽了看了革命都是從書中，不是自己經歷過的，沒有試過被捕、坐牢、槍斃。1979 年我坐牢，在新華社示威被判了一個月。那天放監後有個簡單的歡迎會，有糖有餅有汽水，樓之春跑來跟我說：「今日雄

仔終於上了幼兒園」，革命的大學，還有很長的時間。我看到了，我上的就是幼兒班而已。

黃台仰說要搞魚蛋革命，後來為什麼不革命？因為付出不了啊。改變社會有很多方法，但革命是先用破壞的方法去改變社會，是一個很特定的方法。文青也是改變社會的方法。但馬克思說，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讀的時候很爽，做的時候很難。馬克思很注重知行合一，實踐是很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此岸性和彼岸性。但馬克思主義也很教條。

這在實踐上就會很難，所以就有了職業革命這個說法。職業革命的意思不是收錢搞革命，而是你的志業就是革命，就算你一息尚存，你在哪裡都要搞革命。譬如你在外面找到三個人，就要成立黨支部，繼續搞革命。**這對人生來說是很痛苦的。我結婚了、戀愛了，那我住在劏房，繼續說我相信馬列主義，要為全世界做事，那怎麼辦？當實踐和理論如果可以界分開來，當然最好。但如果一個人說要休息三年，那就是當了三年的叛徒。所以為什麼列寧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會扭曲人性，因為他和人性是相反的，沒有人喜歡死、喜歡坐牢、喜歡對不起自己的家庭，每一個人都喜歡吃好吃的。但資產階級法權底下要貨幣要找錢、要吃好吃就要賺錢。這對托派來說是永恆的問題。譬如說去讀書要讀四年，那要考慮香港快革命了，還讀什麼書？2014 年大家都覺得沒所謂，遲早會普選，但普選已經比革命差很遠了。我認識寶瑩的時候我們 19 歲，現在認識了 44 年了。她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性格很無所謂的人，對生活細節沒有什麼所謂。**

劉璧嘉 | 但她很注重美學啊。

長毛 | 我經常笑她說是無產階級工資，中產階級口味。她是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但其實我也懂精緻的！她喜歡看法國電影，喜歡文學，有小資產階級品味。**但其實革馬盟裡面都是文青，只是大家扔掉了自己的文青性，一定要扔掉啊，文青看個電影都好幾個小時，只能扔掉。不然沒有時間搞革命啊，而且只有這樣才可以把自己變成無產階級。當時我們都在看《鋼鐵是怎麼煉成的》，我們都想當保爾，或者當俄國小說《怎麼辦》的**

主角。我也喜歡文學。我很早就出來工作了，中六畢業就出來工作做印花，白色的毛衣用絲網印成彩色的，我負責印。晚上就看書。但不是所有工人都是這樣的。但我看《70》、《學苑》，開了眼界。我的英文不好，只能如饑似渴地看翻譯的東西，英文都是自學的，透過不停地聽 BBC。

我對六七的印象和理解也是反覆的。不同時期我會有不同的感覺，一開始認為殺林彬是對的，現在我覺得是錯的。

劉璧嘉 | 先從當時的政治意識說起？

長毛 | 我贊成驅逐殖民政府，9 歲開始就這樣想。因為我一直都是看國共兩黨文人寫的東西，我寄養家庭是右派，我是看《星島晚報》、《成報》和《華僑日報》。但我經常回大陸探親，舅舅是共產黨員，媽媽是工聯會的積極會員。

石中英 | 洋務公會的。

長毛 | 她當年還捐了七天工資去建立工人大會堂，她很支持共產黨。我寫過一些文章回憶她，她是二〇年代出生的中國婦女的縮影。她是長女，要做所有勞務，遇人不淑嫁給了賭徒，後來那人死了，她就變了適婚婦人回到娘家，想著不要再嫁人了。然後日本仔打過來，她開始賣故衣，便宜買、貴賣，就是最簡單原始的資本，是增值的貨幣。因為維生很難，1945 年來香港想要打工，就做西人的工作，結果病了。這時候有個媒人婆來了，說有個中年男人想要娶一個年輕女生，她就嫁了給我爸爸。這個婚姻當然不愉快，我爸爸是酒鬼。我這樣出生，怎麼可能會喜歡這個社會、這個制度？細節的確是會改變人的一生。

我讀金文泰，石中英是我的偶像。我現在都覺得這些是偶然，我早兩年入學的話，就會好像他那樣被判坐牢；但我後兩年入學，所以只能仰慕他。我當時覺得，做人就應該像他那樣做，而這個啟蒙是永遠的——在那個年代，居然有人可以放棄自己的學業。

法官本來說判他守行為，他說「你有什麼資格審我？我來判你回去吃薯仔皮〔馬鈴薯皮〕好了！」法官說：「那我就判你坐牢好了。」我當年聽到很激動，這個感悟是偶然性的。我也很景仰劉山青，可以坐牢十年。為什麼吳仲賢那麼快就投降？因為他太聰明了，一個人聰明的性格，可能在順風順水時變學術泰斗、變政治領袖、變有錢人，但逆境的時候，如果信念是要你犧牲，你的人生就會被改寫。蔡和森是湖南三大才子，他和毛澤東、蕭宇博士，一個是開國君王，一個被人殺了，一個做了學者。三大才子就是三條路，一個不問政治做學問，一個搞革命死了，一個搞革命做了暴君。這就是縮影。蔡和森的爸爸比毛澤東要有錢，但也沒辦法。你們這一輩子也是這樣，命運的撞擊只是時代構成了程度的差異而已。

當時要接觸無政府主義，就會去紅黑書店。在六〇年代所有年輕人都很迷惘，你一定要明白這個。我看很多東西，《文星》我也看，看存在主義。我和毛派傳統很不一樣，我不會把自己鎖起來。

我和托派接觸一開始就是問他們，你們覺得農民沒有革命性？為什麼這樣問？托派認為農民是小資產階級，只要一塊地，所以工人要當先鋒。我和他們爭論了很久。

大家都知道金文泰這個故事。我被石中英的後輩吸收了，他的後輩帶我去《新晚報》的「學生樂園」去找他。

石中英 | 但那時我和金文泰已經沒有聯絡了，可能是金文泰那些沒有被抓起來的戰友。

長毛 | 我還記得當時金文泰的外牆，外牆有黑色油漆寫著「打倒奴化教育」，我一看就覺得這個學校好特別喔。我當時不想讀英文中學，想要讀中文中學。

石中英 | 是一種反叛吧。

長毛 | 我覺得反英就夠了。就和港獨一樣，反中就可以了。1975 年我去革馬盟時，已經知道四反運動了。

劉璧嘉 | 四反的社會迴響是怎樣的？

長毛 | 大家都不明白吧。我為什麼知道托派，因為工聯會批托，應該上面叫大家做的，說他們是蘇蔣托大合唱，說我們收美金、盧布。四反四不交以後《華僑日報》、《星島日報》都在反對。這是第一次托派那麼公開的活動，但其實只有十幾二十人。

劉璧嘉 | 但不是有千多人圍觀？

長毛 | 那很容易，大有街工廠區都是人啊，很簡單的就是一群走出來，有些垂頭喪氣，有些想著去看 5:30-7:00 工娛場就很開心。這就是當時工廠區的場景，大家一下班，滿街都是人。

但其實如果不是因為批托，我根本不會意識到托派的存在。當時李怡——我覺得他是有問題的——翻譯了美國毛派寫的托洛茨基主義。他不曾自己講，而是賣書，在天地圖書公司出了一本托洛茨基的書，就是批托的。當時托派已經被污名化了。

但其實沒有人理你的，只有關心政治的〔人會理會我們〕；還有些人以為我們〔托派的托指的〕是托爾斯泰呢！斯大林都少人認識。

老托派我們很尊敬，他們說革命歷史的時候，很大程度也在反映他們的坎坷，很多人讀完中學本來就是天之驕子，但很多學生運動的人一參加托派就會轉入做工人，搞工運。

我進了托派以後就改變了對林彬的想法，托洛茨基講個人恐怖主義，說殺一個人只會讓那個人變成烈士，你殺一個暴君只會讓自己更多同伴被槍斃，但還是會有另外一個暴君。

本來是要殺六隻狗，林彬、徐家祥（民政事務司）等，林彬是排第二的。我覺得是專業殺人的。

劉璧嘉 | 周奕有在 Working Class History 的 podcast 解密過殺林彪的人。不是職業殺手啦.....

長毛 | 我不相信他。他到今天還跟著共產黨，〔現在〕不是 1969 年，是 2019 年了，真的不要相信他。

石中英 | 周奕不喜歡我搞六七，覺得我找了太多不同的人來分析。我覺得他不只是記者，他是參與者，已經 take 了 side。我覺得他和事實會很遠，但我也尊敬他。

長毛 | 但我其實不認識他。不過這是口述歷史的可信性問題。這叫做家賊難防，所以才要殺林彪。

托洛茨基也是「家賊」，托洛茨基覺得革命快來了。這是一個類比。

你問我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那是因為 1842 年的苦難歷史，我才覺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是不對的，殖民主義也是不對的。我是從中共國情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所以要理解中國國情，才能理解我當時的困擾。這也是托派和毛派的問題——毛澤東用斯大林主義，這是拿來主義，後來又反對斯大林。

我是 1971 年林彪事件就覺得共產黨在騙我，林彪是老毛規定的繼承人，結果隔了一陣子就說他是叛徒。傻子也會問：林彪怎麼突然變成野心家了？我和毛派 say goodbye 就是那個時候。林彪死的時候，外國通訊社說他死了。我問接頭人說：「這是真的嗎？」他們說：「沒有這樣的事情！」後來不就是發現死了嗎？其實和 1976 年四人幫倒台一樣，不過我早了 5 年而已，我不相信他是叛徒。

石中英 | 其實左派裡面也在大混亂，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解釋。

長毛 | 共產黨永遠都是這樣的，你越相信他越討厭他。我不相信權鬥，我很純情的。林彪說毛澤東的指示，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結果他就是不理解地執行，然

後就被人殺了。不經歷毛派是不懂的，我真的相信他是紅太陽，我們相信他，要不然石中英為什麼叫法官吃薯仔〔馬鈴薯〕？越相信越憤怒——你怎麼可以騙我呢？！我當時真的很 **shocked**。劉少奇那一次.....我當時無腦，說〔只要〕把劉少奇 1921、1923 年的投敵信拿出來看〔就知道劉是反革命〕，我當年是相信〔中共〕的。現在就覺得〔那些信〕是假的，你當我們是傻的嗎？人是有 **blind faith** 的，但 **blind faith** 以後 **shock** 很大。所以我之後都不相信共產黨——他們偽造歷史。但我不同的是，其他人走到右邊，李怡就是；我是更左轉進了托派。我當年唯一可以選擇的就是無政府主義或者其他左派，譬如最主流是無政府和托派。

其他左派也是有的，只是在香港沒有建立山頭。譬如社會派是一條路，但我不是大學生，我對社會派的東西也在看，但我怎麼進去那個階層？我根本沒有辦法進入，他們都是同學。我去港大讀校外課程，陳文鴻、黎則奮、曾樹基用 Frankfurt School 等現代思潮去吸收人，我當時是去那裡捉人去托派。麥海華是比社會派遲的，在息微時跑出來。當時是天安門事件，〔麥海華〕和麥宗民說〔中共是〕違憲，說怎麼可能開除鄧小平副總理呢？老實說，你要在場景才知道的。1976 年天安門事件以後有《北斗》、《黃河》。

至於國粹派，其實也是大學生，則是很菁英的一層。《揭露》也是毛派組織，反對托派，要搞革命。他們出過一期教人暴動，但他們是毛派。陳以衍後來去了《七十年代》做編輯，人家要吃飯啊。

吳仲賢〔被捕後〕其實很內疚，他內疚當天軟弱，配合中共，就算中共已經知道內情，但他還是親口承認的人，寫了悔過書，中共還要請他喝酒，想召他做特務，這都拍了片。那是在 1982 年 3 月。當時吳仲賢回去，是因為托派感覺到大陸民運很快就會被清算，所以我們請他去大陸和民運人士聯絡，建立地下管道，鼓勵他們成立先鋒黨。吳仲賢見了王希哲、徐文立等人，去了上海、北京、廣東、長沙。他在天津被抓的，共產黨和他說：「你不要以為有人聲援你，你會在人海消失。我們不會被人證明到你在大陸消失，你不要以為第四國際會救你。」

當時吳仲賢住美孚新村，有一次我去陪他。特工在樓下等他。樓下八個人，四個方向，穿得像大陸人一樣，是明目張膽地跟他。吳仲賢是「成也聰明、敗也聰明」。劉山青沒那麼聰明，但也是成敗都因為他沒那麼聰明，你叫他說托派理論他說不了多少，但是他就是有一個信念，要反對極權、反對中共。你要記住我說的：性格決定命運的意思是，在平和時期不需要冒險時，吳仲賢是領袖，在需要犧牲的年代劉山青就是英雄——這就是時代性。如果我們不去接觸民運人士，在香港搞論壇搞沙龍，吳仲賢光芒四射——他能力那麼高。但有一種性格叫「執著」——吳仲賢不夠，黃台仰也是這樣。性格決定命運是對的，但和時代有關，性格無法在時代發揮就是這樣，這就是「命運說」的兩種。

托派的組織是像共產黨的組織，跟的是列寧主義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度。民主的時候可以說，集中的時候不准說、就要執行。我們選的領袖是李明、朱女、區龍宇、陳寶瑩也有機會是。我後來當了領導，因為這些人都走了。吳仲賢被抓的時候，他雖然不是領袖，但他是 **founder**，大家都會尊敬他。其實他被抓之前，〔大家〕已經有點心灰意冷了。他在美聯建築公司工作，當經理，為什麼這樣呢？因為美聯的太子是他珠海〔書院〕土木工程系的同學。他希望在牛頭角可以有個據點，有一層樓，他供樓以後就去了熊谷組做。陳寶瑩丈夫是金禧的教師。吳仲賢進去了以後當助理工程師，我當助理測量，我們還弄了一個支部，因為我們有四個人在那裡做。我們還在裡面做地鐵承建商工潮，兩次都贏了。吳仲賢做完工潮以後被炒了。還有我、還有一個姓梁的——不說名字了，他還在做傳媒。〔吳仲賢〕他〔被炒後〕百無聊賴，就說「我去大陸吧」，所以其實〔去大陸〕是偶然，如果不是搞工潮，就不會被炒魷魚，他就不會回大陸。我們當年很瘋，把中國分作五個區域——華中、華南、華北、華東、華西——每個人負責一個區域，專門去聯絡民運人士。華南是劉山青，我是負責華東的，但還沒上去吳仲賢就被抓了。

老實說，老吳最先受到考驗，他是替我們受罪的。如果我第一個被抓，我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投降。按樓子春的說法——劉山青是第一個「畢業」的，是讀完〔革命的〕

學士了；我坐了幾個星期而已，頂多小學二年級。搞運動是一個德行，做完牢還可以繼續搞運動才是一個考驗。

當時分五個區，我記得有一個人負責武漢華中，華西應該沒有。第一個去的就是老吳，就被抓了，所以我們才沒有去。他算是有良心了，特別通知我們說自己被抓了，我們才沒有上去。老吳很反覆，他一開始和中共合作，中共說：「你回去香港以後繼續革馬盟的活動，不要退出，但不要搞那麼多活動，繼續結交文化界的人。」叫他做文化界工作。你看中共的謀略有多深。當時還叫他從拱北經過澳門上大陸，帶備文件。因為他被抓的時候沒有文件在身上，要他拿文件上去。他回來兩天以後，就跟我們說他被抓了。

這段歷史真的很瘋狂，他跟我們說他是詐降，有兩個人罵他，一個劉山青一個是我，我們說投降就是投降，沒有詐降。我說：「你傻了嗎？如果你已經被納入了情報網，你開一個酒店房間跟我們說這些話，你覺得不會有人跟蹤你？不會有人抓你？他們可以隨時抓你。」李明當時同意他詐降，李明的校名是涅寧，像列寧，他大事當前時很糊塗，還要背著我們拿文件給吳仲賢。我和劉山青急忙制止他，才讓他沒有把資料拿上去，命懸一線。從此以後，那八個人就去跟蹤他〔吳仲賢〕了。

共產黨也有特務在革馬盟吧，沒有特務就是傻的吧。當時就是否開除吳仲賢有兩派意見，是一半一半的。開除吳仲賢和雙山有關，雙山從英國寫信回來，是一份文件，大概是說「在我們的年代，和國民黨合作一定要開除出黨」。吳仲賢不是假合作，是真的合作。你要明白共產黨之所以贏了國民黨，是因為情報做得好，有一個很大的情報網。你也要明白革命者的傳統不一樣，俄國〔的革命者傳統是〕被捕者要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工黨，要宣傳綱領。中共的〔革命則〕傳統則是被捕以後不可以承認自己是黨員，承認了就是背叛。為什麼呢？因為俄國還有一個所謂民主法制，坐牢就是坐牢，不會逼供的。但中共不一樣，你認了，他們〔國民黨〕就會問你關係、問你組織、審判你三年、迫害你三年，折磨你交出組織名單。俄國是公開活動，中共是地下活動。但所有革命者的命題隨著時代改變，在香港如果被問是不是黨員，怕什麼承認？但是在大陸，你就不可以承認。所以雙山已經是很厚道的謙謙君子，他沒有大聲罵〔吳仲賢是〕叛徒，只說

一定要開除。吳仲賢是革馬盟和進步學生的精神領袖，還是革馬盟的青年組織 YSG（Young Socialist Group，社會主義青年社）、RCY（Revolutionary Communist Youth）的重要人物。他們〔一些成員〕會覺得「憑什麼開除老吳」，於是反對開除他的人就都走了。贊成開除他的人就心灰意冷，覺得無可為、覺得自己個人安危堪憂。我們常委會本來有 9 個人，不見了 4 個人，他們去了美國，李明是一個例子。古惑仔說：「恐懼是無法被醫治的。」恐懼一來，就沒有了理智，要不然你就要像石中英那樣，不害怕。

石中英 | 因為他們觸碰到我的底線了。

長毛 | 1979 年我被抓去坐牢，對組織已經是一個打擊，因為大家意識到要付出代價。那一次我只是坐了很短的時間，可是吳仲賢那一次是很大的打擊，因為可能要在大陸坐十年。就算吳仲賢回來了，他的認錯還在中共的檔案裡面。施明德是台灣最出名的政治犯，他寫信給蔣介石求饒命的信還在，〔要求〕「饒我一死」，於是就判了終身〔監禁〕。我覺得吳仲賢是憂鬱死的，他戒煙、戒酒、爬山、潛水，但還是 cancer。

石中英 | 我和吳仲賢雖然政治意識形態不一樣，但好像貓鼠那樣，我們需要對方，我和他的爭論到最後都不真的重要了。

長毛 | 既生瑜，何生亮。許信良台獨，本來是國民黨黨員，中壢暴動後去海外逃亡，變成左派台獨，馬列主義的信徒。人生變得太快。所以做文青是有道理的，文青是生活態度，不是生命態度。我很熟悉這些東西，因為我也很愛文學藝術，我也想要用多些時間去做這些東西。我在托派裡面其實是特殊的，我很固執，而且我是基層出身。

《號外》其實就是學《70》，陳冠中自己跟我說的。我參加港大校外課程，借了一山書店開會，想搞同學會，吸收他們去托派。剛好看到陳冠中從美國回來，他的論文就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藝術什麼的，他說：「我最心儀的刊物就是《70》。」然後就從寫字台的抽屜中拿出了五期《70》，一份是青年先鋒對英國旗撒尿，一份是屌字那個封

面。他說：「我就是想要辦一份這樣的東西。」後來他就做了《號外》，他親口面對面跟我說的。

劉璧嘉 | 1976 年四人幫倒台的時候，你是不是覺得很開心，覺得說的東西應驗了？

長毛 | 是的。不過我們裡面也有人同情文革，我也是同情文革的人。在不同的氛圍裡面會感覺到不同的政治派別，在激進氣氛裡面，我覺得造反派是對的，林彪是該死的，是漢奸。人的思想被氛圍影響，有一個 format，你和我都有。什麼終極關懷、論述、意識形態，什麼名字也好，就是做人的宗旨、人生觀。毛派的說法就是世界觀，世界觀決定人生觀，人生觀決定人生的行為。大學都是用不同的東西說一樣的東西。

改革開放 1978 年三中全會時是從農村開始，**1984 年才進入城市**，所以後來慢慢感覺到改革開放，我們很低潮，革馬盟很難搞。1984 真的是大改革，工業改造，真正的改革。

劉璧嘉 | 老托派的地下組織和年輕托派之間會有什麼的不一樣？

長毛 | 當然有。年輕一代的托派活在自由社會，覺得老一代怕死。但我本來是毛派，看過《紅岩》，當然理解地下黨。

石中英 | 你看他其實是從毛派分裂出來的托派，和其他文青、存在主義分裂出來的托派不一樣。

長毛 | 是的。在那個氛圍裡，就會明白地下黨是必須的。我們在七〇年代也有這種感覺。《戰訊》的陳聖堂當年是搞四反四不交的，現在應該是隱姓埋名了，他當年被 CID 車到水塘裡，CID 說：「你記得在這裡曾經有個警察被丟下去死了？」指的是反貪污〔運動〕之前有個不收賄賂的警察被安排去守水塘，後來死在那裡，是被人綁住殺人滅

口。那些 CID 還說：「你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以後你就會去下面，不過現在啊，小弟，你和我刺探情報。」他就立刻退出了，他很有良心。

石中英 | 政治部搞的鬼。

長毛 | 不過政治部後來沒那麼瘋喇。他是 1975 年被 CID 抓的，他本來因為搞運動被判了緩刑。

石中英 | 我當年搞批托的時候，大家是怎麼想的？有想過抓我嗎？

長毛 | 沒有，但我們以為你是老手，很討厭你，以為是共產黨派的人。

石中英 | 我當時看了斯大林、《聯共布黨史》、馬克思、恩格斯，才去批托的。《十月評論》當時有大大的字「評石中英」什麼的，我其實很害怕。而且我在教書，不想被人發現。

長毛 | 不用怕，我們其實很斯文，或者是想讀書的工人。我最怕的是老托派當通天教主，我們工人不會英文，托洛茨基說了什麼，老托說托洛茨基說了什麼，都是他們說的而已。後來我就會說：「你說托洛茨基說了這個，那你把那一段找回來啊。」

石中英 | 你們會去法國嗎？

長毛 | 很少。我當時也經常嘲諷那些去外國的，我說，讀馬列在香港都有得讀，為什麼要去外國讀？我 1993 年在英國的一個 summer school 遇到一個 SWP（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托派，我們晚上喝酒。我一開始雖然知道大家是不同派別的，他跟我跟中國革命問題，我一開始忍住了沒有反駁他。但後來忍不住就用英文和他說英國革命問題。他

說：「你懂英國革命喔？」我說：「我會英文，你不會中文，我會英文的情況下跟你說英國革命，這樣有問題嗎？你連中文都不會，但我會你英國的語言，你說我不會英國革命？你傻的嗎？」我就是這樣的人。我心想，你不會中文，你用英文理解中國來指導我搞革命？我會英文，那我也可以指導你們搞英國革命問題啊！你以為我是王明嗎？

石中英 | 你真的是個異類。

長毛 | 大家都有這些異類的部份。我最近想大家為什麼信宗教，那是因為人世間不確定的時候需要歸宿。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下一句大家經常不提的是，這鴉片是「靈魂的嘆息」，信宗教是因為人無奈啊，馬克思是很聰明的。

一個人不想服從的話，很難做共產黨，搞無政府主義就可以了，無政府的民主叫參與式民主，隨時走也可以。列寧哥哥就是無政府主義，所以列寧說他永遠不會犯他哥哥的錯誤。中國的吳樾是恐怖主義之父，他寫了一本《暗殺時代》，說要殺滿人。他以身殉道，捧著自製炸彈炸人。他死的照片是下半身炸毀了，但眼睛還沒有閉上，被清兵扶著讓外國人拍照。暗殺是由於孫中山收了法國的款；他只拿了十分之一給組織，十分之九自己拿來搞事；〔當時〕章太炎罵孫中山〔挪用公費〕，汪精衛就跟章太炎說：「你不可以再罵孫中山拿錢，我們是拿錢來搞暗殺。」汪精衛有一個叫「革命煮飯論」，意思是有人是柴薪，燃燒自己是為了想把米煮成了飯；但有人像煲那樣，柴死了，煲還要繼續堅持，就這樣一輩子，總比變成沒用的人要好。我最近通讀了他的思潮集。

石中英 | 我在六七做的事情，其實現在已經沒有太多感覺，只是很開心譬如我是一些人的啟蒙。我都只是做對著天地良心的事。我覺得長毛的抗爭精神沒有腐化。

劉璧嘉 | 你現在還可以稱自己是托派嗎？

長毛 | 我覺得我還是托派，因為我覺得托派的分析是對的，但很多東西需要 fix。不過根據托派的教義，我要參加革命黨才算。

我和區龍宇他們有很多不愉快的經歷。1997 年之前，我說所有托派組織要統一，如果統一的過程中因為我的原因大家會討論得不愉快的話，我可以不參與討論，然後你們成立後我再加入。但是區龍宇卻移了一部份東西去了台灣，他把組織的一些人搬去台灣，像當年革共黨那樣。革馬盟成立四五行動以後，很多人都來信要加入四五行動。但革馬盟人很少，維持不了，就索性廢了。我們和第四國際說退出第四國際，第四國際問為什麼，我說一個革命黨連最起碼的工作都做不了，譬如在群眾運動裡面做事，不是派小書而已，我們那麼小，起不了革命黨的意義，做不了該做的東西，所以我們也不是中國支部，也不存在了。第四國際一早就決定了中國有兩個黨，一個是 RCP，另一個是革馬盟，兩個都承認。不過第四國際自從蘇東波以後就很弱，因為他們預言的革命沒有出現。老托說斯大林主義是歷史的過渡，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狀態，會 either 向前 or fall back。這是二戰時他說的，他認為趁著二戰的轉機要奪權，這就惹來殺身之禍。後來發生了斯大林主義崩潰，但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這就很崩潰。我們的 perspective 是對的，但 result 不對，沒有 predict 到。所以說，到底無產階級的革命潛能還在嗎？

東歐其實是有托派的，是有參與革命的，但一成功以後就被 sideline 了。他們和人權組織有 collab，但沒有和 CIA 有關，這個托派守得很嚴。

CIC 是類似工會那樣，我們是革命工人先鋒黨，但很多人加入了以後熬不住。譬如很多人的個人問題、生活問題就影響了他們的人生問題，他們看不到革命，看不到托派所說的革命。我們在七〇年代還相信革命，但阻止不了，1989 年是最後一擊。

劉璧嘉 | 你怎麼理解托派後來走下坡？

長毛 | 資本主義上升期 profit 高，你想要工資和工作環境變好，他們〔資本家〕就會讓你變好。大家都覺得工團主義就 ok 了，不覺得需要革命——要改善生活的話〔工會〕立刻改善就 ok 了，為什麼需要革命？七〇年代經濟起飛時就是這樣的。

石中英 | 就是短期利益、經濟鬥爭。托派和過去的毛派——革命前的毛派——他們當年相信的終極目標是革命是推翻一切去實現共產主義，這是消滅了所有的剝削，所以工人的先鋒黨並不是工會。

長毛 | 工人先鋒黨是同意革命綱領的人都可以參加，工會是生產過程裡面的無產階級組織。兩者有聯繫的，這也是列寧寫《怎麼辦》的時候說的：不可以只是做尾巴主義，不可以只做經濟鬥爭，要做理論鬥爭。但是他認為理論和經濟鬥爭之間有一個樞紐帶，那個樞紐帶就叫作政治鬥爭，把理論和基層的利益結合起來，就叫政治綱領。當年革馬盟的政治綱領就不是很多人 buy——七〇年代石油危機熬過了，〔社會〕就往上走了，有一些工人會同情我們，但不會參加我們。

劉璧嘉 | 那為什麼不就做工會呢？

長毛 | 我們有做外圍組織，但很難。右派工會奄奄一息，左派工會一發現你是托派就把你砍掉，唐婉清——劉山青妻子——一被發現是托派就被踢出了工會。很多人說我們滲入，譬如大亞灣聯委會當時說不歡迎政黨，當場立刻開會決議不讓我加入會議。我當時就跟他說：「你是牧師，你信上帝，為什麼你可以相信一些東西，但我不可以相信一些東西呢？」這就是托派的綱領，就是聯合陣線，不分政黨、信仰，一起搞運動。

四反以後，天安門事件是我們做主場，後來就是八九了，中英談判時我們沒說什麼。而四五以後，我們覺得自己很弱、錢不夠。我做了 4 年革馬盟的全職，每個月 750 元，當時工人工資是 1500。我的前妻跟我說，你不再找一個工作，我就要和你分開

了。於是我就找了一份洗車的工作，那白天還能做別的，一直到 1989 年前我都在洗巴士。

然後托派有很多轉折，內分裂和托派第四國際的策略問題也讓我們很 **frustrate**。譬如對阿富汗、譬如中越戰爭的態度、譬如有一派瘋到覺得赤柬是資產階級國家資本主義的代表。這些細碎的記憶，讓我現在能組織到是什麼讓我們崩潰。我們是信仰崩潰，我們無法解釋兩個工人國家——中國和越南——為什麼會打，也不知道要站在哪裡。〔第四國際〕他們說要站在越南的那一方，我就覺得為什麼是越南一方？越南是蘇聯支持的，至少我們也應該是失敗主義對待吧，怎麼會要求我們支持越南呢？

劉璧嘉 | 可以說一些切身的例子嗎？

長毛 | 我們當時是看很遠的，世界觀、人生觀、人生、社會運動都是連在一起的。我們 1975 年合併後，我記得最集中的活動就是把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兩派——多數派和少數派——的文件翻譯成中文，然後一本正經地討論。我是反對這個的，我說搞香港最重要。

劉璧嘉 | 陳寶瑩提過她當年覺得這些東西很 **relevant**，但現在覺得 **irrelevant**。有其他第四國際的問題會讓你覺得是 **relevant** 但 **suffer** 的嗎？

長毛 | 有，一開始說「紅色大學」策略，後來一轉就說要做工人。美國工人支部說全世界支部都要轉去做勞工，於是陳寶瑩去做車衣女工，她丈夫從教書變成地鐵司機。

劉璧嘉 | 她說她做女工的時候，無法說服其他人，等了好久也沒有事情發生。

長毛 | 然後她就去讀書，讀了碩士。我就不用轉，我一向都是工人，在這個轉向裡我沒有 **suffer**，因為我本來就是工人。但我是不同意這個轉向的——這正因為我是工人。這

是第四國際其中一個支部——美國支部——的指令，有一些支部是跟美國的，有一些是跟歐洲的。革馬盟本身是跟歐洲的，不過老吳引退以後，革馬盟本身有合併，革共黨是跟美國的，所以要跟美國的轉向。這是 1978 年合併以後的事。因為金禧事件以後，RCY 就帶了 YSC 的人轉投革馬盟，就這樣變成了去跟美國那邊。四反以後國際社會青年社解體成為革馬盟，革馬盟是組織成革命黨的核心。

吳仲賢當時消沉嘛，他金禧〔事件〕之後有消沉，四反以後 1975 年也有消沉。他是一個沒有架子的人，和他聊天一個小時你就會相信他了。他 1975 年以後有一點低沉，因為要吃飯，他結婚了，生了小孩，那要不要養？1976 年，四人幫倒台讓他復活了。我們當時覺得自己充滿力量，預測對了，終於等到了。老吳 1979 做美聯，單純為了要工作。而且老實說組織大了，合併了，李明、珠女可以幫忙了。我還記得施永青是金禧之後跟我說，他要開中原〔地產〕，要開一個公司，他有點覺得這樣不舒服，我說我會支持你的。

石中英 | 我一開始批托時以正統派自稱，我覺得自己是馬恩列斯毛就是正統，我看到這些人發現他們不是工聯會，我正統的感覺就讓我覺得他們不是正統的，是假的左派，是矇騙工人。所以就很氣急地、心高氣躁地想著要「揭露」他們。我看到他們舉著紅黑的旗，就更覺得那面紅旗是在欺騙工人。

但我本來是很開放的人，譬如《70》我也去玩，《盤古》我也去玩，《盤古》的馮可強當時搞七七時還和我很友好，問我去不去，我就說「去！」當時他們都不知道我坐牢，我也沒有告訴別人我是《新晚報》「學生樂園」的，他們都覺得我是左傾知青。我也看李怡的《七十年代》。雖然說我坐牢了，但出來以後還是充滿探索慾和求知慾。林彪的事當時也讓我搞不懂，前幾個月井岡山才說林彪萬壽無疆，一副星火燎原的樣子，過了幾個月怎麼變了狗屎堆。批林批孔也是，一開始跟的時候不懂，後來才明白是批周恩來。後來四人幫就真的很大幅度的清楚了，覺得四人幫是呂后。我不是很崩潰，但覺得好像驚醒了什麼，那是從林彪事件開始累積的。我看了自己之前寫的文章，覺得好像被打臉了，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我就覺得我又不是靠左派吃飯的，我 1973 年就在

教書，不過是愛好者心態要晚上寫一點什麼，自己學的理論要分享給其他人，但我怎麼想到原來我批判別人的理論，是錯的理論呢？因此我 1977 年以後就完全沒有再寫任何東西了。

很多人以為我搞「六七動力」是想要繼續以前的批判立場。但其實我 2009 年做「六七動力」時我就已經決定，我不會為團體寫一個字，搞劇本時我也不會說我要寫。所有人有興趣就可以來合作，我可以得到一些東西，譬如可否合作做，我想要百花齊放。很多人說我很笨，為什麼不找正確的方向呢？說我是不是在利用左派。

我到現在都覺得當年是君子之爭，大家都是知識份子，想的是世界大同的事。他們是很可愛的，想的是國際主義，想的是打破一切，塑造一個新的世界。所以吳仲賢被人抓了，我覺得很難過。我批評托派，但我後來做旅遊，至少我覺得我在把人帶到長城，要理解自己國家，這和理念無關。但加入《花花公子》（Playboy）我覺得走太遠了。

當年大家互相罵，就是一直在批判和批判之間生產新的哲學，變成沒有絕對真理，只有相對真理，但我們當時都以為自己是絕對真理，但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很大的問題。我們當時都很年輕，但三十歲之前不相信共產主義是傻瓜嘛。我覺得當時六〇年代就是年輕的感覺，譬如看到紅衛兵，覺得學生連國家領導人都可以鬥；看到巴黎 Sorbonne 燒車、佔領學校幾個月；看到在槍口插花的反越戰。

我參加六七是因為被「青年樂園」搞左了，但其實不是這樣的。1967 年 1 月時都沒有派報紙，我當時在準備入大學的考試，我是金文泰理科 A 班的學生，一定可以進大學，我因此在集中讀書。4 月人造花廠時，我也不知道消息，因為在考會考。但考完會考就有空了，不用上學，我當時去北角、大坑——因為我父母分開了，其中一頭住家在那裡——就每天看到北角很亂，亂世佳人那樣，我慢慢知道了工人，開始同情工人。我看到警察和市民互相追打、看到催淚彈，心很痛，也很同情工人。我記得有個年輕人在很生氣的情況下一手打破了電單車的鏡子。我現在可能都不知道當年發生了什麼事，那是一個很亂的狀態。

附錄五、2019 年 2 月 8 日陳寶瑩訪談節錄

訪談節錄

當時我們是渴望革命的，認為過渡綱領的最高和最低綱領之間有過渡——是 here and now 的概念，中間有要求的提升。當時我們認為不可以做群眾尾巴，是要提升群眾……

當時我們的 formula 是普選全權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是 tribute to 中國的。當時蘇聯是三權統一的機構，我們會覺得立法、行政、司法機構要分開來。去對抗殖民地政府的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是政治團體，要求政府給一個架構。

社區運動是八〇年代的主旋律，學生也沉寂了，活躍的學生都不做學校運動，而去做社區運動。我們在八〇年代覺得青年學生運動沒得搞，所以要轉向。全世界的青年運動都是低潮。我們當時因為服從於第四國際，所以也要「轉向」，轉向產業工人。我自己是去製衣產業，有些人是去地鐵。我們事後想起來，會覺得很憨鳩〔笨〕，我們人很少，是書呆子，又不理解沒有工人運動去做工人有什麼用呢？大型工業產業不是很多，我的 ex〔前男友〕就是做港鐵，但我們做製衣也是中小廠，泥牛入海，爭的都是加人工，很日常的爭吵。罷工又罷不起來……那個時候長毛覺得第四國際什麼都不懂，很看不起他們。當時已經是這樣了。

我當時比較乖，覺得他們比較有經驗，我自己覺得沒有出路，如果有人給了路讓你走，那就試試吧。走了再說，又不會死，總比憨鳩鳩〔笨〕好。譬如吳仲賢被抓以後，在 1981-1982 年，托派內部很混亂……大家的問題在腦海裡想的是——如果是我，我也是這樣而已，我也應該是詐降而已。我們很同情吳仲賢，但看著那些歷史書裡面的人，是那麼的慷慨就義……最後吳仲賢真的被第四國際要求開除，我們才迫不得已接受，有前輩幫我們一錘定音，我們就跟了。

當時我們〔革馬盟〕有 30-40 人，我們都很 committed，此外有一兩個職業工作人員，都是老一輩給錢請的。大家都各自去書局……十月書社不是開放的，就像「自治八樓」那樣……下班就去。第四國際沒有撥款，就算撥款也是給黨，不會給

我們青年團。……組織氣氛上，當時團體很小，被人打壓，當時《星島》都在罵托派，覺得我們是修蘇，國民黨特務，女生穿拖鞋牛仔褲（反而讓我有認同感）、亂搞男女關係。當時連浸會都把我趕出來，覺得我們像「黑社會」。

記得 Joyce，也就是雄仔叔叔女友，說她夢到我吸引她吸毒。社會上覺得我們是癲瘋病人那樣。我們參加聯席會都被趕出來。譬如民生性的會議都不讓我們進入。在 1978、1979 年，荃灣勞工新田學社反兩巴抗爭時，長毛按門鈴要進去，結果立刻開會被否決，不放他進去。

所以我們很內聚，圍爐取暖。互相的情感以來很強，人很 rigid，想要安放在其他人身上……但我們完全沒有群眾基礎…….

後記

陳寶瑩是香港著名政治人物及社會運動者，年輕時曾加入革馬盟，為托派一員。在托派中，陳寶瑩是比較順從第四國際安排的一類。年輕時，陳寶瑩曾根據第四國際方針去浸會大學當職業學生，卻因為其托派身分被暴露而無法入閣參選學生會。八〇年代初，革馬盟四分五裂，陳寶瑩深受打擊，但並沒有放棄社會運動。多年來，陳寶瑩持續獻身於工人運動與婦女運動，並為新婦女協進會的創辦人之一——此組織至今為香港婦女運動的重要機構。現在，陳寶瑩依然沒有放棄街頭抗爭。和梁國雄一樣，兩人均為社民連成員，陳寶瑩現今是社民連主席，梁國雄為其配偶。

附錄八、2019 年 5 月 21 日房遠華訪談節錄

訪談節錄

一開始加入國粹派是基於很純樸的民族感情、愛國感情。後來就變成了比較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當時覺得自己很不像其他同學。我們是早覺悟的青年，自己有責任和使命要把先進的思想帶給同學，是一種救世救民的思想。想要走進群眾做思想工作，爭取他們成為一份子，後來嚴重到到了中大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在做革命工作，要留意階級敵人……我對家人會覺得他們是資產階級的那邊，自己是資產階級家庭……我排斥看《明報》、《華僑日報》等右派報紙也排斥。基本上我看的是《大公報》、《文匯報》、《七十年代》，也會和李怡聊政治……

我們〔國粹派〕很強調中國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我們只是步入社會主義，還沒有進入共產主義，那是未來的理想。但我們很多資訊都被過濾了，很多資訊都不知道，譬如《理性的黃昏》，我們沒有聽聞，會對其他消息很厭惡……

我們不是無知到不承認〔文革有〕死屍，但我們認為他們是反革命份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革命就是要殘暴地對付階級敵人，所以我們對流血事件的理解是反革命。我們這樣去理解文革的動亂，就會覺得是自然現象，很理所當然……

〔到了四人幫倒台〕我們開始覺得被欺騙感。毛澤東原來和四人幫在一起。說四人幫，他們有很離譜的東西，譬如江青進口色情電影，有很大的影院，我們覺得很過我們的界線。那是腐朽資本主義墮落的東西，為什麼革命派會這樣做？他們用國家的財產做私人的資本主義腐朽的享受，我們不可以接受。

由此我們就開始理解毛澤東的東西是否合理。以前不會挑戰的我們開始會挑戰，之後會覺得人民公社有問題。之前我們覺得是沒經驗的實驗，過龍了也會接受；之前我們知道有很多人餓死了，但我們覺得是自然災害。但後來，我們覺得無法解釋——那根本就是毛澤東一個人搞出來的東西。毛澤東形象破滅，不再是革命舵手、革命導師。我們有了疑惑。

我們開始懷疑華國鋒。雖然毛澤東對華國鋒說「你辦事，我放心」，我們會覺得華國鋒作為繼承人應該是個好人，但形勢發展是：鄧小平上來了，然後有四五事件。我們當年依然相信正統的一套，要批鄧。但崩潰的一刻是四人幫被抓，那是沒有先兆的。我們不可以信服，覺得太突然。

我們可能用了一段時間，用了幾年去沉澱，才從不信服到覺得受騙。然後回看共產黨的歷史，我覺得被騙了。共產主義是很有問題的——怎麼可能從根本推翻呢？我們就不會接受和相信「人性無私」和「大公無私」了，這不可能的。不過，我們可以多一點公，少一點私。只是人不可能不為自己想，那是把自己消滅。我的生存都是私啊。所以我從這裡開始覺得共產主義不可能。

我又理解剩餘價值是剝削基礎，但後來看很多文章，西方的說法開始覺得沒有剩餘價值，沒有辦法證實。資本家也不是沒有付出。我就開始接受資本家不一定會賺也會虧，資本家甚至可以所有都虧的，有一些是失敗的資本家。所以就會懷疑剩餘價值，然後從理論上一點一點想共產主義的不可能。我是從這裡開始覺得中共因此是邪惡的。看到他們弄死了很多中國人，但又說謊，就開始覺得是邪惡的組織，而且是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文革是極度有問題的，就算共產黨有承認錯誤也是不真誠的，十年浩劫你都說出來了，怎麼可能不反省和挖深的理解呢？文革紀念館都沒有。所以我會否定中共，搞了那麼大的災難，要不要下台？要啊。

後記

在火紅年代，房遠華曾成為國粹派一員，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社會部幹事。四人幫倒台後，房遠華退出學生運動，並沒有再加入政治組織，入讀教育學院。畢業後致力於教育工作，曾為裘錦秋中學副校長。

附錄九、2019 年 5 月 15 日楊寶熙訪談

國粹派如何理解文革？

劉璧嘉（以下簡稱「劉」） | 你曾經是中大學學生會會長，也曾經是國粹派的重要人物，親身經歷國粹派的發展。希望可以用你當時的心情來回應我一些關於國粹派的提問，特別是關於國粹派的情感與思想的部份。

首先，我理解國粹派和文革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你們當時是怎麼看文革的？我理解的是，當時一般市民大眾還是很恐共和害怕文革，譬如文革浮屍漂到香港的新聞在當年就很震撼。那國粹派的你們是怎麼理解文革的？

楊寶熙（以下簡稱「楊」） | 浮屍比較是早期文革的事情，大概在 1968、1969 年吧。我 1972 年開始接觸中共在中大的人物時已經過了那個年代。至於對文革的感覺，我們主要是不同意《明報》，覺得《明報》只是報導文革一些「五花大綁」的少數例子，覺得那是以偏概全、煽動，所以我們在整個香港是少數派。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是在大陸一般人的內部脈絡下去理解文革發展的，比較是吸收了大陸當權者的思想。我現在的分析是，我們會覺得「兩報一刊」寫什麼都 make sense，而不是跟隨文革的民間思想。

我是 1972 年加入國粹派，比較有印象的是 1972、1973 年的批林批孔，記得我們有去學「兩報一刊」的文章。當時我們看到那些文章批評孔子，我會覺得投契、融入，因為我到現在也覺得那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東西是迂腐的。但我們完全沒有想過這些批林批孔背後是連帶著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所以我們不知道批孔的 hidden agenda。我們會覺得，連魯迅都說要打倒孔家店，批孔是應該的。

又譬如林彪事件，我們當時是怎麼理解的呢？我們讀的材料就是說他要奪權，結果被毛澤東發現，所以他要逃走，然後他的飛機才會被擊落——我們當時理解的是這樣一個故事，所以我們會覺得林彪「抵死」。又譬如劉少奇，我們的感覺比較不一樣。我們

對林彪的感覺是他在出賣黨中央，但對劉少奇的感覺是關乎到路線鬥爭，因為劉少奇想走資本主義道路。

劉 | 當時《學苑》出版了逃港紅衛兵虞雪的〈理性的黃昏〉，這些都是大陸文革的民間思潮中有左派思想並具備理論性的文章，這些會否影響你們對文革的看法？

楊 | 我想我們當時有一些分工，有些人理論基礎比較好、文筆比較好的——特別是學生報的人——會被分工去應對這些文章。以致於這些文章我們幹事會就不是很理會，我自己甚至對〈理性的黃昏〉完全沒有印象！當時的心態是，那不是國粹派的、是別人的文章，我們就不會去學。我們會覺得就算有這些文章，就由學生報去應對、去反駁、去筆戰和去辯論吧。

文革對國粹派實踐上的影響：訪貧問苦與小資焦慮

劉 | 那上山下鄉對國粹派的影響是什麼？

楊 | 我們看到上山下鄉的時候，會覺得上山下鄉是好的，但香港做不了。我覺得當時我們其實很奇怪，因為我們如果真的要去做，是有條件的。七〇年代香港的農業還算蓬勃，香港本土農業的蔬菜供應量到了本地需要的一半，但我們沒有察覺到這件事，更沒有覺得我們去搞農業議題吧。那是因為我們沒有真的在搞農耕的東西，只是因為覺得訪貧問苦是好的、上山下鄉是好的，所以才去做。現在馬寶寶農場那些年輕人被稱為所謂「農青」，回想起來我們和現在這些農青相比都是不如的，我們做的就是去割禾而已嘛。這也是為什麼我說我們根本察覺不到自己當時的問題和這些問題背後的內在矛盾，只是做了比較表面的東西。而我們很多人到了這個地步已經覺得安心了——或者叫「自我感覺

良好」——覺得自己「去了工作營了」、「幫了哪裡哪裡起路了」，就是這樣而已。我們好像表面上做了很多東西，但回想起來又沒真的做什麼。你看今天那麼多年輕人是真的去認真種田、認真搞農業，但當年我們真的沒有。

雖然無可否認，我們的生活會有很落地的一部份，譬如訪貧問苦、憶苦思甜，看起來好像很深入群眾。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很離地。**我們很鄙視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出身**，同時對草根階層出身的同學會在政治上會天然地覺得相近並想要拉過來團結。**但我們對勞工及勞工議題，始終是吊起來欣賞的，而不是走進去的。**

有一次我和一些在大陸做農村發展的朋友交流，我也說過這個問題。我們雖然當年把「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興」掛在嘴邊，但其實我們對「農」這件事情——包括農耕、農業——其實都沒有一種落地的、真實的感情。我們對訪貧問苦、對農民、對工人，有的只是一種階級情感，但這些情感是沒有根基的，只是根據成份、出身建立起來的。所以我才說我們是把工農包了起來、吊了起來欣賞、仰慕，但沒有真的「進去」他們的世界。

生活上我們可以艱苦樸素，可以不去打扮、不穿漂亮的衣服，但其實我們根本不理解工人及農民。譬如國粹派當年的中大社工隊會搞 work camp（工作營），我們會落手落腳去修橋鋪路、去農民家幫忙割禾——當年七〇年代香港還是很多人在種米。但是那種幫忙是很短暫，是 one shot，用現在的語言來說是「打卡」。我們和文革那種上山下鄉、落戶是不一樣的。而心底裡面，其實我們也不想真的做成上山下鄉、落戶。

外表上，我們堅持要穿著樸素——雖然不至於每天都白衣藍褲，可還是會特意地爛邋邋一點，穿拖鞋、女生不穿裙子，更不要說化妝。但是在生活上，我們走不到工農的情感深處。這就是我剛剛所說的，我們在生活上是看不到自己生活和理念脫節的地方。不過，我們當時很難覺察到自己這些問題，甚至沒有很表面的例子可以去體現那個矛盾和脫節。因為大家當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很樸素，不會有國粹派說自己想要穿漂亮的衣服、想要打扮，然後因此尖銳地感覺到和內心深處的理念之間相矛盾。但內心深處有矛盾是可能的。

有一個例子可以看出我們放不下自己的身份。譬如畢業典禮，外表上我們當時是不屑及杯葛畢業禮的，覺得為什麼要去這個被港督主持的畢業禮，去被英國佬「卜頭」呢？但我們內心深處不是真的很放得下大學生身份。記得當時有一個朋友，他到了中學畢業時有一些左派朋友叫他不要入大學，就去工廠打工當工人吧。他表面上覺得「那試試吧」，但心底裡面卻會覺得「我能讀書、我的成績可以入大學，我又想入大學，那為什麼不能去讀大學呢」。與此同時，有些人會根據一些左派的提議要入大學、在大專院校中建立愛國群組而被分配入大學。那就更會讓譬如我朋友那種人覺得，「那為什麼我不可以去讀大學呢？」題外話是，我朋友過了幾年終於進大學了。

當然還是有一些例外，是甘願整個地放下自身的身份，拒絕去當小資。譬如有些人在畢業後真的去了左派報紙、左派工會、甚至是左派銀行工作——是有這樣的人，甘願拿很低微的工資，就像程翔去了《文匯報》那樣。但總體來說，就算有一人甘心去過低工資和艱苦的生活，但我們情感上從來都沒有真的接近過所謂無產階級。這和當時大學生是天之驕子有關，只有 2% 的人可以讀大學，事實就是大家都已經是天之驕子了。

我 1972 年開始加入國粹派，但到了 1976 年四人幫下台以後和 1978 年改革開放那麼長一段時間，我都覺當時在思想感情上認為自己無法走到草根和無產階級裡面去。

劉 | 你提到國粹派對自身小資性的鄙視，所以你們怎麼判斷自己是小資的？是看家庭嗎？還是只要是大學生就叫小資了？

楊 | 一方面是看出身。我和身邊大批同學都是小資出身，譬如父母是知識份子或者不是草根，他們就會覺得這出身有原罪。當然也有一些真的是工人階級出身，譬如父母是海員工會、紡織工會的。不過家庭和個人是分開的，如果你個人沒有去工廠做工而去了讀書當大學生，就已經可以說你是知識份子「臭老九」了，這種情況，他們就會說是「沾染了小資產階級的習性」。所以無論如何都是有問題的：在大學裡，無論如何都不可能

覺得自己是無產階級，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一個原罪，就因為你是大學生就會被認為是一個原罪。所以我們覺得一定要批判自己。現在回過頭來看，覺得這一招真的很厲害。就是出現什麼矛盾時，都會覺得是不是自己不理解、覺得是因為自己批判自己不足夠，所以才不理解。

我們當時會有很多**批評與自我批評大會**。我記得有兩個同學。一個同學家裡是開士多的，他覺得「這足以代表自己是小資產階級」，因為家裡有資本，為此他不停批判自己。另一個同學——我現在想起來可能更冤枉——他家裡有一個地方是租給別人開 party 的。七〇年代港英政府為了發洩青少年的精力很推廣辦舞會，譬如香港節什麼的，當時舞會很流行，他家是租地方給人開舞會的。他和我們說他看到有人落藥迷姦——我也不知道他真的見到還是只見到了一次然後無限上綱上線——覺得自己家是幫兇，而源頭是因為覺得自己家擁有資本，為此他也不停地自我批判。

國粹派的思想資源與世界觀

劉 | 當年國粹派的思想資源主要來源是什麼？除了「兩報一刊」外，國粹派學生是如何學習大陸左派思想的？有什麼書和資料是比較印象深刻的？

楊 | 當年有一些讀書組。《共產黨宣言》固然都會讀，其他的也會讀，但說真的除了《共產黨宣言》以外其他的我都不是很讀得懂——但這可能是我的問題，其他人可能是讀得懂的。我記得有《哥達綱領批判》、《毛選》，我也知道有人會讀枕頭那麼厚的《資本論》，經典就是這些。上面會有人叫我們看一些必讀的文章，譬如《毛選》裡面的五篇必讀，一個是〈為人民服務〉、一個是〈矛盾論〉——其他的我不太記得了。但看了這五篇我們就覺得掌握自己掌握了理論、掌握了唯物辯證法。除了經典以外，更多其實是讀「兩報一刊」的文章。但那些刊物其實理論不是很多，都是策略的東西，以至於我們當

時可能不是真的掌握了什麼是理論，什麼是策略。一些學習會讓你覺得自己掌握了理論，但其實又沒有真的掌握。

我們也看電影，主要是看左派的電影，譬如南洋、南華、珠江的。我們甚至會被安排一批人去深圳看電影。記得當時有一套電影，說文革中人民如何打爛教育制度，說有一些學校收生不是看成績，而是看學生的手掌有沒有起繭——因為起繭的手才代表你是工人或農民的子弟——我們當時看到這一幕就大力拍掌，覺得「對！考試制度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會有自己的代入，覺得香港的考試制度是不公平的。我們當時覺得就算在香港沒得讀書也不是問題，因為學校給的教育並不是拿來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面對香港，我們心底也想要打爛這些制度，先打爛了再想怎麼改變。

文學方面，當然是看蘇聯文學為主啦！譬如《牛虻》，但內容我現在都忘記了。另外兩本我印象比較深刻，而且是國粹派必看的小說，一本是《青春之歌》，另一本是《紅岩》。雖然我們對《青春之歌》會有少少批判，會說男女主角依然有小資思想，但一邊批判還是一邊叫人看。我後來在想為什麼我們那麼喜歡這本小說，為什麼那麼推廣這本小說，就是因為我們可以完全代入裡面說的隱蔽和服從，我們覺得自己也要學會隱蔽和服從。《紅岩》是講國共內戰下的故事。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這樣想的，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自己當時對中共的理解是完完全全停留在國民黨時期，也就是白區時期。所以我們一想到解放軍不會想到紅衛兵派系鬥爭中的解放軍、不會想到三反五反，一想到解放軍就是想到長征。

我們當時也經常搞關於形勢的 talk，去分析中國形勢、國際形勢。譬如講伊朗、伊拉克、中東的事情。我現在都忘光了……但記得當年我的感覺就是「啊～很雄偉」，哈哈。

回過頭來想，有時候會覺得當年儘管國粹派有萬般錯，但我們是在認真地分析國家和國際形勢的，是有一點眼界的。當然，現在回看很多分析都是只是在講中國那一套，什麼「三分天下」、「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從我今天的角度看來就是「靠嚇」，讓我們總覺得美國、蘇修大敵當前，哈哈。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些口號，但我們當年可是經常把「蘇修亡我之心不死」掛在嘴邊。

國粹派的組織形式與組織精神：服從和隱蔽

楊 | 要學像《青春之歌》和《紅岩》裡面的**服從和隱蔽**，一方面是情懷，另一方面也是和組織生活相符的。我們當時的組織型態是保密的，舉例來說，我那一屆學生會有 12 個幹事，但 12 個幹事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左的，那麼你要如何取得主導權呢？中共的一個策略是要搶組織——今天也是這樣的——但怎樣才可以成功搶奪到組織的主導權呢？首先，你不可以找左校出身的人來做，因為他們的出身會被懷疑，很難被同學選上，所以國粹派要在同學裡找看起來不是最左的。這樣才找上我吧，覺得我比較柔和。此外，他們也要找可以為他們所用的人。譬如 1975 年英女王訪港，他們希望學生會低調，發聲明譴責一下就好了，不要搞反殖示威。但要達到這些目標，還是需要通過全體人的表決，為了確保表決可以順著原本的設計進行，國粹派就有一種叫「**黑會**」的東西。學生會核心人物中的死硬國粹派會先開一個秘密會，聊很多策略及應對做法。到了開 12 人幹事會的時候，這幾個人就可以互相呼應、扯貓尾，去推只是發聲明、不要示威、要和托派劃清界線這些說法。這樣幹事會最終才能通過只是出聲明譴責的結論。我們實現是靠這種已經完全聊好了、鋪好路了的做法，其實靠的就是**秘密的組織，是不會讓人知道的**。

除此以外，我們也會開大會，開大會是在四人幫全盛時期或者因為有活動才會做的，譬如大選之前會搞大會，為了發動大家去投票，或者「中國周」之前也會搞大會，是為了發動大家去拉人參觀。這些大會最多會有百多人參加，但都是秘密的，或是說有限度地秘密吧。這些大會不會像之前所說的 12 個幹事裡面只有幾個幹事才知道的「黑會」那麼秘密，而是 12 個幹事都會知道的，但所謂「一般群眾」就不會知道有這些動員大會。

劉 | 被拉進大會的人會有什麼感受，參與感受又是什麼？是有壓力嗎？還是覺得光榮？

楊 | 比較像是後者吧。但準確來說是不是光榮呢？我覺得那個感受比較像是被拉進大會後，**會覺得自己是「已醒覺」的人**。譬如那個目睹了舞會迷姦的同學，沒有被拉進大會

前，可能已經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去理解而覺得「不舒服」，但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他會覺得「醒覺」，會覺得自己還可以從制度的層面去理解這些事情——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就覺得自己提升了。

劉 | 你提到一些在接觸到這些思想時很激動的一面，譬如對社會不公，你們會很忿忿不平，但在香港的國粹派卻是被要求隱蔽的，你們會對此狀態感到侷促嗎？

楊 | 有時候會覺得侷促的，也試過和上面——也就是大學中國粹派的領導層——有爭論。但是到最後一定是他們贏，他們一定會有辦法說服你。

其實我當時也想過「示威一下也無妨」，但另一方面覺得要**隱蔽和服從**——這真的是拜《青春之歌》和《紅岩》所賜。我們會覺得服從和隱蔽是對的，因為上面一定有更好的理由要我們這樣做。如果我有二心，就會想是不是「自己改造得不夠好」，「有小資產階級的特性」，「還不是無產階級」。如果背後還有什麼理由去支撐這個隱蔽跟服從，那就是「**覺得自己小資**」——**這個是最殺的**。譬如英女王來的時候也會有人問為什麼不可以示威，但最終都被說服了。

劉 | 所以這些領導層是什麼人呢？你已經是學生會的人了，你上面還有人嗎？

楊 | 有的，這些人不是學生會的人。他們背後有什麼人、有沒有一些畢業了很久的學生，我也不知道。譬如我是中大學生會會長，我的領導也都曾經是中大的學生，他們才會知道怎麼一路培養其他學生和指導工作。

雖然梁慕嫻對七〇年代可能沒那麼熟悉，但她也收到了很多料，點了很多名。譬如當年皇仁等官校有很多洗腦了的學生，他們比我們早幾年先入中大，然後就開始做職業

學生，譬如不停讀書、延畢、轉系、升學，總之就是會維持一個學生的身份帶著我們工作。這是我們的「老鬼」，但他們不曾是學生會的。他們的理論基礎的確比我們好，而且知道的資料也比較多，這樣才可以有效說服我們「這樣做就對了」，我們也都很信他們。

當年直接領導我的人很早就過世了，我現在想這也有可能是和他放不下四人幫倒台的震撼有關。因為他一直都認為「四人幫是對的」。他不抽煙、生活正常，但最後在八〇年代初就肺炎過世了。

劉 | 左派組織中的氣氛和文化除了隱蔽、服從、集體主義、樸素以外，還有什麼特質嗎？你們對自己氣質的自我認知是怎樣的？會覺得自己做的東西很危險刺激嗎？

楊 | 我們當年沒有覺得自己做的東西很危險，也不會有自命清高的感覺，但我們會自命進步。我們會覺得「自己要對自己要求高一點」。

劉 | 會感到孤獨嗎？

楊 | 有時候會吧，有時候會難受，因為孤獨所以會更加想要一個集體——一個「明白自己」的集體。不過，這是孤獨感嗎？也可能說不上，但就是覺得別人「不理解我」、「不明白我」。因為我們不能暴露身份，別人也有時候不明白，譬如會質問我們英女王訪港為什麼不去示威。但最終我們也會覺得這是「沒所謂」的。所以「孤獨」可能不是一個準確的詞，當時我如果聽到這個形容的時候會有點不以為然。因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要別人去理解我，而是要堅持自己的理想，讓多一點人對新中國有理解、有愛、有希望——總體正面的感覺比較強。那個「不要讓別人搞亂香港」的**使命感**會蓋過「不被理解」的難受感。

因為我們相信毛澤東那一套「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搞展覽：我們以前是一般群眾，但當自己提高了，有更多認識後，覺得自己要把已學會的帶回到群眾中去，把我們已經認識到的東西教給別人，譬如怎麼從制度角度去看剝削問題，而不是看到自己眼下的收入少、生活苦困就只想到個人問題。

劉 | 那你們對學校課業的態度是怎樣的？

楊 | 我們都不讀書的，我們留在學校只是為了用學生身份搞革命，所以我們應付學校課業的標準就是不給趕出校就可以了。要依然留在學校、要畢業，是因為我們知道這樣可以更有效地接觸群眾，我們會知道畢業後大學生都會成為可以 **occupy** 社會中重要位置的人。所以如果我們認為可以影響到這些同學，讓他們對社會主義有好感或認同社會主義，那社會的未來就會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做「大學生」的工作很重要。所以不讀書是 **ok** 的，但不可以被踢出學校。

所以我們甚至會有一些學術比較厲害或沒有那麼忙的同學幫忙開「水泡班」或「雞精班」，這些同學幫大家上課做筆記，通知大家去考試、提醒大家要考什麼範圍，甚至是 **tip** 題等，讓大家可以及格，救回很多人。

國粹派對香港革命的想像與矛盾

楊 | 當年經常會有一種「有力無法使」的感覺。所以領導會讓我們多去搞「認識」性的東西，譬如搞「中國周」。譬如托派搞四反，我們就搞通貨膨脹資料展覽。又譬如我們會搞很多文藝創作，數白欖、話劇、舊曲新詞等。我們訪貧問苦的時候蒐集到很多關於基層的資料，譬如人工怎麼低、怎麼被老闆壓迫等，就會把這些轉化成文藝創作。這些文藝一方面是叫人行動，另一方面大家看完一個劇可能也就發洩了感覺。

劉 | 你們當時相信革命會發生嗎？覺得革命來到會長什麼樣？對香港的未來有什麼想法？

楊 | 我們認為香港是不會有革命的，香港的未來就是被人收返。

劉 | 那在中共熱烈宣傳革命的氣氛下，你們怎麼消化香港不會有革命這件事呢？托派都說你們是「等待革命論」。

楊 | 內心當然會有一定的矛盾。但我們當時會認為，**革命要看策略、看時機，就好像抗日戰爭時期或者國共內戰時期那樣**。左派當年是不能夠站起來、不能夠振臂高呼的，還是要忍耐、要等。況且我們想的**香港的未來不是革命，而是響應中共號召**，反正也是要**中國政府覺得可以解放香港才行**。

所以我們想的**不是在「等待革命」，我們是在配合**。當年完全明白香港只是一隻棋子，什麼時候該幹什麼，我們完全懂。事情應該讓中央去決定，我們可以給意見，因為我們熟悉香港的情況，但怎麼做**輪不到我們話事**。

我們當時有一個說法，就算中國收香港，香港愛國人士的身份也不可以暴露。其實一直以來，左派都有潛伏在港英政府、甚至警隊內部的。而當時的說法是，就算收回香港，也要長期潛伏。之所以當時說收回香港也要**繼續潛伏**，是覺得香港會繼續有作用吧。就像為什麼中共今天還是口頭上說中國和香港是一國兩制呢？因為香港的確還是有它可利用的價值。就好像何志平那樣，他愛國嗎？他就算是愛國也不會表明，他必須要繼續隱藏他愛國的身份，這樣才可以幫中共辦事。

那要隱蔽到什麼時候呢？或者就是到一國一制的時候才可以結束吧。不過我們當時對社會主義中國是有信心的。

劉 | 這聽起來完全就是中共想要的「長期利用、充分打算」。所以你們當時已經知道了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方針，對嗎？

楊 | 我們當年已經完全清楚這個方針，不是事後才知道的。而且我們還用這一點去說服同學不去衝擊殖民政府。這也是我們和社會派及托派最大的差別——他們可不只是口頭反殖，而是要反到底、抗爭到底。而很多同學看到社會派和托派這樣做，就會覺得我們很怪，就會問我們「你們整天說殖民政府的不是，那國粹派幹嘛不搞反殖的衝擊？」而我們總得解釋吧，所以就要用到「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句話去說服同學，告訴他們香港作為殖民地還是有利用價值，所以我們不要打翻香港作為殖民地的身份。如果能接受「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這個說法的話，就不會再反對我們了。

劉 | 那如果面對一些很實際的但不一定會上升到危害殖民政府地位的抗爭，國粹派為何都沒有參與呢？譬如如果有工潮，托派就會很支持，因為這些抗爭是真的可以改善工人的生活。而在我看來，不是所有運動都會直接衝擊到殖民政府地位，但為什麼國粹派連這些都不做呢？

楊 | 我們當時是學生而已，所以不需要面對被剝削的問題，也不用去想被剝削的時候是否應該要爭取之類的。譬如回應 1974 年的通脹，我們當時的做法就是教大家「認識」（笑）。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這個「認識」還是很有趣又很可笑的，我們就是一直叫人認識資本主義、認識末期資本主義會這樣爛下去、認識什麼叫剝削、認識工人是要反抗的。但我們又會話鋒一轉說：但我們不可以推翻港英，因為中國還是很弱，需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

「中國還是很弱」這一句是很殺食的。我們會說，中國需要運用到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和渠道，譬如韓戰的時候美國要封鎖，霍英東透過香港走私物資協助中共，我們就會覺得霍英東很偉大。而我們總是想像未來幾十年內可能會遇到像韓戰這些場合——需要香港幫助運動戰略物資、醫療物資等——所以我們會說不要逼迫中共出動解放軍去改變香港的現狀。「中國還是很弱」真的是很殺食的理由或者是藉口。

劉 | 所以你們當時認為隨時都可能有戰爭，世界很動盪嗎？

楊 | 是的，我們當時對世界的感覺就是很動盪的。你可能聽過「三分天下」這個說法，第三世界理論認為美帝蘇修是第一世界，是霸權；第二世界則是資本主義國家，譬如英法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就是亞非拉。所以在這個理論下，我們會覺得英國不是第一打擊的對象。

劉 | 當時主張行動的《70年代雙週刊》也講第三世界，這兩者不一定有衝突吧？

楊 | 雖然我們經常說第三世界，但對第三世界的看法也是緊跟著中共宣傳，而不是自主去學習的。當年儘管《70年代雙週刊》有寫一些關於第三世界抗爭的文章，但國粹派壓根不會同意《70》所寫的東西，他們早期是比較無政府主義，後期有托派，我們當時是不 buy 他們的。李怡的《七十年代》比較是我們 buy 的那一套，他們也會說亞非拉的東西，那是我們會看的刊物。我們當時除了看左派報紙以外，就會看《七十年代》，其他東西其實很少看。

我們當時其實也是很反美的，所謂美帝蘇修嘛。反而對當時來說，英國不屬於頭號敵人，我們沒有那麼反英。雖然說英國殖民主義者要繼續殖民香港，但我們認為在七〇

年代，英國已經沒落了，不是霸權，所以也不用那麼反英。在中共眼中蘇聯和美國才是頭號敵人。

劉 | 你覺得你們為什麼會那麼相信中共的策略，以至於可以放棄自己的主動性完全跟隨中共的治港方針？

楊 | 從 1967 到 1976 年會看到中國是有發展的。我們看到六〇年代的中國還是很落後，但到了七〇年代，譬如我們去都江堰會有很深的感受，這個水利工程可能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覺得沒什麼，但我們當年看會覺得很高科技、科學進步。

我們從 1973 年開始做「中國周」，一開始都是做山河風景，但後來開始做「四個現代化」，1976 年「中國周」還特別有一個部份是講大陸的科技發展，當時會看到很多實質例子去證明中國在進步。當然，事後很多年來看，我們會知道那是因為很多資源被調動去催谷這些項目，就像「要核子，不要褲子」那樣，這當然就會催谷出一些成績來。還有，我們當年不知道當中有些是有誇大或造假成份的。

於是，當我們看到那些景色的時候，就會覺得中國是在進步的。這其實有點像今天建制派說要壓制民主才能有經濟發展的說法，不過我們當時沒有民主的意識或概念而已。

我們當時的想法中如果有什麼是類近民主意識的，那就是集體主義。但保持這個想法，就會得出「不如大家一起忍一忍、一起窮，先發展好水利這些對整個國家是好的」東西。而因為看著這些大的方向，我們會傾向忽略一些細節，譬如發展水利的過程是怎樣的？會不會助長貪污等？我們當時是長期地習慣了在不懂的情況下依然去 buy 中共，面對不懂的東西我們會跟自己說「就是這樣的」、「不懂很正常」。

背後其實是認為「集體」的力量很重要，很多東西一個人做不到，要集體才可以做到，所以我們才認為要服從集體，不可以有自我。我們經常會看到很 macro 的東西，蓋過了生活上一些 micro 的觀察和感受。

面對四人幫倒台

劉 | 都說四人幫倒台導致了國粹派的自行瓦解，當年四人幫倒台那麼大的事情，國粹派是怎麼回應和處理的？

楊 | 四人幫倒台之後，國粹派陷入了震驚之中，或者說是崩潰吧，而那是當時的組織沒有處理的。我印象中四人幫倒台之後就開不成任何大會了。不但是這些批評與自我批評，所有大會都沒了，因為大家崩潰了，根本沒有人再召集大家去總結和理順這個思路。可能私底大家三三兩兩會做？但總之沒有大會了。不過，我想當時國粹派中，在震驚和崩潰以外，還是有不同反應的。

有一些人認為四人幫是對的，認為鄧小平和華國鋒趁著毛澤東死了奪權，認為四人幫倒台背後是路線鬥爭。那是因為他們相信四人幫是要搞社會主義的，所以到了 1978 年改革開放的時候，有一些國粹派是會覺得中國在走回頭路。

另一批人對於四人幫倒台的反應則是覺得 relief。那個 relief 是源自於在四人幫時期自己已經有很多矛盾，其中一個矛盾就是覺得四人幫一方面說要反對資本主義，另一方面香港在四人幫當權底下卻還是資本主義。當然，中共為何要香港維護資本主義有很多解釋，因為要我們長期隱蔽、香港要長期利用等。但這就累積了國粹派心中很多矛盾，所以四人幫倒台有些人會 relief，因為他們覺得「唉！這樣就不用再面對內心的矛盾了，不用再壓抑自己、不讓自己做自己了」。

另一批人則是不知所措。但不知所措之餘，他們會跟隨上面新的執政者的看法。譬如當時陸陸續續上面會有解釋下來，報紙也需要去解釋為什麼四人幫要被打倒。這些報紙會去講一些揭露四人幫問題的所謂黑材料，譬如四人幫如何腐化、四人幫要走資本主義路線、打倒四人幫是為了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所以也會有些人是相信這些東西的。而由於當時有很多這樣的黑材料，所以有些人就算認為四人幫倒台是因為新的當權者要奪權而已，都逐漸會認為「無論如何四人幫也不是好人」。

自 1976 年後，國粹派有了一個懷疑的心情，大家一方面在懷疑，一方面也有些人開始選邊站，站到親近新當權者的位置。這個懷疑的感覺持續了至少兩年。到了 1978 年改革開放的時候，大家就更加分化了，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時候，死硬派會覺得這是鄧小平走資的鐵證。也有一些比較務實的人，認為不該問那麼多姓社還是姓資，總之「不管黑貓白貓，能改善人民生活的就是好貓」。兩極化更加強烈了。

劉 | 兩些不同看法的國粹派之間的矛盾有暴露出來嗎？會辯論或吵架嗎？

楊 | 沒有，我甚至懷疑國粹派都沒有寫文章討論這些事。你可以看看當時的學生報，上面一定會有討論到改革開放的，不過那不是國粹派的內部討論而引發的討論，而是社會上普遍的討論。我自己的觀察是，國粹派當時的沉默首先是來自於想不通，而想不通後就索性不去想了——我就是這一類。

我知道大家私下都會就四人幫倒台有一點討論。但一碰到核心理論爭論就會立刻停，大家都不太會觸碰到到底中國是不是還在走社會主義道路，鄧小平是不是在走資本主義等。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用現在的思考來回想，可能是因為不想再有社會派和國粹派那種耗人的討論出現。你懂我意思嗎？

劉 | 意思是因為社會派和國粹派那樣的討論已經讓大家覺得很煩、很耗神嗎？

楊 | 是的，而且如果變成內部爭論會難以讓人接受。所以在不習慣這種爭論的情況下，大家只能去聊比較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國家要富強，因為在這點上大家沒有爭論。

老實說，這些很多是我現在要回推去解釋，不太記得當年發生什麼具體的解釋了。在我寫書的時候，以及接受鍾耀華的訪問之後，我發現很多東西已經難以記得了——莫

說當時的思考，連當時很多 **factual** 的東西我都不太記得。我有想過要不要找一些會催眠的人來才可能 **recall** 那些細節，哈哈。

劉 | 但四人幫也不是第一次中共有那麼大的轉變，劉少奇倒台、中美建交、林彪事件等都是中共的大變動，國粹派在之前會不會已經有人因為覺得解釋不了就走了呢？因為我聽周奕說中美建交的時候曾經引起過左派內一些震撼，有人會覺得怎麼可以和美帝當朋友呢？

楊 | 我不太認識這樣的人，所以在我的認知裡面就沒有這些人，但可能是有這些人的。可能是兩代人吧？中美建交可能對六七暴動那一代人比較有影響，我所知道的我們這一輩就真的沒有。面對中美建交，我們倒是沒有特別的感受，可能是因為我們被教育成認為「**用什麼手段都是沒問題的**」、「**目的才是最重要**」。所以我們和現在所謂「左膠」的左翼會注重手段和目標的一致性，其實是很不一樣，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懷疑自己當年有沒有左過，因為我們是一直在說策略。而你看《毛選》，其實裡面都一直在說策略，所以我們當時會覺得中美建交也沒什麼所謂。

劉 | 當年你們會覺得自己是「左翼」嗎？同樣的問題我也問過曾經在左報工作的周奕，他就說他覺得自己是左翼。

楊 | 如果讓我界定自己當年的狀態，我會覺得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多於左翼，**我當年很多想法都是建立在民族情感之上**。或者我不知道要怎樣才叫左翼吧。所以你說周奕會說自己是左翼也很有趣，畢竟如果當年能在左報當記者，想必也有左校或工會背景吧，所以他的民族情感和左翼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劉 | 我的理解是，他認為愛國、愛民族一開始是受到社會主義的感召，而儘管今天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會被質疑的，在多年來左派的場景中生活，他已經有了不同的 anchor。那些左派工會中的守望相助、為共同目標奮鬥，是至今讓他還會對左這個概念有認同的地方，他的愛國並不是一種被抽空的、沒歷史、沒生活基礎的愛國。所以我也很好奇譬如當年國粹派的組織，為何無法支撐你們熬過四人幫倒台這一關。

楊 | 在四人幫倒台前，那個集體中可以互相依靠的感覺很強。但四人幫倒台以後，組織也散了，互相依靠的支柱也就沒了。更糟糕的是會懷疑自己以前做的東西都是錯的，因此會開始對自己質疑：到底我一直以來做的東西有用嗎？以前的東西到底對不對呢？我猜這是當時很多國粹派同學都有的問題，我自己也在想這些問題。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就只能執著於幾個原則，一些我不會放手的事，譬如「為人民服務」、「樸素」等，當時 1976 年我會執著的也包括「愛國」，因為當時還是有很強的民族情感。但如果一些人沒有這些執著的話，他們很可能就會變回自己以前那個模樣——而很多大學生其實入學是為了追求穩定的生活而已，因此他們一些人會沒有負擔地進入商界，甚至在改革開放後回大陸做生意。不過這種回大陸做生意的也會衍生出兩種人，一批人是發現大陸「可能真的是在走資本主義」，另一批會同意鄧小平，覺得「這樣不錯，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先」。在四人幫倒台後，一些人會沒有了以前那種約束。

那種約束感是什麼呢？以前為了理想而奮鬥，會為了理想約束自己，有一些東西是不可以做的。但這「不可以做」不是一種不開心的約束，所以不是一種壓抑，而是為了成就一種理想才不去做某些事，就好像環保人士不會因為不用吸管而覺得是一種壓抑。但四人幫倒台後、沒有了社會主義目標後，有些人會變得什麼都可以做。

劉 | 是因為長期比較被動，所以就算四人幫倒台，還是支持四人幫的人也沒有辦法說出口嗎？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了緊跟中央的政策，逐漸地就算覺得不妥也不會想指點。

楊 | 對啊，所以我們當年怎麼不喜歡華國鋒也好，也會覺得中央有它的理由，我們總是覺得有些東西是我們不掌握的。

附錄七、2021 年 6 月 26 日阮志雄訪談

劉璧嘉（以下簡稱「劉」） | 請問你是哪年出生的？家庭背景和你初期的政治理念有什麼關係？

阮志雄（以下簡稱「阮」） | 我 1953 年出生，在深水埗住了 10 年，後來去了黃大仙。關於成長的過程，就是街童吧，但我在中學時是很乖的學生，很想把書讀好。我有點古靈精怪，但不會走很前。而在那個時代——也就是 1967 前——很多人都覺得要讀書、上進、改善生活，這個想法在坊間就形成了。我想，當時社會很需要讀書的人，比較厲害的讀了大學可以很容易走到上層，像我這種不太厲害的其實都可以很容易走到中層。

所以到了六七暴動，我雖然感受到他們的英雄主義，但還是不喜歡六七暴動，甚至討厭六七暴動。當時我中一或中二吧，那個感覺其實很簡單：「你搞著我，搞到我無得去踢波。」當時我住黃大仙，其實六七暴動就在附近的新蒲崗而已，但我又不敢去。

1970 年是我正式的啟蒙，中文運動、保釣來了。保釣在當時給我的感覺特別強烈，我記得看到《70》那些人拿著 banner 看著警察的照片——當時還沒有錄影——覺得《70》他們去示威很威！現在想，應該是年輕人的英雄主義作祟吧。

考完會考之後，我在新蒲崗打工。當時剛好是保釣，我一天打工之後去了維多利亞公園參加保釣。我去的時候是一個人，不認識其他人。當我到達維多利亞公園，警察已經把維園封起來不讓人進去參與集會了。於是我就在外圍走了一圈，這是我的第一次遊行。

劉 | 是七七遊行嗎？

阮 | 我不記得是不是七七了，只是記得那一次是不合法的，但那一次以後有爭取到政府開放更多遊行地點。

但在這個以後，我開始主動關心社會多一點，會多留意報章。但其實我之前也不是那種會主動看《中國學生周報》的那種學生，只是在保釣後的想法是想再「走近一點」，就開始留意一下社會言論。

1971 年會考後中學畢業，畢業後我回本校讀中六。其實我分數不太好，可能老師覺得我是乖學生，才讓我升學吧。在那個時候，counter culture 對我的影響要比政治大很多，譬如 Bob Dylan、Beatles 那樣。我當時和同學搞了一份叫《綠角》（*Green Horn*）的雜誌，這個名字的寓意是覺得自己是新生的種子。當時我們用的技術是油印，要用手寫，用鋼筆寫藍紙，然後一張一張地滾，我們每一期滾那百幾份。現在想起來蠻費力氣的，總共出了三期。1971 年的社會很動盪，學校很敏感，我們做這份雜誌時校方並沒有立刻終止我們，但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星期六，我回學校做油印，結果我們編委會有 5-7 人被抓去見紀律委員會。我們當時也不知道什麼事情，只記得要一個一個進去、進去後出來的人也不允許說話。我是第五個進去的，一進去，其中一個老師就指著我叫我認罪，我還問「要認什麼罪？」，我不知道要認什麼罪啊。然後他們在我面前攤開一個 banner，上面寫著「中大的同學都行動起來了，你們呢？」原來，有人做了一塊 banner，但不知道是誰做的 banner，學校覺得是我們在鬧事。我之前都沒有見過這個 banner 嘛，所以我就跟他們說：「我是第一次看到這個 banner。」他們接續審問了我一輪，但也沒審出什麼來，因為我的確是第一次看到那個 banner。我記得我出來時，有一個老師指著我說：「你們這批共產黨！」

在這個事情後，雜誌的出版都要給老師看，有些同學可能有點意興闌珊，也可能是真的在擔心，就沒做下去了。至於我，其實真的沒有這些擔心，因為我覺得只是寫文章而已。到了學期尾，我就被趕出校了，當時有三個學生被開除，我是其中之一，很明顯是因為剛才說的事。但出事以後，其實我又沒有什麼大震撼，我就是傻呼呼的吧。我心想，既然沒有學校讀書，那我就自修去考試吧。我後來去考中大，但沒考上，最後就進了浸會讀 sociology。

劉 | 當年一開始是怎麼接觸到《70 年代雙週刊》的？何時加入到《70》的大家庭裡？
加入時的原因為何？

阮 | 1972 年我被趕出校，所以 1973 年我在做散工。記得有一次收到《70》的傳單，說五一勞動節什麼的，傳單還提到可以去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開會和他們談談。所以我其實一開始是 outsider，或者說是 sympathizer 吧，因為我不是那種會寫文章給《70》的人，我不懂得投稿。反而是那次五一以後就開始去幫忙。其實當時的我是 look up to《70》的，覺得他們很正，但其實又說不出為什麼正，總之就是覺得很吸引。因為我是無端端被趕出校，無端端就成為「抗爭份子」，我就開始去《70》了。記得他們當時出了一本好像叫《青年先鋒》的刊物，還有一個 A4 size 的《民眾報》，刊登一些比較在地的文章，譬如講公屋居住環境什麼的，我們會去工廠派那些東西。

劉 | CIC 和你們的關係是什麼？

阮 | 當時 CIC〔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有少少資助我們。但他們真的是做基本上算工會組織的東西，譬如工人培訓、工人法律班、爭取工人假期這些基礎的工會工作。和我們關係不大，我們會說他們是「改良主義」。

但我去《70》時，其實已經過了《70》最厲害、最風光的階段。我 1973 年去的時候，《70》長期只有幾個比較活躍的人了。雖然說大家還是維持一些讀書會，但很明顯 to be honest，當時大家都沒真的做事情，我上去也是在 hea〔遊蕩〕。我上去時吳仲賢已經離開了，所以關於吳仲賢的事情，都是我後來聽回來的，自己沒有經歷到。聽說當時一些《70》的人在歐洲和托派聊天，那些中國托派經歷過很多事情，理論水平很高，就說服了某部份《70》的成員接近托派，這些《70》成員回來以後就用托派理論繼續運動。

劉 | 當時托派會認為無政府主義的《70》缺乏長遠的工作計劃及革命目標，只是「有事就搞」，也缺乏組織。你是怎麼看這個批評的？

阮 | 對啊！我覺得他們說得對。以我自己的感覺來說，我去《70》時，理論最強的人已經不在香港了，這是第一。第二，我們當時是用意識形態來分是非對錯，為了服務自己的觀點再去找理由、講結論，所以我們看到的就一定只有「蘇聯墮落」、「官僚主義」這些結論。第三，我們當時都很抗拒組織，因為覺得蘇聯墮落，所以我們會把所有組織工人、無產階級的活動都看作是有人要「利用工人」去為自己奪權。因此我們就認為自己「不應該再重複這個模式」，我們當時會說「革命來自群眾」，應該是「群眾自己掌握運動的方向和目的」。現在想起來，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逃避。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想的，但我現在會覺得當時我們沒有認真地對社會理解和做研究。我現在會認為，真正相信一個事情，應該建立在細細研究上，然後透過研究去推一個結論，再去參與一個運動——我們應該去 step by step 建立革命基礎，而不是意識形態出發。但當時的我們，其實沒有足夠認真地去理解這些。

劉 | 《70》內部的氣氛是怎樣的？為何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可以走在一起？

阮 | 其實我上《70》時，應該有十個八個人，但比較經常上去的是五六個吧，大家已經沒有認真的政治討論。和《70》的大家相處的感覺是，大家都像「近親」那樣。我們聊天都會一起數落資本主義和中共，說「資本主義衰」、「中共衰」，要不然就是聊很日常的東西。《70》其實是 friendship 多過 comradeship，不會有那麼強烈的覺得大家要以一種 comrade 的身份一起幹一個東西。讓大家可以走到一起的，比較多的是共同生活和興趣。譬如莫昭如和吳仲賢還是很好朋友。吳仲賢後來在澳洲，帶莫昭如開車到處走，莫昭如也很開心，他以前在澳洲讀書嘛。

劉 | 你參與了 1974 年反加價運動，對嗎？

阮 | 1974 年，我已經去了浸會大學讀書了。第一個反加價集會應該是托派搞的，看到托派搞了集會後，大家開始想要不要多做一點事情，這是初期的討論。我記得我們一堆朋友在想要幹什麼時，傅佬炳提議：「我們做些什麼吧，譬如宣傳大家禮拜日去參加集會吧。」於是就有了街頭宣傳的行動。

在街頭的宣傳不會說比較深入的東西，這是街頭宣傳的侷限，而且就算要我說，我也不是很會說。我們在新蒲崗的宣傳隊抓緊工人中午吃飯和放工時間，去派傳單、宣傳四不交。這個和托派講四反不一樣，**我們當時覺得托派整天在反，但「反乜 q」呢？行動才是最實際的，行動才是對的。**那四不交就是指向行動的。除了宣傳四不交以外，我們還喊了要工人佔領工廠。我們自己後來會反思佔領工廠這個口號，因為我們真的沒有什麼經驗，如果工人真的佔領了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應對。我們當時是看了法國五月風暴，才会有這些口號的出現。但現在我會反思，我們當年這些年輕人用喊口號其實不太可能 motivate 到工人，**因為我們其實沒有真的在組織工人。**我現在都很少再用口號就是這個原因。

我在上《70》之前，只看到運動裡面最 eye catching 的東西，那就是上街。但我去《70》時，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多上街的氣氛了。所以，1974 年突然說有反加價可以上街，我是有點興奮的。加上反加價運動時《70》蜀中無大將，人很少，而又很受他們的行動主義影響，**覺得自己沒有讀很多書，就更加傾向要多行動。**

宣傳隊的工作大約到了第三天就出現了警察阻擾。當年還不用隨身攜帶身份證，我記得警察問我什麼名，我說「我叫人民」。當年的我們沒有那種恐懼，因為年輕吧。

我是一上《70》沒多久就遇到了反加價，但 1974 年社會上的運動氣氛其實大不如前了。社會總體氣氛就是大家都想要搵食，總體經濟處於上升階段，所以我們宣傳那麼多，一般社會大眾也不會因此同情你，但同時也不會討厭你，他們會覺得你說什麼也沒差。

劉 | 這是一種不痛不癢的感覺吧？長毛說他認為六〇到七〇年代總體經濟是上揚的，而從六〇年代窮過的年輕人在進大學的時候，當然會激進，可一畢業都會向上流動，就不抗爭了，所謂火紅年代其實是年輕人之間的火，是很小的火而已。但與此同時，1973年股災、1974年通脹，看起來大家還是有點不滿。所以到底社會是怎樣的呢？是火紅還是不火紅呢？你怎麼看？

阮 | 雖然我自己沒有特別研究社會氣氛的成因，但我同意長毛這個說法，就是總體社會運動是慢慢讓運動搞不起來的，人們怨氣沒那麼大。如果說為什麼1974年我會那麼主動參加運動，那個主動性的背後也是看到1974年的一些特點吧。1973年的股災雖然不是對所有人都有影響，但還是看到它對某些一般市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記得在電視看到過一個畫面，一個工人階級穿著的人一副很憂愁的樣子看著股票市場數字的起落，看到他那個樣子，你覺得聽到了他內心一定是在說：「死喇、死喇、這次仆街喇、什麼都沒有了。」當時股災有很多平民百姓受害，因為股票市場興起，很多人都是一家人把一同存了一段時間的錢集體拿去買股票，股災一來就所有錢都沒了。

我們當時的分析是，資本主義為了利潤的經濟運作一定會「爆」、會有金融危機，而資本主義的「爆」也會伴隨不滿和抗爭。所以，從理論上來說，我們覺得資本主義「爆」的時候我們就要動員。加上當時在這個情況下還要什麼都加價：加水費、加電話費、加交通費、加屋邨租金……我們覺得自己抓到了一個點，一個直接影響大家的、關乎民生的點，所以我們是從一種歷史觀和理論出發去發動四不交的。但現在看來，就會覺得當年有點一廂情願。我們當時搞社會運動時有一種很浪漫的情操，我們會以為自己叫的話，大家就會一起造反，後面就會有人跟。所以我才說長毛的分析是對的：1970年之後社會運動就退潮了，那個經濟崩壞會讓運動氣氛稍微又好一點，但終究來說，社會矛盾並沒有那麼突出，市民百姓比較可以逆來順受。譬如，我記得有次有工會要求有薪假期，有一個社會人士——我忘記了是誰——說了類似「香港的工人很喜歡上班，有假期是不好的」的話。他的 exact wording 我忘記了，但我記得的是除了 activist 以外，沒有太多人去反對這個說法。這就顯示了，事實上大家不太關心要不要放有薪假這個

事。所以回過頭去看，我們在 1974 年以為自己可以發動工人的有規模的抗爭，是有點脫節的。

劉 | 在新蒲崗集會之前，新成立的托派團體和《70》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你們是怎麼一起絕食的？據稱當時有黑旗和紅旗一同飄揚，那是《70》帶過去的旗吧？

阮 | 我不是絕食者之一，我是旁邊叫囂吶喊的哈哈，傅佬炳是絕食者。絕食就是托派那邊派了一人——但我忘記了是誰——我們也派一個去。新蒲崗有舉紅黑旗子的，黑旗是《70》帶去的，紅旗是托派帶去的。

我們和托派的關係是這樣的：當時《70》只有很少人，而且大家理論性不多，大家的討論多停留在口號和情緒之中，但在理論上我們不同意他們對蘇聯和中共的看法。具體來說，他們覺得蘇聯是墮落的工人階級國家，只是被斯大林壟斷所以才是問題，所以他們想要推翻的是官僚的共產主義，維持 1917 年革命的成果，維持蘇維埃政權。如果世界大戰的話，他們是要維護蘇聯的。我們當時覺得：「極權就極權吧，唔需要保衛，直接推翻就好了。」

當時有一篇文很重要，顯示了我們之間的差異。七〇年代美國發表了一份關於中國國情的報告，報導了中共在幾個大型運動中所造成的人命傷害。《70》的朋友介紹了這個報告，那篇文章叫〈殺人盈野的暴行〉。但托派的人覺得《70》這樣做是不對的，因為那是在幫助美國宣傳反共，他們覺得共產主義是很重要的、很正確的道路，會覺得幫美國罵中國在總體來說是在幫倒忙。情況就好像今天本土派支持美國那樣，比較左翼的不是本土民粹的，就會覺得「你怎麼可以支持美國 Trump」。當時也是這樣，《70》沒有根據共產主義的歷史進程去理解事情。不過，在 1974 年我進《70》時，其實在私下我不太認識他們，我只認識岑建勳。

絕食時我有被抓，傅佬炳也被抓了，但他沒有被告。我則是一開始被告襲警，原因是我對著警察 fing〔潑〕油漆。後來沒有告我襲警，改說我破壞公物，好像是罰款 300 和守行為。被捕後其實我完全不害怕，因為一般人認為有案底會毀你一生，但我自己不是在職業事業上進的人，我隨便找個教書職位一輩子沒問題，而當年中學畢業就可以去

教書了，所以被捕時我還覺得自己上了一課！而且，當時我又不用坐牢、不用被人打。在警察局時警察對我們也是客氣的，問我們吃了沒有，還幫我們叫外賣，我點了餐蛋治。

在警察局我被放出來時，我記得因為不想回家，就去了《戰訊》那裡睡，不見熟悉的人，只是見到岑建勳。後來上法庭時，法官把話說得很清楚，他一方面叫警察別額外再罰我們，另一方面他也說知道我們對社會正義有期望，但要遵隨法律的途徑。

但運動結束後，也就是 1974 年之後，我是 at a loss。我自己的設想是社會運動需要很多理論建設、組織建設，但我沒有這方面的才能和想法。《70》組織上頗鬆散，只是些朋友很努力地支撐著做事。譬如《70》最擅長的就是印東西。我 at a loss 時就去了外國讀書，這個 at a loss 連帶的是我最大的恐懼——對於生命的不知所措。我心底裡知道自己不是搞革命的材料，但我口說出來、我的行為做出來，都指向生命的 **purpose** 就是要搞革命，這就導致我有了 **existential fear**。這可能和存在主義的影響有關，存在主義說的 **meaning of life** 很影響我們，我更覺得所有東西都 at a loss。所以 1974 年以後就有些憂鬱，身體 develop 了另一個東西，這抑鬱一直纏著我，到八九後，那要命的腸病就來了，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劉 | 你離開香港去外國讀書和 1974 年以後的低潮有關嗎？

阮 | 一方面因為我在浸會讀得不開心。我們社會學的老師都是看完教科書後依書直說，都是用 **text book approach**，界定乜 **term** 乜 **term**，譬如「什麼叫 **social self**」。所以我有一點不耐煩，就離開了浸會——浸會的教育無法滿足我對 **inspirataion** 的渴望、對結構性分析的渴望。我記得吳仲賢有一篇討論香港青年學生運動何處去的文章，分析了「青年運動怎麼出現」。我在學校社會學的 **presentation** 中，用了那文章的框架，吳仲賢的文章教了我在浸會上學期間都學不到的東西。

另一邊廂，我是 1975 年離開香港的，也和運動有關吧。有三、四個其他人離開了去讀書。我們很多人都有一種 **hang up** 的感覺。

劉 | 可以多說一點什麼叫 hang up 的感覺嗎？

阮 | 這一階段，應該是我回港後，民眾、黑鳥時期，在八〇年代中段。我們都在思考要怎麼和 establishment 打交道。郭達年一開始就認為不應該打交道，應該靠民間的力量來 sustain 運動。莫昭如覺得如果沒有這些支援，沒有可能做到那麼多東西，雖然莫昭如也知道，有此東西不會立刻見到 subversiveness，但還是覺得有一些幫助。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和年輕一代，真的需要很多時間去互相磨合，而且也未必一定磨合到。很多東西都要理解，但不要嘗試 convince，譬如現在年輕人要衝的時候，我怎麼可能和他們說「溫柔革命」呢？……主要不要做老屎忽，不要 condescending，不要下去 convince 他們、補課，要先 convince 自己，試下用自己的方法去改變懶思考的習慣。

劉 | 面對 1974 年後港英明顯的懷柔政策，你們會覺得挫敗嗎？

阮 | 我覺得我們根本不懂得如何討論政府的懷柔政策。《70》的運動有一個很大的面向是意識形態出發的，我們經常問別人是不是社會主義，用意識形態去分人，其實是因為沒有足夠豐富的 discourse。所以，我們當時用意識形態出發，就不太會看殖民主義懷柔政策如何，我們只會批判，覺得懷柔政策也是為了延續殖民統治而已，一直想要批判，但不夠論述。雖然《70》有很多不足，不過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當時的文化活動還是很 grounded。

劉 | 面對國粹派攻擊托派，當時的《70》和國粹派之間的關係為何？

阮 | 早期保釣時，大家沒有那麼分得清楚誰是國粹派誰是托派，大家都面對共同的敵人，要面對美國把釣魚台交給日本。當時參與運動的人，沒有覺得自己是民族主義者、

共產黨的同路人，還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是朋友的關係、是戰友的關係。譬如楊寶熙一開始也是《70》的人，但她後來自己分出來成了國粹派。

但到了國粹派興起，我們覺得國粹派是極權主義的毛澤東主義，他們的心態就是打擊異己，要 isolate 敵人。記得有一個國粹派在港大搞活動，我當時好像剛進《70》，我拿著黑色旗子衝進去。結果後來陳毓祥寫了一篇文章，說托派拿著黑旗去港大搞事。他明明知道無政府主義才是黑旗，但他卻把黑旗說成托派所為。他們為了 isolate 敵人就會這樣做，那時托派是他們的大敵，要先孤立來打，而無政府在他們眼中只是散兵游勇。

劉 | 可以談談你們跟逃港紅衛兵之間的關係？

阮 | 吳甦、虞雪等這一批紅衛兵是和《70》有接觸。我去了才知道有紅衛兵和《70》有朋友關係，他們一開始比較經常來，但我在《70》時他們已經很少上來了。我對他們的認識不多，我是一個小卒而已。譬如《敢有歌吟動地哀》出書時，我就是背著去不同的書局賣。第一版《敢有歌吟動地哀》賣得很快，這是最早期的傷痕文學——當時其實連傷痕文學這個詞都沒有呢。**我們當時覺得省無聯很正，很擁抱省無聯。**我們還把《中國向何處去》還有李一哲大字報翻譯成英文。

其實省無聯的東西是他們在湖南時寫的，這代表紅衛兵的理論基礎是很強的。現在很多人以為紅衛兵只是不同派系但都是為了官僚而起，但是省無聯那個文章我相信不是唯一一篇，他們其實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你會看到裡面有很徹底的革命意識，要無產階級掌握命運、自主推行革命，不是為了毛澤東而已。所以在文革裡面，特別是文化圈裡面，其實他們很早就知道毛澤東搞文革是奪權，所以有些人就用自己的方法來回應，譬如有些人會打擦邊球、會創作，有一些人會透過大串聯去旅行，特別是詩人。紅衛兵中有很多不同的態度，文革後來有群紅衛兵上位做生意很成功，但也有些人看透了毛澤東，會看到權力的鬥爭，會感受到殘酷，他們雖然只是很少數人，但他們看到這些發生的東西，會知道那個鬥爭不是一個出路。

紅衛兵的特色是，他們自己的理論基礎很強。雖然他們長年在大陸受教育，理論基礎是建立在毛派和蘇聯的革命理論，但是這批紅衛兵來了香港以後，有機會接觸西方的革命理論，看到了新左派、佛洛姆、佛洛伊德、看到南斯拉夫講「人性的社會主義」，他們的辯證思維讓他們很容易找到什麼 narrative 是 convincing 的，他們會對本身所學有反省。他們其實知道本來自己那一套很教條，知道這是有問題的、有不妥的，所以就會有不同的反省。吳甦、虞雪後來在《明報月刊》用佛洛姆、Herbert Marcuse 等人的 humanistic Marxism 理論分析紅衛兵的人格，去解釋文化大革命中人們的心理動力，還有怎麼構成一種「獨裁的人格」，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寫完。但這顯示了他們在香港接觸到新左思潮後的一些嘗試：他們看到自己的盲點，想從簡單的左右意識形態走出來，想回看文革這個事。在港紅衛兵的那種行事心態都是和自己本身的討論及關注，和想 overcome 的東西有關的。

劉 | *Minus 9* 有介紹《黃河》，你們和《黃河》的關係是怎樣的？

阮 | 莫昭如是要不停繼續做事的人，他當時覺得在香港做雜誌沒有可能、沒有足夠的人和銷路，那就做一個沒有《70》那麼 heavy 的東西，就開始對外國做 *Minus 9*。莫昭如想繼續發生一些東西，也想將香港發生的東西介紹到外國去。此外，香港也是一個認識中國的窗口，那介紹《黃河》也不奇怪。關於我們和《黃河》的關係，我不是很記得。不過對莫昭如來說，任何可以維持社會運動的事情，無論是多微小的事情他都會 promote。

劉 | 很多人稱《70》是一本無政府主義刊物，你是怎麼看待這個說法？你會稱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嗎？

阮 | 《70》的人對「說不說自己是 anarchist」這個事都有很不同的反應。但我之所以不說自己是 anarchist，是因為我覺得我做不到。我總覺得自己可以做到的東西很微小，我

只能 maintain 住那些微小的東西，譬如在教育上，我就覺得是那些「很小的」但我可「執實」的東西。

不過這也看你怎麼看無政府主義吧，有時候主義這個東西可以是很絆倒自己的。對我來說，我關注的是權力問題。有一個對無政府主義的說法是：「anarchy is nomadic dream of a nation without a state」，一個沒有國的家園。游牧人有家園，但沒有國家，這樣的無政府主義 in a way 是一個很有價值的 foundation，但怎麼 achieve 就有不同的看法。這樣的無政府主義已經不是一種主義或政治組織或行動路線——當然也不能排除有些無政府主義會想要制訂這些。

有一次，我和莫昭如及郭達年去講一個講座，那個 talk 是關於 border 的。政治上的邊界是國界，主義上的邊界就是意識形態。我們要怎麼超越權力為我們定下來的邊界呢？我自己在講故事，在教育部份，我就是想要和小朋友一起去超越想像的邊界，透過想像我們對自主的掌握可以很豐富。這個創作過程對我來說就是一種超越邊界的實踐，我就是做了，這是我現在覺得很實在的一些東西。

我都覺得很多東西的內容一直在變，我拿教育作為一個例子。我們都知道教育是一種操控，這種操控一直都有，學校都是 create manipulation，但現代社會的情況是在改變的，教育到底是不是 manipulation 也在改變。我的意思是，現在的條件是，很多人不用上學也學到東西了。我們身處的那個年代，教育是一個很大的工業社會結構，但我覺得我們在教育上處於一個 historical moment：學校越來越 obsolete，學校曾經做到的現在很多其他東西都在做，而學習的渠道也變得很多。當然，你們是在學校做論文的，你會很了解學校怎麼 dominate 我們學習的能力，譬如對你們來說，這可能是生活上的考慮依然要 pass through 的 ritual。但我們在一個 historical moment，現在其實不需要學校也可以學到很多。而且，就算學校給你一個 certificate，job nature 也可以擺脫。世界在變，那我們怎麼參與在當中，怎麼回應？

劉 | 1977 年的 Social Revolution Anarchist Federation 通訊你有印象嗎？記得 Bruce Allen 嗎？

阮 | Bruce Allen 好像美國還是加拿大人，是那種很積極聯絡的人。我和他其實不熟，但我記得他知道我來自香港後很積極，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I'm Bruce Allen, I have been an anarchist for three years」。我當時就笑，覺得這個人好古怪哦！信無政府主義好像信教那樣哈哈。他後來好像在西班牙，是 CNT〔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全國勞工聯盟〕開第一次大會的時候吧，莫昭如的朋友有去，說見了他。他參加的一些工會活動是比較工團主義的，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美國傳統工會其實很建制，都變成要賺很多錢去國會 lobby 那種。

劉 | 關於七〇年代的運動和你自己的參與，現在回顧起來會有什麼樣的反思？

阮 | 經了《70》那段時間，幾個運動以來，會發現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這個東西慢慢浮現出來——就是 at a loss。以前我們在書局吹水，胸懷大志，想要改變世界，但找不到 ground。但我到現在，都覺得裡面的信念是 valid 的：要自主組織、要過自己的生活。我們以前會把這個東西放很高。

從菜園村開始，看到周思中等人可以在不少層面上把這個很高的東西做出來，就讓我看到生活上其實有很多實際的東西可以讓我們慢慢做到那個信念。周思中他們和村民建立關係不是帶領村民，而是商量對策。這對我來說，就是社會結構中一種非權力化的組織，那就很有無政府的感覺。

皇后碼頭抗爭也是如此。他們搞保衛天星皇后不是為了懷舊，而是有對城市的權力結構的看法，裡面有批判，也有建設。我記得朱凱迪當時帶大家去看天星碼頭的 building，我才知道這樣一個建築和城市發展、起飛、社區建設息息相關。他們在做的都是很實在的東西，和我們當年那個狀態不一樣，他們的 grounded 和 solid 是我們以前沒有的。記得有一次我和 Billy 去皇后看他們，我當時就和 Billy 說：「我回來了。」

社會運動不會離我很遠，但現在自己呈現的方式不是走前線。他們搞得很好，我也無謂「插隻腳埋去」，也沒這能力／量。這一班八十後給我一個 perspective，讓我看到

自己最早期的東西，但我缺乏的他們都走出來了。我當時和 Billy 說「我回來了」的意思是，我找到了 reference。後來我做了一個演出，就是《麵包與黑玫瑰》，這是在整理自己的運動反思、失落、歷史、還有我身體的病，希望是在重整了失落的歷史後才能看到的，這樣看到的希望才比較 solid。所以我私下都跟他們說，我很感謝他們。